



倍倍尔文选

倍倍尔文选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

人 民 出 版 社

目 录

序 言	1
赞成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1868年7月8日和8月20日)	1
打倒宗派主义! 国际工人协会万岁! (1869年6月23日)	7
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 组织章程的报告 (1869年8月8日)	9
我们的目的 (1869年12月)	17
巴黎公社——欧洲无产阶级的前哨战 (1871年5月25日)	67
革命,当然是我们的纲领 (1872年3月13日和15日)	72
基督教和社会主义 (1874年2月)	80
必须给妇女选举权 (1875年5月25日)	96
为德国的劳动保护立法说几句话 (1877年4月18日)	98

非常法不能消灭工人党·····	109
(1878年9月16日)	
妇女和社会主义(摘录)·····	135
(1879年)	
答复·····	161
(1880年4月10日)	
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使人充满热情·····	167
(1886年2月3日)	
沙尔·傅立叶传(摘录)·····	172
(1888年)	
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83
(1889年7月17日)	
向劳动阶级进一言·····	192
(1889年1月)	
工人阶级的党反对非常法(摘录)·····	212
(1889年11月7日)	
面包业工人状况·····	231
(1890年9月)	
第一个十月·····	251
(1890年10月1日)	
在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63
(1891年8月18日)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66
(1891年10月16日)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的策略讨论情况的总结·····	289
(1891年10月19日)	

关于未来国家·····	312
(1893年2月3日和6日)	
在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上的两篇讲话·····	387
(1893年8月7日和11日)	
在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92
(1896年)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 结束语(摘录)·····	394
(1899年10月13日)	
工会运动和政党·····	398
(1900年)	
回忆李卜克内西·····	416
(1900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侵华政策的态度(摘录)·····	437
(1900年11月19日)	
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	469
(1902年9月)	
就副议长问题及有关事宜的补充意见·····	499
(1903年)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的 讲话(摘录)·····	528
(1903年9月17日)	
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的两篇讲话·····	551
(1904年8月17日和19日)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566
(1905年9月22日)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	

性群众罢工的讲话·····	587
(1906年9月26日)	
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两篇讲话·····	609
(1907年8月18日和19日)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关于 “批准巴登预算”问题的讲话·····	619
(1910年9月20日)	
约翰·巴普提斯特·冯·施韦泽·····	651
(1911年)	
为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 阶级斗争》写的序言·····	661
(1911年)	
人名索引·····	666

序 言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战斗的一生中留下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在党的会议和德国帝国国会中的发言以及一些理论著作,这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宝贵的思想财富,也是研究工人运动史和近代政治与社会史的重要材料。

倍倍尔于1840年2月22日出生于德国的科伦—多伊茨。父亲是普鲁士军队的一名下士,母亲是女仆。倍倍尔幼年家境艰难,6岁时丧父,14岁时又丧母,不得不在1854年辍学去当旋工学徒。1858年学徒期满,经过在德意志南部和奥地利的漫游后于1860年成为帮工并在莱比锡定居,1864年成为独立的施工。

当时,莱比锡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重要的活动地区,工人运动在经过1848年革命失败的挫折后已重新兴起。倍倍尔于1861年参加莱比锡职工教育协会,1862年曾当选为协会的第二主席。1863年他参加创建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1864年被选入常务委员会。倍倍尔在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后,通过参加工人经济斗争的经验教训以及对当时德国的民族统一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阶级矛盾的体会,逐渐摆脱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认识到工人阶级开展自己独立的政治运动的重要性。1865年他结识威廉·李卜克内西,通过他接触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在1866年底参加了第一国际,这时他的阶级

觉悟进一步提高。1866年他和李卜克内西一同参加创建萨克森人民党,1867年2月作为这个党的议员进入北德意志联邦制宪议会,8月又和李卜克内西一同当选为第一届联邦国会议员。同年10月,倍倍尔当选为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主席。在他和李卜克内西的影响下,联合会加强了与第一国际的联系,并不断宣传第一国际的思想,同时积极主张建立一个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1868年9月,在纽伦堡举行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倍倍尔起草的、以第一国际共同章程序言为基础的新纲领。纲领声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的目的是要消灭一切阶级统治,政治自由是工人阶级取得经济解放的不可缺少的前提。纲领还声明,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赞同第一国际的努力。这次代表大会为德国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奠定了基础,也是倍倍尔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中,斐迪南·拉萨尔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拉萨尔主张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建立独立政党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幻想在普鲁士君主国家中依靠普选权和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在组织上鼓吹个人崇拜和宗派主义,这都是错误的。1864年拉萨尔去世后,他的主要继承人约·巴·冯·施韦泽继续执行他的错误路线。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为了实现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与施韦泽进行了斗争并争取和团结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内以威廉·白拉克为首的反对派。在这一基础上,1869年8月在爱森纳赫举行了全德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倍倍尔在会上作了关于党的纲领和组织章程的报告。纲领是由他以上述纽伦堡纲领为蓝本起草的。纲领要求废除一切阶级统治,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切奴役的基础,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纲领着重指出,政治解放是工人阶级求得经济解放的前提。这个纲领

虽然还包含一些模糊观点,但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第一个在一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它声明自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德国支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虽然起初并未被选入党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但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是党的“创始人”。在这一期间,倍倍尔研读了《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提高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水平。爱森纳赫大会以后,他受党的委托到南德意志作了鼓动旅行,宣传党的纲领原则。他还发表了一系列与南德资产阶级自由派论战的文章,并在1870年以《我们的目的》为书名汇印成单行本出版。倍倍尔的这一处女作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曾多次再版。

倍倍尔是党的杰出的议会活动家。他是进入德国议会的一个工人代表。这一成就曾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从1867年起,除了1881年到1883年这一短暂期间外,他一直是德意志帝国国会的议员,直到去世。他出色地贯彻了革命的议会斗争策略,充分利用议会讲坛,揭露和反对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军国主义、殖民主义政策,为捍卫和扩大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选举权、结社权、罢工权等),争取提高工人的经济地位,改善和扩大社会立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和李卜克内西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所采取的立场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典范。在战争爆发时,出于对战争的复杂情况,特别是对德法两国工人阶级共同利益的考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1870年7月21日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表决军事拨款时投了弃权票。在法国战败,战争在德国方面已成为侵略以后,他们在11月26日的国会上,投票反对批准继续进行战争的拨款,并且发言抨击政府的侵略意图,公开表示要与法国人民团结一致。为此,他们于12月17日以“图谋叛国”的罪名被捕,一直监禁到1871年3月28日。1871年5月25日,倍倍尔在国会发言

反对进一步筹款支付战费和兼并亚尔萨斯—洛林，声明支持巴黎公社。他大声疾呼：“过不了几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消灭痛苦与懒惰！’就会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倍倍尔在普法战争期间的一系列言行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和德国工人阶级的支持，同时也激怒了统治阶级。1872年3月，他和李卜克内西在莱比锡以叛国罪受审，被判处两年要塞监禁，倍倍尔还被控犯有渎君罪而加判9个月监禁。

倍倍尔利用两年零9个月的服刑期刻苦学习。他再一次钻研了《资本论》，阅读了大量历史、哲学、经济和自然科学著作，并学习了英语和法语。他还撰写了一些文章和著作，支持社会民主工党的斗争。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通过这样的学习，倍倍尔进一步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时社会民主工党开始与全德工人联合会为合并进行谈判。倍倍尔一贯主张争取德国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反对同拉萨尔的错误理论妥协，因此他曾希望马克思发表几篇文章批判拉萨尔主义。他对李卜克内西参与起草的哥达纲领草案很不满意，曾写了一份对立的纲领并打算发表。后来由于李卜克内西的要求，并且担心合并会遭到妨碍，他才同意不公开反对草案，而只接受它作为“临时性纲领”。由于倍倍尔在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前一个月才出狱，所以他未能对合并直接施加影响，但是，仅从他对纲领草案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他在这一时期已经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

为了镇压日益壮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俾斯麦于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党和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和出版物遭到查禁，大批党员被逮捕或驱逐出境。倍倍尔在国会即将通过非常法时发表了重要演说，指出俾斯麦的主要目的是企图消灭德国最坚决的民主力量，他预言社会民主党必将战胜非常法，并声

明党将开展秘密斗争。与此同时，他在党内反对党的执行委员会关于自行解散党的错误决定，并以执行委员会司库的身份，通过秘密的中央救济委员会，开始领导非法斗争。在1880年党的维登(瑞士)代表大会上决定委托国会党团在非常法期间领导党的工作后，倍倍尔作为党团执委会的成员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克服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领导全党执行了把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国外活动和国内活动巧妙地结合起来的革命策略，使党和工会的力量在残酷镇压下仍能不断发展壮大，终于在1890年阻止了俾斯麦第三次延长非常法的企图，对俾斯麦的下台起了促进作用。在党恢复合法地位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1890年的哈雷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当选为司库。在1892年的柏林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党的主席，此后一直连选连任，直到去世。

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德国工人运动获得蓬勃发展的机会，社会民主党在选举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接替俾斯麦的卡普里维政府也宣布实行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新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抬头，福尔马尔主张党应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眼前的改良措施上，并且否定当前国家的阶级性，鼓吹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在1891年召开的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尖锐地批判了福尔马尔的观点，指出如果实行他的策略，就意味着放弃党的最终目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倍倍尔起草的、确认夺取政权为党的头等重要任务的决议。此后倍倍尔仍一再同福尔马尔以及在他影响下的南德意志各邦党组织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在伯恩施坦提出系统的修正主义观点以后，社会民主党在1898、1899、1901、1902和1903等5年的代表大会上就伯恩施坦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明确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倍倍尔在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就伯恩施坦问题所作的长达6小时的报

告和他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的长篇发言，根据大量统计数字和详细的分析，驳斥了伯恩斯坦的观点，因此被列宁评价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

倍倍尔是国际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中享有极高威信的领导入。他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和拉法格等马克思主义者一起同法国可能派进行了斗争，使第二国际从一创立起就基本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在第二国际初期几次代表大会上，倍倍尔阐明了工人阶级为了改善自己目前状况和为最后夺取政权作好准备必须积极开展政治斗争的观点，对参加第二国际会议的条件作了准确的解释，对第二国际终于把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出去作了重要的贡献。1889年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未经党的同意而参加了资产阶级内阁，从而在法国社会主义队伍中引起激烈争论并且导致了分裂，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也造成很大的震动，并成为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重要争端。倍倍尔因病未能出席这次大会，但他是坚决反对米勒兰入阁的。在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法国盖得派建议，以上述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为蓝本通过一项关于社会党策略和国际准则的决议。倍倍尔在这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和大会全体会议上都作了长篇发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驳斥了以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为代表的对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幻想。大会经过激烈辩论之后通过了盖得派决议案，也就是接受了德累斯顿决议，从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给修正主义和米勒兰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倍倍尔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资本主义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进行的。这时由于武器和技术的发展情况，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由少数自觉的人带领多数不自觉的群众进行突然袭击的革命时代已经过去，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必须探索符合

新情况的新的革命策略。从恩格斯当时的文章和书信看来，这一策略的核心思想应当是把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同最终目的、把当前的合法活动同将来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辩证地结合起来。议会斗争是这一策略的重要环节，但不是唯一的手段，尤其不能代替最后的“决战”。倍倍尔所执行的策略基本上是符合恩格斯的这一思想的。他既反对无政府主义，强调党应当进行合法斗争、争取必要的改良，又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强调争取改良是为实现党的最终目的服务，工人阶级必须完整地夺取政权，并且直接间接地表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一场最后的决战，而这多半会以暴力方式进行。但是，对于从合法斗争转入最后决战的环节和手段，他未能作出回答。他一面坚持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无情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和反动政府，一面把主要精力放在当前的合法活动上，从而陷入繁重的日常政治事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理论和实践是脱节的。倍倍尔的可贵之处在于，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面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和各国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他已认识到垄断资本的某些特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正在向极点急剧发展”；随着环境的变化，工人阶级的斗争策略也应当有所改变，“重要的是，必须运用时机和环境所允许的最有效和最有决定意义的手段。”他正是用这种态度对待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的。

1905至1907年的俄国革命对德国的工人运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也从中得到很大的启发。罗莎·卢森堡认为，社会民主党应当在资产阶级统治发生危机时重视并引导群众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政治罢工，把群众的力量汇合起来，造成革命声势，不失时机地发动革命。以工会和党的右翼领导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则害怕和坚决反对政治罢工，认

为改良就是一切。倍倍尔在原则上支持把政治性群众罢工作为工人阶级新的斗争手段。他在190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讨论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时，作了这个议程的报告，既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总罢工观点，也反驳了机会主义者反对政治性群众罢工的观点，指出政治性群众罢工是“在适当的时候应当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斗争手段”。在他的领导下，大会通过了基本上正确的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的决议。遗憾的是，大会以后，在工会的改良主义领导的强大压力下，他又作了让步。党的执行委员会同工会总委员会达成了协议。在1906年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再次讨论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时，通过了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这一决议表面上承认耶拿代表大会的决议，但要求在实际贯彻时要依靠党与工会的谅解，甚至认为，1905年5月工会科伦代表大会通过的否认政治性群众罢工为工会斗争手段的决议与耶拿决议没有矛盾。倍倍尔对于这次妥协当然负有责任。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在认识上与罗莎·卢森堡等人还有距离，他把政治性群众罢工主要看成工人阶级捍卫自己民主权利的防御性斗争手段，并没有把它当作为革命作准备的手段。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于他作为党的领导人不得不考虑与强大的工会组织的关系而实行他认为必要的妥协。

倍倍尔是普鲁士和德意志军国主义的最顽强的敌人。从1867年进入北德意志联邦制宪议会时起，他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这一方面的斗争。他提出“不给这个制度一个人，一分钱”的著名口号，一贯反对帝国政府关于扩充军队，增加军费和延长兵役期等等的任何要求。在非常法时期，他坚决反对带有殖民政策性质的轮船津贴法案。1898年，他和李卜克内西在国会发言，谴责帝国政府出兵侵占中国的胶州湾；1900年他在国会抗议德国参加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反对为此拨款，谴责德国军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毫无

保留地站在中国起义者一边。1904年，他在国会代表社会民主党反对出兵镇压西南非洲赫累罗人和霍屯督人的起义，拒绝战争拨款。从1905年起，由于德、法两国帝国主义为争夺在摩洛哥的殖民特权发生冲突而造成所谓的摩洛哥危机，倍倍尔多次在国会和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谴责德国在摩洛哥的侵略政策。摩洛哥危机标志着帝国主义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和战争危险的加剧，倍倍尔也日益把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结合起来，在第二国际的舞台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1907年8月，第二国际在斯图加特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对待“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态度是这次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倍倍尔作为议程委员会的成员起草了一份决议草案。他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根源，重申第二国际历次大会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议，肯定了各国无产阶级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所作的努力，并在最后提出：“各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应采取一切有效手段来防止战争，如果战争终于爆发，他们就应努力使其早日结束。”这一草案为最后通过决议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也可以看出，上述最后一段写得过于一般化，倍倍尔的思想基本上未超出议会斗争的范围。这和他在策略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弱点是有共同之处的。列宁和卢森堡对这一草案提出了若干修正意见，特别是在最后加上了一段话，即工人阶级“应竭尽一切努力迅速制止战争，并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唤起受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这就大大加强了决议的革命性。据列宁后来说，曾经为这段结束语进行过协商，倍倍尔表示原则上同意。大会以后，倍倍尔为宣传和保卫这一决议作了不少努力。例如，在191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倍倍尔提醒代表们要记住这个决议，坚决进行反战斗争。

当然，在反对战争的问题上，倍倍尔也暴露了一些缺点。这主要表现为他在面临一场大规模帝国主义战争时仍一再谈到要进行防御战和进攻战，以及工人阶级在防御战中应肩负起保卫祖国的责任。虽然他同时也强调工人阶级在这一问题上的出发点和立场与资产阶级有本质上的区别，但这些言论仍受到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的利用。此外，由于未能下决心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分子决裂，倍倍尔在某些情况下有意识地避免十分明确地表述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但这些缺点都无损于倍倍尔作为英勇的反帝战士的伟大形象。至于有些人在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或倍倍尔生平时，把倍倍尔说成是机会主义的中派主义者，更是缺乏根据的。

倍倍尔是以革命实践家知名的，但是他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不少贡献。首先，他在德国国会、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的一些重要发言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楷模，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重要表述。其次，他在这些发言中还往往详细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例如，1893年2月，他在帝国国会关于“未来国家”的两次长篇发言就是这样的。尤其重要的是，倍倍尔还写了一些历史和理论著作，如《傅立叶传》、《妇女和社会主义》、《我们的织工如何生活》、以及《德国农民战争》等。他在《傅立叶传》中对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因此这本书完全可以列为关于社会主义史的学术著作。《妇女和社会主义》更是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中脍炙人口的名著。此书于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不久后出版，1883年修订再版，到1890年一共出了6版，此后第9版（1891）、第25版（1895）、第34版和第50版（1909）都作了全面的修订。倍倍尔写作此书的指导思想是：“同反对妇女享有完全平等权利的一切偏见作斗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因为唯有社会主义思想成为现实才能保

证妇女的社会解放。”因此，这本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单纯妇女运动的范围，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斗争任务的纲领性文献。倍倍尔在每次修订时补充的对于当时阶级状况的分析都对党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说明他的理论认识随着客观现实的发展而不断提高。此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宝库，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倍倍尔的逻辑性很强的思维和明确的语言使这部著作特别在工人群众中赢得的读者难以数计。例如，当时在莱比锡附近的一个小小的社会民主党地区协会的图书馆中，就藏有10本《妇女和社会主义》，仅在1908年一年这本书就被借出75次。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倍倍尔也是一位优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

倍倍尔的著作早在1919年就已传播到我国。当时，在著名的进步刊物《每周评论》上曾发表了他的《傅立叶传》的译文片断。1927年，《妇女和社会主义》（当时的书名是《妇人与社会》）就由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本转译成中文出版，但其中有不少删节。上海解放后，1949年7月开明书店重新出版了《妇女和社会主义》。1965年三联书店又出版了倍倍尔的自传体著作《我的一生》，遗憾的是，这是一部未完成的重要历史著述，由于作者于1913年逝世，该书仅仅写到1883年。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了《恩格斯和倍倍尔通信集》。倍倍尔的一些重要文章和演说曾收入有关国际工人运动史的一些专题资料选编，或在杂志上发表。但我国读者对于倍倍尔的著作整个说来所知不多，而且缺乏一个完整的概念。为了使我国广大读者，特别是研究工作者能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位国际工人运动著名领袖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我们从倍倍尔的大量著作和演说中选编了这本《倍倍尔文选》，但由于篇幅所限，个别文章只能摘录；所有书信也均未收入。

本文选所收入的倍倍尔著作和重要演说，大部分是根据德文

原文翻译的。我们为每篇著作写了题解，作了必要的注释，书末附有人名索引。

欢迎读者对本书的编选工作和译文中的缺点提出批评指正。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

1992年2月

赞成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

(1868年7月8日)

致联合会的同志们

本月7日在联合会理事会上,我们处理了133号到182号(总共49号)收入的文件,以及221号到247号(总共26号)发出的文件。理事会对下届联合大会的会址进行了表决,结果如下:赞成会址设在纽伦堡的有:马格德堡、克里米乔(工人教育协会)、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纽伦堡(工人教育协会)、柏林(工人协会)、士瓦巴赫、曼海姆、开姆尼茨、海尼欣、维达、纽伦堡(工人协会)、科堡、德累斯顿、夫赖堡、奥格斯堡、韦尔道、梅拉内、格罗森海因、图尔姆(工人协会)、富尔特(工人教育协会)、勒根斯堡、威斯巴登、韦森堡(巴伐利亚)、富尔特(《未来》)、赖兴巴赫、果里斯、伦策瑙、格耶尔、利希滕施泰恩和艾顿克宾,总共有31个工人协会。

有些工人协会对会址提出的不同建议是:弗兰肯堡提议科堡或哥达;奥尔登堡提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或加塞尔;波斯奈克提议哥达;普福尔茨海姆提议斯图加特;劳伊特林根提议普福尔茨海姆。

住在格平根的乌尔滕姆堡工人教育协会告知我们,5月10日在海登海姆邦代表大会上,大多数协会(有21个协会出席)主张会

* 1868年7月7日,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理事会通过了将在纽伦堡召开联合大会的议程,并提议讨论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倍倍尔的这两篇文章于1868年7月12日和8月25日先后刊登在《德意志工人俱乐部》上。——编者注

址设在海得堡，少数协会主张设在纽伦堡。

如上所述，根据绝大多数的意见，已决定纽伦堡为下届代表大会的会址，针对这一决定，我们已立即提请纽伦堡工人协会，着手建立地方委员会并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该委员会将及时通知大会的地点，代表报到等必要的具体事宜。

这次联合会大会的日期定于9月5日(星期六)、6日(星期日)和7日(星期一)。

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理事会通过的大会议程如下：

- 1、理事会的工作报告。
- 2、纲领问题，报告人罗·施韦希尔(莱比锡)。
- 3、间接税问题，报告人R·克雷波斯(柏林)。
- 4、国防问题，报告人奥·倍倍尔^①。
- 5、老年保护基金，报告人列·宗内曼(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 6、流浪救济基金，报告人艾谢尔斯多尔夫(曼海姆)。
- 7、合作社问题，报告人Ed·普菲弗尔(斯图加特)。
- 8、疾病救济基金，报告人盖尔曼(莱比锡)。
- 9、保护工人营业的纯收益，报告人列·宗内曼(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 10、审核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 11、关于理事会主席等选举事宜。

托拉德(奥尔登堡)提议，讨论缩短工时问题，麦·希尔施博士(柏林)提议把学校问题列入议程。但是，理事会认为，在上述内容相当丰富的议程中一定会涉及这些新提出的问题。

我们要说明的是关于第二项议程，在联合大会召开之前，我们将在《德意志工人俱乐部》上发表纲领草案。对这一议程，德累

^① 因倍倍尔担任大会主席，报告人实际上是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斯顿工人教育协会提出了下列议案：

“1、鉴于

①把整个德国工人协会及其会员适当地组织起来并制定纲领是刻不容缓的需要，因为只有把现存力量组成良好的组织才能保证实现纲领：

②该纲领和组织章程要完全符合国际工人协会的各项正当要求：

③不分民族，同一切有志于这一事业的工人取得密切联系才有可能解决社会问题：

工人大会决定：

赞成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和组织章程，把现有的协会改组成相互联系的支部，而不妨碍迄今为教育所作的一切努力。

2、鉴于

只有在政治自由和国家自由的基础上，才能谋求建立更为完善的社会环境，但是在没有工人参与整顿公众事宜的情况下，这一点是不可能兑现的：

此外，把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无限度地扩张到国家、市政、学校和教会等方面是首要的和最关键的基础，因此，工人大会宣布：德国工人的责任在于，首先把自己的主要力量完全投入争取这一权利的斗争方面，在这方面，有些东西能够削弱为此奋斗的某些力量，对这些东西我们必须予以清除。

3、鉴于

预支协会和信用协会作为缓和的措施对于独立的工商业者和经商者可能具有价值，但是对于不能独立的雇佣工人则完全意味着雇佣关系，因此提议，不予讨论上述关于在预支协会分配股息或支付利息重要价值的章节，并把它从议程中删掉。”

由于我们以前已经把在预支协会支付利息的问题从议程中删

掉,因此,德累斯顿方面提出的第三条议案已成为多余。对于前面提到的两个议案我们尚未作出决定。我们愿意把这些议案提交联合大会,供讨论纲领问题时参考,为了使各协会了解该提案的作用,我们将在最近几号的《德意志工人俱乐部》^①上发表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和组织章程。

朗格博士先生(文特尔图尔)没有接受承当第四项议程的报告人,因为他的业务繁忙,他甚至不能决定是否出席这次大会。

委托书是各协会代表必须携带的证明文件,必须在委托书上写明协会会员的人数,因为会员的人数决定所代表的票数。根据组织章程第三条,具有200名以下会员的协会代表1票;具有400名以下会员的协会代表2票;具有800名会员以下的协会代表3票;具有1600名以下会员的协会代表4票;超过1600名以上会员的协会代表5票。

科堡工人协会请求我们邀请国外的工人组织出席联合大会。我们认为这一愿望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将尽快采取必要的步骤……

德国工人协会联合大会理事会主席 倍倍尔
1868年7月8日于莱比锡

二

(1868年8月20日)

致协会和联合会的同志们

理事会在7月28日和8月18日召开了会议,会上处理了191号

① 在1868年7月27日和8月12日的《德意志工人俱乐部》上发表了约·菲·贝克尔题为《我们要作什么,应当作什么》的文章,这篇文章曾在1866年1月《先驱》第1号上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所谓纲领发表过,其中关于工人运动的日

至230号收入的文件和268号至418号发出的文件以后，主要讨论了纲领问题。经过简短辩论，大家一致同意，问题不在于提出新的纲领，也不在于使纲领的数目增多，而重要的问题在于，承认现有的纲领是完善的，是目标明确的，从各方面看又是完全符合工人利益的。确定了这一原则，就不难作出抉择。我们首先注意到了德累斯顿工人协会提出的采用国际工人协会纲领和组织章程的议案，并且详细地讨论和解释了所提到的纲领，最后，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和此地工人教育协会的全体理事都一致通过了这一纲领。纲领已被刊登在凡号《德意志工人俱乐部》上，所以各协会已经了解该纲领，它们有机会审核和研究纲领，然后提出自己的代表。

关于纲领问题，理事会建议联合大会通过下述议案：

纽伦堡第五次德国工人联合大会把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视为自己的纲领，并声明一致同意下列各点：

1、劳动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劳动阶级自己去争取。劳动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不是争取阶级特权和阶级垄断的斗争，而是争取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义务，以及废除一切阶级统治。

2、劳动者在经济上依附于劳动工具的垄断者，即劳动工具的唯一占有者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堕落和政治不独立的根源。

3、政治运动是使劳动阶级争取经济解放的必不可少的手段。社会问题同政治问题是不能分开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是解决政治问题，而且只有在民主的国家才有可能。

此外，由于迄今为争取经济解放所作的一切努力缺乏各国不同部门工人之间的团结合作，也缺乏各国劳动阶级之间兄弟般的

和任务阐述得含糊不清，杂乱无章。理事会所发表的纲领草案不是依据贝克尔的这篇文章，而是依据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组织章程的导言。在纽伦堡联合大会上，对该草案作了两处微小修改后被通过。——原编者注

联合一致,因此屡遭失败;劳动解放不是一个地方和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一个包括一切具有现代社会的国家在内的社会问题(社会任务),它们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要依靠最先进国家之间在实践和理论方面的通力合作,第五次德国工人联合大会决定赞成国际工人协会的努力。……

理事会主席 倍倍尔

1868年8月20日于莱比锡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演说和著作选集》
1978年柏林版第1卷第33—37页。

(葛 斯译)

打倒宗派主义！国际工人协会万岁！*

(1869年6月23日)

同志们：

你们知道，正像巴门—爱北斐特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在《民主周报》第14号上声明的那样，我们将不再攻击施韦泽先生。我们诚实地恪守诺言，并且严格地履行几周后同施韦泽先生签定的协议（见本报第17号）。然而，敌人以及由施韦泽先生直接引起的那些事情都证明，他们并非如此。我们在图林根的态度和支持那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们使施韦泽先生感到不快，他竟可笑地想要禁止我们，不经他批准和许可不许同联合会的会员有任何交往。我们完全拒绝这一无理要求。这引起施韦泽先生在6月23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声明说，他认为，我们的态度是“破坏协议”，并表示他不再受任何协议的约束。

我们愉快地接受他向我们的挑战。今天，施韦泽先生和门德先生这两位全德工人联合会两派的主席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完全赞同下，和在她的大力保护下演出这场喜剧的目的无非是：把自己联合会内部不听这两位先生指挥的、有威胁的反对派统统镇

* 1869年6月22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反对派的领导人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领导人在马格德堡举行会谈。会谈以后，反对派领导人呼吁，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脱离施韦泽。这一呼吁得到全德工人联合会广大反对派成员的支持。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立即发表了这份号召革命力量共同战斗的呼吁书。——编者注

压下去，同时，加紧同我们的斗争，关于这一点我们本来就已看得清楚，并且从友好的、消息灵通方面得到了可靠的通知。

“拉萨尔的信徒们”——这是两位“领袖非常正统地和不民主地对他们的联合起来的两派的称呼——可能会被煽动起来反对我们——诚实的社会民主党”。在莱比锡举行的万神大会的闹剧证实了这一点，门德“主席”本人就在这次大会上发表过演说。

我们将进行决战，并且以一切力量，满怀信心地向忠于原则的、明察秋毫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携手进行这场决战。

究竟是他们那里的腐化、卑鄙、贪图贿赂，还是我们这里的诚实和纯洁的意向获得胜利，将会见到分晓。

我们的口号是：打倒宗派主义！打倒个人崇拜！打倒那些口头上承认我们的原则而行动上背叛我们原则的阴谋家！社会民主党万岁！国际工人协会万岁！

李卜克内西、倍倍尔

1869年6月23日于莱比锡

译自1869年6月26日《民主周报》
第281页。

（葛 斯译）

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关于 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组织章程的报告

(1869年8月8日)

先生们：

众所周知，许多年来在社会民主党各派中一直争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组织章程是最好的组织章程。大家知道，有一派谴责另一派（全德工人联合会）说这一派的组织章程太严格了，因为它把一切权力交由一人掌管，这样很容易产生滥用职权的现象。而另一派则强调说，假如废除这个组织章程，那就会把更大的权限让给各个团体。显然，这两个方面左右着这场争论；两派看到，在他们那里不是一切都那么顺当。因此，假如我们想要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就必须选择第三条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道路。

这里，我们必须尽可能利用那些在这方面积累起来的经验；我们说，无论一个纲领，还是一个组织章程都必须适应各个不同时期的情况；当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章程也一定要反复进行修改。

我认为，我们今天提出的这个提案是符合大家向一个良好的组织章程提出的要求的。这一提案可以阻止个别人滥用其手中的权力，同时，它还有助于采取统一的行动。提案的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是这样写的：

“第十一条 应使全体党员至迟在代表大会闭幕后3星期按成本价格能得到代表大会的记录。代表大会一切有关修改章程、党的基本原则和政治态度以及征收党费的决议都必须在代表大会闭

幕后6星期内提交全体党员进行表决，并由表决者的简单多数加以决定。表决的结果应在党的机关报上公布。

第十二条 执行委员会受托领导党的日常事务，执行委员会由5人即主席、副主席、书记、司库和委员各一名组成。司库应交纳相应的保证金。执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必须住在同一个地方或这个地方的1英里内的郊区。他们均由住在党的执行委员会所在地的党员经过投票的特定选举程序以绝对多数选出，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和发行部的成员均不得参加执行委员会。如果在1年之内执行委员会中出现缺额，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则应在第七条所述的情况之外按照同样的选举方式进行补选。”

根据上述条文，在我们党的组织章程中已不再存在领袖了。这一点是必要的；只要一个政党承认某些个人的权威，那么，这个党就会失去民主的基础；因为信仰权威、盲目服从、个人崇拜本身就是不民主的。所以，我们打算用5个人来代替一个人担任领导。

但是，还有另外一点必须提到，即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了目前两派之间的隔阂，使它们相互抱怨并挑动工人之间的相互对立，先生们，那就是给掌权的个人提供了在党内还掌握舆论工具的可能性，从而使他可以把党的机关报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并且只准许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那些对他有利的东西，其他所有的意见都遭到压制，从而使群众相信只有发表在报纸上的东西才是唯一正确的东西。他们采用这种办法使任何反对派都不能公开发表意见，否则当权者可以立即通过报刊公布那个在某一点上反对他的人是叛徒。最近这几年，我们不是已经看到过我们党的最精明、最优秀的同志被宣布成叛徒了吗？^①

^① 倍倍尔在这里提到了施韦泽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独裁领导，施韦泽此时担任这个组织的主席和该联合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领导人。他极力阻止反对他的政策的会员在机关报上发表看法，并把一些党的干部，如白拉克、盖布、约克和弗里茨舍诬陷为叛徒。——编者注

这是我们必须消除的一个危险。

但是，先生们，当我们今天想制定一个新的组织章程时，我们还必须明确而坚决地宣布我们的党采取怎样的方针，以及应该和必须遵循的目标。我不在这里阐述提案中党纲的个别条文，因为这样做就会离题太远，同时我认为，许多地方已经没有继续进行辩论的必要。以后，在正式讨论的时候，会给大家提供充分的机会，详细商讨辩论那些条文的。你们大家一定会赞成我的提议：我们必须制定一个不仅是社会主义的，而且还应该是民主主义的纲领，否则，我们也就谈不上什么“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设想解决什么社会问题了。通过制定一个精确的纲领，我们还可以防止那些异己分子混进党来，并且防止他们在我们中间制造混乱和不合。所有这些都同上述危险有关，要消除这一危险，只有使未来的党报不是属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财产，而是属于党的财产，由党来决定它的权力，如果报纸在任何方面违犯了党的组织章程或触犯了个别成员，那么，必须由党的正式代表对此作出决定。在这方面，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已收到许多控告信，还有，如果所投寄的稿件不中有关编辑部的意，那就经常被篡改，最后把它当成一篇文章刊登在报纸上，可这篇文章却变成完全不符合投稿人所要表达的东西了。但是，我们今天完全可以避免这类事件，因为委员会可以监督报纸，即使委员会本身（当然可以这样设想）对群众的不满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也还有监察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当追究编辑部和委员会的责任。

先生们，因此我认为，草案中的所有条文综合起来就是这么个问题：这份草案符合社会民主党组织章程的要求，另外，它还为各个方面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领导提供了可能。不过我并不否认，其中有些地方还是可以修改，甚至是必须修改的，几天以前在这里召开的一次小会上，有人提出了修改方案，我认为这些修改意见是宝贵的。只要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讨论，我就会提出这些意

见①。

现在你们可以提出反对意见。有人说：是的，提案的第一部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提案的第二部分，有人在组织章程中加上了“地方协会”，对于这个老问题，我们一定要在这里进行一番辩论，他们说，这是地方协会，是个一般的组织啊！这么一来，我们可就陷入了困境，这种处境会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可以明确地讲，建立协会必须以党的纲领为基础，凡是建立起来的协会都应承认，对于党组织作出的各项规定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如果它们触犯了党的原则，按照党组织规定，它们不能以党组织的参加者论处。但是，我们到底怎么会想到这一类组织呢？我承认，如果我们的德国像所期望的那样，是个模范国家，那么，关于组织章程的提案就会是另外一种写法了。由于我们德国有各种各样差异悬殊的结社法，所以重视现存的法律，试图建立一种尽可能受到这些法律保护的组织，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大家知道，在德国大多数邦都有法令，这些法令谈不上是自由的，更不能算作民生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没有地方协会的地方，可能恰恰有统一的组织，这是最好的组织，因为按照结社法，这种组织不可能受到警察当局的干涉。先生们！多少年来，我们始终对此坚信不移，确信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近几个月的经验表明，这是错误的，因为警察当局随时可以解散这样的、公开宣称它在整个德国就是一个协会的组织，另外，断定这样的组织在当今国家监察机关的众目睽睽下，不受任何侵犯也是不可能的。先生们！今年1月27日，普鲁士王国柏林最高当局由于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选举协会不满，决定它是不受欢迎的组

① 1869年8月9日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讨论组织章程中关于建立地方社会主义工人协会时，倍倍尔提出了两条这以前在纲领委员会上讨论过的建议。为了避免使警察当局抓住把柄，把组织章程提案的第二条和第七条中的“党的目的”改成了“鼓动目的”。倍倍尔的建议被代表大会通过。——原编者注

织，普鲁士当局解散了该组织，因为选举协会没有被看成是整个地区的一个协会，它是由各部门协会组成的组织。

这个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选举协会是一种相当于从前的国民协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那样的组织，只是它的主席没有那种无限的权力。它也被看成是整个什列斯维希—霍恩施坦的一个统一的协会，其成员虽然分布各地，但不属各个协会或者部门协会。理事会通过一切有关当局提出了上诉，最高当局作出的决定如下：

“1. 政治性协会仅指选举协会，作为选举协会，它在具体的相应的选举事宜中发挥作用时，不应受到任何势力的限制。

2. 那些由一名业务部门领导人领导的，旨在地方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主题的各协会，实行合并以后即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协会，该组织是其他现有主要协会的附属协会，但它并非因此而失去地位；主要因为这种联合触犯了1850年3月11日结社法禁令第八、第十六和第二十一章的规定。”

先生们，这就是柏林王国最高当局的决定。大家知道，有人在什列斯维希—霍恩施坦选举协会中，提到一名业务部门领导人的问题，这位领导人的确具有全德工人联合会全权代表的全部职能。显而易见，尽管警察当局企图解散全德工人联合会，而协会是不准许解散的，所以，这一决定是具有权威性的。法院必须承认最高当局的这一决定并赋与警察局以解散权。到底为什么掌握了法律权利的警察局转眼之间可以办到的事，至今还没有采取步骤，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以后再谈！勿庸置疑，它是可以这么干的。住在柏林的，也就是住在最高当局驻地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基于这一决定能够生存下去，纯粹是靠普鲁士警察局的恩宠，这也是勿庸置疑的。先生们，我相信，我们依靠当局的恩宠绝对不能建立组织；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建立组织，而对现存的反动法律，这是可能办

到的，这样做才能抵制敌人对我们的诽谤，从而使人们再也不能说什么，在这里必须实行党和政府领导人之间的联合，否则，按照最高法院的决定，谁也不会容忍去干那些未经许可的事。因此，我们除了建立一般的党组织以外，还必须建立地方组织。地方组织同严格统一的组织不一样，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摆脱警察狡猾伎俩的约束。我说这些并非表明，从此谁也不能接近我们，我甚至认为，假如大家承认这项议案，我们会在许多地区受到非难，遇到麻烦；是的，的确我们比从前更要受到监视，因为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明确地规定和讲出了一种倾向，某些人对这种倾向是不满意的，也是不能够满意的。但是，我们一旦遭到警方解散，可以说警方向来能在一个地区解散一个组织的，而第二天我们就又以其他名称建立一个新的协会，因此，党的组织永远存在，它排除了一切足以使警察认为有组织联系的任何迹象。我们可能在汉堡或莱比锡被解散，但是，第二天我们又可以用另外的名字建立一个新的协会。另外，如果说目前要筹建一个像全德工人联合会那样的组织，那么，只要在柏林作出决议即可，但是，在整个德国，协会就会绝迹！

还有一点！假如你们赞成普鲁士、萨克森、奥地利的结社法（我弄不太清楚，我不知道警察局是否在所有地方都要掌握会员名单），那么，在普鲁士所有地区必须呈报会员姓名。先生们，请大家想一想，对于诸如全德工人联合会那样的组织，警察局在整个德国都掌握一本“黑材料”；警察局通过电话联络，在两小时之内就可以使全德的社会民主党人落入法网，因为他们的名单就保存在柏林警察局里。党甚至还担心1848年革命以后警察局搜罗起来的那些东西，是的，这些东西当时也算作声名狼藉的“黑材料”。直到今天，全德工人联合会还表示自愿为警察局热心服务，我们不想这么干。根据由我们建议的组织章程，仅仅有必要申明，谁在委员会或职能委员会，以及其他的事都毫无必要报告，各地方组织必须符合各邦

规定的结社法。先生们，我不想断定，按照我们起草的组织章程警察当局就无法加害于我们。只要我们现在的结社法还存在，我们就不能建立一个逃避警察诡计的组织；但是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尽可能难以让警察抓住把柄的组织！

好！现在我来谈谈党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关系！先生们，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收到很多提案。^① 这里仅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结社立法！^② 正如德意志的结社法规定的那样，我们只能按照这里的提案所说的那种方式参加国际；也就是说，我们将从各方面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国际；可又不能完完全全地、没有限度地参加国际，因为那将使我们成为国际的一个分支。我的衣袋里有一封国际委员会的信，信上说，法国的工人在这方面的做法是：每个单个的人都从国际总委员会领到了接受其直接成为该会会员的会员证。那里的工人声明：虽然法令禁止他们召集和参加国际分会，但法令不能禁止他们每个单个的人参加国际总委员会并成为它的成员。我们也必须考虑，给每一个党员提供能够设法得到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证的机会，但是，为了作到这一点，每人必须交付一年的会费。不过我相信，假如代表大会经过协商，能选出一个委员会，

① 除了约翰·菲利浦·贝克尔向爱森纳赫代表大会提出一份意见书外，莱比锡的党员还提出一项类似的提案，意见书提出德国工人党和德语区支部中央委员会在组织上隶属日内瓦国际工人协会。他们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国际建立直接的联系。同时，他们表示不理睬德国反动的结社立法，并准备牺牲掉讲革命空话的党组织。这两项提案否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革命工人党的必要性，并同阶级斗争的需要相对立。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两项提案。代表大会关于党同国际建立联系的方式的决议符合德国工人运动的条件，也同马克思提出的建议相一致。——原编者注

② 根据1850年3月11日的普鲁士结社法，所有政治性团体一律不准同其他具有共同目标的同类团体发生联系。特别是不准通过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各中央机关报或此类机构进行联系，同样也不准互相进行通信联系。因此，这些团体也不得同外国的组织建立直接联系，类似的法令也适用于其他德意志国家。——原编者注

以便找出一条能够加入国际的最好的道路，那就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欢呼）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演说和著作选集》
第1卷第52—58页。

（葛 斯译）

我们的目的

(1869年12月)

序 言^①

这个集子原来是一篇政论文章，是我在1869年底被迫同当时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民主通讯》进行的一场论战，原因是：

1869年10月底，我受党的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德国南方作一次较长时间的巡回宣传，途中我到了斯图加特，并在那里作了一个关于社会问题的报告。听众中有许多是维尔腾堡人民党的党员和领袖，《民主通讯》的编辑弗雷泽先生也在场。报告结束后，人民党党员，银行家豪斯迈斯特先生站出来指责我的报告有社会主义倾向，我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如果《斯图加特观察家》的编辑卡尔·迈耶尔先生当时不劝说调解，我肯定同人民党公开闹翻了。《民主通讯》根据我们的意见分歧，写了3篇冗长的文章，摆开了同我的社会主义倾向进行论战的战场。《斯图加特观察家》报在显要位置转载了这些文章，因此传播甚广。

我回家后便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作为回答。1870年初，我的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上连载，后来就汇编成了这个集子。第一版博得了党的好评，而且需求量越来越大，于是我就出了第二版。为了便于理解，我在二版中作了一些注解和补充。

集子末尾，我收进了我的关于“土地问题”的评论摘要和我在

^① 在正文前面，我们附上了作者写的两篇序言，目的在于使读者了解写作这本集子的历史背景。——编者注

1870年6月5、6、7日举行的社会民主工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我这样做，目的是尽可能地澄清这个问题并表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莱比锡，1871年9月9日

奥·倍倍尔

对这个集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出第三版已成必要。在这一版中我作了几处改动，增加了新的注解。愿这一版——保证没有改坏——作为宣传材料和教育材料再次达到它的目的。

莱比锡，1872年夏

作者

几年来，由于多方请求，我终于决定将这个集子再出个新版，即第九版。我迟迟不决的原因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我的观点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声明，文章中本来是积极的论述，现在我已不能完全同意了。但是我也不同意完全按愿望改写。这个集子是运动中历史发展的产物。如果整个内容没有问题，要改写是不可能的，不如原封不动，反正这篇东西是我的最初的创作尝试。

于是我决定把这个集子重印一次，不作任何改动，把它看作是运动中一个阶段的见证，一个对党的接班人感兴趣的见证。愿它在宣传方面仍保持一定的价值。

德累斯顿—普劳恩，1885年11月初

奥·倍倍尔

第十版序言

我在第九版序言中已经说过，这个集子既有悖于我现在的观

点，也有悖于党的观点（爱尔福特纲领就是后一点的证明），但是仍然供不应求，有必要出个新版。我出这个新版，有个条件，读者只能把它看作是德国工人运动头十几年中由于拉萨尔的出场而产生的观点的产物。

在今年1月和2月所谓关于未来国家的辩论中，议员巴赫姆博士完全不顾我在第九版序言中提出的保留意见，试图向我证明我过去和现在的观点之间的矛盾。他从这个集子中摘录一些话，同我现在的和在那次辩论中说的话进行对照，企图以此攻击我。不错，这种“矛盾”是存在的，我身上存在这种矛盾，每个参加运动近30年，随着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自身的人都存在这种矛盾。如果我不经历这种发展，对运动不闻不问，不作运动的所谓“领路人”，那么我就是运动的旁观者。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每年都有一些现象强迫我们改变和修正原来的观点。但是，一般的——我是说细节上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改变，而关于必须彻底变革社会的观点不能变，如消灭阶级对立，建立一个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不仅要建立，而且要日益加以巩固。

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人，就仿佛是一个旅行者，在某个地方要极力登上一个极目所见的最高峰，他想象踏上了登上这座高峰的旅途，但是，他走得越近，就越是发现，必须时而绕过这个障碍，时而绕过那个障碍，必须选择一条与自己原来的设想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不管他被迫走哪条道路，目标还是原来的目标。各国的伟大运动也是如此。任何以彻底改造现存关系为宗旨的运动都会遇到许多障碍和阻力需要排除。它每克服一个障碍，旧的社会就会在它面前设置一个新的障碍。它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必须视企图阻碍自己进程的障碍而定。因此，具体应该如何行动，是无法预测的。一个运动只有排除了所有障碍，扫清了前

面的道路，才能成功。在此以前的所有论证，都是推理，而推理固然可以是非常聪明的虚构，但与实际几乎都不相符。

我们现在的国家和社会的主宰都不能说出在自己制度的基础上，今后若干年将干些什么，而每个有理性的人也都不会要求他们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知道，这取决于事先无法估计的情况。但是，社会民主党应详细解释清楚，它将如何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这一点可以认为是自然的，顺理成章的。

所以这个集子的主要部分不包括我今天的观点，对我今天的观点感兴趣的读者，请看我的《妇女和社会主义》，那里有详细的论述。

柏林，1893年7月底

奥·倍倍尔

1869年11月21日，我在斯图加特“音乐厅”作了关于社会问题的报告，《民主通讯》为此发表了3篇阐述“国家帮助”问题的文章，并对能否实行国家帮助提出了一系列的疑虑。特别是说我没有按照它的主张透彻地阐明这个问题，没有同意它的解决方式，而仅仅用一般的套话支吾搪塞，对此它表示遗憾。

我认为，这件事是很自然的。我的听众对当今社会状况的看法同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大相径庭。他们当中的多数人甚至认为，我们提出的各项原则是专断的、没有任何合理的根据。因此，完全有必要明确地针锋相对地证明，我们的当今社会状况本身就是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过去的生存和生活条件与今天的截然不同；所以，断定并相信长期形成的当今社会状况不可改变是愚蠢的。为此，我首先对社会状况的发展作一个历史的描述，并指出今天的状况是怎样逐渐产生的。由此又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现代社会的发展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如

下：

封建国家和它存在期间萌发的小资产阶级生产(小手工业)一旦达到顶点,就向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换言之,大生产(群众性生产)将以工场和机器代替小生产,因为后者仅能满足眼前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前者能满足世界市场的需要。现代工业的发展势必消灭小生产的独立存在;不断加剧的资本集中使占有大资本的需求越来越高,到后来,独立的企业主能够在工业竞争中站稳脚跟。而能够达到这一点的人始终是少数。此外,资本竞争本身迫使那些在一个工业地区丧失竞争能力的资本家迁入其他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开发的工业活动地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这样一来,现代大工业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劳动场所。而原先在这里独立生存的小生产者被消灭,被挤入雇佣劳动者的行列。这种社会状况必然导致所谓中等阶层的灭亡,导致社会分裂成两个在数量上、物质上截然不同、尖锐对立的阶级。其中一个阶级随着今天的不断发展变得越来越小,这就是企业主阶级;另一个阶级则日益壮大,而且还在继续壮大,最后将形成一个包括绝大多数人的阶级,这就是工人阶级。因此,所谓的中等阶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如果赞成雇佣劳动者阶级的要求,就得按自己的利益行事,因为雇佣劳动者阶级同所谓的中等阶层的根本区别仅仅在于,它的处境实际上将是,而且肯定是中等阶层未来的处境。我还要阐明,资本构成的全部基础就是,在当今的社会里,劳动不仅被视为单纯的价值创造者,而且被视为同任何商品一样的商品。因此,劳动力服从商品市场的规律,他的价格受供求关系的调节;由于这种规律,劳动力得不到自己创造的全部价值,即全部劳动所得,而只能得到其中的一部分即工资。实际价值除去工资后的余额都作为“奖金”、“利息”或其他名目流进企业主的腰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这种巧立名目叫作流行的强盗制度),并在他们的腰包里转化为资

本。所以，企业主不是把自己的劳动所得，而是把雇佣的外来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构成资本。

我不得不请求《民主通讯》牢记我在此匆匆论述的有关资本构成的理论，因为后面我还要谈及这个问题，以便证明《民主通讯》称之为“自然结构”和“商业气质”的论述和所谓当资本家和企业主并非为了享乐，而是出于被迫等论点是何等荒谬。

究竟什么样的人才不是被迫袒护穷人反对“自由”工人的资本家或企业主！认为工人不愿认识这一点是错误的！

接下去我要阐明：由于新机器的不断采用，旧机器的不断改良，人类劳动力将成为多余的，在通常情况下劳动力将供大于求，因此，工资升少降多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且工资还将继续下降，因为机器在不断完善，女工，甚至童工将取代男工。因此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将日益激烈，这也是导致工资持续下降的自然原因。对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等国的劳动情况的统计调查表明，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的贫困日益加剧，而所谓的“国民财富”却日益增长。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说明，“国民财富”不等于人民财富，更确切地说，国民财富只是人数很少的企业主阶级（用《民主通讯》的话来说就是那些被迫当企业主和资本家的人）的财富（迅速增长的利润率）。日益增长的国民财富和日益贫困的群众互相补充，互为条件。正像已经证明的那样，我们的生产就是如此发展的，其结果对多数居民极为不利。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家也是无法否认的，他们惊恐地发现，包括大多数人的被压迫者正在滋长不满情绪。统治阶级认识到，这种发展有朝一日会给自己带来毁灭，因此，统治阶级企图用小恩小惠蒙蔽工人和小资产者（手工业者），不让他们看清自己的真实处境。

“自助”公司兜售并已上市的医治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在物质效果方面非常令人怀疑，无论如何不能令人满意。他们宣扬节食

论,即要求人们履行“节约”,这一论点实在是一大讽刺。人们可以想想,在通常情况下,工资只达到一个人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生活需要的价格高度。同时还应看到,现代生产的发展趋势是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因此,将来的工资还要比上面所说的更加大幅度地下降,这是很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节约就等于压缩最必需的生活需要,就等于损害工人及其家属的体力和精力,所以,必须从当今占统治地位的国民经济立场出发谴责这种节约论,因为,社会只有通过不断增加消费(必需品的消费)才能提高生产(消费品的生产)。我们不妨作一番考虑,那些物质水平较低、急需帮助的劳动部门是绝对无法节约的,那么这种节约论的空洞和荒谬就昭然若揭了。个别人乃至个别劳动部门因工资较高,可以节约一些,这是无可争议的,然而他们也是靠省吃俭用才能有所节约。总之,许多人为了有所积蓄,甚至不惜忍饥挨饿。一家只要有一人长期患病或遇到意外灾祸,以往的“积蓄”就要一扫而空。还应当注意的是,个别劳动部门的高工资原则是不能持久的。一个部门的高工资不仅会把原先没有工作的年轻劳动力,而且会把另一些部门的连低工资也难以得到的劳动力吸引过去。而人手增加,工资就会降低,这是当今条件下事物发展的自然过程。

类似这种节约协会的还有消费协会。工人极端贫困,几乎无法为这种协会筹集必需的税款。由于时髦的改革、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工人长期歇工已屡见不鲜,于是这种协会便分崩离析,因为工人没有现钱购买商品,而它们又无法向其会员发放购买商品的贷款。所以,加入这类协会的总是生活条件较好的人,而一无所有的工人只能对它们敬而远之。老实说,消费协会的物质利益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若要积攒一小笔钱,派点很小的用场,必须当很长时间的会员。要想积累资本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虽然资本在现代工业发展中进行独立生产十分必需。如果大部分工人通过消

费协会得到比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那么，严格的工资规律就要产生作用，工人所获得的利益同下降的工资相抵消，物质利益也就不复存在，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能否认，建立这种协会，对工人有某种道义上的作用，因为可以把这种协会看作阶级意识觉醒的标志，并向工人指明，他们只有同心同德才能有所得。此外，这种协会在保护工人，不让他们受骗，用合适的价钱换取劣品和次品方面是有某些用处的。

预支协会和原料协会不是为工人，而是为小手工业者成立的团体，目的是在小手工业者同大资本家竞争和缺乏贷款时予以保护。这两种协会虽然发展很快，特别是预支协会在德国发展神速，但也只能勉强达到上述目的。当然，我们的小手工业正在逐渐被大工业所淘汰。

手工业者不能顶住大资本的竞争，因为他们无法作出必要的保证，而不能保证偿还贷款，预支协会就难以存在。因此，正像拉萨尔所说的，预支协会只能延长小手工业同大工业作垂死挣扎的时间，而不能使其维持下去，原料协会也是如此。

实际上，这些协会对小手工业者没有多少好处，对工人更不用说了。这一点明显地表明，目前，在大多数预支协会中存在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趋势，即信贷协会上升为联合银行。为了迎合这种趋势，会员每月缴纳的会费要大大增加，这就使所谓的“小人物”连入会的可能性也没有了。同样，各种附加费用也提高了。现在，大多数预支协会已经完全掌握在小资产阶级的手里。小资产阶级需要为国家公债、铁路公债和各大工业企业等付出资本，所以其贷款来源只能依靠这些协会。我还要补充一点，不久前，舒尔采-德里奇的“德意志合作社银行”经柏林交易所批准入了股，于是这类企业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得到了大财团——在这点上无疑是最高权威的承认^①。

显而易见，为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存的生产合作社可以证明这一判断。许多生产合作社已经破产，少数仅存的生产合作社也都缺乏资本和贷款，想维持下去，就必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把所得的一部分——往往是很大一部分纯利润转换成资本，大部分工人是没有能力独立经营这种生产合作社的^②。

- ① 德意志合作社代理人舒尔采-德里奇先生在1872年8月19日布勒斯劳生产和经济合作社第13次联合大会上发表的正式声明说，对预支协会的资产阶级本质作出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代理人在他的年度报告中还谈到了货币市场上的巨大变化。他说，这些变化是由于1871年同法国签订了和约，从而带进了几十个亿的外资，并展现了广阔的前景。由于资本大量流入，协会有必要选择利用这些资本的崭新途径。建立了大银行，提高了效益等等，总之，调整了原来与“合作社事业不相适应的”方面，而在这方面原先由于缺乏商业知识，合作社已遭受很大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大量外资拥向预支协会的同时，德国各地的小生产者正面临着破产的危险，为自己可怜的处境发出哀鸣，而那些“流入的外资”却没有帮助他们。

如果这种自助协会的拥护者从迅速增加的合作社和不断增加的资本周转额来推断出中等阶层的状况已有改善，那么，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与此相反，才是正确的。合作社的迅速发展使手工业者阶层越来越难以得到贷款，这些困难迫使手工业者建立并加入他们必须高利偿还其贷款的预支协会。

预支协会急速增长资本周转额，不是因为会员越来越多，而是如上面所说，因为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小资产阶级加入了协会并“发放”越来越多的公债。——倍倍尔注

- ② 舒尔采-德里奇先生在上述布勒斯劳合作社联合大会上还声称：“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正在根据合作社的自助原则，转向消费协会和生产合作社。他们即使出于策略的考虑，不直接赞同我们的观点，但也从我们友好的合作社吸取教益，接受我们章程的原则。不要过多久，他们都会最终站到我们一边”。舒尔采先生就是这样惯于说大话。任何地方的社会主义者也没有急于建立消费协会。即使他们需要这种协会为他们提供一点好处，也不能指责他们。但是，在整个德国，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像舒尔采先生所说的那样看重这些协会。谁也没有想过要借此解决一点社会问题。他们对待生产合作社的态度也是如此。最近两年，社会主义者建立了不少类似的团体，有的是为了帮助一批在反对资本派的斗争中士气消沉和意志薄弱的同志，有的团体，比如正在建立的莱比锡联合印刷所，不是让资本家得利，而是为党的宣传目的服务。加入这类协

诚然，合作社生产是调节社会对立的唯一手段。工资——今天以“劳动力”这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为条件的工资必然被全部劳动所得所代替，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必须得到他全部的劳动所得，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进行合作社生产的资金从哪里来？所谓的自助已经证明是不可能提供这笔资金的，因为今天的生产方式使得要求提供资金的人都是一些贫困交加不能自立的人。因此，有必要由社会代替个人，而一个需要固定组织的社会必须利用现在业已存在的组织，哪怕形式是错误的组织——国家。通过这种有组织的社会——国家筹集资金。也许有人要问，国家是否有这种能力，国家目前已经向个人提出很多不公平的要求，它是否有钱，是否能搞到这笔资金。国家能够筹集大量资金，我们的国家预算和公债可以为此作证。但是今天的国家筹集不到，首先也不愿去筹集消灭阶级对立的资金，因为国家组织本身仅仅是社会形式的产物。统治国家的和统治社会的一样，都是一定的阶级（少数人）。这些少数人企图借助国家组织尽可能地维护其本阶级的利益。当人们将要建立一个制度的时候，他们首先打听对他们是否有利，若要建立一个对大众有利的制度，必须以不损害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前提。因此，大多数人的利益只有同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利益融合在一起才能得到发展。这是封建的国家制度告诉我们的。在封建国家中是大领主、后来的土地占有者、贵族和僧侣掌握政权，他们利用国家的权力和资金维持自己的统治。在中世纪小资产阶级社会的母体中逐渐发育成长的资产阶级在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企图同占统治地位的大地主阶级一

会的人，谁也没有想要借此改善哪怕一点儿工人阶级的状况，更不用说用这种方法废除现今的私有制生产了。社会主义者利用一切现有的手段，是为了达到党的目的。这就是舒尔采先生为自己的观点利用的现象的实质。舒尔采先生如果等待社会主义者去投奔他，那他就永远等待下去吧。——倍倍尔注

起垄断国家的领导权，即垄断由国家内部体现出来的社会的剥削。资产阶级逐步达到了这个目的。在英国，通过1649年革命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在法国，通过1789年革命这一企图也已成为现实；在德国，虽然资产阶级主要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发展起来的（在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推动下），但由于建立了所谓的立宪制国家，现已成为一股颇有影响的力量。资产阶级在法国通过1789年革命取得绝对的统治以后，由于实行选举资格限制，把工人排除在第一条政治权利之外。在英国和德国，资产阶级在带有封建时代残余的机构（英国的上院、德国的元老院、帝国国会和第一议院）也实行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三级选举制、间接选举制，对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税收限制制、取消议员津贴（如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都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不是出于爱好才取得政治统治的，而是因为它在寻找而且已经找到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直接和间接地利用了这种地位。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列举几个我们国家立法方面的事实：税制（直接税的错误分类）、完全不公正的间接税制和兵役制（“有教养的人”、有钱人之子服役1年，而“没有教养的人”、人民之子服役3年）。现存的军队本身就包含着不平等，它只培养一部分能使用武器的兵员，同时它又是特权阶层（大公、贵族、资产阶级、官僚）在国家中维持其特殊地位的主要权力工具和镇压公开爆发的社会冲突的工具。在社会上，国民教育制度同样也是以阶级对立为基础，国家和村镇的较高的教育机构从公共预算，即大众的口袋里提取大笔资金，而很少用在国民教育方面。现存的所谓法制也是建立在阶级差别即财产差别之上。它给与富人的利益远远多于一无所有者。资产阶级除了这些间接的利益外，还享受直接的利益，我知道的就有：铁路建筑费用的利息保证、私人银行和股票公司的特权、保护关税制度给工业的保护、现金贷款（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中少数工业家和企业家只需为这种贷款支付很低的利息，甚至不付利

息)、关税信贷等等。

《民主通讯》在引用我的报告中的这些论述时将会看到,我的论述证明,《民主通讯》断定,国家没有为现代工业提供任何支持,这是对现存关系一无所知的表现。工业同国家曾经进行过多次较量,这当然是事实。当国家还或多或少具有宗法性质的时候,它们之间的较量就开始了。那时,国家还有优势和兴趣为资本的残酷剥削欲望大开方便之门;那时,国家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利益告诉它,以成千上万的人为代价养肥几个资本家,是件不能容忍的事,是它无论如何不答应的,同时不能消灭自己的封建专制主义倾向。自那以后,国家就变得深谋远虑,也就是说变得“现代化”,由于资本而现代化,资本已渗透到政府的各个最隐秘的角落,支配着君主和大臣的心灵和钱袋,现在实际上已成为国家的支配力量。凡是资本占据这种地位的地方,国家都直接按预定方式被利用,资本家的利益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利益。当然,小型的斗争总是难免的,特别是在我们德国,封建时代和旧时专制国家的残余还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它不愿让旧的宗法制度和独裁统治不打自垮。但是,在完全现代化的国家,如比利时、法国^①(封建因素已完全不复存在)或英国(没有权力,没有反抗),资本的统治是独一无二的优势,所以变得特别强大,而国家完成对资产阶级履行的义务以后,就被踢到一边。^②当然,国家帮助资本消灭了反对力量。现在资本已有足

① 德国从前10年起,特别是1870—1871年的“神圣”战争以后,也步入了这些“最现代”的国家行列,这一点不仅可以从自那以后出现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可以看出,而且还可从整个最新式的立法看出。——倍倍尔注

② 这个观点似乎要被下面的事实驳倒:资产阶级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如在对外政策、军事、警察,在反对限制和压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在这方面如谈得上自由的话)的斗争方面,都放弃了反对立场,而且还默默容忍或公开支持政府的反革命措施,进而直接支持国家政权,给它比在封建专制时代拥有的更大权力。

仅仅这个事实绝对不能说明资产阶级天生要“踢开”国家。社会关系的发

够的力量独自维持其优势了，一切限制“劳动自由”的框框，换言之，限制资本的剥削欲的框框统统滚开吧！我们德国也有这种情况。保护关税制度部分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几十年，支持了形形色色的工业家——我只记得有柏林的博尔西希、埃森的克虏伯、开姆尼斯的哈特曼、纽伦堡的克拉默-克勒特。工业有了竞争能力，也就是说，资本树长得足够高大，用各种手段足以饲养相应的工人等级以后，人们就试图慢慢废除这些限制。尽管现在工人抱怨环境恶劣，工作时间太长，工资太低，要求依法调整工作时间，而整个资本家阶级对此仅仅回答一声“是”或者“阿门”，因为这个阶级对“自由劳动的神圣权利”的“干涉”和我们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概念中扩大开来的只关心政治利益、很少关心社会利益的民主极为恼火，这个阶级同民主没有多少关系。直到不久以前，德国的许多州还存在决定工资高低的所谓工资牌价，谁也不能有超出这个牌价的任何要求，谁的支付也不得超出这个牌价，否则就要受到重罚。资产阶级废除这些规定是正确的，但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认为这些规定不公平，而是因为这些规定阻碍资产阶级的发展。有人解释说，原来的工资价格，由于生活资料不断涨价，条件完全改变，已经不适应了，这是正确的，但不是真正的原因。资产阶级能够比小手工业支付更高的工资，它需要许多人手，然而固定的工资率不让它这么做。我们的生产关系有了发展，不能独立的工人等级也已形成，通过使用机器，人的劳动力逐渐成为多余的了。此后，由大生产调整工资，工资本身不会升得太高。如果说今天的工人要求保护最低

展强迫资产阶级放弃自己的理想。它惊恐地看到，它的世界并没有被人看作是“最理想的世界”，它生产出来的无产者并不乐意担任挨饿这个反面角色，而是更有力地反对它，仍然要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这时资产阶级意识到，国家还有点用处，如保护资产者的财产，他们的生存，他们的整个存在，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企图。因此，资产阶级极力加强国家的军事和警察力量。——倍倍尔注

工资率以反对雇主，像以前的雇主保护最高工资率以反对工人提出过高的要求一样，那么，资产阶级就要大叫这是限制劳动“自由”。是的，这就是资本的剥削欲的自由，是对保护劳动即保护工人制度的压迫。老实告诉《民主通讯》，这是地地道道的曼彻斯特学派^①的主张，它与纽伦堡纲领或爱森纳赫纲领大相径庭。至于这两个纲领遭到多少非难，后面我还要讲到。

现在我回头分析我的报告。

我已经指出，今天的国家是阶级国家，首先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所以它没有钱，也不会出钱支持生产合作社组织的合作社生产。如果资产阶级这么做，所有统治阶级这么做，他们就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就将在工人阶级中造就一个竞争者，造就一个最后使他们成为一无所能的人的因素，他们就维持不了作为阶级的统治。当然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进行这种自杀的。由此可以看出，工人阶级必须而且一定能夺取政权，因为工人阶级是绝大多数人组成的阶级，因为它的口号不仅仅是自由，还有平等权利，其中包括公平正义。我再一次明确说明，我认为，由于我在序言中已经提及的原因，工人阶级中不仅包括狭义上的雇佣劳动者，而且还包括手工业者和小农、脑力劳动者、著作家、国民教师和下等官员，所有这些人现代条件下都是受苦人，他们的状况都不比雇佣劳动者强多少，甚至一点不强。他们即手工业者阶层和白耕农阶层也许稍微好一点，如没有现代发展的恩赐，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沦为牺牲品。这些不同的阶层真正构成人民的大多数，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多数人要压迫少数人，而是指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地位，所以这里谈不上工人阶级要取得阶级的统治或阶层的统治。相反，它要争取一个合理的民主的社会，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世界。

^① 曼彻斯特学派是一个经济学流派，主张无条件的“自由竞争”，国家和立法不得干涉经济生活。——倍倍尔注

我之所以要详细重复这后一点，因为《民主通讯》和我们所有的论敌对一个阶级或阶层的统治已经有预感，在对待世界的问题上，他们极其天真地认为，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社会改造只是修补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已。

因此，国家应该由一个以阶级统治为基础的国家变成一个没有任何特权的人民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大众用其所拥有的资金和人力将合作社生产代替个体的私有制企业。在这样的国家里，自助就是人民帮助，人民帮助就是国家帮助，所以自助和国家帮助是统一的，没有矛盾的。要建立一个人民国家，首先要教育群众了解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而这种教育可以通过组织，建立党组织和工会等等，创办和发行报纸和著作等等有效地进行。当然这种组织必须是国际性的，因为我们的状况不是哪个民族的，而是所有文明民族的特点。工业、商业和交通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都是没有国界的，只有有了一个同样没有国界的组织才能废除这种状况。

关于我的报告就讲到这里。至于怎样建设人民国家，我不想多说了，我想只要提一下就可以了。我们若要建立一个人民国家，就必须推翻特权阶级和个人的统治。有的人认为可以通过所谓“合法的”途径，通过演说和协议来实现这个目的；有的人认为，必须通过另一条合法的途径——他们把人民的意志看成是法律，而且是唯一的最高的法律——来实现，那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革命。关于后一条途径，若再作详细的描述，就显得多余了，因为将来不可能进行几次革命，因为那个对今天的国家感兴趣的人的卫士，那个检察官，非常喜欢信口雌黄和处理国事犯审判案。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不得不在此援引，因为这是历史事实，检察官本人也是抹杀不了的——各种国家形态和社会形态都不是通过华丽的演说和协议，通常都是通过残酷的铁的暴力才得以存在。古代的封建国

家就是通过各种暴力手段在平均分配社会家庭和氏族组织的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资产阶级社会则以更有力的更无顾忌的方式打击和压迫封建社会。请看，资产阶级社会，特别是在法国，在1789年及以后，对封建国家恨之入骨，抓住贵族便砍下他们的脑袋，铲除能恢复其元气的老根——剥夺和没收贵族的土地。资产阶级为了消灭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敌人，消灭原来在它眼里是那么神圣的私有制度，它以公正的名义，被压迫人民的名义完成了这一切。工人阶级是否仿效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以打碎政治框架为起点，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变私有制为公有制，进而用暴力手段加速私有制生产向公有制生产转变的缓慢过程，这是难以断言的。这一发展进程取决于运动参加者以多大的强度（力量）推动运动，取决于敌人给运动以怎样的反抗。有一点是无疑的：阻力越大，新秩序的建立就越困难。光靠洒玫瑰香水是无论如何解决不了问题的。

关于“如何”建立人民国家的问题，在斯图加特我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同样，关于使用社会帮助或国家帮助的问题，我也没有多讲，因为，请注意，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统一的。

现在我谈谈我们社会民主党和以《民主通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存在的主要分歧。资产阶级民主派认为，政治自由就是人所能要求的一切，最多也只是国家负责每个公民的足够的教育，国家统一征税，对每个人都公平合理。对于这三点我们表示同意，可是还不够，国家当然应该——社会民主党人也这么认为——保证自由，还应注意，一个人的自由不能损害他人的自由。如果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那么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是平等的。经济优裕的人对经济困难的人来说总是有一种道义上的压力。如果像今天的社会那样存在依附关系，工人服从面包商，依赖面包商而生存，那么，显然这个面包商有权压制工人的政治权利，企业主

就可以用他认为的良好方式剥夺工人的政治权利。除此之外，工人对仅以政治自由为目标的国家不感兴趣。工人之所以要求争取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是希望获得经济独立。

如果工人还是挨饿，他们的状况得不到改善，永远受资本家剥削，受尽生活的折磨，劳苦一生，最后，贫困而亡，那么，单是政治自由对他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仅仅获得政治自由并不能改善他的社会地位。瑞士和美国就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英国和比利时就更不用说了。而在一些民主派眼里，这些国家是“自由国家”，他们把这些国家看成是真正立宪制的模范国家。如果说仅仅政治自由就够了，那么，瑞士和美国工人的状况就没有什么可改善的了。谁相信这一点，谁就错了。在近几年里，美国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因为近几年美国工业发展迅猛，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政治自由又为工人运动开辟了开辟道路和自身发展壮大的条件。那里就象我们君主军事制度的欧洲大陆一样，没有警察监视，没有书报检查制度，不禁止结社自由。瑞士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唯一的、我们不能否认的重要差别在于，运动在自由国家比在半自由的或者专制国家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和效力。至少在国家工场实行的北美法定8小时工作制，以及含有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茁壮萌芽的苏黎世新宪法可以为此作证。

因此，社会民主党认为，政治自由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建立经济平等，建立一个以充分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凡是在自由损害他人的权利，也就是说，自由通过其干涉而损害平等的地方，自由就会终止。

《民主通讯》想知道，我对建设这种经济平等是怎样想的，或者按它的说法我想利用国家帮助？在何地开始实行国家帮助？又在何地结束？怎样着手建立又怎样组织这种国家帮助？

在此，我再次说明，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我没有详细讲这个问题，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大会上必须对今天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系从各个方面加以阐明和批判，从各方面证实这种体系的虚伪和矫揉造作。在这点上我是成功的。最好的证明是，事后，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而其中没有一种意见试图驳斥我对现状的批判，所有驳斥只限于对我阐述的社会改造问题纠缠不休。第二，我不仅要批判现存的生产体系本身，而且还要批判有些人提出的消灭这种生产体系的手段，以便消除甚至连它的辩护士也无法否认的最大弊端。在这方面，我也成功了，我的对手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保持沉默就是证明。

我一定要批判这两个问题，目的在于消除这一体系和辅助手段的优越感，我认为还可以说是为了我们的原则开辟出一块干净的领域。为了批判现状，也为了批判与此有关的历史论述，我花了不少时间，所以我只有很少的时间用来正面阐述我们的纲领。不过，我认为，详尽阐明我们的纲领也没有必要，因为我对现状的批判本身就是对未来系统提出的要求。此外，详尽描绘只有在理论上存在的事物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没有衡量具体条件的标准，就容易产生幻想，从而产生意见分歧。而当这些分歧实际上要遭到干预的时候，就会自行消除，因为正是目前的状况确定了按自然规律前进的道路。此外，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的原则的敌人始终不懂得这一点，相反指责我们，说我们想做的事一件也没有做成。人们为了消灭旧世界让我们忍受了至少几百年的缓慢发展过程，究竟为什么要求我们魔术般地变出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些人无意中暴露出一个很大的弱点：他们不能或者不敢维护现存制度，只能对我们提出的方法吹毛求疵，而对自己的智慧孤芳自赏，似乎这样就能不损害自己的形象，因为他们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请不要指责我只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对自己的困窘避而不谈，

这是因为我想谈谈《民主通讯》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所谓的国家帮助应该给谁？”

我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工人阶级不仅包括雇佣劳动者，而且包括小手工业者和小农，请注意，还有“雇农”和短工。小农等级的处境同小手工业者的处境一样糟糕，甚至更坏，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谈到。小手工业者必须忍受大工业的压迫，大工业压低生产价格，致使产品逐渐贬值。另一方面，如果小手工业者除了自身而外还需要雇佣外来的劳动力，那么价格越来越高，情况更加恶化，小土地占有者也有类似的苦衷。向国家缴纳的高额税金，为购买一小块土地或更好地经营原有土地所借的资本，以及用在大工业方面的资本，加上纸币贬值和公债等重负，就得消耗掉他的大部分剩余产品。他不得不压缩土地生产，因为他无力使用机器更好地经营大片土地，而他的一小块土地通常还不够为了积累足够的肥料养活几头必要的牲畜，他明知拮据，但还得花钱去购买肥料。只要几次欠收或平收就足以使他破产。他被迫出卖土地，去寻找归宿，或者去富农那里当短工，或者到工业部门当工人。

正象《民主通讯》认为的那样，社会民主党越来越不重视对农村居民的状况的研究。这不是因为它不了解农民的状况，也不是因为那种认为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没有关系的利己主义。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形势：产业无产阶级越来越聪明，数量越来越大，需要更多的教育和启发，需要力量。如果农业工人本身对自己的命运至今还持无所谓的态度，而社会民主党又没有足够的资金（这笔费用相当可观）在他们中间进行广泛而又分散的鼓动，那么，关于农业工人状况的各种解释又有什么用处呢？我感到奇怪的是，《民主通讯》居然如此关心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是比较了解农业无产阶级的状况的。可是《民主通讯》在巴塞尔代表大会^①发表对土地问

题的看法时，至少没有如此激动地表示反对。有人可能会答复我说：“引起我们不满的不是巴塞尔代表大会讨论这个问题本身，而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式。”好极了！《民主通讯》既然承认，而且非常了解农业无产阶级的贫困，那么试问，巴塞尔代表大会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措施消灭这些贫困。对这一问题，我想在本文结尾时再进行讨论。这使《民主通讯》觉得我的报告“很特别”，也就是说，我没有阐明农民的所有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我想在我能支配的有限的时间内主要向工人听众阐明我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我希望我能回答那次大会可能对巴塞尔代表大会有关决议提出的质问。结果无人提出质问，对此我比任何人都感到奇怪——这点我敢肯定。不过，在我的论述中终究要弥补这点缺陷。

按照《民主通讯》的说法，我没有论及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关于女工的地位问题。这个问题，随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将会自行消除。妇女将不是男人的竞争者，从而结束对男人的依附关系。男女完全平权，每个人根据各人的特点都能获得一个大致适合其自然能力和爱好的、能大大促进大众的尽可能高的生活福利的活动场所。社会主义社会不再使男人沦为工厂奴隶，同样也不会使妇女沦为家庭奴隶。通过有目的的组织 and 不断采用改良的生产工具和方法，同今天相比社会必要劳动已经压缩到最低限度，所以，这种劳动已不再是一种苦恼的事，而是一种享受。每个就业者，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会过度劳累。家用设备将适应新的条件，更换成与今天完全不同的，而且是更精良更适用的设备。将来，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用于儿童教育，个人不再有过重的负担。儿童将在有目的的共同监督和教育下开始他们

① 指1869年9月5日至12日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倍倍尔注

的早期社会交往，比如我们的资产阶级已经创办的幼儿园和寄宿学校——当然，在实行一个正确的原则时往往走样——在这一方面，妇女也将获得真正的人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妇女将是丈夫的伙伴（最好意义上的），不是从属于他，而是同他平等。她既不像今天的工人的妻子那样，是劳动奴隶和家庭奴隶，例如年轻漂亮就有被放纵的资产者及其同类诱奸和强奸的危险，也不像今天大多数资产者的妻子那样，是装潢门面的摆设，是买卖的对象，生儿育女的机器，或被用来帮助丈夫合法继承他的囤积的财富。

《民主通讯》提出的解决妇女问题的办法（站柜台或坐办公室等）是行不通的。国家和资产者把妇女安排在工厂和上述部门，并不是出于人道和人情，而是出于谋取利润的欲望和节约金钱的考虑。女劳力比男劳力便宜。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如果使用女劳力，男劳力就会贬值，最后，妻子和丈夫一起挣来的钱相当于丈夫原来一人挣的钱。丈夫和妻子，当然连同他们的家庭将一起走向毁灭。是的，劳动“自由”万岁！我想，应该说剥削“自由”万岁吧。

那么，应该怎样使用国家帮助呢？首先是哪里需要？需要多少才能确定这种国家帮助？这是《民主通讯》提出的主要问题。

《民主通讯》说：“拉萨尔想用1亿资金医治这一严重疾病！倍倍尔估计工人大约有1000万，平均每人才得10个塔勒，这么小的数目根本不屑一顾。”

让我们来听听拉萨尔是怎么说的。他在法兰克福的一次演说（《工人读本》）中，同舒尔采-德里奇争论说：“但是舒尔采先生却叫道：从哪里去搞到为此而需要的几十亿资金呢？你们看，人们想唬住你们的头脑！为此并不需要几十亿资金。暂且假定，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只能使用一亿塔勒。在开始的时候，就连这个数目也显得太多了，开始时我们不能把它全部用到合作社上去！资本通常能提供5%的利息。不应当把这种资本利息同企业主的利润混

同起来。资本利息是由企业主自己付给资本家的。这5%的利息每年就提供500万塔勒，如果我们有1亿资金，就能为此目的，即为了建立工人合作社而使用这些利息。由于这每年500万利息上加利，14年内就可以把资本增加一倍，那时我们就会得到2亿资金，这样我们每年就会有1000万利息用于工人合作社。我们假定，拿各个行业的平均数计算，用100万塔勒资本可以使大约4000工人得到工作；这完全是我们的一个假设；这个数字大概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不过无论如何，问题不在数字，因为它不过是拿来举例罢了。因此，1亿塔勒能使40万工人加入合作社：假如每家平均人口为5人，那么这就是200万人口；以每年1000万的利息计算，这就每年又可以使4万工人，即又有20万人口可能得到自由和福利，或者说在开头14年，我们假设每年只得到500万利息，这至少每年又可以使另外的2万工人及其家属得到自由和福利，这样在一定的时期内就为你们大家，为社会上一切劳动阶级摆脱贫困状况开辟了道路。但这还是微不足道的！你们也知道，一切工业部门都是在互相联系的情况下工作的；某一样东西对于一个工业部门来说是工业产品，对于别的工业部门来说却是刚开始劳动时所用的原料。制革工人为鞋匠工作，织布工为裁缝工作，钢铁工人为机器制造工人工作，机器制造工人又为其他成百个行业的工人工作，如此等等。因此，如果有70个或80个大型合作社，则第71个合作社就根本不需要另外的资金，而只需要原来的70个合作社的贷款就行了。这笔贷款完全可以保证它的存在，因为它可以从已经存在的合作中得到它所需要的原料和机器。有了71个合作社，就可能不用另外的资金而建立第72个合作社，有了150个合作社，就可能不用另外的资金又建立20个合作社，而后者以前者的贷款作为自己的劳动条件。这样，你们看，我原来说每年用500万到1000万利息又可以

解放2万到4万工人，这个计算太保守了，你们看，合作化一旦着手进行和发展起来，每年就有大批工人可以实现合作化。从而进入自由和福利的世界，其数目比我原来的大致估计要多得多，速度也要快得多。所以我在《公开答复》中就指出，所有这些工人合作社都应该通过信用联合组织互相联合起来。

这样，你们看到，上述的可怕数字是一种捏造，根本不需要几十亿的资金；对于整个德国来说，1亿资金不仅足够，而且在开始时还太多了。但是从哪里搞到这1亿资金呢？难道有人会这样极其愚蠢地看问题，竟认为国家会从自己的腰包里，从税收中掏出这1亿资金来吗？先生们，这样的想法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只证明说这种话的人对财政科学、对货币和信贷的职能一窍不通。我已经在《公开答复》中说明，这笔所需要的钱，即所需要的贷款，可以由国家轻而易举地筹集到，而不要任何人花费什么。但是我们先不谈这一点。你不妨暂时把事情想象成这样愚蠢和不正确；你们不妨假定，国家必须拿出这1亿资金来。不过，先生们，还没有一次战争不要花费两倍于这个数目的钱，而且，为了什么事情不曾进行过战争啊？在上个世纪，进行战争是由于情妇的某种爱情纠纷；在本世纪，进行战争是由于国王的征服欲，或者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某种销售利益。英国在40年代同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至少花费了两倍于此的钱，而这只是为了强迫中国人吸食鸦片，即完全为了资产阶级销售的利益。所以，为了任何事情，为了满足有产阶级的任何狭隘的销售利益也好，为了满足国王的脾气也好，都可以找到这一亿资金，甚至于两倍于此的资金；只是当问题涉及到拯救人类的时候，突然就无法筹集到这笔钱了！”^①

人们可能要问，从哪里搞到这1亿资金呢？先生们！在这

^① 参见《拉萨尔言论》1976年三联书店版第183—186页。——编者注

里，我不会，也不能向你们阐述一条冗长的财政科学理论，但是，我可以简单告诉你们，筹集1亿资金很容易，简直易如反掌，而且不要穷苦的农民——如自由派报刊所说的那样——从口袋里掏出1芬尼。我提个问题：发放银行券的银行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我是说，这种银行的利润是以什么为基础的？这种银行的基础无非就是下面这些：

比如，一家银行有1亿资金供流通，那么，它就能发放4亿银行券，这一点仅仅是根据经验事实得出的结论，4个银行券持有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表现自己而同时把银行券兑换成现金。全欧洲所有发放银行券的银行都是以这条简单的原理，这个经验事实为根据的。这个事实是一个社会的因素，是一个扎根于所有人内心的事实，谁也没有创造这个事实，彼得没有，克里斯朵夫没有，威廉也没有。这是一条社会的基本规律，就象存在自然的基本规律一样，谁运用这条规律，谁就拥有假设的3亿资金，即不属于他的，而别人也不需要的资金供他使用，因为在银行券持有人，即这个银行的真正债权人眼里，银行券起着同塔勒相同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还要证明一点：谁是这个银行的债权人？是我，你们，我们大家，是每个曾经把一个塔勒在口袋里放了一个月，而过了三刻钟就到了别人口袋里的人。

所以我说，谁运用这个社会的事实，谁就不用去抢任何人的，就会拥有假设的3亿资金供他使用。

今天，少数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许多国家都有这种情况）可以把这个扎根于所有人内心的因素当作他们的特权加以利用，这不是罪恶，不是耻辱吗？这个扎根于所有人内心的，而且只有通过所有人，而不是通过个人的活动产生的因素，反过来也只能给所有人，即国家带来好处！因此，国家不得象今天的许多国家那样，允许私人银行发放银行券，也不得允许普鲁士的那种混合银行

存在，如果需要的话，允许存在的应是象制币厂这样的必要的国家特权。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德意志国家银行——德国银行。然后，你们看，先生们，国家就有两倍、三倍的资金用于这些合作社，而不用象《柏林人民报》所说的“‘穷苦的农民往外掏出1芬尼’！”

《民主通讯》从上面援引的拉萨尔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微不足道的1亿资金也将是相当可观的帮助，无论如何足以解决最迫切的困难。1亿资金对于德国来说确实微不足道。1866年的战争就花去4亿塔勒资金，而“北德意志联邦”为它的兵役制不到3年就花了两亿多塔勒。^①人民国家不可能出现这种支出，相反，可以冻结其他支出，开辟新的收入来源。我想，在人民国家中，将废除军警人员和某些地位高的人的采邑，这样每年可以节约几百万。变这个阶级的私有财产为国家的财产，又可以积累几百万。国家为了大众的利益应发放多少公债券可以研究。那时，为非生产目的或为特权阶级的利益所发放的公债券将有公债受益人来偿还，或是干脆废除公债。同样，也将没有教会和慈善机构的财产。

因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则是工人的全部劳动所得，仅仅是全部劳动所得归工人，所以，各种高级官员和国家职员是否也照此办理，可以研究。结果可能是，他们领取的上千元薪水同他们的劳动量成反比，所以应该适当调整一下，高工资的作些扣除，分配给低工资的。根据我们的观点，铁路和公路，矿山和矿井必须是公有财产，即国家财产，前者为普通的交往服务，即沟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后者包括原始产品，是埋在地下的全民财产。因此，国家本身

^① 1870年的“光荣”战争在写本文时还没有爆发，因此，在此对那次战争作一点说明，德国和法国在那次战争中作出的牺牲，按货币价值论，按拉萨尔的办法足以一举解决社会问题，甚至还有富余。顺便说明一下，今天，我已经不再认为，按拉萨尔的办法就能解决社会问题，而认为，一种比较激进的解决办法是必要的。往后我也许有机会就这个问题作一个比较详细的论述。——倍倍尔注

有可能实行社会劳动，并且一定能有所裨益。铁路、盐场、矿井和矿山是易于最先实行合作劳动的领域。由于上述措施而颇为扩大了国有土地，可以首先实行农业合作制（农业合作社）。国家一方面采取节约措施，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民主组织提高福利，积累充足的资金，为组织越来越大的生产合作社创造条件。这种生产合作社越发展，私人企业就要相应倒闭，私人企业家的所有资本对他们的企业将失去作用，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工人，没有劳动力资本就不能增殖。最后，私人企业家一定会自愿把资本拿出来用于合作社生产，因为除此而外他们没有别的用途。由于私人企业逐渐被消灭而一跃为统治地位的商业将乐于，而且越来越愿意为合作社做生意，因为它们能获得买卖的全部所得。^①

按照《民主通讯》的说法，“商人的气质”是天生的，因此是绰绰有余的，尽管人民国家高度发达的人民教育发展那么多“商人的气质”，也会充分满足需要。对于《民主通讯》来说，它只要提供社会必要劳动，完全有机会同印刷工人和出版人组成联合体。在这种联合体中，他们及其数以百计的同舟共济的伙伴不是作为依附的人领取他们的精神劳动的工资，而是获得全部劳动所得。写作的无产阶级可能非常需要这种“国家帮助”，这一点《民主通讯》是不

① 不久前，有人曾试图驳斥本文的论点，但没有成功。这个匿名的人想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私人资本占有者是否能得到资本的“利息”。这位作者先生其实不懂，在现今社会里被称作“资本”，并谎称它具有增殖能力的东西，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存在的。在现今的社会里，资本只是简单的劳动工具，如果没有活的劳动力就一事无成。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参加劳动的人才有资格享受生产出来的产品，所以当然没有资本家想做“生意”的希望，即使他们表示只收“资本”的“利息”、不要“利润”也不行。利息只是部分企业利润的一定的形式。社会主义是彻底的，在这方面它敌视部分，也仇视全部。因此，资本家先生除了移居日本和中国外——那个匿名者先生也这么威胁说——别无其他办法。我只是担心社会主义在这个文明古国一旦实现，就会被日本人和中国人迅速理解并加以仿效，到那时，可怜的“资本家们”除了移居天国就别的别无他路了。——倍倍尔注

会有异议的。

其实，人民国家不会缺乏资金。它可以象今天的反动国家一样，用贷款解决困难。奥地利很幸运，它筹集了50亿古尔登借款，人民没有得到一点好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借款高达120亿法郎，这么大的数目，在人民国家中用来改造社会绰绰有余。

因此，组织生产合作社要比想象的容易得多。现代工业中现已存在的分工、机器生产、为生产某种产品成千上万的不同工种的劳动力之间的有机的相互联系，还能大大简化这种组织。生产向大生产（工厂生产和机器生产）的过渡越快、越多，对我们就越有利，我们的过渡就越容易。工业一旦发展到最高阶段，私人企业家和有产者的数量就会日益减少，而无产者，即工人的数量就会日益扩大，后者对前者的剥夺就会日益容易。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仅要维持，而且要发展现代生产方式、分工和机器生产。但是，从这里得到的好处，不是象今天这样只有少数企业家能享受，而是人人都能享受。如果今天发明一台机器，只需一个劳动力，就能在相同的时间里创造出以前需要5至50个人才能创造的等量产品——这个工人并没有这方面的特长，只是因为机器只需看管，往往只需花很少的力气——那么，成年的男工人通常可以由便宜的劳动力，如女或儿童来代替。一台机器能提供5至50倍的产品，那么，原来就业的工人有些就要挨饿。因为他们要活命，于是在他们内部展开竞争和压低工资。因此，每一个进步，每一项发明只有利于资本主义企业家，而不利于工人，而社会生产将结束这种状况。人人都能在改善了的生产中受益，人人都能享受到增加生产后的好处，多享受，少劳动。但人人必须劳动，杜绝懒汉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懒汉的命运就象今天的小偷一样，将被社会所唾弃。

在今天的国家和今天的社会里则相反。最会偷懒的人却受人

尊敬，因为他靠他人劳动而肥私；最善于巧取豪夺的人却受到百般称颂，而从清晨到黑夜同妻子儿女一道辛苦劳作的人，所挣的钱却几乎不能维持日常生活。这是什么世道！

现在，我们来看看《民主通讯》描绘的关于厂主和商人的动人情景：

“事实上大商业企业”，它说，“不仅需要资本家及其资本，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也就是说，毫不负责地任意把厂主描绘成大老爷是不公平的。今天，人家当工厂主，并非为了娱乐，为了消遣，他们也学习了不少东西；这些人不仅需要懂得技术方面的业务，还要懂得商业方面的业务；他们一定也干活；他们没有形成一个享有政治特权的阶层”，云云。

够了！《民主通讯》说过许多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研究，大企业是否除了资本家及其资本外，还需要别的。不，尊敬的先生们，大企业除了资本外什么也不需要。资本家通过资本就可以得到他所想要的和需要的一切：技术管理和企业管理、劳动力、机器、原材料。而他需要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资本。要说他愿意做的，无非就是清查帐目和把利润——通常是什么样的利润啊！——揣入腰包。这是多么轻松的劳动，然而是多么优厚的报酬！不是所有的厂主都是“大老爷”，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尤其是小厂主，他们为了应付竞争，保护自己，困难重重。这是今天的生产关系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产阶级的发展必然表现为世界市场的竞争。整天进行无计划的生产，对市场的真正需要一无所知，于是在某个生产部门就出现产品过剩并造成产品贬值，使经受不了这种打击的小厂主破产，而且还给另一些生产部门带来严重的反作用。不仅如此，这样的危机导致大批产品贬值和被销毁，从而导致一大批人的劳动力毫无用处。

在此我必须十分透彻地指出，我们的斗争不是针对单个的资

本家，而是针对整个阶级。单个的厂主和单个的工人一样，面对今天的情况是无能为力的。他必须服从市场规律和生产规律，否则就要破产。这并不是说单个的厂主就不能调整他们与工人之间的不平衡。如果他非但不调整这种不平衡，而且还利用他的优越的经济地位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进行更残酷的剥削，那么，这个单个的厂主也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将同他进行无情的斗争。

《民主通讯》断言：“今天（那么昨天呢？）人家当工厂主，并非为了娱乐，为了消遣。”唉！究竟是什么阻止厂主去当雇佣劳动者或小手工业者呢？什么也没有！当厂主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娱乐，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对此垂涎欲滴！厂主和商人的平均寿命比劳动者阶级的寿命长得多。他们大多数人脸色红润，体格健壮，同骨瘦如柴、目光暗淡的工人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寿命长，营养充足，正是无忧无虑、生活富裕的标志。所以，当厂主根本不是负担。因而这又是《民主通讯》的谎言。

它还说：“他们也学了不少东西。”

不错。不过很遗憾，这样说还远远不够，资本家无论在社会知识方面，还是在一般的知识方面，都远远不如他的工人。在我们的工厂城市里，许多关于企业家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说得不好听就是无知的例子不胜枚举。^①

① 把社会主义者描写成道德和家庭的掘墓人，已成为当代的时髦。因此，在此指出，我们的资本家阶级正在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并不是多余的。隐瞒破产，伪造票证，交易所的骗局和所谓的集团组织的谎言，不用说是对道德的犯罪。而我们的企业家阶级却有进行这种犯罪的特权。如果作一次调查统计，看看我们的监狱和拘留所关押的犯人中企业家阶级占多大的比例，那么，我相信，这种调查对我们的“有教养者和有产者”是极为不利的。尽管如此，大家熟悉的那句口头禅用在这里仍然十分恰当：“吊死小偷，放走大盗”。至于说到“消灭家庭”，结果就更不利了。婚姻在我们的所谓“有产者和有教养者”那里，十之八九都是金钱买卖，难道不是吗？只要妻子们想严格要求自己的丈夫，保持忠实，不是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都要因通奸而被判刑吗？关于这些丑闻的大量材料究竟

上面我已经指出，一个人如果是资本家，就不需要多少知识。如果当资本家的关键是知识，是文化，那么世界就要发生重大变化。一批资本家就要降为工人，而原来服从于资本家的人就可能上升为资本家。民族的最高贵最伟大的人物必将成为资本家，这些人无论现在或过去却正好处在相反的地位。这一点，《民主通讯》比我知道得更详细。比如，我们的科学家，还有诗人和发明家，特别是后者还会唱这方面的歌曲。

《民主通讯》声称，他们“需要懂得”技术方面的业务和商业方面的业务，“需要懂得”这几个字就能说明问题了，我没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的批判。“他们也干活”，噢，怎么干！酒吧间和早餐店、浴场和妓院的大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形成一个享有政治特权的阶级”，真的没有吗？而这是一家“民主”报纸说的！《民主通讯》真的一点不了解普鲁士和巴登的等级选举制、萨克森的书报检查制、巴伐利亚的间接选举制、国会议员和关税议会议员的资格限制制吗？这一切究竟对谁有利，对工人吗？在这一切被废除的地方，难道没给资本家以特权？——如果资本家不靠资本创造特权，不依附工人，不掌握报纸，他们拿什么制造，对，就是拿什么制造舆论？高等教育机构难道不是为他们的阶级开设的吗？还有税制、兵役制和法制没有给资本家以特权？谁否定这一点，谁就是瞎子！

《民主通讯》说话确实勇敢，很勇敢。此外，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在资本家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发表的言论，不正好证明它想反驳什么了吗？它完全承认我上面关于资本家阶级是靠国家保护和国家帮助而发展起来的论述。但是现在，当资本家阶级成长起来，并能自立以后，它便慢慢遗弃原来的养育者和保护者——国家了。

然而，资本家作为人（即他的体力和脑力）为资本的增殖究竟

来自何方？在公开的或秘密的嫖娼宿娼方面，谁能超过贵族？这些问题，我留给“有产者和有教养者”来回答。——倍倍尔注

出过多少力！我们的股份公司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民主通讯》的故乡有一个例子，可以对此作出非常明确的证明。埃斯林根有一家拥有1500名工人的大型机器制造厂，这个厂是个股份制企业，也就是说，几个资本家联合筹集了一定数目的资本，购买了厂房、工具、劳动力、技术管理和企业管理。年底工厂结算的结果是，脑力劳动力和体力劳动力创造了那么多的剩余价值，以致除去各种费用外，每个股东的每100古尔登股票可以得到股息8古尔登。于是，在12年半的时间里，股东的资本增加了一倍，而资本占有者除了把股息装进腰包外没有付出任何其他劳动。股东如果出卖股票，那是150或160古尔登了，而不是原来的100古尔登，于是他又有50至60古尔登的资本额以外的“纯额外报酬”。即使股东都是傻瓜，一点不懂技术管理和企业管理，但利润还是那么多；股东们谁也不参加劳动，谁也不动一点脑子，但利润分文不少！技术管理和企业管理也象其他劳动力一样，是按照市场价格买来的，也就是说，是出钱雇佣的。

《民主通讯》看到了吧，当资本家是何等痛快！工人有各种理由起来造反，因为资本仅仅是堆积起来的他人的劳动所得。

在此，我还要指出《民主通讯》对我的报告的另一个误解。它把我的原话：劳动所得必须代替劳动工资，同公司的份额混淆了。这两者有天渊之别！单个的公司所有者不可能把全部劳动所得给工人，每个工人只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劳动量从公司中得到同等的一部分。说到“公司的份额”，假设某个公司所有者、厂主或商人，把纯利润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任意把一部分交给工人。这就是——《民主通讯》说得完全正确——没有国家干预的“自由合同关系”，我完全愿意相信，资产阶级面临该死的国家调节生产关系的威胁时，将自愿实行这种“公司的份额”。但是，这种合同制存在两个问题：如果工人本来可以得到一个面包，而他宁愿要恩赐的一

点面包屑，而不要一个面包，如果他们宁愿在依附关系中满足于自己的部分劳动所得，而不愿自己成为企业主，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人，那么，他们就是傻瓜。实行这种“公司的份额”，资产阶级永远不会吃亏，相反，他们只会大发横财。有头脑的人早已理解这一点，所以，新的口号被提出来了：“公司的份额对工人有利！”“实行合同制！”在英国曾有人提出这样的口号。

让我们进一步看看这个问题的实质。

假定有一个工厂，能生产20%的纯利润，厂主愿意把纯利润的25%转让给工人，按照工资比例进行分配。假如50名工人一年的工资总额为1万塔勒，而纯利润总计也是这么多。厂主愿意拿出25%，也就是2500塔勒在工人中进行分配。这样每个工人除原来的工资约200塔勒外，还可以得到50塔勒，共250塔勒。厂主拿出2500塔勒并不多，而工人获得50塔勒却可以解决大问题。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就没有害处。但情况并非如此。工人由于能从公司得到25%的纯利润，劳动越来越积极，他们想尽可能地扩大这个25%的收益。他们懂得，浪费原材料、电、油等等对他们也不利，只要略加当心，就可以节约一大笔钱。还有，由于工人希望得到利润，不用强迫，积极性就很高，因此厂主不用再雇佣工头进行监督。这样又可以节约几百塔勒。由于这些原因，来年的利润就可能达到15000塔勒，而不是1万塔勒。工人能获得25%，也就是3750塔勒，每个工人将得到60个半塔勒，而不是原来的50塔勒。请注意，工人越干越积极，越来越节约原材料等等。而厂主将得到11250塔勒，而不是去年的7500塔勒，也就是说比实行公司份额以前增加1250塔勒。然而他得到这1250塔勒只付出很少的劳动，甚至可以说不必操多少心。那么，这种合同制究竟对谁有好处？主要对厂主有好处。除合同制以外，由于还存在工资制度和调节规律，还会产生其他后果：工资率逐渐下降，工人很快就会回

到老样子，而资本家将越来越富。整个合同制不久就会向大家表明，——今天深明事理的人已经看出——它象其他制度一样是欺骗，是镇痛剂，它绝对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消灭阶级对立。去你的吧！我们的口号仍然是全部劳动所得，我们的口号是全社会的劳动组织，而不是合作社劳动组织。

《民主通讯》对劳动所得的“分配”感到很头疼。它以为我们都很幼稚，如果没有“比较有力的”干预，也就是说厂主的干预，我们就根本不能进行分配。我敢向《民主通讯》保证，只要让我们进行分配，那么，分配对我们来说只是区区小事！贡献越大，报酬越高，只有作出贡献，才能获得报酬。谁的所得多，谁就可以多消费，但是应杜绝挥霍浪费，同时消灭贫困，人人都要力所能及，厉行节约。不过，他的积蓄不是资本，他找不到任何人供他剥削，而没有剥削对象，他若不参加劳动，他的积蓄就不能增殖。《民主通讯》提出关于合作社的内部机构的问题，也是出人意料的！它曾经极其尖锐地呵斥过那些怀疑人民是否有能力在国内处理自己的事务的人，可它现在竟然也以为人民是一群无知的孩童，不能组织和管理一个合作社。就连目前条件下的最简单的生产合作社，甚至每个消费协会、信贷协会都能令人信服地向它证明，工人当然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组织；在一个把尽可能普及教育视为主要任务的国家里，工人有双倍的能力建立合作社。

用《民主通讯》的话说，合作社生产将成为“国家规定的必然性”，所以它将会看到，人们如果不想饿死，“深入他们内心的商人的气质”就一定会表现出来。我想，有那么多“有识之士”，不难找一条正确的途径，只要这条道路本身不完全屈服于新的关系。我坚信这一点。

只有合作社生产——通过全社会进行——才是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我刚说完，《民主通讯》马上就提问：“工人应对经济

萧条冒多大的风险？”它在提出这类问题时总是以工人和资本家的、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关系为前提。

在一个正确组织起来的社会里，经济萧条的可怕风险、幸运和不幸将完全或者基本消失，因为这种弊端只有在无计划生产的、牟利只取决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欺骗的社会里才能存在。在有计划的生产中，通过调查统计，易于确定商品的需求量，而生产过剩这一生产停滞的根源也将随之消除。做到这一点将越来越容易，因为只有极少数人能购买的用以享受的奢侈品今天将停止生产，相反，真正的必需品的数量将扩大和增加。这种生产的计划管理将日益简化，因为在我们这里能实行的这些措施，在其他文明国家肯定也能发挥作用。一些国家收集的所有材料将汇总到一个国际性的协会委员会——不管对它怎么称呼。这个机构的费用总计也许要达到今天我们的完全没有用处的驻外机构的费用，但其作用将同它的费用成反比。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已经证明，工人是多么理解这种组织的必要性。目前，国际当然是作为战争手段成立的，而国际本身却是有效的维护和平的良方。

《民主通讯》还想知道，国家资金应该按什么方式进行分配。首先，资金数目由人民代表确定，应该尊重对此有表决权的人民。对单个生产部门的资金必须按照现在待业的人数进行分配。合作社一旦组织起来，就由自己的后代不断补充。究竟如何通过生产满足新的需求，由大家决定。^①这样，世界上最民主的组织就将诞生。

常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一个已经实行合作制的国家里，怎样安排那些不能从事合作活动的行业，比如医生、学者等等，我

^① 公社的制度对劳动的组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言而喻，除生产之外，消费也必须组织起来。在今天的社会里有一大批人，而且是生活相当富裕的一大批人，在从事产品的销售。他们是代理商、经纪人、零售商，总而言之，是各种中间商，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消费者自然要为商品价格加价。而在

的回答是，这些人的活动是为大众服务的，所以理应由大众供养，相反，那些对大众没有用处，而又想靠大众养活的人（这种人我们今天并不少见），在享受公共福利方面，理应按小偷和罪犯处理。

受苦最深的劳动部门应首先开始从资本主义生产向合作社生产的过渡，然后以此类推。至于原来的商业组织最好向今天那种已初具规模的工会合作社发展。为促进人民福利而设置的官僚机构，将远远不如压迫各种自由活动的官僚机构强硬，那是我们今天进行的而且是必须进行的自由活动。而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自由活动将容易得多。人民本身拥有对付当局干涉的武器，人民是独立的，官员是人民的委托人，而不是人民的老爷。

《民主通讯》从此可以看出，事实上，只要人民愿意进行这种改造，其他事情都是比较容易的。我不否认，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犯错误。什么时候才能不犯错误呢？至少现在确实确实没有犯。同样，我也不想断然说人家提不出比我们更好的建议，谁有更好的，谁就提出来！但一直没有人提出更好的建议，于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建议是最好的，这一点谁也不能责怪我们。我们的建议——我们相信是好建议——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对现存关系进行检验后产生的自然结果，所以它有非常实际的根据。

《民主通讯》在3篇冗长的社论中确实动了脑筋，试图论证我们的建议是不可行的。最后它提出了一条建议，这叫什么建议啊！太可怜了，真可以说是事倍功半。

《民主通讯》要求“把国家帮助用于别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但又限于“如果可行的话”。我在本文另一个地方已经谈过教

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切将不复存在，大货栈和大商场将代替零售商店、商行等等，通过这种方式的集中将为大众节约一定的时间和费用。但是，这种组织建立以后，要动员上述这些人参加生产，他们的生活不能再依靠销售他人的产品，而是依靠自己创造产品。——倍倍尔注

育在今天的经济条件下具有的影响和地位，现在我只想向《民主通讯》提一个问题：假如两个婴儿同时出生，其中一个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为其准备了25000塔勒，可以说在他身上倾注了种种努力，但他却是个傻瓜；另一个一无所有，但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按照《民主通讯》的观点，谁最有前途，我是说，成为亿万富翁？请回答，而且要直截了当地回答。

《民主通讯》在文章的开头便声称，它摸索着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这些文章对我们的建议进行了批判，说我们的建议是为真正的曼彻斯特学者、舒尔采-德里奇或者孚赫^①歌功颂德。《斯图加特观察家》^②在首要位置转载了这些文章，说明它完全同意这些文章。最后，这两家报纸的反对者常常指责它们有社会主义——可笑透顶——甚至共产主义情绪。这些反对者想必会感到无地自容，不得不承认自己干了件蠢事。《民主通讯》现在兜售的、《斯图加特观察家》虔诚地转载的东西，各家民族自由派报纸可以心安理得地采用，斯图加特的爱德华·普菲弗尔^③博士先生甚至走得更远。

我的答复可以结束了，但是我还要回答《民主通讯》一个问题。这个回答关系到我们对土地问题，对农业无产阶级的状况的态度。

《民主通讯》自己也承认，是有这么一个阶级，它的状况比工业无产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劣，这一点，《民主通讯》知道，而且描述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宁愿援引它的原话，而不愿自己表述。它说：

“农业工人的存在，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历次代表大会和报纸上都进行了讨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人们有理由象为城市工人那样也为农业工人提出自主的要求；同样，另一方面，如果收

① 茹尔（尤利乌斯）·孚赫（1820—1878）——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1866年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编者注

② 维尔腾堡人民党机关报。——倍倍尔注

③ 一个属于曼彻斯特学派的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家”。——倍倍尔注

益只应有利于今天完全称作工人的人，那么绝对不能，也没有责任提出给农业居民以国家帮助的要求，如果有另一种什么国家帮助的话，农业居民肯定也会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如果说国家应该为城市中不再存在‘奴隶’而操心，——这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它同样有义务在农村消灭‘雇农’。根据这一点我们作了概括，短工、雇工和佃户同富农相比，就像城市工人同厂主一样，确实是可怜的。如果城市工人不打破这种局面，首先就得一代一代地继承这种恶劣的状况，而农民甘愿一代一代地忍受这种同他们一样的或者稍好一点的状况，不像厂主那样经常改变自己的状况。

只有无知才否认农业无产阶级的存在。如果工人问题有朝一日以国家帮助的形式正式通过立法讨论并作出决定，那么农业无产阶级的存在问题也将迅速成为，而且将会不客气地成为迫切的问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样，这一问题至今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也是可以解释的。社会问题首先是由不了解农村情况的学者和思想家提出来的，现已被城市工人所接受。城市工人受到城市的熏陶，精神上比较独立，他们与居住密集的工人群众共同生活，比较勇敢和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目前，工人团体的领导和成员极为重视社会问题，而这个问题与职业和兴趣又有所联系。当然他们必须首先克服他们面临的重重困难，以便使工人问题不再象强加到自己头上那样，再扩展到其他人身，尽管他们不甚了解这些人的状况，至今还没有让这些互不交往的人的生存明确地联合在一起。但是，这同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反复强调，国家帮助也要照顾到农业工人，谁想真诚地处理这个问题，谁就必须记住这一点。”

对第一段，我不得不表示反对。农业无产阶级的状况问题已作过讨论，我记得是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已进行认真的讨论。我下面还要谈到。

《民主通讯》自然明白，它在狭义上十分了解农业无产阶级，就

像了解工业无产阶级一样。比如说，它总是把大多数生活很贫困的小手工业者看作“师傅”，“独立者”，一种“企业家”，说他们的状况不必再改变。同样，它还认为农业无产阶级仅仅是那些极可怜极贫困的短工、雇工和佃户，对于后者，它无疑是从普鲁士明确了解到的。

《民主通讯》没有把德国中部和南部的、大多数生活极为贫困的小农计算在内，虽然这些人的处境同前面提到的几种人基本相同。他们象小手工业者受大工业家的压迫一样，受着大地主的压迫，直到其土地被盘剥罄尽，尔后便到大地主那里跨入短工的行列，或者跨入工厂的雇佣工人的行列，踏上我们的社会阶梯的最低一级。

这种情况是怎样出现的呢？在我们德国，至少在大部分地区没有像英国那样，限制土地的继承和随之出现的分割。德国的大多数州已经废除了对土地继承权和小块出卖土地的限制。在萨克森，原来实行过有关小块和整块出卖土地的限制，但不久前，第二议院也作了废除这种限制的尝试。这种尝试的结果是把土地弄得七零八碎。每个人都想有一小块，种植必要的作物，满足自己的需要。但这毕竟是有限度的。如果个人的地产越来越少，最后就不够养活占有者自己。但是，占有者不仅想有必要的土地产品，而且还想使收益有所剩余，然后出卖，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如交纳税收、偿还小额债务的利息，添置衣物等等。合理施肥是土地丰产的主要杠杆，所以他还必须购买必要的肥料。他要饲养牲畜，而没有牧场，想买肥料，又缺乏资金，结果其收益当然日益减少。小农感到绝望，便去寻求帮助。于是，狡猾的企业主便成了救命的天使。他发现，穷人已经难以聊生；他还看到，穷人耕种那么一小块土地，有很多空闲的时间。作为一个“生来就有商人气质”的人，他很快就计算出，只要支付微薄的工资，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空闲时间。

不管他建立什么样的工场(麻纺、棉纺、织袜等),穷人们都会去干活,因为他们希望,除耕种土地稍有收益外,当雇工再挣一点钱就可以维持生活了。就这样,他们得到了一份微薄的工资。可是,就连这么微薄的工资也很快下降了,因为工人的数量越来越大,工人之间开始进行竞争。企业主也说,虽说还是原来的产品,但他不能再支付原来的工资,由于机器的竞争,他不得不廉价出售自己的产品。小农想,只要延长劳动时间,就能在微薄的工资以外再增加收入。但是,他如果延长劳动时间,就没有时间经营自己的土地。于是他就出卖土地,当然是廉价。卖给谁呢?卖给较大的土地占有者,卖给资本家。后者早已发现,小农即使卖掉土地去当工人,总还得生活下去。资本家已经看出,原来的小农和现在的工人是他最近的和最好的顾客。他一块又一块地买下他能买到的土地。每买进一块土地,就等于少了一个小农,消失一个竞争者,却增加一个消费者。由于他买进的土地区数量相当可观,雇佣短工耕种土地他嫌费用太大,因此,就仿效管理工业的办法:购置机器,聘请能干的具备足够技术知识的管理人员。于是,他搞起了大农业,各个方面都安排得有条不紊,他的产量相对来说,远远高于原来的占有者辛辛苦苦才能收到的产量。这时他就出卖粮食,而且是高价出售,尽可能贵地出售。原来的土地所有者现在必须从他那里购买粮食。如果他的销售市场再大一点,他的出售价格就会更高。如果附近有铁路,即对他来说更是福星高照了。他可以把粮食运到附近的城市,运到大工商业中心,甚至运到国外去销售。因此,对于本地居民来说,土地产品的价格当然不会便宜。如果他和他的同伴都没有为他们运输产品和有助于提高产品价格建造铁路,而企业家和银行家又因获利太少不愿建造,那么,他和同伴就去找国家。他们把一个地区的贸易和交通描绘得神秘莫测,极端重要,并且证明,国家在此地或彼地投资建设了一条铁路,但获利不大,认

为这种做法有些顾此失彼。于是大臣们就开始考虑得失：他自己当然不会出钱建造铁路，但是，在这个地区当上议员，当然首先是获得选票，说不定就是获得上述地区的大土地占有者的选票，而获得这种人的选票对政府，对他本人却是至关重要，特别是争取在议院取得绝对多数也是不容忽视的。好！说干就干！于是计划拟定完毕并提交议院讨论。只有少数人，主要是已经自立的城市和较大的工业区的代表表示反对和不满，因为在议院里多数人得到过大臣的帮助，所以他们对大臣怀着非常明显的感激之情，另外一些人还指望得到大臣的照顾，早就想表示他们的心意。这些人同几个有幸挤进议院里的官僚和大财阀（他们知道应赞成什么）就足以使这个计划以多数顺利通过。铁路就这样建成了，从而为我们的大土地占有者开创了新纪元。到此为止，他基本上只种植和出售粮食和辅助产品，但是他打算并已看出，如果把部分土地改种牧草和饲料，饲养更多的牲畜，那就更实际更有利可图。

他认为，这样做投资少，成本低，而赢利高。

以前他也饲养过一些牲畜，但由于缺乏同外界的联系，无法把牲畜运到外地去出售，而本地居民，自从变成消费者和顾客以后，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列，因为穷人很少吃肉，也就是说买不起肉，因此他在这一方面经营甚少，充其量只靠它们提供一些农田用的肥料和帮助他处理废料。现在不一样了。他有了铁路，他的牲畜可以高价出卖，因此饲养业成了他的主要项目，他养了羊、猪和种畜，除了肉类以外，羊毛、猪鬃和毛皮的价钱也很高，是工业上大量需要的原料。经营这种生意使他的财富日益增多，他的占有欲也随之日益升高。

小食利者逐渐消失了。原来的中等阶级接替了小食利者的地位。他们的土地虽然较多，但他们无力按新的要求经营这些土地，因此他们的收益越来越少。他们的富邻居使用机器，可他们想都

不敢想，第一，因为购买机器要花许多钱，而他们只有很少的钱；第二，因为他们在小块土地上无法使用机器。所以他们只好望机兴叹。这时，他们至少想购买一些生产肥料的先进设备等等，以便在他们的土地上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但他们没有现金购置这样的设备，于是就借债。由于工业需要源源不断的大量资金，股份公司从资本家身上可以获得比利息高得多的利润，还有，国家为了军事等项目不断发放公债券，为了得到资金又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提出优惠的条件，所以货币增值。农民必须支付比他的土地所得高得多的利率。他不得不加倍劳动，以便偿还高利贷。如果他的土地很多，还需雇佣劳动力来经营，那么，他必须给劳动力支付较高的工钱。工业的工资即使再低，对他，一个务农的人来说，也算是高的。但是，按照本地的习惯，他必需的生活资料却不断涨价。他本来可以出售这些生活资料，获得一笔钱，可他必须把它作为饭钱支付给他雇佣的外来劳动力。

因此，原来觉得还能应付的农民，而今每况愈下，他不得不从清早干到天黑，还常常维持不了他那点小资本，如果遇到歉收，便告破产。他的土地就得出卖或被拍卖。这对贪得无厌的富邻居来说，却是大开胃口的好机会，直到又一个牺牲品出现为止。大多数农村游民都属于上述这个阶层，他们看到，长此下去，自己的灭亡难以幸免，所以他就变卖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还清债务，留下一点钱去寻找新的归宿，这样做，对于一个游民来说，通常是克服一个难关又陷入另一个更大的不幸。

而我们的政治制度，如沉重的税收负担、兵役制等等，严重恶化了小农和一般平民的生活状况，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把这样少的地产再分割成小块让子孙继承，就等于加快他们的灭亡。即使由强制法禁止土地分割，也难以避免产生这个问题，因为地产继承人势必出钱买下其他部分的遗产，这样就因为负

债而使其加速破产。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原因曾经毁掉了小资产阶级的生存，现在又把农民等级推向灭亡。

我们应该让农民走向灭亡吗？他们同别人一样也是人，他们同富豪一样也有要求生存的权利，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权要求社会废除不是他们创造的、对之没有义务的、不让他们生存的制度，而建立一个能使他们和所有受苦的人象人一样生存的制度，换言之，要建立能保证这个地球上的财产人均有之的制度。这个地球上的财产足以使每个人幸福安宁。

我们要在地上幸福生活，

我们再也不要挨饿；

绝不让懒肚皮消耗

双手勤劳的成果。

为了世上的众生，

大地上有足够的面包，

玫瑰，常春藤，美和欢乐，

甜豌豆也不缺少。

人人都能得到甜豌豆，

只要豆荚一爆裂！

天堂，我们把它交给

那些天使和麻雀。

——海涅^①

但是，如果小农和短工由于这些原因象产业无产者那样，陷入

^①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9页。——编者注

当今的困境，那么，改变他们状况的途径显然是一样的。我在论述产业工人的状况时已经指出，国家拥有国有土地和它没收和剥夺来的地产、教会地产、国王的私有地产等等，所以，国家有能力建立农民联合体(农业合作社)来耕种土地。当然，这种合作社必须象今天的大地产那样，使用机器耕种，在合作社内按贡献大小分配收益。此外，国家必须对土地分割和共同经营等依法作出规定。或者使大土地占有者根据上述措施自己辞去劳动力，把土地转让给国家由社会经营，或者由国家加以剥夺(剥夺其所有权)。现在的国家还保留剥夺权。如果需要建设一条公路，一条铁路，国家有权不顾占有者的意志，征收有关地段(按价付款)。今天的国家声称，这么做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但往往只是为了少数有产者的利益。而人民国家进行剥夺，无疑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征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的，所以这种剥夺有充分的根据。

毫无疑问，这里列举的措施，对于消除农业居民的贫困是唯一可行的措施。同时，这些措施是以非常简单的条件为基础的，所以它们比社会上工业部门的合作社组织更易于实行。至于这些农业合作社如何组织，以村镇为单位组织或者在一些村镇里组成几个合作社，还有土地的规模等应由立法部门作出规定。这些组织所必需的专业教育，应该象工业组织一样，国家应当保证所有入学者得以就近入学。

巴塞尔代表大会遭到那么猛烈的攻击，它对这个问题究竟作出了什么样的决议呢？“大会宣布，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私有制，变土地私有制为土地公有制。还宣布，这种转变是必要的。”

这个决议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害怕，是可以理解的。对一个迄今未曾被外界论证的问题，一个许多国家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作出一项决议，而且不作任何说明突然向全世界宣布，产生这种反响是必然的。

这次代表大会如果接受了总委员会的提案，即埃卡留斯提出的要求简单通过布鲁塞尔决议的提案，而不出现上面引用的那段文字，那么，这个决议草案就会心平气和地获得通过。有些人就是这样，不管在他们充满偏见的眼睛里是多么糟糕的东西，你最好彬彬有礼地送给他们，那样，他们最多表情难看一点，但总得咽下去，但是，你如果莽撞地送给他们，他们就会用耳光来回敬你，然后怒发冲冠，再也听不进你的任何要求。

那么，埃卡留斯的提案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鉴于生产的需要和众所周知的农学(农艺学)规律的应用都要求大规模经营农业，因此也有必要采用机器和组织农村劳动力，并且一般说来，现代经济发展力求大规模的农业经营；——鉴于根据上述，农村(农业)劳动和地产必须同矿山(上次大会决议宣布，矿山是公共财产)建筑在同一基础上；鉴于，土地的生产特点构成一切产品的原始材料，构成一切生产资料 and 一切不需任何劳动的消费资料的原始源泉，大会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形成一种社会的必然，即农田将转化为公共的社会的财产，由国家方面以同矿山和铁路的同等条件租给农业团体(农业合作社)”。

实际上，这同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提案是完全相同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它说出了应该这么做的原因和方式。哪怕不明内情的人也会一目了然。

大会虽然事先没有说明，应该怎样实行这个决议，但是很清楚，实行这个决议必须以各国的不同情况为转移。比如英国的情况有别于法国，而法国的情况又不同于德国。实际上各国也有相同的地方：英国和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群众同样忍受着贫困。但是人们感到，贫困的形式因各国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而各不相同，所以，根据这些现存的不同形式，必须采取相应的变革形式。在英国，一举剥夺所有的土地占有者比在德国采取同样的行动可能要

容易些。在英国，由于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如果我再在此详细论述这个过程，那就离题太远了），只有不足35000个土地占有者。35000个土地占有者（每家按4口人计算，共14万人）占有一个国家的土地，享用着这些土地出产的可供3000万人生活的收益！大租田者，其中包括中等阶层，使用完善的设备经营着这些土地，而所有的农业居民却难以聊生。

暴力和犯罪，在英国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记得的就有：对爱尔兰的态度、殖民地的残酷剥削——，使农业居民的精神和肉体堕落到了惊人的地步。用暴力剥夺大地主，是向人民赎罪，是一个创举。这个创举的规模虽说不能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但在取得的内部权利方面完全可以同它等量齐观。

法国的情况与英国不同。在法国，由于1789年的革命，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最大限度地剥夺了贵族和教会的地产。所有的土地，有的免费，有的真正低价分配给了农民、原贵族和僧侣的奴隶及农奴，同时，通过立法保护了较大地块的合并。封建贵族和僧侣的统治吓坏了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现在想方设法防止类似的制度以任何形式复辟。英国只有为数很少的土地占有者，而法国恰恰相反，有很大数量的土地占有者。但是这些小土地占有者由于太分散，所以忍受着同我们德国的小农一样的贫困。法国的农民等级的状况究竟如何，最好来听听官方人士的评论，这是我在埃卡留斯《一个工人对约·斯·穆勒的国民经济学说的驳斥》中看到的。德·贝昂塞先生1866年在法国下院说：“根据1851年的统计，加在地产上面的抵押债务达100亿法郎，自那以后，情况越来越严重，劝说政府、公布1861年的报告等一切尝试到目前为止全告失败。许多想出卖地产的人找不到买主，相反，较大的地产，主要在城市近郊，只要分成小块，就能高价出卖。为了买到一小块土地，人们往往要借比自己占有这块土地时多一倍的钱，他们想慢慢

偿还这笔债务。而这种分块出卖又导致新的抵押。村镇委员会证明，在法国7846000个土地占有者当中，有不下360万人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交不起人头税。”这种数字不胜枚举。拉萨尔陈述说，根据1861年的统计，在法国，有346000家农民住房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1817838家农民住房只有一窗一门。在这2163838家农户中生活着大约1000万人，他们都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然而法国比我们德国提前50年达到“劳动自由”，“国民财富”也年年增长！

所以，法国应当采取同德国同样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在德国，我们实行的既不是法国的土地制度，也不是英国的土地制度，而是一种混合的制度。

法国代表在巴塞尔代表大会投弃权票，有两个原因：一是有些人不赞成公有制，而赞成巴枯宁所说的个人主义（巴枯宁主张废除一切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安排个人的生活）；二是法国人担心，这个决议会吓坏农民，把他们推到反动派的怀抱，这在法国革命运动即将来临的时刻可能产生极为不利的影晌。

这后一种原因也要求德国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必须谨慎。农民固执，死抱住私有制观念不放。他们同外界没有频繁的交往，分散居住，过着枯燥单调的生活，很少接触新思想，而叫他们接受新思想就更困难了。他们没有文化，应该知道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互相间没有活跃的思想交流（思想交流只有在共同生活中才能开展），原来压在他们身上的负担使他们养成了多疑的习惯，所以，这种人轻易就能激烈地反对上述任何一种新思想。我们的农民对合作经营土地还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要实行变革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重要的是，要避免农民等级在以产业无产阶级为出发点的运动面前感到意外，感到害怕，以致受人挑拨而变成运动的敌人，要把他们吸引到运动中来，不仅要使他们理解任何一种新

思想(因为只有一种新思想是不能使他们产生兴趣的),而且还要使他们明白自己的切身利益,使他们从反对者变成同盟军。具体怎么做,大家还可以讨论,只要大家群策群力,就可以做好。

对于农业问题,我们产业工人阶级首先要有足够的认识,这是必要的。只要我们想做,就一定能做好,每次在集会上都要向农民群众宣讲他们的状况。产业工人应首先在附近的农村进行宣传,并以此为起点。

我离题太远了。我本来只想按照自己的想法谈谈我们对农业工人应该采取的态度。我觉得已经谈得很多了。我们在产业无产阶级解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实际上已经表明我们是赞成巴塞尔决议的,至于怎么赞成,我们认为,只要符合我们的条件,可以不拘形式。

我们遇到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我听见《民主通讯》喊道,“共产主义的”马脚露出来了。几个月前,你们在爱森纳赫才通过一个纲领,现在竟然恣意践踏这个纲领——且慢,别着急!

爱森纳赫纲领究竟是怎么说的呢?这里用不着全文转述。纲领的第三款第二条说:

“工人对资本家的经济依赖性构成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所以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在废除现在的生产方式(工资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合作性质的劳动使每个工人得到全部的劳动收益。”^①

上面这段引文的意思是明确的。如果有人能向我说明,现在还有另一条途径、另一种方法,能使工人经济上从此不再依赖资本家,那么,请说出来!我洗耳恭听。谁有其他方法,能使“工人得到全部的劳动收益”,请提出来!我们将聆听并验证他的建议。但是,如果《民主通讯》出来说,爱森纳赫纲领是——它是无意的——共

^① 奥·倍倍尔《我的一生》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2卷第79页。——编者注

产主义的，幸好人们不承认它，那我就回答说，爱森纳赫纲领第三款同纽伦堡纲领^①第二款是一致的，该纲领第二款说：

“劳动的人对劳动工具的垄断者资本家(独占者)的经济依赖性构成各种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压迫和政治依赖性的基础。”^②

这里说得既明确又透彻，工人要获得解放，必须结束劳动工具完全占有在少数人手中的状况。至于这些劳动工具是机器、工具、其他材料还是土地，那是无关紧要的。

因此，爱森纳赫纲领第三款第二条的行文同纽伦堡纲领第二款第二条的意思显然是一致的。

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只有两条路：一，建立民主国家，通过立法逐步排挤私人企业主。如果社会民主运动的对手及早醒悟，实行妥协，设法使自己的剥削阶级灭亡，并作为普通的人转向大众，那

① 为了阐明这个和上面那个纲领，有必要向不明内情的人作如下解释：1868年9月5、6、7日，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当时作者是该联合会主席)在纽伦堡召开联合会代表大会。莱比锡郊区协会建议通过一个纲领，表明德国各协会的立场，并提出四点意见作为纲领。而这四点意见几乎是逐字逐句照抄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这在社会民主党和进步党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结果前者获胜。后者退出联合会，后来组成德国工人同盟。在纽伦堡联合会代表大会召开后一周，德国人民党在斯图加特召开代表大会，对我们的行动表示热烈欢迎，并声明“赞成”这个纲领。9个月后，当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一致决定解散，加入民主工党)召开的时候，德国人民党的大多数人对此不感兴趣。关于土地问题的巴塞尔决议真是祸根，把友谊给毁了。分裂已成为自然的而且对双方来说也是必要的。人民党同我们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行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但与我们党的社会纲领却大相径庭，而我们认为重要的正是社会纲领，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作是不会持久的。

《民主通讯》(当时弗雷泽任主编)极为坚决地反对我们党，一年后弗雷泽任《奥地利杂志》编辑，这是维也纳的霍亨瓦尔特伯爵大臣的报纸，所以他知道为什么要反对我们。——倍倍尔注

② 1868年9月12日《民主周报》。——原编者注

么,我们就要走这条路;另一条道路要简单得多,但比较残酷,那就是暴力剥夺,一举消灭私人企业主。我们走哪条路,对我们是无所谓的。因此,如何渡过危机,取决于资本家阶级本身,危机的性质取决于他们使用手中的权力工具的方式。愿他们量力而行——根据实力较量,胜利最终属于谁,是不容怀疑的。群众站在劳动人民一边,道义上的法也在劳动人民一边!只要真正了解群众,斗争是必胜的!

人们对可能使用暴力不必惊慌失措,对“合理的”存在的压迫、对暴力的剥夺等等不必大惊小怪!历史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新思想一般都是先通过其代表同旧思想的代表进行暴力斗争才发生作用,然后,为这些新思想斗争的战士再力图打垮旧思想的代表。我一再提醒人们记住法国的1789年,记住在某种程度上也关系到法国的1830年,记住德国的1848年,那时资产阶级显然也参加了斗争,但由于缺乏革命动力,它作为阶级极为明显地表现出缺乏精神力量,因此半途而废,一听到立宪主义的口号便同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和王权媾和。如果当时工人在数量上达到今天的水平,政治斗争是必胜的,社会斗争的道路也将是平坦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暴力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起的作用。卡·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的著作《资本论》中说得很有道理:“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①

我建议《民主通讯》读读上述这部著作。我不仅向它推荐这个作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柏林敦克尔出版社1859年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版,1869年第二版^②,还向它推荐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编者注

② 奥·倍倍尔误写为1870年。——原编者注

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①以及上述埃卡留斯的著作和遭到很多人诽谤的拉萨尔的著作,对后者我以前也做得很不公正。

《民主通讯》自己也承认不理解这个问题。现在它从其他方面将体会到,只有认识了一件事物,才能对这件事物作出公正的评价。上面引用的著作是一个最好的材料,而上面列举的著作更是内容丰富的材料。

我的话讲完了。

这次论战结束以后,我无意中突然想到,还有一个问题我不能不提出来。一家报纸,如《民主通讯》,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民党的指导性报纸,许多党的同志要从上面吸取社会政治知识,而它在“怎样对待党员群众的知识 and 判断力?”^②这样一个迫切的问题上公开承认自己愚蠢,无怪乎有那么多人只知道喊:天哪!天哪!却不知道干什么。

译自《我们的目的》1893年柏林版。

(蒋仁祥译 葛斯校)

① 奥·倍倍尔误写为1844年。——原编者注

② 我们的报纸编辑十之八九天天在有意无意地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连社会主义的著作都没有见过,更不用说读过了,这是事实,否则他们描述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时那种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该怎么解释!——倍倍尔注

巴黎公社——欧洲无产阶级的前哨战*

(1871年5月25日)

……先生们，议员特赖奇克先生^①曾经说过，我们的城市管理准则，也就是普鲁士的城市管理准则不久就会在亚尔萨斯—洛林贯彻执行。不过，这是些什么样的管理准则呢？目前，得天独厚地在亚尔萨斯—洛林发号施令的官员是众所周知的人，或者我就干脆讲明，他就是声名狼藉的冯·屈韦特尔先生。（右边有人喊：“嘘！”）由于他在莱茵省实行反动统治，由于他耍弄手段对付自由派报刊，又反对进步市长特立普而名震欧洲，但是，这是一种很坏的名声。（左边有人喊：“太对了！”）

先生们，施梯伯先生^②建立了警察机构，象上面提到的冯·屈韦特尔先生那样一位享有如此盛誉的人物，一位20年来在整个欧洲声名狼藉的警官都能够在特殊情况下得到了极大信任。各位依靠这类官员，永远也不能得到亚尔萨斯—洛林人的同情，假如你们

* 倍倍尔1871年5月25日在帝国国会讨论兼并亚尔萨斯—洛林时发表的这篇演说，使社会民主党支持巴黎公社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弗·恩格斯针对这一演说在1871年6月22日致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倍倍尔是他们（德国工人）的杰出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39页。——编者注）

① 亨利希·冯·特赖奇克（1834—1896）——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871至1888年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编者注

② 威廉·施梯伯（1818—1882）——1870至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为德国军事警察局局长。——编者注

认为，这就是你们今后几年在亚尔萨斯—洛林贯彻的准则，那么，其效果恰恰是事与愿违，就是说，你们在这里巴望着得到亚尔萨斯—洛林人的同情，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接着有人说，我们在德国享有宗教方面的宽宏大量，我们在德国还享有宗教教育，所有这些也要传播到亚尔萨斯和洛林。先生们，这里我只需提一下普鲁士文化大臣冯·米勒先生的名字，任何人都知道，如果按照法令规定的那样，皇帝可以在一年半之内随心所欲地摆布亚尔萨斯和洛林，那么，这对亚尔萨斯和洛林意味着什么。先生们，专政时期到底意味什么，在普鲁士方面，从反动派的利益出发，从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出发，又该如何理解利用这段专政时期呢，那无非就是你们曾在你们兼并的那些省份，如汉诺威、黑森等地同样实行的专制独裁。由普鲁士国王和帝国首相（即当时的普鲁士外交事务大臣）在1866年12月6日签署的公告规定，任何间接或直接发生影响的官员，只要他不能令人绝对信赖，则必须立即予以革职，对于任何直接或间接反对这一专制规定者必须立即送往明登监禁。（右边有人喊：“太好了！”）太好了！妙呀，有一个洗衣妇，用撒黄沙的办法来表白自己的爱国之情，可她因此几个月以来一直被关押在明登，这也应当归功于这项公告吧。（会场气氛热烈）如果诸位打算在亚尔萨斯和洛林贯彻诸如此类的措施，那好，你们就等着瞧吧，看你们能够贯彻几时！

接下去又有人说，我们必须在亚尔萨斯和洛林实行普鲁士的城市制度，或者像人们所说的，实行普鲁士的市政管理自由，是的，目前是由行政长官在那里统治一切，可以说，在行政长官经营的地区，要使人过上自由独立的市政生活，那是难以想象的。先生们，你们在这里如此攻击法国的行政长官，实在太蹩脚了，你们倒不如多化一点力气，左右环顾一下，再用用脑子，想想看普鲁士邦议会管理的地区甚至不如法国行政长官管理的地区。（左边有人喊“很

对！”你们所说的，由行政长官管理的地区也好，还是你们的邦议会管理的地区也好，它们所推行的制度都是实行经济协调，事实上，你们也不敢拍拍胸脯，说一声：我们比起他们是一些更为高超的人，那么，到底什么叫市政自由呢？就是说，市政议会和市长必须由政府批准。是的，多少年来，我们在很多情况下，看到政府惯于运用手中的批准权。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上面我提到的佐林根的特里普市长，他是未经批准的，因为政府对他本人和他的主张并不满意。有人曾经正式询问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冯·屈尔韦特先生声称，事实证明特里普是一个恶劣的官员，因为他从来不重视保管公文。（哄堂大笑）

这就是你们试图为官方批准与否进行申辩的理由。

帝国首相先生在讨论法律第一读发言时，热心地谈到，必须把普鲁士的城市自由给与亚尔萨斯—洛林，他就是这样下了保证，甚至断定，巴黎公社当前的奋斗目标基本上就是在法国实现普鲁士的城市制度。先生们，我当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当我看到这段讲话时，我实在惊讶，在这样一次重要人物的会议上竟然能够允许说出这种话，而没有引起哄堂大笑；因为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了解德国的市政和城市制度，特别是普鲁士的城市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公社的奋斗目标无非为了建立普鲁士的城市制度，那么，每颗子弹都很令人惋惜；因为在我看来，普鲁士的城市制度不值一颗子弹的代价。（笑声）

是的，先生们，这就是那里表现出来的最大的努力，帝国首相先生假如当时果真严肃地讲了这些话，那他似乎压根就应该站在公社一边，而绝对不应几天以后接受和约的规定，把被俘者交还法国政府，去推翻巴黎公社，也就是说，去直接反对维护普鲁士的城市制度了，（大笑）他更不应该再补加一条：在巴黎公社垮台后30天，支付第一笔5亿法郎的战争赔款。瞧，他就是用这种多年来在

普鲁士惯用的，显然今后还将运用的方式，反对在巴黎实现普鲁士的城市制度。

先生们，尽管在你们眼中，公社的奋斗目标是如此这般可鄙，或者象昨天有人在这里私下议论的那样，是如此疯狂，但请相信，全欧洲的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向往自由和独立的人都仰望着巴黎。（热烈反响）先生们，尽管巴黎公社目前遭到镇压，但不要忘记，巴黎的斗争仅仅是个小小的前哨战，欧洲的重要事业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过不了几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消灭痛苦与懒惰！”将成为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会场热烈）

特赖奇克议员先生在星期天晚上还进一步流露过，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在阿尔萨斯—洛林重新唤醒主张建立君主政体的感情。的确，特赖奇克议员先生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可使我怀疑的是，他会真正了解人民内在的精神世界；（哄堂大笑）先生们，否则他也不会相信，八、九十年来始终同共和政体的革命传统、同法国保持密切联系的阿尔萨斯人民，能够在阿尔萨斯—洛林重新培养起拥护君主政体的感情。先生们，如果你们没有弄错，如果你们非兼并不可（是的，我们出于善意，面对反对我们的势力，丝毫也不能制止兼并，抵制权势），那么，我从兼并阿尔萨斯—洛林这一事件中看出的唯一好处是，正是现在把共和制的革命思想输入到了德国。我坚信，大部分阿尔萨斯居民具有这种思想，阿尔萨斯—洛林象楔子一样插入进来，促使我们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后，让整个君主制的德国四分五裂。我站在我们立场上，坚决反对兼并，因为在我看来，兼并侵犯了人权，兼并给德国的历史涂上了污点。我希望，意识到自己赋有自由使命的阿尔萨斯人民，将同我们一道在德国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以迎接欧洲人民获得充分白决权的时刻的最终来临，只要欧洲人民从共和制的国家形式中看到自己的奋斗目标，那

么,他们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会场骚乱)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演说和著作选集》
1978年柏林版第1卷第147—151页。

(葛 斯译)

革命，当然是我们的纲领*

—
(1872年3月13日)

我打算就你们从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宣读的几段演说，说几句话，仅仅因为这是我和李卜克内西发表过的演说，仅仅因为这些演说全部可以当成兴师问罪的口实，尽管我们在其他的演说中也丝毫没有提到任何使人受到威胁的东西。指控我们的基本论据是，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决定，争取群众并使之适应暴力行动的需要。这是错误的。党组织依靠宣传鼓动，是为了通过群众的加入而为那些在公众集会上作报告的人和传播我们主张的人筹集资金作为报酬。除此而外，也提出要照顾到党的地方活动。因此，除了原来的党之外，还应当建立地区协会。这些协会因同党的委员会有联系，就受到德国结社法——这些结社法是不折不扣的样品——全然不同的待遇。上述联系在某些邦不受任何限制，但在普鲁士、萨克森等邦则是不允许的。因此，许多协会无法长期存在下去。尽管有人千方百计使地方协会同委员会脱离关系，使之无法参与党务，但并没有规定明确的界限，所以在斯图加特召开的代

* 这是倍倍尔针对莱比锡叛国案发表的声明。莱比锡叛国案是德国统治阶级为迫害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一手策划的案件，他们企图以此限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阻止其领导人在国会的合法斗争。事实上，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案件审理中把法庭变成了革命无产阶级宣传自己信仰的讲台，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性文件为自己辩护，扩大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原编者注

表大会上，最终决定使协会本身排除在我们的组织之外，不是解散，但却是使之完全独立于党之外。各地的党员象从前一样，选举了一个所谓的受托人，他负责受理个人的会费，把它转交给委员会并向警察当局申报党在当地召开的公众集会。如果说在这种关系上，即由于党员参加的地方协会的数量增多，因而会出现触犯法律的事例，那么，这仅仅是违反了结社法，律师不能由于要支持起诉而将违反结社法运用于叛国罪。只有先编造法律原则，才会按此原则把一系列轻微的违犯警章升格为严重的刑事犯罪。

至于说到党的各个机构的职能，我认为有必要就指控说几句话。原控告硬说委员会是个主管部门，说它负责颁布命令。那些在创建我们的组织时被当作准则来使用的动机表明，在我们这里不存在针对个别机构的强制性服从。我们的组织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组织，它的主席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原控告也想把这种绝对权力硬加在我们党的委员会身上，这是十分没有道理的；因为委员会把所有重大问题都提交一年一度的党的集会，即代表大会来审议。

与委员会并行的还有一个监察委员会，它可以越过更高一级的负责人了结对委员会的申诉并可把它的决定向最高的审理机构——每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即本来的“民众”发出呼吁。因此，委员会根本没有任何专制的权力，它只负责行政事务。它是我们宣传鼓动的中央机构，负责党的财政，监督《人民国家报》的出版和发行工作，一般没有任何权力。

我们本人当然更没有支配委员会的任何权力。

就国际工人协会来说，我应当说明，按照爱森纳赫纲领，凡是“结社法允许范围内”的成员都可以以小组的形式加入协会；在萨克森，我们至今还没有准许这样做。委员会对国际来说根本不代表党，这是因为委员会在《人民国家报》上说明它乐于替国际接纳

个别人交纳的会费并把这些介绍给总委员会。假如委员会真的在伦敦的总委员会公开代表过党，那它就不只是声明“乐于”接纳会费，而是要颁发法令直接征收费用的问题了。假如我们中的一员同时又是国际的成员，由于后者的身份还要向伦敦交纳一笔特别会费，这一点却清楚地表明，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不直接是国际的成员。或者不如说，我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是直属国际的。

鉴于我们的政治地位，我承认，就象前几天我说过的那样，我认为“自由的人民国家”就是共和国。虽然我不得不再次说明，应当区分我个人的观点和党的观点；但我仍然认为，我党同志的大多数，在“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问题上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他们还指控说，假如我们把共和国树为目的，那我们就是一致主张使用暴力建立共和国。但是，不论在委员会，在我们中间，还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用这种方式来建立共和国。我们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我们愿意等待，看事态的发展，静观舆论，即多数人是否会渐趋赞同。但是，我丝毫不想隐瞒下述观点，即在我看来，当人民的多数宣布拥护建立共和国，那么这个多数也就有权用暴力还击打算以暴力阻挠建立共和国的政府。国家即民众，也许可以没有王公，但是没有民众的国家是无法设想的；政府是人民的公仆。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就自称是“国家的第一仆人”。但假如国家公仆一方面箝制舆论、制定法律，另一方面却陷入暴力冲突，就应予以废黜。假如因此而同议会以暴力针锋相对，那么以暴除暴就是每一个国家公民的义务。

“革命”，这当然是我们的纲领，但是，不是在以鲁莽暴力的意义上，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的企求乃是对公共状况和制度来一番彻底的变革。我昨天讲到关于拉萨尔给“革命”概念下的定义，是同后一种观点相一致的。它得到了设在柏林的国家法院的赞同，并导致了对拉萨尔的开释。我在这里之所以又来重复此事，是因为主席

先生^① 前天感到有必要说,他要把拉萨尔的定义是否在这个大厅里得到过赞同一事先搁在一边。就是我们的政敌即国家法律权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谈论革命的。我想从布伦奇里和布拉特编写的《国家辞典》上拣选一则来当作例证。

主席(打断被告):倍倍尔先生,硬给我们讲授什么是革命,这是无济于事的。关键仅仅在于,法律^②把革命理解成什么。

倍倍尔:这一则很短:只有6行。

主席:这种离题的行为我是不允许的。看来,您似乎更想对您的党内同志们讲话,而不愿意对法庭和诸位陪审先生们讲话(!)

倍倍尔:主席先生,其实我不知道听众席上有没有一个本党同志在场。再说,我要抗议主席先生对发言自由的限制。因为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对我们使用的“革命”一词含义的理解上。因此,我无论如何都要阐明我们对这个词的观点,因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原告和我们之间的重大分歧。

主席:我准许您照读这6行。另外,我仍坚持我的意见。

倍倍尔(朗读):“从广义上说,革命意味着彻底的变革,而政治革命则是国家的彻底变革,不论革命的动因来自上面,还是来自下面;不论在发生变革时是否尊重现存的法律形式,或变革的浪潮是否以暴力的形式突然爆发。”^③

① 亚历山大·爱德华·冯·弥凯。——原编者注

② 《法兰克福观察家报》是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的报纸,它在1872年3月14日为此写道:“真是双料的胡说!第一,判罪主要依据被告对构成控告对象的、由他使用的某种措辞的理解而定,因为对词义理解万一有误,对被告来说都肯定是非常有利的;第二,在全世界都找不出一种专门研究‘革命’的表达方式而且仅仅是一种理论表达方式的刑法。主席起码在这次发言中援引了‘法律的定义’,这就可能给陪审员造成很大的混乱!”——倍倍尔注

③ 《德国国家辞典》1864年斯图加特、莱比锡版第605页。——编者注

我现在不得不就“革命”一词来表白自己，因为我在指控我们的许多信件和其他文章中都使用了“革命的纲领”这样的表达方式。再说，我们纲领提出的一部分要求，业已过渡到立法阶段。例如，普遍直接选举权、义务教育等。现在尚未得以实现的要求，也许以后在现在的国家形式下可以实现；当然，我本人就这一点还有另外的看法。

二

(1872年3月15日)

就巴塞尔代表大会，我无法发表任何意见。我没有参加那里的会议。而且业已声明，我们只赋予代表大会决议以理论上的意义，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另外，主席先生已经声明，原告根本不过问巴塞尔决议案的事。因此，我只想就国际一事谈一谈，使我惊奇不已的是，艾希霍夫的小册子^①竟被当成指控我们的材料。假如这些材料不是在原告手中发挥作用的话，我倒真可以把它们当成无罪释放的证据。昨天我宣读的材料的字里行间没有一句话能给叛国案原告提供某种逻辑上的论据。主席先生强调指出《宣言》上写的最后一句话，可在这里他又把“斗争”一词理解成了革命，并联想到用镰刀和相似的工具进行的一场战斗。但我们只要同前一段对比一下，问题就清楚了。前一段说：

“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

^① 指《国际工人协会——它的创立、组织、政治活动和扩展》。——编者注

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欧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关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在欧洲各国内阁里有其爪牙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抵抗的侵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作到使私人关系间应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紧接着这一段下面的一小段就是被认为出麻烦的地方了：

“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总斗争的一部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①

若是与上述各段联系起来理解，只能把最后一句话里面的斗争理解为用精神武器进行的斗争，人们在这样的斗争中努力通过宣传来争取群众，这样的斗争是世界一切法律都无法禁止的。凡是在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民主工党的正式的和仅具有约束力的文件中出现的斗争一词，都同样明确无误。我不得不强调指出，艾希霍夫的小册子还在有人策划这次案件之前就已公开出售，其内容早已成为普通的常识了。

昨天，李卜克内西已经强调过国际的公开性质，因而我当然只能确认，总委员会的决议和会议报告始终光明正大地发表在伦敦的报纸上，近期以来德国报纸也经常转载。

李卜克内西也提到了载于《人民国家报》第38号上旨在反对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3—14页。——编者注

密联系的总委员会的呼吁书。^①我要强调指出，这份呼吁书是登载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的，是由总委员会的全体委员签署的，因而它是国际最严格意义上的正式文件。另外有人提出，国际蓄意对参加它的各工人组织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可是，在一整本小册子中我却找不出一句这样的话来。相反，《章程》的第五条谈的却是国际的仲裁，是关于不同小组的合作问题。第六条规定“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联系”^②，这一点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被迫同总委员会联系的人是没有的，并且更不拥有独裁性的权限。在这里尤其应该指出，总委员会没有任何强制性手段，强令贯彻违背会员观点的决议。最后，第十一条规定，参加国际的工人团体，可以保留其特殊组织，不受侵犯。这就清楚证明，确保个别的组织享有最充分的独立是有保障的。不仅如此，社会民主工党可以同上述各条规定毫不相干，因为它从没有正式组建过国际的某种一体化的组成部分。

关于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李卜克内西已作了充分的说明。因此，我没有什么要讲的了。艾希霍夫小册子的末尾还谈到，在德国存在有这样的小组。据说它们“尽管心有同感，但由于没有法律许可”^③而不能加入。人们能够设想有比这个话更明确地表达出愿依法行事的意图吗？还有比约·菲·贝克尔和马克思——德国人支部的书记——用公开信发通知一事更能清楚地表现出绝对不回避公众的吗？说实在的，这样的“叛国者”是很稀奇的，因为他们的行动十分公开，如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在话归正题。假如有人专门死揪住“斗争”一词，那么原告几乎在每期《人民国家报》上都会找出岔子的。例如1870年第1期上登载有如下两行字：“一个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83—484页。——编者注

② 参见上书第17页。——编者注

③ 威廉·艾希霍夫：《国际工人协会》第74页。——原编者注

争接着一个斗争，党全线处于战火之中。”^①——而这里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和敌人对我们的迫害。这两行字载于编辑部对党内同志的新年献辞里面。

1869年8月28日委员会的呼吁书中载有防范警察生疑确保组织的“艺术”这样的话，据说出了麻烦。其实这个呼吁书是全然无害的；它包含的是为党内同志规定的、完全合法的行动规范。这些规定向党内同志说明，他们应当如何区别不同的组织；而后文章讲道：“假如你们这样做，那么你们就不会违犯世界上的任何法律。这是一种艺术——但假如你们训练有素，你们肯定不会落入警察手中。”^②因此，委员会的呼吁书中声称，我党同国际的正式联系是不合法的，其实这种联系也是不存在的。

但是，假如真有这种联系存在，难道这也是原告据以控告“谋叛”的罪行吗？肯定不是的。充其量只能叫我们负违犯现行结社法的责任，但根本不会到这个法庭上来受审。

最后，假如说我们在发生停工时按国际的原则处理，并呼吁支持外国的罢工，那是我们的简单权利，是任何现行法律都禁止不了的。难道应当削弱劳动阶级的权利？它的敌人资本家阶级每天都在行使这种权利，不是吗？资本家不问他所剥削的工人是说德语还是说瑞典语，是说英语还是说法语；肤色是白的、黑的，还是黄的。对付这种对工人进行的“国际性的”剥削的手段只有一个：被剥削者实行国际大联合。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演说和著作选集》1978年柏林版第1卷第184—191页

（张念东译）

① 1870年1月1日《人民国家报》。——编者注

② 1869年8月28日《民主周报》。——原编者注

基督教和社会主义*

(1874年2月)

亲爱的先生:

您在第9号上发表过一封信^①,其中您试图以“教会仆人”的身份为自己辩护,对我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和各邦议会的议会活动》这本小册子中,主要抨击教会和宗教的论述作了批驳。下面我,那本小册子的作者,准备回答您的辩护。我没有早早作出答复,因为我的身体长期欠安,未能动笔,希望您能谅解。我的回答较长,但愿您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很重视您的抗议,所以才写了长文予以回答。

您觉得我的小册子中有些地方攻击和伤害了您的人格,这是没有根据的。您只要重读一遍这本小册子,就会承认这一点。我从未攻击过教会方面的人,我从不否认“教会仆人中也有一些人,由于发自内心的极其虔诚的信仰,竭尽全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 倍倍尔1873至1874年在胡贝尔图斯堡服刑期间,写了这篇文章。起因在于,天主教徒W·霍霍夫反对倍倍尔在《1871至1874年德意志帝国国会和各邦议会的议会活动》一文中关于宗教在剥削国家中阶级职能的论述。倍倍尔的这篇反驳文章起初在《人民国家报》上连载。1874年7月经倍倍尔做了补充和文字上的修改后,文章以单行本再版。至倍倍尔逝世,本文共出了11版。——编者注

① 当时的天主教徒W·霍霍夫给倍倍尔的信发表在1874年1月23日《人民国家报》上。他研究神学、哲学、历史和国民经济学,并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中得出了社会主义应放弃其革命目标和向基督教伦理学靠拢的结论。——编者注

我与其说对这一点尚了解不多，倒不如说对那种一定要把年轻幼稚而又无知的人改造和教育成“教会仆人”的初级学校更有所认识。我还要说的是，我承认，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甚至具有先进的文化水平，但却心甘情愿地服从教会及其教义；还有成千上万的，甚至上百万的人，正在试图通过各种巨大的牺牲向教会赎买自己的灵魂。但是，反对我阐述的这些目前尚未定论的观点，又证明了什么呢？很简单，什么也没有证明，绝对没有！上百万人曾经以牺牲精神、苦心修行、禁欲主义和狂热的信仰依赖过和正在依赖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儒教和伊斯兰教的上百万善男信女都具备这些特点，他们象您一样，有权指出他们教派的成就和他们教徒的牺牲。

如果我们统计一下，成千上万的人最笃信哪种宗教？哪种宗教最无我，最耐苦，最富牺牲精神？毫无疑问，佛教在各方面都完全超过天主教和基督教。

因此，按照您对宗教的评价，佛教无疑是真正的实际的宗教，而我似乎犯下了弥天大罪，因为我曾经声明，不论怎么说佛教反正当基督教一样，是阻挡和压制人获得自由和独立的。但是，您却一定要按照您的教义，视佛教为伪教、异教、邪教，尽管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在教义和教规方面，佛教不仅与基督教完全相同，而且比佛教晚400年的基督教的信条、习俗和教义都是承袭前者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的核心，究竟什么是基督教？我说它同其他任何宗教一样，是人创造的。人由于文化水平低，不能明确地认识时而对他有用的，时而对有害的自然和自然事件，也不理解他作为人的地位，所以，他把自己周围发生的一切不可理解的东西视为超感官的神，神可以随心所欲地使他所不能理解的种种现象产生出来，于是，他便试图求助于祈求，祷告，仪式和贡物，以得到恩赐，受到神的庇护和保佑。按照各民族的文化状况（这首先取

决于它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其次取决于土壤性质和气候状况)不被理解的自然力作为超感官的神接受各种不同的特性和形象。敬神因此而形成。敬神是由专门研究宗教要求的人主持，但敬神的形式不久就变得异常复杂纷繁，至于在最高的神灵那里敬神有否成效，则取决于准确、认真地遵守宗教戒律。当然，这种事情只有绝顶聪明，八面玲珑的人才能做到，于是这些人成了统治者。牧师阶级随之产生。懂得在各国人民当中，迅速不断扩大自己权力的国家统治阶级是这一牧师阶级的支柱。牧师阶级于是试图使各国人民更加相信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了取得成功，它一开始就必须反对人的启蒙和不断发展。对自然和自然现象的无知还招来本国统治者以及外来民族和外国统治者的奴役和暴行，而人们并不认为这种奴役和暴行是自己所犯过失应得的惩罚，反而越来越强烈地需要宗教教义。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往往无法挣脱侵略者和暴行者的桎梏，因此寄希望于将会报答人们对至高无上的神的无私崇拜和拯救人民的超自然的救世主。这些想法或者类似的想法不同程度地成了几乎所有古老民族的信念。由于小亚细亚和非洲边境民族的历史发展，这些想法又以非常特殊的形式在犹太教中安了家。后来的基督教就是从犹太教派生出来的。正象人们常向我们说教的那样，基督教绝不是以一种完美的宗教出现在宗教舞台上，而是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很快认识到它可以用来压迫人类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同其他几大宗教体系如：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一样，也不是产生于“神的启示”。这些宗教的创始人都异口同声地坚决强调，他们履行神的使命，同样，基督教荒诞的创始人也是如此。正像上百万信仰释迦牟尼、孔夫子和穆罕默德教义的信徒所表明的那样，他们也像基督教徒信仰耶稣一样，履行神的使命。

我并没有像您断言的那样，检验了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叔

本华、费尔巴哈、拉萨尔和马克思的哲学体系，同时我要指出，拉萨尔和马克思从来没有想要建立一种哲学体系。您可以把拉萨尔和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从您的知识宝库中删去。不过，我对文化史和自然科学稍有研究，因此我发现难以让一个有思维能力的、又多少研究和发现过自然科学的内行去相信基督教是“最好最完善的宗教”。事实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自然科学论证了地球的产生和年龄以及人类的产生和发展，正是这些事实使基督教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使它趋于毁灭。您必定同我一样清楚，基督教的创立和发展史丝毫没有证明它是神的世家，更确切地说，在最初的基督教徒中间就已经风行口角、拳斗、争执和相互间的尔虞我诈，那些“教会教士和仆人”的自诩者却起着相反的作用，他们在这些“善行”中，总是先行者。

基督的存在非常缥缈，他的教义和讲演也没有一个字是出自他的手笔，只是在他死后才被人当作上帝来供奉。基督是否就是上帝或者类似上帝，耶稣的信徒们对此愤怒地争吵了几百年。在公元325年举行的尼西亚宗教集会上，终于确定了上帝和基督是二位一体。这次集会犹如波兰的议会，基督教界相互斗争的两派代表毫不讲理、指责谩骂，甚至大打出手。当时，基督的小牧师们认为，必须在基督同上帝的关系问题上统一口径，因为教士之间的争论也影响到这些小牧师，许多社会贤达和思维敏捷之士也感到迷惘。这就是为了建立基督教会，即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为了奴役群众，在基督教教士当中迈出的伟大的第一步。

同西方国家的基督徒相反，东方国家的基督徒发展了在古代宗教，如古埃及宗教中业已形成的关于神的三位一体的观点。因此，有一个新的危险威胁着教会。56年以后，即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上，从二位一体变成了三位一体，因为人们把圣灵作为第三位补进了这个集合体。这便是神的三位一体的简单的、

世俗的历史，基督教最高教义的历史。牧师先生，您将会承认，象这里所描述的那样，纯粹的人类演变对于强化信仰基督教上帝是极不相宜的。采取这种方式规定的信条所以拥有几百万信徒，是因为时代不开化和人类无知，人不理解自己同世界，同自然和自然事件的关系。几百万信徒所以至今还笃信这些信条，是因为历次宗教会议整理、讨论和争辩的教义，从教会和国家方面讲，是作为“上帝的启示”向人类宣扬的，换句话说，已经约定俗成。如果说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仍然热中于教皇永无谬误这一重新炮制的教义，那就像两千年来大部分人能够相信基督教的启示和奇迹一样，不必大惊小怪。

神圣的三位一体是由牧师们创造的，同样，圣徒的礼拜也是牧师们设计的。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教堂里不容许有任何偶像，埃尔维拉宗教会议甚至极其庄严地禁止“在墙上绘画顶礼膜拜的偶像”。欧塞毕乌斯和赫里佐斯托莫斯这两位著名的宗教之父大约在公元390年才开始仿效基督生活，他们把偶像的使用称之为偶像崇拜。但是到后来，在基督教教堂里，就象在该训咒的“多神教教徒”中间一样，肆无忌惮地流行着偶像崇拜和圣徒礼拜，就是在今天的天主教堂里也盛行这种崇拜。

在天主教堂里相当重要的数念珠是模仿了古埃及人的习惯。当然在“多神教教徒”中也有数念珠的习惯，在古代佛教中也有类似的习惯。

自古以来，在东方国家和各条顿民族中，给孩子作洗礼是作为一种宗教规定而普遍流行的，只是到了4世纪基督教牧师才开始使用这种仪式，而今天，信徒们把它当作“上帝决定的圣礼”并加以宣讲。圣餐仅仅是犹太人逾越节的一个习惯，只是被人基督教化了，后来它才具有当今的意义。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信条中还没有提到这一点。犹太人的逾越节后来成了基督的复活节。

祭鬼神是从古代“多神教”的各种宗教中移植过来的，在基督教中起了很大作用，在新教中尤为普及，到16、17世纪，成了巫术火刑的依据。

信仰死后灵魂永生并非基督教的观念。这种信仰在古代所有文化较为发达的民族中早已存在。基督教只是承袭了这一信仰，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作了调整和改进。古代希腊人早就信仰灵魂不死论（见荷马史诗），同样，古代德国人也如此（朝圣地的灵魂不死）。自从苏格拉底创立了同多神论相对立的一种神论和古希腊哲学以后，信仰灵魂不死论就被扶植起来了。类似的还有早在基督降临前很久，在波斯人的“圣经”里就已提及的所谓的世界末日或“末日审判”。

在基督教中，象基督教发起人书面提到的，至高无上的神的使者来拯救人类的说法，也不是基督教的特产，这句话在基督降生前，4世纪释迦牟尼就说过，索罗亚斯德也说过，甚至苏格拉底也阐述过。

这里已经证明，基督教的基础，即那些最重要的教义和习俗都是从“多神教”那里移植过来的，同样，基督教的，特别是天主教的祭神仪式也是如此。到处都表现出对“多神教”的模仿，甚至根本找不到独立的、原始的观念痕迹。希腊人和罗马人继承了埃及人的一切礼仪，而今他们的祭台成了基督教的讲台，他们的布道坛成了基督教的说教台。牧师服装的颜色和式样基本上同古埃及人的传教士的服式一模一样。埃及神话中太阳神奥塞烈司着装的颜色是红和白，直到今天基督教各教派的牧师还穿着不穿裤子的埃及人的长袍。太阳神奥塞烈司的权杖成了基督教主教的权杖；月亮神牧师的角形帽成了基督教牧师的帽子；甚至天主教神父头顶削发也是来源于埃及的祭神仪式，削发象征着光芒四射的太阳神奥塞烈司的形象。圣水、薰香和涂油式、圣餐杯、音乐、赞美诗、下跪

祈祷、向圣坛鞠躬、牧师同教民合唱和演讲等等，这一切在今天，特别在天主教堂起着很大作用的仪式和习俗，无一例外，都是来源于埃及多神教的敬神仪式。

同样，当时最短的一天，太阳神之子的生日成了耶稣的生日；古代犹太人夏天的火神节成了基督教的圣约翰节；叙利亚的中秋节，即古代犹太人的结茅节成了米迦勒节。此外，日耳曼人的冬至节同埃及人的太阳神之子的生日，后来的基督教的圣诞节是一回事，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多神教和基督教的宗教习俗相同的地方还远不止这些。埃及人描绘的太阳神形象同后来耶稣基督的形象完全一样。前者和后者甚至连稍微偏侧的头、卷曲的头发、慈祥的面孔、头顶光芒四射的光环和丰满的双手都一模一样。埃及人的女神埃西怀抱太阳神之子的姿态同头顶光环或星环的基督教圣母抱着儿子基督的姿态一模一样。就是在今天，在德国南部的整个地区还把圣母描绘成黑人，这一点足以证明，这里同埃及—非洲的观点有着血缘关系。

基督教的教义不是别的，正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古代哲学的观点，同样，基督教的敬神形式——今天在天主教中特别盛行——来源于多神教的敬神习惯和征象式。因此，基督教同其他任何一种宗教没有丝毫差异。它给进步的文明时期以精神上的打击，而在这一文明时期，古代的直到那时仍然风行的各种宗教却被消灭了。基督教完全是人创造的，一个国家的道德、习俗和古代宗教在不同程度上为它提供发展和演变的必要性。同时，基督教在古代宗教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在阿尔明尼亚，人们毁掉女神阿提密斯的半身像，把她的神庙变成了基督的殿堂；在以弗所，多神教的黛安那神庙供上了圣约翰的神像。就是在今天，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还有人亲吻丘必特铜像的脚，僧侣们断定，丘必特就是圣彼得。

有人赞美基督教，说它同其他的宗教相比是出类拔萃的，因为它主张信仰一个神——这个神本身又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这对一个普通人是无法理解的，不过，这也仅仅是神话而已。早在基督降临前500年，在犹太人那里多神组成的神圣的三位一体就已存在。在基督降临前几个世纪在埃及人那里就已存在这种信仰。在印度人和埃及人多神论的宗教中，早在基督降生前几百年就形成了基督教的每条教义、每个习俗，所以，我们完全有权认为，基督教是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的宗教的翻版。

根据以上所述，基督教教会的各种教义和习俗并非“神的创造”，而是人的创造，所以也是基督教依靠的文书。

圣经作为一部文化史著作，具有重要意义，只是它的文化史价值，至今尚未完全得到验证，教会方面也从未把它看作文化史著作，而是把它视为上帝的启示录。但是，这部概括了两千年的文化发展，记述着各种事件，其中包括各个世纪的人的不同观点的著作，作为上帝的启示录，必然存在大量无法解决的尖锐矛盾。

我们把它叫作圣经或者圣书上的含混不清和前后矛盾的概念，自古以来，对这些概念有过各种不同的解释，直到本世纪，在基督教教会内部，它们仍然是引起激烈争论和分裂的根源。如果不是牧师和国家当局用武力维护那一度提出的合法性，这些概念也许早已把天主教教会和新教教会分成两个教派了。

因此，天主教教会禁止俗人阅读圣经，从他们的观点看是完全正确的。假如学者都不能明确地解释圣经的内容，那么，一般的人又怎能理解得了？世界上除了圣经以外，再也没有一本书能把更多的人带入迷宫。可怜的冥想者曾经寻找过圣经里不存在的东西，只要他们以为发现了真理，便又开始阅读另外一段，于是他们又重陷迷宫。

所以，圣经不可能是“上帝的箴言”，也不是那些圣经上和书上

署有其名的人所写，而是一部许多人共同撰写的文集。这些人绝大部分没有多大的名气，而且是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文章的数量很大，要求人们把它们看成是关于基督的生平和学说的真正的纯粹的话本。因此，对于圣经的真实性和价值，在最初几个世纪曾经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经过多次宗教会议才逐步取得一致，因为他们不考虑其真实性与否，把其中一些不适应新的条件或容易被人接受的章节加以否定，压制和消灭，而把其中更多的文章汇集成册，冠以统一的标题。于是，经过几个世纪的争论和斗争，圣经终于作为“远无谬误的信条”和“上帝的箴言”问世了，怀疑其真实性和正确性，只是在不久之前才被国家看成是犯了弥天大罪。

经过详细研究以后得出的结果表明，现存的福音书和使徒书信没有一篇是出自公元4世纪以前的。有人发现，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的许多重要章节都是那些任意写作的作家任意添加的章节、主管牧师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兴趣解释其含义，并把它们当成“上帝的箴言”向人民宣讲。对现有圣经的所有手稿作一比较就会发现，错误竟达5万处之多，有关的地方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意思，但是，尽管如此，圣经还是“上帝的箴言”，不得改动，也不能提出异议。

牧师先生，您将会承认，如果说一切哲学体系都不能动摇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那么，这些在历史上、科学上都确定无疑的事实必定动摇最虔诚的情感。因此，当我这个不仅是天主教的反对者，而且是任何一种宗教的反对者在这里提出了这些论述，您看了以后大可不必感到惊讶。

如上所述，宗教是一个民族或几个处在相同文明阶段的民族的文化水准的产物。一种宗教，甚至同一种宗教，在不同的民族，由于文化程度和精神发展条件的差异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西班牙的天主教就完全不同于法国的天主教，英国的新教也不同于

德国的新教。此外，文明的日益发展，也对宗教产生日益不同的影响。15世纪的基督教徒笃信的那许多东西，到19世纪，就连最虔诚的基督徒也不相信了。比如，信鬼神、信巫术在16、17世纪起了什么作用！

但是，自然科学的成果越多，研究文化史的人越多，各种教义和信条也就越加站不住脚。我们对地球发展的认识摧毁了圣经中关于创世的神话，天文学的研究和发现告诉我们，宇宙不是什么天国，而是由成千上万个星座，就是说，是由那些不包括天使和圣人在内的世界人口构成的。

所以，这足以证明，基督教即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完美的”宗教，它同其他宗教相比是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完美的，而是有缺点的，是不完美的。它必然被人类的进步所消灭。您也许要大声疾呼，基督教是讲道德的！道德同基督教，同任何宗教根本没有关系，各民族的文明状况不同，道德也不同。各个民族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形成了一定的法规，为了大家的利益，大家普遍认为，维护这些法规是必要的。没有这些法规，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生存，而超越法规，则被人看成是不道德的。代表社会的权威往往通过公布第三者的不满，甚至通过物质上和肉体上的惩罚来处置这些破坏法规的人。连天主教内部对某些仪式也说法各异，有的人认为是道德的，而有的人认为是不道德的，可诅咒的。在这方面有两个例子，比如婚姻不经牧师祝福，在法国天主教徒看来是有效的，完全正常的，而在虔诚的德国天主教徒看来，是姘居，因而是非道德的。北美的天主教徒认为，政教绝对分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德国的天主教徒则认为这是国家向教会作出的无谓牺牲。但是，仁爱的戒律、博爱和互相克制的戒律，所有这些教义毫无例外地存在于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各个民族中它们得到文明的承认，在印度人、波斯人、中国人和阿拉伯人中间，这些戒律在实践中更多地得

以兑现，而在为了“未来的”生活要实施一切美好愿望的基督教那里却远非如此。爱的宗教，也就是基督教从18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反对一切有异端思想的人，可以说，它是仇恨的宗教，是迫害和压迫的宗教。世界上没有一种宗教象基督教那样，使人类流那么多鲜血，那么多眼泪，犯下那么多骇人听闻的罪行，至于说到战争和大屠杀，基督教各教派的牧师们今天还准备为之祝福，一个民族的牧师为了反对另一个与之敌对的民族，甚至虔诚地举起双手，祈求上帝消灭对方，他所祈求的恰恰是同一个上帝，即那个仁爱的上帝。

如果说今天教会不再象从前那样实行压迫，那不是牧师和教会仆人的罪过，而是普遍的人类进步置牧师和教会于不顾，并与之进行斗争的结果。您所说的宗教仆人的那些所作所为，不能归咎于宗教本身。是的，阁下，如果牧师可以将宗教的道德准则——在此我重申，道德准则与宗教本身完全没有关系——不是作为例外，而是作为从古至今的法规置之度外，可以日复一日地加以践踏，试问，这样的宗教究竟有什么价值？最热忱的信徒虽然以为他们在行善，其实他们在伤害人类的大多数；因为他们把任何抨击教义的行为看作异端，把对宗教的任何怀疑看作弥天大罪，并用火与剑共讨之。十字架、无数的宗教迫害、宗教裁判所、对犹太人的迫害、巫女审判案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盲目的幻想，而所有这些都是狂热的牧师引起和煽动的，并得到他们中奸刁冷酷的牧师的支持，目的只是扩大教会的权力——他们的权力，甚至是为了掠夺。

基督教是自由和文明的敌人。它关于消极服从“上帝”命令的教义，关于在苦难中忍耐和顺从的说教以及关于尘世间的苦难将在彼岸极乐世界得到报应的训示，使人偏离了自己的目标：在各方面完善自己，争取自身的最大发展，满足并享受所得的财富。它把人类置于奴役和压迫之下。它至今仍然作为政治剥削和社会剥削的工具被人利用，并为这种剥削服务。自从希腊和罗马的文化被

推翻以后，基督教在欧洲统治了1000多年，极端的无知和野蛮压在各国人民身上。西班牙原来在“多神教教徒”摩尔人统治下，农业、工业、艺术和科学都达到了高峰，生活富裕。那时，在多神教教徒摩尔人或阿拉伯人的统治下，基督徒和犹太人享有同等权利（在现代的文明国家里，犹太人几乎没有或在不久以前才享有这种权利），现在西班牙以基督教作为武器排挤了摩尔人，基督教取得了独裁的统治，西班牙成了狂热主义和宗教迫害狂的场所。最繁荣的城市和地区荒芜了，阿拉伯科学的光芒暗淡了，整个国家的文化教育状况一落千丈，至今尚未复原。科学和进步，12世纪在意大利，15世纪在德国就已经开始发展，这不是信仰基督教的结果，而是研究异教古典著作的结果。这一切在基督教统治下已经灰尘寸厚、虫蛀霉烂的著作，避开教会的非难和迫害，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传播，把人类引向了进步的轨道。宗教无非是统治群众，并逐步巩固这一统治的工具而已。

我在我的小册子中已经论及，历代日光远大的著名人物（如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弗利）都把宗教看作仅仅是达到政治统治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同样，列举一些教会权威人士上的论述和活动，也不是多余的。西内西乌斯主教在公元410年解释说：“人民总在想，有人要骗自己，人们采用其他方法根本无法与之交往……从我这方面讲，为了我自己，我总想成为哲学家，但是对人民来说，我成了牧师，从这一点上看可以称之为骗子”。格雷哥里·冯·纳齐安茨写信给热罗尼莫也说：“只要说些空话，就能给人民留下印象。人民理解得越少，就越钦佩你。我们的教父和教士不是经常说心里话，而是经常信口开河地讲讲环境和需要”。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1475—1513）统治时期，罗马教廷荒淫无度，腐化堕落，嘲弄宗教、无所不为。一天，有人从虔诚的德国寄来一大笔捐款，这时教皇对他的一个主教说了这样一句寓意深刻的话：“瞧，兄弟，关于耶稣基督的寓

言是有利可图的”。法国公使曾经对16世纪的教皇保罗三世的道德作过评价。他在一封给宫廷的信中写道：“教皇和他的主教们至今用这种方法欺骗了你们，现在他们企图用虚伪和谎言掩盖一切，并且干些更加卑劣的勾当”。教皇保罗四世为了反对地道的西班牙天主教徒，不仅呼吁新教教徒给予帮助，甚至要求基督教的“世敌”土耳其人攻克西班牙的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同他的亲生女儿，臭名昭著的鲁克雷蒂娅·波尔吉娅乱伦。有一次，他想在宴席上毒死他的7个主教，于是主教们向厨师们行贿，让他毒死教皇及其儿子——抱独身主义的、除了那个女儿外的独生子。

我说过，在剥削人民的问题上，国家和教会任何时候都是兄弟般的配合默契，而您否认这一点，但您忘了举出例证。

如果说任何一个国家有义务去塑造一个基督教模范国家的形象，那么，这个国家就是直接在教皇政府和高级僧侣治理下的教会国家。可教会国家直到它存在的最后一天，给我们留下的又是一副怎样的形象呢？一副欧洲现存的最可悲的形象：不顾人民死活，任其沉溺于迷信和愚昧；玷污和强制劳动，与此相对的是不知廉耻的乞讨和目不忍睹的贫困。犯罪率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的不安定已为众所周知；管理国家的是现存的最腐败的政府，这个政府任意践踏起初尚能容忍其他教派的基督教博爱戒律。这就是基督教的模范国家。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不论新教教会还是天主教教会的代表都是一模一样，都在国家当局、人民代议机构中拥有发言权，在维护和强化反革命的国家权力方面都有其影响。如果说目前德国的天主教神父似乎是个例外，那它仅仅是似乎而已。任何一个统治阶级的国务活动家都不会不明智地推行那种把天主教僧侣降到被压迫者地位的政策，这种地位仅仅意味着促使僧侣充当目前各种要求的代表，而僧侣在相反的情况下是绝对不会提出或者赞成这些要求的。天主教的倡导者和自觉的代表们——因为

被领导的人和无知之辈不在考虑之列——几年前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等地还处于怎样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他们总是站在右派一边，甚至是极右派的一边，比如日前在奥地利，特别是在法国，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不要过多久在德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①所以我们不要上当受骗。这种情况难道不能改变吗？人类的进步就是要向一切特权和一切统治宣战，教会对人民的统治并不亚于国家。教会是建筑在权威和盲目信仰的基础之上，所以它反对一切它认为必须消灭的东西，如社会主义力求获得的知识和文化。社会主义是纯粹的民族性和人性的体现，它要真正实现自18个世纪以来教会几乎无不当作压迫和剥削人民招牌的道德准则。社会主义不想实现普遍平等，博爱和普遍幸福，因为这些是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所宣扬的、是目标和理想，人类在各个地区，在一切国家法和宗教法的统治下，都会有意无意地追求这些目标和理想，即使没有释迦牟尼，没有耶稣，没有穆罕默德，人类也会照样去作。更确切地说，正是他们残酷地窒息了人类的追求，阻碍了人类的进步，因为他们把地球解释成尘世，宣扬节制和节欲，把人类置于彼岸生活之中，至于这种生活存在与否，他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证明，因为它根本不存在。

用两句话可以概括我们的观点：基督教统治时期出现的好的东西不属于基督教，基督教带来的许多弊端和坏的东西我们不要。

牧师先生，现在您也许会看到，我们的目标同基督教的目标存在着天壤之别。您的主教、您的大教堂参事、您的伯爵，男爵和资产阶级先生们都是天主教运动的领导者，他们不是我们的人，他们不愿意给人以平等和幸福，因为他们必须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假如没有放弃这一地位的话），以确保他们所谓的人类幸福。但是他

^① 那以后不久这种情况就完全出现了。——倍倍尔注

们是特权、等级统治和阶级统治的主要卫士。他们需要的不是正义，而是行善；不是平等，而是驯服；不是知识，而是迷信。当人民争取和要求生的权利和按劳取酬时，他们便劝人民要知足，用“老天有眼”之类的话安慰人民；然而他们自己却整天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挥霍别人的劳动果实。信仰天主教的人整天辛辛苦苦，劳心费力，至今还紧跟着这些人，但他们是我们的，我们希望他们有一天认清这一切，站到我们这边来。如果那些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低级僧侣——关于他们的无产者的地位，您有过出色的描述——能站到我们一边，那很好，我们会欢迎他们的。到那时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在教堂里徒劳地试图达到的理想和目标将在我们的行列里由我们来实现；同他们的空洞的宗教信条相比，我们这里对他们有更高尚的任务，可以说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宗教都是人类进步的障碍。牧师先生，您的处境很不妙，按照您的说法，您还不如一个佣人或侍从，过着最下等的无产者的生活。而上教生活得却象大老爷一样，拿着高薪，享受着主教的荣誉。如果象您所说的那样，基督教同社会主义是一样的，那么基督教怎能维持等级差别和不平等的制度呢？又怎能维护那种“上帝造物”的提法呢？我们能够尊重和欢迎这种宗教吗？或许您期望我们坐等一切人的普遍福利和最大幸福，一直等到存在近19个世纪的、至今还没有一个牧师相信其教义的宗教把这一切给我们为止，是这样吗？我们倒是可以永远等下去，可惜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不，不能等！如果您仍然热衷于在教会和“单个的”教会仆人之间制造某种差别，那么您将会，而且可能是徒劳的。您作为例外加以阐述的恰恰是规律性和原则性的东西。而您的规律是例外。但是您知道，例外永远不能上升为规律。

因此我不敢苟同您关于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追求同一目标的观点。基督教同社会主义是水火不容的。是您，不是我发现的基督教中所谓的良好核心并不是基督教的，而是普遍的合乎人情的

东西。构成基督教的东西本身就是虚假的教义和教条,所以说,基督教是敌视人类的。至于您如何处理您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悉听尊便。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演说和著作选集》1978
年柏林版第1卷第283—299页。

(蒋仁祥译 葛斯校)

必须给妇女选举权*

(1875年5月25日)

主席没有宣读他的提案的前言,所以他的提案没有完全为人所理解。

在提出这些要求时先假定:在现代国家中我们不能实现这些要求;在辩论中我们必须从这一立场出发。

“在国家和地方的选举中”这一提法说得不完全,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选举,例如选举官吏;所以,这一段要修改。

哈赛尔曼认为妇女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但是,对男性工人也可以这样说。是的,还有一些人声称,只有到工人更有教养时,才赞成普遍的选举权。

但这是错误的;如果想看到一种权利的效果,就必须使这种权利得以行使,并且必须为此提供机会。昨天我们说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现在不应把妇女看成同我们相比是反动的。

义务选举权无论如何是有利的,而且它在瑞士已经证明是行得通的。资产者几乎全都参加选举;没有参加选举的50%是工人,尽管其中有一部分人可能投票反对我们,然而大多数是赞成我们的。

哈赛尔曼说,当妇女受到足够的教育时,他才会同意妇女有选举权;既然这样,我们恰恰必须努力使妇女受到足够的教育,而要

* 这是倍倍尔在哥达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合并代表大会上的一次发言。

——编者注

做到这一点，又恰恰须要我们给予她们选举权，从而使他们能够练习使用这一权利。

发言人几年前也说过工人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但是他已经有了另外的看法，那些现在还认为妇女没有受到足够教育的人，情况也会如此。

现在的事实已经是：妇女们兴致勃勃地参加我们的运动，并且有效地影响着男人。

特别是由于上述最后一点理由，我们必须想法把妇女们争取过来，另外，发言人还提醒要注意妇女在教皇至上主义运动中的影响。

在去年的莱比锡国会选举中，向妇女散发了一份传单，影响很好。

当时我们十分惋惜，妇女不能参加投票；否则，我们相信，那次我们甚至会从资产阶级妇女的行列中获得大量的选票。

在英国的66个地方，27000名妇女当中就有14000人行使了投票权。弗吉尼亚州的一个首席法官向华盛顿报告说，自从妇女有权参加选举以来，在选举方面的骚扰就完全消失了。

如果通过他的提案，可在短期内取得巨大的成就。

选自《研究〈哥达纲领批判〉参考史料》
1978年三联书店版第67—68页。

为德国的劳动保护立法说几句话*

(1877年4月18日)

先生们:

逐一批驳三天来,在辩论过程中对我党、对我们的提案进行的数不清的攻击,当然不是我现在的任务。无论如何以后还会找到机会,就各种攻击给予答复。

在辩论中竟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昨天我们的提案遭到各方面猛烈的抨击,而今天,我们又几乎淹没在一片赞扬声中,令人透不过气来。(全场活跃)

借此我要声明一点,那就是我们既不要受攻击声,也不要受赞扬声的迷惑。假如说刚才冯·赫耳多尔夫议员——我承认,他对我们的提案的评价态度是友好的——自认为可以断言,如果我们这样走下去,情形也许会很快发生变化,我们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了。在这里,他就象那些硬说我们提出了这样的提案就等于背离了我们的纲领的人一样,是大错而特错了。昨天谴责我们的是议员希尔施博士,而我只能声明,他根本就不知道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为何物,这对一位以工人代表自居的他来说,可真不是光采的事。

* 1877年4月1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针对中央党拟定的法律草案提出了反提案。倍倍尔为了维护反提案,在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修改工商业条例时,发表了这篇演说。它最初发表在《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速记记录》1877年柏林版第1卷第567—576页。1877年4月24日,恩格斯在信中称赞这篇“演说非常好、明确、有条理并且中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50页)。——编者注

假如他知道我们的纲领，他也许会发现，在一般原则要求之后，在那涉及未来国家和社会组织的要求之后，还有一个专门的部分列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现代社会内部提出下列要求”的项目当中。它包含了我们在提案中逐一阐述过的主要内容。这些要求（前几条政治性的从略）说：

“3. 保证不受限制的集会结社的权利。

4. 实行同社会需要相适应的正常劳动日。禁止星期日劳动。

5. 禁止儿童劳动和一切有害于健康和道德的妇女劳动。

6. 实行保护工人生命和健康的法律。监督工人住宅的卫生状况。由工人选出的官吏对矿山、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监督。实行有效的责任法。

7. 调整监狱劳动。

8. 工人的互助基金和救济基金完全由工人自己管理。”^①

先生们！你们看见了吧，这里，我们的纲领提出了一长串要求，这些要求的全部内容说明：我们是向现今的国家提出这些要求的，特别因为我们认为，这些要求在现今的国家是可以变成现实的，并不怎么触及国家的根本。不过，诸位也应该由此得出结论，即我们并不是想把上述要求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说，《日耳曼尼亚》^②对我们提案的特点讲得恰如其份。对这些提案的短评，它冠以这样的标题：“社会民主党议员提出的一项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提案”。一点也不错，这项提案同我们那些涉及到未来的社会组织 and 变革社会的原则要求毫不相干。我们向现今国家提出上述要求，因为我们——由于克莱斯特-雷措

① 参见《研究〈哥达纲领批判〉参考史料》三联书店版第80页。——编者注

② 一家周报，德国流亡者，即在奥地利领导下的统一德国的拥护者的机关报；1858年至1859年用德文出版，最初叫《伦敦德意志报》，后用《日耳曼尼亚》的名称出版。——编者注

夫^① 议员昨天的发言，我特别提请他注意这一点——当然认为，目前的社会状况是社会发展过程的自然产物。我们认为，它不是人为的产物，而是自然形成的存在。我们认为，任何政党都必须考虑到现存的东西，但也要注意，现存东西的发展过程。现存的东西也象一切生成的东西一样，是会消逝的，也就是说，自身会发生变化的，它的发展方式对行将取代现存的东西的那些未来的制度最为有利。……^②

我们几天以来就现在的提案进行的所有辩论表明，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怎样才能帮助解决困境，我这里所指的不是一般的困境——如本国国会各方都提出过（尤其是自由派的）、又为李凯特和格鲁姆布莱希特议员所否认的困境——，而是指每况愈下的小企业经营者的困难处境。因此，会上一方面有人建议，他们主张建立一些机构，这些机构应当在表面上重新使我们的小企业经营者得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失掉的独立性，使他们处于比现在更为有利的竞争地位。这些建议把责任归咎于对职业自由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则有人声明，千万不可动摇现存的秩序，因为他们满足于空洞无物的提案。

后来，又有人把对上述提案的讨论同社会民主党的产生联系了起来，我们听到了这方面的奇谈怪论。右派发言人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增长引起了手工业阶层的逐渐衰落；而另一方面——这回又是议员希尔施——则认为，社会民主党力量增长的原因在于，我们近年来在劳动立法的稳定方面出现了动荡不安。他认为，这种不安定局面，即担心现状能否继续维持下去的不安心理，在上次大选中帮了社会民主党的大忙。

① 汉斯·胡果·克莱斯特-雷措夫（1814—1892）——普鲁士政治活动家，保守党极右翼首领，《新普鲁士报》的创办人之一。——编者注

② 原文如此。下同——编者注

假如希尔施博士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按照帝国首相官邸主席先生^①的声明，理所当然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即现在，连政府方面都不想改变工商业条例的原则这种“稳定”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就会出现骤然衰退。对主席先生的这一声明，议员希尔施博士十分满意，兴高采烈溢于言表，并且紧接着大谈社会民主党如何如何。可现在，这种为人所希冀的衰落没有出现；自由派报纸借口某个集会参加人数不多，或以某种完全无足轻重的理由就冒然推测，大喊大叫：你们要看清楚，在所有地方社会民主党都陷入衰退了呀！若干年来，就是在这些地方也没有出现衰退。

先生们！假如象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政党，竟然受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所左右，那么诸位就完全有理由认为，它，即诸位认为是人为产生的，是一系列宣传的产物的政党，一旦这种人为的原因失去作用，就会马上消逝。但是，社会民主党不是人为的，而是我们制度的天然产物，它植根于我们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状况之中，如果说我在这里提到政治状况，那么我想同时作个补充说明，即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把国家建筑看成上层建筑，看成可以用形式来表现的社会状况。国家的政治立法，如果说它应当具有某种固定性和实际的全部有效性的话，它就不可能是某种人为的产物，不可能是个别人按照他们自己杜撰的某种模式随心所欲臆造的东西；它应当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植根于社会即在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和发号施令的那个社会阶级的天然生存条件之中，此时此刻这个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换句话说，就是资产阶级的表现方式——自由主义。假如有人要追问社会民主党产生的原因和手工业阶层衰退的原因，假如诸位想得到清楚的认识和令人满意的回答，那么，诸位必须要考察我们的社会状况。但这不是说诸位不

^① 指卡尔·霍夫曼（1827—1901），国家官员。——原编者注

问青红皂白用镇静剂就能使(社会的)弊端药到病除。假如社会出现了普遍的弊端,那同时也就存在普遍的原因;人们不应在个别法令的效果中,或在个别人的活动中去寻找这种原因;人们尤其要考察法令所依据的、个别人赖以开展活动的普遍社会状况。假如诸位真的以此为标准,假如诸位真的对作为当前社会本来生存条件的我们社会的各种状况所作的批判进行了研究,那么诸位不论从右的方面,还是从左的方面都肯定会大吃一惊:诸位拿那些替企业经营者的状况说话的提案不会赢得任何东西,或者仅赢得了表面的东西。整个现代社会的发展——这一点我已不同程度地讲过多次——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又是以在工商业和工业不断扩大对机器的使用和劳动分工、改善和完善技术并运用自然科学成果为基础的。我们社会生活的这种发展乃是一大进步;我不认为在座的有人会把这种现代的发展看成是退步,尽管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种发展又给劳动阶级造成了无数的弊端。我们认为,通过我们的提案能够而且一定会消除这些弊端。

诸位先生们!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从外部来说主要表现在,今天由于使用和充分运用现代发展的一切有利条件,小企业愈来愈多地被大企业所取代,其后果就是,只有有能力保证企业独立性的企业主,才能经得起竞争。这也就是说,他要装备必要的物质手段,才能在一系列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改善上稳操胜券;而那些无力以某种方式用必要的物质手段装备自己的企业主,在这场竞争中必然会败下阵来。但既然这种一方对另一方的竞争已经成了整个现代社会的关键,那么显然,整个现代经济的发展将会而且一定会日趋尖锐化;在这场生存斗争中,唯有大型的、有竞争力的企业主才会得胜,而弱小者则被消灭。——我不明白,这个近在眼前的社会过程,怎么能由于议员拉斯克尔博士摇晃脑袋就生出疑问了

呢!

随着上述过程的进一步发展,个别的工业家和企业经营者为了能经受住这种竞争,就需要更有力的辅助手段;而有能力这样做的企业主,随着资本的日益集中,数量也日益减少着。结果,势单力薄的工厂主和企业经营者被中等的摧垮和并吞,而中等的又被大型的摧垮和并吞。

这样一来,这个发展过程的自然结局就是我们的小手工业阶层,不管它是经营什么的,在这场竞争中最终必然败北,最后就留下仅限于靠修理糊口的了,即仅限于少数无足轻重的例外,因为在那里现代化技术和机器尚未大规模地使用。……

如果说上面我所阐述的我们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大体上是正确的,——我不认为,有谁能够郑重其事地驳倒我的话,因为我的分析是以实在的、有目共睹的社会状况为基础的——,那么不言而喻,人们建议采取的各种不同办法,不管是哪一种办法,都无法有效地阻止手工业阶层由于大资本的发展而引起的衰落。事情还不仅于此。我还要说,正是那个或那些我们在这个大厅中不得不首先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表的政党,也就是自由派,为了他们切身的利益,拒不接受一切旨在保障小手工业阶层生存能力(同限制资本发展含义相同)的措施。毋宁说,事情与自然正好相反,为了自由派学说的利益,为了大资本的利益,竭尽全力推进在我们眼前日趋完善的过程,也就是说,由大资本逐渐并吞小资本,使小手工业完全丧失生存能力。当然,人们不禁要问:应当怎样和能够怎样消除这种弊端呢?整整一个社会阶层在贫困下去,这是无可否认的。诸位先生,那我们就不应当向后看,而是要向前看。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几十万独立的经营者的成了这一过程的牺牲品陷入了愈来愈无把握的境地。毫无疑问,我们是乐于助人的,假如我们真知道怎样才能切实地而不是表面地帮这种情况的忙的话。但是,诸位请看!在

这方面我们同诸位即别的政党是有区别的——自由派报纸硬说，我们试图争取小企业经营者的利益，我们有能力在大资本的普遍发展中维持他们的独立存在，事情恰好与此相反——我们要对他们说，这是无稽之谈。我们同诸位相反，始终强调，即使人们在某个地方，在某种个别情况下，通过警察和麻痺手段还能在短时间里维持他们的存在，也根本不可能保证他们的独立存在。我们甚至还要说，从一般的文化观点来看，从人类进步的观点来看，这种人为地强行维持与整个现存制度相抵触的状况的做法，是愚蠢和荒谬的。我们甚至要说：假如事情是这种情况，即整个现代发展的结果，使机器愈来愈多地代替手工劳动，分工愈来愈广泛，自然科学必然愈来愈广泛地运用于工业生产方法，并且因而制造出大批用过时的生产方法不可能生产的物品；同时另一方面结果表明，现在几千人、几百万人不得不无声无息地安心忍受对他们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剥削，而且因为按照社会状况和社会制度，只有少数人才有可能为了自己最切身的利益，以牺牲多数为代价，充分利用一切文化进步的成就，原因在于他们善于统一掌握物质手段——必然性的准则就是，要创建这样的机构和社会设施：它们要以平等和合理的方式使一切社会成员都能分享好处，不是保留而是继续扩大一切文化成就。说到这里，我们就涉及到了前天我的党内同志弗里茨舍在他开始发言时提到的论点了，即要求把广义上的劳动资料，也就是土地收归社会所有。（右边有人喊：“原来如此！”全场骚动）不！诸位先生！事情并不象克莱斯特-雷措夫认为的那样，不是讲财产的分配，他对弗里茨舍议员的话全然误解了；相反，这里指的是把占有集中在社会手里，指的是合理分配劳动的收益即通过劳动创造的一切产品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要利用现代的生产资料（还有待尽可能地完善、改进和多样化），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无限扩大了商品生产，应

当使这种生产平等地造福于一切社会成员。劳动应该以合作的方式组织起来，并把参加这种劳动确定为有劳动能力的成员的义务。

可是中央党所提的议案同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反，其效果与其说可以通过言词，倒不如说可以用现成的动机来衡量。因此，我认为，这些提案（只因为它们涉及的是对自由、职业自由的限制）即受到多方激烈抨击的要求，不得不到右翼先生那里去寻求支持。在这些党派之间，充其量只会出现这样的争论，即人们在个别情况下到底能走多远。至于对方法的争论，即人们对实行这些限制措施是如何设想的，它们到底应当表现在哪里，中央党的发言人和右翼发言人就完全置我们于不顾了。这是相当说明问题的。由于他们只提一般性建议，而根本没有能力提出他们如何实行建议的设想，那就等于他们承认，他们感到无法有效地扼制普遍的发展趋势，因此，他们的提案就会因其无法实施而归于失败。也许有人愿就我们对未来社会制度提出的要求对我们讲与此相同的话吧！（全场活跃）

是的，先生们！请诸位千万不要忘记，如果说我们今天不能贯彻我们的思想，其原因不是由于建议不对，而是由于社会发展的程度尚不足以这样作，社会的发展只有在未来才能实施这些思想。之所以今天无法实行，是因为对于社会来说我们还是少数，这是不言而喻的，也因为诸位从来没有听到哪个社会民主党人持上述见解。我们始终强调，我们只能设想当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达到它的顶点时，才能实现这些思想，因为只有那时普遍的认识和见解高度发展，看出为了享有现代发展的优越性，为了避开其阴暗面和弊端，除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另外，希尔施议员还特别反对由我们提出的建立义务进修学校的要求。他说，这种要求的实现应当听任自由协商，换句话说，就

是听任各区的自便。但假如人们就象他和他的党内同志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说的那样，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即认为：要使我们的社会的、职业的状况有根本的改善，基本要靠把对青年工人，也就是对学徒的技术训练提高到更高一级的水平，那我就真的不明白，面对这种公认的必要性，人们怎么硬把这样的事完全听任各区自便，或个别私人自便呢！我真的不明白，它们是否愿意通过建立进修学校的办法对职业学徒提供支持这样的事，竟然取决于自愿！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特别是处于今天状况下的绝大部分的区，确实都处于负担过重的情况之下，这是众所周知的。愿意满足这种需要的区几乎是没有什么的，尽管这种需要非常迫切。是的，另外我还认为，我们的大部分区根本没有能力满足这种要求，假如不同时谋求国家对建立这类学校提供资助，或者完全由国家建立这种普遍的进修班（我认为后者更可行）的话。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发现我们的提案中也有漏洞。在这里，我还想提请注意某些事情。

例如，假设我们把50亿法郎或者这个数目的大部不投在非生产性的军事装备方面，只把其中的一小部分——我想说哪怕是5亿——用于建立职业进修学校、职业博物馆等等，那么我认为，这样一来，对我们整个文化发展和我们整个社会的、职业的和工业生活来说，当然会达到更高尚、更美好的境地，比之把这笔钱的实际用途即服务于自我毁灭不知要好多少倍。但是，说也奇怪，用于军事目的的费用要多少就给多少，想从什么地方筹措就从什么地方筹措；而对于一般文化利益提出的要求，则一文不给，绝对不给。虽然在这个大厅里没有人说这样的话，但举个例子来说，我在自由派的报纸抨击我们提案的文章中，就看到过这样的话：不可否认，社会民主党的提案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好的，很切合实际的，因此，它们也许会得到自由派的拥护。不过，这些提案难以实施，因为那要使国家耗资过大，即使国家能予批准，也无处弄到这笔款项！诸位

先生们！用于实施我们提案的开支，我们在提案中毫不含糊地列入了帝国预算。因为我们认为，帝国早就有能力为实际的文化目的做点事了，因为它要压缩非生产性军费开支。我认为，把这笔费用转移到帝国身上，是用以对付军事预算压倒其他预算并日益膨胀的有效手段。我们致力的中心议题，始终是拿帝国的军事开支同用于文化事业的开支相比较。这就是我们向帝国，而不是向各邦提出用于实施我们的方案的物质要求的主要原因。

即使用于资助普遍受益的设施每年要花费1500—2000万之多，这笔开支所取得的结果，也远比帝国迄今为止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更造福于社会。……

诸位请看！接受我们提出的条款，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为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在群众中煽动虚构的阶级仇恨，如帝国首相官邸主席昨天所说的那种阶级仇恨，同我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不，假如说阶级仇恨（实际确实存在），象我在此必须明确声明的那样，由于我们制度是非正义的，那是有充分道理的，它令人不快地表现在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斗争中，而且是互相的，有一定的规模，因此不易作出客观的判断，这种判断完全是不可能的。从根本上说，责任要归咎于环境，即在我们有关工商业和社会问题立法上，呈现一片无政府状态，工人则缺乏应有的保护措施。提案表明，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愿意关心制定某些法律条文和界限，从而使这场斗争能够以大大缓和的形式进行，我对此毫不怀疑。另一方面，最后，我想着重指出，我们不会被我们提案的效果蒙住眼睛，并且不认为随着提案的采纳和实行，会给目前的社会状况带来更大的稳定性，或者，会使对立的利益达到完全的均衡。提案的目的仅仅是把实际存在的斗争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而给两党提供更多的闲暇和更多的客观性，以便更好地研究我们社会制度的自然的和有机的过程。那时，也许站在另一方的人们也会领悟到，只

有实现我们的要求,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演说和著作选集》1978年柏林版第1卷第440—450页。

(张念东译)

非常法不能消灭工人党*

(1878年9月16日)

先生们,首先,我对刚才那位先生^①的讲话表示满意,他以如此尖锐的语言直截了当地批判了选举中的阴谋活动,以及导致选举斗争的局面。不过,他若是回忆一下挑起这场斗争的人到底是谁,那就好了。当然干这种事的决不是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没有玩弄选举斗争的乐趣,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先生们,如果说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斗争中,有人把人们想象得到的和想象不到的种种伎俩全用上了,那么,在上次选举斗争中,情况也是一样。为了至少把我们从这所房子里赶出去,凡是可以采取的一切行动,他们统统没有放过,关于这一点诸位不能不承认吧。可是,敌人没有达到目的,但愿他们将来也不能达到目的。

先生们,在开始讨论今天的问题时,帝国副首相^②不论前些天发表过的御前演说,还是现在谈到的这项法令,都着重谈了行刺案件;今天,所有发言的人也或多或少地触及到行刺问题,他们都认为,行刺是导致制定非常法的直接原因,他们甚至异口同声地

* 倍倍尔在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通称《反社会党人法》或《非常法》)时,发表了这篇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演说,马克思在第二天,即9月17日就写信告诉恩格斯:“倍倍尔显然造成了强烈的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76页。)—编者注

① 指奥托·冯·赫耳多尔夫。——原编者注

② 奥托·施托尔贝格-韦尔尼格罗德(1837—1896)—国会议员,保守党人,从1878年起为德意志帝国副首相。——编者注

说，最明显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行刺。因此，先生们，大家不得不期望政府对这件事作出明确无误的说明，这是合情合理的；政府应该说明，经过广泛的调查，到底发现了什么问题，能够揭露出怎样一些足以指控我们有罪的事实，并证明刺客^①同社会民主党有关系，哪怕仅仅是思想上的联系。然而时至今日这一切都一无所知，人们听到的完全是空话和指责。有的人甚至提出这样的口号：“社会民主党行刺有罪！”于是，反对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就叫喊什么“社会民主党是谋杀皇帝的政党”，他们费尽心机，煽动人们对我们极端憎恶和刻骨仇恨，使用手段之毒辣绝无仅有。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要求政府采用多种形式说明问题，人们到底得出了什么结论，通过对这两个刺客的调查，查到了哪些与我党有关材料。我们完全不能容忍的是，人们至今仍然保持沉默，以为用基督教仁爱的外衣就可以掩盖对我们的种种诽谤。当前，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想了解一下，调查行刺事件的大量记录到底包括些什么内容，就是说，你们在德国各地区对我们的党内外同志、对待各种见解的人，尽管他们同刺客毫无关系，进行过无数次审讯，那么，通过这些审讯到底弄清出了问题。有人欲加罪于我们，要我们对此承担责任，因此我们要求澄清问题。尤其是第二次行刺事件，因为这次行刺是促使帝国国会重新选举和制定这项法令的直接原因。

我有责任在这里扼要地向诸位描述一下，在第二次行刺的消息传到莱比锡时，我和我的朋友们对此产生的印象。6月2日傍晚，我和我的家人散步回来，刚刚走进家门，就有一位热心的太太^②冲进我的住房，问我：谁和他有关系。我问她：“什么事？和谁有关系？”“您还不知道？有人枪杀皇帝^③！”我十分惊讶，忙问：“刺

① 麦克斯·赫德尔（1857—1878）——莱比锡的帮工。卡尔·爱德华·诺比林（1848—1878）——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编者注

② 奥托·弗莱塔格的姐姐。——原编者注

客是谁？”“是一位叫作诺比林的博士。”“诺比林，我有生以来还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于是，我立刻戴上帽子，急忙到几位朋友那里去，向他们打听：“你们是否知道，诺比林博士是不是党员，他同你们是否有过来往或联系？”谁也不能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对此我十分高兴。第二天，大清早我就急忙去《前进报》^④编辑部，想再详细地打听一下情况。那里的答复是：他们已经得到一些消息，可以肯定，诺比林博士确实曾经在莱比锡大学上过学，但是，他同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相反，他们得到的一切消息都证明，他恰恰是我们的对手，在莱比锡，他同一些极有名气的自由主义团体有联系，而且由于诺比林的天才，这些团体还很器重他。这些消息使我们大家都很宽慰，几乎不约而同地说了句：“好了，他们干的事同我们沾不上边。”听到这一切我十分高兴，离开了编辑部。几分钟以后，我来到一家商店，那里贴着一张电报使我非常惊讶，上面写道：“深夜两点发自柏林。刺客诺比林在上次法庭审讯时供认，他是一个热中于社会主义倾向的人，他在这里曾多次参加各种社会主义集会，8天来，他就蓄意刺杀皇帝陛下，他认为，消灭国家的首脑，将使国家兴盛。”

我当即返回《前进报》编辑部，对他们说：“我们高兴得太早了，他竟然同我们挂上了钩。”先生们，显然是官方向全世界发布了关于这一消息的电报。这里，在我手里就有这份电报，它是由《十字报》^⑤的编辑亲自火速送到《十字报》编辑部的。因此，对于电报的官方性质不应产生任何怀疑。但是，现在通过各种可靠的消息证

③ 1878年5月11日和6月2日先后两次有人谋刺威廉一世，皇帝受重伤。——编者注

④ 1876年以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1876年10月起在莱比锡出版报纸。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1878年10月该报停刊。——编者注

⑤ 即《新普鲁士报》。从1848年起至1939年在柏林出版。是反动当局及后来的保守党极右派的报纸。——编者注

明，在行刺的那一天，或在那一天的夜里，根本没有开庭审讯过诺比林，也没有任何东西足以作为凶手的动机和他的政治观点提供严肃的论据。先生们，诸位当中的任何一位都知道，沃尔弗电报局是怎样的情况吧（大家表示赞同），诸位也知道，如果不经官方许可，绝对不能发出这类电报。显然，我们给这份本来就是官方的电报再加上“官方”的字样未免是画蛇添足了。我以为，毫无疑问，这是官方有意伪造的电报，并把它公诸于世。（“你们听！你们听！”）

在电报里，官方混淆黑白，极尽诽谤之能事，其目的显然是，采取最无耻的方式给一个伟大的政党罗织罪名，给它盖上周谋犯的烙印。今天，我代表我们的全体同志，要求说明这份电报是怎样炮制的。同时，我还要问一问：副首相先生是否知道，是谁炮制了这份电报，或者，是不是有人在行刺后不顾那些非常可信的，完全相反的论据直接审讯刺客，而编造了虚假的电报内容。其次，我要问问，是不是追究过那个起草这份进行无耻诽谤的电报的刺客、追究他反对伟大的、有威望的党的罪责。（会场骚乱）最后，政府的各机关报，即所有官方的和半官方的、以及随声附合的其他报刊，单凭这份电报，几周几周地甚至几个月几个月地采取最骇人听闻、最卑鄙下流的方式连篇累牍地攻击我们；这些报刊每天把它们搜罗的所谓的阴谋活动、什么同谋犯之类的令人极为恐怖和不安的消息随心所欲地公诸于世，而政府却丝毫不对这些颠倒黑白的报道和消息加以澄清，也不对这种狂热的叫嚣进行批驳，而这些报道发出的这种叫嚣势必在公众中造成严重混乱，难道说这是可以容忍的吗？众所周知，政府在这方面毫无作为。相反，为了在舆论界大肆散布和肯定那些假论据，政府倒是无所不用其极，可是，直到今天，政府的正式代表始终没有表示愿意对现存的种种黑暗现象作出起码的解释。

第二个刺客已死；对我们来说，他死得为时过早；先生们，对于

他的死我们深表遗憾，我们多么期望这个人能够完全保持清醒的头脑，期望对他进行审讯，从而详详细细地了解他的思想和他这次行刺的动机。如果说还有一个政党不但对他的死而且还对这两次行刺事件深表遗憾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无辜受到株连的党。

但是，极为必要的是，最后不仅必须向帝国国会，而且还必须向整个国家，甚至向对这些事件深表同情的整个文明世界证实：几周以来和几个月以来抛出的一切指控材料哪些是真实的。人们对我们施加迫害的方式使人想到了中世纪最黑暗时代使用过的那种方式。如同人们在中世纪利用宗教迫害不同信仰的人，例如迫害犹太人、新教徒、基督教徒那样，在19世纪30年代前后，人们把全面围剿社会民主党人——政治上的不同信仰者——的战争进行得绘声绘色，而且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参加了这场围攻。他们甚至企图剥夺持社会主义观点者的工作权，打碎他们的饭碗，断绝他们的生路。同时，肆意辱骂和诽谤他们，说他们是一些没有廉耻和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们公开玩弄种种卑劣手段，企图制造混乱；并蓄意恶毒刺伤我们，以激起我们采取某种暴力步骤。显然，他们并不满足于这些行刺活动。如果我们在这一系列强烈挑动下，果真采取暴力步骤，那么，毫无疑问，这对他们来说，倒是正中下怀，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掌握更多的、更重要的攻击我们的材料，从而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势。确确实实，从来没有一个党象我们的党那样，处在如此困难、如此危险的境地，也从来没有一个党象我们的党那样，期望自己的党能够稳定而和平地发展壮大，我们的党不愿意进行任何挑衅活动和采取任何轻率的步骤。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不论在那些连续不断遭受诽谤的月份，还是在已经结束的选举斗争中都已经向每个人表达了这些观点。但是，我还要重复一下，我们要求结束这些毫无根据的煽动和诽谤；要求公布记

录；要求将记录提交给帝国国会和专门审核该法令的委员会。我在这里提出的要求，同几天前在议会各方面的同意下，讨论“大选帝侯号”不幸事件时，就这次不幸事件^①提出的正当要求是完全一样的，海军大臣^②明确表示，就他而言有权批准这一要求。在朝的各位先生们，你们完全应该满足这一正当要求，而不应该否决它。你们很难证明，你们对记录没有作过指示吧。当然，你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使用这些记录，哪怕你们愿意把记录交给上议院和委员会也不会受到任何阻拦。因此，我代表我的党，向我希望应该受人尊敬的人提出明确要求：把记录公诸于众。（“完全正确”！“太好了！”）

先生们，现在在制定法令草案时，有人继续指控社会民主党企图进行破坏活动，企图危害国家。

然而，我事先必须在这里简短地提出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人们除了企图把行刺事件加罪于我们外，还把同行刺事件有关的许许多多渎君事件统统算在我们的账上，说这就是我们党所追求的目标。先生们，我宣布，行刺、渎君、法庭审讯、以及对有关渎君案件的判决的时刻是德意志近代史上最悲惨和最可耻的时刻，（会场一片赞同声和骚乱）从各方面来说，有关的事件和审讯不仅对德意志人民而且对德意志的法庭都是一种耻辱。（会场一片赞同声和混乱）

是的，我相信，总会对此作出公断的，先生们……

主席^③ 插话：我必须提请发言的先生控制一下，不要采用这种

① 1878年5月31日，德国“大选帝侯号”装甲舰在英国附近的加来海峡同“威廉国王号”冲撞而覆没，270名水兵死亡。1878年9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有人向政府对这一事件提出质问，要求让每个议员了解这次事故的原因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不幸事故的发生。——编者注

② 阿尔勃莱希特·冯·施托什（1818—1896）——德国将军。——编者注

③ 麦克斯·冯·福尔肯贝克。——原编者注

方式攻击帝国国会以外的个人和机构。（“对！”）

倍倍尔议员接着说：先生们，经常有人在这里进行攻击，也许比这还要尖锐。我不是否认诸位权利，然而，为了避免误会，我必须明确提出，我决不是用自己的判断来指责所有的法官。我对法庭和法官们是深为了解的（笑声）而且在实践中我结识过一些极有名望的和正直的人物，我并不认为，他们乐于接受党在政治上的影响和在政治方面作出的种种决定；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另外，我要提一下普拉内贝格先生最近写的小册子，这位先生关于读君案审判的方式方法，以及关于对大多数人的判决等看法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先生们，再说在读君案件上，不是从另一个方面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伤风败俗已经发展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了吗？这里，我不妨提一下许许多多极端卑鄙无耻的告密勾当。的确，这种事情并非社会民主党所为，而完全是出自那些颇有声望人士之手，他们经常用爱国主义的词句标榜自己，或者认为这种种行为就是爱国主义的举动，尽管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爱国主义人士，否则他们决不会对自己的国家提出这些可悲的指控。由于行刺事件而被逮捕的所谓读君者当中到底有多少人是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倒是掌握一些材料，只要你们作一番调查就可以发现，这个数字可以说几乎等于零。最近几天和最近几周，所有强加在社会民主党头上的种种罪名，实际上完全是耸人听闻的无稽之谈；除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外，相当多的人对于什么是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一无所知，这并不奇怪。我的报告可以向诸位证明，甚至在这所房子里，就有相当数量的德高望重的人物对于什么是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追求的是什么缺乏起码的了解。我若以这所房子里的人对上述问题的普遍无知为尺度来衡量一下，就可想而知，将来警察遵照这项法令，非把一切事情都算在社会民主党的账上不可，这样一来，实际上现在尚未受到威胁的、唯一的

为劳动阶级谋求幸福的、符合人道的追求也没有立足之地了，因为，这种追求也被人看成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会场左边有人表示赞同）人民代表都如此无知，迄今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德意志警察会有知识，那才见鬼呢。（会场情绪热烈）

该法令的第一条写道：一切团体，凡怀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企图，致力于推翻现存国家制度或社会制度者，均应禁止之。这是镇压报刊的重要标志，进一步说，是镇压一切团体，没收其财产的重要标志，因为人们从这些财产上判定这些团体符合上述概念，甚至更进一步可以并且能够在很多企业限制或压制手工业工厂，正如大家知道的，尽管那里的积极分子根本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比如那些房主、印刷工人、图书借阅处的负责人以及阅览室的负责人等等，他们完全出于业务上的兴趣为社会民主党人办事。先生们，有人攻击和谴责我们，说我们要消灭所有制。是的，这一论断有一点是对的，我们要消灭当前在生产工具和劳动资金以及土地方面的私人所有制的形式。（会场右边有人喊：“啊哈！”左边有人喊：“没错！”）是的！先生们，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反驳过和否认过的事实，我真弄不懂，右边的那些人为什么对此发笑，还喊什么“啊哈”。这完全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它已被写在制定这一法令草案的论据里面，从这一点上看，这些论据不无道理。但是先生们，直到今天社会民主党还没有粗暴地没收过或消灭过任何无耻之徒的私有财产，它也不想为了消灭个别人去侵占私人财产。与此相反，假如这个非常法草案一旦生效，那么，私有财产，即以资产的方式得到的财产就会遭到掠夺，这是社会民主党至今既没有干过也没有想过的，因为尽管社会民主党要改变所有制的目前形式，但是任何人也没有想到去废除所有制本身；问题在于，为了一切人的幸福，应当建立比较合理的所有制，废除那种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牺牲他人的个人所有制。然而，按照这一法令草案规

定，一个阶级里的无数人的财产都将被没收，这些财产并不是他们继承下来的，或者由于某种运气碰巧得来的，而是他们辛辛苦苦积蓄下来的和用自己的劳动代价换取的。现在还有一个令人十分惊讶的现象，有人站在政府一边攻击我们是消灭私有财产的人，还把力求彻底改造所有制的关系和彻底改造生产关系的罪名强加给我们。他们进一步说什么，自1864年起，通过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①就说明了这一切（这一纲领已被印在该法令草案的附录里面），而且把这一切都作了规定。看来，他们从那时起就仔仔细细地议论过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帝国政府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事实，即可以用许许多多的证据予以证明的事实，当时，普鲁士政府最有权势的人物不但不怕社会民主党追求的目的，而且还非常心甘情愿地准备支持和促进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听呀！听呀！”会场骚动）先生们，我认为我有责任在这里阐明几个问题，并把这些问题公诸于众，因为它们将有力地证明：政府的首脑人物当时讨好社会民主党，是为了使社会民主党支持他们的对内、对外政策，以对付自由党或对付当时的进步党（该党自称为进步党），这些人物是那样热情洋溢地许下诺言，答应实现社会主义纲领中提出的各项重要要求；他们当时又是怎样同社会民主党的最著名的领袖们建立了极其亲密的关系，而今天又是他们在这里控告我们是企图推翻政府的暴徒，是一些最坏的人，甚至说我们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②。（“你们听呀！听呀！”）

① 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18页。——编者注

② 倍倍尔揭穿俾斯麦把工人运动作为他捞取政治资本的企图。同时，倍倍尔还阐述了俾斯麦同斐·拉萨尔的谈判以及1865年俾斯麦邀请马克思担任《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撰稿人的情况。1878年6月，马克思把洛·布赫尔为此日的写给他信摘录后交给了报社，以支持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非常法的斗争，布赫尔是1878年5月第一次被查决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的作者。倍倍

先生们,我刚才已经说过:政府将根据法令草案(只要它被正式通过为一项法令)采取极其严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干涉私人财产;也正是这个政府将无缘无故地用暴力强行破坏个人财产,因此我认为,这个政府倒是的确确为今后开创了真正令人担心的先例。

草案首先规定,一切团体、合作社、储金会和一切出版物,凡旨在推翻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者,均应禁止之。国会议员赖辛施佩格^③已经多次强调,应该以怎样的方式使用和解释“推翻”这个词,对此,已没有人有任何怀疑了。严格说来,只有推翻旧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要废除另一个法令必须具备下述前提:唤醒人民确信旧法令已不实用,让人民坚信应该“推翻”从前制定的那个威严的法令,我们说,只有这样才能制定新法令。假如诸位把这个“推翻”看成是对国家的一种危害,那么,诸位也会把一切、把任何一种进步都看成是不可能的了,从而可以预料,你们必然把我所说的一切也看成是不可能的了。根据草案第一条,人们将直截了当地把任何旨在改善现存国家或现存社会状况的意图都说成,都看成是危害国家的、是“推翻”的了。再让我们看看下述做法:冯·赫耳多尔夫先生特别称赞那些行政管理机关,这些机关在赫耳多尔夫先生结束发言时提到的那次选举斗争中,曾经反对过自由派,还有,拉斯克尔议员本人竟容忍人家把他称作半个社会民主党人,还有人不得不说,是社会民主党选他当议员的,我认为,这些做法差不多使我们猜得出来,假如政府和政府的职能机关一旦掌握法令中规定的那种巨大

尔通过这些揭发,迫使俾斯麦于1878年9月17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表态。——编者注

③ 奥古斯特·赖辛施佩格(1808—1895)——德国法学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71—1884年为帝国国会议员,天主教中央党领袖之一。——编者注

权力，它们将会干些什么。

先生们，你们企图通过这一法令扼杀一切科学研究工作，尽管你们今天还不承认这一点。诸位，你们在提到社会民主党危害公共治安的目的时，想在什么地方划一条界线呢？社会民主党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关于这些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向你们解释，只要诸位看看我们的哥达纲领，自然就会发现，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许多要求，而这些要求也许将由在座的大多数人批准。因此，上面提到的任何一种努力都将被视为社会民主党对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推翻”，因为我们努力的目的在于支持或实现哥达纲领中提到的这一个或那一个要求，再者，把这些写在纲领里也是为了给下级警察机关掌握情况提供一些方便。当局也许会想到，把印好的哥达纲领塞到帝国国会的所有警察的衣袋里去，以便使他们在每次大会上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危害国家的、进行颠覆的社会民主党的种种努力到底出自何处。

上一次帝国国会辩论非常法时，各派都十分明确地谈论过社会民主党努力的目标。比如国会议员贝托许-胡斯伯爵就宣布过，直接累进所得税是共产主义的一项要求；正常劳动日和正常劳动工资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要求，尽管社会主义方面根本没有提到后一项，即便提出来也毫无意义。去年辩论工商业条例问题（当时各派提出许多提案）时，国会议员威伦普芬尼希博士在谈到正常劳动日时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而今天，瑞士、北美、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英国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已经实现了上述种种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要求，这又如何解释呢？假如连这所房子里的人都把这些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要求看成是纯粹的社会主义要求，当然，最卖力气的第一流警察就更会把它们当成社会主义的要求了。但是，在敌视我们的资产阶级团体和报界看来，社会主义的概念甚至可以被说成，凡旨在改善工人状况的任何努力都是社会主

义宣传和煽动所造成的后果。假如诸位听听敌视我们的那位工商业主的滥言，那你们就会了解，只要他的工人对他那个毫无道理的命令稍加顶撞，他就会任意指控，说那位工人是个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是受了社会民主党挑动的人，可实际上，也许这位工人一辈子也没有读过一本社会主义的小册子，甚至连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打算都不曾有过。对社会民主党的这种盲目的偏见在某些团体中甚至发展到了荒谬透顶的程度；这些团体普遍认为，任何停工等活动似乎都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策划和领导的，否则，根本不可能发生。是的，我就是上述所说的领导人。但是，假如我今天向诸位保证：在我从事长达16年之久的工人运动活动中，从来没有一个工人向我请示过，是否批准这一次或那一次停工，恐怕诸位难以相信吧，然而，事实就是如此；我们所有的同志所遇到的情况也完全如此。你们和我们的敌人同样以为，工人实际上是一群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没有头脑的乌合之众，他们仅仅知道盲目地追随自己的所谓的领袖。可是我坚信，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象社会民主党那样，不断地听取广大党员对自己领袖的批评，容许产生不信任和进行严厉的批判。

依据这一法令，首先遭到冲击的将是被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和著述；他们以为这样大概就会击中我们的要害。然而先生们，这里我还要提出几个问题，难道说连拉萨尔的15年来一直未遭非难、已由书店出版的一些科学著作和其他著名人物的著作，即代表同一流派的著作，现在也突然一律加以禁止吗？按照法令规定，我们得到的回答当然是：不错，要禁止！再比如冯·图纳恩的著作，卞尼格先先生在上次辩论非常法时，就已经提到了他，说冯·图纳恩在他的伟大的经典著作《孤立的国家》中非常明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思想，难道说对这样一些著作也不能容忍吗？甚至连洛贝尔图斯和阿尔伯特·朗格的著作也不能容忍吗？如果你们把我们自

己的，就是说，由我们这些在世的社会主义者撰写的著作，连同由我们译成德文的外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一同禁止，那还说得过去。难道你们还要禁止几十年来一直未遭非难而已经出版的著作吗？这怎么可以允许？毫无例外，一切著作都要被禁止。等着瞧吧，这个法令将把诸位引向何方。接下去还有，只要你们读读谢夫莱的著作就会发现，几乎通篇都含有纯粹的社会主义性质；（会场一片赞同声）你们若是再读读阿道夫·瓦格纳的著作，比如，读读他的最近由劳改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你们也会发现，全书的不少章节，特别是关于土地所有制的那些章节，充分表现出纯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确如此”！）阿道夫·瓦格纳先生完全主张土地公有制。诸位还可以读一读最近出版的各种各样篇幅不长的国民经济学著作，尤其是科尼斯堡的民族主义银行家萨姆特的著作，那你们就会发现，其中也是以种种方式支持废除土地私有制的。显而易见，按照这一法令草案的规定，所有这些著作都得统统取缔。还有舍尔、路约·布伦坦诺、施穆勒等人的著作，也同样逃不出禁止的厄运吧？如若不再准许我们散发自己写作的全部文献，我们当然会适当地利用没有被禁止的国内外文献。你们想干什么就去干好了！我们将几年几年地，如果必要的话，十几年地用这些文献给群众提供精神食粮；我们将千方百计地寻找深入群众的，即深入到群众的更加广阔领域中的方法和途径。同时我们坚信，在制定这一法令所造成的如此紧张、如此令人气愤的情况下，好奇心将促使更多的人去阅读那些所谓的危害国家的小册子和著作。可以说，这项法令会给我们增加如此众多的读者，这也正是我们今天，乃至许久以来难以期望赢得的。在这里，我毫不夸张地向诸位宣布：日前，我们销售4000至5000份社会民主党的读物要化一年或两年的时间，这项法令实行以后，依靠我们尚未被你们破坏的组织（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你们非破坏所有的车间和工厂不可，

还有铁路和邮局)我们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销售更多的读物。过去三四十年当中你们都不可能消灭被书报检查机关禁止的读物,毫无疑问,当时已经传播过大量被查禁的读物,这些读物顺利地传到了公众手里。可是在今天,也只有在今天,党内个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之间的往来才得到了更加广泛地发展,以致我们在任何地方、甚至直到德国最遥远的角落都有可信赖的几十名党员,乃至几百名党员;甚至在一些你们根本想象不到的地方也有我们的党员,而警察却无法认出他们。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给他们寄送物品,哪怕你们加倍派警察,也无济于事。然而,你们要想到处设置间谍系统,就必须三倍、四倍乃至五倍地增派警察,这样一来,由于整个间谍系统需要耗资巨额,又势必提高捐税,此外,还会使我们整个社会的个人生活很不安定,甚至受到损害,结果连最守本分的市民也会产生不满。我们认为,这一切恰恰是法令所造成的后果,所以,法令只能对社会民主党有利,这是毋庸置疑的。以上是我们要阐明的观点。(各种各样的喊声)

先生们,你们也许要说:“是的,然而我们还是要投票赞成法令!”(“是这样!”会场右边有人喊)先生们,倘若我们顺应这里的所有所作所为,赞成这件不合理的事情,那我们也许会干出不合理的事情来。我敢向诸位保证,我听到我们那些非常能干的同志们说过:但愿通过这项法令!这项法令的通过甚至比我们那些同志起的作用还大,因为法令通过以后,保险有成千上万的、今天还不是社会民主党党员的人加入我们的党。我们将在不多的几年内比以往更加壮大。(“说得完全正确!”)好,现在我想谈谈今后散发材料的问题。

先生们,我还向你们保证,我们将通过现有的相当广泛的各种联系,为了实现当前的目标,我们还可以轻而易举地三倍和十倍地扩大这些联系,把我们的各种小册子,不是什么4000份、5000份,

而是2万份和3万份，不是在几年内，而是在几个月和几周内销售出去。此外，我们还要以禁果为诱饵定出价格，这样可以成倍地和三倍地弥补我们在其他方面被削减掉的宣传资金。总而言之，各邦政府想要干什么，就去干好了，但休想置我们于死地。举个例子，去年冬天，在整个德意志帝国有上千个家庭乃至上万个家庭，根据不同情况3个人、4个人或者5个人组成一个单位，自行联合起来；他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聚集，在一个十分融洽的组织里举行集会；他们还在家庭举行茶话会和阅读社会主义著作，并组织讨论这些著作的活动等，难道说，你们能阻止住这些活动吗？你们知道，这一法令会迫使社会民主党干出什么事吗？你们的迫害激发了社会民主党人，就如同激发起第一批基督教徒异常地热中于自己的事业，甚至变得狂热，成为不折不扣的宗教狂一样。那些可靠的工人将以无比坚强的意志为他们的信念进行辩护；他们将在车间、工厂、家庭和啤酒酒店，在火车上、在星期日散步的时候，在许许多多其他的、没人监视他们的地方聚会。每个人的衣袋里都会装上2本、3本、甚至10本、12本小册子；他们将去乡下和各个城市最偏僻的地方探望朋友和熟人，把这些小册子散发给他们。你们要阻止这些活动是完全不可能的。

好，先生们，我现在接着讲下一个问题。这一法令在法律方面和物质方面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你们在这里宣称：所有印刷社会主义著作和社会主义报刊的印刷所一律予以没收和取缔。你们想以此压制报纸和书籍的出版，取消图书阅览室和读书会等等。是的，先生们，大概你们认为，这样一来，整个资产阶级的生计就会受到严重损害了吧？我认为：否！我只要把事情向你们讲得再清楚一点，你们马上就会明白，尽管社会民主党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然而它又天然地同资产阶级的生活最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甚至社会民主党本身也是从资产阶级社会产生出来的，今后还要从中不

断产生出来；如果你们不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和利害关系中设置最巨大的、最严酷的障碍，你们就休想消灭社会民主党。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目前在德国大约有16个印刷合作社；还有一个包括私人企业的印刷厂，这个工厂除印刷和散发社会主义文献外，还经管与此有关的一切事宜。此外，还有一些在政治上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有不少私人印刷厂，这些工厂不计报酬地印刷社会主义报纸，比如在德累斯顿、曼海姆和普福尔茨海姆等地就有这类工厂。

先生们，根据我的调查，这16个印刷合作社每年的销售额总共大约80多万马克，从这个数目上看，你们会一下子使德国的工商业和德国的工业受到损害。然而，这是一些几百人和千百人赖以生存的企业。仅仅在16个印刷合作社里工作的排字工人、印刷工人和发行人员就远远超过了300人。此外，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编辑（一些生产合作社是40名）、负责发行文献和报纸的销售员等。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已经结婚，如果法令一旦生效，我确信，政府一定会极力推行它，那么，所有这些人就会突然失掉饭碗。他们中的多数人由于对自由资产阶级态度明朗，所以绝对不会找到工作，也没有买卖可做，有关当局将施展几个月来惯用的开除手段，让他们挨饿的暴力手段。此外，还有2500多名工人和小市民也是一些合作社的社员；他们相信你们的各项法令，按照我们的合作社法自行组织起来，并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即为数不多的财产投资到那里，根据不同情况他们总可以得到比例很大的红利或利息。可是，一旦非常法被通过，可以想象这些合作社一下子就会破产！可以肯定，在任何情况下用现有的财力去抵偿债权人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理由很简单，现有的大部分财产，即小册子和书籍等按照法令规定应当全部没收和销毁。再说这些合作社的一部分债权人，比如推销员和图书发行人由于买卖倒闭也失去了支付能力，所以

说，这2500多名社员不仅丧失了他们入股的财产，而且根据合作社法规定的连带责任，他们还必须用自己的私有财产作担保，这样他们立即成为一无所有的人。

如此粗暴、如此严重侵犯数千人的财产和生计的行为，必定遭到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怨恨和使他们产生最强烈的仇恨，难道你们对这一切还有怀疑吗？我敢断言，我们进行10年至15年的宣传鼓动也未曾使人对今天的国家、对支持这个国家的并将要批准这一法令的社会集团如此仇恨，正是这个法令作到了这一点！

此外，你们还想利用这一法令取消合作社的储金会。可是先生们，你们知道这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所有的协会都有不同的奋斗目标，肤浅的人认为，储金会的目的是煽动停工。我们暂且不说在停工问题上，人们对社会民主党的奋斗目标有各种各样极其错误的看法，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还是多次在正式决议中阐明，采用停工的办法谋求改善工人状况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所说的这些协会的目标在于，对其所有成员实行免费医疗和残废照顾等。这里，我同样想用数字向诸位说明问题。目前在德国约有26个比较大的工会组织，总共大约有5万名会员，他们分布在1266个地方。我可以预料，在政府各部门看来，这些组织统统都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因此，它们势必遭到法令干涉。这26个工会组织每年收入401000马克，支出321000马克。余下的钱作为医疗、旅行和照顾残废等储备资金。例如，被公认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手饰工人工会在残废储备额中有价值18000马克的财产。还有，同样被公认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印刷工人协会联合会以重要的方式用自己的财产承担职务；该联合会的旅行和医疗资金的储备额总计93000马克，残废储备金中有价值52000马克的财产。我还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联合会的重要作用，及其卓有成效的工作。将近三年来，也就是从1875年10月1日以来，联合会为流浪各地的会员提供

的救济总共是208258马克，这是一笔巨额开支，就是说，每个流浪的会员每天平均可以得到75分尼。诸位先生，你们都是在警察局和其他行政部门担任要职的当权者，你们一定知道，由于这些年来日益贫困，各地乞丐越来越多；数千名饥饿的工人流浪街头，最后不得不沦为乞丐，甚至被迫走上犯罪的道路。这里你们已经看到，这个唯一的联合会是怎样为每个月流浪在各地的971名会员每天提供75分尼予以救济的，从而使他们不少人没有沦为乞丐，就是说，公共福利对这些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是，非常法将毫不留情地冲击，进而取消这些组织。请问诸位，采取这种法令措施会造成什么样的必然后果呢？的确，不单单是遭到冲击的工人，还有其他没有受到冲击的人，即一切有同情心、有正义感的人难道会认为，这样做是公平合理的吗？

除了这一类联合会以外，还有一大批各种形式的地方联合组织；比如，印刷工人联合会在德国就有很多下属联合会，它们同样掌握医疗资金和残废资金，这些联合组织的财产总共也有好几十万马克。虽然印刷工人联合会不是党的组织，但老板们把它以及它的下属联合会看成是社会主义组织，去年就有人在各种场合以这一罪名告发这些联合会。众所周知，尽管在这些联合会里有许多持社会主义观点的会员，但其中也有不少不持社会主义观点的会员；而后者同前者一样也遭受意外的粗暴袭击和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大家可以想想，这将会造成怎样的气氛。在德国，还有相当数量的合作社，它们尽力在各地为出差到那里去的同志提供廉价的住处；这些合作社有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们当然不能期望得到法令的恩赐，而势必被取缔。此外，在德国我们还有很多教育协会，它们都已有10年、12年或15年的历史，并且配有设备齐全的图书馆，还有自己的动产和一部分可观的教学资金，这些协会的领导人除了那些没有被宣布为在政治上同情党的理事会成员和协会会

员外，还有一部分被说成是社会民主党的人。显然，所有这些人按照法令都将被看作社会民主党人，就是说，全部都要受到迫害。许多工人阅览室也都会受到袭击。他们千辛万苦挣得的财产、为数千名青年工人在漫长的冬夜提供过进行有益谈话和受到教育的一切设备将毁于一旦，而正是这些设备使工人们不再沉缅于使人堕落的小酒店生活。你们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用稍微不同一点的东西，用比较好一点的东西来代替被破坏的这一切。

由此可见，法令侵犯了工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现在我继续讲下去。不过，我还要问一问，你们打算怎样制裁社会民主党人经常光顾的酒店呢？就是说，先生们，你们消灭财产的界线又划在什么地方呢？事情一旦发展到最尖锐的程度，我们若想试图报复，大概不会有人感到奇怪吧？比方说，我们现在聚集在一些店主十分富有，但又反对我们的酒店里，边喝啤酒边交谈，有谁会来阻止呢？在我们出入酒店时，势必有人向警察告发，说有一伙社会民主党人定期在那里聚会，并进行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你们认为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至少会使店主恼火和不快吧。店主可能会认出一些最有声望的党员，他知道他们是李卜克内西、弗里茨舍和倍倍尔，当然他一定会把他们拒之门外，但还有成千上万的，他所不认识的人也是党员，这些党员就利用这种方式以最坚强的毅力——我认为，这方面你们对我们有足够的了解——进行活动，而店主和警察却不能一下子认出他们来。正象我前面讲过的，通过所有这一切类似的措施、经历了这一切令人恼火又困难重重的麻烦事，法令给社会各团体带来的无非是混乱和不满，这些团体从前也许还是非常法的最热烈的拥护者，而今却极切地期望尽快把它废除。

现在有人说，从我们的章程上可以看出，我们的工作就是搞暴力颠覆。我认为我们的章程里没有这样的内容，其中甚至连这种字样也没有。（会场骚乱，有人表示反对）是的，你们要拿出证据

证明这个问题；你们要加罪于我们，又拿不出证据来。我以为，你们的检查官们为了摸清我们的意图，几年来真可谓费尽了心机。为了反对我们，当局采取的行动“已经超过了可能的限度”，也就是说，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还通过了一连串的动议，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但仍然不能置我们于死地。人们又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指控我们的材料呢？我们的纲领——我认为我们的纲领的确十分重要——恰好讲的是些与此相反的内容。难道说我们的努力目标是危害公共安全的吗？！先生们，你们感到可怕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在法令草案的附录里已被全文刊印出来，其中提到：“这个国际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和民族。代表大会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就是危害公共安全吗？我认为根本不是。先生们，我很想知道，人们怎样才能提出更人道的、更高级的和更理想的原则和观点。我确认，在整个德国，真正有理想的政党只有一个，先生们，那就是社会民主党（会场骚乱。有人喊“你们听！听呀！”）是的，情况就是这样，社会民主党有理想，有崇高而值得称赞的理想，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才拥有可观的追随者。你们总以为，参加社会民主党的似乎仅仅是些手工工人，仅仅是一群受挑动的群众。先生们，难道说最近几年你们还不了解，科学家不是也象其他的人一样赞成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吗？社会民主党所追求的目标非常广泛，例如国民经济学、自然科学、文化历史、哲学，总之，包括科学生活的一切领域。我们掌握全部现代科学，使之为我们的目的服务，而且必须为之服务。最近在报刊上讨论了以达尔文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理论，讨论这些理论是有助于社会主义还是有碍于社会主义。在德国，达尔文主义最重要的

代表人物是海克尔教授，他不认为，并且完全否认达尔文主义有助于社会主义。还有一位对达尔文主义表示反对或怀疑的微耳和教授也赞成这种说法。先生们，我以为，海克尔这位达尔文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并不十分了解社会科学，所以他不可能预料，达尔文主义必然有助于社会主义，相反，如果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就必然同达尔文主义相一致。（会场情绪激动。有人喊“说得好”！）

如果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现代自然科学也是致力于消灭国家和社会的了，也应该属于危害公共治安之例了；因此现代自然科学也必然要被取缔。诸位刚才同意我关于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见解，这就证明，我关于实施这一法令的见解也是正确的。诸位先生，你们进而又攻击我们在宗教问题上的无神论观点和唯物主义观点。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尽管我应当在这里明确宣布，正如一切多少对社会民主党有所研究的人将要证实的那样，社会民主党并不要求拥护它的人在宗教方面有确定的看法。例如，前些时候在《未来报》上——这是我们在德国的科学机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坚决反对我的朋友莫斯特关于退出教会的种种宣传。众所周知，莫斯特去年冬天在柏林所作的宣传是一次非常生动活泼的宣传。在我们党内，有各种不同的，规模不等的团体，但它们对于党在宗教方面的态度观点是一致的，《未来报》上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已表达了这一看法。在这方面，说社会主义政党是无神论者并不恰当，是错误的，尽管我确信，社会主义最终必定是无神论的。（“说得太对了！”）

但是使诸位如此烦恼，如此忧虑的无神论学说又是由谁科学地、哲学地创立起来的呢？也许是社会民主党人吧？（“听呀！听呀！”）埃德加尔·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大卫·施特劳斯、厄内斯特·勒南等人也是社会民主党人吗？（“说得太好了！”）他们

是一些生活在资产阶级圈子里，大部分是在自由主义政党内进行活动的、持一般观点的科学家。先生们，大卫·施特劳斯最后的一部著作《新旧信仰》已经出了4版，可社会民主党人或工人都没有买过这本书，因为价钱太贵，社会民主党只有个别党员才能买得起这本书。本书第4版的大部分被自由资产阶级的那些大人物买走了，他们显然是社会民主党的敌人，他们不赞成我们的社会倾向和政治倾向。（“非常正确！”）我们是在科学信念的基础上，接收了这些无神论的观点，并认为有责任进一步宣传这些观点，把它们传播到群众当中。为什么对于无神论在这一方面可以通融，而在另一方面又被禁止呢？有人把我们的这些观点、对我们传播这些观点看成是危害国家治安的，并试图通过现在正在讨论的这个非常法把我们从政治上置于死地。先生们，现代哲学不是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社会民主党的理想目标了吗？我想起了菲利浦·麦兰德尔写的最新的也是极为重要的哲学著作《拯救哲学》，这部著作曾引起很大轰动，作者在书中坚决而明确地阐明和指出，人类为之奋斗的目标将是实现理想的国家，他所说的那种国家基本上是社会民主党所追求的那样的国家。同我们相一致的现代科学一切领域中的情况也都是这样的。我们从自己的信仰出发，承认现代科学学说和结论，并不断传播这种认识，使之家喻户晓，我们打算，发出适当的和符合我们目的的通告，用这种形式让这一认识在我国家喻户晓，把它传播到社会上的各种组织当中。难道这也是犯罪、是危害公共治安吗？有人甚至走得更远，他们企图证明我们非常巧妙地危害了国家，说什么在去年召开的国际根特代表大会上，有人称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其他国家的典范。是的，先生们，的确有人这样称赞过我们，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不是采用暴力和采用革命颠覆手段发展壮大的，他们坚信，我们主张采取实际步骤；坚信我们会在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开展活动。先生

们，你们一定从非常法提案的附件中看到了根特宣言，根特宣言就直言不讳地宣布反对社会民主党中以暴力颠覆为最终奋斗目标的那个无政府主义派别。该派曾声明：除采用暴力革命外，没有其他手段。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米哈伊尔·巴枯宁。如果说，人们在德国已经了解到，无政府主义者想干些什么，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目的又是什么，那各位不应把这一切归功于联邦会议和帝国首相府的枢密顾问，而应归功于国际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科学巨匠——我们的卡尔·马克思同志，他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的，内容极为丰富的著述，在这一点上，哪怕我们的对手，例如鲁道夫·迈耶尔也是十分清楚的，并且认为对此应表谢意。先生们，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根特宣言中最精彩的段落。

宣言中提出：“工人在有权参加选举的所有国家必须建立政党，以便派遣代表参加议会和市政代议机构；工人在没有选举权的国家必须竭尽全力争取选举权。”

又说：“一切独立的和善于思考的人要求永远清除愚昧无知；消灭世界上的不平和特权；使一切劳动者的命运不再是贫困和饥饿，使一切不劳而获者的命运不再是舒适和富裕。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即达到现代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活着的人必须克服困难，消除封锁道路的障碍物，建立或承认更加接近我们目标的临时机构——这是他们的神圣义务。”

先生们，除了这份宣言哪里能把自然规律发展的道路描绘得如此尖锐，如此清楚，又把各国工人的行动尺度和准则规定得如此明确呢？德国社会民主党走的就是这条道路，难道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树立了值得仿效的榜样吗？为了逐步达到目标，我们不是已经感到必须利用一切可供我们使用的合法手段吗？这就是活着的人的义务，不是吗？当然，为了消灭各种障碍物，为了采取一些能够达到目标的临时措施，我们显然想到了长期发展，这将是必要

的。难道说这一切都是危害公共治安的吗？由于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信仰，你们试图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剥夺我们的权利，堵住我们的嘴，那你们为什么又不敢断定：是的，你们在国家没有任何权利，因而也谈不上有任何义务，你们不必付捐税，不必服兵役了。这该是非常法一下子得出的结论吧。

冯·赫耳多尔夫议员说，这个法令不是非常法；不能说我们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他们只是不应该进行具有危险性的活动。先生们，如果我作为国家的公民被号召参加选举，那我应该根据我的信仰投票，但是，如果不准我宣传我的信仰和阐明我的信仰，那我就是一个没有权利的人。这一法令一旦通过，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法，是阶级法令。不过它显然会违背诸位的意愿，它会比迄今所有的一切法令更有效地为我们进行宣传。这一法令所起的作用恰如你们所料想的，定会给你们造成麻烦。它所导致的后果是暴力颠覆，这正是你们想要防止和应该防止的。

这方面有一些值得一读和引人注目的论述，那就是一些重要的国家法学家关于革命的概念和引起革命的论述。我国的法学家有布伦奇里和韦尔凯尔等人，大家知道，他们决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曾经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也决不认为，革命在一切情况下都必定是暴力事件，或者革命就是暴力行动。显然，你们也承认，完全合法的革命是存在的，关于这一点，布伦奇里在他编写的国家词典里，有一篇署有他名字的文章，其中是这样写的：“从广义上说，革命意味着根本的变革，政治革命是对国家实行彻底改革，不论这一革命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发动起来的，还是以合法方式或以暴力强制方式进行都是一样的……”

改革任人运用，或者任人阻挠，导致革命的病态因素就会增多。人不能正常地发展，受到压抑的力量就会一下子迸发出来。”

布伦奇里认为，关于革命的前提可以归纳为如下两条：

“一，一个民族的政治欲望和要求与现存国家形式之间的严重矛盾，这种矛盾令人难以忍受，以致发展成国家机构失灵的无组织状态，假如不对国家机构加以根治，这一严重的矛盾很容易上升到白热化的程度。极度狂热的人民是国家发生革命的渊源。

二，人民的迫切需要得不到合法的满足。一句话：人民的贫困状况是革命的自然前提，只有对宪法实行暴力改革，人民才能得到援助。

避免革命的唯一保险的办法就是及时地、彻底地进行改革。革命权是人民的天然权利，除此以外，人民不知道还有其他解救的办法。”^①

布伦奇里先生提出的关于革命的这些理论，正象赖辛施佩格所宣布的那样，将来根据刑法法典势必受到法律干涉，从而，窒息有关这方面的科学。我们的国务活动家们可能会把韦尔凯尔这位绝对谈不上激进的法学家下面所说的话放在心上吧，他曾经说过：“要防止革命，有一种必不可少的办法，那就是及时进行各种改革。在目前情况下，要找到合适的、能够进行改革的方式看来相当困难。鉴于王冠的尊严和国家的威信，考虑到随着新的、贪得无厌的要求而来的将是妥协，因此需要小心从事，辨别真正的国务活动家的唯一依据是：他知道克服种种困难，他了解在现有的情况下人民急需怎样的改革。要想从历史上举出一个例子，说明经过及时的改革仍然不能避免革命是不可能的。”^②

先生们，对这些话我没有可补充的，我仅仅希望，我们的国务活动家们能够真正把这两位国家法学家的话放在心上，并且首先要对我们的社会情况作一番彻底研究。但是，先生们，一方面

① 参见布伦奇里的《革命与改革》，载于布伦奇里和布拉特合编的《德意志国家辞典》1864年斯图加特和莱比锡版第8卷第605—607页。——原编者注

② 参见《国家辞典》1865年莱比锡版第12卷第553页。——原编者注

据说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鼓动而引起的对普遍贫困的大声疾呼和怨声载道，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多少年来所处的真正的物资上的贫困状态，而你们面对这一切完全无动于衷，你们所说的无非是1873年4月4日德尔布吕克大臣在这个讲坛上说过的这些话：“先生们，我们不能为那些任意挥霍自己钱财的人制定法令”，这样看来，似乎是人民甘心情愿把自己的钱财扔到滥设公司的骗局上面了，先生们，这可不是国务活动家该说的话。如果你们面对这些事实袖手旁观，既不制止滥设公司的骗局，也不制止滥砍公司的骗局，那就会又有一些穷困的股东被骗了进去，面对这种灾难和普遍的贫困状况，政府除了实行国家垄断和征收新捐税以外，别无办法，我们可确实要对这些国务活动家治理国家的本领产生怀疑了。诸位如果坚持你们的决定，那我们也象往常一样，照样继续生活下去直到完全消灭给我们在德国造成如此悲惨环境的种种弊病。尽管你们并不相信，你们能够用暴力手段消灭社会主义；如果你们仍然坚决走现在政府给你们规定的这条路，如果你们不把这一草案扔到该扔的地方——字纸篓里的话，那么，你们将通过你们的措施走向定会严重损害你们的切身利益、损害你们的组织和机构，甚至严重威胁国家制度的道路。

好，先生们，在我结束我的发言以前，我还要重复我开头提出的那些要求：在你们今天继续直言不讳地对我们提出种种指控以前，我们首先要求，不要依靠空话和指责，要依靠事实和证据！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演说和著作选集》1978年柏林版第2卷第1分卷第12—37页。

（葛 斯译）

妇女和社会主义(摘录)

(1879年)

第28章 未来的妇女

这一章我写得非常简短。综上所述,本章只是对未来社会的妇女地位作出结论,这些结论现在就是读者本人也不难得出。

新社会的妇女在社会上、经济上是完全独立的,她们不再遭受任何统治和剥削,同男人一样,她们享有自由和平等,并且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她们除了性别和性功能的差别外,都同男人一样,应当受到同等的教育,因为她们是在健全的生活条件下生活,所以她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充分发挥和显现体力和智力这两方面的能力;她们可以选择那些符合自己的愿望、爱好和条件的工作,在同男人一样的条件下进行活动。同样,她们可以在一个生产部门当实际的工人,之后把一天的另一部分时间用于教育工作,当教师、做保育员,剩下的时间研究艺术或科学,最后,再办理一些行政管理事务。只要她们情愿,只要给她们提供机会,她们就会从事研究、进行工作、享受娱乐,以及同妇女或男人进行各种交谈。

象男人一样,她们可以自由地、独立自主地选择爱人。她们可以自由求爱或接受爱。除了自己的感情,她们不受任何制约,最终结成良缘。这种结合如同中世纪以前的婚姻是私人契约一样,完全是一种没有官方介入的私人契约。在这方面,社会主义没有什么新创造,它只不过使那些在私有制统治社会以前所公认的东西,在高级文明阶段、在新的社会形态下,重新恢复起来罢了。

人只要在不损害他人或给他人造成不利的前提下,可以尽情地满足自己的需要。性冲动的满足同任何其他自然需要的满足一样,都是个人的私事,不需要向任何人阐明,更不允许无关者干涉。我怎样吃,怎样喝,怎样睡觉以及怎样穿衣,完全是我个人的事,同样,和异性交往也是个人的事。在未来社会中,通过教育和社会联系,人的见识和教养、人的充分的独立等一切素质都会任其自然发展,这一切将会促使每一个人不去做于己不利的的事情。未来社会的男人和女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将会比当今社会的男人和女人更能克制和认识自己的本性。而对于性问题羞于启齿和可笑的神秘感等现象也将不复存在,从而使两性之间的交往比今天更为自然和健康。假如已经结合的男女变得不和、产生了失望甚至厌恶,那时他们就会要求解除这种不正常的婚约,因为这是符合道德规范的事。又由于迄今造成的大多数妇女独身或卖淫等现象已经统统消失,所以男人也不可能再占据统治地位了。另一方面,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变也将消除婚姻生活中的许多障碍和干扰,这些障碍和干扰今天仍然影响着婚姻生活,使其无法维持下去。

当今妇女所遇到的重重障碍、矛盾和违反自然的现象,越来越被广大公众所认识,而且这方面的情况无论在社会学著作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表现得十分生动,不过人们常常采用不恰当的表达方式。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能否认,当今的婚姻和婚姻的目的是不相适应的,因此,我们对那些认为恋爱自由和离婚自由是天经地义的,而又不主张改变现存社会状况的人,自然不需要感到惊异了;这些人认为,两性的交往自由仅仅属于特权阶级。马蒂尔德·莱希哈尔特-施特罗姆贝格在同主张妇女解放的女作家范妮·勒瓦尔德进行辩论时,写过一篇文章^①,其中就是这样写的:

① 指《妇女的权利和义务。对范妮·勒瓦尔德的书信〈支持和反对妇女〉的答复。》——倍倍尔注

“假如您(指范妮·勒瓦尔德)要求妇女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同男人完全平等,那么,乔治·桑在为争取妇女解放所做出的努力也必定是正确的,因为她竭力追求的无非是男人长期以来绝对占有的东西。为什么只让妇女在理智上平等,而不许她们在感情上也平等,为什么妇女不能象男人一样,自由地爱人和自由地被人爱,这方面确实找不出任何合乎理性的原因。然而,如果妇女按其天性应有最充分地发挥聪明才智的权利与义务——我们不应当埋没我们的这些天才——,以便同异性在智力方面展开竞争,那么,她们同样也应当有激发感情冲动的权利,以使用适当的方式保持理智和感情的平衡。这里,我们以歌德这位最伟大的人物来作例证,他经常地、一再地把自己炽热的感情和发自伟大心灵的爱慕倾注给各种各样的妇女,然而我们读了这一切却没有产生一点点道德上的反感。明智的人把这些看作理所当然,因为歌德具有难以满足的伟大心灵,只有狭隘的道德说教者才对此持谴责态度。可您为什么要讥笑妇女心目中的“伟大人物”!……我们假定,所有的妇女个个都是乔治·桑那样的伟大女杰;所有的妇女都象卢克勒蒂·弗洛里安妮一样,她们所有的孩子都是同情夫所生之子,在这些孩子身上她们不仅倾注了全部纯真的母爱和心血,而且还以智慧和理智培育孩子们成长,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是怎样的呢?勿庸置疑,那时的世界同今天的世界一样,照样存在,照样进步,也许还会更加美好。”

但是,为什么只有“伟大人物”才可以这么做,而那些不是“伟大人物”的人就不能这样做呢?假如歌德和乔治·桑——象他们俩那样做过的和正在那样做的人是很多的,我们只不过选择了他们两个人——可以随意流露自己的感情,尤其是描写歌德爱情生活的书大量出版,崇敬歌德的男男女女的读者又都是虔诚而狂喜地一口气把这些书读完的,那么,为什么歌德和乔治·桑这样做就

博得狂热的赞美，而其他他人这样做就遭到非难，就有人如此大惊小怪呢？

的确，在资产阶级社会是不可能实现恋爱自由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有所论述。不过，只有在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类似今天上等人在物质上、精神上所享受到的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才能得到恋爱自由。乔治·桑在她的《雅克》一书中描写一个男人，对他的妻子同别人通奸的事，得出了这样的评论：“没有一个人可以驾御爱情，爱或者不爱完全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使妇女卑贱的是欺骗；通奸的构成不在于她委身于情夫之时，而在于她后来同丈夫的共眠之夜。”基于这一观点，雅克认为，把自己的位置让给情敌薄勒尔是他的义务，他还从哲理上对这件事做出推论：“薄勒尔假如处在我的地位，他一定会心安理得地殴打他的妻子，然后就去拥抱遭到他殴打又受过他亲吻的、被别人污辱的妻子，而绝不脸红。”还有一些男人，按照东方的习俗，干脆杀死自己不忠的妻子，因为他们把妻子看作是自己法定的财产。也有一些人则同情敌决斗，杀死他或战胜他，然后向他们自己认定所爱的女人要求亲吻，要求爱抚，这时妇女要么惶恐地逃跑，要么就无可奈何地顺从。一般说来，这也是夫妇生活中通常采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我看来，猪的爱情方式也不会象这些人那么卑劣，那么粗暴。”^①勃兰德斯在这里还说：“今天，在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看来，这是尽人皆知的真理，而在50年前，它却被人看成是大逆不道。”但是，那些“有财产，又有教养的人”至今仍然没有勇气公开承认乔治·桑提出的原则，尽管他们事实上是按照那些原则生活的。这些人同他们在道德和宗教方面是虚伪的一样，在婚姻方面也是伪君子。

如今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做歌德和乔治·桑做过的事，虽然这

^① 见乔治·勃兰德斯：《19世纪的文学》莱比锡1883年版第5卷。——倍倍尔注

些人的作为不能同歌德和乔治·桑的相提并论,但是,却丝毫没有在社会上失去尊严。人们只要有显赫的地位,就可以为所欲为。不过,从资产阶级的道德观点来看,歌德和乔治·桑的自由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破坏了社会所规定的道德准则,触犯了今天社会制度的本质。强制婚姻在资产阶级社会是正常的婚姻,是唯一的“道德的”两性结合,任何其他的性结合都是不道德的。我们已经确凿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婚姻是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结果,因为它是同私有制和继承权紧密相关的,所以,这种婚姻不过是为了能有“合法的”继承人罢了。这种婚姻在社会制度的压力下,即使没有任何财产可继承,也要受到强制^①。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法规,违反这一法规,不论男女,只要他们私通或离婚都将受到国家监禁的处罚。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除了把个人和家庭的日常用品可以看成遗产外,没有其他任何可以继承的物品。就从这一点上看,今天的婚姻形式也将会消失,同时,继承权问题也将随之解决:社会主义甚至没有必要去废除继承权,因为私有制已不复存在。就是说,妇女自由了,她们的孩子只会给她们增添生活的乐趣,却不会妨碍她们的自由。她们一旦需要帮助,那么,保育员、教师、女朋友和年青的姑娘都会成为她们的帮手。

将来,也许会有一些男人讲出类似A·胡姆波尔特讲过的话:“我并非为了当一家之主而生。在我看来,结婚是一种罪恶,生孩子则是一种犯罪行为。”这是什么意思呢?自然本能的支配力会在

① 谢夫莱博士在他的《社会形体的建造与生活》一书中提出:“由于离婚容易,而使婚姻关系疏松的确不是好事,它违反人类联姻的道德使命,既不利于保持人口,也不利于教育子女。”根据上面所述,我们认为这些观点不但是错误的,甚至应当认为是“不道德”的。谢夫莱博士也承认,在文明程度远比当今的违反道德观念的制度更高级的社会中,实现或坚持上述观点都是不可能的。——倍倍尔注

其他人那里得到平衡。不论胡姆波尔特的敌视婚姻，还是叔本华、麦兰德尔或冯·哈特曼的哲学悲观主义都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认为，在“理想国”中，人类将自行灭亡。这里，我们同意拉策尔的观点，他非常公正地写道：“人类已不再把自己看作是超脱自然规律之外的，人类终于开始寻找自己的行为 and 思想中合乎规律的东西，并且竭力使自己的生活符合自然规律。人类同自己的同类已经不是依据几个世纪形成的原则，而是依据对自然认识的理性原则去安排他们的共同生活，也就是建立家庭和国家。迄今仍由一切可能的来源所维持的政治、道德和法律的原则，将来只能依据自然法则重新改造。人类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人的尊严终将成为现实。”^①

这个时代很快就会到来。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各个发展阶段，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走向能够使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所有制、完全的平等和博爱的境界，不过，这一切已不再仅仅为了上等人，而是为了整个人类。这是人类社会的伟大进步。资产阶级社会无法实现的、过去未能做到的、将来也不可能做到的就是建立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一点将由社会主义来实现。资产阶级社会只是提出了理论，而实践，象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同理论是背道而驰的。社会主义将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

但是，当人类返回到自己发展的起点时，它已经处在比原来的起点更为高级的文明阶段上，完成了这一切。如果说原始社会在氏族和部落中还有公有制的话，那也仅仅是最原始的形式和处于不发达阶段。自那时以来所完成的发展过程使公有制消亡到只有一部分，而且是无足轻重的残余，氏族也解体了，最后，整个社会也分成许多个体，但是，在各个不同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

^① 引自海克尔斯编写的《自然造物史》第4版。——倍倍尔注

生产力，满足了多方面的需要，各民族和部落组成了国家和较大的联邦。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种状况，即随着社会提出的各种需要而产生的尖锐矛盾。将来的任务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把财产和劳动资料重新变为公有，以解决这些矛盾。

社会将收回原本为它所占有并且由它创造的东西，社会可以使所有的人按照重新创造的生活条件在更高级的文明阶段生活，也就是说，社会将把在原始状态下，只有个别人和个别阶级才有的特权提供给一切人。今天，妇女又重新发挥她们从前在原始社会发挥过的那种积极作用，不过她们已不是作为女主人，而是作为同男人有平等权利的人发挥着作用。

巴霍芬^①在他的《母权论》一书中写道：“国家发展的终点正是人类生存的起点。原始的平等又重新再现。”“人类社会的循环是以母权的物质生活开始，又以母权的物质生活而告终。”摩尔根^②对这一点写道：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健全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象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

① 约翰·雅科布·巴霍芬(1815—1887)——杰出的瑞士历史学家和法学家。——编者注

②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1818—1881)——著名的美国学者、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编者注

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

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①

这样，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人，依据他们各自的科学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妇女完全解放、男女完全平等是我们文明发展的目的之一，地球上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止这一目的的实现。但是，这一目的只能在消灭人统治人，也就是消灭资本家统治工人的变革中才能实现。只有那个时候，人类才能获得最充分的发展。人们几千年来所梦想和渴望的“黄金时代”终将到来。阶级统治将永远消亡，而男人对妇女的统治必将随之告终。

第29章(略)

第30章 人口问题与社会主义

一、可怕的人口过剩

有人把人口过剩问题看成是一切问题中最重要和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据说“人口过剩”的确是一种威胁，实际上，目前也确实存在着人口过剩问题。这个问题必须从全球观点出发进行专门的研究，因为人民的供养和人口的分布日益成为国际性问题。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4页。——编者注

马尔萨斯^①提出人口规律问题以来,人们对此有过很多争论。马尔萨斯在他著名的,同时又是声名狼藉的,卡尔·马克思称之为不过是对“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②、唐森^③、富兰克林^④、华莱士^⑤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是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⑥的著作《人口原理》中说,人类是按着几何级数增长(即1,2,4,8,16,32……),而粮食却按着算术级数增长(即1,2,3,4,5……)。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人口的数量和粮食的储备量之间将很快比例失调,其结果将最终导致大批人口死于饥荒。因此,必须提倡“节欲”,控制生育。没有足够的财产养活家庭的人不准结婚,否则,他的后代将因此而“自然的餐桌”上没有席位。

人口过剩的威胁已经不是新问题了。正如本书前面所述,早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以及在中世纪末期就曾出现过这种威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罗马人以及中世纪的小市民都遭受过它的可怕袭击,深受其害的伏尔泰在18世纪初就曾撰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后来仿效他的还有许多作家,一直到马尔萨斯,后者最确切地表述了人口过剩的危险。

人口过剩的威胁往往发生在现存社会制度处于崩溃的时期。

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资产阶级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编者注

② 詹姆斯·斯图亚特(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编者注

③ 约瑟夫·唐森(1739—1816)——英国教士,鼓吹反科学的人口论。——编者注

④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杰出的美国社会活动家、外交家、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最先有意识地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编者注

⑤ 罗伯特·华莱士(1697—1771)——英国教士和统计学家,鼓吹反科学的人口论。——编者注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6页。——编者注

人们把这个时期出现的普遍不满，首先归咎于人口过剩和生活资料短缺，而并没有考虑到如何增加粮食产量和如何分配粮食。

人剥削人的基础是阶级统治，而阶级统治最初的和最主要的手段是抢占土地。土地逐渐地由共同占有变为私人占有。多数人因此成为无产者，他们为了糊口又不得不替有产者效力。在这种种情况下，家庭每增添一口人，或者说来个新的争吃争喝的人都势必成为沉重的负担。一个人口过剩的幽灵出现了，它到处散发着恐怖气息，看吧，土地越来越被垄断，由于没有深耕细作，或者由于良田变成了牧场、变成了供老爷们娱乐的狩猎场而使土地失去了生产效率，就这样土地再也不能为人们提供粮食了。在罗马和意大利，当土地集中在大约3000名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时，粮食便开始严重匮乏。因此，有人惊恐地呼喊：大地产在毁灭罗马。意大利的土地不是变成供豪门贵族娱乐的巨大的狩猎场和公园，便是一片荒地，因为从非洲和西西里岛输入粮食比用奴隶耕田更加便宜。这种形势为谷物高利贷者提供了有利可图的良机。而罗马的财主们又争先恐后地加入了粮商的行列。这就是当地土地荒芜的主要原因。土地占有者从谷物高利贷中比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粮食获利更多。

面对上述情况，罗马市民或不富裕的贵族都逃避结婚，也不愿生育子女，尽管采取一定的奖励办法，鼓励结婚和生育，以防止统治阶级的人口下降，但完全无济于事。

中世纪末，由于几百年来贵族和僧侣采用各种阴谋手段及暴力掠夺农民的财产，把公用土地攫为己有，也发生过类似上面所说的现象。农民不堪忍受残酷的虐待而奋起反抗，但最终遭到镇压。这样一来，反而使贵族的掠夺行径更加变本加厉，新教改革派的王公贵族也随之而来，把教会的财产攫为己有。因此强盗、乞丐和流浪者的人数空前骤增。宗教改革以后，他们的人数之多竟难以计

算。被掠夺了土地的农村人口潮水般地涌向城市。但是，从上面所提到的原因中可以看出，城市的生活状况也日益恶化，“人口过剩”就是这样到处蔓延。

马尔萨斯正是在英国工业发展时期出现的，当时由于哈格里沃斯^①、阿克莱^②和瓦特^③的新发明，使机械制造业和技术的提高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些变革主要对纺纱业和亚麻业影响最大，并使在与家庭工业有关部门劳动的几十万工人频于失业。英国在这个时期，土地高度集中，大工业迅速发展，出现了势不可挡的局面。一方面是某些人大发横财，另一方面是广大群众饥寒交迫。本来，资产阶级理直气壮地把现存社会看作完美无缺的社会，但是现在他们必须对诸如处于财富迅猛增长、工业高度发达时期的人民大众却一贫如洗等矛盾现象作出令人信服，又能推卸责任的解释。于是，他们就把这种矛盾现象归罪于劳动者生育子女过多，而并不归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土地高度集中在大地主手里而造成的劳动者过剩。这种解释无论如何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尔萨斯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④一书为现存弊端提出了论证，它正好表达了统治阶级内心的想法和愿望，为当时的社会弊端找到了并公开陈述了理由。马尔萨斯的主张一方面受到空前的欢迎，另一方面也遭到尖锐的抨击。马尔萨斯在关键时刻说出了英国资产阶级想要说的话，所以，尽管他的著作“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⑤，但是，他本人却成了一个遐迹

① 詹姆斯·哈格里沃斯(死于1778年)——著名的英国发明家。——编者注

② 理查·阿克莱(1732—1792)——产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企业家，占有不少他人在英国的发明权。——编者注

③ 詹姆斯·瓦特(1736—1819)——杰出的英国发明家，万能蒸汽机的设计者。——编者注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6页。——编者注

⑤ 同上书。——编者注

闻名的人物，他的名字成了人口学说的代名词^①。

二、人口过剩的形成

马尔萨斯对劳动阶级发出了紧急呼叫，提出了残酷无情的理论，他又是遗憾，又是冷嘲热讽，这种状况从那时起，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不仅在马尔萨斯的祖国——大不列颠，而且在世界所有国家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行土地掠夺制和使群众受机器和工厂的奴役。其结果象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制度使工人同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分离，土地、工具和资金全部由资本家操纵。同时，这种制度还不断地建立新的产业部门，使这些部门不断发展和集中。与此同时，又经常把人民群众抛向街头，使他们成为“过剩”者。象在古罗马一样，土地掠夺制把大地产全部集中到拥护自己的人的手里。爱尔兰是欧洲的古老国家，受英国掠夺制度的侵害最为严重。1874年，爱尔兰拥有12,378,244英亩草地和牧场，但却只有3,373,508英亩耕地，人口逐年减少，耕地又逐渐变成地主饲养牛羊的草地，变成牧场和大地主狩猎的场所。^{②③}1908年，那

① 达尔文和其他学者也都曾支持过马尔萨斯的观点，这一点表明，缺乏经济学知识会在自然科学领域形成极为片面的观点。——倍倍尔注

②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在一首令人惊心动魄的名为《爱尔兰》的诗歌中是这样描绘的：

是地主要他的农民
精心照料鹿和牛，
去养肥它们，任大地干枯。
您明白了吧，这就是爱尔兰的泥土！
是地主要土地荒芜
五谷原本在沃土上飞舞，
而今那是水鸡、水鸟、野鸭栖身之处。
啊！上帝诅咒吧
千百万良田变成了沼泽和荒土！

——倍倍尔注

③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德国著名诗人。起初为浪漫主义

里有草地和牧场14,805,046英亩,耕地2,328,906英亩。此外,爱尔兰的大部分土地都是租给无力使用现代耕作手段的小佃农和非常小的佃农。这样爱尔兰就从一个农业国变为一个经营畜牧业的国家。因此,19世纪初,拥有8百万人口的爱尔兰如今下降到430万人,即便如此,仍有几百万“过剩”的人口。所以,爱尔兰人奋起反抗英国就不言自明了。英格兰土地占有和土地耕种情况同爱尔兰的情况非常相似^④。最近几十年来,在进入现代化发展时期的匈牙利也有类似现象。匈牙利是欧洲为数不多的一个拥有沃土良田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负债累累,人民贫困不堪,高利贷者主宰了国家的命运。大批居民由于绝望,流落异国他乡。土地完全集中在一批现代的大地主手里,他们采用最卑劣的手段掠夺林业和农业资源,致使匈牙利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不能出口粮食的国家。意大利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意大利同在德国一样,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皮蒙特、伦巴尔、托斯卡纳、罗马尼阿地区和西西里岛的勤劳的农民却越来越贫穷,甚至濒临死亡。几十年前的小农精心种植的果园和农田如今又重新变成了沼泽和荒地。罗马城门前那块被称之为坎帕纳的地方有几十万公顷的土地被荒废,而这个地方是古罗马时期最繁华的一

诗人,后成为革命诗人,181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至60年代为银行伦敦分行职员,50年代后半期脱离革命斗争。——编者注

- ④ “包括苏格兰某些最肥沃的地区在内的200万英亩土地完全变成了荒地。格伦-提尔特的野草是佩特郡最富于营养的牧草之一;本-奥尔德的鹿林曾是巴登诺克广大地区内的最好的草地;布拉克山森林的一部分曾是苏格兰最适宜放牧黑脸羊的牧场。为了狩猎爱好而变成荒野的土地面积,比整个佩特郡的面积还要广阔得多,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出,这种荒野的面积究竟有多大了。本-奥尔德森的土地可以养活15000只羊,而这个森林的面积不过只占苏格兰全部猎区的1/30……所有这些猎场都完全是非生产的……结果等于是沉到了北海海底一样。”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02页。——倍倍尔注

个地区。沼泽复盖着土地，散发出有毒的瘴气。假如采取适当的方法，彻底改造沼泽地，排出污水，修建灌溉设备，那么，罗马的市民就可以得到丰富的食品 and 幸福的源泉。但是意大利当局却攫取强权、野心勃勃，由于国家管理混乱，一味热中于军事装备和海上武装，致使“殖民地”人民陷入了悲惨境地，因此，他们对于解决类似把坎帕纳重新开垦为肥沃地区的文明事业则一筹莫展。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也同样存在着坎帕纳那样的状况。从前堪称罗马粮仓的西西里岛，如今则一贫如洗。在整个欧洲，没有比意大利的人民更受压榨、更加贫困、更遭受苦难的了。欧洲最美丽的国家的一些安分守己的子弟跑遍半个欧洲和半个美洲，去那里充当廉价的劳动力，或者结伙永久移居异国，因为他们在故土一无所有，他们不想饿死在家乡。疟疾这个可怕的热病蔓延整个意大利。1882年，惊恐万状的政府不得不对此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可怕地表明，意大利69个州中有32个州疟疾病害严重，32个州受到了传染，只有5个州未受侵害。这种疾病过去只在农村流行，现在已经浸入到了城市，这是因为大批的农村人口拥进城市，使城市无产者骤增，密集的人口成了传染疾病的病源。

三、贫穷与繁殖力

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观察，我们都可以发现，广大群众的贫穷和悲惨生活不是由于粮食和生活资料短缺，而是由于不合理地分配粮食和生活资料，也就是由于不合理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使一部分人分配过多，使另一部分人又分配过少。马尔萨斯的主张仅仅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出发才有意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迫使人们多生孩子；因为资本家的工厂和作坊需要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在无产者看来，多生一些孩子似乎也划得来，因为他们必须挣钱养家糊口。从事家庭

工业的无产者甚至不得不生育很多孩子，那样才能使竞争能力有所保障。这确实是一种可怕的制度，它加剧了工人的贫困化和对雇主的依赖性。无产者被迫为挣到少得可怜的工钱而拼命劳动。由于经营家庭工业的企业家不必履行任何劳动保护条例，他也不必为这种或那种社会义务支付额外的款项，这就使他扩大了自己经营的家庭工业范围，因为这种企业给他带来了采用其他企业形式难以得到的好处，当然，根据生产过程的特性，如果又具备发展家庭工业条件的話。

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不仅造成了商品和劳动力的过剩，而且也使知识分子过剩，致使知识分子终于因为供过于求而难以找到工作。在资本主义世界，只有一种东西不过剩，那就是资本和资本的占有者，即资本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出发信仰马尔萨斯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不应该用这些资产阶级的奇谈怪论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约翰·斯图加特·穆勒^①说过：“可以预料，共产主义将会出现，并公开声明强烈反对利己的无节制状况及有关的社会舆论。任何会改变人民舒适的环境，或者强化人民劳动强度的人口增长必定给集团中的每一个人带来直接和明显的不良后果，我们不应当把这一不良后果归罪于雇主利欲薰心，或者富人的不平等的特权。在发生如此变化的情况下，社会舆论提倡控制人口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舆论难以奏效，那就对这样或那样的对社会有害的无节制行为给以某种惩罚。但是，无论如何不能采取特殊的方式指责，是共产主义理论造成了人口过剩的危险。相反，恰恰是共产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防止这一灾难的倾向”。阿道夫·瓦格纳^②教授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76页上是这样

^①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摹仿者，詹姆斯·穆勒之子。——编者注

写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原则上也不会准许结婚自由或生育自由。”可见这两位经济学家都认为，人口过剩是一切社会状态所固有的，但他们两人也确信，社会主义比其他任何社会形态都更能使人口和粮食的相互关系趋于平衡。这一看法是正确的，而前一种看法则是不正确的。

当然，也确有某些社会主义者受了马尔萨斯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人口过剩的危机已“迫在眉睫”。但是，现在这些信仰马尔萨斯的社会主义者已经销声匿迹，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深刻认识使他们改变了看法。地主们怨声载道，说我们生产的食品太多，当然这是从世界的角度看，从而造成了价格下跌，致使他们无利可图，这种抱怨也使我们大受裨益。

马尔萨斯主义者凭空臆想，资产阶级代言人纠集的合唱队毫无头脑，只知道随声附和，叫嚷什么可以自由恋爱，人家都能象人一样生活的社会主义会成为一个“兔子窝”；在那里淫欲无度，人口会大量繁殖。然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迄今，子女平均数量最多的不是生活境况良好的阶层，而是处境贫困的阶层，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产者的状况越贫穷，他们子女的平均数越多；当然也不能排除个别情况。微耳和也证实了这一论断，他在上个世纪中叶曾经写道：“英国工人酗酒无度，颓废无知，他们仅仅知道两种享受：饮酒和性交，同他们一样，上西里西亚的居民近几年也把一切愿望，一切追求集中到这两件事情上面了。狂饮烧酒和满足性欲成了他们的第一需要，所以，人口飞速增长，但是人的肉体和精神状况则明显地退化了。”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类似的叙述，他写道：“实际上，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

② 阿道夫·瓦格纳（1835—1917）——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社会法律学派的代表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编者注

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规律,在野蛮人中间,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间,听起来会是荒谬的。它使人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① 马克思接着引用了兰格^②的话:“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舒适安乐的环境中,那么世界上很快就会荒芜人烟。”^③ 可见兰格同马尔萨斯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认为,优越的生活状况不会增加出生率,只会减少出生率。赫伯特·斯宾塞也有同样观点,他说:“不论何时何地,优越的环境和繁殖的能力都是成反比例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类不断进步发展似乎将减少人的繁殖。”可以说,持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在这一点上是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的,我们也同意他们的看法。

四、人口减少与食品过剩(略)

五、社会状况与人口增长能力

.....

将来,在人口问题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包括我们所有妇女在内,所有的人都将获得更高级、更自由的地位。有学识的和有才干的妇女(不包括少数例外)一般说来并不情愿把自己的一生消磨在“上帝的恩赐”——孩子们身上,也不情愿把宝贵年华耗费在妊娠或哺乳子女上面。现在,大多数妇女都不愿意有过多的子女,将来,尽管社会主义社会对妊娠妇女和母亲关怀倍至,可她们反对多产的情绪肯定会有增无减。我们认为,很可能社会主义社会人口的增长要比资产阶级社会的人口增长得缓慢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5—706页。——编者注

② 赛米尔·兰格(1810—1897)——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自由党人。——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6页。——编者注

我们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似乎没有理由为将来的人口增长而大伤脑筋。迄今只有因人口减少而灭亡的民族，却从来没有因人口增长而使民族灭亡的先例。总之，在按照自然规律生活的社会里，对人口增长的调节不必采用有害的节制手段，也不需要采用违反自然的手段加以防范。卡尔·马克思在这方面对于未来作了明确的论述：他认为，每一个经济发展时期都有其特殊的人口规律，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统治时期也会得到证实。

H·费尔迪在他的题为《人工节育》一书中曾写道：“社会民主党反对马尔萨斯主义是一个大骗局。人口大幅度增长加速了群众的贫困化，进而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假如能够制止人口过剩，那么，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扩张，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连同它一切美好前景就会永远消亡。这里我们除了有许多旧的武器之外，还有致社会民主党于死地的新武器，那就是马尔萨斯主义”^①。

有些人担心人口过剩，因此要求对工人的婚姻自由和居住自由特别加以限制。阿道夫·瓦格纳教授也是其中之一，他抱怨说，同中等阶级相比，工人总是早婚。同其他持有这些看法的人一样，他忽略了中等阶级的男人要在一定的年龄，获得独立生活的地位以后，他们才能操办符合他们身份的婚事。但是，未结婚以前，他们是靠卖淫制度来满足自己的性欲。如果有人对工人的婚姻加以刁难，那也会把他们推到这条路上去。但是到那时，可不要对这种

^① 社会主义者的死敌费尔迪对社会民主党一无所知，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著作的第40页上的一段论述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写道：“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相比，社会民主党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社会民主党要求，每个工人生育孩子的数目要根据社会提供粮食的状况，并以此为前提来确定最低工资……一旦社会民主党作出了最后结论并废除了私有制，那时头脑最简单的人也会提出：我为什么就应该拖长时间干又苦又累的活呢？难道说仅仅因为我的邻居给社会增添了一打新公民吗？”既然敢于描写社会主义，最好还是先弄清楚社会主义ABC，以免说出这些蠢话。——倍倍尔注

结果发出抱怨，也不要唱什么“丧失了伦理道德”的高调，如果男人和女人——女人同男人一样也有性冲动——非法同居，以满足各自的需求，并使城市和农村充满了非婚子女，即“私生子”，那可不要愤世嫉俗。不过瓦格纳和他的同行的观点是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我们的经济发展相矛盾的。因为资产阶级需要尽可能多的人手，以便在世界市场上充实一些有竞争能力的劳动力。用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又来自市侩和落后的说教是不能医治时代的弊病的。在20世纪初，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无力制止和阻挠社会的自然发展。一切此类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发展的潮流如此汹涌澎湃，它将冲破一切淤泥暗礁。我们的口号不是后退，而是前进。有人以为可以阻挡发展的潮流，那纯粹是自欺欺人。

人类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当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并可以驾驭自然的时候，才会有意识地发展自己。人类在迄今为止的一切时代里，无论在生产和分配方面，还是在人口增加方面都对发展的规律没有认识，也就是说，它的行动是无意识的。在新社会，由于人类认识了自身和发展的规律，其行动也将是有意识的和有计划的。

社会主义是适用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的科学。

结 束 语

从我们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实现社会主义时，问题不在于任意破坏和任意建设，而在于自然历史的演变。一切因素，也就是—方面在破坏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在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都将产生它必定要产生的影响。不论“天才的国务活动家”，还是“煽动群众的鼓动家”都不能任凭自己的意志领导事物。“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推动者，实际上他们自己是在被推动

着”。但是“成功的时刻”已为时不远。

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不止一次地谈到引起各种危机的商品过剩，这是一种以往任何一个发展时期不曾有过的，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现象。

资产阶级社会不仅造成商品和工人过剩，而且使知识分子也过剩。德国是在整个社会发展阶段造成知识分子过剩的典型国家。资产阶级社会也不懂得应当重用知识分子，让他们在重要岗位发挥作用。几个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发展中的不幸状态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许多小邦各自为政的政治体制阻碍了大资本的发展。小邦林立的现象使整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五花八门并造成许多对整体产生影响的精神生活的小中心。同统一的中央政府相比，许多小邦尤其要有庞大的，其成员又必须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吏机构。于是出现了大批的高等学校和大学，而这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是不曾有过的。各邦政府之间的妒嫉和虚荣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某些政府开始实行国民义务教育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不甘落后于邻邦的努力产生了良好的结果。由于资产阶级物质的蓬勃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又促使人们要求参与人民代议制和地方自治的政治生活，因而对知识分子的需求就增长起来。这都是一些小邦和小地区的同业公会，不过所有这些却促使上层阶级的子弟竭力在其中占据一个位置，并为他们创办教育，以适应这一要求。

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科学方面，而且也反映在艺术方面，欧洲还没有一个国家象德国有那么多的美术、艺术和技术学校、博物馆和艺术收藏品。其他国家仅仅在其首都可以炫耀一下艺术珍品，但是，德国的艺术珍品则遍布整个帝国。在艺术方面能与德国相比美的只有意大利。

整个科学艺术的发展对德国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没有人的政治斗争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去思索生活。当别的国家热衷于争夺世界市场，瓜分世界，进行国内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时，德国人则深居田园过着梦幻般的和思辨哲理的生活。但是，要沉湎于田园生活，要想专心致志的努力，就需要必要的客观条件，良好的环境有利于德国去幻想，去思索、去用哲理的头脑观察事物，因此造就了他们敏锐而审慎的智力才能，他们一旦醒悟过来，这种才能就开始显露锋芒。

英国资产阶级在17世纪中叶、法国资产阶级在18世纪末叶就已经能够对国家发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德国资产阶级只是在1848年才能对国家政权施加微弱的影响。不过，德国资产阶级正是在1848年这一年成为代表自由主义的自觉的阶级；今天，它已经作为独立的政党登上了舞台。这些都表现出德国发展的特殊性。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工厂主、商人、贸易家和金融家，而主要是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大人物、教授、作家、法学家和大学各系的博士。他们都是德国的思想家，他们正是本着这种观点来发表自己的著作的。1848年以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暂时沉默；但是，它充分利用了50年代政治上死一般沉寂的时期，扎扎实实地发展了自己从事的事业。奥意战争爆发和普鲁士开始摄政都促使资产阶级重新把手伸向政权。于是，民族统一运动开始兴起。这时资产阶级得到了充分地发展，进而它已经不能容忍国内的许多小邦在政治上，同时也有经济上的各种限制长期存在下去了。它于是装出一付要革命的姿态。冯·俾斯麦先生看清了这种形势，并且要弄手腕，利用这一局势使资产阶级和普鲁士王朝言归于好，握手言和，本来资产阶级对普鲁士王朝就不曾有过敌意，因为它惧怕革命和群众。最后，阻碍资产阶级物质发展的种种限制统统被取消，致使资产阶级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占有了德国的财富，如煤矿和金属矿，同时还控制了有知识又容易满足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就这

样获得了如此突飞猛进的发展。除美国外，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条件下都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德国因此很快成为欧洲名列第二的工业和贸易大国，并力争名列首位。

不过，物质上的这种迅猛发展也有不利的一面。在德国统一以前，德意志各邦都实行封锁制，至今仍存在着无以数计的手工业和小农阶层。他们由于一切保护层被突然冲破，而一下子暴露在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面前。这种状况使他们陷入了绝望的境地。70年代初，正是繁荣兴旺时期，因此，这一危险起初表现得还不十分明显，但是，当人们感觉到危险的存在，危机也就随之爆发出来。资产阶级充分利用了这段繁荣时期大力发展自己。目前，由于大规模的生产，资产阶级的压榨比过去残酷10倍。从此，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急骤加深。这一解体和吞并过程一方面使物质的力量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又使反抗的力量减弱，它使整个阶级陷入愈加贫困的境地。他们看到，他们的生活处境越来越险恶，并且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

在这场绝望的斗争中，很多人想方设法改变职业，寻求生路。老年人对改变职业已经无能为力，同时又没有财产留给子女，于是，他们就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子女安插一个既不需要经营资本，又有固定收入的工作。这一类工作包括为帝国、联邦政府和行政机构服务的官吏；教育、邮政和铁路部门的职员；还有为资产阶级效劳的高级职员以及事务所、货栈、工厂的办事员、保管员、化学家、技师、工程师和造船技师等等，后来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诸如律师、医生、神职工作者、作家、艺术家、建筑家、男女教师等等。

从前，成千上万从事某种手工劳动的人，如今也都因为无法自立和维持小康生活而想在上述职业中寻找一个位置。所有的人都

争先恐后地接受高等教育和深造。实科中学、文科中学、各种工艺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而且各校的学生全部超额；同样，在大学里的大学生、在化学和物理实验室里的见习生、在艺术学校、工业学校和商业学校以及各种各样的女子高等进修学校里的学生的人数也都在大量增加。各专业学校无一例外都达到了完全饱和的状态，但涌向学校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因此，人们强烈要求，新建文科中学和高等进修学校，以便使所有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都能就学。当局和私人一再呼吁，因为他们时而要求进入这一专业的学习，时而又要求进入另一专业学习。甚至几十年前由于缺少报考者而濒于消亡的神学专业也出现了人满为患，不得不扩大牧师的编制。“只要给我一个可以谋生的位置，上帝教我，还是魔鬼教我，我都会五体投地。”这就是来自各地的呼声。然而教育大臣一直反对新建高等学校，“因为现有的学校已完全可以容纳各专业的报考者。”

资产阶级彼此间的竞争和你死我活的斗争迫使他们的大批子弟谋取一定的社会地位，这样，就更加剧了这一事态的发展。另外，大批军官由于长期处于和平状态难以晋升，他们之中的多数人还在壮年就解甲归田，而国家又要帮助他们在各种行政部门寻找职位。下级军官中一大批文官候选人又争夺其他阶层的饭碗。此外，帝国、联邦政府和各级行政部门的一大批官员都在对他们的子弟进行就职教育，而且非进行这种教育不可。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教育水平和需求，不允许他们的子女去从事所谓低级的、并且也存在着人满之患的职业。

一年义务兵役制(服役期限在达到一定教育程度，并在物质上作出某种牺牲的情况下，可以从两年或三年缩短为一年)进一步使各种官职的候补人数猛增，特别是其中的许多富裕农民的子弟都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去继承父业。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德国的学者和艺术家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得多，而且他们都是无产者，即所谓的自由职业的无产阶级，他们同时还把对现状不满和人心浮动的情绪带进了上层社会。这些青年人对现行制度进行猛烈抨击，从而大大加速了普遍崩溃的进程。这样一来，现存的各种事物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和诋毁。

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未来的伟大斗争中担负起首要的领导责任。德国社会主义者发现了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并且科学地论证了未来的社会形式——社会主义。首先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斐迪南·拉萨尔通过鼓动，唤醒了群众的觉悟。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德国社会主义者，他们也都是各国工人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锋战士。

半个世纪前，布克尔^①在深入研究了德国的文化教育情况后写道：德国虽然有许多最伟大的思想家，但是，这里的学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却比任何国家的都大。今天看来，这种说法并非正确。而当科学活动仅限于在超越实际生活的学术界中进行时，情况确实如此。自从德国发生了经济革命以来，科学必须为实际生活服务。科学本身也成为实际的东西。人们认识到，只有当科学成为生活的手段，迫使资本主义大生产不断发展时，科学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因此，近儿十年来，德国的各门科学专业越来越得到普及。首先有一大批为从事高级职业而受过训练的青年人努力把科学知识传授给人民群众；其次，同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德国的普及教育水平比较高，从而使广大群众容易接受更多的人类精神产品。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通过文献、新闻报道、结社和集会、议

① 亨利·托马斯·布克尔（1821—1862）——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者；曾在其主要著作《英国文明史》中用唯心主义观点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编者注

会中的代表和利用所有这一切因素不断地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提出批评，所有这些都十分明显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知识水平。

就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78至1890年)也丝毫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只不过缩小了一点运动的活动范围，减缓了一点运动的发展速度。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反社会党人法又促使运动深入开展，使得反对统治阶级和反对国家专政的情绪更加激烈。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只是社会主义政党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和国民经济发展时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可见运动一直在勇往直前，即使在目前的条件下也仍然会勇往直前。

象在德国一样，社会主义运动近几十年来，在所有文明国家也都取得了巨大胜利，出席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就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明。

就这样，在各文明国家掀起了一场伟大的精神斗争，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除了社会科学外，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医学、历史和哲学等也都为这场斗争提供了武器。现存制度的基础遭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旧社会的支柱也受到了猛烈的打击。革命思想渗透到最保守的阶层，并使我们敌人的阵营发生了极大的混乱。手工业者、学者、农民、艺术家、商人和官吏，甚至工业家和银行家，总而言之，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对已成为为胜利而战和必将胜利的大军的工人深表同情，所有的人都在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一般说来妇女，特别是无产者妇女在这场争取解放和拯救妇女的斗争中是不甘落后的。她们一定会证明：她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在运动中、在争取美好未来的现实斗争中的真正地位，并决心参加斗争。男人必须消除对妇女的一切偏见，支持她们参加斗争。任何人都不应当低估自己的力量，不要以为个人无足轻重。在争取人类进步的斗争中，任何一种力量不论它是多么微小都是不可缺少的。不间断的滴水终究会穿透坚硬的石板。聚滴成溪，聚溪成

河，再聚河而成巨流。最后，任何阻力也不能抵挡奔腾的江河。人类的文化生活也是如此。凡是深感身负使命的人都会竭尽全力投身于这一斗争，并且必定取得最后的胜利。

任何人，只要他更加热情洋溢地、富于牺牲精神地沿着已经指明的道路前进，那他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尽管人们要作出牺牲和艰苦的努力，但是谁也不会为是否能够活着看到崭新的更加美好的文明时期的到来，是否能够享受胜利的果实而畏缩不前，也不会因此而放弃已经开辟的道路。当然，我们无法确定在争取最高目标的斗争中所必须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持续时间和性质。但是，如果我们对生活充满渴望，我们同样会满怀希望地去经历这一胜利。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说是一日千里、突飞猛进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使一切敌视新的高级社会制度的敌人发抖。

由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迅速发展和日益广泛地传播，新鲜事例层出不穷。一切领域都在动荡，都在前进。美好日子的曙光已冉冉升起。我们将不遗余力，奋勇向前，不必顾及“何时”，“何地”才会建立人类新的、美好时代的界标。如果我们在这场解放人类的伟大斗争中牺牲，那么，自有后来人接替我们继续战斗。我们深知，我们是尽了人的义务而牺牲的，也是怀着不论反对人类进步的势力如何抵制和反抗，目的定会达到的信念而牺牲的。

“未来属于社会主义，而首先属于工人和妇女”

译自《妇女和社会主义》1980年
波恩版第421—454页。

（葛 斯译）

答 复*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就抨击1880年3月2日
在帝国国会演说一事的表态

(1880年4月10日)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2号上,有一位“来自南德”的党内同志对我3月2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的演说进行了抨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在这次演说中还声明,社会民主党也要结成反对外来敌人的阵线,假如这种敌人真的进攻德国领土的话。

这一声明——再说绝不是郑重作出的,可是通过沃尔弗电报局热心传播以后,人们似乎竟然信以为真了——激起了这位南德同志的愤怒,他一定以为声明中有某些违反原则的东西。

现在,我要声明,就是在今天我也完全坚持我当时所说的话。假如有些同志认为我走得“太远”了,而我却发现很多人都认为完全有必要发表这个声明,解释我们的立场,以便抵制故意散布的谣言:即似乎不管任何外来势力抢夺了德国的部分领土,还是德国沦为异国统治,统统是无所谓的。照这位南德同志的意见,这种冷漠

* 这篇演说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法国或俄国进犯德国时,坚决反对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压迫,维护民族利益,主张爱国主义的立场。当时保守派议员F·冯·弗兰肯贝格引证倍倍尔支持巴黎公社,谴责吞并亚尔萨斯—洛林,说这是社会民主党对祖国的背叛。“来自南德”的一封信也对倍倍尔进行抨击,说“奴隶和被压迫者是没有祖国的……”倍倍尔针对这些攻击,在这篇演说中说明了无产阶级对祖国的阶级立场同无产阶级坚持国际主义原则的一致性。原载《社会民主党人报》1880年4月18日第16号。——编者注

的态度应当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唯一正确的策略。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的朋友就在有意扩散这种看法，而且取得了成效。但是，我却断然否认这种意见的正确性。

就爱国主义本身而言，我们并不反对它。然而，把爱国主义当成反对外来民族的挑唆手段、利用它大肆宣扬沙文主义、民族仇恨和民族虚荣，并借此肆意发动战争，这些战争会使人民感觉不到自己脖子上的枷锁，同时有人试图把人民的注意力从内部转移到外部，仅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持反对态度。爱国主义，即热爱人们在那里出生、受那里的风俗习惯和语言熏陶和教育的国家，一句话，热爱我们在上面生根开花的土地，社会民主党不仅不会抛弃这种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而且正是社会民主党时时刻刻大力宣传它，是社会民主党竭尽全力地同统治这块土地的制度作斗争，而置一切迫害于不顾，并向每一个想离开这块土地的人发出号召，‘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留在这里共同战斗吧，这里是我们为新时代、新世界而战斗和工作的土地。

这一简单的事实证明，尽管我们怀着世界公民的志向，然而我们对于这个国家——我们的家园不能无动于衷。如果说这是正确的，——我们为在自己的家园建立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从事的全部活动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南德的这位同志也无法否认，在我们看来，为了解放这块土地，首要的条件是，这块土地要归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所有，而不是拱手让给外来占领者。世界公民志向决定或者要求我们不可对祖国漠然视之；毋宁说这种志向决定了我们把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视为兄弟，假如那里的人民对我们也怀有同样的情谊的话。出于对一个恨我的人的兄弟之爱而让人杀死我，那简直同神经错乱相去无几了。

近10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不管统一的形式如何）对于经济的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何等重要。自1871年以来，是

什么促使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有了重大飞跃呢？这个飞跃使我们的敌人颤抖，使从前彼此争吵不休的议会党团最终实行合并。一句话，是环境的原因，也就是说，随着普法战争的结束，引起德国国家形态争执不休的祸根几乎不复存在了，因而相同的经济法最大限度地促进了同类型的经济发展。

假如来自南德的这位同志在运动方面比他现在表现的更老练、更有经验一点，那么，他也许会知道，1870年以前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爱森纳赫派之间主要争议之一，为什么就是对1866年事件及其后果的态度问题。不过，另外他也会明白，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场来自外国的进攻战中也应严守中立的看法，也就是社会民主党针对1870年事件所采取的立场，它已被公认为是极其荒谬的立场。1870年战争爆发时，在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没有人怀疑，面对向德国发动的进攻和掠夺战争，人们有责任为保卫国家的独立贡献一切。不过，当时对于这个问题也是众说纷纭，比如拿破仑第三正式宣布的这场战争是否真正是一场进攻和掠夺战争，是否更象是俾斯麦政策所希望和怂恿的战争。

后者是李卜克内西和我本人当时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所持的观点，我3月2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在这里受到了批评）再次坚持了这个观点。当时，我们据此发表声明说，虽然战争是拿破仑宣布的，但这场战争却是俾斯麦政策必然的和预期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对战争拨款投弃权票的原因。全德工人联合会当时的代表（施韦泽、哈森克莱维尔、弗里茨舍）坚决反对这一观点。他们声称，从德国方面来说，这场战争无疑是一场防御性的战争，因此，批准战争拨款就是义务，在这项义务面前，其他一切意见分歧统统应该放在一边；这样，他们当时投了赞成票。声明反对李卜克内西和我的意见的爱森纳赫派委员会（白拉克、施皮尔等人）也同意后一种意见，同这个委员会站在一边的还有一批委员。只是在推翻了拿破

仑,也就是所谓的和平破坏者消失了的时候,由于明目张胆宣传吞并亚尔萨斯—洛林的原因,而使防御战变成掠夺性战争的时候,才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重温社会民主党生活中的历史事件,也许会向南德的这位同志表明,他所要求的绝对中立,即使在一场真正向德国领土发动进攻的战争中,也比他设想的要困难得多,这是事物的本质决定的。

我还想对南德的这位同志多说两句。在他抨击我的观点中,他觉得应该引用凯泽尔的话,但正是这位凯泽尔同志在帝国国会马上发言,完全同意我的声明,因为这样一来就一劳永逸地结束了那些认为似乎德国社会民主党想把德国出卖给任何一个占领者的诽谤了。这位可尊敬的同志引证了哈赛尔曼的话,按照他迄今为止的全部观点,也同样是不会走运的;但是,假如他认为,应该把他无辜受到3个月的拘留作为对一位同志进行日光短浅的报复政策的起因,那是很可笑的,而这位同志迄今已有3年半被今天的制度关押着,而且照他看来这位同志确实也是无辜的。

我理解我们的同志们对我们的状况和我们所受的待遇满怀着仇恨和不满。我完全抱有同感,我恨不得在今天,而不是在明天就看到,这种卑鄙状况一下子寿终正寝。假如这位南德同志认为,敌人的入侵,或者国土的丧失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和最后胜利是无所谓的,甚至是无益的,那可就完全否认了历史的发展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了。各国人民的首要生活条件,就是其国家的独立。因此,国家的解放战争及由此形成的国家的独立,又是人民向更高一级的和独特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一场强加给德国、促使其为自己的国家独立而奋斗的战争,会聚集起大量的能量,面对这一目的,一切别的事情似乎都是次要的,而且任何政党都无法反对,或抱漠然视之的态度。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也是一位侨居

国外而大名鼎鼎的德国党内同志^①的观点。前不久，他写信给我说：“一场使德国不得不为其独立而战的欧洲战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可能遇到的大不幸，它可能使运动倒退20年”^②。

我认为，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生一场进攻战的情况下应该干什么，我们倒可以认真听听法国同志的意见。如果说，社会主义者一向有理由对某个制度不满，那么处在第三帝国统治下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正是如此。1870年，我们的法国同志同我们一样是坚决反对战争的；但是，由于战争，敌人践踏了他们的国家，使其面临丧失大片省份的危险时，全法国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声言这是统治阶级的事，而坚决劝阻人们参战。于是，大家都投入了战斗，直到战争结束。假如事关归还亚尔萨斯—洛林，来自南德的这位同志难道也认为，不管现在谁在法国执政，法国同志都要拒绝拿起武器吗？肯定不会！假如，举例来说，不论法国哪一届政府向莱茵河左岸——莱茵普法尔茨、科伦、科布伦茨、美因兹发起进攻；或者，俄国染指东部省份，他在那时也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可以而且应该刀枪入库坐视不救吗？难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信念就在于，放手让任何异己的、外国的势力欺侮德国、授予他们任意宰割德国的权利吗？我认为这位南德同志也许会敬谢不敏的。

人们以为遇到我时要指出，法国社会民主党同时也有以武装反对其内部敌人的需要，那么我的回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打算要干什么，或将要干什么，我没有作过预言。下面这种情况也许是这个制度——现在在德国正在庆祝它的辉煌胜利——好的一面，即它为了保护自身而不得不武装它内部的敌人和按照本质来说一定会变成敌人的人！未来将会对此作出判断的！

① 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原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08页。——编者注

万一在一次战斗中，为了德国的领土完整，人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连同本国卓越的行政体系——党的死敌都列在保护范围之内，这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很严峻的事；但是，社会民主党用外来占领者之手是消除不了统治体系和敌人的，因为外来占领者只会延长本地暴政的寿命，1813至1815年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而只能用自己对这个制度的帮助和推动来达到目的。因为这种制度目前占据统治地位，而最终它会激起群众的反抗。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要防止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身（可不是我们的敌人及其暂时性的制度）遭受分割和奴役；我们为使自己“成为战斗堡垒”并不是“为了在敌人面前保护我们强悍的警察和法官”，就像这位可敬的南德同志所讽刺的那样，而是为了腾出手来能同我们家里的敌人周旋到底。俄国的皇帝可能会带着他的军队驻在柏林，这对社会民主党的敌人来说是件惬意的事，但对社会民主党本身来说，则是件极不愉快的事，这样的时代说不定会来临。

我3月2日的演说，没有丝毫放弃我们的立场，因为我们在一场防御性战争中所保卫的不是我们的敌人及其制度，而是保卫我们自己和国家，我们打算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变革这个国家的制度，这个国家也是我们活动的唯一基地。只有出于愤慨（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形成的认识，才会把这样简单明了的观点说成是犯罪。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演说和著作选集》1978年柏林版第2卷第1分卷第91—96页。

（张念东译）

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使人充满热情*

(1886年2月3日)

……先生们！不管诸位对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作何种设想，诸位一定会向我承认，社会民主党是有某些要在国家和现实生活中实现的理想的。我可以明确地说，诸位是否赞同这些理想，完全是无所谓。也就是说，这些理想贯穿着这样的基本思想，即今天的社会状况虽然不是随心所欲制造出来的，但却是社会长期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它肯定会向另一个更高级的社会状况过渡，这是因为今天的这种状况必然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数不清的弊端。因此，我们打算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实行某种变革，要使全体居民有一个更高的生活享受，一个远比今天高得多的生活水准。诸位先生们！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一个追求这种理想的人——我看，每个稍微有一点心理学常识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没有像混日子的那种人的那些低级趣味的人。假如诸位到酒馆、舞厅以及所有的公共娱乐场所去看看，并且想打量一下周围的人的话，光顾者中间究竟有几个是社会民主党人呢——我敢向诸位打赌，诸位在顾客中只会发现极少数的社会

* 这是倍倍尔在萨克森邦议会，针对当时有人对滥用酒精和建立酒徒收容所问题写的请愿书发表的两次演说的摘录。民族自由党议员路·阿·尤·尼特哈默尔认为，社会民主党要对酗酒者人数的增长负责，倍倍尔批驳了这一论点并对统治阶级提出的社会改革表态。这篇演说发表在《萨克森王国邦议会例会辩论记录（1885至1886年第二议院）》1886年德累斯顿版第1卷第625—627、631—632页。——编者注

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向工人灌输理想，这是会发生影响的。会使工人去关心公共事务，使他们看到那些充满和占有他们的存在、思维和思想的目的，因此，这种影响就会激发热情，也就是诸位经常谴责我们的所谓狂热。人的整个存在和思维都将被这些思想所掌握、所浸透。这种精神不胫而走，像汉堡—阿尔托纳这样的地方，已为官方所承认，社会民主党在道德关系方面的俭点收到了极大的益处。这一点在70年代中期就已有口皆碑了。我认为，每个稍微有点常识的人，注意周围事物的人都会认识到，那些致力于人类公共事务的人和那些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迷恋于吃喝玩乐的人之间的差别，他一定承认我说的话完全正确。

今天，尼特哈默尔议员先生说，是我们在挑唆不满情绪，说这就是造成某些人无故旷工，并因此染上酗酒恶习的根本原因。不错！我还不致于硬说没有上述可能性的存在。那些因为反对企业主阶级的社会斗争而失去工作和生计的人中间，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尼特哈默尔同事先生有相当的能力证实这一点——，他们普遍被解雇，他们找不到任何工作，他们被暴力抛到街头，是会有个把人身陷贫困，因而染上酗酒恶习的。是的！先生们！我们利用国会辩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机会，坦率地举出发生在鲁高区的一个典型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倍受工人敬重的工人，曾为我们的事业积极奔走过，他被解雇了。全体矿山企业主发誓不再雇用他。后来这个工人开设了一个饭馆。这时矿山企业主对其雇用的工人声明：“凡是到容尼克尔饭馆去的人，一律开除！”这样一来，当然等于逼着他去犯罪。后来事情竟然发展到如此地步，他为了养活老婆孩子，最终同意伙同另一个人杀了人。这就是社会斗争，这就是社会斗争的个别结果。现在我明白了，作为企业主的尼特哈默尔议员先生听到这样的事会感到十分不快的。假如他认为这是社会民主党的过失，那是毫无道理的。诸位先生们！试问，社会

民主党产生的原因究竟何在呢？当然，尼特哈默尔议员和他的阶级同志坚持说，社会民主党是个别宣传的产物。他错了！如果说19世纪下半叶才产生了社会民主党，那么它只能产生在那个时候。因为只有那时党才有了它的社会生存条件。以前的任何时代都没有为社会民主党提供像今天那样的生存条件。现代的生产方式，现代的交通发展，总而言之，只有现代是整个社会生活才造成了空前的阶级对立，贫富之间才产生了巨大的鸿沟，社会的发展才日趋尖锐化，一方面，产生了极少数的富人，或生活优裕的人；另一方面，产生了占大多数的穷人和被压迫者。可是，诸位先生们！随着形势发展日趋尖锐化，所有那些从比较好的社会地位滑到下层去的人自然会产生不满情绪。另外，由于劳动条件愈来愈受到机器的影响，于是劳动力的竞争加剧了，处境恶化，工资愈来愈少，生活条件愈来愈差。所有受上述情况影响的人也会滋长不满情绪。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必然壮大成长，因为各阶级都对现状不满，这种思想日益变得强烈。今天，在我们活动较少和影响不大的阶层中，也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我知道，这种思想已经深入到政府官员阶层、学者阶层，简言之，今天它已经出现在诸位尚毫无觉察的国家阶层之中了。也可以说，社会对立的发展促使这种不满情绪的产生，它又随着这种对立的加剧而与日俱增，假如尼特哈默尔议员先生认为这种局面应直接归咎于社会民主党——我想说，这也许是因为各地有各地的情况——，那却是狭隘和肤浅之见。不！诸位先生们！酒鬼、酗酒者、堕落者并不站在我们一边，他们是流氓无产者，他们随时都有，他们有钱就花。任何群众运动中都有这种人出现。社会民主党深知，人民运动不能依靠这类分子，我们绝不依靠他们！这是些为了一杯烧酒或一杯啤酒就出卖表决票的家伙，社会民主党人不干这样的事。假如诸位认为我们也会支持你们的提案，那么这种情形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才会产生，即我们

指的是彻底变革我们的社会关系，因为假如没有这种变革，我们状况的改善，个人状况的改善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直截了当地承认，这种改善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它不仅是损伤今天的企业主阶级的问题，而且要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完全消除作为企业主的这些人，继而征用企业。

但假如尼特哈默尔议员先生又提出，是我们的宣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说我们向工人宣传：雇主就是你们的死敌，那我就要斩钉截铁地否认这一点！诸位先生！从前我也当过一批人的雇主；我们党内就有几十个、几百个雇主。假如我们要做这样的说教，那我们就自相矛盾了，那简直等于发疯！我要承认，尼特哈默尔先生也许是从糊涂人那里道听途说来的；但是，党本身能为这些糊涂虫负责吗？！要澄清这样的问题是有些荒唐的；因为个别与我们作对的企业主，他们本身无法改变自己所处的地位；不能叫他们对社会状况负责，因为他们就是这种社会状况的产物。在他们生活的关系中，他们必须按照关系行事，而他们本人改变不了这种关系的一根毫毛，假如我们看到个别的雇主压迫工人、降低工资、虐待雇用的工人，我们只能反对他们，不过我们并不反对个别没有上述恶行的雇主。我们的宣传并不针对企业主阶级本身，尤其不是个别人，而是反对作为一个社会结构的企业主阶层，必须消除这个阶层，以建立一个再也没有剥削人的企业主阶层和被剥削的工人阶层的社会制度。简单说来，这就是我们的纲领。凡是过去客观地看待运动，并且稍微看过我们文章的人都会承认，这同个别人是毫不相关的。

……后来，尼特哈默尔先生又扯到理想。诸位也许是有理想的吧！可你们的理想是宗教、皇帝和国王！诸位先生们！后面这一堆东西正是我们要消除的现实，可这位先生是保皇派，我就不是！

(喊声：“是祖国！”)不错，是祖国！(喊声：“是国家！”)不错，是国家！我们也想只按照我们的方法变革国家。可尼特哈默尔先生认为，假如我们大家逃避不了祖国、国家给我们造成的危险、斗争、迫害，祖国对我们来说岂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吗？我想，我们的地位确实是不值得人们称羨的。年复一年，各种案件没完没了地纠缠着我们，使我们没有喘息的机会；律师和警察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使我们掉入陷阱，纠缠在法律的罗网里。假如有人说，他要在他的意义上变革祖国的制度，并且心怀对祖国之爱，那这就是我们；因为，假如我们没有这种爱，我们完全可以移居外国，我们会有钱的；可我认为萨克森第二议院也许会为此批准特设一个职位，以减少我们移居方面的困难。(全场十分活跃)

但我们不需要钱！诸位可以放心！我们有理想，我们要把祖国改造得能使大家都有好日子过。但我们不是在狭隘的意义上来看待祖国二字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认为我们的祖国高踞于其他国家之上。我们的出发点也不认为，我们作为德国人就有天生出奇的地方。我们是德国人，这不是我们个人的功劳，这绝属偶然。不能因此就把我们看得高于别国之上，甚至煽动民族仇恨，培植沙文主义，从而招致无穷的祸患，刺激别国一定会带来后患的。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演说和著作选集》1978年柏林版第2卷第1分卷第321—325页。

(张念东译)

沙尔·傅立叶传*(摘录)

(1888年)

.....

我们认为,上面的论述就是这样再现了傅立叶学说的主要思想,只要有适当的篇幅这是可以做到的;他的某些精彩的段落,我们没有提到。正像我们由于篇幅所限不得不略去的别的段落一样。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的著作卷帙浩繁,这是其一;其二,要对大量的材料、杂乱的体例和断续的思想方法应付裕如,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但是,研究他的著作却是一种巨大的享受;他的作品显露出丰富的、令人惊异的、独特的思想和观点,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对现时代,以及对社会未来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教益。他对人类情欲的研究和由此得出的结论,都是我们第一次才知道的事情。他要把人类的情欲用于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这种形式是经过深思熟

* 《傅立叶传》是倍倍尔在茨威考监狱监禁期间(1886年11月至1887年8月)写成的。该书于1888年1月至4月作为《国际图书馆》第17期至19期至少刊印了3000份,1888年12月作为该丛书的第6卷出版,迪茨出版社打算通过这套丛书向工人介绍著名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家的著作。1890年出第2版,未作改动。第3版加了《序言》。本文摘自1907年斯图加特第3版。倍倍尔的专著是对早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向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作出的重大贡献。倍倍尔对傅立叶的评价是以《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中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论述为出发点的,本文只是该书的摘录。文章以主要篇幅系统介绍和评价了傅立叶的学说:学说的一般原则;情欲的体系;由此产生的新的劳动组织;傅立叶的教育学原则;论妇女的地位和婚姻问题;分配和消费的基本原则;人口理论;对宗教的态度;“文明”经济的恶性循环;进步观和向一个更高级的社会状况的过渡等。——原编者注

虑的，以致于未来只需要朝着他所理解的思想方向前进和发展建设就行了。他提出的儿童教育制度太好了，一定会给教育专家带来许许多多新奇的想法和启迪，而且这也是那种令人惊奇的细致入微的观察的证据。就像对待他所遇到的一切事物一样，他也用这种观察方法悉心地研究了儿童的生活。由于他终生未娶，也没有孩子，这就更使人觉得奇怪了。还有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地方，这个终生孤独的人，献身于自己的事业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却建造了那座爱的殿堂。他的至交和学生都没有发现他的行为有任何轻狂放荡的地方。鉴于有人对他著作中关于爱的章节发动的攻击，指出这一点并非多余。

我们只能用较少的篇幅来介绍他的关于儿童教育的思想，但这在他的著作中却占去了相当大的比重，并包含着许多有趣的细节，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只好割爱了。但是，除了傅立叶对儿童进行的认真观察而外，这些细节同样显示出他对这些代表社会未来的人的深切的爱。

我们要向有志于研究有关问题的人建议，要去钻研傅立叶的著作。除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和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事情（这是因为我们足足迟生了一个世纪，因而头脑中储存了大量的发现、发明和经验，这些都是傅立叶和他的时代所不知道的）而外，他同时也认识了许多对今天和相当遥远的将来都是十分宝贵的思想、启迪和观点。即便是那些古怪可笑的事物也始终是构思奇特的，令人玩味无穷。这些东西就像是纪念碑，它标志着在一个生活在距今还不远的时代和彻底认识了人类和事变的天才头脑里，反映出了人类和世界的未来。凡是读过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一书的人和考虑到傅立叶和歌德是同时代的、卒年相近的人，都会发现两个人对人类幸福的幻想是有着许多亲缘关系的。傅立叶的乌托邦思想同特别是在《漫游时代》中表现出来的

歌德的空想主义完全相同；而傅立叶对人的现实的认识，对群众生活状况的理解和对社会本质历史等认识方面则超过了歌德。

我这里完全舍去了(不得已而为之)傅立叶撰写的、论战色彩很强的、驳斥他恨之入骨的哲学家们的著述，就像以往的情形一样，假如仇恨起着主导作用，仇恨形诸笔端的东西比他们应得的评价还要坏得多。人们确认，他以哲学家的名义加以谴责的人就是指政治家、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和形而上学家们。另外，人们还注意到，他敌视这些人，他这位热爱事物真实性的人认为，他们许诺给人类以幸福美满，许诺要解救人类脱出苦海，可这些大话和动听的言词同他们的行为背道而驰，同真实的新创的事物状况判若云泥。凡是像傅立叶一样认识了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著作、各政党代言人的言论，认识了像西哀士^①和米拉波^②、吉隆特派、丹东派、罗伯斯庇尔派等所包含的那些伟大的光辉的美好的思想的人，凡是看到白色恐怖是怎样继红色恐怖而来的人，就会知道资产阶级掌握了权柄，就会像以往一样地虎视眈眈，厚颜无耻，置他们说过的一切大话和唱过的高调于不顾。他们一心只想压迫人民，掠夺他们的劳动果实；下一步，继许诺的幸福而来的是大众的贫困，而且愈演愈烈；我们要说，凡是站在傅立叶立场上看到、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并且认为不能忽视人和物的本质的人，他的心也一定会充满仇恨和激愤。但他也善于运用戏谑和嘲讽的手法，因此他的抨击饶有风趣，而这尤其会激怒他的对手，招致他们喋喋不休的攻击，多数则总是采用众所周知的缄默战术致他于死地。这种战术使得像傅立叶这样性格的人尤其怒不可遏。

① 艾曼纽尔·约瑟夫·西哀士(1748—1836)——德国天主教神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编者注

② 奥诺雷·加布里埃尔·米拉波(1749—1791)——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编者注

他的体系没有考虑到群众的理解程度,即使本是为群众创造的;他谋求大人物和富人的赞助,而这些人只有在特别是高贵的记者对他的思想和著作抱友好态度时才有可能争取到。但是,他们当中的作家们肯定深深感到他的批判使自己受到了冲击和伤害(且不谈他的思想内容)。傅立叶还有个天真的想法,即敌人不应把他的批判理解为人身攻击,而应当认为是对事的批判;这就是说,事实上他天性偏爱揣测,过于相信自己立论的威力。不过撇开他这类论战文章不谈,统治阶级出于我们一再指出的由阶级统治和阶级对立本质决定的原因,是不会善意相待的。他们把他当成“傻瓜”,出于这些人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怎么能期望狼会变成羔羊,或者,要求从蓊草上采摘葡萄呢?!

这种永遭拒绝的情况,重新激起了他的愤怒,加剧了他的戏谑和嘲弄的手法。他在体系和他的辩护者给他造成的无数弱点上使用了这种笔法。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肯定是位称职的批判家,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即使傅立叶对体系的阐述价值不大(恩格斯本人并不这样看),傅立叶以其批判的形式可算得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①。

如果说傅立叶受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人物和吹鼓手之类的哲学家们的虐待,那他也受到了来自教会方面的攻击和谴责。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指出,傅立叶的上帝观和人对上帝的地位的看法是不符合教会的口味的。假如教皇把他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他那个时代的天主教喉舌,如《法兰西报》^②和《宗教界》^③就会

① 恩格斯的原话是:“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4页)——编者注

② 法国正统派的报纸,1631年起在巴黎出版。——编者注

③ 即《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是法国教权派报纸,1833年在巴黎创刊;50年代支持波拿巴的政策。——编者注

加紧攻击他是一个放纵人的情欲的人，是用罕见的寡廉鲜耻破坏道德教义的人，是嘲弄和诋毁了家庭婚姻中最神圣和最亲密的两性关系的人，总之，说他通过这一切手段和他的起破坏作用的、本质上是无神论的宗教学说，要千方百计地颠覆社会、宗教和道德。

傅立叶愈是不想承认这一点，他就愈猛烈地反驳无神论的指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特别指责欧文的无神论，但从根本上说教会制度和权威人士的代表们(的指责)是有道理的。除了上面已经引用的以外，他还在一篇较长的论著《论自由意志》和论述上帝与人的关系中讲了不少异教观点，这些观点极易挑动开明的宗教代表起而反对他。

傅立叶所说的自由意志观可以概括如下：“神学像哲学一样，它所教导的是一种错误的自由意志论。照哲学看来，理性本身应当居统治地位，理性应当决定人的行为；因此，对理性来说自由意志是绝对的。达到理性的人是自身的主宰。他要像理性指导的那样去行动，不要顾及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志。

相反，神学家则认为，上帝意志(本身)决定上帝要有所欲为，他要引导一切，而人要服从上帝的意志。在上帝面前，人是无力量、无意志的。

这两者都是不对的。上帝和人虽然是对立的，他们是两个极端，但他们又不得不彼此接触，并且在共同体内互相打交道，以求得他们彼此的满足。上帝想要人帮他的忙，作为他在某种意义上的合作者。但为了能进行这种帮助，人则必须研究自然法则和引力法则，人一旦明白了这些，他就有能力同上帝共同行动了。联系两者情感的应当是友谊，不是如哲学家所教诲的蔑视，也不像神学家所宣传的盲目的屈从。不论在上述的哪种情况下，上帝和人都可能是幸福的，他们都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接下去我们不想批判傅立叶的哲学，读者是知道如何批判它

的，不过教会对它不可能是满意的。

傅立叶逝世时，他的影响微乎其微；面对着实现他寄以狂热和革新之火的制度（这是他每天都在盼望的事）希望渺茫，他也许认识到文明的发展要采取同他的设想不同的道路达到目的，所有这些失望情绪都使他在晚年感到愤懑。在久病之后，1837年10月10日清晨，他的房东和学生发现他已死在床前。人类最伟大的朋友之一永远闭上了眼睛。

傅立叶学派对法国的命运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其拥护者却大有人在，他们多数都出身于有教养的阶层，主要是学者、艺术家、技术人员，甚至还有军人，他们只是在笔头上代表着傅立叶的思想，但是傅立叶主义从来也没有在现代法国政治—社会斗争中形成起突出作用的党派。由于该学派拥护者的主要来源所致，从具有意识形态天赋的年青资产阶级的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作家写了大量的文章，但是文章的数量同在群众中产生的影响太不成比例了。

傅立叶的一些主要代言人，如他死后成了该学派主要人物的维克多·孔西得朗^①和1887年2月才去世的康塔格雷尔，多年来都是法国的民众代表，就是这种情况也无法阻止傅立叶主义的逐渐消亡。由于这个主义竭力以迎合占有者来求得阶级对立的和解，它必然日益退化为一种纯人道主义的梦呓，或者就像设在吉兹的法伦斯泰尔里的情形那样，在社会主义的旗下，被歪曲为掩盖大资产阶级剥削的外衣。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所作的一切社会主义的尝试，以及目的在于和解互不相容的对立所作的尝试，都必然归于失败。在这些尝试延续时间较长的地方，比如在美国个别的以共产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小群体内，作这些尝试必须采取几乎与

^① 维克多·孔西得朗（1808—1893）——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生和信徒。——编者注

世隔绝的方式、并且只存在强迫其成员过着斯巴达克式的简陋生活和维持宗法制关系的经济形式下才能成功。

这不是人类追求的文化发展目标。人类要求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发挥人的一切天赋和能力，充分享有一切文化成就，这只有通过文化资料的积累、在技术和科学高度发展的阶段才能实现。一个小型的、孤立的、受力量和资金限制的群体——不管组织得多么富于艺术性——都无法实现上述的一切。因为任何外来的影响都会干扰它，个体与整体的必然关系愈活跃，外来的影响就愈大。因此，要么同整体一起行动，一道发展；要么保持孤立，依然故我，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有以资产阶级方式行动的人才是可以想象的，个人同整体的关系就好比一个小齿轮同一架庞大的机器的关系一样，机器上的几十个大轮子同成千的小齿轮是井井有条地一一咬合在一起的。个别人的作用就在于对整体发生影响，另一方面，整体也对个别人发生影响。两者是互为补充、互相制约的。

凡是作为个人反抗整体，自认为能走特殊道路的人，凡是认为有能力摧毁一切都逃脱不掉的社会机械论的人，凡是错误地认为能建立自己独特的社会天国的人，一定会很快从严酷的事实中得到另外的教训，从而认识到个人的无能。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关于社会主义的尝试都是空想的、臆想天开的，是从个别人的想象为出发点的，在他的想象中，资本主义企业主可以从事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要么就是从一个小整体出发进行孤立的尝试。任何这样的尝试都是思想不成熟的标志，其作用只能令人大失所望，使这些想法在头脑不清者中名誉扫地，而给敌人提供了用以对付他们感到害怕的企图武器。

我们时代的伟大进步在于，空想主义不复存在，或行将不复存

在了，群众中再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他们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连最普通的工人都知道，靠人为的力量是创造不出任何制度来的，应当产生的制度必然是发展变化的，而且依靠整体并同整体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同整体相分隔、相脱离的。

问题在于为发展创造自由的道路，消除一切陈旧的、过时的东西，使行将灭亡的东西加速灭亡，并为此目的对所有表现出来的弊端加以批判。人们在运用批判方法的同时，必须调查引起弊端的原因。从对原因的认识中，必然会找出医治弊端的药方。

傅立叶是位批判大师，但是他的批判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那是因为他作了错误的假设。他对现存弊端的认识是出色的，他的描述也是很精采的，但在对产生这些弊端起因的调查中，他是从对社会本质的理解出发的，这就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凡是具有他那样观点的人，——这种观点对他所处的时代抱有同情心——，即认为人类选择发展过程不是取决于他们若干世纪以来形成和发展开去的那种生存和生产条件的有规律的作用，而是取决于纯粹偶然的和任意的环境，取决于某个大人物的思想和思维，取决于某个大人物的行为。凡是不相信规律，而相信偶然性和任意性的人，肯定相信偶然和任意是可以改变环境的。在傅立叶看来，人的意志不是由支配他的社会利益的环境决定的；在他看来，人的意志是独立的不受社会关系支配的、而是任意产生的力量。他不认识社会的阶级性质，他认为，任何观点都只不过是个人的看法，它要靠以普遍幸福为目的的思想即所谓普遍理性的作用才会博得人心。因此，他主要利用那些就其社会地位来说没有多少兴趣，确切地说根本没有兴趣改变现状的人。这样，傅立叶甚至深深陷入他在一般情况下要与之斗争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观点之中，这些哲学家同样认为，为了使某种观点行时，只需要认识善、正义、合理这些观点就行了。傅立叶曾嘲笑过这些哲学家，认为他们总是把观点加以美

化，甚至于要当成基本原则写入同事实大相径庭的法律之中。不过，傅立叶所宣传的观点最终都因铁一般的现实而归于失败。

傅立叶的伟大功绩在于，尽管他认识不到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什和由于什么而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但他对这个社会的特征是清醒的，他认清了这个社会的空虚和矛盾，无情地撕下了它的假面具。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模棱两可的特性，正像他完全正确地指出过的一样，这种特性表现在这个社会的一切方面；在他之后也没有任何人比他更尖锐地批判过资本主义社会。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异乎寻常的。

同样，他从另外一面，特别是通过他对人的情欲和激情的批判，提出了一种对于人的本性的深刻而宽宏的观点，这表明他是一位观察大师。他的人的情欲观过去和现在都同神学家和伦理学家们的观点相抵触。他认为一切情欲都是天然的，因此是有益的 and 合理的，必然会使人得到幸福；只是社会状况使它们受到压抑和歪曲，因此，这些欲望才变得有害于个人和社会了，对统治阶级来说必然表现为异端邪说，但它们是解除迄今为止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束缚的开端。傅立叶以他这种关于人的情欲观成了独具一格的革命者。凡是同情这种感觉论的人，肯定都会合乎逻辑地、必然地要同那个压制人的天性、歪曲和压制人的情欲因而抹煞了人的天性的本质的制度展开斗争，并予以摒弃。因此，人们不难想到，这些思想在社会吹鼓手那里会遭到何等愤怒的攻击，因为这个社会在残酷无情的大革命血战之后刚刚复原；它自认为是一切社会类型中最好的典型。它几乎立足未稳，还来不及闪现自己的青春光彩，傅立叶就对它进行了尖刻无情的批判，揭露了这个社会的一切弊端。这个刚刚推翻了陈旧的封建社会的社会（这之前它曾以批判的武器摧毁了封建社会），刚刚掌握权力自身就得到同样的下场。在刚刚用残酷的暴力镇压了巴贝夫密谋之后，就在年轻的傅

立叶身上一个新的敌人挺立在这个社会的面前，他用自己武器库中的武器同这个社会展开斗争。但是，他单枪匹马，没有拥护者，他也没有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那种手段，就投身到解放被压迫者的事业之中。于是，（敌人）只要用死一般的沉默，或者嘲讽，就足以干掉这个新的对手。其他上千个代替了傅立叶的人在这场无望的斗争中也许会变得意志消沉，因为傅立叶在这场斗争中只是个既无钱又无名的店员，却敢同社会这个强大的敌人作对。然而傅立叶没有消沉。那些坚信自己所追求的既正确又合法的人，一定会成为无所畏惧的狂热的信仰者。傅立叶就是其中的一员。别人对他进行恶毒攻击、讽刺和嘲弄，这些极其苦涩的经历使他不会迷航。他以顽强的似铁如钢的毅力在发展和宣传自己的体系，费尽了千辛万苦，在自己的周围聚集了少量的拥护者，他们数量虽少，却有勇气、热情和耐心。

从傅立叶整个内在构思上看，尽管傅立叶主义对群众未能发生重大影响，没有发动起伟大的党的运动，随着阶级对立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加剧而失去了立足之地，但是傅立叶思想对社会运动的进步并未失去意义。傅立叶思想将在未来新建的社会制度中，即使是以一种不同于其倡导者所说的形式庆贺自己的再生，而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却得到了无数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人的同情。这里表现了一个人的真正意义，即他因之受到迫害、诽谤和嘲弄的思想，他的从未取得过胜利的思想在他死后继续在传播，发生影响，最终清除了自身的杂质变成了后代的共同财富。傅立叶及其著作就是明证。如果说今天还有被傅立叶许多罕见的观点吓退的社会主义者，并因而忽略了他著作中的宝贵精华，那么这只会证明他们的浅薄，证明他们没有能力作出客观的判断。傅立叶是一位天资聪颖的人，有一颗对人类最热诚的心；他的名字只有在人们怀念那些今天被群众拥戴为领袖的其他人时，才会受到人们的

敬重。

今天，傅立叶学派在法国只剩下了少数零散的、大部属于占有阶级的拥护者了，这些人死死地沉湎于这个学派青春的梦幻之中，这就是他们留下的一切了。傅立叶死了，但社会主义则葆其生机。新的社会思想，尤其是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依其创立者来看也可称为德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所代表的社会思想，在法国，在由诸如傅立叶这样的空想主义者打下的基础上扎下了根。老的学派和派别四分五裂了，或者正处在解体之中。不久，社会运动的潮流也将在法国唯一宽广的河床中奔流，运动日益胜任自己的使命。……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演说和著作选集》1978年柏林版第2卷第1分册第454—463页。

（张念东译）

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889年7月17日)

对于我们的发展进程来说,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今天可以讨论国际工人保护立法了。在不到20年前,提出这样一个纲领来进行商谈是不可能的。当时工人运动与其说是忙于实践,不如说是忙于研究理论。原则问题的讨论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想法,改造社会的任务已近在眼前了。从那以后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制度固然已无可挽回地注定要走向没落,但是,目前它还有足够的反抗力量,还可以苟延残喘一个时期。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还不能对社会进行必要的改造。我们应当立即着手做些什么直接有益的事情这个实际问题已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要提到重要地位,尤其是因为它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工人阶级正越来越多地卷入社会主义潮流,从而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起初在我们德国,人们几乎普遍认为,工会运动、行业联合会这些把工作重点放在实际生活日常问题上的活动和组织是社会主义的障碍。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自己所犯的这个错误。不可能一下子就把群众争取过来,使之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完整的和最终的目的而奋斗,不可能立即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情况迫使人们越来越赞成采取一些实际措施,以便首先唤醒工人的阶级觉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辉煌的。尽管德国工人运动相对来说比较年轻,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运动年轻,但是它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要达到

的目的，它拥有强大的、已经在斗争中经受了考验的力量。它的这个力量今天或许已经使统治阶级感到过份害怕和惊恐。

这一发展一方面应归功于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活动，另一方面应归功于经济条件，即最近20年来德国大工业的突飞猛进。随着工人运动越来越活跃，卷入的人越来越多，它一方面使自己的敌人越来越感到惊恐，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越来越注意工人运动，以致他们不得不渐渐地至少原则上承认工人的实际要求，在这些要求中也有国际工人保护立法的要求。今天人们正在普遍讨论，我要说，正式讨论那些不到20年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还被敌人认为是不能容许的和卑鄙的问题。这是一个光辉的证据，它证明工人运动已成为一支强大力量，它正在产生巨大影响。例如，今天在德国没有人再敢说，国际工人保护立法是办不到的事情，我们的经济制度没有什么大缺点，没有什么严重的弊病。

舆论的这个彻底转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工作的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意义从它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人数上就可以看出来。

早在1870年前后，运动就已相当强大了。然而只是在德国实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之后的时期，才出现了自1870年以来我们所见到的这种波澜壮阔的蓬勃发展。同时针对实际问题开展宣传鼓动已成为运动的特征。除了党的政治组织之外，工会和行业联合会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大批报纸和杂志出版问世了，它们同舆论偏见进行斗争，并教育工人阶级认清自己的状况。数年之内社会党就拥有了将近50种报刊，其中一部分是每日出版的，另一部分每周出版2—3次，其余的是周刊。必须根据我们在历次国会选举中获得的选票不断增长这一情况来估计在报刊发行方面所取得的进步。1867年党在第一次竞选中获得的选票几乎不到10万张。1871年选票只是略有增加，因为在战争的影响下，政府和有计

划地制造的舆论施加了巨大的反压力，然而1874年我们获得的选票增加到351000张，1877年增加到493000张。

统治阶级像政府一样害怕和忧心忡忡。赫德尔和诺比林谋刺事件来得正是时候，它们被利用来作为对我们党实行镇压的一个借口。作为对赫德尔谋刺事件的回答，特别关心德国资产阶级的事情的俾斯麦侯爵提出了“反对社会民主党非常法”草案！尽管第一次提出的草案遭到了否决，因为资产阶级还有点担心，如果政府被授与无限制的全权，那么，它也可能把非常法用来反对资产阶级。

诺比林谋刺事件又发生了，它打消了一切顾虑。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蛊惑。有人编造说谋刺事件是社会主义宣传的结果，并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眼前出现的社会革命的幽灵。在这种压力下举行的选举，自然会产生一个赞成非常法的议会。

这条法律的含义是什么呢？它宣称，“一切团体，凡是其旨在推翻现存国家制度或社会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企图，表现为危害公共安宁、尤其是危害阶级和谐者，应一并禁止之”。根据这条规定，政府和警察可以在任何地方对它们认为是这类企图的行为进行镇压。

人人都享有的一般权利，在涉及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时要加上警察的专横作为补充。它想把什么东西理解为那种企图，这由它自己决定。凡是可能助长这种企图的东西它都加以禁止和弹压。这条法律一通过，全部社会主义刊物就立即被取缔了，我们的一切组织都被解散了。这样一来，成百个，甚至成千个家庭一下子被断绝了生路，濒于灭亡的境地，因为它们的赡养者原来在我们的报刊编辑部和发行部工作，或者在我们党的印刷厂就业，还有的当我们的报刊推销员，等等。其次，人口稠密的大地区被宣布处于所谓小戒严状态。于是根据戒严法，一切据说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有

危害的人都可以被驱逐出境。敌人从柏林及其近郊开始，一下子从那里驱逐了93个最积极和最有活动能力的社会党人。接着在1880年，这个厄运轮到汉堡-阿尔托纳及其近郊，1881年轮到莱比锡及其近郊，后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什切青和其他地方也相继遭到这个厄运。许多遭到驱逐的人被赶来赶去，漂泊不定，由于找不到一处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流浪到美洲去。目前被置于小戒严状态下的德国人约有350万。发出的驱逐令有好几百道，大部分都是涉及家长的。警察是国家的主人。这种状况终于把一种特务制度引进德国来了，这种制度在法国即使在拿破仑第三的统治下也没有实行过。由于俾斯麦侯爵可以任意支配几百万秘密基金，所以秘密警察的代理人无孔不入地对我们的党员同志进行严密监视。此外，警察还有权解散任何集会，取缔任何报刊和任何组织，只要他嗅到它们有“颠覆活动的倾向”。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不复存在。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已成为幻想，甚至在选举期间也往往如此。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统治时期，有1200多种各式各样的书刊和印刷品被没收和禁止。厅堂的老板们干脆决定不准我们在他们那里开会。帝国的一切权力，它的备受赞扬的经世济国之才的机智都被用来消灭社会民主党。但是在这场空前激烈的斗争中党胜利了。在对党的打击最厉害的地方，党的顽强精神也受到了最好的考验。正是在那些实行小戒严的地区，党赢得了最多最有才智的、具有最坚定的信念和最勇敢的牺牲精神的拥护者。他们的正确行为，他们为避免骚乱（即使在骚乱已被挑起的地方）而作的不懈努力，他们尽量同一切可疑分子划清界线的谨慎态度，使他们逐渐赢得了舆论的同情。他们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和加强，不仅从工人阶级中，而且也从被大工业和大商业的激烈竞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中得到补充。甚至我们的工人报刊的发行量已逐渐超过反社会党人非常

法实施之前所达到的水平。社会主义的原理一如往昔，只是比过去更加灵活，更有成效。我们的报纸和杂志的传播从来没有达到过像今天这样广大的范围。正如警察在提交帝国国会的关于小戒严状态的年度总结报告中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工人组织就在他们眼皮底下成立起来了，而他们碍于已转变风向的舆论不能充分行使解散工人组织的权利。党在警察的掌心下成长起来了，而警察却无能为力。俾斯麦侯爵企图利用同瑞士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作为把柄，以便迫使瑞士对我们采取镇压措施。现在，只要他愿意，他尽管沿着瑞士边界线连绵不断地布置警察和宪兵好了！这帮不了他任何忙。他无法阻挡社会主义运动的传播和加强。这次同瑞士发生的冲突，结果也将像往常一样，不会使我们遭受任何损害。这个事件的唯一真正受害者，将是首相的好朋友们，即那些在瑞士休养，以便恢复冬季娱乐活动造成的疲劳的高等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先生们和女士们，他们这次有机会亲自体验一下警察国家的好处。也许随后他们会明白，他们崇拜的偶像想用一种什么样的办法来阻挡最宏伟的历史运动啊！

最近几个月来到处发生的大规模工人罢工这种经济斗争形式，是对工人运动的意义的又一证明。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甚至对社会主义思想深入穷乡僻壤感到担心。再没有什么把最近在莱茵兰和威斯特伐里亚发生的矿工罢工归咎于我们更荒谬的了。这些罢工是现存社会制度的天然产物。但是有一点却是事实，即在工人和雇主之间发生的这一切冲突（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中唯一的受惠者是社会主义。这些冲突唤醒工人的阶级觉悟，使他们看到，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利益多么不可调和。因此资本家阶级甚至给我们帮了绝妙的忙。在威斯特伐里亚矿工罢工中他们以非常特殊的方式给我们帮了忙。他们在这次事件中把阶级斗争赤裸裸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这些平时忠心耿耿满脑袋君

主义思想的钢铁大王和煤炭大王，这次竟连皇帝直接向他们提出的劝告也听不进去了，因为这些劝告要他们不要无限制地利用他们对工人占有的优越的经济地位。这不会不产生影响，大家会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甚至敌人的报刊也不得不承认，在那里发生的一切，只对社会民主党有利。

选举统计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已逐渐失效的最好证明。由于这条法律刚刚颁布时给我们党造成而且必然会造成的损失和混乱（在任何其他党内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混乱），在1881年的选举中我们获得的选票降到了310000张。但是这种倒退现象没有持续多久。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1884年我们的票数就增加到了550000张，而在1887年甚至增加到750000张。这里还必须看到，在德国只有年满25岁的人才有选举权，所以在投我们的票的775000人后面还有几十万有坚定信念的、比较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德国人民中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和多深，下届国会选举将相当清楚地表明，其结果定会使即使最熟悉我国情况的同志们大吃一惊。恰恰在最近几年中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帮了最大的忙，尽管不是出于自愿。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在德国现在在我们面前已经出现了一条自由而平坦的通向目的的道路。恰恰相反！我们的斗争将来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激烈，更艰苦，但是，我们已下定决心要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毫不怀疑，我们最终将彻底获胜。

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致力于传播它的真正思想，而且还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通过立法途径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以便为工人创造一个可以比较容易地进行解放斗争，并有更大的希望使这个斗争获得胜利的生存环境。从这个考虑出发，党的国会议员多年来就在国会中倡议工人保护立法，它的内容包括：规定正常的工作日；制止夜班和节假日加班；在某些对妇女身体有

害的工业部门限制或禁止妇女劳动；禁止童工；成立保证工人能行使自己权利的劳动法庭；对大小工业以及家庭工业进行监督，等等。这些提案自然直到今天都被大多数人有计划地否决了。但是这些提案已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其他一切党派都被迫举行某种争取讨好劳动阶级的赛跑。

往下倍倍尔在他的演说中概述了国会讨论工人立法问题的经过情形。他指出，工人立法迄今为止遭到了来自俾斯麦方面的最坚决的抵抗，他是工人立法的主要反对者。接着演讲人谈到了瑞士的情况。他叙述了瑞士为实现国际工人保护立法而作的努力，并证明，一切文明国家的相似的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使这样一种立法成为必不可少。代表大会的使命是表明自己的看法：它认为在这方面必须做些什么事情。

要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那么，他，演讲人，已经自己负责起草了一个决议案，并向大会提出，以便每个代表都能在讨论过程中对它加以补充或修改。不言而喻，这个决议案不要求限制各国社会党人的行动，它只是想指出，我们应当朝着什么方向前进。应当由每个国家的特殊状况，特殊情况来决定，它可以直接利用什么东西。在起初不可能实现八小时正常工作日要求的地方，必须满足于9小时或10小时工作日。但是到处在原则上都坚持把8小时工作日当作今天的生产条件容许达到的一个目标是重要的。对于各国的宣传鼓动来说，决议案没有提出什么行不通的要求。

接着倍倍尔阐述了他的决议案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并专门就对家庭工业和小工业雇工问题作出法律规定的必要性作了说明。把视察工作扩大到这两个领域特别重要。必须最终把广大居民阶层所处的暗无天日的悲惨状况摆到光天化日之下来。我们这个标榜人道的世纪居然容许儿童劳动的野蛮制度存在，多么可耻，诚然

在德国有一条法律规定14岁以下的儿童每天劳动的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但是在小工业和家庭工业中这条法律根本不起作用。然而恰恰在这两个部门情况最令人触目惊心。萨克森的资产阶级声称，如果国会禁止在大工业中使用童工，那么，国会就会使大工业在使用童工的小工业和家庭工业会立即向它展开的激烈竞争中遭到毁灭。借口扩大视察范围需要大笔经费不能成为反对视察的理由。只要（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政府经常为军国主义提高关税和赋税，把几亿甚至几十亿用作军费开支，那么，说什么足够数量的工业视察员会给国家造成无力支付的负担，这简直是愚蠢。当问题涉及大批劳动者的利益的时候，就总是没有钱，相反，当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就总是不愁没有钱。此外，工人阶级已准备好把对工业的监督和视察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工人阶级愿意自己来监视法律，只要当局肯向它提供为此所需要的自由。在完成这项任务方面它将比现在那些有官职的人尽职得多，这些人提出的报告几乎什么都不能令人满意，虽然它们在某些问题上也有益地透露了一些有关工人状况的真相。

在政治方面，主要的困难是，工人们几乎没有可能利用他们的结社权来改善自己的命运。然而无产阶级并不因此就不须作出努力来完善自己的组织，无产阶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单靠善良愿望他们从政府和资产阶级那里是什么东西也得不到的。但是他们将在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中获得一切，并且完全是靠自己本身的力量获得的。单是通过决议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必须下定决心，使代表大会已承认是正确的东西真正取得胜利，而且是通过有力的宣传和行动来达到它。如果各国无产阶级首先赞成国际工人保护立法，那么，这样的要求也必定会受到重视。“我们越顽强地坚持我们的要求，越明确，越坚定地说出我们的要求，我们可能带给下一届国际代表大会的成果就会越丰硕。”（讲话结束时会场

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译自《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0年纽伦堡版第24—29页。

(李俊聪译)

向劳动阶级进一言*

(1889年1月)

工人们、小资产者们、农民们!

1889年刚刚开始,在这一年里我们的邻邦法国将要欢庆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这场革命摧毁了封建国家,摧毁了它的贵族和僧侣统治,废除了一切徭役和赋税,取消了行会权、领主权和革出教门权,使新兴的市民阶级取得了胜利。

这一事件成了我们整个欧洲大陆现代发展的出发点,它要求我们对历史作一番短暂的回顾,迫使我们研究一下市民阶层近百年来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历史是各国人民的老师,或者说,历史理应如此。它教诲各国人民不仅应当避免犯哪些错误,它主要教诲的是进步,不停顿的进步乃是各国人民的生活准则,现存的一切都是要消逝的;各国人民的需要就像每个国家的需求一样是在不断变化的;它不会停顿,更不会“开倒车”。

我们今天同全世界文明的人们共同回顾的这一百年,使一切都革命化了。一切国家的,一切经济的,一切社会的关系和设施,自那以来都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人们的全部思想感情都变了,我们还难以预见这场精神的和物质的革命所要到达的终点。

* 这是向德国各邦宣传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主张的传单。由于几千份传单落在警方手中,致使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柏林、汉堡、吕贝克、施特廷和威廉港等地受到严厉监视。1889年3月4日该传单被禁止散发。——编者注

现代的儿子们，尽管你们当中许多人是保守派，可我们统统处在这一发展洪流之中，它当着我们的面埋葬了一切司空见惯的关系，使我们社会的一切阶层冰消瓦解，任何人都得不到把习惯了生活挨到明天的保证，最上层的会变为最底层的，对这种发展来说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这种状况使一切地方，一切谋生的行业都永远得不到安宁了，它给你们——工人们、小资产者们、农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你们的劳动果实一再贬值，使你们愈来愈贫困。这种状况是怎样造成的呢？

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虽然并非上个世纪发生的大革命的结果，但革命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必不可少的自由的道路，使劳动得到了解放，使工人、小资产者、农民摆脱了行会和封建社会的束缚，使他们成了“自由人”，所谓“自由”是指给每个人都提供了施展自己力量和才能的机会，领主权和封建义务再无法捆住他们的手脚，行会法和居住权再也限制不了他们的独立趋势。但是现在，还是这个社会制度又把他们抛到了自由竞争的漩涡之中，它竭力推广现代的工厂制度，使用强大的技术手段和庞大的交通体系，并且动员眼下成了资本家手中交易物的地产，使农民摆脱了领主的肉体奴役，但又陷入了对抵押占有者的物质依赖。

因此，以法国为开端，这种经济依赖形式在本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却保留了下来。它换成了另外一种形式，但自那时以来，对这种依赖性的意识却有了巨大的觉醒，因为这种依赖性的原来的本质得到了证明，这就引起了依附的和被压迫的阶级奋起争取解放，摆脱一切压迫。

工人们、小资产者们、农民们！你们构成了人民群众的大多数；是你们承担了社会上层建筑造成的主要负担即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今天，你们的处境在形式上

虽然同上个世纪的法国和德国你们的先辈们有很大的不同，但为你们安排的命运却是相同的；你们为了活命不得不从早到晚、年复一年地挣扎，你们看不到依靠个人的力量改善自己命运的希望，但也可能已经意识到，随着我们发展的进程，情形会愈来愈糟。

你们放眼看看你们的周围，你们看见了吧！今天，资本的力量是全能的，凡是人类活动的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它的手掌之中，有一天处处都要由它独家统治和管辖。本世纪的技术和对自然科学的运用所产生的巨大进步，几乎使资本势力独家受益。在我们的工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农业各部门，劳动和运转过程都包含持续不断的变革，每时每刻都有新的发明创造出现，使在今天看来是最新式的东西，一夜之间就成了陈旧的、被废弃的东西，这就要求每个人为了在这场大竞赛中保住胜者的地位，必须随时随地兢兢业业，奋斗不息。不论他如何聪明、如何勤奋，他只有在占有必要的资本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保持不败的地位。

资本统治一切。资本是现代世界的真正上帝，一切都拜倒在资本脚下。凡是不占有资本的，就成了流氓无赖。资本创造智慧，资本创造劳动力、工具、机器、土地、各种原料。凡是充分占有资本的，就有可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凡是缺乏资本的，就要尽其智慧、机敏、勤奋和节俭之能事，去进行一场无望的斗争，好比侏儒对抗巨人，拿着棍子的步行者对付全副武装的骑手一样。偶然性有时可能给个别人带来益处，使他免遭覆灭的命运，而大多数则会在这一场斗争中败北。在产生一个四肢不勤的富人的地方，一定会有上百个勤劳的人变穷。只有贫困才创造了财富，资本是工人汗水的聚积。人们不仅通过对热带非洲黑人的奴役来培养百万富翁；人们也在舒适的德国借助白人奴隶来培植百万富翁，黑人，是他们的主人连肉体带精神一起购买下来的，但他是有生命的资本颗粒，所以他的主人有兴趣养活他，给以衣穿、

给以房住，即便一时没有活给他干。白人并不是非洲黑人意义上的奴隶，他不是买来的，购买的只是他的劳动力，因此，他作为“自由人”也可以力求在他失业时，在他的劳动力因新引进的机器，因“人手”供大于求，因气候不利，因事故和危机变得过剩时，有人能给以饭吃，给以衣穿，给以房住，我们城市的和工业区的穷人预算增长迅猛，所谓的工人殖民地暴满，大城市流浪汉人数骤增，妓女和流氓无产者越来越多。凡此种种就是，随着我们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后果的答案。

任何新的机器都会使工人闲下来，把他们作为“多余的人”加以抛弃，迫使他们为了生计去为更低的工资卖命，因此，机器就成了压低普遍工资水平的工具。改进机器设备，简化劳动过程，使劳动变得便宜，并尽可能紧凑地充分利用劳动力，这些就是企业主所指望的除了廉价购进原料的好处以外的重要手段。企业主作为没有自由意志的个别人，乃是巨大链条上的一环，他不得不依照普遍的队列行进，他不得不极其细心地充分利用这一切手段。竞争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左右着销售地区、世界市场。个别的工人在这场大搏斗中只不过是简单的零。他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从一地到他地，从一省到另一省，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波动而辗转于途，因此，在他看来生计是没有保障的。以上列举的事实仅限于工资的情况，也就是经常失业的状况，工人想把自己的老婆孩子也计入其内。但初看起来对工人有利的东西，现在却成了他要诅咒的东西了。老婆和孩子没有成为共同挣钱人，而是成了压低工人工资的求职竞争者，因为资本迫不及待地通过女工和童工压低工资水平，提高利润率，或者用这个方法来挤垮企业主憎恨的危险竞争对手。

他们对我们时代陷入这种境地的工人说，工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通过勤奋、节俭和智慧兴旺发达，为此他只需要具有坚强

的毅力就行了。这简直就是他们所能作出的对工人的最大嘲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是建筑在一小撮占有者剥削大批无产者的基础之上的。资本本身仅仅是通过劳动获取的剩余价值产生的，而不是通过支付的劳动，假如没有雇佣的工人，资本家就是不可思议的；资本家就像靠勤劳的工蜂养活的雄蜂一样，没有工人他就活不成。他们对工人说，你们大家都有机会成为资本家的！这好比向一个身陷泥淖的人高叫，你要揪住自己的头发跳出泥潭呀！

单个的工人是没有力量的，他不过是大风暴中的一颗砂粒。假如他要自救，就要加入他的难友和阶级兄弟的行列，通过政治活动，通过有目的地充分使用自己的权利，通过为共同事业作出物质牺牲才能达到目的。在区，在邦议会，在帝国国会他绝对不选不能坚定地维护工人利益的人当自己的代表，他坚定地认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不能彼此分割的。他在政治上绝不能相信那种他不得不认为是自己敌人的人，即社会上的高级国家官吏、大企业主和资本家。政治就是交易，即使人们不愿意明说。没有比议会回廊上的讨价还价更热闹的了。在那里，有的只是等级和阶级的对立。假如工人听任自己受某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几句好话的驱使，就去投他的票，那这个工人一定是个傻瓜。

面对大人物和富人即我们简称为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工人应该十分自觉地提出自己的阶级利益。既然作为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工人要为消除一切剥削和压迫而奋斗，他们也就是在为全人类的解放和平等而奋斗，他们就是在完成一件文化史上拯救人类的伟业。

正如工人一样，小资产者也在受着时代的熬煎。假如说工人直接为资本家服务，那么小资产者则是间接地依附于资本家的，因此，他们的命运同受资本家控制的整个经济发展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资本年年都把迄今为止手工业者、小商、小酒店主等赖以维持生计的领域，变成为自己牟利的领域。这种情形逐年加剧。因此，这些阶层都日益深重地遭受大资本势力的排挤，直至最后被压垮了事。他们绝望地自卫着，但白费力气。他们一步步地败下阵来，他们的生存日益变得窘迫，他们的顾客愈来愈少，到头来等待他们的是负债、破产。假如他们能够通过最低的服务勉强维持自己的和属员的生计，他们就 very 满意足了。

工厂推垮了手工业者，大仓库和百货店挤垮了小商小贩，因为前者囤积居奇，致使小商贩无法使售价高于购进价。大股份公司开设的豪华啤酒酒店，大企业开设的游乐酒店挤垮了小酒馆。

新的机器挤掉了旧的机器，新机器完成的劳动比旧的更具艺术性，新的机器愈来愈多地取代了熟练工人的效率，因此，一个不熟练工人的，一个妇女的，甚至一个儿童的会操纵机器的手和脑，一定很快会抵得过熟练工人的。劳动产品由于他们构思精巧的和大批量的生产，会变得如此廉价，以致任何一个手工业者都无法同这种产品的价格竞争。在每个劳动部门，机器产品都愈来愈多地排挤手工业品。甚至艺术行业面对机器的竞争都有些惶惶不安了。到处出现新的工作程序，取消手工劳动；举例来说，木雕艺术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被锌版制刻术弄得奄奄一息了。谁也说不出来（但每个人都要有这种思想准备），明天出现一种新发明是否又会排挤掉刚出现不久的发明。你追我赶，无止无休，其中只有强者即资本雄厚者能占上风，并使群众愈来愈多地为自己服务。

那些依靠生产廉价的大宗产品的机器办不到的事，就千方百计通过广泛的分工来达到。以前由一个工人干的活，今天被划分为若干工种，要由10个、15个或20个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依靠辅助机械使可分性进一步完善，进一步加快。因此，每天都有新的行业出现，从而夺走旧手工业者的地盘。

就像资本通过创建现代生产设施夺走手工业者的顾客和消费市场一样，资本也坑害了它的工人。千万个工人清楚地知道，对他们来说手工业者所具有的那种独立性不复存在了，他们拥进工厂，在那里他们用机器从事分工劳动挣得工资，而这是濒于末口的手工业者依靠自己不完全的劳动设施根本保证不了的。由于在工厂从事单一性的劳动，工人逐渐不再是以前手工业者所特有的多面手了。他使用机器，他本人也就成为和就是机器的一部分了。要是若干年以后偶然回到作坊车间，去给手工业者当一个有点用的助手，则他提的要求——尽管在他看来是合情合理的——也会使手工业者感到绝望的。手工业者会抱怨工人“不顶用”，因为工人念念不忘的是通过劳动手册和工会制度使自身成为奴仆。手工业者们不明白，劳动过程出现的日益强烈的变革（借助于机器）不仅从他们手中夺走了工人，工人毁坏了手工业，而且任何他们想加在工人头上的强制措施，反而使工人更加热衷于挣脱手工业跑到工厂里去，这绝不是个别的。抱怨工人“不顶用”和“不顺从”的数以千计的手工业者根本没有看到，就是手工业中由于竞争所迫也在搞某种形式的分工；他们没有看到，假如人们要师傅的学徒掌握传统手工业者全部必备的技能，那么就连“师傅”本人也会陷入窘境的。我们有数千个没有造过一把完整的锁的锁匠；数千个没有造过一张完整桌子的木匠；数千个没有制造过一架完整的钟的钟表匠；数千个没有制造过一双结实的男鞋和女鞋的鞋匠；数千个没有铸造过一把刀子的刀匠，如此等等。因此，他们也就不能把这门手艺传授给徒弟。由于无法避免的戒律的束缚，他们年复一年只是制作一个物件，或者制作某种商品的一部分，可他们就是手工业者，并自称“师傅”。从这样的作坊出来的学徒——一般讲来只有那里才是造就学徒的地方，因为产品的价格对觉醒的工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在另一个生产别的产品的工作坊，就都成了“外行”，

尽管他们在劳动中都是相当能干的工人。

手工业的解体，一方面是由于机器的应用和工厂的竞争所致；另一方面也在于手工业分工的本身，这种明显的解体过程应该向每个有思想的手工业者表明，任何同业工会的强制手段、高超的技术、一如既往地对手和学徒的控制，都无法挽救手工业社会性的崩溃。

获得过“黄金般的土地”这种美誉的手工业，属于一个早已逝去的历史时期，是无法用尘世的强力起死回生的。那些想让手工业者相信能这么办的人，不是傻瓜，就是骗子，不会是别的什么。几十年来，手工业一直在进行殊死的斗争，它愈是接近灭亡，资本家间的竞争愈激烈，这场斗争也日益剧烈起来。

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制造了人以前根本不知道的需求；它创造了无数能使生活变得美好和舒适的事物，给人类精神的发展开辟了无数崭新的前景，繁荣了文化，使享受得到了空前的、成倍的提高。但是，它也带来了弊端，它使劳动资料和劳动产品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广大群众无产化，使他们依附于劳动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使整个社会分裂为两个在数量上和钱财上相差悬殊的、在各自利益上截然敌对的阵营：即一个是数量逐年相对变小，但日益变得更加富有的少数占有者，另一个则是队伍庞大、日益增多、但也日益贫困的多数无产者；这种极端的对立，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

因此，工人和小资产者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统治下是注定要无产化的，而且会愈演愈烈，作为这个同盟的第三个组成部分的农民，情况同以上两者相似。

农民也在抱怨世道艰难，产品价格下跌，抵押负担增加，税金增高，各种支出名目繁多，无法避免。

从农民的立场来看这是对的。

资本主义制度也控制了土地的生产。城市和工业人口飞速膨胀,对生活资料的需求愈来愈多。按照事物通常的进程,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会引起生活必需品物价的上涨,前些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农民有过好时光。不过,价格的上涨也会刺激生活资料的生产。农业化学的发明,农业机器的发明,新的施肥方法,上百种其他的先进技术不断出现。下跌的农业收益刺激了资本,尤其对土地的投资,那是可以设想的最保险的投资。土地价格大幅度提高。随着其他投资保险程度的下降,资本对土地的需求增涨了。由于日益增强的工业的发展,加速了资本的积累,积累反过来又急于增加投资。对资本占有者来说,投资的保险程度会很快超过投资生息的水平,利息在下降,因为把资本用于引进新的耕作方法,土地的生产效率有了巨大的提高,因而生活资料价值愈来愈便宜。

此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随着工业的蒸蒸日上,交通运输也同时有了改进。工业生产远远超出本国人民的需求,因而必须在国外为过剩的工业产品打开销路。这样一来,运输的廉价和迅速就成了首要的条件。经过改良的交通工具如人愿地生产出来了。和工业方面的情况相似,蒸汽成了交通运输标准的优于一切的动力来源。

但贸易不可能是单方面的。既然我们在国外销售我们的产品,外国也就会要对等地出口它的货物,货币就会抵销价值的差别。既然我们把我们的过剩工业产品销往奥匈、多瑙河诸侯国、俄国、美国,新近又增加了印度和澳大利亚,我们就必须对等交换它们的过剩产品。按照这些国家的经济性质来说,主要是农产品。工业对此抱有特殊的兴趣。工业依照其内在的规律推动着人口的增长,但是,工业不仅需要大量的,而且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价格除了取决于供求关系而外,主要取决于工人为养家糊口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的价格。这样一来,廉价的生活资料就决定了较低的工

资，工业对工资的考虑愈来愈多，这是因为世界市场上经营工商业各国的竞争日益加剧的缘故。因此，大宗生活资料的进口就成了农产品价格压力的一个新的因素。但大宗进口会使价格愈来愈低，因为目前同我们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大量生产生活资料，于是这种生产就成了资本家投机的对象。价格便宜的和肥沃的良田绰绰有余。现在，良田已开垦，按照全新的资本主义原则，借助于质地优良的机器耕作和收获，农产品用新发明的、或经重大改进的运输工具，以最便宜的价格抛到欧洲市场。肉、黄油、蛋品、家禽、畜产品的情形也差不多。

面对着资本的竞争——它构成了我们的贸易强权地位的关键因素，因而是必不可少的——农民的耕作方法落后，工具不完善，并肩负着抵押的重担，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面对着大地产占有者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农民，同面对着大工业企业主的手工业者，处境相似。农民买不起机器，而且因为土地有限，他也不可能充分利用机器。他既不具备使用人造肥料使自己的土地变得更加肥沃的手段，也不能提供更好的厩舍、更精心的管理和优质的饲料使自己的牧畜兴旺，而这一切对农民来说是更加宝贵的东西。农民的占有范围狭小，资金有限，既无力引进合理的轮作法，也无力购进新品种和良种。大土地占有者由于使用优良的机具、建造排灌设备、耕作适当和适时、施肥轮作合理、为牧畜和家禽提供更好的厩舍和饲料、充分利用畜禽产品（牛奶、黄油、蛋、蜂蜜等）、库存保管得当、选择最佳时机出售产品等等得到的一切好处，农民都是不具备的。

对农民来说，任何对自己土地的重大改良都涉及资金的问题，这就使农民愈来愈依赖资本家，并使农民冒更大的风险。一次歉收，一场大水，牲畜死亡都是不祥事件，都会引起灾难，会使农民遭受颠沛流离之苦。

农民劳作的4/5是为抵押占有者干的，后者让半依附的农民在自己的领地上为自己即资本家服徭役，并且在收获季节作为农民产品的最惠买主出现。把农民当成勤劳的服劳役者，农民汗流满面地耕种和改良仅在表面上还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样作的优越点在于能使许多抵押占有者在没有极特殊困难的情况下，不必急于进行强制性推销。另一方面，在邻居大土地占有者对其地产进行土地合并和利用最初的最佳时机使农民成为赤贫时，农民就被迫作为工业无产者去含辛茹苦，或者，农民利用剩下的资金，背井离乡，到新的天地去碰运气了。

救星在哪里呢？实行生活资料关税，这种关税应当对外国进口实行人为的干预，并相应提高本国农产品的价格，但这根本救不了农民。偶尔小利帮不了农民的忙，一旦农民因境况不佳被迫由卖主变为买主（如歉收以后），这种关税对农民来说就是令人敏感的伤害了，这是可以想象的。从关税中得到实惠的又仅仅是大土地占有者，关税使他们吞并小邻居更加得心应手。小农经济就像手工业作坊一样，在现代的发展进程中已陷于绝境。我们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儿子们有充分理由怀疑，他们是否还会像以往一样成为独立的经济。他们中的许多人预感到，或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不惜工本地在寻找新的职业。达不到预期目的则是常事；因为竞争遍布一切地方，劳力过剩，使人感到透不过气来。

因此，在上述关系的发展中，小土地占有无可挽回地没落了下去，为大资本所占有；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中，农业人口不断减少，就是对这一点最令人信服的明证。

机器代替了农民的手，机器采摘、播种、碾轧、打谷和包装，以前要许多人干好几天的事，只需几小时就完成了。农民住宅在消失，整片村庄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林带和农田。假如占有者不想耍农田，宁愿建立森林公园，或者，在大量占有土地的情况下觉得

与其要高额收成，不如轻松经营，甚至都变成森林，这种现象也不是罕见的。

因此，工人、小资产者、农民所牵系的都是一根绳索，他们大家都是那个无情无义无所遵循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牺牲品。这种占有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些人会因积累过多而窒息；群众的无产化程度也日益增长，日益广泛，群众在贫困中颓唐潦倒，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特征；这个制度正朝着自己的顶峰因而也就是毁灭疾驶而去。

工人们、小资产者们、农民们！大家作为个别的人是没有力量的，你们只有在团结起来的时候，在认识到你们利益的一致的时候，在你们也共同协调行动（因为你们有共同的利益）的时候，你们才是强大的。你们解放的途径是夺取政权。国家是社会的政治性组织，即所谓为了大家的利益。其实，处于今天组织中的国家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和阶级统治。应该把国家改造成代表群众利益的组织，看成正义的和仁爱的象征，这就是被压迫，被歧视的阶级即工人、小资产者、农民的任务和目的。

你们就是群众，你们蕴藏着力量，假如你们认识到你们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并想取得这样的地位的话。

既然今天的国家是阶级的国家，也就是说，既然国家优先保护和促进作为你们的社会统治者的那些阶级的利益，你们在政治上就是以国家的形式受他们的监护、奴役和压迫。

这方面的证据不胜枚举。如果说国家是个公开的保护机关，那么大家理所当然应该像他们享有的保护一样为国家作贡献。占有者们受到国家最大的和最特殊的保护，那么他们也理应当为国家作出最大的贡献才是。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穷人和没有钱的人倒是为形形色色的公共负担出的力远远超过了富人。请看帝国吧！它把大部分负担用间接税来筹措，即通过关税和对群众

日用必需品的税收。因此，穷人同富人出的钱一样多，尽管富人本来可以缴纳20倍、50倍、甚至成百倍的税金，并且应该相应地偿还它从国家得到的好处。但穷人的家庭人口比富人要多得多（通常是这样），那么负担对穷人的冲击也要更加严峻得多。穷人消费的面包远比富人要多，因为除马铃薯外，面包就是主要食品了；这样，通过粮食关税提取的面包税大头是由劳动阶级承担的。盐，每磅上税6分尼，上了税就成了9分尼或10分尼，不上税则只有3分尼，而在盐的消费上穷人远远超过富人。帝国征收烧酒税约达13500万马克，几乎由劳动阶级独家承担。但掌权阶级却竭力不断完善这个最不合理和最卑鄙无耻的税收制度——间接税，换句话说，掌权阶级千方百计地把维护国家的重担日益沉重地转嫁到劳动阶级肩上。

下表提供的数字说明了事情发展到了何种程度：（见下页表）

概括来说，间接税和关税1873年为257 771 200马克；1879—1880年度为274 931 800马克；1888—1889年度为493 360 600马克；1889—1890年度则上升为528 086 400马克，就是说在此期间增长了约2.7亿马克即100%！

工人们、小资产者们、农民们！在此期间你们也变得如此富有了吗？

为了说明问题，请各位注意：多年以来，由于执行了错误的税收制度，国家以对超额输出的食糖的税金实行逆补偿的方式从帝国纳税人那里搜刮了巨额款项。举例来说，1886—1887年度这种逆补偿达114 181 000马克（总税额为141 213 000马克。酿造税的计算无论如何要想到它是北德人征收的；南德则有自己特有的啤酒税。补偿金因自由港地区不收关税和消费税而有所提高，随着汉堡—不来梅自由港地位的取消，从现在起也取消了补偿金。

工人们、小资产者们、农民们！请你们看看这笔数目吧！你们

	1873年	1879—1880年度关税	1888—1889年度	1889—1890年度(概算)
纯收入①	122 610 000 马克	135 318 300 马克	245 554 000 马克	270 800 000 马克
		国内烟草税		
纯收入	1 125 000 马克	896 000 马克	9 264 000 马克	10 023 000 马克
		糖税:		
纯收入	45 453 400 马克	45 893 000 马克	27 234 000 马克	51 394 000 马克
		盐税:		
纯收入	33 083 900 马克	35 932 400 马克	39 032 000 马克	40 315 000 马克
		烧酒税:		
纯收入	36 100 200 马克	36 857 000 马克	138 372 000 马克	135 332 000 马克
		酿造税和啤酒暂行捐税:		
纯收入	15 039 700 马克	14 859 800 马克	18 725 000 马克	20 195 000 马克
		所谓对关税等的补偿金:		
纯收入	4 359 000 马克	5 174 300 马克	8 543 600 马克	(由于汉堡和不来梅取消自由港地位而被抵销)

① 即指提取管理费(约占收益的15%)之后的收入,不过也要由老百姓来负担。——倍倍尔注

会轻而易举地算出，你们每年在你们的生活资料和必需品价格上要为间接税付多少钱，你们要知道德国的人口大约有4700万！

这就是帝国的税收。此外，还要征收国家、省、地区税，但是，无论什么地方都不是按照合理的制度办事的。除了间接的国家税和地方税以外，我们还有地产税、实业税、阶级税、所得税和其他各种名目的税。假如你们仔细看看这些税收的分摊情况，则到处都是同一个样子。没钱人纳税过多，富人到处试图尽可能地少花自己的钱，而把税款更多地转嫁给没钱的人，因为他们在所有的代办机构中都掌握着权柄。

他们肯定能作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掌握着绝大部分的政治权力。在帝国国会实行普遍平等选举权的问题上，他拒不同意发给议员补贴，从而达到不让劳动阶级的代表进入国会的目的。适用于邦议会、市民代表机构、省和区的代表机构的选举权，要么完全取消没钱人的选举权，要么使它名存实亡，这样就使无钱人无法掌握决定性的票数。

我们的国防法律条文规定，任何有能力使用武器的服役男子，都应服役3年；而占有者自己就不履行这项义务，因为他们对他们的子弟就实行一年制的志愿服役制。

高等教育学府只为有钱有势的人敞开大门，很少例外；不是才干和能力，而是钱袋的大小决定着受科学教育的程度。

我们的司法部门收费昂贵，因此，没钱的人不得不放弃诉诸法律，给他有钱的对手以可乘之机，因为他不需要缴纳预付金。在我们的国家和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情形大抵如此。到处都表现出社会分成两大阶级，各有不同的利益，其差别反映在法律和公共设施方面，总是表现出对劳动阶级利益的损害。

广大群众承担了国家的主要负担，他们成了纳税的主角，他们既承担钱的捐税，也承担血的捐税，他们的子弟构成了军队的主

体，保卫着这个主要是为富人谋取福利的祖国。血的捐税同钱的捐税一样也在日益增大。对外的民族仇恨是同内部的阶级对立相适应的。工业和商业的竞争激起了嫉妒之心。本来像某个省份应归属哪个国家的建制这样无足轻重的问题，不听一听法律上应当作出决定的有关居民的意见，硬说这是关乎国家荣辱的大问题，这样的决策就会引起敌对国之间血气方刚的男人们展开一场大屠杀。几十万从未见过一面又无冤无仇的人们，遵照统治者的命令疆场对阵，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就像天命所归一样，他们无法逃脱噩运，劳动群众服从着领导阶级，日益沉重的负担压弯了腰，这比各国人民手执武器决死一斗的职业还要沉重得多，不必等大屠杀——要死上几百万人的大屠杀到来，国家就会破产，人民就会破产的。

对下次欧洲战争——它会给各国人民及其领导者带来无可估量的灾难——的准备程度，可以从下列数字中得到证明：

1873年度	1879—1880年度	1888—1889年度	1889—1890年度 (概算)
帝国陆军			
259 733 000马克	315 283 000马克	362 819 000马克	366 905 000马克
海 军			
8 341 000马克	23 460 000马克	35 900 000马克	34 512 000马克
帝国伤残基金：			
28 251 000马克	32 344 000马克	26 359 000马克	26 174 000马克
一般退休基金：			
20 737 000马克	17 125 000马克	28 717 000马克	30 734 700马克

文职官员退休金只占最后一项的799000马克，其余数额都被军事和海军管理费所占用。绝大多数军官是壮年退休，这使退休金费用增长很快。自1871年以来的漫长和平时期使晋升放慢了步

伐；于是进行人为的助长，但出钱的却是老百姓。除了这些定期的年度支出以外，每年还有数日可观的特别支出。来自法国的数十亿^①（金法朗），除了用来补偿全部战争费用以外，有25亿马克用作军事装备和伤残基金的开支。这方面由例行的收入预算中还产生了大量的开支。近4年来，特支费的情况如下：

1885—1886年度 1886—1887年度 1887—1888年度 1888—1889年度

帝国陆军的情况：

33 321 000马克 53 699 400马克 210 966 000马克 372 473 000马克

海军的情况：

15 398 700马克 14 211 600马克 9 142 800马克 12 775 400马克

截至1875年，帝国已无债务；但自那时以后帝国的债务却直线上升，到1888年3月底已达1 144 369 766马克，并且在今年还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帝国债务的利益计为：1879—1880年度6 212 300马克，1889—1890年度达到37 483 500马克。

1879—1889年度：收入 584 083 300马克

支出 550 264 800马克

1888—1889年度：收入 1 225 926 100 马克

支出 1 203 768 800 马克

以上数字可以作证。

就像德国一样，欧洲所有的军事大国的情形也是如此。

这些国家在完善自己的军备方面各不示弱，都想千方百计高人一筹。这就形成了普遍的军备竞赛，看谁武装的士兵最多，看谁拥有量多质优的战舰和大炮，看谁拥有射速最高、射程最远的枪

^① 1870—1871年普法战争以后，法国付给德意志帝国50亿金法朗赔款。——原编者注

支。整个欧洲成了一个大军营，死抱住军备不放，造成债台高筑。

难道这个制造普遍不安、无止无休的战争恐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动乱是劳动阶级所希望的社会状况吗？在这场动乱中受难最深重的是劳动阶级，发财的总归是交易所。

这种持续的不安，这种军备，这种持续的备战不过是统治阶级政治的延续。只不过是一国的统治者把原因推到另一国的统治阶级身上而已。外交政策使各国人民处于紧张状态，这是阶级统治的手段：因为他们要转移人们对内部事务的注意力。

实行一点“社会改革”^①（主要也是靠劳动阶级自己出钱），这不过是给化脓的疮口粘块橡皮膏而已。

工人们、小资产者们、农民们！这就是你们的处境：按照自然法则，它是会逐渐激化的，总有一天要以一场普遍的灾难、一场大崩溃告终的！

你们愿意坐以待毙吗？集合起来！团结起来！征集你们的票数，选出了解形势和决心维护你们利益的人来吧！

未来属于社会民主党！它是你们唯一能参加的党。它是劳动的、权利的、正义的和平等的党。

几十年来，社会民主党已经预言将要发生什么；每个肯思考的人能够实地把握住什么。

资产阶级世界本身就包含着经济衰退。大资本是一头贪婪的巨兽，它要张口吞噬一切，不到撑死的那一天是不会住嘴的。

但假如说资本的倾向——在铁的事实面前谁也难以否认——

^① 在酝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俾斯麦政府就宣布要通过某些政治措施来加紧对社会民主党的镇压。1881年1月政府提出了伤亡事故保险法草案。接着在同年11月，皇帝在致新选举的帝国国会的一份诏书中，宣布实行社会改革，颁布了伤亡事故、疾病、老年和残废等社会保险法。这是当局试图通过社会立法来收买工人阶级，孤立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就是把劳动资料和劳动生产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财产大量聚积——土地、机器、工具、运输工具、原料和成品都成了少数人和私人的财产，但劳动阶级则日益依附于世界一切物品的占有者，制造群众的贫困和奴隶制，那么激进的疗法也就清楚了。

这个方法就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剥夺占人口少数的统治者手中的劳动和生活资料，取消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以一切劳动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合作的）生产和分配。劳动成为一切人的责任。使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的优越性，充分利用技术和自然科学的优越性造福于每个人。任何劳动都要以最高级的技术进行社会化的经营。取消耕作中、商业和手工业中存在的分支经济。合作社要取代个别的私营企业。劳动生产率会因此而以今天尚且不知的方式不断提高，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和享受，今天只是少数优惠者才有这种可能。

那时，阶级统治没有了，阶级斗争销声匿迹了。从那时起，只存在自由平等的人，不存在被剥削和被压迫者。大家只有唯一的目的，就是各尽所能，使生活变得更美好。

那时，民族仇恨也不复存在了。各国人民都会认识到，他们应该去从事比在无谓的斗争和遭受重大人员伤亡的战乱中消耗可贵的精力更为有益的事情。那时，大家要比赛和平的艺术，而不是生产杀人武器和嗜血的军备。

这是穷困饥饿、斗争不息的人类憧憬的崇高目标。各时代、各地域的优秀人物都曾为之奋斗过，但是没有达到目的，因为没有实现它的条件；而新的时代，由于它的伟大发明和发现，由于它有可能无限发展为满足人类的一切需要的手段，因此才创造了这种条件。

工人们、小资产者们、农民们！今天你们看来似乎无法实现的理想，随着时代的前进会变成真正的现实。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

及同这个体系相联系的事物(你们今天完全有理由把它看成是最大的敌人),违背其统治者的意愿,创造了这个体系本身提供的实现一种新社会形式的条件。

你们是有力量为这种社会形式催产的。请认清你们周围事物的本质吧!丢掉禁锢你们思想的偏见吧!甩掉你们过去的朋友吧!他们是你们现存制度的卫道士!站到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来吧!社会民主党认为,它的任务就是把人的面貌所代表的一切东西从社会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

请你们务必在下届帝国国会大选时行动起来!用你们对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赞成票来表达你们的意愿吧!

你们的自由和你们的权利是不会白白从天上掉到你们怀中的!你们要为争取自由和权利而奋斗!正因为如此——

社会民主党万岁!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演说和著作选集》
1978年柏林版第2卷第1分册第537—555页。

(张念东译)

工人阶级的党反对非常法*（摘录）

（1889年11月7日）

……1878年在这间会议厅进行了讨论，当时政府提出的这项法律的第一条条文是：“一切团体，凡怀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企图，致力于推翻现存国家制度或社会制度者，均应禁止之。”后来在讨论过程中，根据拉斯克尔议员的提议，对这个条文作了一些修改，即在原有条文的基础上加进了下面这句话：必须予以制止的企图是那些“旨在推翻现存国家制度或社会制度，表现为危害公共安宁、尤其是危害阶级和谐之企图”。曾在这间会议厅参加过1878年讨论的人都知道，不仅在一般性辩论中，就是在专题辩论中，只要上面这句话在条文中再次出现——而它在该法律中大约重复出现5至6次——，辩论照例就会带上一般性辩论的性质，因为所有的发言人都立即进行争论：对“旨在推翻现存国家制度或社会制度，表现为危害公共安宁、尤其是危害阶级和谐之企图”应作何理解。对于担负执行任务的官员来说，全部问题在于，在实际运用这个定义时他认为什么是起决定作用的，他对那些在他看来是“旨在推翻现存国家制度或社会制度之企图”怎么

* 1889年11月5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首次讨论不定期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提案。倍倍尔在这篇演说中就这个问题揭露了政府当局对社会民主党实行警察专政的政治背景。1890年1月25日在进行三谈的时候，倍倍尔再次发言反对这一提案。这篇演说发表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的速记记录》1890年柏林版第1卷第177—180、182—185、190页。——编者注

办,是进行惩罚呢,还是予以禁止?或者,当这些“表现为危害公共安宁、尤其是危害阶级和谐之企图”变得非常明显时,他是否想进行干预?

你们将不得不承认,按照我们普通的一般法律概念,旨在推翻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之企图,应被视为叛逆行为,而按照刑法书上的规定,这种行为应受到最严厉的制裁和惩罚。毫无疑问,“旨在推翻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之企图”这个概念必定会被纳入普通法。但是现在人们在解释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中的这个定义时却不想说明它有普通法中含有的那层意思。然而这个定义的内容究竟指什么,或者人们想用它来指什么,无论是当时以自己的,朋友们的名义提出这个提案的拉斯克尔议员,还是赞成这一提案的其他发言人都说不清;结果,这些年来,由于人们对这个定义所作的随心所欲的解释,在受这条法律管束的一切公共活动领域,专横暴戾逞凶肆虐,横行无忌。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条法律在生效以来的11年中所起的作用,那么毫无疑问,它是产生了相应的影响的。据我所知,根据这条法律约有1300至1400种印刷品被禁止了,其中约有120种定期出版的报纸,200多种小册子和书籍,它们当中有一部分完全是科学书刊;其余的禁止印刷品事件约有800至900起涉及传单、某几号报纸等等,而主要是涉及竞选传单。

此外,社会民主党当时拥有的12家印刷所,由于社会主义书刊遭到禁止而倒闭了。这不仅使我们在财产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当时大批以出版和传播这些报刊和书籍为业的人还失去了面包。

再有,对许多地区还实行了小戒严;许多年来我们不得不穷于对付这个情况。由于实行戒严,总共大约发生了500至600起驱逐事件。不言而喻,大多数被驱逐的人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有很

大一批人的生计完全被断送了，另一些人不得不年复一年地从事艰苦、繁重的劳动，以便重新恢复他们原来的状况。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这个方面，即该法现在的第28条所包含的内容，昨天已由内务大臣先生^①非常明确和详尽地着重指出来了，因此我没有必要再在这里提请大家注意；稍后我还要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

可见，在所有这些方面这条法律已充分尽到了它的责任。其次，这些年来大量集会被禁止，另一些集会被解散，成百个联合会被取缔。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或以与该法有牵连为借口在德国进行的家庭搜查累计起来可能有1万次。对个人进行的迫害——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警察对社会民主党杰出人物的紧紧盯梢——次数多得无法计算。这种个人迫害许多年来到处都非常猖獗，而且直至最近一个时期还在自由主义的模范国家巴登横行无忌。比如，不管我在哪个城市出现，哪怕是作为跑外勤的人为了我的公司的事务去找各式各样的顾客，到处都有警察寸步不离地跟踪我；这种现象在德国几乎比比皆然。还在一年以前，在自由派统治的巴登，而且是在弗赖堡，有人在我下榻的旅馆门前设置了3个警察作为门卫，这使全体旅客都感到极端惊讶。这3个警察把守着进出口，只要我一离开旅馆去办理我的事情，他们就像狗一样跟在我后面跑。（会场活跃）这类事件我们在德国到处都会碰到。今天我的知名的朋友当中没有哪一个人到德累斯顿来不会经历这种遭遇。只要警察局发现了，就会派一个秘密警察来跟踪我们。

从以上各个方面来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颇有成效的，已经产生一定影响。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反面！这不利的一面表现在：社会民主党在1881年的选举中只获得311000票，而在1887年的

^① 路德维希·赫尔富特。——原编者注

选举中却获得了763000票，也就是说，在6年中我们获得的选票增加了约140%。其次，在此期间党的财政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上面所描述的那种情况，使同志们受到极大的鞭策、刺激和震动，他们表现出了空前未有的牺牲精神，以致我们党今天大概已被你们，先生们，已被你们自己的党内朋友们，奉为榜样和楷模。在这里我想起了冯·赫耳多尔夫先生不久前在一次集会上，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大概是在他的选区举行的集会上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提醒人们注意社会民主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他的党内同志们和朋友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之间的巨大差别。他说，一旦涉及捐款问题，他的党内同志们和朋友们就人也找不着，话也没法说了。先生们，在社会民主党那里当然是另一种情况，它的牺牲精神是自不待言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有理想的政党，不管你们是否承认这一点，而一切为理想而奋斗的人，同时也受到理想的鼓舞，并愿意为理想作出牺牲；但是你们再也没有为之奋斗的理想，因此也就没有牺牲精神。甚至施特克尔先生在柏林这里的机关报不久前也发表了这样的观点：保守党没有任何理想——其他党派也完全一样。由于它们完全没有理想，所以不言而喻，它们也完全没有有吸引力的思想。因此也就不存在任何自我牺牲精神和为了党的奋斗目标而作出较大的物质牺牲的愿望。

昨天内务大臣先生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解释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究竟是怎样起作用的和又是怎样没有起作用。他说，一方面这条法律没有起作用——在这一点上动机和法律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与人们的预期相反，错误学说的传播范围并没有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他甚至不得不承认，它的传播范围已扩大了。但是另一方面，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已起了作用，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传播的范围基本上仍然局限于它原来已经占有的那些地区，而迄今为止整个说来农村地区尚未受到它的影响。在这方面据我看来，大臣

完全受蒙蔽了。无可争辩的、而且最近一次选举也清清楚楚地表明的事实是，和从前相比，党的地理范围也大大地扩大了。我们在许多我们从前没有获得过选票的选区获得了选票。根据我所了解的，现在在德国工人阶级以及社会民主党中存在的思想来判断，我毫不怀疑，下次选举的结果将使内务大臣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

内务大臣先生随后承认，社会民主党是一股无法用机械手段镇压下去的精神力量；但它还是一股从现今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力量，正如前一位演讲人^①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先生们，当你们一方面承认这个情况，而同时又想采取非常措施来镇压这股你们自己也承认是从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个机体和本质中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精神力量时，你们陷入了多么矛盾的境地！

.....

你们如何理解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给颠覆企图所下的定义呢？你们说：啊，这是指，如果你们攻击国家，或者努力设法推翻国家。但是这种事情如何才能发生呢？通过语言，比如，我在某个集会上或某篇著作中说：你们听着，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我们必须组织一个大党，它抱定的宗旨是控制国家，如果通过和平方式达不到这个目的，那就不用暴力手段，啊哈，这样一来，你们就再也不需要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了，那时刑法书就该起作用了。我由于说了这样一番话至少应承担制造叛国舆论的罪责。如果我更进一步，直接采取行动，或者至少企图实现准备叛国的行为，那么我就触犯了企图叛国和完成叛国行为的法律条文，于是按照刑法书上的规定我将再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但是，有人说，当你们宣称，我们想从根本上彻底改造国家关

① 威廉·库勒曼。——原编者注

系和社会关系的时候，这种企图就已经存在了；这种按照“彻底改造”的方针“从根本上”进行改造的愿望，已经是一种危险的东西。

但是，昨天内务大臣先生说（在这里动机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学说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并不抵触。是的，先生们，社会主义学说清楚而明确地说——在一切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著作中谈到社会主义学说时到处都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只有在与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你们不是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了吗？正是被库勒曼议员先生、哈特曼议员先生和诺贝议员先生视为最危险的、危害国家的企图的东西，内务大臣先生却宣布说是可以容许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原理可以传播，只要不牵涉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是多么矛盾的说法！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据说答应给予我们，至少大臣先生是这样说的——在实践上当然是另一回事儿——，而我们认为最不重要的东西，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却应予以禁止，这是一种罕见的矛盾。

库勒曼议员先生尽了极大的努力（昨天还有哈特曼议员先生替他帮腔）来说明，我们在议会里代表的势力首先决不是社会主义势力，说我们无权妄自尊大，自称代表工人阶级，说我们只代表工人阶级的少数。库勒曼议员的这个指责我同样可以用来回敬他，用在他自己的党身上完全合适：当他的党自称代表德国资产阶级时，这也是一种妄自尊大的行为；它也只代表德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它不代表整个资产阶级这个情况是它的党感到最遗憾的事情。至于我们，我们从未否认过我们只代表有觉悟的那部分工人，受过政治教育的工人，即工人阶级中有头脑的那部分人。但是按照我们的信念，每一个工人，如果他明白现存国家的政治机构的话，必然都会成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一点你们大家也都知道得很清楚，但你们害怕这个情况。因为你们害怕，所以必须让反社会党人非

常法永世长存。你们想破坏和阻挠我们的宣传；你们不希望工人接受政治启蒙和政治教育，不希望工人接受我们的观点。这就是原因！

民族自由党的先生们所采取的社会立场本身说明了他们何以如此积极地拥护非常法的规定，何以要竭力压制像我们党所宣传的那种学说和理论。只要看一看这个党，看一看它在国会里的代表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明白，尽管它的党员人数相对来说非常少，但在他们当中却有30几位百万富翁哩！（笑声）这个党的多数人代表大资本家、大工厂主。这班先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向成百工人和成千工人发号施令的权力；因为这班先生中的每一位先生都有像过去那样继续剥削和敲诈工人、再搜刮千百万资财的天然而强烈的欲望，所以完全可以理解，这班先生在为本阶级的利益着想的时候，同时也在为他们个人的利益盘算。在这里他们的阶级利益和他们的个人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先生们，在他们自己的党员同志中并不是所有的人，至少并不是在一切时候都有这样的观点，即认为社会主义企图（即使它贯彻到底）是危害国家的。我在这里从1847年在萨克森出版的一本名叫《矿山集景》的杂志上摘引一段话以资证明。著名的卡尔·比德曼博士教授也是这家杂志的撰稿人之一。比德曼先生在这家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解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追求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比德曼先生今天还在世，他今天仍然是公认的萨克森民族自由党的领袖之一，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即社会主义非常可能在不太远的将来实现。在一个离我们即使遥远的发展时期，共产主义提出的那种自由思考的最后结果终将实现的时刻，极有可能来临。自由思考、共产主义——民族自由党的先生们，你们听到后身上不起鸡皮疙瘩吗？（笑声）这也就是我们要说的一切。比德曼先生当时，也就是说在1847年，即距今40多年前在由布罗克豪斯

和阿芬那留斯于莱比锡出版的《矿山集景》上还反驳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当时在某个共产主义纲领中还存在一种粗鄙的分配理论，即粗鄙的分配共产主义。他强调说，一般信仰这一学说和理论的人没有哪一个代表粗鄙的分配共产主义，然而，我们却在这里，在帝国国会中有机会在大约11年前在一次辩论中听到一位名闻遐迩、德高望重的大人物——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陆军元帅冯·毛奇伯爵——说我们代表这种理论，说我们的目的只是要搞分配，然而分配纯粹是瞎胡闹，因为即使今天进行了分配，过一周之后完全不平等的现象又会出现。如果我们真想做冯·毛奇伯爵硬说我们做过的那种事情，如果共产主义真像他所说的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驳倒，那么我们大家都会为信奉这样的学说感到羞耻，我们就会再也不敢在任何地方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因为我们立即会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嘲笑。……

你们想否认今天在劳动阶级中存在着从未见过的悲惨境况吗？你们想否认今天劳动阶级觉得自己受到了非常法的压迫并在整个德国被看成二等公民了吗？许多年来，尤其是这几天在关于戒严的讨论过程中，可以看到大量的事实，它们证明，你们企图用这条非常法来对付社会民主党的所谓颠覆活动而进行的一切努力，主要是打击了工人的活动。当大批专业协会由于它们的某些成员参加了社会民主党而被勒令解散的时候，当工人们因为提出工资要求（这被看作是推翻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企图）而受到非常法的压迫的时候，我想问一问，在这种情况下，在劳动阶级的一切圈子中人们会不会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产生自己处在非常法的淫威之下的感觉？

我还想向你们举出一些事实，说明禁止和解散集会的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你们马上就会看到，不仅各个主管部门——不管是上级主管部门还是下级主管部门——在干这种事情的时候都玩弄

了各式各样的花招，而且你们还会进一步看到，在执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原则可循。以前我曾在报上撰文说过，现在在这里重申一遍：如果德意志帝国悬赏百万马克，任何人只要他能够证明德意志帝国的各个主管部门在执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所依据的原则和所持的特定观点都可以获奖，那么，这笔奖金不管它的数额有多大，也决不会被人领走，因为对这条法律的执行根本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道理，完全是一意孤行，胡作非为。

在慕尼黑，几天之前有一个集会被禁止了。这个集会是由前议员菲勒克召集的。参加者是他的周报的订户们。开会的目的是为了同他们商量，是否把周报改为日报。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九条，这个集会被禁止了。关于巴登的情况，你们从穆泽尔的小册子中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在德累斯顿，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九条，有一个集会被禁止了，因为木工们想讨论一下老板制定的工场管理条例并作出决定，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条例。在魏玛，有一个集会被禁止了，因为报告人作了一个关于歌德和他所处的时代的报告。（笑声。）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普劳恩，有一个集会解散了，因为在主席团中有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在戈尔斯贝格，一个选举协会的成立被禁止了，因为国会选举的日期还没有公布。在埃森，有一个集会解散了，因演讲人像地方法官那样说，要是社会民主党人也享有结社权就好了。在凯泽斯劳滕，有一个集会被禁止了，因为预告将要在会上讲话的海德堡的吕特博士19年前在萨克森曾因某一违法的政治行为受过处罚。在诺伊特林根，有一个集会被禁止了，因为人们想成立一个选举协会。在多特蒙德附近的马丁，有一个集会解散了，因为演讲人说，必须把常备军改组为人民武装。在图林根的阿恩施塔特，有一个集会被禁止了，因为报告的名称是：学龄前儿童的营养和汉斯·萨克斯^①。

(笑声)在索劳,有一个集会被禁止了,因为这个地方离城市太远,警察不便来参加。所有这些都是警方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九条宣布解散和禁止集会的理由。

此外,还要提一个同一主管部门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这个奇怪现象我要特别提请驻萨克森联邦专员先生^②(他昨天感到很惊讶,为什么恰好在我们萨克森对政府和它的机关报的不满情绪特别大)注意。我曾经获准于9月初在我居住的地方德累斯顿附近的普劳恩,召开过一次讨论国会报告的会议;但是过了14天,当我想在同一主管部门的管辖区举行第2次会议时,却被当局援引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禁止了。尽管在此期间已经过去了6个多星期,申诉书也递交了,但是直至今天还没有收到回答。辛格乐议员想在茨威考召开的两个会议被禁止,因为他参加了国际代表大会^③,其实他当时根本不在巴黎。(左边有人喊道:“是吗?”)我被禁止参加一系列会议,因为我是社会民主党著名宣传员,不管怎么说,我经常受到惩罚。(笑声)

此外还发生了下列各种事件。萨克森的霍恩施泰因第17选区要举行一个集会,我要在这个集会上作关于国会工作的报告。但市长禁止举行这个集会。我们向茨威考行政区长官提出申请,后者取消了这个禁令。不过后来我们再也找不到开会的场所,因为市长施加了压力,没有一家老板肯出租会场。我们只好在农村举行集会。但是尽管格劳豪地方行政长官清楚地知道,茨威考行政区长官已取消了不准在霍恩施泰因举行集会的禁令,他还是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九条重新禁止了我们的集会。这还不算,好

① 汉斯·萨克斯(1494—1576)——鞋匠、歌手,是16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著名人物。——编者注

② 赫尔曼·古斯塔夫·赫尔德。——原编者注

③ 指1889年7月14日至20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原编者注

戏还在后头。我们再次向茨威考行政区长官提出申请，后者也取消了这第2道禁令。当我们重新申报准备开会的时候，格劳蒙地方行政长官竟然违背上级主管部门的坚定意志再次禁止我们举行集会。（左边有人喊道：“听啊！”“听啊！”）下级不服从上级的类似造反行为在德意志帝国是否已经像在萨克森一样出现了呢？

我已经指出，霍恩施泰因的市长施加压力，使我们再也租不到会场。而这正是整个萨克森和几乎整个德国的警察当局的一贯作法。警察到处都在准备对旅馆老板进行工作，试图说服他们不要出租会场；警察威胁旅馆老板说，他们的营业许可证将被吊销，尽管这根本不可能，警察告诉他们说，他们将领不到舞会许可证，或者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出租厅堂，你们将遭到宵禁等等。这种不足称道的、可怜的斗争（我相信，政府当局会为这种斗争感到羞耻）目前正方兴未艾。当我们最后对旅馆老板进行抵制（先是在萨克森，后来在整个德国）时，情况稍微发生了一点变化。因为旅馆老板们暗自思量：抵制造成的损害毕竟比警察的奸计给我们造成的其他一切损害大，因为我们必须低声下气地哀求。

难道你们以为同当局进行的这种斗争（我向你们担保今天在整个德国、在每一个较大的地方它都在进行）不会使群众义愤填膺和怨恨吗？难道群众不会自然而然地认识到，他们是毫无权利的人，政权机关的唯一目的就是压迫他们吗？

当我举出这样一些禁止集会的理由时你们都会对它们嗤之以鼻（喝采）——同事先生们，请你们原谅，我在这提到了我已经说过的过去的事情，但是嘲笑这类严禁集会的理由的还有群众；不过他们的嘲笑和你们的不同；工人的嘲笑带有讥讽和蔑视的味道，他感到自己是毫无权利的人，他感到自己被别人当成下等人来看待了，正像冯·卜尼格先生在他1878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演说中完全正确地描绘的那样。他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他看到，由于实施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他受到了藐视。他的憎恨和他的愤怒就是这样产生的！

然而对待各种协会的态度有丝毫差别吗？在这方面也是一意孤行，肆无忌惮。不少协会遭到了禁止，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是这些协会的会员，或者也许因为个别会员某次曾经说过在警察当局看来根本不该说的话。专业协会和专门研究工资问题的工资委员会到处都被禁止。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必然给德国工人造成最恶劣的印象。

你们现在想把这条法律变得宽容一点。你们说，将来对禁止集会的申诉不交给监督管理机关处理，而交给行政法院处理，在我们萨克森，这样做什么也改变不了；在我们那里监督管理机关照旧存在，因为我们没有行政法院，即使有，也几乎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到萨克森内务部作出过一次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敌人，不利于主管部门的裁决。在我们那里有一条原则：一个官员不论对社会民主党做什么都是对的；大家在心里说，我们不能破坏官员的威信，不能使他们的观点发生动摇。（右边有人喊道：“完全正确！”）我们经常不得不接受内务部的最不近情理的判决；我们事后才注意到了官员们的态度，除了他们的作法得到正式批准以外，私下里他们被告知：以后要干得机灵点。（喝采声）这种作法是合适的吗？这是纯粹的我行我素！这种作法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不能认为是正当的。最高当局之一的这种暧昧的作法究竟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恰当的称呼，我不想在这里说出来。

其次，请你们记住，在成百起这类事件中人们根本没有提出申诉；他们知道，这样做没有用，首先他们知道，通过申诉预定目的还可能达到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对申诉作出的裁决总是拖得太晚。

此外，还有另一种手段，在萨克森，在许许多多部门可以看到

这样一种作法：当工人来要求出具书面证明，说明不准集会的理由时，当局拒绝作这样的书面说明，也拒绝支付费用。这样工人的申诉权也就被可耻地打了折扣；它们不想让禁止集会的理由落到工人手里，免得工人根据书面告诉他的理由再搞一份诉状。这样做是否正当，我让你们自己去判断。（右边发出喝采声）——是的，这当然是不正当的行为；但是，同事先生们，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包含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本性中；这条法律可以这样来执行，以致不法行为成了真正的法，而法律状态却不存在。

此外，还有一种崭新的手段，已多次被用来打消工人们提出申诉的念头。例如，前几天我收到从阿恩施塔特寄来的一个报告，说那里有一个集会被禁止了，大家都对地方官发出了怨言，因为他要求为裁决支付10.50马克的费用。（笑声。——左边有人喊：“听啊！”）可怜的工人，他们的集会被禁止了，他们想向上级主管部门呼吁保护他们的权利，却要支付10.50马克的费用，这样地方官或许会仁慈地作出裁决：禁止集会合法的。于是在这个地方一切寻求法律保护的行动都会停止。在这里工人们必然会越来越深信，对他们来说，再没有什么权利可言，我相信，我真的再没有必要作这样的阐述；这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请你们想一想，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了千百次，并且不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存在的大约11年中发生的，而是在两、三年中发生的。我作了一个统计，统计的结果是，除柏林（那里也发生了许多次禁止集会的事件，只是我们还不能一一确定）而外，从今年1月1日起到9月1日止，在德国有360多次集会被解散或被禁止。（左边有人喊道：“听啊！”）我用不着对你们说，尽管发生这样多起解散集会的事件，工人们并不是在一切地方都向上级机关提出申诉，完全撇开起草申诉书照例会使工人感到巨大困难这一情况不谈。然而，你们很容易想象得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这种滥用产

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谈谈报纸。我承认，在这方面和从前相比，限制稍微放宽了一些。很久以来就在这样做了，我已经听说，这是根据政府的一项协议才这么做的，在完全查封某家报纸之前，先禁止该报的某一号，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里就是这样建议的。但是情况并未因此而有多大的好转。我们来看一看导致查封判决的那些文章！查封的理由是极其独特的。内务大臣先生作为帝国委员会的成员会向我证实，在许多场合，在各个不同的邦，查封报纸的事都是由下级机关根据转载的、在柏林工人报纸上不受指责地发表的文章干的。我想向内务大臣先生说句恭维话，在德国广大地区，包括萨克森在内，人们都怀着某种羡慕的心情注视着柏林目前的形势，因为在柏林工人报纸享有的自由比德国其余的地方大得多。但是，这种情况也还是建立在随意性的基础上的；如果现在的内务大臣先生让位给另一个人，比如说让位给他的前任冯·普特卡默先生，或者是普特卡默先生的兄弟冯·普特卡默-普劳特先生（笑声），那时我们想看一看，风从哪里来。那时风将从另一个角落刮过来。无论如何，这种稍微放宽限制的作法随时都可能停止。一条允许放宽限制的法律构成纯粹的任意性；它在一个地方允许这样做，而在另一个地方则禁止这样做。这条法律的执行必然会对当局和群众产生影响，造成极度混乱和人心沮丧。群众会在心里想：究竟什么是公理？谁是对的？普鲁士内务大臣是对的呢，还是萨克森内务大臣^①是对的？

我想向你们讲一件我刚刚想起的真正荒唐的事情，它表明各地方最高当局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运用是多么矛盾。在西里西亚，社会民主党打算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目的是解决下一届国会

^① 赫尔曼·冯·诺斯提茨-瓦尔维茨。——编者注

议员的候选人问题。布勒斯劳警察局下令禁止这次集会；内务大臣根据向他提出的电报申诉作出裁决：取消禁令。很好！取消的裁决来得很及时，集会可以在下星期天举行。

先生们，但是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巴伐利亚内政大臣先生^①是怎样裁决的呢？在纽伦堡，几个星期以前社会民主党要举行一次巴伐利亚全国会议，以解决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问题。纽伦堡当局，特别是区政府，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九条禁止举行这次集会。在慕尼黑的内务部接到申诉后批准了这个禁令。这样巴伐利亚内务部便宣布社会民主党的一次为了推选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而召开的代表大会为“旨在推翻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之企图”，如像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中所说的那样。而普鲁士内务大臣则宣称，这是一种完全奉公守法的、必须予以支持，或至少必须予以赞同的企图。（左边有人喊道：“听啊”！）

请你们想一下，当巴伐利亚工人和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知道两个德意志邦的最高负责当局所作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时会有什么样的表情？你们还相信，靠你们现在为这条法律规定的预防措施，靠你们的所谓放宽限制能使情况得到任何改善吗？集会今后像过去一样，要受个别主管部门、地方主管部门的监督；萨克森作出的裁决和普鲁士作出的裁决不同，巴伐利亚作出的裁决又和萨克森作出的裁决不同，等等，而形形色色的裁决今后会像过去一样纷至沓来。什么事情允许做，什么事情不允许做，这完全取决于有关官员的个性。这个标准是，而且必然是这条法律的唯一标准，这一点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本身的特点。

现在谈谈戒严。各邦政府特别重视戒严；它们宣称：戒严绝不可少，在紧急情况下我们必须实行戒严；因为——昨天内务大臣先

① 麦克斯·冯·费利茨。——原编者注

生大约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实行的小戒严如果被取消的话，所有的宣传员就都可能重新回来，那时什么不幸的事情都可能发生！那样一来，我们很快就不得不宣布大规模戒严。

先生们，内务大臣先生知道得非常清楚，你们当中除个别人外，所有其他的人直到现在都根本不关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实施情况；所以他能够向你们说这样的话。我们比较了解真实的情况，我们知道迄今为止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的情况，尤其还知道种种驱逐出境的事件，因此，我们能给你们提供更好的信息。正象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整个说来已有500至600人被驱逐出境。但是若干年来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在得到当局的批准后已返回原地，再未被驱逐。另一部分人已远渡重洋，他们在那里生存下来了，当然不再回来。第三部分被驱逐出境的人在德国其他地区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也丝毫不想再回去。最后，至于说到那些被当成主要目标的人，那些当局主要想拒之于千里之外的人，即我们这些议员们，我们这些被驱逐的党的领导人——那么，对我们来说，何处是归宿终究是完全无所谓。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为党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且我还要补充一句，今天我们的工作干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得多，工作的范围和内容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广泛得多，这是你们采取驱逐的作法给自己带来的耻辱。（左边有人喊道：“听啊！”“听啊！”）

先生们，你们驱逐我们达到了什么目的呢？当然你们已经，例如，毁灭了我过去的生计。我终于被迫退出我呆过的那家公司。多年来我曾努力为这家公司搞外勤工作；但是每一个商人都知道，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警察当局的恩准一年当中最多有两三天的机会来到他从前居住的地方经营他的买卖，那么这个人就根本不可能详细了解经营情况和买卖的发展情况，这个人就无法充分了解

他的顾客和他们的关系，而在每一桩生意中不仅是老板，而且还有他的伙计，外勤人员，都必须知道顾客和他们的关系。现在，我终于完全退出来了。我不得不声明：再也不行了，我同我对公司老板承担的义务发生了极大的矛盾，因为我不能履行委托给我的和我愿意履行的职责。然而结果如何呢？结果是，今天我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了社会民主主义宣传，我把我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党。现在促使《北德总汇报》三番五次地用激烈的语言抨击我的所有那些事情，例如，我对德国面包房帮工的状况的调查，等等——是如何才能办到的呢？只有在我被驱逐之后^①才能办到，这时我已经完全自由自在，不受公司方面的任何义务和要求的束缚了。

我们的议员辛格尔也是这些危害国家的宣传员之一，因此，人们把他从柏林驱逐出来了。你们真的相信如果允许他回到柏林，柏林就会有危险？帝国国会在此举行会议的整个期间他都可以在柏林逗留，但是要说这会给柏林的安宁带来特别大的危害，恐怕连你们也不相信。他也是由于驱逐，被他的公司排挤出来了，他也中途退出了他的公司，因为他作为一个诚实的和认真负责的人，不能同意继续作为一个股东参加他再也无法为之效劳的公司。今天他也把他的全部精力和他的资金交给社会民主党支配了。你们从这里得到了什么好处吗？

我的朋友李卜克内西始终是一位作家。他从事这个职业的愿望是不可遏止的。驱逐把他同他的人丁兴旺的家庭分开了。为了孩子们的教育，他不得不让他的家庭留在较大的城市里。他的家属住在莱比锡，而他本人则住在一个名叫勃斯多尔夫的小村子里，这个村子属实行戒严外的地区。不管对他来说同家人的分离有多

① 1881年6月27日萨克森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下宣布对莱比锡市和莱比锡地方长官管辖实行小戒严。从6月29日起生效。因此，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便被驱逐出莱比锡。——编者注

么痛苦，党却获得了极大的好处，今天他已不像过去朝朝暮暮地生活在他的人丁兴旺的家庭中那样，今天他已经有富裕得多的时间来把他的全部力量贡献给我们的事业。

我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其他的人。我们的同事迪茨被驱逐出汉堡。当他在汉堡的时候，他从未在公众集会上发表过演说，他在汉堡讲的话比在这里，在国会上讲的话还少。不仅如此，他从未关心过宣传，从未公开露过面，然而他却被说成是危害国家的宣传鼓动员。为什么？唯一的原因是，他是一个大印刷厂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个杰出的领导人，不受当局欢迎的一家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就是在他的印刷厂里印刷的。他在事业上所处的这种地位就是他之所以被驱逐出汉堡的原因……

你们曾经用最尖锐的语言谴责对宗教改革、对胡格诺派教徒的迫害，谴责对伽利略和乔尔丹诺·布鲁诺的迫害——我们手头的历史著作没有一本不作这种谴责。今年你们还在罗马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乔尔丹诺·布鲁诺节，全世界的自由党人都参加了。你们自由党人当时在你们的报刊上赞扬了一种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战胜的思想的力量。这样，你们自己就清清楚楚地表明，任何物质力量都无法与精神力量相匹敌。你们自己在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胜利地亲身经受住了反动派的斗争——这一切的一切你们都忘了，你们今天正重蹈覆辙，想用暴力手段来反对一种精神力量，反对一个代表着伟大的文化运动的党。我前面的一位演讲人库勒曼先生刚才承认，我们党代表着文化运动，这一点甚至冯·普特卡默先生也承认——然而你们却想用非常法来对付像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样的文化运动。你们以这条法律为根据使用的最锐利的武器，在用来反对这个文化运动时将像玻璃碰到花岗石那样摔得粉碎。像你们已经开始的那样继续干下去吧！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正在毁灭我们的生计，迫使社会民主党朝着推翻现存的

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方向努力的话,那么,先生们,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社会民主党人喊道:“说得对!”)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演说和著作选集》
1978年柏林版第2卷第1分卷第614—630
页。

(李俊聪译)

面包业工人状况*

导 言

(1890年9月)

卡尔·马克思在1867年7月25日写的《资本论》第1版序言中对英国、德国以及西欧的社会统计进行比较时写道：“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①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像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像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像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会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么，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项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②

自从马克思写了这个评语以来，已经过去23年了。在这23年

* 《面包业工人状况》1890年9月在斯图加特出版。倍倍尔为了写作这本反映面包业工人生活、劳动情况的书，发出5000份调查情况的表格。他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描述了面包业工人劳动时间长、工资低，生活贫困等情景。同时，提出了禁止星期日和夜间劳动以及法定劳动时间、改善工人状况等要求。直至1896年7月1日，面包业工人的劳动时间才从每天14个小时缩短为12或13个小时。——编者注

① 美杜莎——古希腊神话中3个蛇发女妖之一，凡是看见她的人都要变成石头。后为柏修斯所杀。转意为可怕的怪物或人。——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编者注

当中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对于一个民族的现代经济发展来说就像空气之于人那样不可缺少的政治集中——尤其是关于贸易、交通和工商业方面的立法——在此期间已充分实现。继政治集中之后，德国工商业政策的发展，它的大资本主义的集中所达到的完善程度，在这个时期的开始阶段，几乎是想象不到的。

今天德国已是欧洲的第二个贸易和工业大国。它的“国民财富”急剧增长，它的工业现代化竭力模仿英国的榜样，采取了在现代资产阶级发展的样板国家中早已成为典型的那些形式。与大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无产者的大批涌现和中等阶层的无产阶级化相适应，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而且20年来这个运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业已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

这个运动为反对现存社会制度而进行的斗争，献身运动的作家和演说家对现存事物所进行的批判，必然也会引起那些就其社会观点和科学观点而言大概是致力于研究经济关系，而本身只是太乐于颂扬现状的人对运动及其产生原因的注意。我们在这里首先指的是高等学府中从事写作的国民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学说。工人运动的日益增长的力量，迫使这些人抛弃他们迄今所使用的那种狭隘的、目光短浅的看问题的方法，迫使他们把自己的眼光转向实际生活，并将观察到的事实同假定的理论进行对比，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以及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和他们在科学上的先锋战士的要求的正当性。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等人的著作成了这些人热心研究的对象，即使人们只是在完全例外的情况下才决定公开地和无保留地支持工人阶级的这些科学上的领袖——部分原因是认识不能提高到这些领袖们的高度，部分原因是对立场和进步的顾虑妨碍他们表示公开承认和赞同——，然而研究他们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并且还迫使人们遵循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效法

已有的榜样。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何善于利用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议会调查委员会报告和医生关于英国公共卫生状况的正式报告（这些报告向德国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们指出了他们应走的道路）来进行论证的方式。当然在德国几乎完全没有——正像马克思在本文一开头就引证的《资本论》序言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在英国几十年前就已大量存在并收集起来的东 西：有用的正式社会统计资料。某些德意志邦到那时为止还根本没有兴趣让人进行这种调查。过去留下来的东西是一些简短的、大部分散失在各地的，或者鲜为人知的关于某些工商企业的状况的论文，这些论文很少是根据深入而有计划的研究写成的，尤其是它们根本没有为自己提出更高的目的——揭露和调查一部分社会机体的经济结构，以便了解种种弊端，进而根据这些弊端阐明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必要性。

这方面在德国学者当中第一位可以说是披荆斩棘的人，就是阿尔丰斯·图恩。1879年图恩在他的两卷本著作《下莱茵的工业和它的工人》中非常内行地描绘了亚琛地区的织布工业，克雷费尔德地区的丝绸和天鹅绒工业，格拉德巴赫地区的棉纺织工业，索林根和雷姆沙伊德的刀具和五金产品工业，以及乌培塔耳的纺织工业的状况。继他之后，艾曼努埃尔·萨克斯于1882年发表了《图林根的家庭工业》一书，这本书使工厂主们感觉到，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因而写了许多反驳的著作。其次，除了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著作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施纳佩尔-阿恩特博士的《陶努斯山区的5个村社》，布鲁诺·舍恩兰克博士的关于《宗奈贝格区的家庭工业》的调查，《关于弗兰肯的编筐工业状况》，特别是他的《菲尔特的汞涂镜业和它的工人》一书。先于这后一本书之前出版的有H·赫克纳的《上阿尔萨斯的棉纺织工业和它的工人》，继

这本书之后，最近又出版了一本Fr·莫尔根施特恩博士的《菲尔特的金箔制造业》。这些专题论著的大部分，正像它们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主要是研究家庭工业状况的，而且是出于一个非常自然的原因，因为这些家庭工业通常集中于一个比较小的地区，因此，对那些没有官方的权威，而只是依靠企业主和地方当局的善意经营自己行业的个人进行考察要容易得多。

考察一种分布在帝国各个部分的行业或工业，或者考察遍布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小企业的状况所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而且大部分困难简直是无法克服的。由于对任何极其重要的社会政治调查来说都是个人的见闻和观察，要想当面提问和回答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得不依靠第三者提供的书面材料，而且往往要依靠那些不大会书写、对最直截了当的问题只是作吞吞吐吐的回答的人。如果这样的调查由一些私人来进行，那么即使他们的联系和关系比较广泛，这样的调查也必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他们不可能提供被调查的工商企业的非常清楚的，直至各个细节都一览无余的情况，他们只能提供一个梗概，这个梗概的轮廓表明，如果这样的调查由官方权威机构用享有官方权威的人所能支配的或应当支配的辅助手段来进行的话，可能会暴露出什么问题。

最近15年内德国工商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出现的一批较年青的学者所编写的专题研究著作，充分揭示了在这些工商业中就业的人的社会状况；这些专题著作多次揭露了极其丑恶的种种弊端，它们打开了一幅幅向我们显示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美杜莎的头，即隐藏在社会内部深处的东西的图画。这些描述和揭露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反过来又推动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献身于这种社会统计调查和开辟新领域的事业。因此，本文开头援引的卡尔·马克思关于德国情况的那段论述，有一部分已经失效了。

相反，官方对我国的社会状况所进行的调查基本上依然如故。

当然即使在这方面我们也不再处于1867年那种原始状态。德国工人运动变得越来越强大，这种强大也表现在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在国会中的代表不断增多上；工人阶级通过在政治上为一切党派捍卫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的行动而使自己的重要性增加了，——这一切迫使政府和统治阶级对这个运动和它产生的原因给以越来越大的关注，并承认社会问题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在议会、报刊和大量集会的讲台上利用各种机会就社会问题进行的讨论中都有许多试图扮演新的俄狄浦斯^①的聪明人，以便解开社会问题这个世纪之谜。尤其是各个政党在国会一再提出的关于制定某些比较广泛的劳工保护法的提案，迫使人们进行研究根据现有事实这些要求在多大程度上是正当的。当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人们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只是摸索着前进。我们的达官贵人中受过社会政治教育的那一部分人是在雇主阶级的观点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对来自下面的一切东西都不相信并怀有敌意，因此要他们进行具体的、能够把那些也许是真正见不得人的事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调查，他们是非常不情愿的。此外，德意志帝国全部对内对外政策的最高领导人俾斯麦公爵一开始就对这类调查和由此而产生的劳工保护立法持公开敌视的态度，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各种调查机构在进行调查时不得不极端小心谨慎，瞻前顾后，以致最后它们的调查结果都蒙上了一层迷雾。最近15年中所进行的各式各样的调查都害怕公之于众，害怕引起任何公开的讨论，只有当它们的结果公布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在这方面德国国会同英国议会相反，当人们要求它通过某些鼓励进行这种调查的决议时，它所起的作用完全是消极的。议会方面从不参与这种调查，除非政府宽宏大量地允许议会参与，否则这种活动是宪法根本不容许的。

① 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解答了斯芬克斯向他提出的难解的谜语。——编者注

德意志帝国国会无权要求成立拥有全权的，可以传询证人和知情人，如有必要，可以让他们宣誓作证的，有权强迫当局向它提供澄清事实所必需的情况和支持的调查委员会。1868年社会党人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提出的一项应让国会享有这一全权的提案，由于遭到那一届国会的几乎一致的反对而失败了。起初人们认为不需要给予这种授权，后来出于一种形式上的顾虑——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刚生效不到一年就又要进行修改——拒绝了这一提案。至于在1890年国会春季例会上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的一项类似提案是否有较大的希望获得成功，目前还是很值得怀疑的。^①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帝国政府感到不得不多次（而且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有时是由国会推动的）允许对工人的特殊状况进行调查，而这种调查是用纯粹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的之后，帝国国会必定会承认，不仅这类调查今后必须要更好地为它的目的服务，而且对立法者来说，从他们自己的队伍中派人参加调查委员会，并担任调查委员会的领导是有极大意义的和极其重要的。

70年代中期由帝国进行的关于工业部门妇女就业情况的调查，以及作为这一调查的补充的关于服装类产品制造业中的女工的状况和关于工商业部门星期日加班情况的调查，远远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弄清问题真象的目的，因为调查所采用的方法是不正确的，因此它多次受到内行人的谴责。不是任命内行的调查委员进行调查（他们知道用公开的和对比的办法进行调查，并不厌其详细地询问自告奋勇愿意回答问题的人），这个任务被委托给了行政官员，他们按照一般的问题模式提出问题，被调查的人也由他们随意

^① 倍倍尔指的是1890年5月18日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提出的一项提案，它要求成立一个德国国会调查工人状况的委员会。1890年12月9日倍倍尔说明了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提出这个提案的理由，然而未得到通过，不了了之。——原编者注

挑选。这些官员在许多情况下都害怕全部真象被暴露出来和记载下来，他们担心，这里那里会得罪人，这是明摆着的。

德国采取的调查方式同英国议会委员会的调查方式还相去甚远。1889年秋季进行的关于普鲁士矿工状况的调查再一次中肯地证明了这一点。负责进行这次调查的恰恰主要是这样一些机构，按照它们的官方地位和社会地位来看，它们相当关心的是不让最坏的情况暴露出来。

正像帝国迄今所进行的关于工人的调查令人感到有许多不足之处一样，工商业视察员根据他们的公务活动编写的报告也是差强人意的。关于那些在讨论工人的状况时显然最使人感兴趣的东西、应该构成调查的核心东西，如工资的高低、劳动时间的长短、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发病率和死亡率等方面的情况根本什么问题也了解不到，或者只能找到一些言之无物的、不能作为重要判断依据的记载。谁想要找到一点点关于提到的问题的有用的材料，他就得花很长的时间从头到尾去阅读视察员的报告。即使是关于童工、16岁以下的青工，以及女工的报告（由于现行法律作了保护规定，关于这类工人的情况绝大多数视察员都进行了调查）所包含的内容也远远不符合人们的要求，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和应该期待的东西。首先帝国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所使用的方法绝不是统一的方法，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每一个城市都各行其是，如何登记，由它自己随意决定，结果我们在德国处于一种奇特的状况，这就是根据工商业视察员的报告，关于同一问题我们根本无法作出恰当的对比。其次，视察员的人数太少，比实际需要差得很多，以致不能进行要花大量时间来进行的社会统计调查。最后，这些官员中的大部分人对自已的官职和责任的想法也同大多数英国工厂视察员的看法大不相同，英国工厂视察员认为，他们应该成为保护工人的官员，他们的唯一职责就是排除一切对工人的

身体和生命有害、对工人的道德价值有损的东西，或者直言不讳地把它们和盘托出。而德国工商业视察员的大部分报告都竭力体贴上面的意思和照顾雇主的面子，而且往往对工人抱有很深的成见。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工商业视察员的报告内容是极其贫乏的，整个来说，它所包含的对社会学家和社会政治家有用的材料少得可怜，尽管这些报告已逐渐汇集成卷帙浩繁的巨著。谁如果把这些报告当作他求知的唯一源泉，并想根据它们来了解德国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那么他得到的是一幅完全不真实的关于德国工人状况的图画，他完全是在黑暗中探索最重要的问题。

终于冲破了紧紧地束缚着迄今为止的活动的框框、至少勾划出了对本国工商业特别重要的一支工人队伍的劳动状况和生活状况的图画的唯一工厂视察员是巴登的工厂视察员沃里斯霍费尔先生。他除发表了一份他作为视察员在1889年的公务活动的报告而外，还发表了一部经过辛勤的劳动得来的、内容广泛的著作《巴登大公爵雪茄烟工人的社会状况》作为该报告的附录。这部著作普遍受到称赞，它的内容是非常客观的，它详尽无遗地描绘了载入本书的那些雪茄烟工人的社会状况，根据现有材料来看，其详尽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沃里斯霍费尔先生的著作指明了德国工厂视察员应走的道路，如果大家都步他的后尘，那么这条道路就会为科学和实践提供理论研究和实际立法的丰富材料。

除了工商业视察员，或工厂视察员而外，负有监督责任的特别还有警察当局。在我国，警察当局必须监督有关社会福利的警察条例的实施和协助检查官员。关于警察当局的活动，整个说来，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要是他们都克尽职守，或者没有把自己的职责忘得一干二净，那么我们看到的，例如，一部分工人和整个工商个业的劳动场所和住宅就绝对不像现在这样糟糕和简陋。在最近12年中，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统治下，德国警察花

了这样多的时间、力量和手段来监视和迫害社会民主党，而且对整个社会来说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可是对个别人来说大概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如果德国警察把这些时间、力量和手段用来经常检查某个工人阶层的劳动场所和住宅，以及了解他们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那么德国警察所做的造福于民的事会多得多，他们会使整个工人阶级对他们承担的供养国家的任务产生崭新的、更崇高的概念，而不像现在这样。

根据我们对德国面包工人的状况所进行的调查业已证实的、暴露了在许多场合会使监督社会福利的警察（结果他们多少意识到一点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的话）的干预成为必须履行的义务的状态的种种事实，特别使我们得出了这样的判断。可是福利警察的干预还不多见，否则14至18岁的青年就不可能遭到这样无耻的剥削：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得非人所能忍受，他们的劳动场所，除了极个别的地方，完全不符合卫生的要求。然而我们却看到，这种剥削和对人的摧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而公共福利的卫士们却丝毫无动于衷，根本不打算采取措施减轻或消除这种践踏一切人性的状态。在下面提供的材料中所包括的东西，尽管和遍及整个德国的一种祸害的规模比较起来微不足道，但它将引起公愤，将使广大群众感到必须无条件地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了国家和法律，对这个部门必须进行干预。

面包工人（包括学徒工在内）的状况，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一切工人中大概是最悲惨的。卡尔·马克思向我们描写的关于伦敦面包业的状况^①（这个状况是根据1863年由国家下令进行的一次调查暴露出来的，正像马克思所形容的那样，它不仅激动了英国公众的心，而且也激动了他们的胃），同某些奥地利工厂视察员在他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78页及以下各页。——原编者注

们关于他们视察过的面包房的状况的报告中所描绘的情况完全一样，此外，也同我们进行的调查所了解到的情况完全一样。

面包工人，以及帮工和学徒工，除少数人外，都处于简直是非人的境况。正像下面的调查材料所表明的那样，星期天和平常的劳动时间除了极其罕有的中断和例外，一般都长得要命，以致即使是最健壮的身体在短时期内也必定会被搞垮。同时在多数场合，劳动场所条件极差，它们多半都设在楼房的底层，缺乏新鲜空气、照明和通风设备。劳动场所往往也很狭窄，肮脏不堪。帮工和学徒工，在许多场合往往还有老板，就是在热气腾腾，令人汗流夹背的高温下，在污浊不堪的空气中，制造人民最重要的食品，它既是宫廷也是茅屋中每日消费的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单是后面这个情况就应迫使当局作出极大的努力来调查同公共福利有最密切关系的这个劳动部门的状况。

既然在帝国内每天几乎有20万人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条件下从事制造人民最重要的食品的工作，那么，提出下面这个问题，例如，对公众来说，毫无疑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危险：面包业中出现的情况正把大量传染病菌散播到千百万人当中去。现在到处都在惶惶不安地调查研究引起危险疾病的杆菌是从哪里来的，它可能通过什么渠道继续传播开去？特别是引起肺病的杆菌，它的产生、生活和传播方式正受到科学的最仔细的研究和观察。一旦找到某种传播这种非常危险的疾病的媒介时，人们就会立即把它公之于众，并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不过，可以推断，我们的相当大一部分面包房是肺病的一个主要疫源地，这不仅可以从患痨病的面包工人特别多这一事实中看得出来；面包房的整个状况，正像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描绘和材料所表明的那样，在我们看来正是肺结核杆菌孳生繁殖和传播的最好的地方。我们只要想一想在烟雾腾腾和尘土飞扬的烘烤房里，在令人难以

忍受的灼热下，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累得死去活来，大多患了结核病的大批面包师帮工和学徒工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就够了。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这种情况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负责过问一下，而是听之任之。

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有调查表上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您居住的地方，干您这门行业的帮工主要患的是什么病？从我们收到的回答来看，总是首先指出：“患肺病”，或者是“肺部患病”，这是民众口中用来表示结核病的两种普遍流行的说法。其次是风湿病和皮肤病（癣、疱疹）。

因此毫无疑问（谁如果还有疑问，书中公布的事实将会把它打消），对面包业的状况进行一次正式调查是我国工商业部门和卫生部门的警察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他们同面包业的状况有非常直接和共同的利害关系，几乎是其他任何部门所不及的。因为尽管磨坊业和酿造业的状况同面包业的状况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这两个行业，以及还有许多其他行业，也迫切需要进行一次正式调查，然而无论就面包业从业人员数量之多而言，还是就它的产品的性质和公众与面包业的关系而言，都在更大的和更迫切的程度上，要求国家进行调查和立法机构予以帮助。

1889年5月9日联邦议会用命令的方式颁布了有关卷烟工厂的详细规定：厂房高度、从业人员每人平均应占有的空间、安装通风设备的必要性、每天擦洗供劳动用的桌子和劳动场所的地板的义务。毫无疑问，这道命令是非常必要的，它所起的有益作用，今天已得到公认，但是为面包业制定类似的法规尤其有更大的必要，而且这种法规还要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它必须节制帮工和学徒工的白天劳动和夜间劳动。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至今都没有这样做；有关面包业的状况，上

级机构不可能像看起来那样几乎完全不知道，因为它们肯定知道别的国家面包业方面的情况，这一点可以使它们大致推测出我国面包业的状况。此外还有些工厂视察员已经指出了按工厂方式经营的面包房的种种弊端，而在小规模上经营的面包房这种弊端还更多。最后，招募新兵的名单必定表明，在面包工人中不适宜于服兵役的人所占的百分比特别大，比大多数其他行业的工人都大。

雇主们不肯自己主动地着手改善他们的企业的状况，这是完全符合一般雇主，特别是面包房老板的狭隘的阶级利益的。不断膨胀的、往往缺乏最起码的教育的自吹自擂所起的作用无论在哪个行业中（也许肉类加工业除外）都没有像在面包房老板那里所起的作用那样大。工人们一般都被当成了奴隶，可以向他们提出任何苛刻的要求。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是最原始的，他们受到的待遇简直是非人的，只有对那个按照他们的平均教育程度和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来说可以容忍这种待遇的工人阶级才能采取这种丧失人性的作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面包工人多半都是从农村招聘来的，现在他们处在这样一种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下，在这些条件下他们的一切向上的努力和一切自尊心很快就被压制下去或者被窒息，而决不是被唤醒。

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整年整月都像牛马一样干活的工人，由于他们的工作方式，不能享受文化生活，他们缺乏一切教育手段，一旦他们有了几小时空闲时间，他们就或者睡大觉，以便恢复可怕的过度劳动所造成的疲劳，或者，如果他们还想暂时得到一点乐趣的话，就去赌博或喝酒，或者寻找其他有刺激性的、损害健康的享乐，这种工人对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毫不敏感，一般说来，他们只是在慢慢地挣扎，试图从环境迫使他们陷入的那个泥坑中爬出来。大部分面包工人的境况都是这样，雇主们绝大多数都不择手段地企图把他们的工人保持在这种精神堕落和体质蜕化的状态下。有

头脑的、意识到自己的人权的工人不愿被人当牲畜看待；但是少数人想的和相当多的雇主所关心的事情是，如果工人死了，每天都必须有人来顶替他。

正如调查中收集到的各种不同的言论所表明的那样，面包工人中比较有干劲、比较进步的分子也直言不讳地公开承认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由于绝大部分面包工人都处于这种愚昧和麻木不仁的状态，工会努力把他們组织起来，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经过长年的不懈工作之后，在最近一个时期才开始打下较好的基础。由于同样的原因，每两周在柏林出版一次的面包工人的机关报《德国面包工人报》只拥有相对说来数量较少的读者和订户。

但是老板方面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所谓的“日耳曼联合会”中，老板们多年来就已拥有一个遍及整个德国的组织，相当大一部分雇主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经常利用这个组织来尽力压制和残酷无情地摧毁他们手下的、迄今为止还仅仅是一小部分工人试图改善自己的境况使之变得比较符合人的尊严的努力。为此目的，他们早就向他们联合会的会员所雇用的工人颁发了所谓的日耳曼-职工劳动手册，这是一种证明书，一个工人如果想就业就必须持有这种证明书。同时，这些劳动手册还有一个作用（而这是违反工商业管理条例的），这就是它们被老板用来作为登记那些积极活动，为自己的伙伴争取较好的地位从而成为他们眼中钉的工人的行为和败坏这些人的声誉的手段。面包工人由于精神颓废堕落，而又缺乏组织，所以在极大程度上成了任凭雇主随意摆布和剥削的牺牲品，而且雇主还有一个好处，即通过普遍推行的学徒工培训制度——进行这种培训一般是大多数手工业同业工会师傅的标志，他们可以充分使用他们的学徒工，这和工厂的劳动相反，被看作是一种理想状态——在他们面前始终有一大批剩余劳动力，他们随时都可以用流落街头的劳动力来代替在业的，或不服从命令的工

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特别有必要通过面包工人立法。通过保护法律和对面包业的严格监督，将制止那种毁灭面包工人，甚至是谋杀他们，同时也使公众的身体健康受到威胁的状态，这种状态使那些比较熟悉它的人感到愤慨、恶心和憎恨。

50年代中期在英国，特别是在伦敦，掀起了一股对众所周知的、在面包业中大肆泛滥的面包掺假现象强烈不满的风暴。这个抗议行动促使下院成立了一个调查食品掺假行为的委员会。调查的结果是，在1860年颁布了一道“防止食品和饮料掺假”的法律。在公众密切注意到面包业有掺假行为之后，群众集会和递交议会的请愿书也受到了人们的注意，伦敦面包工人在这些群众集会上和请愿书中发出了反对过度劳动等等的呼声。结果在1863年任命了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来负责调查群众的申诉。

关于调查所取得的结果以及对公众和立法所造成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作了描述，我们在这里要援引他的两段话，因为在这两段中他谈到了面包业的状况，其中几乎逐字逐句都符合德国的情况。我们进行的调查业已证实了这一点。不仅如此，我们甚至相信，如果德国肯学习英国的榜样，勉为其难地进行一次深入的、真正能了解真实情况的官方调查，那么还会暴露出许多更糟糕的情况。进行这样的调查必定会立即涉及到某些将特别使顾客，也就是使整个公众感到极大兴趣的经商秘密和商业上弄虚作假的行为。若干年前不是从波希米亚运进过整整一列车重晶石粉，它的用途不是为了同制造面包用的面粉掺合在一起吗？

关于英国人进行调查的结果，马克思这样写道：“皇家调查专员的报告和证词激动了公众，不过不是激动了公众的心，而是激动了公众的胃。熟读圣经的英国人虽然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

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发酵粉，不用提明矾、沙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因此，不管‘贸易自由’多么神圣，这个一向‘自由’的面包业终于受到国家视察员的监督（1863年议会会议快结束时），同时，这次会议通过的法令还禁止18岁以下的面包工人在晚上9点至第二天早晨5点这段时间内做工。上面这项条款充分说明了这个带有古代遗风的工业部门中过度劳动的情形。”

接下去马克思列举了一些说明工人劳动时间和方式的材料，这些材料反映的情况和德国的情况毫无二致。他写道：

“伦敦的面包工人通常在夜里11点开始干活。他先发面，这是一种极费力气的活。根据烤制面包的数量和精粗的程度，需要半小时到三刻钟。然后他躺在那块兼作发面盆盖子的面板上，拿一面袋枕在头下，再拿一面袋盖在身上，睡几个钟头。随后他一连紧张地忙上5个小时，把面揉好，分成一块一块，做成面包的样子，放到炉里去烤，再从炉里取出等等。烤炉房的温度达75度到90度，小烤炉房的温度还要高些。各种各样的面包做成后，分送面包的工作又开始了。短工中的一大部分人刚刚结束了上述繁重的夜间劳动，又要在白天提着篮子或推着车子挨户送面包，有时他们还要再在烤炉房里干些别的活。根据季节和营业范围的不同，劳动在下午1点到6点之间结束，而另一部分工人则在烤炉房里一直忙到晚上。在伦敦社交季节，伦敦西区烤制‘全价’面包的工人通常是在夜里11点开始干活，一直忙到第二天早晨8点，中间只稍微休息一两次。然后就叫他们运送面包，或有时在烤炉房烤面包干，一直干到下午4点、5点、6点甚至7点。活全干完了才睡6个小时，有时只睡5个或4个小时。到了星期五，总是提前上工，大约从晚上10点开始，不停地烤制面包或发送面包，一直忙到星期六晚上8点，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一直干到星期日早晨4点或5点。就连出售

‘全价’面包的第一流面包房，到了星期天，也要为第二天做4—5小时的准备工作……在‘卖低价面包的老板’那里，面包工人的劳动时间更长，不过几乎是在烤炉房里做工，因为他们的老板除把面包供应一些小铺子外，只在自己的店铺里出售。每当临近周末……就是说从星期四起，晚上10点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星期六深夜，中间只有很少的休息。”^①

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

伦敦面包业所需要的“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英国的最重要的农业区苏格兰和德国。在伦敦，从德国来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完全自愿的、始终准备干最苦最累的活的“人手”。

现在让我们把根据我们在德国进行的调查所证实的情况同伦敦面包业的状况比较一下。

这里先要作一点说明。1889年晚秋，在柏林《面包工人报》编辑部和在汉堡的面包师联合会理事会以及同行们的帮助下，我们发出了将近5000张调查表。我们要求接受调查的人认真回答下面这些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工人本身的最迫切的利益。调查表上提出的问题如下：

1. 企业店铺所在地点的名称。
2. 公司或店铺的名称。
3. 它雇用的(1)帮工有多少？(2)学徒工有多少？
4. 工场的帮工中有没有已婚的人？有多少？这些人有子女吗？有多少？
5. 每天的劳动时间有多长？(1)帮工的劳动时间(2)学徒工的劳动时间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6. 帮工和学徒工除了本职工作外，是否还必须做其他的工作？都是些什么样的工作？
7. 干这些工作的时间是否包括在规定的时间内？
8. 如果不包括在规定的时间内，这些额外劳动要占用多少时间？
9. 通常干本职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79—280页。——编者注

班加点的现象？多长时间？（这里要求填写节假日期间、赶集期间，等等加班加点的情况，以便了解一年中有多少天发生过这种情形。）10. 星期天是否干活？干多久？11. 住宿情况如何？睡觉的地方怎么样？（这方面还有较详细的提问。）12. 伙食如何？工人是否必须吃存放时间很久的焙制食品，甚至当作午饭来吃？这种情况多久发生一次？13. 清洁卫生是否经常有人打扫？14. 周工资是多少？a)一级帮工的周工资是多少？b)二级帮工的周工资是多少？等等。15. 学徒工除了由老板供给膳食和住宿而外，是否还有一点报酬，有多少？16. 一年中有多少天完整的休息日（24小时休息）？17. 在您居住的地方干您这一行的帮工主要患什么病？18. 当地有多少老板？19. 当地干活的帮工有多少？20. 当地失业的帮工有多少？21. 其他。

发出去的大约5000张调查表收回了约745张。其中有一小部分问题回答得不完全，只好摆在一边。另一小部分没有采用，因为答案同在当地收到的许多别的现成的资料完全一致，采用这部分调查表看来是多余的。对有关地方的面包业的状况多少有利的答案，始终受到考虑。从同一个地方寄回来的调查表上所填写的有关当地现有的老板、帮工、学徒工的人数的材料有一部分非常矛盾，我们认为，这部分材料最好不公布。总之，这样做对于我们计划要达到的目的本身丝毫没有失去什么。

在较大一部分回答中，关于劳动场所、睡觉的地方的情况，关于膳食、清洁卫生的情况的材料还不太精确。在这方面个人参观和考察，以及更准确地提出问题的可能性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个人的见闻和考察比不管多么详细的回答都更有价值。然而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为了深入了解情况对广泛的领域进行个人考察是行不通的。这种事情只能由享有官方权威、可以到各地视察的人来做。总之可以断言，通过目前这种唯一可能的调查形式得到

的结果总是有利于对情况的了解，而不是不利于对情况的了解的。附在关于下面几个城市的报告后面的一般描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几个城市是德累斯顿、汉堡、巴登的奥芬堡等等。如果在各个地方都能找到熟悉情况和有才能的、提供过关于面包工人的全部状况的报道（如像对德累斯顿面包工人的全部状况所作过的那种描述）的人，那么我们看到的情况还会阴暗得多。还有一点不要忘记，相当大一部分面包工人对自己企业的恶劣条件已经非常习惯，甚至甘之若饴了，以致他们的生活用不着以任何符合人的尊严的存在的标准来衡量了。他们满足于在上面的人看来简直少得可笑的让步。例如，有几个法兰克福的面包工人在调查表上声明，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废除星期日劳动，尽管在一周中他们的劳动时间都长得要命，而且他们平常所过日子也绝不是值得羡慕的。这里谈到的劳动时间过长和星期日加班的情况，也可以用来判断膳食、住宿和清洁卫生等方面的情况。长年生活在最原始的条件下的人，对较高的文化要求已失去任何标准，如果说他什么时候曾经有过这种标准，那么，在这里考察的这类工人中，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形。

其次，我们曾多次压制了暴露工商企业搞的旨在使工人蒙受欺骗和吃亏的弄虚作假行为的描写，因为这些行为太令人恶心了，所以我们不好根据某些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人的证词公布它们。这又是一个需要进行彻底的官方调查的理由。这个调查如果用正确的方法进行的话，定会揭露出许多亲爱的公众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事情。

总之，我们把公布这些材料看作只是一次敦促，即敦促人们继续作更彻底的、而且是官方的调查，绝非这样一来就提供了关于面包业状况的详尽无遗的图画。然而，只是向比较少的地方发出的调查表所获得的答案表明，他们反映的情况是非常接近真实的，从

德国各个不同的地方寄来的材料大同小异这一点就是证明。柏林、汉堡、德累斯顿、莱比锡等城市(在这些地方除面包工人之外的其他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比较好)暴露出来的面包工人所处的无比悲惨的境况,一方面证明面包工人至今软弱无力,另一方面也证明雇主的行为非常残忍,他们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正在榨干自己工人的最后一滴血,他们全然不顾,在这种剥削制度下工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都会遭到毁灭。从这些事实来看,如果面包业不经常从农村人口中输入大量新鲜的人力和新鲜的血液的话,它就会成为那些再过几十年后就没有工人骨干的行业之一。面包业正在极大程度上使它的工人腐化和堕落,它是现有的摧残人最厉害的行业之一。

关于材料的编排还要说几句。这里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一种是用归纳的办法对从各地收到的调查材料进行分类整理,例如,在多少多少家店铺里就业的有多少多少人,在这些店铺里,劳动时间有多么多么长,还有如此等等的一些特点。如果选用这个办法,那么这是一个比较简便的办法,使人便于了解概貌。但是这种办法有一个巨大的缺点,那就是它抹掉了单个店铺的特点,这样就不可能列举大量较小的细节,而这对于说明面包业的状况和判断工人的境况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另一种是我们实际上已经选用的办法,这就是把有关每一个店铺的最重要的材料列在一起,构成一幅幅单独的图画。这样一来,对状况的描述当然不仅达到了大得多的规模,但同时也令人感到有点单调,不过它却有一个巨大的优点,这就是如实地反映调查的情况,它能够提供关于某个店铺和某个地方的状况的真实得多的图画,从而提供关于整个行业的状况的真实得多的图画。而这正是本书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目的。

从调查表上提供的答案看得出来,编写报告的人做了认真的努力,使他们提供的材料严格符合真实情况。读者也会得到这个

印象。在某些场合,尽管我们尽量轻描淡写,不用浓墨重彩,但摆在我们面前的图画还是非常阴暗的。

最后,还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一下,凡是没有强调指出别的什么情况的地方,在有学徒工的地方,提到的劳动时间也适用于学徒工。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演说和著作选集》1978年柏林版第2卷第1分册第792—811页。

(李俊聪译)

第一个十月*

(1890年10月1日)

我们度过了11年、11个月零11天的岁月之后,今天,1890年10月1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了。从此,终止了德国历史上最可悲、最耻辱的一段插曲。制定这一法令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消灭一个伟大的党,原因是这个党危害国家。这项法令因为毫无效果,就像一堆破烂折戟沉沙了,而该法令矛头所指的社会民主党却胜利了。这又一次证明,任何暴力手段都无法同发自事物内在本质、由于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而形成的民众运动长期对抗,任何想镇压和消灭这一运动的企图,到头来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想铲除社会主义运动的如意算盘的确存在。1878年10月19日在帝国国会会议上,以221票对149票通过,并于10月21日颁布的法令授权政府和警察拥有特别权力,它适用于彻底消除任何党的公开的政治性活动,而且立即得到强有力地、肆无忌惮地推行,这使人无法怀疑我们的掌权者要达到上述目的的真正意图。起初,国会中的德国资产阶级,哪怕在发生了赫德尔的行刺事件以后,仍然否决了俾斯麦提出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提案。1878年

* 1890年1月25日,德意志帝国国会否决了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提案,同年9月30日,废除了长达12年之久的对德国工人运动残酷镇压的非常法。德国工人为此欢呼、召开各种集会庆祝胜利。倍倍尔在本文中总结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经历的艰苦岁月,提出了今后的斗争目标。本文最初发表在《新时代》第9年卷,1890/1891年第1卷第1号第3—10页。——编者注

5月24日，第一方案以251票对57票遭到否决。但是，紧接着发生了诺比林的行刺案件，这件事使他们完全改变了态度，并且使他们的领袖卡尼格先^①彻底打消了他起初认为非常法的措施有害无益，以及认为存在危险的种种疑虑。他们对政治和社会敌人的仇恨压倒了他们的实际疑虑；他们那种只要可能就致对手于死地的企图占了上风，于是促成了非常法的出笼。尽管它收效甚微，但直到今天对我们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来说却显得如此必不可少，以致于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来看待这一法令的废除，他们惴惴不安，生怕给自身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不妨看一下政府及其机构对旨在消灭扎根于国家和社会肌体中的敌人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可以说各种措施不计其数，但毫无收效。

法令刚刚颁发，禁令、迫害便纷至沓来，一个接着一个，极力显示法令的威风。1878年10月21日至1879年6月30日，也就是在短短的7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有147种期刊和278种不定期的刊物被查封，217个协会连同5个出纳处遭警方解散。此外，1878年11月28日对柏林、波茨坦和郊区实行了小戒严，紧接着第二天，67位党的最著名的拥护者被驱逐出境，无法生活，他们都是孩子的父亲，其中一部分人还经营着自己的商店。继这67人之后，在下一年中又在各地区驱逐了几百人之多。

查封报纸、禁止刊物、解散协会和出纳处，这些作法使党开设的14个印刷厂濒临倒闭。其中大多数不得不结账清库，关门大吉。为数众多的编辑、发行人、书商和各种辅助工作人员一夜之间丢了饭碗，这些人连同被驱逐的人及其家属，不得不依靠同志们的救济过活。这些人显然互不来往，分散在各地。起初，很难把他们聚集

^① 鲁道夫·卡尼格先(1824—1902)——德国政治活动家，主张在普鲁士霸权统治下“自上”统一德国，民族自由党右翼领袖，国会议员。——编者注

起来，一部分人逐渐从打击和迫害中振作起来，去履行他们的党员义务。

除了上述这些措施和种种迫害之外，对最著名的同志进行监视和惩戒，搜查住宅，没收信件和包裹，建立了秘密警察局，这就加深了其他措施所造成的印象。此外，当时持续经年的商业危机和对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心怀不满的企业主所发泄的仇恨也增加了被惩戒和被驱逐者的就业困难，这些年来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则流亡国外。

这种现象对某些人来说也是必然的，因为1880年11月间对汉堡、阿尔托纳和周围地区也实行了小戒严。1881年6月底，戒严范围扩大到莱比锡和周围地区。

这些被驱逐者和被惩戒者就象野生动物一样从一地区被赶往另一地区，到处受到警方的迫害，警察随时向其上级报告这些人的活动。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除了流亡国外，没有其他建立新生活的可能。这样一来，我们就丧失了几十甚至几百个运动的骨干力量。这种情形正像一场败仗之后的大减员。

当然，另一方面，驱赶一些被驱逐出家园的人和受到惩戒的人也给滥施迫害的当局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遭到驱赶的人成了一支流动的宣传大军，他们强有力地促使同志们猛醒。他们是这场前所未闻的、经常使用残酷手段的大迫害的活见证。他们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畏缩不前胆小怕事者的斗争热情，致使从前的旁观者成了运动的新的追随者。由此看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驱逐虽然对个别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它制造了一系列的颠沛流离，骨肉离散，使全体同志承担了巨大的物质上的牺牲，但是，从宣传上和思想上来看，对党却大有好处，它使我们在现有条件下，能够最有效地开展宣传运动。

被驱逐和被惩戒的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极大地弥补了由于救

助他们而造成的物质损失。在不允许任何协会——因为只要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总要搞出些名堂——存在的一段时间里，被驱赶着和被惩戒者成了为党的复苏筹建基础的先锋分子。

证明党仍然存在于世而没有停止活动的信号——第一个比较重要又影响广泛的生命信号，就是在瑞士举行的党的维登代表大会。大会于1880年8月20至23日召开，到会代表56人，其中45人来自德国，11人来自国外。这次大会通过了一年以前在苏黎世创建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并一致同意从党纲中删去“合法”一词，作为对德国警察肆无忌惮镇压的回答，除了传达党的斗争策略以外，这是讨论的主要议题。

维登代表大会反映出党在整个德国在有计划的行动，这一点在1881年10月召开的帝国国会普选中第一次显示出来。

这是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来对党的力量的第一次考验，因此，敌友双方都对这次普选翘首以待，而结果则使双方都出乎意料之外。

党在1877年1月的普选中，为它的候选人争取到493 447张选票。在发生了赫德尔行刺事件之后，由于实施非常法没有获得多数，1878年解散了国会。当然，在诺比林行刺案发生以后，的确获得了这种多数，但是俾斯麦解散国会另有政治目的，就像创立保护关税和征收间接税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票数下降到437 158张。但这种下降乃是两次行刺事件之后策划的可怕的迫害的自然后果。他们把这两次行刺事件无耻地推到了党的身上。

因此，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造成的表面上的毁灭性打击之后，在所有组织破坏殆尽之后，面临物质匮乏，敢于承印社会民主党传单的印刷厂奇缺，召开集会、争取宣传力量等方面都面临着困难，要想取得和过去那样大的成就，是不可设想的。另外，敌人方面到处散布这样的口号：打倒社会民主党！把他们赶出国会！然而，

1881年10月27日党竟赢得311 961张选票，这个数字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他们的文件记载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以来的第一次表现在数量上的失利，尽管他们在同年的3月31日^①就已经把非常法延长到了1884年9月30日。从这时起，党又活跃起来了，呈现了不断上升的趋势。坚冰已经击破，党认识到自己比敌人要强大。只要党具有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敌人的任何暴力手段都无法阻止它的前进。

党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使敌人目瞪口呆。下面的第二种状况也帮了党的忙。显然，敌人用野蛮镇压党的办法无法战胜工人阶级要求与人的尊严相称的生存的志向，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即把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所谓“合理的”意图据为己有，以便在群众中釜底抽薪，达到破坏党的根基的目的。

早在讨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会议以前皇帝颁发的诏书中，就已经宣布了改革的必要性，后来又一再强调这种必要性^②。为实现社会改革的目的，在以后几年中，政府陆续颁布了众所周知的疾病^③和伤亡事故保险法草案，以及伤残和老年保险法草案^④。同

① 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是1878年10月21日至1881年3月31日。俾斯麦为了扩充军备，继续压制进步力量，于1880年5月4日，提前一年第一次延长了该法令。——编者注

② 1881年1月，政府提出了伤亡事故保险法草案，同年11月，皇帝在致国会的诏书中，宣布实行社会改革，即实行伤亡事故、疾病、老年、伤残等保险法。政府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收买工人阶级，孤立德国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③ 1883年6月15日制定的疾病保险法是实行社会改革后的第一项法令，从1884年12月1日起生效。按照这项法令，患病的工人自得病的第三天起的13周内可以得到相当于当地普通工资一半的医疗费。企业主要向区、地方和企业的疾病保险机构交纳该费用的1/3。为了抵制企业主要向保险机构施加政治压力，社会民主党通过广泛的请愿运动要求允许建立自由的救济疾病保险机构。工人本人在这里交纳全部保险费，而获得更多的、一年为期的医疗费。那时不当国会议员的倍倍尔，在他的《工人怎样对待新的疾病保险法》一文中，对上述机构的作用做了说明。社会民主党还要求把这项法律的适用范围扩大

时,各党派开始竞相提出各种劳工保护合同。所有议员对这些提案在国会都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其中社会民主党和对社会民主党的压制,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关于暂延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和每年一度重新颁布的对柏林、波茨坦、汉堡、阿尔托纳、莱比锡及其周围地区(1886年又增加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哈瑙、奥芬巴赫、施特廷和施普雷姆堡等地)的所谓小戒严的辩论,使那些以社会民主党为焦点的争论更为激烈,这就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提供了极为广泛的机会向尽可能多的公众讲述那些针对他们和他们的党采取的常常是卑鄙的甚至是极其卑鄙的措施,使这些措施的使用者威信扫地。国会就揭露挑衅间细及其幕后操纵者而举行的辩论,大家还记忆犹新。这些辩论除了起到一般性辩论的作用之外,还起到广

到农业、林业、家庭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工人,1885年通过了对后者的立法。1883年4月16日社会民主党议员为争取制定对工人最有利的法律,在国会提出过修改建议,他们在1883年5月31日国会举行最后表决时发表声明说,鉴于该法律具有警察和官僚主义的总特征,他们甚至要投它的反对票。该法最后以216票对99票获得通过。——原编者注

- ④ 1889年6月22日通过的老年和伤残保险法,是俾斯麦颁布的最后一项社会改革法。1887年11月17日,《北德总汇报》发表了题为《工人的老年和伤残保险》的文章,对此倍倍尔于1887年11月30日立即在国会发表演说。1888年7月由联邦议会通过了法律草案,1888年11月22日交付咨询。还在法律提案提交国会讨论以前,倍倍尔于1888年9月22日就在德累斯顿的施特里森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对这一提案发表了演说。由他提出的决议案,成了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提出的、主要由倍倍尔润色的修正案的基础。社会民主党的零星建议,在制定的法律中都有了各自的着落,例如,为暂时丧失劳动能力者付给伤残费的要求;把保险费的一半退还给已婚女工的要求;以及关于收据卡的建议等。不过,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提案都遭到了否决。在1889年4月4日国会举行的第二次审议和1889年5月20日的第三次审议中,倍倍尔发言,就社会主义工人党对日常任务和社会主义的目标的观点做了说明。

1889年5月24日,老年和伤残保险法在帝国国会以185票对165票获得通过。除社会民主党议员外,主要是德国自由思想党,以及波兰和亚尔萨斯—洛林少数派,投了反对票。1891年1月1日,该法开始生效。这项法律保证,对丧失劳动能力或缴纳保险费满30年的70岁的工人,发给最起码的养老金。——原编者注

泛的宣传作用。

还有一种情况也帮了遭受迫害的党的忙，并且促使广大群众向党靠拢。这就是，一方面政府和资产阶级本身承认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因而也就是承认工人阶级的困难处境，另一方面，他们却制造了一个关税和间接税制度，首先加重了下层阶级的负担，使他们受到残酷的压榨；而占有阶级却由此得到了巨大的物质利益。这样一来，例如每年钢铁和纺织企业主通过工业关税，糖厂股票持有者通过糖业补贴，大酒商通过估算烧酒税时产生的税额差额，大土地所有者通过粮食、家畜和渔业关税和对进口国外家畜和鱼类的禁令，捞取了高达几亿马克的实际好处。

这个统治制度的另一个矛盾在于，它一方面对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工人阶级中最活跃和最有远见的人，实行疯狂的镇压政策；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承认，有人试图消灭掉的这个政党也有“合理的目标”，他们也必须为实现这些目标操心。但是，他们自相矛盾又敌视工人阶级当成阳光和空气一样不可缺少的权利，即团结合作的权利，把它说成是“潜藏着革命的九头蛇”的权利。冯·普特卡默先生臭名昭著的罢工训令，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最好说明。

一方面，想帮助工人，因为人们在谈论社会改革及合理的要求；转眼之间，就剥夺了工人的最主要的权利，同时为损害工人阶级的剥削政策开绿灯。这种行为所造成的矛盾会使最简单的头脑觉醒，并且肯定会导致居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威信扫地。

另外，也要从根本上看到下述事实：一方面，自1879年开始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造成了对大资产阶级有利的经济效果；另一方面，大资产阶级经济制度蕴含的集中和日益增大的积累趋势，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中间阶层的解体过程，使思想利于向革命化方向发展。这些因素产生的影响，最终对社会民主党有利。

最后，保护关税率造成了生活指数人为地上涨，同时以垄断工

商业为旨的资本集团和托拉斯都用最敏感的方式触及了手工业、小商业和中小官员阶层，并使工人阶级的任何改善工资待遇的努力归于无效，这一切都是积怨的最有效的方法，从根本上说，都是社会民主党壮大的原因。

群众情绪不断高涨，这一转变的主要标志表现在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变得日益有力和果敢，警察的介入、查禁和有增无已的法律迫害——所有这一切都对它奈何不得；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国会的选举结果上。

党的候选人得票情况如下：1881年311 961张；1884年549 990张；1887年763 128张；在今年2月举行的选举中则为1 427 298张。以上结果表明，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9年间，选票数量增加了457%。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一时变成了全帝国中最强大的政党，这种情况使全世界都感到震惊。

其实，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此时此刻早已一败涂地了，尽管俾斯麦侯爵也承认，他曾试图使这项法令永远保留下去，甚至将法令条款变得更加严厉，只有像他这样的野蛮暴力理论的代表人物才会认为，死不回头就会达到目的，尽管他的这种暴力理论到处碰壁。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文化斗争^①的结果就足够了。

① 一方面，在俾斯麦政府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另一方面，在中央党和天主教会之间，从1871年起，就出现了政治磨擦，也称之为“文化斗争”，虽然有点词不达意。为了用暴力强行限制天主教的政治影响，从1871年至1874年，还就国家对教会和学校的监督权，就国家对训练和任用神职人员施加影响问题，以及对民事婚姻的指导问题等，另行颁布了若干法律。1874年5月4日制定的驱逐法，将违反政令的神职人员驱逐出境。由于1878年强化对革命的工人运动的镇压的关系，自1879年中央党为了大资产阶级和大农庄主的利益同意批准保护关税政策以来，“文化斗争”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于1885年至1887年完全终止。早在这场政治磨擦的初期，倍倍尔就指出，“文化斗争”乃是统治阶级代表人物之间的打情骂俏。在帝国国会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进行辩论时，他揭露了中央党的反社会主义行径，因为中央党自1880年以来投票赞成延长非常法。他在《教皇和社会运动》一文中，向党指明了“文化斗争”的结局，他认为中央党

掌权者根据国会选举结果决定取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是正确政见的标志，在内政方面俾斯麦侯爵一生从未有过这种见解。

自1881年以来，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威力持续增长，同时他的物质力量和辅助手段也相应得到加强。据1880年维登代表大会（德国有45名代表出席）的报告，自实行非常法以来资金收入达37 310马克。

1883年3月29日至4月2日举行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出席代表54名，其中来自德国的代表51名。根据报导，资金收入达95 000马克。1887年10月2日至6日举行的圣加伦代表大会，出席代表79名，其中74名来自德国，资金收入达208 666马克。在大厅里作报告，这也许相应产生了更加有利的效果。

上述款项都汇入了由议会党团主席管理的中央基金；那些在各地募集和使用的、更具重要性的款项尚无法详细计算。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有过这样的权力地位，其标志无疑是那些在国外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因为召开这些大会要付出巨大的牺牲，要克服内部的和外来的一系列困难才能办到，尽管警察多方打探，然而警察没有一次事先得知开会的地点。这是一件十分典型的事例。

由于警察在镇压党的行动中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它的无能，法庭迫害便取代了警方的迫害。这里我们回忆起秘密集会案时期。几年来，就像警察愈来愈放肆地解释非常法条款一样，法庭对通用法条款的解释也愈来愈慷慨大方了。到头来，连像《国民报》^②这样忠心耿耿的报纸都不得不承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对维护法律

为维护大庄园主和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制定的反社会主义政策要为斗争的结局负责。——原编者注

② 《国家报》，即《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编者注

来说起了令人生疑的腐蚀作用。

事实上，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由于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群众中丧失了道义威望，其损失之大是无法衡量的。他们因颁布和实施这项法令给自身带来的危害，是他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都无法办到的。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实施非常法这近12年间那样，使群众觉悟到国家和社会的阶级性质，政府、警察和法庭的面子和权威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巨大的损失。

非常法对掌权者和该法的炮制者还起到另外一种使他们十分不快的作用。这项法令极大地激励了群众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使之成为独立的精神力量。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统治下所谓的“领导人独裁”的说法，纯系臆造的弥天大谎。牵扯到秘密集会案的持续不断的危险早就不允许领导人插手地方的和私人的关系了。一般秘密组织根本就没有过，因为它们无法存在；它们少则几周，多则数月就会被监视和暗探体系侦破，其领导人也早就成了刀下之鬼。因此，律师和法院就千方百计构陷(党)同议会党团或同上层的议会党团主席有普遍秘密联系，但这些企图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以这种理由谴责被控告的领导人，这可以被认为是司法犯罪。假如说，尽管有以上种种手脚而党内事务仍然有条不紊，党内同志仍然遵照领导人的指示办事，这主要是因为大家都认识到团结一致的必要，从而达到意见和步调的一致。

这一点本身就是党和领袖的力量所在，并不是由于所谓后者的独裁。任何人都没有要求过独裁，任何人也没有认为有这样做有必要。要是真有人想埋怨领导人的话，倒是应该说他们施加的影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因为他们经常在人们特别需要他们的地方，拒绝干预。

好了，下一届党的代表大会就要结束这种臆造的独裁了。随着第一个十月的来临，党又将立足于普通法之上了，这样，新的任务

将落在她的肩上。党是过不成轻松的日子；政府和党的敌人才为这种日子担忧。一方面政府秣马厉兵，如临大敌，动员警察和律师，为肆意解释法律撑腰打气，并要求加强警察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却四肢颤抖，就像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资产阶级统治的丧钟已经敲响。

这种战栗的恐惧是亏心和无名怯懦的表现，德国的资产阶级一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在为自身的解放进行的斗争中，极其缺乏象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的那种巨大的勇气；同样，在对付向他们的特权地位冲杀的工人阶级进行自卫时，也是如此。他们慌慌张张遁入国家权力的卵翼之下，高喊出兵。

国家权力试图通过社会领域方面的小小让步来争取工人，来同资本势力和解。资产阶级却把这种作法视为对自卫最神圣的特权的无耻出卖，视为对他们的出卖和用他们来填塞“群众的欲壑”。

迄今为止，这个阶级在国家法律的保护之下，从事对群众的剥削，积累资本，它在德国的经济发展中过去鲜为人知。就是这个阶级，一旦国家（这个一直表现为他们的国家，这个千方百计保护他们支持他们的国家）想要他们、来作些小小的让步和采取若干一般妥协时，它就会悖然变色。

俗话说：上帝要谁灭亡，必先把他打晕，这句话又应验在我们的资产阶级身上了。他们让肆无忌惮的阶级利己主义迷了心窍，因而头脑发晕。事情好像要把他们推向一场只能使他们走向灭亡才能告终的灾难之中。

在整个工人阶级中间，不仅是德国，而是在世界上一切发达的文明国家，都在为争取权力而忙碌着。到处都在争取变革，争取自由，争取空气和阳光。我们与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试图用警察和律师来扑灭它，用似是而非的让步来软化

它,都是异想天开,都是罕见的近视。按照我们那些让阶级的仇恨和阶级利己主义迷了心窍的资产阶级的灵丹妙药,对这场运动采取武力镇压,那是更加行不通的。

社会问题就是时代问题。本世纪的最后10年,从各种迹象看来都应当是对事情作出重要决断的时期。任何个别的势力,或者某个阶级的力量都不能阻止这一决断的发生;反过来说,任何个人或阶级,也都无法随心所欲地作出决断。起主导作用的乃是历史的必然性,它寓于发展之中,并且通过事实的力量给人们指引社会文明利益所代表的必由之路。

肯定还会有艰苦的日子,但社会主义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它在向目的地迈进!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演说和著作选集》1978年柏林版第2卷第1分册第812—822页。

(张念东译)

在第二国际布鲁塞尔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891年8月18日)

倍倍尔(受到暴风雨般掌声的欢迎):他^① 不准备在这里讨论德国工人的一般状况,而认为应对巴黎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要求^② 采取一致行动。对于前5点要求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对于其他由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提出的要求,他和他的德国同志们有不同的意见。首先他想强调指出,根据他的理解,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不是要获得一个劳工保护法,它的任务首先是向工人们阐明现今社会的性质及其特点,以使这个社会尽快消失,而且要消失得比这个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所携带的致命病菌使之灭亡的速度快。

① 原文如此,记录按第三人称整理。——编者注

② 巴黎代表大会关于劳工保护法的决议全文如下:

“鉴于资本主义生产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已逐渐囊括全世界;

鉴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味着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的加剧;

越来越加深的剥削所带来的后果,是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压迫,政治压迫和奴役,造成工人阶级体质上和精神上的衰退;

因此,各国工人阶级的责任和任务是:用它们拥有的一切手段反对这个毁灭它们、威胁人类自由发展的社会组织;

但是,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同目前的经济制度的破坏性影响进行斗争;

代表大会决定:

1. 一个有效的劳工保护立法在已采用现代化生产的一切国家里都是绝对必要的。

代表大会把下列各项要求视为劳工保护立法的基础:

(1) 8小时正常工作日;

(2) 禁止未满14岁的儿童劳动,14—18岁的青年的劳动时间每日限定为6小时;

工人必须认识社会的性质，这样，如果它的最后时刻一到，工人们就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他特别强调说，国外有人最近发表了很多意见，说在德国党内对这一任务或策略存在着原则分歧。这是错误的，不存在这种分歧，谁想试图使党离开这个任务，他自己就不得不立即离开党。

我们的党也是一个宣传党；工人阶级的一大部分离我们还很远，因此我们必须使用一切方法和途径，一方面把这部分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另一方面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这就是我们对劳工保护法问题的态度，这会使工人阶级具有战斗力，更加有效地引导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管资产阶级多么不情愿，它还是被迫步步退让，被迫违背它的愿望而加强工人反对现今社会的斗争。

接着倍倍尔阐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帝国政府的态度，帝国政府为了把世界的注意力突然引向自己，为了显示对工人友好，采取了一个果断的行动——接受瑞士国际劳工保护问题的倡议。即使外国对此抱有怀疑，从最近选举投票数目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

-
- (3)禁止夜班劳动，工作性质需要连续开工的企业除外；
 - (4)凡是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的企业不准雇用女工；
 - (5)禁止妇女和未满18岁的青年男工上夜班；
 - (6)每周至少有36小时的连续休息；
 - (7)禁止建立和使用对工人的健康特别有害的工业部门和劳动方法；
 - (8)废除实物工资制；
 - (9)由国家支付工资的，并且至少有一半是由工人自己推选的工厂视察员对所有的工业企业包括家庭工业在内进行全面视察。

2. 代表大会声明，所有这些措施应通过法律或国际条约予以保证，并要求各国工人阶级用自己最合适的方式去为实现这些要求并使之以贯彻而努力。

3. 此外，代表大会还声明，把女工作为享有平等权利的战友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是所有男工的义务，同时帮助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代表大会认为，实现这些要求以及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愿望的极其重要的手段是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因此代表大会要求充分的联合和结社的自由。——编者注

证明,它没有受骗,没有让先发制人者占上风。正如柏林代表会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一样,帝国政府的劳工保护法案尽管名目繁多引人注目,但就实质而言毫无意义,而在很多方面恰恰是更坏了,因此最后连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也声明反对。简而言之,在德国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头脑不清,或者受到蒙蔽。

关于上述决议案的个别条文,代表大会在作出决定时要当心,各工人组织不是贯彻代表大会决议的适当因素;关于劳动统计,英国等国的工会虽然作过多种考虑,但毫无疑问,没有全社会的手段,这种劳动统计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决议案的形式没有承担有关责任,所以他没有提出异议,尽管他对这项工作不抱多大希望。

关于决议案的第3点^①,他必须重复一遍他昨天在委员会上已经说过的话。这些要求对他来说不是太多了,而是还不够。根据德国的形势,任何一个不彻底承认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人我们党都不会提出来作为候选人;但根据这个决议案只要同意巴黎决议中关于劳工保护的各项要求就够资格了。每个资产阶级政党都可以赞成这点,但这样做还远远当不了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必须使那些揭社会疮疤的党旗帜鲜明,以便大家都能看清它们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们承认其他国家的同志们有根据自己的情况行动的自由,能同我们保持协调一致,我们就满意了。(热烈鼓掌)

译自《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年柏林版第10—12页。

(李俊聪译)

^① “最后代表大会要求全世界工人面对资产阶级政党的反抗而团结自己的力量,并且在已拥有政治权利的一切地方,不投那些不支持他们的要求的人的票。”——编者注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891年10月16日)

同志们,近几个月来,一些著名人士都在吵吵嚷嚷地猛烈攻击议会党团奉行的同哈雷党代表大会决议保持一致的策略,否则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不会讨论今后必须实行什么策略的问题。前面的发言人已经部分地赞成了这些谴责。你们可从发给你们的文件中看到大部分内容,但事先我们有必要就这个问题稍微回顾一下党的历史发展情况。任何一个政党一般只要心目中有一个确定的目标,都必须强调两个问题:要努力实现的种种要求以及实现这些要求所要采用的方式。第一个问题是纲领,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斗争方式所应遵循的准则,即指党的策略。我们的基本原则写在纲领之中;即使我们直接参与关于一个新纲领的讨论,那么大家也必须切记一条:要像往常一样,尽管今后在实践上和原则上对我们的要求的表述会比迄今的表述更好。但在表述时无疑在原则上不宜有什么新的提法。

党的最终目的,是推翻今天的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从一开始就是它的目的;从党对本身有明确认识的时刻起,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生产制度就成了党的纲领。

现在,社会民主党同从前的一切政党比起来,就它们企图取得统治这一点而言,所处的地位是根本不同的。由于我们竭力想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代替它,我们就必

须选择一条与从一切阶级取得统治时完全不同的道路。迄今人类的整个发展向我们表明，一个阶级只有在它取得对新的生产方式的统治即占有物质力量的时候，才能取得国家政权；我们这里的情况却完全相反。

我们不能依靠取得经济权力来建立工人阶级的统治，我们必须采取相反的手段。首先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并且利用政权，以便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剥夺也取得经济权力。如果我们掌握了政权，下一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那么我们怎样取得政权呢？

如果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政党向统治集团宣战，而且其最终目的是消灭这个集团，那么不言而喻，这个统治集团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阻挠。另一方面，像我们这样一个力求达到这种目的的政党，有必要采取它认为适合于宣传这一思想的一切手段和措施，它也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使群众具有这一思想。而这些群众由于利害关系本来是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但是我们知道，夺取政权的斗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即使我们在今后的年代里争取达到目的的速度无疑会比过去快得多），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一些最有效和最有成果的手段。

现在条条道路通向目的。首先是在协会和集会上进行口头上的鼓动。不管这样做对我们有多么困难，但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是为它服务的工具，不过我们是用供我们支配的一切力量来运用这些工具的。其次是创办报刊；扩大我们的报纸，努力提高这些报纸的预订份数，不断使新的报刊机构为党的志向工作，因为这样做会不断增强我们的力量。第三个手段是开展议会活动。比方说，拉萨尔对这一手段评价很高，除了争取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外，他没有提出其他要求。他认为这一手段是夺取政权的唯一手段。运用这一手段会使国家不得不正视工人阶级的种种要求。1867年这一要求得以兑现。

这里我不想研究，当时统治阶级是出于什么原因才认为有必要实行普选权，实行了普选权就够了；从实行普选权的那个时刻起，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怀疑过，要尽量利用这一手段和把党员议员派到帝国国会去。这毕竟是近25年来不断努力争取到的成果。

现在有一个问题：议员在帝国国会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曾多次成了讨论的题目，而且只要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议会活动的基础上开展工作，这个问题就始终是个讨论的题目。关于议会活动的限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自然的。如果不是从第一年起，那么也是从议员人数日益增多的那个时候起，关于党内可以实行的策略就出现了分歧。在那个时期，社会民主党在帝国国会有两个相互对立的议会党团：一个代表全德工人联合会，另一个则代表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工党虽然是1869年在爱森纳赫建立的，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在帝国国会就已经有自己的议员了，他们是李卜克内西、我以及其他的人。我们早在1868年就已经提出讨论议会策略这个问题，而且是由李卜克内西提出来的。可他们那方面，据我所知，还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关于党的策略，早就暴露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而且是在领导人本身参与的情况下暴露出来的，这就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党内言论自由是它的一个生活准则，一种当然的权利，领导人本身也在极其充分地、极其广泛地利用这种权利。如果不是这样，党就会发生分裂或者走向灭亡。假如在一个完全民主的党内扼杀不同意见，除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见而不容许有其他意见，这样的尝试会怎样呢？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那里一向是以上席为首，根据组织原则主席拥有异乎寻常的巨大权力，这诱使他滥用权力，并且为了他的利益去影响联合会拥有的唯

一机构，除了这个机构之外，不容许其他机构存在。这引起了斗争，终于使施韦泽下台。稍后两派于1875年实行合并，取名社会主义工人党。按照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组织的性质，一开始就禁止任何独裁的企图，而时至今日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说，围绕党的策略的斗争最初是在领导人中间发生的。1869年李卜克内西写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态度这本小册子究竟是针对谁的呢？主要是针对我。因为那时在涉及1868年工商业管理条例时我们在帝国国会中无法就奉行什么策略问题取得一致意见。适用于一切情况的那样一种策略至今都没有确定下来，而且也永远无法确定。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在个别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关于这个问题直至今今天在议会党团内部仍在进行极其激烈的斗争。如果谁象反对派所描述的那样，认为议会党团似乎是个由几个人领导、为一定的物质利益而由一只慷慨恩赐的大手决定的无差别群体，——那样的群体是没有的，因为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支配党的资金，——那么，他使用的显然是极其虚伪的斗争方式。直至此时此刻对个别法律草案和提案应持什么态度的意见时常都是不一致的。那些提案时常以微弱的多数遭到否决或者获得通过。比方说，关于轮船公司津贴的争论——我只想说明——在议会党团内部曾进行得如此激烈，以致只能由全党出面调解。议会党团只是对军事立法以及与此有关的法案持一种绝对否定的立场：因为军事和海军两项开支整整占帝国预算的4/5，而且这部分开支应该说是可以控制的，所以议会党团总是没有任何分歧地投票反对整个预算。

当1868年军事法案提供讨论的时候，我们提出了否决军事法案的提案，并委托政府提交一份由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的新法律草案。这是非常尖锐的否定。早在1868年讨论迁徙自由法、选举法和护照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无顾忌地提出提案，那时还没有出现

各种不同的意见，只是在讨论工商业管理条例的时候才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且那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李卜克内西认为，反对派今天感兴趣的那一发言不仅是指向他本人的，而且是指向党的整个策略的。——怎么证明这是不对的。——李卜克内西和我之间的那些分歧，成了紧接着于1870年6月初在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提出讨论党的政治态度问题的动因。那时我们在观点上也是迥非一致的。这样，我们向党代表大会提出了一项我们两人取得一致意见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提到了一种妥协方式，其内容为：工人党参加帝国国会和关税议会的选举主要是出于鼓动上的原因，只要可能，它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参与议会工作，但总的来说对此是抱否定态度的。决议案的第二部分谈的是选举时的投票问题，在那里各位会发现，那时一致通过的这一决议案同后来的决议，特别是关于对终选采取的态度问题，是有本质区别的。其中写道，党不同其他政党结成联盟或实行妥协，但建议在没有提出本党候选人的地方，把选票投给在基本政治态度上与我们持同样观点的那些候选人，而且首先支持其他政党当中真正的工人候选人。在其他工人政党中，施韦泽领导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门德领导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另一小部分人对此曾经是理解的。此后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出现了另一种情况。今天我们有两点看法是一致的：在第一轮选举中一般不应选举敌对党派的候选人；不可再使党因支持其他工人候选人而陷入窘境，因为现在的情况不再是从前那样了。其次，1871年党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曾讨论过策略问题，会上我受党领导机构的委托作了关于参加市镇议会和邦议会选举问题的报告；那时发出过指示，要求各地支持邦议会和市镇议会实行普选权。1873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作出了类似的指示，1874年在科堡代表大会上根据李卜克内西的提案也作出了这样的指示。直到1877年，即反社会党人法前举行的最后那次党

代表大会的时候，总的来说党没有再讨论策略问题。但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维登、哥本哈根和圣加伦3次代表大会一再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作出这样的决定，总的来说要党参加选举，要议会的议员们决不只是采取否决的态度，而是竭尽全力争取得到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种种让步。为什么我们总是选择后面那样一种做法呢？因为每一个置身于实际生活的人都知道，如果党不是同时也关心劳动人民的日常需要，即日常疾苦，并迫不及待地去补救现存的弊端而且使现状得到改善，那便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很对！）另外我们试图借助工会组织的帮助做到这一点。有一段时间，党内就这一帮助的合理性发生过热烈的争论。今天个别人也还是认为，这一帮助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应当尽可能不借助于这一帮助，认为工会组织有碍于政治组织，它们挤占了用于政治组织的大量资金和力量，但鉴于不成功的争论所造成的损失，也不应不准取得这一帮助。但是党内绝大多数人认为，工会组织不仅对于党的发展是必要的，而且对于领导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阶级斗争也是必要的。（赞同声）

每一个置身于实际生活的人都知道，我们并没有以我们的最终目的把成千上万的人争取过来，因为这些人只是很喜欢说，那种追求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也许看不到所追求的目的，也不期望从中得到直接的成果。而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是宣称，应该置工会活动和议会活动于不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翻现行的社会制度。不管无政府主义者的牺牲精神和满腔热情有多么巨大而又经久不衰，但可以肯定的是，凡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兴起的地区，不管他们作出什么努力和牺牲，他们除了建立起可怜的派别外，是不会取得什么结果的。（有人叫喊：抓进警察局！）过去和现在肯定是要进警察局的，因为得宠的人对于今天的当权者所能做到的事情是使用暴力手段对付我们，得宠的人也希望这样做！（赞同声）

所有这些意在彻底否定的派别无意中为我们的敌人帮了忙，因为这些敌人期望的正是这样一种策略。对于这些敌人来说，他们讨厌的莫过于冷静的、有目的的工作，他们喜欢看到的则莫过于无产阶级提供机会使当局有可能使用暴力对它实行镇压。只是我们坚持不懈的、没有任何失误的掘墓工作，才使我们的死敌时至今日仍然感到难以受用。（暴风雨般的赞同声）如果我们现在打算放弃这一久经考验的策略，那就是极大的错误。我们一致认为，工会运动和工会组织是必要的，为改善工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而斗争是扩大我们在整个工人阶级中的运动的一个非凡手段。我们知道，所有千千万万的人，男人和女人们，像我们一样今天能够自豪地说，过去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一眼就发现，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也是我们的目的，即我们要把他们同这一目的联系起来，而现在他们正在这样做，因为他们看到，我们党是唯一关心工人阶级疾苦并为改善他们的地位而斗争的政党。他们看到，其他政党的行动同它们向选民所作的许诺是背道而驰的；他们看到，在这方面我们党则是为自己的诺言而斗争，它知道自己所承受的压力，知道为他们所遭到的不幸而叹息，知道为他们所忍受的苦难而痛心，而且随时都在痛斥虐待和剥削他们的人。（很对！）正是这些考虑决定群众转向我们。现在说他们一定站到我们一边，那是十分自然的，他们起初只是希望得到某些直接的好处，也许更多地是出于次要的原因向我们靠拢，但逐渐被我们所征服，直至他们最后成为完全的社会民主党人。（很对！完全正确！）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能够说：我从我想成为一个觉悟很高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是这样的人了呢？——于是反对派先生们出来对1890年2月20日的150万张选票进行嘲笑；他们嘲笑说，那些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自觉的有奋斗日的人显而易见只是少数。奥尔巴赫甚至今早还在毫不掩饰地发表这样的看

法。我要问一问，如果你们不把群众争取过来，你们究竟打算怎样说明奥尔巴赫完全有权把他的那种看法称作是我们的任务呢？你们究竟是否打算依靠那些相对来说显而易见的少数人来夺取国家和社会？这的确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如果你们相信这一点，你们无非是个政治上的傻瓜。（完全正确！）

我们必须争取这些群众，因为我们试图拯救每一个人。我们拯救一个人起初也只是抓住一个指头，随后他像每一个把手指递给魔鬼的人一样有救了，我们抓住一个指头就抓住了这只手，我们抓住这只手就救出了整个人，这样，他就完全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从一个反对者变成一个忠实的、有牺牲精神的狂热信徒，而从他那方面来说这个人又去关心争取一些新的异教徒。（热烈鼓掌）人们不会象密纳发那样从丘必特的头脑中跳出来，就象诸位披上现存社会的盔甲以成熟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面貌出现，而是他们必定要十分严重地受到他们从这个社会及其所在学校和教会的卫道士那里接受过来的大量偏见的困扰。另一方面又要肯定的是，今天无数参加运动的人可以说是深谙这一运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子女，因为他们父母的相应影响是存在的；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的父亲和母亲，只能我们成为那样的人。（十分活跃，很好！）如果说今天从我们本身以前也许没有考虑到的那样一种角度来看，党不仅在广度上而且也在深度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那么，这是近20年发展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我们本身的功劳。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我们已经做到我们只能做到的事情，因为一切情况都使我们得心应手，因为我们的死敌资产阶级同时也是现代无产阶级子女们的母亲，我们必须把这些孩子培育成社会民主党人。通过这一途径，我们已经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现在反对派说：党在腐化，在庸俗化，它在提出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标，看来它在忽视原则性的宣传。如果说曾有过一

种谴责从各个方面看都是不公正的话，那么上述谴责便是如此。但愿历史学家不久就向人们展现党的议会活动。历史学家即将发现，我们前些年虽然在言词方面讲得比今天尖锐和生硬，但另一方面，党今天的种种要求的实际提法却比20年前的那些提法无比地前进了。你们倒是谈一谈关于近年来在这一所谓机会主义议会活动中提出的那些提案。这一活动始终不断地在进行；只是在我们的代表人数太少的地方，这一活动才进行得差一些，而且我们未能提出单独的提案，因为我们的代表人数不足15人。这种情况特别是在最初几年时有发生。在德国的整个运动中有这样的特点，运动不断地得到了发展，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党派之间的对立变得日益尖锐了，以至达到了例如首先在萨克森，其他各党结成了反对我们的一群乌合之众的程度，但是怎样适当地表现这样的特点呢？今天在更大的程度上在德国其他各邦同样出现了上述那种现象。早在15年前，当在爱尔福特这里涉及到社会民主党人卡佩尔和自由保守的鲁齐乌斯^①的时候，激进的欧根·李希特尔就在电报中命令说：宁要鲁齐乌斯，不要卡佩尔！今天，这样的对立不仅比过去更明显地在议会外的政治运动中表现了出来，而且我们在德国国会中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这倒底是为什么？要知道，各党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其他各党今天放弃了它们的纲领中的一系列政治要求。唯一的原因在于惧怕社会民主党。其他各党认识到，今天增加任何一点政治自由都首先对社会民主党有利。那种把社会民主党不断增长的力量视为一股日益扩大的洪流的恐惧已使其他一切政党愈来愈变成一种反动的逆流。恐惧促使它们今天可怜地放弃了从前自己提出的那些提案。这正是我所理解的，敌人为什么偏偏异常喜爱反对派中间那些先生们的谴责（直至断言我们的党

① 鲁齐乌斯——德国律师和政论家，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证人。——编者注

变成了一个可笑的党),并把这些谴责推向顶端,加以传播,指指点点地灌输到群众中去。的确,如果我们的政治敌人不是全面地利用哪一方面为他们提供的斗争手段,他们必定带有偏见!(很对!)反对派提出过某些谴责,比方说,你们应当这样或那样提出这些提案,你们必须以尖锐得多的方式发表这次或那次演说,那我就来谈谈这些问题。我衷心地希望有一天反对派的先生们也在帝国国会中取得成功,而这一天对一些人来说却是不会到来了。他们应当证明,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过去,他们曾是他们那方面的候选人,并且真诚地努力去争取一个帝国国会议席,今后,他们大抵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如果我能考虑到,他们那时在选举前的所作所为和他们对党特别是对议会党团的实际活动的颂扬,那么,我会强烈地感到,要对他们今天的那些演说的坦率和真诚表示怀疑。当初他们在帝国国会选举前勉强发表了一些演说,那些演说同我们的演说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也没有超出我们向选民提出的那些要求的范围,他们指出的是我们工人代表为工人利益所做过的工作,——数月之后,他们完全改变了态度!这一矛盾早在哈雷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被提了出来。为了弄清这一矛盾,现在我必须在这里提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去年夏天,威纳尔和辛格尔有过一次谈话;那还是在反社会党人法期间,当时议会党团就是党的领导机构。威纳尔说:您得承认,我在选举中得到了22000张选票,而在帝国国会中有一席之地其他人却只得到7000张选票。这些人有什么可说的,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十分活跃)那些先生们今天的观点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务请他们也说些什么。这当然是个花招,让人家决定一下能否作个安排,对于那些得到好几千张选票之多、但未当选的人,也让他们能够参加议会党团和党的领导机构的讨论。当人们对失败表示气愤的时候,人们总是矫枉过正,并从这一角度来看待任何行动,最后怀着敌意加以挑剔,以

致以否定一切的态度进行批评，而且做得十分过分。我并不反对开展批评的做法；要是有人问我（那是他的权利），议会党团中的人是否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把别人痛斥一番，那么，很少有人比我更加容许人们进行争辩。最后我会取得也在最大限度上代表反对派观点的那种权利，我像我们大家一样敏感，我们的确有时也产生只有敏感的人才会出现的那种互相猜疑。但这无损于友好关系。如果说有一个人落选了，那么，他不是表现出沮丧的样子，而是在尽他最大可能来拥护多数人在帝国国会中作出的那些决议。（很好！热烈鼓掌）如果少数不愿服从多数，如果持不同意见者有权继续对那些决议及其实施情况进行挑剔，使党不得安宁，并造成它的分裂，那可就是一个不妙的党了！

由我对反对派作出评价，对我来说确实十分困难。据说，我在费恩宫说过，那些先生们会乘机建立一个新党。不管把这句话上多少遍，这里所引证的也完全不是我说过的话。我说过的话得根据《前进报》的报道，准确的报道如下：

“党内那种没完没了的挑剔行径和混乱状况从表面上就使人相信，党似乎是分裂的，但这种情况最终必须结束，还相信我在下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会关注于最后使党和反对派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关注于在反对派不能同党的态度和策略取得和解的情况下，后者将乘机建立一个自己的党这个问题。尽管现在情况不再进一步向前发展，但是必须这样或那样地结束现在存在的情况。”

可见我明确地表示过：如果我们之间无法取得谅解，而你们坚持你们的观点，认为你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想服从多数，那么，你们必须建立一个自己的党。现在再补充一点其他情况，当我那样表示的时候，受托人曾通知我说：有一个无政府主义派别存在；有一个选区的部分受托人为使他们和一些具有同一思想的同志作出一个关于把来自销售书报收益的款项积累起来并将其用作斗争基

金的决议而滥用了他们的地位。这只有在掌握款项的同志没有从中悟出什么道理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个小集团作出了这一荒唐的决议，而我认为，只要这些人没有良心地滥用他们在党内的受托地位，那么，任何妥协和任何合作都将停止，而党怎么能够完全不让这种情况发生。（很对！）在费恩宫举行的那次会议之前，我就知道了这项决议，而且对他们说过，你们要设法撤销那一决议，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于是我发表了上述意见。那些先生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根据那一决议必须看到，他们是想通过这件事弄到钱，来应付他们当中有人因扩大“自主限度”而被捕和被罚的情况，如果说事实果然如此，那么，除了同他们决裂，就别无其他办法。对我来说，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可怕的幽灵，不会使我对他们感到毛骨悚然；如果说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好啦，那么他们就可以是无政府主义者，但那样一来，他们就不再从属于党了。（赞同声）党的哈雷代表大会除一票反对外几乎一致赞同了议会活动和议会党团的策略，而且当时有400多名代表在场。如果今天对议会党团的活动持反对意见，那么这就证明，在圣加仑和哈雷作出决议以后，只有议会党团或它的一些成员反对那些决议的做法才是正确的。如果他们没有那样做，那么，他们也不能受到指责。

现在我正在研究柏林传单，反对派在这份传单中放弃了那些观点，按照这些观点，党的当前策略不仅应当被看作是虚伪的，而且应当被看作是对党有害的。劳工保护法草案中的个别条文有哪些问题可以受到攻击暂且不提，但有一点要肯定，在整个草案中并没有这样的要求：采取可以被看作是违反党的原则和党的要求的行动。我特别敦促那些先生随即证明一下，在我们的哪一个提案和演说中表示过这样的希望，似乎我们能够从资产阶级社会取得可使我们感到满意的让步。其次证明一下，我们又是怎样沦为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改良党的。只要大体上把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研

究一下，比方说把关于手工业同业公会的提案中的态度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我们总是以明确无误的语言宣布：那一态度要求的是愚昧无知还是花言巧语；不应认为，这样一来，那一态度就会有助于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力下，那一态度决不会有助于小资产阶级，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使小资产阶级破产。我们的这一观点总是在明显地发挥作用，就在几天前萨克森的选举中还使我们受到了谴责，谴责社会民主党不想帮助小资产阶级，不能帮助小资产阶级，甚至谴责社会民主党说小资产阶级毫无希望，要使小资产阶级彻底毫无希望。其次那一时期我们强调过，如果小资产者打算保持明智或能够保持明智，他们就必须依附我们；在现行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幸福和出路可言的；对他们就象对工人一样，唯一的幸福在于有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这一基调贯穿于一切演说和书刊，而过头的指责就是诽谤中伤。另一个谴责是，党内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造成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的均势。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什么更加厚颜无耻的事情了！（普遍的赞同声）在35名代表中，发言者品质迥然不同，性格各异，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全是同样好的发言人，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敏锐地和缜密地处理每个问题。我也决不把议会党团看作是党的精华、纯粹的知识分子、出类拔萃的人物。相反，过去我常说，党内有很多人比我们当中的很多很多人都聪明得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不可能在党内担任公职。尽管选举当中作出了意外的选择，但是我们知道：比方说威纳尔一举得了22000张选票，但另一个人却以7000张选票当选。可我们对这种情况能怎样解释呢？我敦促维护传单的人证明一下，传单中哪怕只是根据一个发言人讲过的事实所作出的强调也是有道理的。这整个的斗争方式不仅是一种对党有害的斗争方式，而且对每一个客观对待事物的人也是一种不正派的斗争方式。其次，如果说传单中曾写道，有人试

图让同志们相信，借助议会活动就能在当今社会内部实现社会化是骗局，那么，请问这是谁说的。假如在帝国国会中有人这样说，我会宣布这是胡说，而不会像反对派那样说是骗局。如果说我在揭露哪一个人的骗局，那么，我是在断言那个人在捏造，扯谎，说他不相信的话，知道坚持的东西是行不通的；如果我对此说过胡说这个词，那么，我还总是具有一番好意，好意不可想得更好，它是一种短浅的见解。“胡说”一词我可以容忍，即使是这样，我仍然要证明一下，是谁传播了这样的胡说。其次那里写道，法律草案是可怜的，帝国国会演说是不够的。情况可能这样，维尔德贝格尔和威纳尔发表的演说比有时发表的要好些；他们完全能够发表特别漂亮而且有原则性的演说，但是在这里听到的他们的演说倒使我对他们疑虑重重。那充其量是个中等货色，如此而已。（活跃）特别是威纳尔迄今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是我为哈雷党代表大会证明下面一点的证据，哈雷党代表大会向他展示了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证据，他有一切理由一声不吭地呆在一边，只要一个劲儿地学习就够了。（十分活跃，喝采声）结尾写道：新的策略是以牺牲原则来实现同群众的妥协。您能否举出一个行动、一个提案向我们证明一下，就这一行动、这一提案所达成的妥协给原则带来了损害。我们一丝不苟地坚持的事业，是党25年的活动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为我们确定的事业，是全党绝大多数人始终赞同的事业。如果我们按那些先生们的心意去寻求一种策略，那么，我们的行动就直接违背了这一决议。到底是谁决定策略呢？如果我们听从反对派的，那可是议会党团，现在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去听他们的。但这样做是不对的。议会党团必须遵循党代表大会决定的策略；因此，问题只在于议会党团是否违反党代表大会决定的策略。上一次在哈雷代表大会上就这一问题作出的决议写道：

党的代表大会宣布，议会党团的议会活动既符合圣加仑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彻底履行了把党的政治小组发展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职责。

因此，党代表大会敦促议会党团，象以往那样坚决维护社会民主党对待资产阶级政党和阶级国家方面的原则性要求；但同样也致力于在当今社会的基础上进行可能的和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所必需的改良，从而使人不致对维护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进行的合法政治活动的意义和作用产生怀疑或幻想。

反对派先生们，你们的任务在于指出我们有哪些违背这一决议的行动；倘若你们这样做了，你们就有理由采取你们的那种态度。如果你们认为，策略必须是另外一种策略，那么，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权持这样的一种看法。正如福尔马尔所认为的那样，党的策略必须更多地集中在某些具体的要求上面，而把其他要求留到今后情况更好的时候再提，我是坚决反对这种观点的。但是，象福尔马尔会有这种看法一样，其他的人则会认为，党的迄今的策略必须更加具有攻击性。如果反对派当中的一些先生们比如这样说：议会党团要有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而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必须加以讨论，但是，如果你们的抨击尽是诽谤和怀疑一类的内容，那么，在这种方式下是无法进行讨论的。现在有些先生们说，议员演说中发表的革命观点肯定要多一些。但是我们听到，他们本身在议会策略问题上的意见并不一致。他们的共同基础只是对党的领导的怀疑和谩骂（热烈的赞同声）；在其他一切方面他们的看法都是各不相同的。有两个人，即维尔德贝格和理查·巴京斯基^①，按他们的才华可能被看作是反对派的领袖，他们对党在议会活动方面必须实行什么策略的问题上从根本上相互分手

^① 理查·巴京斯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属于“青年派”。——编者注

了。维尔德贝格尔并不反对议会活动本身，他只认为，行动必须比以往更加果断，而巴京斯基对此却说，我们虽然要在帝国国会中选举议员，但是却不是让他们在那里提出提案，而仅仅是让他们提出抗议和进行否决，进而宣布，你们，身在帝国国会那里的你们，是一帮可恶、可鄙的人，同你们这帮人没有什么可以接触的，我们将设法使用我们的权力征服你们，那样，你们就糟糕了。维尔德贝格尔说，我们不应否定革命观点，我们必须经常强调，议会主义不是我们据以达到目的的基础。那么最后的手段呢？在帝国国会中总是有人责备我们；你们喜欢的只是野蛮的、极其无情的暴力和颠覆。让我们承认这一点吗？在帝国国会中有人人会这样做的，但在不追究刑事责任，可由此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我们在帝国国会外部将要对这种轻举妄动负起道义上的责任，并使我们的处境恶化。但不言而喻的是，敌人由此便会得出结论，他们只能在街垒中、在战场上同我们进行斗争，并为此而避免对我们采取本来可以采取的完全另外一种态度。其实我们可以不以那样的方式的讲话给敌人帮很大的忙，（很对），那样讲话就会造成敌人所希望的情况。不幸的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同我们对抗，他们对我们所作的一切遇到的是我们的冷静和镇定自若，就像遇到一辆坦克一样。迄今他们没有一件武器能够给我们造成重大伤害。他们可能严重地损害一些人，也许杀害一些人，那又能怎么样呢？会有10个或20个其他的人来代替这些人。只要我们同现存的国家 and 现存的社会进行斗争，那么，不管在反社会党人法之前和反社会党人法之间，还是在反社会党人法之后，情况都是这样。如果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讲反对派要求讲的东西，那么，挑衅就会接踵而至，而那时我们也不会回避使用暴力的斗争。或者，你们这些老练的人是否相信，党宣布过同意的一种策略。而批准它的那些人就会长期听任其仅仅停留在一句话上？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会被

迫进行公开的斗争！但是，在自动步枪和大炮时代进行一场可以多达有几十万人参加的革命会发生什么情况，不久前我在德累斯顿就谈到过这一点：我们会像瘦小的孩子那样可怜地被击毙。（赞同声）由于不仅在军事领域、而且也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巨大进步，今天谁还相信，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会以资产阶级政党的比如说构筑街垒的手段来达到目的。那样的人是彻底糊涂了，完全弄错了我们所处的环境的性质。（很对！）正由于我们对国家和社会所采取的是与从前所有那些阶级和政党截然不同的基本立场，因此，我们也就确定通过崭新的途径和新的手段来达到最终目的，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我认为，我们有极大的理由对事件的进程感到满意，只有那些无法了解全貌的人才会持另一种意见，资产阶级社会如此有力地为其自身的灭亡而工作，以致我们只得等候那一时刻：由我们去接管资产阶级手中正在失去的权力。（赞同声）正如在德国一样，在整个欧洲事态给人的印象是，我们也有一切理由对此感到高兴。是的，我确信，实现我们的最终目的的日子很近了，以致在这个大厅里只会有少数几个人看不到这一天的到来。（骚动）而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针对反对派说），赞同你们的那种策略，就是从根本上把矛头对准党并使之堕落下去。

这些是对“左”派先生们讲的，现在谈一谈福尔马尔。我并不想在这里挑起争论：从报纸有关福尔马尔的慕尼黑演说的报道看，有哪几点正确地被反映了出来。我已掌握了他以署名小册子的形式献给我们的那次演说的内容。

福尔马尔认为，当前的政治局势有了重大的改善，他相信已出现了一种“新方针”。他认为，大工业家和农场主一定会准备放弃他们的一些过分的要求；政府已站在劳工保护立法的立场上，我们应当走上谈判的道路，寻求在现行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

实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改善。“向善意伸出手来！”无知和成见使不少好人成为我们的意图的敌人，我们必须实行自我批评和自我克制，在实际的政治运动中不要过多地关心过去的事情等等。象我在《新时代》上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个演说的真正内容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永远慢慢来！福尔马尔尽管强调了发展的必要性，但是他以令人担心的方式提醒人们要考虑现状，要慢慢来。第二篇演说只是第一篇演说的解说，这是由于第一篇演说受到攻击而引起的。他在其中进一步说，关键是要把力量集中到各个时期的最近的和最紧迫的事情上，要特别着重强调最近的事情。我们的运动的本来目的在两篇演说中只是附带提到的。福尔马尔提出了他的下列要求：1、继续实行劳工保护；2、争取一种真正的结社权；3、阻止国家进行偏袒一方的干预；4、制定关于工业“瑞恩”的法律；5、取消粮食税。由此可见，福尔马尔的演说的宗旨是：“当然我们今后也要记住纲领的目的，但是我们关心将来和将来要发生的事，必须比从事他认为最必要的和最近的事少得多。”现在我不得不声明，如果党遵循福尔马尔的策略，并且暂时撇开我们的本来目的而首先把全部鼓动工作集中到实现这五项要求上面，那么我相信，这场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必定使党腐化。这意味着完全放弃我们的本来目的。也就是说，同我们要做的和以前做过的恰恰背道而驰。我们经常强调，以前我们一直在为争取能够从今天的国家争取到的一切东西而斗争，但是我们争取到的东西始终只是一点微小的让步，而真正的局势根本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必须看到整体，而任何新的让步对我们来说只有这样的意义和目的：把我们所立足的斗争基地整治得更好一些，使我们更加拥有防卫能力。如果我们这支大军——党——同另一支大军——整个反对派——相对立（关于后面这支大军，我不得不承认，它起初在各个方面还是比较强大的），那么，同后面这支大军进行一场决战，当然是一种愚蠢行为。因此，我必

须进行的一切工作都要尽可能地使我的斗争地位有所改善，从而保证取得最终的胜利。凡是我在这样一场斗争中争取的每一寸土地，凡是我能为自己谋得的每一点利益，我都必须设法获得它们，使我更加有力地去进行最后的打击。正因为我们企图达到我们在经济、政治和议会领域的鼓动中提出的全部目标和最终目的，因此我们的敌人说，你们就是愿意取得妥协，从而使你们能够对我们进行更加有效的斗争，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向你们作出这样的妥协。但对我们来说问题在于，我们要向群众指出，敌人是怎样从他们本身的立场出发拒绝满足群众最起码的和最合理的要求的。使群众对我们的敌人有这样的明确认识，是我们的议会活动的主要任务，而不是首先是否达到某一要求或者没有达到这一要求的问题。我们总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提出我们的提案。在上一届立法任期期间，我们就提出过许多提案，如果敌人不想使他们自己丢脸的话，其中总会有个把提案被他们接受，而且是他们自始至终必须接受的。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活动，正如很多来信所证明的那样，在大多数工人当中得到了极好的反响。因此我们总是维护这样的观点：问题首先并不在于，我们是否正在争取达到这一要求和那一要求；对我们来说，主要问题是我们要提出一些其他政党不会提出的要求。我们代表工人阶级同其他所有阶级对立的利益，同时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行福尔马尔在他的第一篇慕尼黑演说中所主张的并且在第二篇慕尼黑演说中进一步主张的那种妥协。例如他在第二篇演说中说，自从帝国国会成立以来，德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上台的是一些新人，他们进行了不少改革。其次，他一一列举了从建立第一个工厂视察制度到实行最近的工商业补充条例这一时期的种种成果。

他谈到工人的命运正在逐步地继续得到改善，而且有明显的事实证明这一点。他说：“严肃的人们在追求着理想，但是他们也

想到了实现这些理想的漫长道路和必须越过的无数障碍等等。“这是我极其反对的观点。其根本错误在于，我们当中的一位领导人竟然出面而且不断地对党说，孩子们，这是一条我们必须通过的无限漫长而又有着无数障碍的道路，也就是说，你们的步子要相当小，走得不要太快，这样，即使很慢，我们也将逐步达到目的。这是一种虚伪的和错误的策略，它使一切热情减退，使重视微小让步的观点得到传播，这种策略与党的本质及其目的是不相容的。同时受到忽视的，不仅有我们这方面的思想意识的巨大进步，而且也有我们对于那方面的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进步。全党越来越发展了，我们也更加前进了，随之我们的观点便相应地变得强硬、鲜明和富有原则性，于是我们的对手就日益向后倒退了。今天没有一个有见地的对手还敢说，资产阶级社会能够满足工人的要求。几年前我们的很多对手还相信过这一点，今天没有人再相信了。经济情况的发展，战备的继续，（使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说，战争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要么就是后天肯定会发生的），以及对所有这些情况正在促成现今社会毁灭的确信，——这一切导致了不再有人否认，我们在走向一场灾难。自然有人回避说出，社会民主党是对的，但是没有对手再相信，它是不对的。对于自己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这是巨大的收获。（热烈的喝采声）在这种局势下，要我们接受福尔马尔的观点并且一反常态地说，孩子们，慢慢来，要知足。好象我们什么时候不知足过似的！（活跃）对福尔马尔的拖延政策，我是绝对不能表示赞同的。同志们，那么现在在全世界具体地说近两年来在德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俾斯麦下台了，当然我们大家都对此感到高兴，但是卡普里维上台了，而他的所作所为难道总比俾斯麦要好吗？（喊声：不是的！）这个人在最近一次帝国国会上说过，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我们准备的无非是以枪和炮对付你们社会民主党人，——他公开地发表了他的意见，这使我们感到高

兴——但是我们的确没有理由对他表示信任。政府在农业问题上的态度也是如此。我们是否有理由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呢？但那又会取得什么结果呢，即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实现了更迭，我们在现行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下能否指望得到巨大的成果呢？最后，如果政府同意同俾斯麦的那种统治相对立，那么，除了制定疾病、伤亡和残疾法以及在劳工保护法方面做些事情外，还会有什么结果呢？唉，政府已经做的这些，是为了给社会民主党提供方便？不，不是，而仅仅为了给社会民主党制造障碍。（很对！）我们的确不想低估这一点。但愿上面那些人还有一颗“好心”，——比方说我相信冯·伯勒普什先生的那颗“好心”，——但是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所作的一切和正在做的，是为了削弱我们。如果他们由于满足我们的这个或那个要求而使我们得到加强的话，那么，这样做是违背他们的意愿的。今天问题是这样，我们的敌人一向做的是否都在反对我们，或者都在赞同我们，以及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在关心我们的工作，都在违背他们的意愿来关心我们的事业。但是为此我们既不应感谢他们，也不应信任他们。2月份烧酒税从50马克下降到35马克，这不是他们向我们作出的微小让步，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同奥地利签订贸易合同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生活需要。这是他们以沉重的心情作出的一个让步。而如果他们今天又同意进口美国的脂肪和火腿，那么谁还相信，他们这样做对社会民主党人或工人阶级是友好的呢？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使我们丧失宣传材料，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美国总统通过麦金莱法案有权借助关税政策方面的报复措施来严重损害德国的工业。如果他们相信凭着上面采纳的象我们的劳工保护法草案那样的法律就能把社会民主党打发了事，那么，他们明天就会全盘采纳我们的那项草案。（很对！）由此可见，我们自己并没有弄错敌人为他们的行动所确定的动机。如果他们向我们作出让步，那么我们就接受

这一让步,但并不会表示非常满意,而是将其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和小额的分期付款。(很对!)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背离我们迄今的策略来讨好我们的敌人。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向你们提出了我的决议案。反对派认为,在党制定决议时,凡是不赞同决议的个人都可以随意结成反党阵线,可以置党于不顾,为了抵制这一观点,我曾在决议案的最后三段指出:

“其次,党代表大会要求,每一个党员要十分重视全党的决议和党的机关报的指示,只要它们是在授与它们的权限之内行事就应认识到,像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斗争的党只有依靠极其严格的纪律和对全党意志的服从才能达到它的目的,这个党正在实行这样的纪律和这样的服从。”

我们一般总是必须作出那样一些理所当然的决议,这是很糟糕的事。但是根据那些先生们的态度,我们必须作出那些决议,这不仅是对他们,也是对每一个今后打算对党的决议和党的策略冷眼相加的人。其次我曾经提出,尽管这根本不是与党的策略紧密相关,但同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反对派当中的那些先生们强调,我们压制开诚布公的意见,打算不准发表其他意见,这也是一种被敌人的报刊所夸大的观点。——

“党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对党的机关报和党的议员的行动或疏忽提出批评,是每一个党员应有的一种当然权利,但是代表大会要求,这样的批评要以有助于对涉及的部分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那样一种形式来进行。”

最后我建议作出决定:

“党代表大会最终认为,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所谈到的那一原则:‘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①,今天也还必须是党员行动

的准则。”

在1891年，即国际工人协会成立27年之后，我们有必要说明一下同志之间的关系准则，但这并不是我们党的现状的吉兆。我作为老实人总该向对手讲讲，我这个老实人能够维护的事情，更确切地说，这样一种行动对同志们来说是个义务。同志们，我请你们，请你们一致接受这个决议案，从而使党的荣誉和利益今后受到各个方面的维护！（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1891年10月14至2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年柏林版第158—178页。

（唐春华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页。——编者注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 大会上关于党的策略讨论情况的总结

(1891年10月19日)

同志们,两天来我们在这里进行了讨论,我作为报告人有必要把讨论的全部情况研究一下并做出总结。那些我认为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我想可以略而不谈了。一部分同志离开了大厅,因为今天下午要通过的决议不合他们的胃口,也不会同意研究他们提到的一些问题,尽管如此,我也顾不了这些了。对立面的先生们对党和议会党团迄今的策略持有异议,他们不仅在这个大厅里如此,而且在这个大厅外面,即在反对派那里也是一样,他们在那里还能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我们无法回答他们的论点。我总是乐于在这些先生缺席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驳斥,但我不得不这样做了。

奥尔巴赫先生再次作了冗长的发言,试图以此表明反对派的谴责和抗议。倘若他同时声称,他一向做的事情其实只是要解决分歧和对立,他们无非是党内“最忠实的”的反对派,那么,我对他的回答是,如果这些先生们一直象他今天这样讲话,就不会发生已经出现的那些炽烈而激动的争论了。但基本差别是,正如各方面所证实的那样,这些先生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攻击了一项策略,而这项策略是与远在外地和在柏林受到他们攻击的那项策略有着重大不同的。我再证实一下,对于我们来说首先问题在于,既然反对派先生中的一些人对某些人特别是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人身攻击

和控告，他们就要为此提出证据，其次则要求，人所共知的柏林传单同样要为它恶毒攻击议会党团和党一事提供证明或者撤回那种攻击。问题只是在于，那种攻击成了这里某些人进行表演的理由，因为他们首先提出了那些谴责。假如反对派能像比方说福尔马尔就党的策略发表他的不同意见时那样不厌其烦地详加论述，那种个人性质之间的分歧就不可能发生了。

我还是首先谈一谈维尔德贝格尔提出的一些控告。他的控告是指党内在实行专制，他的控告材料只是依据哈雷代表大会以前那一段时间的事实，有一部分还是依据反社会党人法早期的事实，而这些事实早已为历届党代表大会的讨论所澄清了。他同威纳尔一起提出的一系列其他控告也属于这种情况。如果我在这里还想研究一下由于圣加伦代表大会和哈雷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在那里最后作出决定并且得到解决的那些论点，那么，据说这种要求就是不负责任地要去占用党代表大会的宝贵时间。这些先生们不是限于研究上一年中在他们看来据说给党带来了不幸和耻辱的那些问题，而是多半以谴责的口吻追溯到10年和更长的时间以前，并把早已解决的问题重新当作谴责的对象，这些正是我们还要对他们进行不寻常的谴责的地方。其次，维尔德贝格尔坚持谴责议会党团执行了一种小资产阶级改良策略。弗里茨同志几天前已经毫不掩饰地通过为柏林第三选区维尔德贝格尔竞选的传单指出，这些传单就其全部内容来看所包含的观点一般说来是同党的传单完全一样的，所有这些传单——我手里就有6份为维尔德贝格尔竞选的各种传单——都表示指望他得到手工业者、小工商业者和小职员的选票，而所有这些人也都主张选举维尔德贝格尔。尼德尔奥艾尔说过，如果维尔德贝格尔本人对这些传单还不满意，如果他不赞成这些传单，那他还有什么可谴责的呢？尼德尔奥艾尔就这些传单问题为维尔德贝格尔进行辩解的尝试是很不成功的。假如维尔德贝

格尔反对这些事，那他就负有义务否定这些传单，并且声明他不打算参加竞选。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交给你们的关于柏林反对派的小册子中一切该登的东西都没有登出来。讲一讲他在竞选演说中讲过的东西，并不是多余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890年2月，即在议会党团的活动还不象后来那样的时候，他便完全依赖于议会党团及其活动，并且强调这些活动，使这些活动为他的竞选发挥作用。那时，他在一篇演说中说过：“社会民主党不想破坏，而是想建设；我们的目标是如此合情合理、如此有根有据，致使具有人的思维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些目标。然而这些目标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哪怕我们在帝国国会有100名议员，也是不能达到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倒是能向这些目标大大迈进一步。（听啊！）维尔德贝格尔其他演说的内容都与此相类似。威纳尔称赞这是“提高矿工阶级觉悟的特别标志，因此矿工们决定，鉴于选举即将来临不举行罢工”。在另一个场合威纳尔说，我们的党以它在帝国国会的态度表明，它是真正维护劳动人民权利的唯一政党。（听啊！）这就足以证明，直到1890年2月20日反对派先生们及其代言人已经完全同议会党团和全党站在同一立场上了；如果他们此后采用另一策略（据威纳尔说，自那以后他的观点已有所改变），那么，这仅仅归咎于一种不幸，即他们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场内活跃。很对！）但是，不能把那些先生们的失败说成是改变党的或者议会党团的策略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其次，维尔德贝格尔指责我，说我对柏林传单没有采取对法兰克福呼吁书的那种态度，而且还补充说，他不理解，在法兰克福同志们的那种行动之后，我怎么能对这些人采取如此宽容的态度，而对他们这些柏林人却是如此毫不留情。首先我要声明，我根本不了解法兰克福呼吁书的内容，而是对此发表过意见。还有，那时我因事不在柏林，当议会党团就法兰克福事件作出决定并向苏黎世派出一个代表团时，我稍后曾

对议会党团的代表们公布法兰克福人的那一声明深表遗憾，确切些说，我对此事表示遗憾是有益于法兰克福同志本身的。但是，在议会党团决定公布那一声明之后，这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首先，法兰克福声明不是未经签署就别有用心地被发表出来，而是在法兰克福同志了解此事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然而在这里却只有维尔德贝格尔才了解柏林传单一事。这样，在议会党团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发表以后，当弗罗梅还在自作主张地认为有理由对法兰克福人持反对态度的时候，我并不认为这种作法是正确的，而且我反对他的那种态度，但不是针对法兰克福声明的内容。恰好象奥艾尔在这里说的那样。他可以表示赞同柏林传单的大部分段落，同样，我也可以对法兰克福呼吁书采取这种态度。不过两者却有天壤之别。当时正值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我们没有可以自由写作的报刊；对议会党团在轮船公司津贴的态度问题上有过一场十分激烈的争论。这样，法兰克福的同志们就行使他们的权利，把他们对这一事件的意见寄给了党的机关报，于是机关报在议会党团的赞同下把这一声明作为党内一部分同志的重要意见发表了。如今柏林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取消了反社会党人法，我们有了每天可以向党反映意见的报刊，有了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就是说，同志们有了足够的机会用公开的方式去谈论他们不愿向领导和某些同志谈的一切问题。因此，必须批判反对派采用散发传单的方式而又对此一口否定的不老实行为。维尔德贝格尔先生曾经谈到过裁军问题，并想根据我在帝国国会的发言证明我犯了一次错误。是他错了。在这一点上我从来没有犯过错误。象对于全国裁军那样一个绝对无法实现和空想的计划，我根本就不是怀疑。顺便说一下，谁略微留心读一读后来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就军国主义问题通过的决议，他就会发现，我在帝国国会的讲话是符合以那次决议为依据的观点的。裁军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原则

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对任何持异议的人提出指责。相反，我仅仅对有人说我犯了错误提出抗议，我认为我的行动是无懈可击的。

其次，奥尔巴赫强调了涉及到近几年来议会党团的活动的一系列观点。既然奥尔巴赫及其同伙想要党代表大会作出一项决定，那么办法当然是简单的：他们宣布一下近年来议会党团采取了这样和那样的态度、提出了这样和那样的提案就行了；我们认为，这样做是违背纲领或策略的，因此党代表大会应当就此作出它的判断。这似乎是合理的和正派的，所以就不得不作出判断，因为这是解决这类分歧的唯一办法，所有那些令人不快的争论也会就此停止。但是有人不想这样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和作出这样的决定。奥尔巴赫甚至走得很远，他把一种倾向硬是强加在我们的提案上，而这一倾向早已由该提案中明的理由予以消除了；我指的是药房国有化提案。奥尔巴赫关于这个问题的整个发言将由于下面一点而遭到失败，即我们声明提出该项提案的动机是，使医药以其本身的价值为价格而存在并在国家无利可图的意义上来实现医药业的国有化。在邮电、铁路、采矿以及其他国营部门，国家完全把它们看作一种私人企业，并在那里对工人和职员进行同样程度的剥削，同时往往把利润用于敌视文化的目的，因此不能说那是一种抽象推理的行动。也不能说这一提案是立足于国家社会主义。由于有人用错误的方式以邮政部门为例，说明社会民主党必须如何行动，结果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曾多次出现过思想混乱。只是谁也不应把这些国营企业看作国家社会主义企业，那样的国营企业将变为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一旦社会民主党掌握政权，这种国营企业的存在就会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因为不再需要对这种企业实行剥夺。从这一观点来看，人们会赞成对一切可能的企业进一步实行国有化，如果这样做不违反其他政治利益，引起人们对这一行动产生怀疑

的话。因此，“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不适用于我们的国营企业；这最多适用于在物质上直接受到国家干预的老年人立法和伤残人立法。所以，我们站在我们这个方面没有对此投赞成票，因为这一法案对于我们过分“国家社会主义”了，而其福利金却又不充足和短缺。另一方面，我们坚决反对所谓这一法案有可能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我们，而且尤其是我，在谈到议会党团的任务时非常果断地指出过，所有这些立法丝毫没有改变工人的阶级地位，也没有触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这样，我就同一部分反对派分道扬镳了。

现在我来谈谈福尔马尔。他在今天发言的开场白中强调指出，这里以各种不同的态度对待他的慕尼黑演说的方式和方法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人们不是没有读过演说的全文，就是他们的解释不符合原意。他竭力说明，他想从什么含义上来阐明那篇演说；他说问题并不在于根据他的意见从某些地方摘引的个别句子或个别词，而在于要把它们放在一个整体之中加以考虑。其次他对此抱怨说，不仅敌人对他的演说和他的行动进行诋毁（这些诋毁是直接违背他的意图的），而且诋毁也来自广大党员和党的报刊。我从一开始就以十分客观的态度对待整个问题。我想进一步补充一下，除了一家敌对报刊登了一则唯一的报道外，我想起读过什么有关福尔马尔演说的材料。我对那两次演说的批判，同敌对报刊毫不相干。我若根据敌对的报刊对一个党员同志的评语来判断这个人，我总认为那是对我本人在人格上的一种贬低。所有那些在这里就福尔马尔的演说作了发言的人，他们的批判也不是来自敌对的报刊，敌对报刊只是引起或许大部分人去关注这件事，尽管如此，也不会引起争执。我现在的立场就是福尔马尔本人对他自己的演说所采取的立场。如果有人根据个别用语、词汇或句子就对这两次演说进行批判，我认为这也是错误的、荒谬的和极其不公正的，因为人们一再指出，而且福尔马尔本人也认为应该指出：无

中生有的东西不足为凭。我们不妨提个问题，那两次演说是怎样作出的？福尔马尔反驳一种说法，说他仅仅准备好一篇演说或者除此之外没有作过其他演说，而情况是这样的，其他演说绝没有包括他想到的一切问题。凡是了解福尔马尔的人都知道，他聪明过人，不可能对他进行那种诋毁；对他的诋毁既不是我，也不是党代表大会和党的报刊。如果说，是对福尔马尔背地里说三道四，我认为那是不值得花气力替福尔马尔辩解的。但他向我们发表的演说毕竟是严密的、完整的、浑然一体的；那不是即兴而发，而是精心制作的标本，其中每一个词都有一定的份量，因而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地说，那里面包含的内容是福尔马尔经过冷静而全面考虑过的意见。第一篇演说于6月1日发表，福尔马尔没让作记录，慕尼黑党报报道前他事先也没有读过，但他事后根据这个粗线条的简讯把他的那一演说固定了下来，这个简讯成了演说的基础，此后演说在党内遭到反对，却受到敌对报刊的热烈欢呼，称这一演说十分重要。这家报刊指出，如果一个有福尔马尔（迄今他在党内属极左翼，不久前反对派甚至称他对自己有培育之恩）那种地位的人突然明确表示要改变方向，那么，这意味着放弃党的迄今执行的整个策略，结束它迄今的全部历程，这对党来说是十分重大的事情。至于后面一点，我是赞同这家报刊的判断的。在党内，没有哪一个人象他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激进的立场转变到了机会主义的立场，我们必须公正地回答，当一个具有巨大才能和教养的人改变他的观点和立场的时候，怎样去解释这一转变呢？关于这一点可能众说纷纭。但我不愿吞吞吐吐，要公开地说，在那两篇演说出世以后，他的个人挚友都认为，说福尔马尔所讲的话是别人让他讲的，那是不可思议的。有人这样提出过问题：他是信口开河吗？他只是想标榜一下自己吗？或者说这意味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我确信那是他的真正看法，而这种看法可以简单地从已经彻底改

变的人际关系和他近年来所采取的态度中得到说明。有一个关于巨神安泰^①的古老神话，巨神安泰为了吸取新的力量，暂时回到大地母亲那里，他只要身体接触土地就吸取了新的力量。这个形象的故事也适用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鼓动家。一个人在党内起杰出作用，是因为他具有特殊的社会身分，一旦他失去同群众的经常联系，那就有走入歧途，失去同党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感情危险。（很对！）福尔马尔近年来多少有些孤立，这既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也更加由于他个人的，社会上公认的情况。按照我们的唯物主义观点，对于所有的阶级来说都是生存条件决定它们的思想方法，同样，这一规律通常也适用于我们大家当中的每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身分沾沾自喜，那么往往就要发生问题，他就会屈服于诱惑，而不顾及哪怕是如饥似渴的群众特有的感情，他考虑的是去做迫切要做的东西，但这可不是变革，而是要我们小心从事，注意至少逐渐放慢脚步去达到目的。我们有时间呀。

一个人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受到一种观点的左右，这我是十分理解的。福尔马尔也是了解我的观点的，因为他把我在《新时代》上发表的见解说成是号召群众不要忍受下去。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不是我违心地想到群众不能忍受下去或者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而是我的感情和理智告诉我：组成政党的成员们有一切理由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从而也表现出强烈的不堪忍受，而且他们有权期望和等待一切情况尽快地发生变革。

另一方面，我们的党决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政党，它的所有党员也不具有同一的物质水平和思想水平。近年来，由于社会的整个发展，我们的党已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当然，从党的内部看，在运动的发展速度上是存在不同流派的。但是，尽管在速度问

^① 安泰——在古希腊神话中是海神波赛农和地神盖娅所生的巨神。他力大无比，所向无敌，但只要同自己的母亲即大地脱离接触，就失去力量。——编者注

题上众说纷纭，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作为社会民主党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阶级斗争，用尖锐批判的这把手术刀去解决问题。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要强调不管我们的鼓动工作取得什么样的积极成果，其目的无非是使党更加富有战斗性，从而更快和更深入地达到全部远大的目标。总之，到处都要极力强调，我们斗争的实质是开展阶级斗争，同时还将一再指出：凡是敌人给予的，都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被迫。我们既不应低估敌人的本性，也不应低估运动的性质。（喊声：福尔马尔说过）不，他在他的小册子中没有说过这种话！当然他说过，我们不应忘记目的，但另一方面，他在他的两篇演说中系统而全面强调的是：慢慢地、谨慎地、适当地进行，使你们不致产生急躁情绪和遇到危险，而且要你们考虑到，我们的敌人当中有很多人怀着善意的。福尔马尔为了论证人们在他的演说中还能看到其他某些东西，就从那里面作了大量引证来证明他的说法。尽管如此，有一点倒是颇为引人注目：福尔马尔认为有必要强调一下他在6月1日的演说，因为报刊对它作了错误的报道；于是他又认为有必要随后再作第二次演说，第二次演说必须被看作是第一次演说的解说。但是，在他强调了那两次演说之后，他就必须在这里作第三次发言，这次发言又必须被看作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演说的解说。可他今天的发言和前两次演说相比，其基本内容并不是没有差别的。（很对！）我们就来仔细研究一番。他的那两次演说的标题是：《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任务》。他劈头就提出一个问题：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来的情况是否能够使党奉行另一种策略。如果今天福尔马尔十分强调他根本没有想到要有一个新的策略，那么，他当初说过的话就完全是虚伪的。如果问题在于保持旧的策略，他就根本用不着发表演说。（很对！）按他的意见，自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和俾斯麦下台而出现“新方针”之后，理应说我们已经处于一种根本不同的形势之下：政府认为有必要在一系

列问题上对我们采取另一种态度；已经出现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和改善，我们必须承认有很多善良的好心人，如果以正确的方式把我们的意图向他们陈述，他们会很乐于赞同我们的观点，而我是最坚决反对后面那种见解的。福尔马尔终于向我们指出了矛盾，在他看来矛盾在于，我们一方面认为党的目的是个不久即可实现的目的，另一方面又主张持续不断地进行一切可能的改革。如果说这一观点本身就有矛盾，那么，矛盾也在福尔马尔身上；他不是一再地说，他一直注视着全部目的，但差别只在于，他的那个全部目的的实现是遥遥无期的。辛格尔的比喻其实恰到好处，他却可能认为这样的比喻是可笑的。按照他的策略我们势必发展到这种地步——在专门为目前任务进行鼓动时，最终忘记我们是社会民主党（很对！），忘记当今的政府和社会是社会民主党的死敌，同它们不存在达成协议的问题。福尔马尔的那种观点的完全合乎逻辑的结果是，虽然他主张不要忘记目的，但一直主张注视的是某些实际的目的，并主张把我们的全部力量、我们的全部精力和我们的手段集中到这个上面。我曾把这种集中的做法叫作一种倒退的集中的做法。其次，我想把这种做法称作一种对我们的力量的浪费，一种同我们党迄今的全部活动完全对立的煽动。以前我们一直说，我们想推翻当今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政治上层建筑即现政府，从而建立社会民主社会。为此目的，我们力图取得一切手段和有利条件，使我们易于为这一目的进行斗争。就其整体来说，这个目的是个重要问题，其他目的则是次要问题。当我们觉得有可能达到全部目的的时候，我们究竟可以作出多大的让步，这对我们来说是次要的。相反，福尔马尔却把远大的总的目的说成是暂时次要的目的，而把我们必须争取的最近的实际的要求说成是主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对立，其尖锐性根本是无法想象的，当然，对这一点作出说明是代表大会的任务。（赞同声）

福尔马尔指责我，说我喜欢作预言，而他认为预言是个捉摸不定的东西，如果预言家言而不中，那么，他的那个预言就会朝着对他十分不利的方向发展，其次则因为，如果这样的预言出自某一个人之口，这个人又凭借他在党内的地位而广泛地产生一定影响，那么，这种预言就可能是危险的。福尔马尔虽然指责我作预言，可他自己不是也在作预言嘛。他和我的差别仅仅在于，他指责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是个粉红色的乐观主义者，而我必须指责他，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不幸的悲观主义者，他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作出预言的。（很对）

我说，根据德国和欧洲的形势党有一切理由对不久的未来完全充满信心和抱有美好的愿望（而且我认为，只要容许在这一领域作出证明，也是可以证明的），相反，福尔马尔则说：不，一切都是遥远渺茫的事情。他使党失去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没有这种面貌，象我们党这样的政党是无法存在下去的。（很对！）敌方已经有人把福尔马尔称作新拉萨尔了。同志们，拉萨尔用福尔马尔的那类演说从来没有取得过什么成果，从来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生气勃勃。（很对！）于是，便有人求助于民族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把民族自由主义的策略推行到社会民主党内。（很对！很对！）福尔马尔说，从来没有一个党由于小心谨慎而毁灭。民族自由党就是由于这样的小心谨慎而毁灭的。（很对！）其他政党的历史同样向我们证明，在他们出于形势所迫而取得了政权以后，由于过分小心谨慎以及很容易由此而产生的畏惧心理，都使它们遭到了失败和毁灭。我们有一切理由不仅在群众中点燃起热情的火焰，而且要使之保持下去（很对！），同志们，我们用什么方法去鼓舞那种热情呢？只用我们提出的诸如标准工作日之类的改良措施吗？说真的，我是最懂得标准工作日的价值的。在这方面，我同意马克思的意见。我也一向维护反对派提出的切合实际的要求的价值，但

是，如果我们把美好的目的推到遥远的未来，并且总是强调，只有将来的子孙后代才能达到目的，那么，群众就完全有权同我们分手。（福尔马尔喊道：热烈赞同。）好了，亲爱的福尔马尔，你用最近的那一类演说并不能鼓舞人。（场内活跃）

同志们：我三遍四遍地研读了福尔马尔的演说，并在我的笔记本里摘记了重点和注明了意见。你们在任何一页上都不会发现不是这种情况。总而言之，我是了解他的演说的内容的，在这里我还是说一下，那两篇演说是富于逻辑性的样板，但演说也自始至终反复提醒人们要谨慎从事和适可而止。有人对我说过，福尔马尔的第一篇演说其实比现在他那个印刷本要糟糕得多，我无法也不愿对此作出判断。但另一方面，我并不隐讳，当我读了第一篇演说又读完第二篇演说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感到惊奇的是，第一篇演说中的一切谨慎行事之谈又以更加谨慎行事的形式写在第二篇演说当中。第二篇演说还包括他以乘方增长的机会主义观点。小册子的第15页上写道：“上台的是一些新人，他们不顾四面八方对新事物的抵抗，进行了不少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改革。这个新的阶段已几乎历时一年半，现在是以研究的眼光考察这个新阶段的时候了，应当看看它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有理由改变我们的政治态度。”^①这一观点的核心问题在第18页上可以发现：“谁也不可能想到放弃我们的任何一点原则，不如说，在执行我们的实际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念念不忘；这样做只是向伟大的目标接近了一小步。未来的希望使我们力量倍增，高瞻远瞩，但是对于未来的希望不能压倒对于现在的希望，不如说，它正是必然要激励对于现在的希望。在荆棘丛生的漫长道路上走向遥远的尽头的旅行者，不能光靠远方朦胧可见的、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来维持他

^① 《福尔马尔文选》198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6—147页。——编者注

们的生命力，否则他们远在到达之前就会饿死或憔悴而死。因此，我们必须在不忽视总的目标的情况下，重新从时间上无限的目标走向直接的目标，从绝对的事物走向实在的事物，必须除了提出长远纲领之外，还提出为最近时期规定的工作纲领，必须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到符合各个时期的最迫切的需要、本身又有实现的最大可能性的一些个别要求上去。然后必须运用我们的鼓动工作的全部力量，我们的论证和说服工作，我们的谈判的灵活性和坚韧性以及我们的全部社会影响来支持这些要求。人们只注意和尊重强者，所以我们不能放下我们至今使用的武器。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武器仍然是我们唯一的保障。但是我们用不着任何时候都徒劳无益地拿着这些武器大叫大喊。一个野蛮人以为，只要他乱舞长矛进行威胁，并且做出吓人的动作，敌人就会害怕；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即使把枪枝放在脚下，也给自己和别人以强者的印象！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在6月1日指出了应当首先争取实现的要求：1. 继续实行劳工保护，特别是标准工作日；”等等，等等。^①

由此可见，这实际上是福尔马尔打算为党提供的一个崭新策略。如果我们要按福尔马尔所希望的那样去进行鼓动，那么，我们势必变成一个最坏意义上的机会主义政党。这对党来说有点像这样一种策略：一个活生生的肌体在被打断脊柱以后，还指望它像从前一样去完成任务。（赞同声）我要防止社会民主党的脊柱被打断，也就是防止它的原则、反对统治阶级及其政权的阶级斗争由于一种怯懦的策略与斗争方式以及由于争取所谓实际目标的独特斗争而被推到次要地位。

今天福尔马尔在我提出的决议案的基础上十分具体地发表了看法。如果他把这样的看法在他的第一次发言中讲了出来，我认

^① 《福尔马尔文选》198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51—152页。——编者注

为，厄尔特尔的提案可能就是不必要的了。(赞同声)但是也许我本人要负一点责任。我不想反驳，星期六朋友们作为发言人对我提出的指责：你本人是有责任的；如果你在你的发言中能更有力地触动一下福尔马尔，那么，他也许会把他的发言或多或少准备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赞同声)好了，我就说到此为止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终非坏事。争论有了成果。——当然，福尔马尔很少想到我的顾虑——在我第一次的发言中，我就说过，我们提出我们的提案，这些提案能否被接受，那是无所谓的，而且我会愿意合乎逻辑地、不言而喻地表示：如果这些提案不被接受，那好，我们有一种更加有效的鼓动手段。

福尔马尔清清楚楚地了解我的这一观点。他知道，谁都不像我那样致力于我们提出的那些提案，他也知道，劳工保护立法草案的第一次提出是我促成的，那时候我和他都是议会党团选出的委员会的委员。结果到头来他对我的意图还有怀疑。(福尔马尔叫喊)你听着，福尔马尔，我们相识时间太久了，相互太熟悉了，我们都不会弄错对方的意图。

但如果他这样解释我的发言，似乎我主张提出其命运与我们无关紧要的提案，甚至我们会在其遭到否决时感到高兴，那么，这正是我所反对的那一作法，这不仅关系到我将同我的对手断绝关系，也关系到一些同志必然因出现这样一种疏忽而在鼓动上付出代价。对于这些同志，有人将要引证的却是福尔马尔对我的发言的解释，而他采用的斗争方式使我感到气愤。

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况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观点。直到他星期六的发言，他一直持有同党不同的观点，如果他现在声明，他完全站在我的决议案一边，我就再一次回答说，倘若他撤销星期六的那些说法，我就为他大声叫好，因为这是我希望达到的目的。我认为，我的第一次发言已经使他有了下台阶的机会，只要他进一步考

虑一下，并且在他弄清党代表大会的情绪以后，他会找到一种他能够接受的形式，放弃他在打印出来的演说中提出的观点。这对他不是丢脸，我们当中也从来没有人会糊涂到要对他落井下石。这种声明根本不会降低他的威信，相反倒会使他赢得极大的尊严。（很对！）在福尔马尔于星期六声明他虽赞成决议案，但却出于另一种动机以后，我认为，党代表大会就厄尔特尔的提案作出表态当然是必要的。如果在举足轻重一类的问题上存在这样的不同意见，那么，在作出决议和达到目的问题上能有什么样的统一呢？福尔马尔说过，他赞成倍倍尔的决议案，但不赞成它的动机，而奥尔巴赫则说，他不仅同意这个决议案，而且也同意它的动机，但我担心，党的领导机构无法根据这一动机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极右派和极左派都同我们在决议案的条文上联合起来了。因此我认为（丝毫不能说万事大吉了），决议案中必然会被塞进一些不该有的东西。福尔马尔从激进一方转变到了右派一方，谁能保证他今天声明之后就再也不会会有新的改变，并且重新以他的第一次发言为依据，这是我要防止的，我也要防止我们党内也许会出现另一个人去效仿他。（赞同声）这方面必定遇到障碍。在我们体会到福尔马尔在这里作的两次发言虽然含义截然不同，但他在两次发言中却对决议案表示同意以后，我们不得不对厄尔特尔的提案表态。我要补充的是，在对厄尔特尔的提案表态的那一时刻，福尔马尔这个人完全是由于我而退却了。表态那件事暂时是以福尔马尔今天在他的发言中作出声明而解决的，他那样做是由于我涉及到了他，而不是由于涉及那件事的真正的一面，即要防止今后出现新人，随便一个人，舒尔采也好，弥勒也好，或者科恩也好（场内活跃），那样的话，这个人就会对我们说：福尔马尔确实也说过，他要以决议案为依据，但他并没有撤销他的第一次发言，为什么不许我重复一下，他说过什么，而我又认为什么是正确的呢？因此也就必

须表明态度，因为我知道，福尔马尔所代表的那种观点在我们的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同志中是受到欢迎的，其中部分同志是由于缺乏洞察力，部分同志则由于天生的好逸恶劳。福尔马尔在星期六所作的发言，在这里，在这个范围内博得了比我预料的要多的掌声；我要完全公开地说明这一点。关于在这里代表一派的那些有关同志，我认为他们知道问题何在，他们不是由于福尔马尔发言的漂亮的表达方式或者他的敏锐的观察力，而是由于发言的内容才报以热烈的掌声的，因此我希望查明一下，在有关党的策略问题上有多少人是赞成福尔马尔的观点的。（赞同声）这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如果多数人认为，不对厄尔特尔的提案表态就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他们也有义务去解决必然在党内造成混乱和迷惑不解的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而有助于他们有把握地完成任
务。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党代表大会冷静地和客观地宣布，我们不能赞成福尔马尔在关于党的策略的发言中所包括的那些观点，那么，我认为，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伤害个人感情的做法。这不是对福尔马尔的责备，而仅仅是对他的发言发表不同意见，发表不同意见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适用的，而且也是必须受到大家重视的。但如果当事人没有立即说明他要讲的是你们能够对我作出的极不信任的表示，代表大会就不容许发表出来，那可就糟了。不，这不是那么回事。我明确地说，在刚刚听了福尔马尔的声明之后，我决不会还在厄尔特尔提案上节外生枝。我只是想最后弄个水落石出，使我们不致被迫不久又在一次代表大会上进行类似今天的辩论。我们同左翼反对派一刀两断了。对于右翼的观点，我们还必须听听代表大会的意见。我所以支持对厄尔特尔的提案进行记名投票的那项提案，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希望对今后党的策略不再怀疑，也不得不希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公开的肯定或否定来表明他的意见，从而使选民有机会同我们当中的

每一个人进行辩论。(很对!)在我的生活中,我所讨厌的莫过于棘手的、不明朗的局势,而我一向主张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如果这种做法不会带来别的结果,而是使局势趋于明朗化的话。

福尔马尔特别对我感到生气的是,我说过他的策略会导致党的腐化。他说,那样的话,“青年派”也就同样有权对我们提出同样的指责,他的这种反唇相讥的作法博得了一部分与会者的热烈喝采。这是骗人的。双方都说同样的指责远远不是同样的。这指的是作出这样一种判断所依据的理由。如果极左派的同志们出来对我们指责说:你们正在使党腐化,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向他们说:是你们自己搞错了。第一,这是我们25年来一直遵循的策略;第二,党是凭借这一策略发展壮大起来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改变它。我们不想尝试一下你们的策略,因为我们认为这一策略是有害的,而福尔马尔的策略也是经受不住考验的。他的策略必定会导致腐化,因为它把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而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反社会党人法的最大损失是什么呢?我们的报刊、我们的鼓动者为了能够一般地向人民进行宣讲,被迫必须在上而规定的一个有限的视野里去撰写和宣讲。如果我们不可能通过我们在国外的报刊、通过创办《社会民主党人报》和通过出版一种真正的党的书刊(由于党员的惊人的、怎样称赞都不过分的自我牺牲精神而广为散发)而从原则上向党员进行宣传教育,那么,政府当然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得它想借助反社会党人法取得的成果,那么,党就会在思想上显出愚昧无知了。(热烈的赞同声)再者,12年来反社会党人法把思想的樊笼强加到了我们的头上,现在我们怎么能继福尔马尔之后也自动地为自己设置这样的樊笼!这简直是一种犯罪行为。因此我认为,“腐化”的那种说法是十分诚恳的。客观地讲,那是完全正确的。那不只是腐化,而是彻底堕落,并最后导致党的毁灭。(很对!)但我并不感到担心,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如果党代

表大会赞成那样一种策略，它就会发现：代表们一旦回到了家，他们也就会在家里造起反来，而我将置身于这样一支造反队伍的最前列。（场内活跃。妙极了！）我十分相信群众的正常理智和革命本能，知道福尔马尔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他提出的策略与从前施韦泽先生的策略没有什么不同，而这样的策略已经遭到失败，我们今天既不欢迎也不需要施韦泽。（场内骚动）我们面临的也还不是冲刺或慢慢来的问题。我在《新时代》上只是有条件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今天冲刺是不能考虑的，而慢慢来就更不对。我曾经说过：谁追求我们的那些目标，谁就要象我们一样同群众一道工作并意在使他们觉醒起来，那么，只要他满怀激情地对待事业，毫无保留地去维护整个事业，他就一定会取得某些成果。同时不言而喻的是，谁也不应推行一种有点蛊惑人心的策略，违背群众的崇高信念去宣传，把海市蜃楼的幻景讲给群众听或者向他们作这样的预示，而他自己却不相信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人们对我们思想的威力和发展是会有各种看法的。我一向是个乐观主义者，而且时常向我的那些沾染较多悲天悯人思想的朋友说：你们要当心，有朝一日不要使自己成了圣经里头的傻丫头们，新郎一来，她们就没有油去添灯了。（场内十分活跃）换句话说，你们似乎对真正的情况了解很少，以致对事件感到意外，不知道该干什么。领导人在有重大变动时发生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了。我的乐观主义也不是我自己捏造出来的。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对人和事从基本上进行研究的极其平凡的人。就像任何一个人一样，努力防止上当受骗。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几十年特别是最近时期以来德国和欧洲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形势有了发展，正是这种发展必定使我们感到极为满意和产生良好的愿望。（赞同声）历史告诫我们，在革新的时代要使新的思想和目标战胜现状，那是需要时间的。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国家、封建社会以及反对教会、贵族和君主制的政治斗争是

何时开始进行的呢？孟德斯鸠在1749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前40年发表了他的《法的思想》，他以这本书使这一领域里的第一批坚定的反对派受到了鼓舞。孟德斯鸠是其他革命作家的后继者，那些作家也都发挥了作用。在行将到来的革命前，他们鼓舞人们满腔热情地迎接革命并预示革命就要爆发，而他们的这种表现影响了攻打保守派的最顽固的巴士底狱前的那些年代。他们也都曾经是预言家。于是今天便有为数众多有思想的保守派人物在他们的书和杂志中直截了当地写道：要当心，革命到来，灾难临头！（赞同声）如果说我同样的想法，有人就要因此对我提出指责而且要怪罪于我，因为我的那些想法会使我们的同志们激动不已，在他们那里引起种种希望而又使之焦虑不安？！对此我的回答是：与其在讲话和思考问题时完全无动于衷或者极其乏味地斤斤计较，不如充满过多一点希望和焦虑！（很对！）其次我们要问一问：1848年革命的思想准备是何时开始的？在20年代初，即革命前大约30年。而我们的情况如何呢？近30年到现在，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宣传，而且在这一时期我们发展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如果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一时期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革和今天敌人因不知出路何在而完全处于绝望之中；如果我们看一看，整个形势如何逐步得到发展，以致明智的人都不再怀疑形势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不会不这样发展下去和相信由此而来的灾难仅仅是个时间问题，那么，人们接受我所持的种种看法并把这些看法讲出来，就不仅是当然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了。我不讳言，当不久前我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的著名的信件（我们的报刊也发表了这封信）中断言1898年前形势将有根本的转变时，我是非常高兴的。福尔马尔觉得可以就此嘲笑一番，而我却是这样写给恩格斯的：老头子、你和我，我们是我们党内唯一的“年青人”！（场内十分活跃）人们会对这个预

言发笑并取笑一番；有思想的人也在所难免。今天的这种冷漠的、悲观的麻木态度几年前与福尔马尔也是格格不入的。受到他攻击的恩格斯在1844年就完全正确地预见1848年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起义期间曾在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信件中就欧洲事件的未来形势作过预言，而这一预言不是完全得到应验了吗？（很对！）李卜克内西也取笑过我，而他自己却作过很多预言。（场内活跃）1870年他在帝国国会向我作过的那个预言，今天完全应验了。只要你们读一下他和我的1870—1871年期间的演说，你们就会证实这一点。但福尔马尔却出来大声疾呼：那些老调不必重弹了，预言也可以休矣。可他本人也在作预言。他和我之间的差别只在于：他对我们的敌人抱着极其惊人的乐观主义态度，但对党的原则性志向及其未来却抱着极其可怕的悲观主义态度。（很对！）

我再来谈谈对外政策问题。我知道，大部分同志一听到对外政策，通常是耸耸肩。这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的绝大部分同志都必须艰辛地为赤贫的生活而奔波，他们既无经费也无时间去研究重大政策问题，即使这些政策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我们大家都是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而且必须站在这个立场上，因为我们认识到并且相信各国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在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流行起来以后，关于对外政策的研讨工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如果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由于上述原因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件事就不得不由那些按其财力、学识和社会地位不仅有资格而且有义务表示关心的人去做了。说李卜克内西和我在三国同盟问题上同福尔马尔持有同样的观点，现在看来是不对的。福尔马尔知道，李卜克内西和我许多年来是议会党团在关于预算问题总辩论中的发言人，而这一辩论几乎是为议会有可能比较详细地讨论对外政策问题提供的唯一机会。为了表明我们在对外政

策上的观点,只是了解我们自己人的发言是不够的,要把握住这个问题的全貌,还必须了解一系列的发言。在这方面,我们与福尔马尔相反,他通常愿对这种事保持沉默,而我们则仍然大力强调吞并亚尔萨斯-洛林做法的缺陷一面,强调此时此刻仍有必要同法国和解。我们同他相反,不愿忘却1871年事件,否则我们的观点就无法理解。我对俄法联盟问题以及对我们对于这个联盟的态度问题都发表过意见,我们党对这些意见也作过一些评论,这些评论虽说是紧紧地针对那些意见,但那是《前进报》昨天完全顺便引自法国沙文主义报刊而登在它的著名的巴黎通讯一栏上的。福尔马尔向我大声疾呼,提醒我要注意,敌人的报刊对于象我的那种表现是会心领神会的。我对他的回答是:身在玻璃房中就不要扔石头了。^①我关心的不是敌人的报刊的做法,并且认为不值得花费心思去回敬。不错,我理所当然地提出过要求:无论哪一个同志只能对确实是我的而不是敌人强加于我的那些言行提出批评,但如果哪一个同志不顾我的要求,胆敢对我的言行提出批评而又抹煞他的批评与敌人的批评的差别,那么,我就不得不坚决地对此提出抗议。我承认,我们,而且是最亲近的朋友,在对欧洲形势的看法上是用不着取得一致的意见的,虽说恩格斯和我之间并不存在那样一种不同的意见。虽然我们的天性不同,虽然由于学识和经验他比我考虑问题深远,但由于我们在频繁的通信中反复地论述欧洲形势问题,因此我们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几乎是惊人的一致的。如果这里有人说,我在著名的柏林集会上散布了一种沙文主义观点,如果有人根据我的长篇大论得出结论说我要战争,而且公开主张挑起战争,那么,这是根本不对的,是一种十分拙劣的诋毁。福尔马尔甚至说过,幸而帝国政府像我那样比较冷静地对待形

① 即要正人先正己。——编者注

势,情况才没有急转直下。如果说,他说的我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那么他就是正确的。但符合实际的却是相反的看法。我无论是在关于俄国贷款的文章还是在我的桑索乌基的演说中,都十分客观地从1870年以来历史发展的观点出发,阐明了在欧洲发生而与德国有关和在德国发生的那些事件,而且根据所有这些情况我又十分客观地、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欧洲的形势即使不是立刻也用不了多久就会使我们面临战争灾难。于是,我就在关于俄国贷款的那篇文章中当谈到反对德国的一次侵略战争及其后果时曾进一步写道:我们正象政府的先生们一样是德国人……德国的土地、德国这个祖国就象属于那些先生们一样属于我们,属于群众,甚至更加属于我们和群众。如果俄国这个残暴与野蛮的庇护所,一切人类文明的敌人,为了肢解和毁灭德国(这只能是那样一场战争的目的)而对它进行侵犯,那么,我们就象德国的那些当权者一样,甚至比他们更加关心这一侵犯,并将成为抗击者。我还要补充的是,如果我们旋即就同今天同我们为敌的人并肩作战,那么,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拯救我们的敌人以及他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而是为了拯救德国即我们自己,使我们的土地从野蛮人的占领下解放出来。这个野蛮人是我们志向的死敌,而他的胜利就意味着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失败。我想再也无法说得更加尖锐和更加具有原则性了。(很对!)格里伦贝格尔有很多次不是站在我的立场上,他会证明,我在纽伦堡也讲过十分相似的意见。(格里伦贝格尔的赞同声)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这种情况是我们所希望的,而且还明确地强调过,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要归咎俾斯麦政府,而俾斯麦政府在执行这一政策中是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的。其次,我在最近的桑索乌基的演说中还曾经指出过:我们就是现在到了最后时刻也还要求同法国和解,而且要不惜任何代价去消除使德国和欧洲面临的巨大危险。但是我也要进一步

补充一下：如果起主导作用的人物说，最好使4200万人民按兵不动，从而使我们的堡垒不致失去基石，那么，我们当然就不得不强饮下那杯苦酒，但那样一来，造成这种情况的人就要遭殃了！全部责任正落在他们头上，而且他们也将体会到，他们制造的事态的结局不是他们所预料和所希望的一种结局。（热烈的掌声）这就是说，福尔马尔在我面前没有用任何方式维护一个重要问题的客观性，但他却要求我和我们在他面前去尊重这种客观性。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我想充分地说明一下，我们相互之间怎样实现停战。如果福尔马尔以含沙射影的方式进行威胁，我将对他的这种表现表示遗憾，厄尔特尔提案中并没有刺伤个人的词句。福尔马尔是以他星期六的发言以及他早些时候的演说而使自己陷入了这种困境。如果他星期六的发言像他今天的发言这样，那么，就不会有人想到提出象厄尔特尔那样的提案了。当他对我们采取根据他过去的表现他不会采取的那样一种态度的时候，他就突然暴露了自己。在这里，在党代表大会上，他不得不注意到他在6月1日和7月6日的两次演说未能得到赞同，而且根据此后发生的一切情况，他不能不注意到，他的观点对我们这样一个政党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虽然他仍然坚持那样的观点，但是，无论朋友还是敌人都丝毫不会怀疑我以我的朋友的名义提出的决议案的意义；我请您也以大丈夫的气概对厄尔特尔的提案予以肯定或否定的准确答复！（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译自《1891年10月14至2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的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年柏林版第265—286页。

（唐春华译）

关于未来国家*

(一)

(1893年2月3日)

先生们,星期二的辩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远远超出了我们讨论的题目;辩论结束的时候,特别是巴赫姆^①议员先生极为生动地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在帝国国会的讲台上向大家阐明我们的真正目的,因为照他看来,我们没有提出任何使多方满意的足以改善现存关系的办法。他希望我们阐明一个纲领,也就是要求我们特别阐明,我们是怎样设想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国家”的。以前也曾有人提过这一希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也是出自巴赫姆议员先生之口,在星期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议员布尔博士也在他面前表示过这种希望。最后,国务秘书冯·伯提歇尔博士先生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可是我曾经阐明我不能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因为我担心主席先生会指责我不遵守纪律,然而国务秘书先生表示,我的这一异议完全无效,他说,在帝国官员内部讨论预算

* 早在70年代,在社会民主党内,就有人开始对未来国家提出各种设想。约瑟夫·狄茨根阐明一种利用普鲁士军队的一般义务,但又同普鲁士兵营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福尔马尔在70年代末,提出了孤立的国家理论。在80年代,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人们考虑的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倍倍尔在他的著作《妇女和社会主义》中展示了未来国家的前景。这是他在帝国国会辩论未来国家时的演说。——编者注

① 卡尔·约瑟夫·艾米尔·巴赫姆(1858—1945)——德国法学家,属中央党,1889至1906年为帝国国会议员。——编者注

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大笑)

当然今天我不得不在这里谈许多问题,但是,在我进行人们所期望的分析,即那些先生们故意要求的,对详细纲领进行分析之前,我有义务驳斥在星期二我们讨论问题时,有人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提出的那些反对意见。

我曾经指控普鲁士铁路管理部门走得如此之远,甚至不再向铁路工作人员、列车员和售票员发放冬天御寒的毛皮服装和毛皮靴子。而那个国务秘书冯·伯提歇尔博士先生则反对这一指控,同时声明,这不是事实,只有在西部地区发生过这种情况,那里至今没有发放过,再说也没有必要发放这些东西。

先生们,我的那些材料都是从各家报纸几周以来相继刊登的报道和评论中引来的,它们特别尖锐地谴责铁路大臣采取这种手段。从这些报道中,我们还看出了某种动机,据我所知,普鲁士铁路大臣在预算中把一笔14万马克的款项列为工作人员节约的服装费。此外还有一个事实是,铁路管理部门把一部分由它掌管的大衣以赔本价格出售,而那些一向认为这些大衣必须用来御寒的工作人员又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把它们买回来。此外,这位大臣还进一步表示,在各铁路工厂不存在我所批评的那些事实,即为了节约把每半个月支付一次工资改成每月支付一次的方法;而是一如既往,工资还是每半个月支付一次,只是按月结算罢了。先生们,一个从最诚实的人中选出来的工人委员会,如威斯特伐里亚维滕的铁路工厂的工人委员会认为,在管理部门没有接受该委员会为工人的利益提出的保留半月支付一次工资的提案以后,有理由鉴于铁路大臣的这种措施罢免他的委任,这就证明,对这些措施,工人们想法完全不同于冯·伯提歇尔。可关键问题不在于半个月或一个月支付一次工资,关键在于,这样支付工资——准确地说是分期支付——能否使工人不吃贷款就能满足自己的生

活需要。如果不能，工人就有理由提出指控；而我在一段时间内，比如在今天，在国务大臣先生也无法否认，至少存在贫困状况的今天，当国家铁路管理部门要通过这些措施，损害工人利益，还要加剧普遍贫困同时节约大量津贴的时候，把这一切看成是管理部门采取的毫无根据的措施。这样的措施，在一个真正为工人利益特别操劳的政府里面无论如何是通不过的。

国务大臣先生还说我抱怨有这么多工人没有饭吃；说他不想争辩，在大城市和工业区有这种情况，但在农村情况并非如此，他还说，是我们反对采取那些有利于工人留在他们能找到工作的地方的措施。换句话说，他赞成限制迁徙自由，是为了阻止工人从农村流向城市和工业区，把他们死死捆在农业地区，以便按他的观点让他们去寻找目前在城市和工业区不可能找到的工作。国务大臣的这一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工人为什么要从农村流入工业区呢，那是因为农村的收入太低，生活太困难，以致不能负担（大部分人都非常简朴）必要的生活需要。而农业工人同每一个人一样，有权在他们认为能得到最好报酬的地方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使工人在实现自己的愿望时也许在某个地方上了当，同时他们寄予城市和工业区的希望落了空，那国家管理部门也没有义务去横加干涉，并且把这些人遣送回已经根本不是人能够生存的地方。（左边有人喊：很对！）把工人引向农村的建议仅仅证明，这些先生们没有看到，无论是工业发展还是农业发展，在最近几十年中已经发生了彻底的革命。在拥有大地产的农村，特别是东部地区，手工劳动正在日益为机器劳动所取代。尤其在冬季，几十年前还需要农业工人去干，并且可以安置大批劳动力，但由于使用了机器，目前几乎不需要人力了。特别是脱粒机、饲料粉碎机和农业耕作中一系列大大小小改良措施的应用，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今天，农场主在冬季只要雇佣少量工人就能应付，而大多数工人则无事可做。现在

的工资已经很低，甚至连卡尼茨伯爵^①先生最近也声明说，农业已无力支付较高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人为地限制迁徙自由，使农业工人从城市和工业区重新返回农村，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现在在农村支付的那点可怜的工资还将大大降低，工人的普遍状况还将变得比今天更加糟糕。——这就是国务大臣先生提出的解救贫困的良方，可是在我们看来却远不是这么回事。

接着，梅奈特先生提出了善意的观点：他认为，象我前不久在一次演说中谈到企业主先生时所表示的那样，假如把社会民主党人推上船并哄下去，那么，大家就会感觉很舒服。梅奈特博士先生和他的同党，甚至德国的统治阶级，在今天百般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比如1887—1888年的臭名昭著的反社会党人法中所规定的那样，的确会感到很舒服的，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但是，这样的措施哪怕依照你们的观点，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都是行不通的。如果你们果真企图实行这种措施，那你们就会看到，社会民主党不是靠这种小伎俩就能被消灭的。社会民主党仿佛是卡德穆斯的龙牙，在哪里播种，就在哪里长出新牙，它们就象米尔米东人一样成群结队地走出来。先生们，下面我还要向你们证明，我们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这是你们无法逆转的。没有你们的资产阶级社会，没有你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建立的这种高明的制度，社会民主党根本不可能存在。是你们的社会才为社会民主党提供了土壤。资产阶级社会越发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资本越是集中，那么，这片土壤对我们来说就越加肥沃，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也就越加深入各个阶级，从而使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也就越发壮大，社会民主党的实力和影响也会不断扩大，直到它最终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右边有人喊：嘘！嘘！）

^① 汉斯·威廉·亚历山大·卡尼茨(1841—1913)——保守党领袖之一，普鲁士议会议员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维护大地主利益。——编者注

梅奈特议员先生在谈到萨克森的储蓄存款时说，有存款的主要是工人。我在这里不想继续探讨他的这个论点。问题不在于储蓄者多数是萨克森的工人还是其他地方的工人，而在于统计后确定社会各阶层存款的数量；还在于确定各阶层的人均存款额。然而，这样的统计至今还没有搞过。如果进行这样的统计——我承认这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那么，将会得出一个同梅奈特议员先生及其朋友们期望得到的完全相反的结果。

现在，巴赫姆博士先生说，你们社会民主党人只知道批判，却提不出一个建议，你们到底有什么办法改变现存关系呢？先生们，我们在自己所有的演说中、在提出改革建议（不管是就某个法律草案提出的建议还是通过提出新的法律而提出的建议）时，过去和现在总是反复强调，我们提出的并希望你们在今天社会的土地上实施的一切建议都仅仅是镇痛剂；这些建议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帮助，但不能长期地彻底地解决问题。更何况彻底解决问题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对当今社会的实质进行改造，这样的要求我们是不会向你们——统治阶级的代表提出来的。你们的全部利益就是同国家和社会的现存状况融为一体，如果我们非要要求你们进行这样的改造，那按照你们的观点，无疑是要求你们在道德上和物质上自杀。统治阶级即使看到其整个阶级所依赖的现存状况已经摇摇欲坠，它也不会设法用自己的力量去埋葬和改造这种状况，这是世上从未发生过的事，而且只要世界存在，就不会发生。（社会民主党人喊：同意！）

在发展过程中，出自不满阶层中的、同现存状况相对立的因素正在产生，迄今为止，这些因素始终存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现存状况摇摇欲坠，这种认识日益加深，而且非常强烈，所以，有朝一日，持这种看法的人必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将通过所谓的合法途径或所谓的革命途径彻底改造这种状况，而且是为了大多数贫困者

的利益改造这种状况的。这一天定会到来。

先生们，我们究竟首先提出了哪些建设性的意见呢？我们不仅在这里，而且在失业者的集会上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如果帝国国会和国家当局，特别是村镇当局，一句话，民政当局落实了这些建议，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消除至少可以缓解广大群众当前的贫困状况。

我们特别建议开展公益劳动；我们曾经要求动用普鲁士铁路大臣目前掌握的、但并不需要的两亿贷款，以便尽一切力量建设新的铁路干线；同时我们还要求其他各州也这么办，比如巴伐利亚州的财政大臣大约也拥有4500万贷款。此外，我们还要求开设医院、学校和其他社会必需的公共设施，以及修建公路、开凿运河和改良土壤。在我们省目前还有大量土地几乎颗粒不收，我们可以运用当前的农艺学和农业化学的水平把这些土地改造成非常优美，非常富庶的园林。

不过国家管理部门对所有这些事情几乎毫无兴趣，认为干这些事要花很大的力气。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要干后面所列举的工作，我们的大土地占有者究竟有多少兴趣那是值得怀疑的。

此外，我们还要求大大缩短工时，也就是缩短至每天8小时，这样做有助于安置一大批工人，使贫困的工人不致流落街头。总而言之，我们提出了各种辅助措施，目的是尽可能安置无业工人。所以说在解决贫困状况方面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此外，在改革方面，自从我们在帝国国会占据多数席位以来，从我们方面讲已经尽力根据现存社会状况尽可能改善了工人的状况。从这个观点出发，15年来，只要国会为了改善工人状况提出一个新的法律草案，我们就不仅积极参加过辩论，而且还通过对草案提出建议，甚至通过提出全新的法律草案来说明我们的方针，比如我只提醒大家记住我们提出过内容丰富的劳工保护法草案。我们认为，按照

我们的方针，就是在当今社会制度的土地上，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也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特别要求通过法律来调整工时，首先要求缩短至每天10小时，继而要求缩短至9小时，最后要求缩短至8小时工作制；我们要求严格禁止一切工业企业部门实行夜班制，哪怕从技术角度看这也是可行的；我们进一步要求禁止或限制有害或有损妇女健康的劳动；同样要求禁止童工；严格禁止星期日劳动，明确规定不搞实物工资制，规定按周支付工资等等。此外我们还要求组织工人议会，以便也为工人阶级建立一个组织，使工人阶级在这个组织中不仅能够表示自己的一切愿望，而且能够依靠自己在工人议会中得到的权力，通过对本阶级状况的调查和统计来说明自己的一切愿望。（社会民主党人喊：同意！）

我们还要求取消生活资料税，因为我们认为，特别受其害的是工人。在提出事故保险、老年保险和残疾人保险法案时，我们从各方面提出了反对意见，假如按我们的意见采纳这些法案，那么无疑，通过这些法律而受益的人将会得到比现在更大更可观的好处。（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在讨论老年和残疾人保险时，我们特别要求让这种保险使那些年长或残废的人能够得到更好的生活，而且要吸收小企业和小农等级参加这种保险。

如果说所有这些提议和要求没有被通过，没有成为法律，那么，失败的原因只是由于你们的出尔反尔，而不是由于我们的态度。（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

我再说一遍，这些建议至今没有被采纳，我们在当今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有利于我们的改革付出了努力，然而并没有取得丝毫成效，关键在于你们这些执政党的代表们，对我们的建议投了反对票。还有，在讨论军事法草案时，我们提出了有助于将军费负担比日前更加公平地分配给单个公民承担的建议，另一方面还建议，通过我们提议建立的组织，大大缩减目前由德国军事部门承

担的沉重军费。此外，我们在一切场合都主张扩大和维护工人的权利，今后我们还将这么做。我们在所有方面确实是这么主张的，我们完全没有损害我们向来坚持的原则立场，面对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试图拥护工人阶级在这个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我们这么做的主要结果，是使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工人群众中拥有了象今天这么众多的拥护者。因此我们反对所谓的“青年派”至今要求我们做的一切；他们已经同我们的党分道扬镳了，两三年以来他们就徒劳地企图使我们偏离我们的轨道，他们说：一切议会活动都是无济于事的，你们必须改变态度，你们必须使群众作好革命和推翻现存制度的准备。我们一直反对青年派的这一企图，另外，我们也已经意识到，在当今社会的现有条件下我们能够要求又能够实现什么。所以我们的观点在工人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巴赫姆先生希望：有朝一日工人会来找我们算帐，他们将会认识到，我们没有信守向他们许下的诺言。我说这一希望要落空的。巴赫姆先生，如果您和您的朋友们有兴趣使国会解散，那我们第一个表示赞同，并且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将是独享其中好处的人。（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你们将会发现，你们尽管有欧根·李希特尔的小册子和他的节俭的阿格尼斯^①（大笑）你们让人在工人中免费散发了数千册，尽管你们为培养教师和鼓动家，在明兴格拉德巴赫创办了一所正式大学，可这全是模仿我们的样子！（社会民主党人大笑，表示赞成）——是的，巴赫姆议员先生，你们想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培养一些精干的鼓动家，以便在民众大会上、报刊上能同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家进行较量——我们对此一点也不恼火，我们很冷静。你们为了反对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或作出的任何新的努力，我们都表示欢迎；因为这是我们

① 指欧·李希特尔的抨击性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对未来的描写》中的人物。——编者注

日益强大的又一个证明。(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如果你们马上转过来论证你们的要废除驱逐耶稣教徒法令的提案——我们早已知道你们将这样论证：说耶稣教徒是一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力量——那你们将会看到，我们国会党团的所有同志将一致赞同废除驱逐耶稣教徒法令，因为我们不怕他们及其同伙。(有人喊叫)是的，让耶稣教徒来吧，我们确实不怕他们！（大声嘘嘘）

我想，我已经以此证明，我们一向从当今的社会制度基础出发，认为必须向你们提出，而且今后还将提出的辅助手段是什么性质。工人是理解这一点的，他们不仅理解，而且已经开始将我们要求的東西同你们实行的东西进行过比较，而这种比较的结果将越来越对你们不利。

接着，巴赫姆议员先生还说：“你们怎么能够建成你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呢？你们连一家社会主义的面包合作社都不会管理；请看，柏林这里的那个面包合作社整天吵吵嚷嚷！”巴赫姆博士先生，您说这番话的同时还说，您“非常用功地”研究过社会主义的著作，可是，您作为“一个可怜的傻瓜”还是“同以前一样聪明”。确实，巴赫姆博士先生，当我详细阅读了您的讲话以后，我仍然相信，您研究得非常少，根本没有理由在这里向我们扮演真正致力于实事求是的研究浮士德的角色。我认为，您本应当在糜菲斯特斐勒司面前扮演学生的角色，他根据糜菲斯特斐勒司怎样领悟什么的建议非常窘迫地回答说：

“我觉得神智昏眩，

好象水车在脑里旋转。”^①

(左边有人喊，太棒了！)因为您从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当成名言和精髓引证的那些东西，我什么也没有找到；如果您就是这样研究

^① 歌德：《浮士德》1983年上海版第99—100页。——编者注

(等于没有研究)社会主义著作,那么,巴赫姆博士先生,您本来在星期二就不该发表那个讲话。(左边有人喊:太棒了!)

因为您身为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人民代表,在大多数人的掌声中所作的论述竟是一些肤浅的刻板的东西,所以我不得不说,我绝不认为这是可能的。我怀疑,这样的论述是否能在世上任何一个国会博得热烈的掌声。德意志帝国国会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如此一无所知,我并不感到震惊。因此今天有必要向你们较为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给你们办一次讲座。(左边有人大笑)

巴赫姆议员先生,我正是从您的论述中看出,您对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和目的原来是一窍不通。

不过,既然巴赫姆博士先生已经谈到那个著名的面包合作社,即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合作社,那我不得不在此说几句。您似乎完全不知道今天没有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根本无法生存,我们认为,在某一个地方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完全是妄想。我们党以合作社名义建立的组织是根据所谓的舒尔采-德里奇的自助企图建设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非常正确!)

我们不论现在还是从前都说过:我们从来也没有而且永远不会因为党而支持这类合作社,我们在党的上届柏林代表大会上已经十分坦白地说过这个问题,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同意党员把钱和精力用来建立合作社,也不认为这类合作社能为自己和自己的阶级同胞带来很大好处。仅仅从下面的立场出发,我们才能同意建立生产合作社,即建立合作社既不是为了撰写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著作(因为本来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出版),也不是为了替受罚的工人重新恢复地位,给他们安排工作(他们本来就没有工作)。这是我们虽然没有支持但已经容忍这类合作社的唯一例外。

如果巴赫姆博士先生象他所说的那样，对社会主义的著作只是一知半解，那么，他首先至少必须读读拉萨尔的《公开答复》，那是在德国发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个倡议。他读了拉萨尔的《公开答复》就会发现，拉萨尔是以非常坚决的，至今还值得仿效的态度反对将所有这些合作社作为可怜的镇痛剂的，并警告大家不要建立这样的合作社。此外他（巴赫姆）还必将知道，拉萨尔之所以抨击当时的进步党，特别是抨击舒尔采-德里奇，是因为他们将这种镇痛剂吹捧为改善当时称之为工人等级社会状况的特别手段。（社会民主党人：非常正确！）

你们看，我们同这些玩意儿毫不相干，它们同我们毫无关系；我们从来没有将它们看作是改善工人阶级社会状况的手段，充其量也仅仅是个别同志的看法。但是，如果你们以为，从一个或许带来过弊端的生产合作社就能判断社会民主党人有无管理合作社的能力，那你们就大错而特错了。你们之所以认识那个合作社，是因为它遭到了公开批判，对这种事情进行公开讨论是很自然的，公开讨论在工人中，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中早已蔚然成风；此外，你们这么认为，是因为上述那个面包合作社的参加者中有很多是社会民主党人。你们提到的那个柏林合作社曾演出那一幕闹剧，遭到的那些指控，在德国我可以举出一打甚至更多的不同于它的合作社，它们的管理都相当出色，并且以它们的方式带来了众多的益处。

比如，我们在汉堡就有一个由党员同志建立的面包合作社，它同柏林的那个合作社相反，今天已是汉堡最大的商行；它至少有10辆马车每天早晨从商行出发，向全市和整个郊区运送面包和各种糕点。可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飘飘然，而大喊大叫什么，看呀，那里能办到的事情，可以向全社会推广，这样你们就有了改善工人阶级社会状况的重要手段。我们对此根本没有想过。而且，在

德国，除了这个管理良好的面包合作社外，还有雪茄烟工人合作社、鞋匠合作社、制帽工人合作社等等，其中有些合作社管理得非常出色，生意非常繁荣。

但是，这里不存在拥护或反对我们原则的问题；不是说那个管理不善的面包合作社反对我们，也不说许多管理良好繁荣昌盛的合作社就拥护我们，我们不需要它们。我们视它们为对伟大运动基本上无所谓组织，它们同伟大运动没有什么关系；就象我们对已经提到过的由社会民主党人管理和创办的消费合作社的态度一样，它们完全是中立的。它们对其成员带来的好处不足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合作社在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摆脱现存的工资制度方面，在使阶级国家作为国家巩固伟大的改造方面没有任何意义。

接着，巴赫姆议员博士先生还谈到我的朋友李卜克内西的工资问题。巴赫姆博士先生，把这样一个问题拿到帝国国会的讲台上，太过份了吧；我不得不说，我正式拒绝谈这个问题。（左边有人喊：言之有理！中央党：矛盾百出！）但是，这个问题既然已经提出来，那我就不得不谈谈它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的朋友李卜克内西的工资不是1万马克，而是7200马克，这是我们党的执行委员会批准的。他可以说整整一生始终不渝，没有离开过党，而且不得不为一家糊口的工资而工作。直到最后我们才有力量支付他一份可以说象样的工资，但是同柏林这里报社的第一流编辑的工资相比，我们认为他的工资还是低的。这里报社的所有一流编辑所得到的工资远远高于李卜克内西，如果你们愿意问问冯·哈默施泰因先生，他作为《十字报》的一流编辑（大笑）拿多少工资，那他就会回答：象李卜克内西拿那点儿微不足道的工资，我才不愿把劳动力卖给《十字报》呢；而他或许是对的。他是一家保守派资产阶级大报的编辑，他能领取

两三万马克，而不是7200马克，我不责怪他，但也不嫉妒他。（大笑）

但是，先生们，是谁把这件事公之于众的呢？不是我们的“青年派”，不是，而是资产阶级报刊。资产阶级报刊如此不诚实，以致使这份工资同我们大多数党员表示不满的收入情况根本不成比例，事实上，这里或那里的党组织曾经对那份我们深信不疑的工资产生过小小的不满，我是说，资产阶级报刊为了挑动和蛊惑人心反对社会民主党，极其可恶，极为卑劣地利用了那份高工资和我们党内因此而产生的不满情绪。（社会民主党人：说得对！）那些比我们领取更高工资的编辑们极尽攻击李卜克内西和讥笑他的工资之能事，并企图在我们党内进行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宣传。（右边和中央党大乱）先生们，你们当然可以动用这种小小的伎俩，因为你们无法用光明正大的手段反对我们。（嘘！——主席摇铃）

副主席巴赫姆博士插话：倍倍尔议员先生，我在此不得不打断您的话。我认为，您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即不能用光明正大的手段反对社会民主党这句话，不应当针对国会议员。

倍倍尔议员回答：主席先生，我承认，我可能措词失当，我说的那句话首先是指国会不加怀疑的敌对报刊。

接着，巴赫姆议员先生一个劲儿责怪我们没有权威。他向我们喊道：“你们当中究竟谁是权威？是倍倍尔吗？是李卜克内西吗？是辛格尔夫吗？谁也不是，你们当中没有权威！”

先生们，你们看，我们当中没有权威，这正是 一大优点。如果说有一个权威，那是他自己争取到的，是他通过自己的活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牺牲精神和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争取到的权威。其他权威是没有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人为的权威，被人搞成的权威。我们的党员同志如果认为有人能够完全代表他们的利益，就理所当然地应当把重要职位交给他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

才拥有某种权威地位。但是，你们从我们的历次党代会上已经看到，这种权威职位并没有多少决定性作用。无论是李卜克内西，还是我，还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如果他做了使这个或那个同志不愉快的事情，不是照样必须接受最普通的同志（如果我可以作这种区别的话）的指责吗？这种事情在其他任何一个政党里出现过吗？而我们，先生们，从不认为这是不体面的事情，相反，我们认为，一些同志广泛利用他们向我们提出不同意见的权利，提出同我们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自然的。

所以，我们反对人造的权威，反对人为地搞成的权威，而且是理直气壮地反对。我们反对一切权威，既反对天上的权威，也反对你们摆在我们面前，并迄今试图以此来牵着群众鼻子走的人的权威。这就是我们同你们的巨大矛盾。你们在我们这看到的是缺乏权威，假如你们再反过来说什么“社会民主党施暴政”，那这又是一个缺乏证据的论点。一会儿说缺乏权威，一会儿又说可恶的暴政，这是多大的矛盾！究竟是谁在施暴政？的确不是我们，我们要设法制止对任何同志施暴政，——我们已准备就绪！这是我和我们的同志必须遵循的明确的纲领原则和明确的组织决定。谁在一些人面前表示反对这些原则和决定，并试图做他无权做的事情，他就不会有好结果。最坚决反对暴政企图的是社会民主党。不论从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性质上看，还是从其内在本质上看，社会民主党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主政党，而且只要它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就必须是一个民主政党。我们反对所有旧的政党，因为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是真正民主的政党。

先生们，接着我来谈谈“未来国家”的问题。这是布尔博士先生、冯·伯提歇尔博士先生和巴赫姆先生同时提出的问题。当我听到冯·伯提歇尔先生以巴赫姆先生和布尔博士的口吻讲话时，起初我想：我多么不幸，竟然在这帮人中看到你。（大笑）。因为

在第27次会议上，当施拉德尔议员因我们对分期付款的态度而攻击我们党的时候，就是这位冯·伯提歇尔博士先生曾经为我们党辩护，驳斥了施拉德尔先生的指控和诋毁，当时曾博得我们热烈的掌声。（大笑）如上所说，我们为他鼓了掌，而且当时我对自己说：如果将来你们急需一位国务秘书而没有合适人选，那国务秘书冯·伯提歇尔博士倒可以用今天的讲话证明，他已经对社会民主党的思想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因此，可以考虑他作为这个职务的候选人。（左边有人喊：听啊！注意听！长时间大笑）

先生们，现在我当然不得不立即停止这样的赞扬，因为他在星期二确实不应当得到这样的赞扬。那天，冯·伯提歇尔博士先生采取的态度与他在1月27日采取的态度完全相反。他在星期二也说：你们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国家”究竟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巴赫姆先生也提过，说得不好听，我可以用我向巴赫姆先生提过的问题来回答。我向他提出的问题是，您死后打算如何复活和永远活下去？（大乱和叫喊）你们的教会不是自18世纪以来一直在宣扬这个问题吗？不是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证明吗？（大叫）您不可能证据确凿地回答我的问题。（大叫）当时我确实很焦急，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将如何证明这个问题。我等着你们证明的心情比你们等着我阐明“未来国家”的心情更焦急。（会场活跃）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巴赫姆先生同他说的相反，他没有读过社会民主党的任何著作，假如他读了，他就不会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国家”这个问题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想建立什么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国家”。（大骚动，大叫，嘘！）先生们，我知道你们听了要大喊大叫的。我再说一遍：你们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我承认，要是在10年、12年、15年前，你们倒是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当时，社会民主党在理论发展方面还远远没有达到今天的水平。我们不仅是一个你们所说的革命党，我

们还是一个争取前进的党，一个正在持久学习的党，一个被理解为精神上正在经历脱毛的党（大笑），它不认为，今天已经明确的原则，今天看来是正确的观点，明天仍然正确，永远不可怀疑。先生们，你们看，自从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诞生以来，自从拉萨尔露面以来已经30年过去了，我们经历了一系列精神上的脱毛过程。当时我们首先有了拉萨尔的纲领，拉萨尔的理论以及拉萨尔关于国家的观点；他的观点深受自费希特以来的德国哲学旧观点的影响，此外，你们还应当注意拉萨尔关于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和建立所谓国家工厂的建议；说得正确些，就是依靠国家贷款建立大的合作社的建议。这些要求近20年内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内容。但是，后来就被废除了，因为党内的进步思想早已超出了这些要求。我们的进步著作，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虽然从未赞同过拉萨尔的观点，但他的观点却统治着我们的党。今天我们还知道，拉萨尔在给洛贝尔图斯的众所周知的书信中说过，他本人并不认为，他的建议就是最后决定，相反，他说问题首先在于，提出一项看上去尽可能实际的建议作为宣传手段，以便今后继续前进，如果争取得到赞同这一建议的群众的话。当时他认为，群众思想上的理解能力还远远难以了解社会主义的要求，对此我有权提出异议。

我们党长期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直到它脱颖而出接受了进步思想，终于在两年前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新的纲领，这一纲领完全同迄今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观背道而驰。我提醒大家记住工人协会联合会（当时我是该联合会的领导）1864年的纽伦堡纲领、社会民主工党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1875年的哥达纲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我们党的发展的一斑。当然，哥达纲领作为两派，即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合并纲领，基本上还是1869年纲领的内容。上面已经指出，到了1891年，我们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全新的纲领，以那时起，这个纲领就为全党确立了科学著作和

我们党的进步人士长期以来在理论上提出的准则。

所以说有关党的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著作是有的，而巴赫姆议员先生不了解这些著作，我又要谈这个问题了，可他说他了解社会主义著作。如果他只读过我手中的这本小册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里的《前进报》出版社出版的第4版，可它早在12年前就已问世了），那么，他在第40页上就会看到，恩格斯在长篇辩论中反对在这部著作初版时还普遍存在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民国家观”，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的最后发展中更多的不是谈国家问题，而是谈国家的消亡问题，然后建立起管理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管理组织。所以说，要建立的是一种与今天的国家没有丝毫关系的组织。

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部分所作的出色论述（我在这里只是提一下）外，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恩格斯的优秀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及其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该书在1877年出了第一版，此后又多次再版，传播甚广；其次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一部在科学界公认为十分出色的、具有启发性又相当吸引人的著作；还有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最后还有我本人依据朋友恩格斯的分析在我的《妇女》一书中所作的论述。所有这些论述都指出，在解决社会问题时，从社会主义的含义出发，最后所涉及到的问题不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国家”，而是涉及到别的事情，即涉及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问题。

巴赫姆议员先生问道：你们的未来规划究竟在哪里？是否就是欧根·李希特尔先生设想的规划？不，他自己可能会知道，那是一本为了反对社会民主党而写的诽谤性的小册子，写得就象欧根·李希特尔先生能做到的那么糟糕。（大笑）先生们，我坦率地告诉你们，我听了，也读了他关于军事法案的演说和关于预算的演说，还有他的ABC一书，受益不浅，甚至比他那些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小

册子更有味道，我乐于请教论敌，只要他拿出些可学的东西。（大笑）这本小册子倒是“节俭的阿格尼斯”的典型印象，我们为它在消遣报上找到了用场，几年来，我们的消遣报就是靠它维持生命的，它还常常是我们私人谈话的取笑话题。（大笑）但是，先生们，如果让我在这里对这本小册子进行分析和反驳，那实在是多此一举，我虽然没有这么做，但别人已经做过多次，我仅向你们举个例子。这个例子能够说明，由你们，即由你们的朋友在全国各地散发数千册的这本小册子到底有多大的宣传价值，你们将会看到，你们这样做又到底有多大价值。我深信，这本小册子没有使任何人，至少没有使工人疏远社会民主党。说得更确切些，我是说，你们这样做不会妨碍任何一个工人靠近社会民主党。去年秋天，我在哈弗尔河畔勃兰登堡召开了一次民众大会。会后当我离开会场时，一个年轻的工人向我走来并请求我听他说几分钟话。他告诉我，他在一家有300多名工人的工厂里工作，我要作报告的海报一登出来，就有人立即给厂主送去三四百册我们的同事李希特尔的出色的小册子，叫他在工厂免费分发，当然要免费分发，因为没有一个人买它，工人要买的是比李希特尔的著作更合理的东西。（大笑）这个年轻的工人接着说，他也读了那本小册子，但他从来不注意什么社会民主党，他心想社会民主党不可能干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今天他参加了这次大会，听了我的报告，他发现，他心里想的完全得到了证实，从现在起他就是社会民主党人了。你们看，先生们，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它可以证明散发这类著作对社会民主党起到了什么作用。

如果说你们不愿要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国家，那么，你们究竟要什么样的国家呢？这里，我有必要就国家这个概念谈几句，谈谈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我们是怎样看待国家的。先生们，关于国家的性质，已经争论了几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自从柏拉图和亚里

士多德以来,我们的哲学家都在努力给国家概念下一个明确的符合各方要求的定义,从而阐明国家的性质。但是,在主要问题上毫无结果,迄今对许多其他概念也没有得出结论。所有研究国家概念定义的人在国家概念和性质的问题上,提出了相互对立的观点和范畴。只是到了人们从整个社会的和经济的发展过程对社会进行历史地研究时,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国家,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是什么,它又从何处获得了权力。先生们,在各个历史时期,在世上所有地方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了私有制,就在同样的历史时期,产生了国家。按照氏族组织起来的最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私有制的形成而得以发展,在这种时刻有一个暴力机关,即国家,是必要的。只要有了共产主义的所有制,国家和国家政权就失去了必要和可能;国家政权、国家组织存在于社会上出现利益冲突时期,在这个时期,为了你的和我的开始了争执和斗争,于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开始消亡或正在消亡;在这个时期,有产者同无产者相互对立,社会的一部分人将氏族的、部族的财产全部或者部分据为己有,并利用因此而得到的力量日益广泛地巩固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一旦在原始社会存在这种利益冲突,那么,能够实施暴力干预的组织也就成为必要,这些组织以强制的权威而问世,同时,在一般情况下,是由现存的始终为统治者服务的教会以天赋的权威身份行使职责,无产者和被歧视者不敢侵犯这一权威,不敢摧毁甚至推翻它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私有制的形成和发展越来越多样化,手工业以及农业和畜牧业越来越发展,尤其是商业的作用开始越来越突出,于是,国家组织及其多样化的关系也随之变得五花八门。但是,国家的任务在各方面都考虑统治阶级的要求,随着社会现象的复杂化,国家本身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先生们,看到了吧,根据我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现存的社会内部,固定的生产机构如何存在,社会如何调节它的交换关系,

国家政权和国家形式也就如何变化和改造。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几千年的社会，已经从古代国家、封建国家和专制国家发展成资产阶级社会，因此，国家管理及其越来越剧烈，越来越绝望的社会关系自然也要实行彻底的改造。还有，先生们，在近代，世界上的所有文明国家，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先进国家英国，都希望逐渐打破大小封建领主的统治，由大的中央国家和民族国家代替这种小块的封建割据。这是符合经济发展的。也就是说，后者对我们的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负有义务，资产阶级必然需要大的民族国家，一方面是为了拥有尽可能大的可靠的销售市场来销售他们的商品，另一方面是为了拥有保护力量，使资产阶级能够在世界市场上露面，向各方面销售产品。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性质的发展梗概，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认为，一个国家政权无非就是某一个国家中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的体现。因此，我几年前在这个地方（我记得是在一次关于预算的演说中）引用了下面一句名言：究竟谁是联邦议会和政府的主人？实际上你们是统治阶级利益的管理委员会，当时，就是这个冯·伯提歇尔先生，作为统治阶级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他完全了解和珍重自己的地位，并向我喊道：非常正确！而现在，先生们，情况就是如此，国家政权无非是统治阶级社会利益的代表，它必须关注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受侵犯，它制定一种固定的法的体系，试图通过这种体系尽可能稳固而可靠地维持从经济关系中产生的法的秩序，这样一来，问题就清楚了，假如有一天能消灭阶级对立，那么，国家政权也就不复存在，因为它已经无事可干。（嘘！）先生们，有人向我发出嘘声！我不打算用我的纯格言式的论述来完全说服你们；只想向对我发出嘘声的先生指出，我，作为社会主义者也不是一夜之间就明白国家有一天可能会消亡的。国家可能怎么消亡？这是我们迄今认识的最高点。国家，即使按照拉萨尔的观点，也是代表大众的保卫、

权利、平等的组织！我们看到，国家根本没有这么做，相反，它拒绝承认人人平等。我们甚至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人人平等的普选权也仅仅产生于外部关系的压力下；如果能够废除它，今天我们也许感到高兴。（右边有人喊：对呀！）你们喊对呀！我知道你们会这么喊；我还向你们承认：普选权就是不分等级，不分财产多寡，不分宗教信仰和出身贵贱，民主地承认所有公民的平等，所以，它同现在不平等的财产关系是直接对立的。一个以阶级对立为基础，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必须全力维持这种阶级对立，否则势必走向灭亡，这样的社会赞成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会出于好意，因为果真如此就会导致它自身的崩溃和灭亡。（右边有人喊：言之有理！）普选权要力争国家、国家政权的民主化，力争社会关系的改造。（右边有人喊：言之有理！）我非常坦率，甚至冒着危险告诉你们，将来有一天你们想提议废除普选权，可以利用我的论述，以便从中得利。你们尽管这么做好了，不过我们知道，我们将呆在何处，最后去到何处，你们想怎么干，随你们的便！

诸位先生，现在你们会问，你们对今后的发展究竟是怎么想的？先生们，你们究竟是怎样建立今天的国家的？你们无论如何会承认，今天的国家同一百年前的国家不一样。一百年或几十年前你们的先驱们曾描绘过这个新型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是，这又怎能符合今天的状况呢？让我们看一看，在法国大革命前，关于把封建国家改造成立宪国家，即改造成资产阶级国家的必要性的所有著作，那里，对必要论述的一切均作了阐述，我们只要将那些论述同现实作一番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差别。今天，我们不再进行这样的描述，因为我们对发展规律的认识恰好同你们的先驱相反，通过这一发展规律，我们的社会制度不断发展，日臻完善，直到这一发展规律最后消亡。正如你们自己的先驱们在国家的性质问题上空想主义者，并作出了同后来出现的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的

描述一样,有些身为社会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先驱,他们也作了类似的描述。我不再谈柏拉图;让我们先来看看16世纪生活在当时资产阶级发达的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看看康帕内拉,看看上个世纪的摩莱里,最后我们再看看本世纪尤其在英国和法国起过作用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看看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是的,先生们,这些人都勾画了漂亮、美好的国家和社会图景,都作了深刻细致的描述,其中不作安排,不作出规定之处几乎没有。我看得出来,你们听说过或者读过一些这类关于国家和社会的描述,所以你们认为,我们也象当时这些伟大的空想家们一样,要去详细地勾画这种社会,说我们肯定也要这么干。不,先生们,我们才不下这种事呢。(会场活跃)我们同那些人的区别恰恰在于:他们是空想主义者,而我们是实践家,他们那些人所处的时代还不太发达,他们只认为,有必要向统治阶级阐明,现存社会制度是不公平的,不诚实的,骗人的,腐朽的,并且认为,只需根据现有事实证明,建立一种新制度是必要的,而要影响人们建立这种新制度,只要对这种新制度详加阐明即可。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傅立叶。他是当时在世的人中最有才智者之一,在20年当中,他每天中午12点都守在家里,准备迎接会给他带来100万法郎的人,准备用这笔钱来建设他的法伦斯泰尔;这一点他坚信不疑。他找了欧洲所有的君主,试图说服他们相信他新设计的社会制度是正确的。可是,当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他这个反犹太主义者(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竟然去找到冯·路特希尔德先生,鼓励他根据他的社会主义法伦斯泰尔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新王国。圣西门、欧文、卡贝等人也都这么干过,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这么干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而是同那些人及其学生(他们有许多学生,主要来自上、中等阶级,特别是来自著作家阶层)对着干?为什么我们不象那些人所干的那样,着手在美国,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些

小集团和社会主义的殖民区并证明：你们看，伟大的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可以改造的吗？因为我们认为，这是荒谬的，你们不了解资产阶级社会。并不是因为一些人相信资产阶级社会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它才存在，而是因为社会的经济发展使我们目前拥有的劳动制度和社会制度成了必要，资产阶级社会才存在。同样，资产阶级社会在目前的基础上还要继续发展，达到高度完善，从而为建立其他的新社会奠定基础。当然，我承认，资产阶级社会是迄今存在的社会中最好了的，但是，它不是最后的社会，在它的身后还将诞生新的社会。（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

资产阶级社会并不是象你们和你们的追随者津津乐道地在国会向愚人们渲染的那样是自古就有的。你们愿意说，它是自古就有的，正因为它自古就有，所以它将永存。不，它不是自古就有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比较新的产物；它所采取的形式，在德国，是本世纪才产生的，在法国，是上个世纪产生的，在英国，是在17世纪由奥利弗·克伦威尔^①领导的大革命以后产生的。那时新的条件和新的状况已经以法律和国家的形式被固定下来，这种新的状况使资产阶级社会达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高度。

此外，我们之所以把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不合理的社会来反对，是因为它目前的状况，更确切地说，我们反对的是它的弊病，同时指出，必须有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我们承认，资产阶级社会同以前的社会相比是最好的社会。它不同于以前任何一个社会，它对人的各个生活领域进行了革命改造。请你们听听我的朋友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8年初出版的著名《宣言》中是如何论述资产阶级社会的！

^①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编者注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未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惰作为它的相应的补充的。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①

先生们，这是对资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所能给予的最大赞誉。（大叫）是的，资产阶级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阶级，它给人的活动和人的知识诸方面带来了巨大的革命的发展。而资产阶级越是象以前各个社会阶段中的其他领导阶级那样继续发展，它就越是在给自己准备了埋葬自己的人，越是在生产自己的掘墓人。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8—469页。——编者注

(嘘！嘘！)资产阶级社会在封建社会以后才可能产生，而社会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社会以后才可能产生。我们是你们的继承人。
(嘘！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

但是，假如果真如此，我希望你们也能理解，我们不能，也不想人为地加速整个的发展过程。资产阶级社会如何进一步发展，并不取决于我们；我们不能为你们规定，你们统治阶级该怎么干，从而使我们掌握权利和赢得胜利。先生们，资本越集中，大生产越扩大，资本主义社会越成为当今整个社会的典范，中等阶层的贫困化越漫延和群众的无产阶级化越普遍，阶级对立也就越尖锐，群众就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头脑中也越来越产生新思想和新观念。一百年前所以没有社会民主党，就是因为那时不具备社会民主党生存的条件，那时没有社会民主党唯一能够诞生的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可以说，社会民主党就是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天然产物。

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为简单，极为普遍而又自然的结论，以致我不认为还有人会对提出反对意见。

如果说这是实情，那么，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向群众阐明资产阶级社会的实质和本性，使他们懂得，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受苦挨饿，尽管他们从早到晚干活，还要遭受社会的无情剥削，他们是创造价值的人，但却不能享受价值，而有些人则借助社会组织把生产资料和劳动资料当作资本掌握在自己手中，摆出一付社会的主人和救世主的架式装腔作势，压迫工人阶级。是的，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群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受苦难并对此有了认识，那是因为有了出色的文化设施，在这方面又该无可争议地赞扬资产阶级社会了，是它创建了许多文化设施和教育设施，而在它之前，任何一个社会都没有办到，工人阶级越能充分利用这些设施(尽管还十分可怜)，群众就对现存社会的状况看得越清楚，对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改造这个社会的必要性也就理解得越透彻。——你们看，

先生们，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在搞什么空想主义的琐碎描绘，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如何一定会到来。它自然会到来。

爱尔福特纲领和决议一发表，就有人要求我们对我们的未来国家作一番描绘。现在请你们听听德尔布吕克教授是怎么看待这种要求的。他在1891年11月的《普鲁士年鉴》第5期上的一篇关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通讯中写道：

“那些以为只要揭露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的荒谬，就能置社会民主党于死地的人”，——就是说他认为我们的纲领是荒谬的，我们当然不这么认为——“是完全错误的。那些首先考虑要重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人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纲领？无非就是为自由战争以后和20年代的冷静理智的人证实，建立德意志的游戏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德国的狂热分子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一条通往德意志帝国的可行途径。有人出版了耶拿的已故历史学家施米特的一部长篇遗著，冯·施泰因男爵曾经根据这部著作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设想，并为一些根本行不通的事情作出了努力。”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政党和国务活动家只有在实际上得以兑现之际才需要切实可行的纲领。”

你们看，德尔布吕克先生研究过爱尔福特纲领，是一位研究过社会历史发展的人，他还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他告诉你们，要求我们今天就详细说明我们的具体措施是愚蠢的行为；因为我们几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取得政权。只有在社会民主党从实际出发可以提出自己的任务，并产生要干什么问题之际，我们才能详细阐明我们的具体措施！假如我们同你们辩论我们如何设想未来社会，我再说一遍我们如何设想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过渡的具体细节，那么，这会意味着什么呢？先生们，现在我想向你们提一个问题，今天你们政权在握，你们是否能知道你们在未来5

年中要做什么？你们知道吗？不，你们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你们说：我们不知道到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到时候有些情况可能会使我们今天制定的美好计划全部成为泡影；我们必须估计到情况的变化，然后酌情开展行动！——你们的做法不是同我们完全一样！

我们有自己的纲领；这个纲领概括了我们设想的一般原则；没有这些原则就无法行动。这个纲领在阐明了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看法以后说道：

“生产资料的私有，在以前是生产者确保对自己的生产产品的所有的手段，现在却变为剥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而将劳动者的产品归于不劳动者——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所有的手段。只有将生产资料——土地、矿坑、矿山、原料、工具、机器、交通手段——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成为社会的所有制，并将商品生产转变成为社会和社会经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才能使大经营和社会劳动的不断增大的收益性对至今被剥削的阶级来说，由过去穷困和压迫的源泉变为最高福利和全面和谐的完美性的源泉。这个社会的转变”——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就已经要求对整个劳动资料的剥夺，而我们在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的时候就要实行对整个劳动资料的剥夺——“不只是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且意味着为今日的状况所苦的全人类的解放。但这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因为其他各阶级尽管相互间有着利益冲突，却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并以维持现存社会的基础为共同的目标。”^①

先生们，我们还对自己说：即使这是一些极为一般的措施，你们要达到也并非朝夕之事，你们不知道这个时刻何时到来，的确你

^① 《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1985年版第274—275页。——编者注

们一点也不知道何时取得政权，哪怕是部分地，局部地取得政权，不知道是否能至少部分地实行你们的纲领。归根到底，我们要走的也许有10条，20条，30条不同的道路，在我们达到目的之前，也许要经历许许多多阶段。但是我认为有一点是肯定的：最容易的就是，如果社会民主党夺取了国家政权，就要对大企业，如施杜姆^①先生、克虏伯先生等的大企业实行剥夺，并将它们转变为社会所有。（会场活跃）

先生们，你们看，股东们掌握的大企业越多，也就是非工人掌握的大企业越多，就越容易剥夺，因此，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也赞成由国家剥夺；我们不反对国家接管比如铁路等等，也不反对它接管矿山，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这些国有企业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甚至可以让冯·伯提歇尔先生当上掌管内务的国务秘书。我们用不着剥夺这些国有企业，因为那里没有所有者，因为我们就是国家，人民就是国家。我们看到大企业转移到股份公司手里的越多，人们也就越能更好地向人民指明，不劳动者只须剪剪息票，就可获得大量利润，我们就更容易剥夺所有这些大企业，并把它们转变为社会所有。这将是易如反掌的事。（会场活跃）

所以说，资产阶级社会越是朝这个方向发展，小资产消失得越多，将来有一天就更容易剥夺。至于你们的技术员、工程师和企业管理人员，我们会很好地使用，到了那美好的一天，他们会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在社会民主党的“国家”里能够发挥自己的才智，并且变成了自由的人。我们只要能走到这一步，那么，怎样着手我们的事业，的确不会一筹莫展。

在此我还要说明一点：要达到这一点，要实现这最后一步，要

^① 卡尔·施杜姆(1836—1901)——德国大工业家，保守党人，工人运动的敌人。——编者注

组织社会生产,就必须夺取政权。我们也一定要掌握一系列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使公民能够相应地行使他们应有的权利。所以我们要求:“不分性别,皆有用秘密投票的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这对你们来说是一种真正可怕的事——(会场活跃)“……以创议权和否决权为手段的人民直接立法;普遍的军事教育;废除一切限制和压迫自由发表意见和集会结社的权力的法律;废除公法关系上和私法关系上一切对男女实行差别待遇的法律;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学校的世俗性;免费的司法免费的律师。”^①

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实际要求。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国家”的一斑。在此我问问您,巴赫姆先生,您赞成这些要求吗?不,您不赞同任何一条要求!那么我们应该同您讨论吗?这有目的吗?毫无目的!我们要走出去向群众宣讲,他们理解这些。

我可能还要向你们提出一系列其他的要求,这些要求涉及到今后可能出现的国家组织。这一国家组织的最后行动预计包括剥夺私有财产、废除或清算公债、取消抵押等等的伟大措施。到了这美好的一天,席勒下面那句话将成为现实:

“让我们的帐簿全部烧光,
和全世界的人进行和谐!”^②(会场十分活跃)

是的,先生们,社会民主党如果取得政权,就要采取这些措施,而资产阶级社会,特别是大上地占有者负债累累,所以,在那美好的一天,我们一旦剥夺了他们,他们或许会感到高兴。(大笑)有朝一日我们可能还要把右派的先生们看作行善者,(大笑)而他们今天却把我们看成最厉害的敌人。

先生们,还有,我们如果拥有并有组织地利用了高标准的教育

① 《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1985年版第276页。——编者注

② 《德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页。——编者注

手段和文化手段，那么，我们就将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广大群众的普遍的文化水平提高到我们今天预想不到的高度；而你们，这种普遍教育的坚决反对者将会看到，人民利用这种适度的文化在改善和提高群众的物质生活方面也能做些事情。（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

此外，先生们，资产阶级社会还有一个伟大的优点，由于技术、机器制造业的发展，由于自然科学在生产过程、交通运输业等方面的运用，使社会只要愿意，就能大量而完美地生产商品，即消费品，使人人都能极富裕地生活。（右边的人和中央党大笑）今天我们有什么？有所谓的生产过剩。“生产过剩”！这是一个荒谬的词！我们有生产过剩，因为所有土地和仓库都堆满了商品。到处堆满了无人得到的商品，我们从另一个方面看到，无数的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受苦挨饿，他们想工作，却不能工作，因为商品占有者生产新的商品无利可图。这不是一种该死的、疯狂的社会制度吗？

一方面生产大量商品，造成积压，另一方面，千百万人在渴望工作，又不能工作，只能忍受极端贫困，而得不到一点点这些积压的商品。请你们想出一种试图使生产和消费相协调，使每个人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得到一份社会工作的社会制度吧！接下去你们看一看，先生们，从前任何一个社会，好，你们可以以技术进步为例，看一看在农业、园艺、畜牧业各部门，在交通运输业、在工业品和工艺品的生产中，从前任何一个社会都没有创造出什么了不起的、社会可以借助其充分满足大家需要的技术辅助手段。可是保守的洛贝尔图斯早在40多年前就说过：我们能在各个领域大量生产各种满足人的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时代将会到来。

右派的先生们，你们完全可以向你们的洛贝尔图斯学习很多东西。他说出了你们今天不承认的许多东西；他还强调了阿道夫·瓦格纳在他重新编写的劳^①的《国民经济学教程》中提出的废

除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左边有人喊：注意听！)那边的先生们(指右边)多数人反对这一点，而保守派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和阿道夫·瓦格纳却早已承认了这一点。我们还看到土地改革派也赞同完全相同的观点，尽管他们实现的方式不同。现在，我们一旦开始剥夺土地，自然也要剥夺工人和一切与此有关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这是紧接着第一步的第二步。

谈论将来要建立的组织的问题，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我们不清楚将来的条件如何。这种组织将以什么形式出现，这要取决于建立这一新组织的条件。我坚信，最适合建立这种组织的条件一定会成熟的。这时请你们不要来打扰我们，请你们不要过问我们的事！（会场活跃）

先生们，你们看，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在物质发展和精神发展中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且在今后的物质和精神发展进程中还将取得进步，所以也就产生了在繁荣和危机交替时期日益频繁出现的矛盾现象。但是，群众却因此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苦难，他们因此就越来越积极地要求按照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彻底实行社会改革，进行社会改造。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你们资本家变不变成资本主义的代表，问题的关键也根本不在于你们改变与否。你们成不了气候。（会场活跃）你们那几个人不代表社会；到你们公开投奔社会民主党的阵营时，你们在全国各地的资本主义选民就会敲起警钟，要求取消你们的候选人资格，因为你们背叛了神圣的资本的利益。（会场活跃）你们是否属于我们中的一员，对事物的发展是无关紧要的，然而我们欢迎每一个从你们队伍中来投奔我们的人。（会场活跃）

最近10年的发展显示了什么？显示出整个国民经济科学越

① 卡尔·亨利希·劳(1792—1870)——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编者注

来越转向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甚至连教皇的官方刊物(我现在忘了这个刊物的名字,我很遗憾,我忘了把笔记带来,我将把笔记单独交给巴赫姆先生,如果他对我的说法有怀疑的话)也在几周以前公开说明:“不能再怀疑了,社会主义将是未来的社会制度,国家和社会好歹必须容忍社会主义。”这是教皇的官方刊物说的话,既然这样的官方刊物都说出了这种观点,那我们确实没有任何理由要为未来担忧。相反,我们可以信心百倍地迎向未来。我们在经济上日益受挫,遭受一个危机接一个危机,而且危机期越来越长,繁荣期越来越短,因此贫困状况使越来越大的社会地区趋向没落,中等阶层的反抗能力日益下降,日益变成无产阶级,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社会民主党不仅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欢迎,而且正在日益受到知识界的欢迎。不过,这倒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生产过剩。资产阶级已不再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在物质生产和中介部门当厂主或商人,而是把他们安排在公务部门、高等院校、司法部门、医疗卫生部门和管理部门等,于是所有地方人员严重过剩。社会已无法再安置自己的知识界人士了!这证明社会活动的矛盾,同样也证明进行改造的必要。生产力远远超出了社会的需要,因此,社会将要和不得不毁于自身的内部矛盾之中。假如这个社会接下去将导致你们几十年来推行的出色的外交政策迟早给我们带来一场欧洲战争;假如因为千百万人经济力量极端薄弱而使我们面临一场新的从未经历过的危机;假如因为接连不断的严重破产,使成千上万有财产的人一无所有;假如大企业因不能开工而倒闭;假如生活资料因供应紧张而大幅度涨价,最后,假如在战场上,发生使整个欧洲都将为之震惊的大屠杀,那么,先生们,你们的整个社会就会一下子毁于你们所获取的那些东西上面。(嘘!)到时候你们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要干什么?不过,你们更要好好考虑,该发生的事总得发生,你们是改变不了的。

资产阶级社会就是这样从过剩中创造出了贫困和匮乏，这是它的内部矛盾。这句话说明了一切。但是，一种新的组织会使过剩有利于群众，所以，海涅早在50多年前说过的名言将得以实现：

“为了世上的众生，
大地上有足够的面包，
玫瑰、常春藤、美和欢乐，
甜豌豆也不缺少。

人人都能得到甜豌豆，
只要豆荚一爆裂！
天堂，我们把它交给
那些天使和麻雀。”^①（右边和中间的人骚乱）

先生们，这就是我们的纲领，未来属于我们，而且仅仅属于我们。不管你们对我的分析满意与否，我们将继续向前，下次选举以后，你们将在这个大厅里看到，我们将得到比今天在这里得到的更多的席位。（社会民主党人热烈鼓掌。右边有人喝倒采）

（二）

（1893年2月6日）

先生们，在上星期六，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洛伊施纳议员先生得到了发言的机会，他当即声明，他不发言了，因为在他看来，在这次为期3天的辩论中，社会民主党在道义上已被消灭，所以他也就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右边有人喊：非常正确！）在他之后，我立即发言，并提议延期举行会议，以便让我们也得到一次机会，用充

^①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9页。——编者注

分的理由来回答我们所听到的各种攻击,这一点或许已经向各位证明,我们没有“被消灭”,我们不想放弃斗争。在今天以及在今后的辩论中,你们将会有不少机会相信这一点。我们愿意并准备随时同你们进行斗争,至于在这场斗争中,谁将最终在道义上取胜,——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将心平气和地让公众舆论,让那个在这场争论中起重要作用的阶级,即德国工人阶级裁决。德国工人阶级最后对此将说些什么,它从这场争论中将得出什么结论,对我们来说是决定性的。你们没有任何理由在德国工人阶级面前就这场争论的结果津津乐道。不久的将来就会证明这一点。如果你们准备同我们辩论,那么,不论就“未来国家”的问题,还是就其他问题,我们都乐意奉陪,而且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还要利用各种机会向你们证明,我们将严阵以待,坚定不移,并迫使你们奉陪到底。(社会民主党人喊:很好!)

上面是我简短的开场白,下面我来回答几位发言人对我的论述,以及对我的同志弗罗梅提出的反对意见。当然,我不指望能在此逐一答复几位发言人,特别是巴赫姆先生和李希特尔先生谈及的各种琐事。

先生们,这两位先生的发言之所以在主要问题上谈得那么出色,就是因为他们在这里论述了鸡毛蒜皮的琐事,(有人抗议)他们以为根据这些琐事就能证明,我们的努力必然破产。不过,这两位先生的发言在其他方面也不逊色,比如对他们视为法宝的策略的论述。二位也许没有带着现有的证明材料和现有的与我们论述的实事求是的引文有关的意见来参加会议,而是遵循着这样一种策略:首先讲讲我们党的著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不过,那是按照二位对手的思路想象的社会,然后对他们自己设计的“未来国家”提出反对意见。(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是的,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策略,法学家们尤其乐意采用这一策略。他

们一旦陷入困境，不知所措，就给对手加上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和论点，然后他们再把自己提出的论断作为对方的论点来加以批驳，以证明对手的论述简直不值一驳。（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

现在我深信，在国会外面客观上关心这次辩论的人比国会里边的人更加懂得尊重最后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我们早已料到，我也早已声明，可我们无法使你们相信它。如果我们在这里辩论的不是4天，而是4周、4个月，甚至4年（我们准备这么做！），那么，一直到4周、4个月或4年以后，我们还是站在目前站立的这个地方。（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统治阶级的代表和某些党派的代表最关心的是，利用他们掌握的一切权力维护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维护这一制度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而你们就是这样的代表。如果有谁想使你们有朝一日会赞同我们的信念，那简直是愚蠢透顶。假如你们以为我们有此念头，那我们就要提出严正抗议。我在星期五就已经对你们说过，只要这个世界存在一天，统治阶级就绝对不会认识到，也绝对不会承认，他们代表的社会制度对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来说已经变得极为糟糕，极为腐化，一无用处，而必须有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来取而代之。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统治阶级这么认识，这么承认过。今天对你们——资产阶级的代表提出这一要求，我再说一遍，是再愚蠢不过的事情了。（社会民主党人鼓掌。）

代表不同党派的各位先生，你们在碰到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个别问题时就分崩离析，你们向来如此，但是，只要一涉及到我们，一涉及到社会民主党和我们未来的目标，你们就结成一条严密的阵线，结成反动的一帮。接着你们大家就一致对付我们。你们之间的区区差别，你们之间的小小磨擦随后就烟消云散。各阶级分成两大阵营，彼此各得其所，最后，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无论如何是你死我活的。（大叫。）

先生们，施杜姆议员先生在论述中说，社会民主党所追求的是未来国家，但你们的思维能力不允许你们在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之间作出区分。尽管我早已明确反对追求所谓的未来国家，但这些先生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谈到未来国家。（会场活跃）我很遗憾，你们的思维能力太狭窄，只要你们的思维能力再开阔一点，你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如果你们愿意再花一点力气认真地读一读我上星期五向各位发表的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区别，关于国家概念的演说（会场活跃），同时你们再看一下我为你们的报告提到的文献，那么，你们就会明白，并不象你们想象的那样，国家和社会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在今后的辩论中，我还要论及这个问题。

施杜姆议员先生说，未来国家一方面是监狱，另一方面正如他津津乐道的，是兔子窝。先生们，这与巴赫姆议员先生所说的话正好相矛盾。巴赫姆先生是这么说的，一方面我们没有权威，没有能够对抗危险企图和欲望的权威力量；另一方面又说存在着社会民主党的暴政。这种说法显然同冯·施杜姆议员的论述是矛盾的。冯·施杜姆先生似乎不知道在监狱里是怎样度日的。但是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在监狱里，自然的性欲不可能得到满足，而他的“未来国家”的前提就是满足性欲。“未来国家”也不设监狱，只有今天的国家才有监狱。比如，在施杜姆兄弟公司的工业企业中实行的工厂制度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左边反映热烈，右边提出异议）当然，根据新制定的工商业法，冯·施杜姆先生不得不修改他的工厂制度，尽管这使他十分恼火；但是，他在这里仍然明确声明，他将不受法律的约束，并寻找办法和途径，使他的工人遵守他并非依据新工商业法在自己的工厂制度中列入的各项规定。（社会民主党人喊：听呀！听呀！）因此，我可以预料，冯·施杜姆先生今后也是坚持未经他同意，工人不得结婚的有关规定，因为他早就确

信，必须监视工人的结婚倾向，从而在某种意义上监视和掌握本地区的儿童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而这就是一条监狱里的规定。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社会最大成就之一，你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任何偏见，既不对人也不对事，我说过，我把这一点看作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大进步；资产阶级社会特别是从1867年德国政治上重新改组以来，首先在北德意志联邦，尔后在德意志帝国，开始把这一点视为它的首要的措施，并着手清除在婚姻问题上存在的一切障碍。资产阶级社会之所以这么做，当然只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继续发展，它就必然需要比以前更大数量的工人。仍然坚持婚姻问题上的种种限制，势必影响必要的人口增长。由于资产阶级社会要废除这些婚姻限制，所以它才做了一些对工人有利的事，使工人得以摆脱从前的限制而建立起自己的家庭。然而首要的问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增加人口，也就是增加工人的数量；而随着工人数量的增长，它就拥有更多的人手供自己使用，这样一来，只要情况需要，它就压低工资。

所以，在今天的事物顺序中是一个事物取决于另一个事物。因此我们欢迎你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权——在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时候，尽管内阁中没有你们的直接代表，但实际上你们已经掌握了这种权力，因为政府实际上是代表你们的利益的——假如我们为了废除婚姻限制，象你们现在所认为的那样，象你们对这些事情所论述的那样，在事物未来的顺序中，也采用这些限制措施，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先生们，这是最后一次提醒你们了，也是对你们反对我们的一切借口的回击。你们说，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违反人性；说我们的目的在于压制人的自由；又说我们阻碍人自由地向各方面发挥和发展自己的智力和体力，尽管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要发挥人的聪明才智远比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容易得多；可你们

却说我们反对这一切发展条件，假如你们所说的这些果真是事实，那你们也不必担心，因为如果是那样，我们从第一天起就要崩溃，你们没有必要为此对我们发火。（社会民主党人喊：说得对！）我似乎觉得，从你们的利益出发，你们甚至期望我们进行这种尝试，以便让我们自己把自己引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但是，由于你们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由于你们自己心里十分清楚，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你们在同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一场包括人类未来在内的第一流的文化运动打交道，（右边和中间有人喊：嘘！嘘！社会民主党人喊：太对了！）由于你们在心里对自己说了这些话，然而，从你们的阶级利益出发，你们又不得不敌视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所以，就象你们在此地的所做所为那样，企图用如此可怕的色彩来描绘所谓的“未来国家”。在工人阶级当中，特别是在下等人民阶层中你们有自己的追随者，为了使他们惧怕这种所谓的未来国家，你们非这样做不可。（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

我们静候你们的努力获得成功。对于你们的指控，我们坚持我们迄今作出的解释，而结果究竟会怎样呢？是的，我们已经看到：优势向来在我们一边。先生们，巴赫姆议员博士先生和李希特尔议员先生在这里针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国家”所发表的那些演说，以前选举时，在他们的传单中已经说过了。这并不是他们在这里提出的唯一论断，也不是他们在这里作过的唯一阐述，我们不仅在他们的传单中，在他们的报纸上，还在他们历次选举时的演说中以及其他场合听过或看过这些东西。这一切对他们有什么用处呢？没有任何用处！我可以毫不隐讳地说，坦率地说：我偶尔也读读你们为反对我们而写的那些传单，你们在传单中把我们描绘成毫无人性的杀人放火者，描绘成毁坏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人，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恢复野蛮状态，比如李希特尔议员先生不久前在这里再次绘声绘色地说了这番话。我说过，每当我读到这些传单，心里

不免就想：谁得到这些传单了呢？谁看了它们呢？读这些传单的人大多数对国家和社会，对你们的努力，是一窍不通的，那么，这些传单上的如此描绘对他们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每当选举日来临，我就看到，尽管这些反对我们的传单如此编造谎言，欺世盗名，但我们的选票仍然大幅度增长，这时我就对自己说，一定有一个强大的核心，影响着广大群众，这一核心由那些保持着正常人的理智，保持着阶级本能的人所组成。我们的选票可以依赖这个核心，尽管敌对方面试图用各种方法扼杀和消灭这一核心，可是我们仍然指望从它那里得到选票。（会场大乱。社会民主党人喝彩）

你们也说过，——特别是施特克尔议员，他在上星期六就说过：“你们煽动群众，你们诱惑无知的人。”先生们，如果说群众是无知的，那他们怎么会是无知的？正是你们使他们处于无知的境地。（右边和中间强烈反对，社会民主党人赞同）先生们，国民教育不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没有学校，没有教会，没有成百上千的机构，我们不掌握连同士兵和宪兵在内的国家统治权，我们也没有教师、神职人员和成百上千的新闻报刊，以及企业主的社会权势。所以，群众变成今天这种样子，完全是你们教育的产物，说得更确切些，是你们没有教育的结果。（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会场大乱）你们使他们愚昧无知，先生们，我们正在启迪和教育他们，以便帮助他们认识和理解各位，认识和理解你们美妙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时使他们支持我们为使其幸福而奋斗的目标。

先生们，“未来国家”不是监狱，只有今天的社会制度才是监狱，在其他方面也表明了这一点。最近选举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多数派在其报告中已经声明：如果雇主随心所欲地强迫工人在选举时投他一票，那么，这是正常的事，不是吗？迫使工人放弃自我决定权和自由选举权，对这种闻所未闻的苛求，你们却只字不提。（大乱。社会民主党人喊：很好！）冯·施杜姆男爵先生几年前甚至

禁止其工人在他的工厂里阅读指定的报纸；埃森的克虏伯先生对两家天主教报纸常年实行经济制裁；他威胁过他的每个工人，谁阅读上述天主教报纸，就解雇谁，如果这个人住着他的房子，则必须立即迁出。先生们，这不就是今天的国家、今天的社会中的监狱设施吗？这种强迫行为不就是干涉工人的自由，干涉工人的自由决定权吗？（右边大乱，表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喊：千真万确！）我们十分清楚，越是箝制工人，越是压迫工人，你们就越加感到舒适。我们还非常明白，这就是你们为工人所作的真正努力。先生们，正是这个克虏伯先生，他在对两家天主教报纸实行了几年的经济制裁——当然，他对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一次也没有实行制裁——以后，最近不是冠冕堂皇地发布了一份公告吗？他在公告中说，现在他准备撤销几年前发布的关于禁止那两家报纸的禁令，因为从那两家当年被他制裁的报纸今天所持的态度上，他已经看出来，它们对工人已不能构成任何危险。（社会民主党人喊：听啊！）先生们，谁象老爷一样用这种方式支配他的上千名工人，谁用这种方式限制和蔑视工人自由发表意见权和自由决定权，谁就是监狱长；而在这些工厂里干活的工人同犯人相差无几，尽管他们同犯人相比还享有某种虚假的自由。这就是你们在今天的社会中给予工人的优惠。

此外，你们总是带着偏爱依靠你们所说的，由你们推行并给予工人的普遍表决权。这一点，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很多次；但是，你们总是反复提出你们多次提过的反对意见，所以我不得不对此作出我已反复作过的答复：普遍表决权是你们不得已才给的，今天你们若能把它取消，那你们才高兴呢。（中间有人起哄）先生们，你们为什么不利用你们在普鲁士议会中的权利推行普遍表决权呢？你们，巴赫姆先生和你们的朋友们，为什么不反对最近由米凯尔先生重新提出的那个“一切选举法中最卑劣的法案呢”？（中间有人喊

叫)不,先生们,你们没有指责这个“一切选举法中最卑劣的”法案。(起哄)不,你们没有这么做,你们并不要求普遍表决权,你们仅仅反对上述草案中的个别规定,而且准备把这个关于三级选举制的法律草案稍加修改后作为将来普鲁士选举的基础。

同样,先生们,不分党派,象你们在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所干的一样,你们在德国所有各邦都是这么干的,的确,你们在各邦拥有绝对多数。你们不愿意给工人以政治权利,因为你们不能容忍工人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家公民,你们无论如何要压迫他们。而你们借助自己的阶级地位,掌握了政权,它使你们能够作为统治阶级在国会中的代表,任意制定法令。

议员巴赫姆博士先生在反对我的论述时曾经说过:有朝一日中央党实现自己奉行的社会政策,社会民主党就会消亡。(向社会民主党人起哄)先生们,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进行一些社会改革?巴赫姆先生不久前引用了俾斯麦公爵1884年11月26日的演说,俾斯麦公爵在这次演说中,矛头直指我的朋友和党内同志奥艾尔,后者当时在一次关于议员津贴的辩论中当着他的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批评了他代表的政府体制;论述了社会改革及其意义。巴赫姆先生引用的内容是正确的,但俾斯麦公爵当时还说了其他的话,我认为现在有必要给你们读一读。这些话证明,14年来,你们在德意志帝国得以实现你们在任何场合都加以引用,并以此感到白鸣得意的改革措施,完全应当感谢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

当然,我们社会民主党是少数派,根据在国会中必须占绝对多数的原则,我们不能制定任何法令,也不能贯彻任何法令。你们是多数派,先生们,你们可以制定法令!我们最早是12个席位,接着是15个席位,后来是25个席位,现在是36对360,我们的对手占具360个席位,面对这360个席位,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这是很

自然的。不过，先生们，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只有36个席位，但是我们在道义上的力量却大大超过你们这360个席位！（右边有人大喊大叫：社会民主党人喊：说得好！）的确，我敢肯定这一点，冯·马索夫先生，原因是，我们尽管占少数，但道义上的力量却很大，以致你们不得不违心地采取这些所谓的社会改革措施。已故皇帝在1878年的登极演说中，在谈到颁布反社会党人法时是怎么说的？他说，现在，必须压制社会民主党及其革命企图，同时要注意社会民主党内现存的真正核心，并且通过积极的立法帮助工人，使他们受现在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约束。这就是皇帝登极时第一次演说时说过的话，而且他在皇帝诏书中又以同样方式重复过这些话，通过这份诏书于1884年11月或12月真正开始进行社会改革。在这个诏书中，我们又一次被说成是这个即将制定的立法的道义上的真正发起人。而俾斯麦公爵在巴赫姆议员最近引用的1884年11月26日发表的演说中，针对我们是怎么说的呢？

“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党，不过，它对有产阶级来说总是一种严重的信号，一种不祥之兆，现在有产阶级干什么事情都不能称心如意，都不那么顺手，在这一点上，正如前一个发言者先生所说的，反对派倒是帮了大忙。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没有那么多人害怕社会民主党，那么，我们迄今在社会改革中取得的一些进步也是保不住的（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那些向来对自己可怜的同胞冷酷的人对社会民主党倒有几分惧怕，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社会民主党人喊：好极了！）是的，你们瞧吧”。俾斯麦先生继续说道：“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还是一致的。”（会场气氛热烈）

根据这位权威人士的话，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去理睬，到底谁是你们感到白鸣得意的那些改革措施的真正发起人。

但是，巴赫姆先生，你们通过了新工商业法以后，还想对社会

改革措施出些什么点子？你们究竟还要耍什么花招？（社会民主党人情绪热烈）我看是智穷计尽了吧！你们充其量只能提出一些微不足道的措施，接着就将山穷水尽！你们的行动将对工人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拭目以待！

你们还说：你们社会民主党只掌握年轻工人，20年来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情况发生了变化并有所改善的老工人，你们掌握不了这些老工人！哈哈，巴赫姆先生，如果您以为我们没有老工人为后盾，那您可就错了！今天我们拥有一支与我年龄相仿的老工人组成的骨干队伍，他们从运动一开始就站在我们一边。即使我们仅仅拥有年轻力量，又有何妨？在任何时代，未来都是属于年轻人的：老一辈死了，但他们的理想是未来，年轻一代将继承他们的理想。1890年2月20日，我们不是有1427000名选民吗？他们不是投了我们的赞成票吗？这是德国最强大的党，比你们强大，比中央党强大，我们被认为至今最强大的党，不是吗？在下次选举时，我们的票数将比你们的多一倍！（中间有人起哄）

你们将会看到：我们要争取到的将不再是150万，而是225万或者更多的选民！（起哄）

先生们，你们等着吧！你们为什么把每3年一次的选举改为每5年一次？是因为你们害怕社会民主党，害怕普选，害怕选举太频繁，害怕我们的宣传！（右边和中间大乱，社会民主党人喊：说得对！）你们等着瞧吧，我们倒要看看！

你们还说，这1427000人不全是社会民主党人。先生们，他们等于是社会民主党人，同样，你们作为中央党掌握的那130万或者说相当这个数目的人就等于是中央党人，自由思想党掌握的100万或者相当于这个数目的人就等于是自由思想党人。我们如果作一次考证，那么，不管是进步党还是中央党，投它们赞成票的选民决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向我们详细讲述他们党的纲领，——我知道，

自由思想党不会提出这种要求，中央党也不会提出这种要求，我承认，我们也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选民有一大部分不能详细陈述我党的纲领。这没有关系，也没有必要。主要的问题是，他们跟随我们，我们以他们为后盾，他们站在我们的旗帜下，是因为相信我们。先生们，这1427000人在德意志帝国投票赞成一个象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党，尽管它遭到其他各党的极为恶毒的反对，尽管国家政权一贯对它横加压制，尽管它的奋斗目标，如我上面所说的，遭到丑化，遭到各党派敌视我们的传单日复一日的攻击；有人把我们比作猪狗，把我们描绘成有血有肉的魔鬼，尽管有这一切责难，但这1427000选民毅然决然地投票赞成我们，在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些人是完全属于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喊：千真万确！）

巴赫姆先生还说，我在一次讲话中对俾斯麦公爵说过，我们朝一日也能当着你们的面阐述我们的生产体系、消费体系和合作劳动组织。但是我在那次讲话——巴赫姆议员先生引证的是那个讲话的结尾部分，那是我当年在讨论预算问题时发表的一个长篇讲话——中还说，我在这个讲话中向你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你们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再谈其他问题。先生们，在那次讲话中我还要求取消间接税、盐税、啤酒税、烟草税、糖税和葡萄酒税，取消灯油关税、咖啡关税、烟草关税和谷物关税，征收直接累进所得税，取消糖贴、征收军官税、平民税和帝国官员税，变常备军为人民武装，建立国际仲裁法庭。这些都是我在那次讲话中主要提出的要求。而这些要求，你们实现了多少？你们在哪里实现了这些要求，只有你们自己最清楚！比如，向帝国官员征税。你们，特别是中央党，先向一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帝国官员家庭支付约700万现款，然后才向他们征税。先生们，你们如果把这也叫作对工人的友爱，对人民的友爱，你们如果把国家银行，即国家公民口袋里的钱拿来支付

给国内那些一次未能出示这种特权的合法证书的豪富家庭，（中间有人：嘘！）以便他们从自己的大量财富中抽出一小部分上缴税收，尽管这些家庭主要是享受现存国家制度优惠的家庭，——我是说，你们赞同这些措施，是对人民、对工人最大的爱。

先生们，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来参与讨论原则性问题，但我在那次讲话中所说的话，就我本人而言，已经在我那本深受欢迎的书《妇女》中作过详细论述。

议员巴赫姆博士先生继续提出问题：“你们想要的是什么？在你们的著作中从来没有人提到你们对未来的设想。”先生们，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当然使用了所有可以使用的资料，显然，资料是现成的，按照我自己的观点，并且从目前状况出发，这些资料对未来分析了在社会主义组织中应该怎样发展生产、消费、普通教育，总之，论述了社会的一切基本生活需要。巴赫姆先生说他没有读到这方面的内容。但李希特尔先生来了说，这些内容在倍倍尔的《妇女》一书中都包括了进去，同时他试图在一次冗长的、极不严肃的讲话（大笑）中无中生有地驳斥我在《妇女》一书中所说的话。是的，先生们，如果说用极不严肃的话就可以驳倒严肃的事和严肃的奋斗目标，那么，在这一点上，李希特尔是成功的。（大笑）但是，谁试图用玩笑来对付严肃的事、对待严肃的奋斗目标，谁就表明自己的证据不足。（大乱。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

先生们，我接着讲下去。议员巴赫姆博士先生就是对我说了这些，仅仅因此他才能够对我说：你们许诺要详细描述这一切，可你们什么也没有描述，同时他还引证了我的《我们的目的》一书。这是我在1869年写的一本小册子。我在这本小册子中的确说过：我们准备在某一天详细描述未来国家的概貌，并阐明建设未来国家的计划。我当时确实是这么写的，但是，先生们，我在后来——在这里足见我们开展活动的真挚诚意——，即1885年11月，《我们的

目的》将出第9版时，我撰写了下面的序言：

“几年来，由于多方请求，我终于决定将这个集子再出个新版，即第9版。我迟迟不决的原因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我的观点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声明，文章中本来是积极的论述，现在我已不能同意了。但是我也不同意完全按愿望改写。这个集子是运动中历史发展的产物。如果整个内容没有问题，要改写是不可能的，不如原封不动，反正这篇东西是我的最初的创作尝试。

于是我决定把这个集子重印一次，不作任何改动，把它看作是运动中的一个阶段的见证，一个对党的接班人感兴趣的见证。愿它在宣传方面仍保持一定的价值。

德累斯顿—普劳恩，1885年11月初

奥·倍倍尔”^①

先生们，一个著作家还能比这更诚实的吗？一个著作家能对那些看过他的晚期作品，并在其中发现一些与他的早期作品相矛盾的东西的人说出他早期作品同晚期作品的矛盾所在吗？自1885年以后购买并阅读过我的《我们的目的》的人，也就读过这篇序言，并且一定清楚地知道他该如何对待它的内容。因此，使用任何不正当的手段都是没有诚意的表现，比如，施特克尔议员先生在星期天对我进行过诽谤。他说，我们知道自己写的东西不真实，但仍然继续以此煽动群众。这种诽谤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我已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施特克尔议员把本来应当对《我们的目的》说的话扯到了我的《妇女》一书上，所以我要在此立即指出，我在《妇女》一书中所说的一切，今天还要原封不动地予以保留，在以后出版第13版时我要写得比现在的第12版（至今已销售约7万册）更尖刻。

^① 1986年《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1—2辑合刊第151页。——编者注

这就是对你们的教训。

后来，巴赫姆先生说，不管是李卜克内西还是倍倍尔现在都没有老。巴赫姆先生，我们同以前一样，还没有老，或者说，如果您愿意，我们象从前一样年轻。今天，我们在一切重要问题上，仍然坚持从前的观点，只是远比从前更加先进，我们在理论上发展的成果已经表现在爱尔福特纲领中。您如果将这个纲领同1868—1869年和以后的纲领作一番比较，那么，您将不得不承认，爱尔福特纲领比从前的纲领明确得多，纲领中提出的要求也高得多。

先生们，哈默施泰因的《十字报》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在谈到这次大会的辩论时，得出的结论是，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唯一具有明确纲领的政党，它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这番话是一家站在我们对立面的报纸说出来的，我听了我最顽固的论敌说出这么坦白的話，觉得比听先生们在这里进行软弱无力的批判要舒服得多，因为这番话把我们的发展过程和我们的目标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大家。

不，先生们，我在参加运动的30年中，年复一年，不停地向前走，我把这看作是我的荣誉。今天我向国家和社会提出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彻底。李希特尔议员先生说，我们30年前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的一次工人大会上第一次见面，当时两个人都是舒尔采思想的代表。今天，先生们，我经历了一个脱毛过程，我所属的党也经历了一个脱毛过程；不过，李希特尔及其所在的党同样也经历了一个脱毛过程，只是有所不同罢了：我和我的党是前进的，而他和他的党不是原地踏步就是向后退的。（大笑）这就是我们之间在30年当中存在的最大区别。我遵循着自己的全部观点一年年地向前走，今天我在所有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比30年前所持观点要进步得多，而李希特尔先生上星期六在这里谈到危机的原因、节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问题时，用大家早已习惯的那种高傲态度提出

的论点和理论却同他30年前所说的完全一样，可以说是一字不差。因此，李希特尔先生可以说是一块活化石。（大笑）他是一个什么东西也没有学会，倒是忘记了不少东西的人。

先生们，我在此必须强调，当年李希特尔先生是进步党的民主主义者，而今天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党人。只要把进步党的纲领同今天自由思想党的纲领作一番比较，那就可以断定他是倒退的。因此，我们之间的区别的的确确在于：李希特尔先生是倒退的，而我们是前进的。

先生们，由于我们，我们个人和我们的党，——在此我又要重复那个被你们多次嘲弄过的单词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精神方面的脱毛过程，因此我们认为，与时代的进步有关的一切都会发生这个过程，甚至你们也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先生们，你们对一个法学家说你们是法学家，可我看你们都是实足的反动分子！（有人大叫）是的，幸好施塔特哈根不再是法学家了。（会场活跃）

先生们，巴赫姆议员先生在星期五的讲话中对我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一条他没有提出来，这正好证明，他心理比嘴上更想承认，他已经认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点了。先生们，他曾经问过，他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给他的回答是：白铁匠。他不同意，因为他觉得他不具备那方面的才能。那好，现在我们还可以把他变成另外一种人，给他寻找另外一种工作。但是，他却不问一问，你们怎么会让我当法学家呢？这是令人吃惊的。他在社会主义社会当法学家是完全多余的，这一点他已经十分明白，他的看法很正确。（大笑）于是他说：那时你当法学家，比任何一个人都多余；因此，他完全明白无误地认识到他必须成为另外的什么人，我的意见是让他当街道清洁工，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们将象对待其他任何学术活动一样，发给报酬。

不过还是言归正传吧——你们可以问问某个医生，医学科学在过去的5年里是怎么发展的，过去有效的东西今天是否仍然有效；你们可以问问某个自然科学家、技术工作者、工程师，总之，你们可以问每一个由于自己的技术工作和学术工作不得不站在社会洪流中的人！他们都会回答你们说：万物都不是静止的，静止是不可想象的；万物都是发展的，可以说是不停地发展的，赫拉克利特说过：自然和人类的发展可以理解为永不停息的长河，后浪推前浪。而黑格尔的最大功绩是，他不仅在哲学上论证了人类的这一发展过程，而且还证明了在某个特定的发展阶段量转变为质的情况；换言之，我们可以以资产阶级社会为例，当资产阶级社会达到其发展的顶点，达到高度繁荣阶段时，它身上的固疾也以越来越高的速度发展着，于是这个社会就必然发生质的变化，即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

先生们，这就是今天在科学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和观点，你们（尽管违心），甚至右派先生们也不能不考虑这一点。

我曾经问过，你们5年里将干些什么？施特克尔先生回答说那时我们将以现存社会制度为基础，继续学习，并且充分利用我们学过的东西。甚至连那些右派先生们如今也不得不承认，不能再静止不动了，我们要前进，而他们从前根本不想承认国家和社会会停顿不前；每口每年都会出现新现象，每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以后，每当从这些现象中产生出某种结果时，我们必须对此表态，然后采取措施。甚至连右派也承认这一点。

巴赫姆议员先生对我的那个问题：你们5年里将干些什么？也是这么回答的。他企图同我绕圈子，他说，哎，当然在5年当中，我们仍然以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为基础，干这种制度需要我们干的事情。是的，正因为你们以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为基础，正因为你们能够十分清晰地看到这种制度的各个方面，所以你们

才应该能说出你们5年中会干些什么。但是，巴赫姆先生，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您能够保证在这5年当中你们的那种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还会存在吗？它也可能在这5年当中会毁灭了吧！巴赫姆议员先生，您点头承认了！您从哪里弄来了这种见解？可您对此一窍不通，就象您不知道死后能否升天一样；您仅仅相信它，不过如此，您没有提出一个证据。

所以我说，尽管你们对自己的社会制度了如指掌，但你们未必能说出你们5年当中要干些什么。

先生们，上星期六晚上，我们在军事委员会所属的委员会讨论了李希特尔先生的一个提案，当时我觉得很好笑。李希特尔先生在这一提案中向政府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原话我今天没有带来，但我可以引述它的意思——：帝国政府在今后3年内，根据现行法律和体制，设想向帝国国会一次要求多少专款？当时在场的所有军官先生和委员先生都说：我们不知道。我也立即向坐在我对面的同行格勒伯喊道：您看，格勒伯先生，这个问题也是询问未来国家的。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回答。尽管这里涉及到的军事制度是存在的，但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当然，那些先生在1887年和1890年也曾声称：现在我们提出的是最后一个较高的要求，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不再提更高的要求了。而今天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这个计划最早是作为军事提案向我们提出来的！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计划呢？原因很简单，德国没有用中国的万里长城围起来，它与世界各国，特别是邻国有着政治关系和国际关系，因而政府的先生们都已经认识到，总的政治局势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在1887年和1890年足够使用的开支，在今天则显然不够用了。

因此，先生们，这些人不顾政府的三令五申，还是向你们提出新的法律和要求，因为他们事先没有预料到必须制定这种法律和

要求。而你们面对这些事实却要求我详细描绘一下我们尚不了解将在何时诞生的“未来国家”！先生们，只有在全党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协商并作出决议以后，详细描绘未来国家才有一点价值，否则你们就总会说：是的，这是倍倍尔的希望，李卜克内西的希望，奥艾尔的希望，可党的希望究竟是什么呢？先生们，现在我们究竟何去何从？如果政府提出一项法律草案，那各党派通常会说，这个草案一点也不适用，必须修改，直到适用为止。每一个法律草案一提出来，你们都是这么干的，尽管你们的委托人，即政府的先生们是代表你们的利益的，而且都是绝顶聪明的人。这一点我可以叫伯提歇尔先生放心，在这种时候先生们要想不越雷池一步是不可能的，当然他们的状况也大致相同。所以你们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见到使你们不安或不满意的法律草案，你们就否决，或者修改，直到没有异议为止。政府第一次将事故保险法草案提交帝国国会的时候，有人就是这么抵制的，于是草案被撤回，一年以后才提出了新的草案。这一切都是在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发生的。而我们现在已经不那么天真了，我们不想向你们介绍，也不想向你们详细阐明或许十几年甚至半个世纪以后才可能发生的事，我们也根本不可能知道那时将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沿着什么方向发展，因此我们无法采取措施，这样一来，你们就大喊大叫说社会民主党的目标不明确，以及行动粗暴等等，还说社会民主党详细介绍的“未来国家”纯属胡扯！先生们，难道你们完全不知道你们的态度前后矛盾吗？你们对这个问题认真思考一下，会了解到什么呢？——你们的发言人一定会对你们反对我们的意见感到脸红。（右边和中间有人大笑，社会民主党人喊：确实是这样！）

是的，他们一定会感到脸红，因为他们不得不承认，人们在期待严肃地提出问题和严肃地回答问题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巴赫姆先生接着说，如果德国工人失去思考能力，那么，社会共和国就会来临。不，巴赫姆先生，只有在工人善于思考的时候，社会共和国才会到来，而不是相反；正因为工人不去思考，你们才能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要是他们能够思考，他们就会跟随我们，跟社会民主党走了。所有的工人如果都学会了思考，知道你们是怎么压迫他们的，那他们就是社会民主党人了。（社会民主党人喊：好极了！）

然后自然又会出现一次众所周知的可怕的大屠杀场面。（有人大叫）是的，而且是残酷的大屠杀场面。在各位先生看来，这场灾难一来，就会出现这种场面。诸位，我曾经问过自己，这场辩论对你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同时我深信，这是你们挑起的一场难堪的辩论。（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你们害怕下次选举时同我们社会民主党进行大搏斗，所以你们希望得到大量用来对付我们的材料；你们以为只要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就能使我们干出蠢事来，从而使你们拿到把柄。请看，这就是这场辩论的全部秘密，可是你们失望了。因为我们同蠢事无缘，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向你们隐瞒任何事情。如果说你们确实如此害怕有一天现存社会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发生流血事件，那么，我看你们想错了。我深信，如果今天的社会安安稳稳地向前发展，直至达到它的最高发展阶段，那么，今天的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也可能是安安稳稳的，比较迅速的，同样，拿破仑在色当战败和被俘以后，法国人在1870年就建立了共和国，结束了拿破仑的统治。

当然，我们不知道发展的具体细节，因为我们无法制约发展过程，相反，发展却制约着我们。这些情况迫使我们顺从发展过程，而不是相反。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能把今天的那种由现状来确定和控制人类社会的现象改变成由人类社会来确定和控制现状。这就是我们力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有

人大叫)现在你们叫喊起了“啊哈!”你们对于刚才听到的所有新鲜事都感到惊讶;你们恰恰不理解这一点,因此就惊叫“啊哈!”我看你们尽管喊叫“啊哈”好了!(会场活跃)

好吧,我再说一遍,我们不相信非发生大屠杀不可。还有一点,先生们,你们将来会看到你们自己的前辈所做的事情,我不想说你们的先父,而说你们的前辈,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回事。比如,你们的前辈在1789年,以及在以后的年代里,在法国据说砍下了3万名贵族和僧侣的脑袋,这是据说,我不知道是否真有这么多,反正这是无关紧要的事。同当时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相适应,他们认为,只有砍掉这些人的头,才能改变局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大屠杀。有人说,如果法国革命不杀掉这些人,也不通过法律,特别是不通过诸如没收僧侣、教会和贵族的土地,而把土地分给至今的依附农和农奴等社会改革措施来改变局势,——如果不采取这些或类似的措施,如果杀掉的是30万而不是3万人,那么,法国革命就不会成功。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它一个不杀,也不杀路易十六,局势也会改变成现在的这种样子。

先生们,这就是我们今天同你们当时的前辈之间存在的区别。我们知道,问题的重点不在于人,而在于事。我们常常对你们说到这一点,比如,你们在颂扬你们的俾斯麦公爵时,我们就曾对你们说过,有一天俾斯麦死了,事物照样会一如既往地发展下去!——你们看,事情就是如此。假如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和政府的先生们,还有你们,德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栋梁,有一天突然全部死亡,那也丝毫不会改变社会发展的进程,一切还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4周以后又会组成一个新的同旧的一样好的帝国国会。(会场活跃)先生们,我们就是这么看问题的。至于某个个人心里怎么想,那是无关紧要的,我在不久前对你们说过,不用说你们那几个人,就是更多的人,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都是无关大

局的，这就是事物的发展，它能改变社会和人。由于各方面的发展只能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正在努力认识事物的本质，努力认识决定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一旦认识了这些事物和决定其发展的规律，我们就能采取措施；至于现在有这样或那样的人，那是无关紧要的。先生们，就我个人来说，我真希望你们能活到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那一天，那时，如果你们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好情景气得要命，我将十分高兴，（会场十分活跃）我甚至希望你们能气死，省得我们来把你们杀死。（大笑和大叫）克奈尔克议员先生，您就很可能气死。

下面我来谈谈李希特尔议员先生的论述。（大叫）是的，先生们，你们既然已把汤烧好，就必须把它喝下去，别无他法。我只想向你们证明，我们没有被消灭。

李希特尔议员先生在星期天晚上又提出了罕见的国民经济学观点，从而使他一举成名。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成了他那一派的姘姘者。我十分怀疑，比如他的朋友、议员班贝尔格尔博士^①真地愿意把他星期日晚上所做的国民经济学论述，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我认为班贝尔格尔聪明过人。他简直貌似无所不知。（会场活跃，有人大叫）当然，我绝对不会说他是伪君子。我也没有把心里话全说出来，我认为，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这么做的。

我只想以此说明，议员班贝尔格尔先生在一生中积累了许多经验，特别是他曾经长期住在法国，那期间他获得了大量知识，这些知识是他的那些议员同事，尤其是李希特尔议员先生所缺乏的。这位李希特尔先生，照我看来，他在整个的活动中，发展得极端片面，不过，我承认，在这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功绩是卓越的。班贝尔格尔议员先生从中看到了许多其他人没有看到的东

^① 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1823—1899)——德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1866年加入德国民族自由党，1871年起为帝国国会议员。——编者注

中首先是经济要素及其影响，特别是经济法则的本质。班贝尔格先生是否愿意把李希特尔议员先生星期六关于危机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的讲话全部记录下来，我深感怀疑。李希特尔议员先生说，这次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我们遇到了歉收年。那么，为什么上个世纪在歉收年没有发生我们现在遇到的这种世界危机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那时还根本没有我们现在用来制造产品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工具。当然，即使在中世纪也有贫困，贫困的程度也许不亚于现在，可当时还没有出现今天这种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当时某个地区，某个省，或者某个邦发生饥荒，那根本无法挽救，因为当时没有交通工具，无法把其他地方或许过剩的粮食运输过去。当时，人们只能看着饥荒、瘟疫、战乱和贫困四处蔓延，然而，象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期性复发的经济危机在中世纪社会是没有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是无法想象的。经济危机只是现代才有的一种现象，是最近两百年内在一些先进国家，首先是在英国，其次是在法国，最后是在我们德国，开始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现象。

我在这里所说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的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出现不是由于消费能力不足，而是由于群众缺乏购买力。群众领取的工资越低，流进企业主口袋的利润就越高，生产发展得越迅速，从这些矛盾中产生的危机就越严重，危机持续的时间就越长，繁荣期也就越短。这种发展就是现代社会的特点。硬说收成好坏对危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种十分片面的观点。当然，收成的好坏对市场状况确有一定影响，因为在歉收年，吃亏的人大部分是农民，他们的购买力在荒年无疑不如丰年。但这不是关键，主要的问题是，大多数人即工人阶级，在危机时的购买力由于失业和降低工资而越来越小，从而反过来又加重危机。商品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但没有那么多的顾客去购买这些商品。目前的发展存在的缺点是，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我们中有某些少数人每

年收入2万、5万、10万、100万或者更多的马克，从而不断形成新的资本家，并设法到新的企业中去投资。新形成的这些资本家主要把资本投入到工业上去，而不是相应地用来消费商品。大多数人忍饥挨饿，少数人则挥金如土，但丝毫不影响他们不断占有财富。如果有可能把对少数资本家有利的东西使之有利于工人，从而抑制资本家迅速形成和发展，那么，比如在目前工人的工资就可以提高33%、50%，甚至更多。你们也许会觉得奇怪，怎么会这么快就能克服危机！那是因为工人有了这个新增加的33%至50%甚至更多的工资，他们就可以相应地消费更多的商品，这样，库存的商品就可以销售出去，从而为新产品腾出地方。所以说，事物的本来面目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象李希特尔先生所说的那样。

接下去，他还谈到了失业者的现状问题。他说，在那里发表演说不是失业者，而是社会民主党的议员。是的，在那里发表演说的人确实是议员，这一点我们很清楚，各种报纸上也写得很明白。我们认为到那里去是我们的义务，我们是得到邀请的。那些人，其中有些是我们的党内同志，曾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举行这样的会议，并登台讲话，给人们讲讲这次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应当怎样克服等等。我们凭良心和能力去给他们讲了话，同样，李希特尔议员和他的朋友们，如有人要他们到会讲话，他们也可以去。如果那时李希特尔议员还说没有失业者在会上发言，那么，报纸就会登出关于他的非常糟糕的报道，或者干脆什么也不登，因为说没有失业者登台演说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出席过两次这样的人会，每次都有许许多多的失业者登台演说。对我来说，我虽然很熟悉工人的状况，但看到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登台演说，我仍然感到很意外，他们描述了自己的贫困状况，比如他们说，他们已经失业几周，几个月，甚至许多个月了，他们如何如何徒劳地寻找工作，而最后得到的答复还是原来的答复等等。我怀着极大的

兴趣出席了两次大会，最后离开的时候认识到，我在这两次会上学到了许多从前不曾知道的东西。

李希特尔议员先生接着还说，社会民主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未必能防止失业，它也非得强制工人出境不可。李希特尔先生如此固执地坚持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以致他无法想象出那时的情况。你们只要读读他关于未来的描述，就可以看出，他所批判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李希特尔式的未来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李希特尔先生设计了一个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国家”，他先是描述，而后又把自己的设想推翻。他整个的描述反映了，当然也歪曲了资产阶级的各种设施。他甚至这样描述说，他还要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国家”中设帝国首相。我感到意外的只是，他倒没有干脆让卡普里维当首相。（会场活跃）李希特尔先生，很遗憾我不理解你所说的，否则我就回答了；我不象你，讲话被打断了就发火。他还描述说，社会主义的帝国首相因擦鞋子问题被缠住了，也就是说，首相不是自己擦鞋子，他找了一个笨蛋给他擦鞋子，这是大家都听说的，而现在，这个笨蛋不得不辞去这个差使。李希特尔先生如此固守他那一套狭隘的观点，以致他难以设想，发明一种擦鞋机是很有可能的，因此他所说的那种对社会主义的帝国首相的危险是不存在的。（哄堂大笑）先生们，你们笑吧！乐吧！下面我还要给你们讲一些令你们发笑的事情。李希特尔的小册子出版刚刚半年，纽伦堡方面就传来消息说，那里的一个工业家发明了擦鞋机，有人甚至说，那个发明人还是李希特尔先生的同志。（哄堂大笑）至于这个消息是否属实，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千真万确的是美国已经有人使用了擦鞋机，先生们今天如果去一趟芝加哥，就可以用擦鞋机擦擦你们的鞋子了。

但是，先生们，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帝国首相真地需要亲自擦鞋子，这又有何妨？我常年自己擦鞋子，今天我有时还是自己擦。我

一点不觉难为情，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不仅擦鞋子和洗衣服，而且还擦地板。这些都是我干过的，而且干这些事对我丝毫无损。我并不认为这有辱我的人格。你们或许认为，擦鞋子是件不光采的活，（大喊大叫）似乎有点象中世纪许许多多“不光采”的行业一样吧？你们为什么对这件事感到如此可笑？（大叫）李希尔特先生，您不仅会擦鞋子，还会整理铺床，即您为什么把这些活让您的夫人或女仆去干呢？您自己动手，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好。（会场活跃）

我讲这些只想证明，你们在各方面对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多么可笑，多么荒谬，确实可笑得可怕。社会民主党的确要调节劳动，使它面向消费，面向需求。因此，应当象我们今天在公社、国家、帝国内已经开始的那样，通过广泛的统计调查尽可能明确确定，什么是必须满足的需要。根据各类消费品的可能消费量确定消费品的生产。也就是说，这是可以估计到，是可以加以调节的，所以，工人长期失业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虽说对未来的消费没有作过一次统计调查，它不是也在设法对生产进行某种调节吗？那是因为它看到，由于自己无计划地生产，陷入了一个又一个危机之中，进行调节是权益之计。

试问施杜姆、哈马赫尔博士、戴歇尔霍伊泽和本国会中的许多大工业家先生，几年来大工业各部门建立了托拉斯、联营集团和辛迪加，其目的除了试图调节生产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目的。这些组织打算在本部门内部确定市场对有关产品的准确需要，并对这些商品进行分配，即按照各个企业的大小来满足它们的需要。今天资本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试图在资本主义地区对生产实行调节，一般说他们是不成功的，也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他们决不能照顾到国内所有的得益者：他们即使在一个国家内成功地实行了生产调节，但也不能去调节世界市场。当然，组成托拉斯、联营集团、辛迪加

等本身就孕育着未来设想的萌芽，这与资产阶级社会发展本身孕育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胚胎是一样的。在我们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你们所到之处，都能看到各种组织正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有情况下只需对它们扩充和改造，使它们日臻完善，不过，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它们带来全面的发展，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拥有这方面的必要实力。不久前我说过，即使把我们的股东集中装船，运送国外，对社会也丝毫无损。李希特尔先生听了又反对说，是的，这一点我们相信，你们把股东们运送国外，却留下了他的钱财。李希特尔先生，他们的钱财我们也不要！我们把他们所有的钱都装起来，还有他们的家具，他们所有的一切，统统让他们带走。我们不需要这些。他们可以把钱和黄金带走，他们愿意带多少就带多少，我们不希罕。我们的社会不靠他们的钱和黄金，不靠他们的财产是可以存在的，因为它是一个劳动的社会。

此外，他试图证明我们提出的有关帝国铁路管理的要求——变一切财产为公有财产——是违反自然的。先生们，这又一次证明，李希特尔议员先生坚持的是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小市民的观点，他关于国家铁路的论点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天还有谁认为他的论点是正确的？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论点同我们的思想有什么关系？简直风马牛不相及。比如说，难道我们会满足这种国家铁路的管理？国家铁路的管理问题难道不能解决得更好一些？非得像现在这样糟糕？然而这取决于政府的人和原则，取决于现存的某些过份追求损害顾客的企图，但就其本身而言不取决于铁路是帝国的还是国家的财产。我提到的铁路国有化问题想要证明什么呢？我只想证明，国家在目前的情况下，对某些大工业实行国有化的进程越快，将来它就越发易于为社会和社会民主党广泛征用。别的我什么也不想证明。管理的问题与我毫不相干；不管今天的管理是好是坏，对我的目的完全是无所谓的。比方说，假如国家在德

国，能将所有矿山和矿井等等，把各种大工业企业，如克虏伯和施杜姆的大工业企业收归国有，那么，归根到底，这种作法的最大优点就是对将来的广泛征用非常有利，也就是说，一方面变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为公有财产，另一方面变资产阶级的国有财产为公有财产。这就是我曾在不久前提到国有铁路问题时想要证明的一切，接下去我什么也没有说。

按照议员施杜姆男爵先生的说法，以及按照李希特尔议员先生的观点，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他们使用“国家”一词时总是加引号）不仅是一所监狱，而且比今天的军事国家更糟糕。先生们，我已经说过一次，社会民主党今天在要求所有国家公民，不分性别，只要年满20岁，统统享有普遍表决权，同时享有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一句话，扩大男人和女人的一切政治权利，我是说，如果社会民主党是目前存在的最激进的民主政党，那么，它在取得政权以后，怎么可能去着手建造李希特尔先生、巴赫姆先生和施杜姆男爵先生所设想的那种监狱之类的设施？难道你们以为我们要把那类设施留给自己的拥护者使用不成？（各种各样的喊叫声）

先生们，你们这样对我大喊大叫，矛盾百出，我简直听不清你们说的是些什么。你们自己也未必明白你们在干些什么！我还要补充一点：巴赫姆先生在发言中，极尽蔑视工人、贬低工人才智之能事，致使我确实十分惊讶；按照他的说法，如果没有现在的企业主，工人简直不知道选什么样的人，才是继续领导企业的内行，比如领导某个矿山或某个工厂。他说：“是的，倍倍尔先生，如果您被选为一家机器制造厂的厂长，您会干什么呢？辛格尔先生，如果让您当一个矿山的经理，您又会干什么？”巴赫姆先生，如果真的进行这样的选举，您以为威斯特伐里亚矿场的工人，包括你们的极权主义工人会选举一个他们明明知道他对矿山企业一窍不通的人去当厂

长吗？这是不可能的，你们不会这么认为，因为这样你们就正好证明，你们的天主教工人原来竟是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无能之辈。（社会民主党人喊：好极了！）

巴赫姆先生，还有一点您忘了：如果现在的全部私有财产和国有财产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公有财产，那你们的工程师，你们的技术员，你们的师傅准备干些什么呢？你们准备怎么使用他们的才干？（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你们除了使用他们的才能和知识为社会服务外，还能干什么？因为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中生活，所以你们别无他法。（大叫）我倒有个主意：你们可以移民！我们很快能够物色到同你们一样懂行，甚至比你们更加内行的新人。（噢！——大笑）先生们，你们不知道，今天在工人阶级中蕴藏着多么大的聪明才智，这是我们的运动的巨大优越性，也就是你们在国家、在乡镇、在公众生活中以及在你们的私人交往中当作工人所需要的人力，没有他们你们就没法生活，这些工人通晓一切，了解一切，你们必须把一切委托给他们，他们是我们的拥护者，如果有一天你们今天绝对信任的也必须信任的这些工人、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罢起工来，那你们就会一筹莫展。往后的结局你们自己也想象得出。我说得够多了。所以，先生们，请你们不要沉溺于幻想。人总有一天会自由的，而且会人人平等；人，最后总会走到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人的一天，并且能够自由自在地、无拘无束地发挥自己的智力和体力，会得到当今的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能给他提供的欢乐和享受。（右边有人大叫）当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下流现象及其从现存条件下又滋生出来的一切不良习气将会消失。只要给人提供符合理性和健康的环境，这种不良习气和令人厌恶的本性就不会滋长，比如我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看到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良现象就不再会发生了。（右边有人大叫）如果再让这些工人回到他们从前所处的恶劣的环境中，那么，

这些人又会染上原来就有的不良习气。(右边有人大叫,社会民主党人喊:好极了!)

李希特尔议员先生还说,我关于国家性质问题的分析是咬文嚼字。他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工资问题时,说假如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工资,那是咬文嚼字,对此我曾警告过他。先生们,有些问题,例如,给国家概念和国家性质科学地下定义的问题,学者们已经研究了两千多年,我现在就是试图根据这些科学观点给国家下一个定义,可他说我是咬文嚼字。先生们,对这样一个人我该说些什么呢?难道象他一样,在他谈工资问题时驳斥他,说他咬文嚼字!李希特尔先生难道真不知道人类社会曾经有过没有工资,没有工资关系,根本谈不上工资的漫长的发展阶段吗?而且将来还会出现同样谈不上工资的发展阶段,到那时人对人的统治关系已经终止。

他把“工资”和“工资制度”看作是现在不变,将来也不会改变的永恒制度,同样,他很快就从中得出了关于国家的概念,并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非常可怜、极为肤浅的定义。先生们,你们不要指望我会在这里再一次论述和分析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巨大区别,也就是说,不要指望我重复我上星期五的论述,我也不希望你们再听一遍。这个问题我不谈了。但是我相信,如果由中立的科学家组成一个仲裁小组,来评议他和我所作的关于国家和社会的论述,那么,我将静候这个仲裁小组的裁决。我知道,他的定义是不会得到他们赞同的。——有这一点就足矣!

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工资”的。可在奴隶制和奴隶劳动为主要生产形式的古代社会有工资吗?在封建社会,即在依附关系、农奴关系中有过工资制度吗?(右边有人大叫)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如果说有人曾经得到过工资,那么,这个人不是农奴,也不是依附农,而是地主、贵族、僧侣,他们以利息和税金的形式,

服劳役和徭役的形式，从工人身上得到大量的“工资”，也就是说，得到了一方面是实物形式的工资，另一方面是服务性质的工资。工资制度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它在资产阶级社会才开始形成。这种工资制度是以自由的工人为前提的；就是说，有了自由的工人，才能出现工资制度，这里所说的自由是这个词在它全部意义上的自由，一是工人可以自由活动，二是工人不再拥有任何财产，没有土地，也没有劳动工具。他们是些被剥夺原有财产的工人，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中世纪城市的手工业者师傅和商人。从这时起开始出现了工资制度，它日益支配着资产阶级社会。这种工资制度以企业主、以发达的商业、货币经济为前提，而德国的货币经济是比较年轻的社会机制，这一点李希特尔先生不会不知道。

当然，李希特尔先生也谈到了他草拟的未来规划。他说过并且夸耀过，由于他的这个小册子的传播和被译成多种文字，他使我们难以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我不知道他的《未来规划》被译成了多少种文字。我可以将他的《未来规划》同我的《妇女》作一番比较，到目前为止，我的《妇女》已经被译成11种文字，最后一种是希腊文，不久将翻译出版罗马尼亚文和俄文。（右边有人喊：听啊，听啊！）是的，请注意听！我只是想说，如果别人能在那一方面夸耀自己取得的成就，那么，我们也有权针锋相对，把我们的成就拿出来摆一摆。先生们，传播李希特尔的《未来规划》同传播我们的著作的巨大区别在于，他的《未来规划》完全是资本家和企业主大批购买后分发给工人的，而大多数工人仅仅把它当作废纸，几乎不去读一下；而我们传播和出售的著作是有人阅读的，比如，我的每一本《妇女》都有四五十男人和妇女阅读过。这就是区别。我甚至可以说，我的《妇女》一书在德国妇女中引起了一场精神革命，以前还没有一本书发挥过这么大的作用。（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这一点非常有利于社会民主运动。如果我把最近几年收到

的受人尊敬的妇女们的来信整理发表，那可以出版几大卷。这一点向我证明，我们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具有的和所代表的思想深受妇女们的拥护，她们已经感觉到现存制度不公平，她们也认识到作为女性，作为社会的人，她们是处在从属地位上。她们现在已经懂得，只有通过社会民主党，她们才能在社会上获得充分的平等权利和自由。我们看到，妇女们正在日益走向社会民主党一边，先生们，妇女们今天站在伟大运动的哪一边，哪一边就能胜利，你们能够保证获胜吗？（社会民主党人喊：确实是这样！）

接着，李希特尔先生对我在本书中论述的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条件下，按照我的看法，必然要产生的一些设施进行了长篇批驳。他嘲笑中心洗衣房、中心食堂、中心供暖设施，并说，谁知道这一切！先生们，我觉得，李希特尔议员先生完全不知道，你们资产阶级社会早已有这些设施了，至少柏林的妇女今天不仅在家里洗衣服，而且可以把衣服送到中心洗衣房去洗涤，今天我们的旅馆里就有中心供暖设施；在美国，有的市区，甚至整个城市都有中心供暖设施；今天，妇女的活动同5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彻底革命；许许多多的事情在50年前被视为妇女必须在家里要干的活，可今天已不再要求妇女这么干了，至少在资产阶级家庭，尤其是在大城市，不用妇女去干了，因为在当时视为必要的设施现在已经过时，已经被新的更好的设备取而代之。今天，在拘留所、兵营、医院、监狱无疑已经有了我们所说的中心食堂。当然，人们可以嘲笑这一切，象李希特尔先生干的那样，说什么：“想叫我们吃低劣的饭菜吗？”先生们，难道中心食堂就不能把饭菜做得可口一些，非得象今天的一样低劣吗？我们在一些大宾馆不也是在食堂吃饭吗？成百上千的富裕家庭在旅行途中或在海滨度假期间不也是经常在食堂吃饭吗？他们不是觉得住在那里比住家里更舒适更惬意吗？如果现在我们说，把现存社会在这方面为特权阶级准备的这

一切，向全社会开放，这难道就是空想，就是愚蠢吗？富翁可以使用这些设施，这可谓天经地义；大家都来使用这些设施，就被说成是疯狂，继而被嘲弄挖苦（大叫），是的，是嘲弄、挖苦，还有讽刺（大笑）。李希特尔先生就是这样取悦于你们的。先生们，你们星期五和星期六在巴赫姆先生和李希特尔先生讲话时捧腹大笑，知道你们是在干什么吗？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取笑的对象正是你们自己。（大笑，社会民主党人喊：说得好极了！）

现在谈谈教育问题。社会民主党的儿童可以得到衣服，有人为他们提供食宿；母亲几乎不必为他们操劳任何事情。先生们，李希特尔先生哪怕仅仅在今天的社会上看一看，那该多好！星期六我提醒他，您还没有结过婚时，他发火了。我说这句话，并非要戏弄他，我只想说明，如果您不象现在这样，而是当了父亲，您就不会提出那么多反对意见了。如果您以后愿意问问您的夫人，她从早到晚，每天围着3个、4个、5个孩子转，不停地侍候他们，是不是觉得很舒服，那您的夫人就会说，只要有人来给我看他们半天，只要照料得好，我就要感谢上帝了。（大乱；社会民主党人喊：的确如此！）

只有极少数有钱的人可以这么做。先生们，我们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夫人们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她们可以雇用保姆和佣人（大笑）看管自己的孩子。一方面，我们看到无产者当保姆，去喂养和教育资产者的孩子，而另一方面，无产者妇女迫于工厂劳动，不得不从清晨到深夜远离自己的孩子，无法教育照看他们，而孩子们又没有保育员。（社会民主党人喊：说得对！）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尖锐矛盾，就是现存社会产生的矛盾现象。面对这种状况，随之产生了种种有伤风化的事情和道德上和肉体上的堕落。统治阶级的家庭生活日益遭到越来越盛行的享受欲和肉欲的破坏和摧残，而另一方面，无产者的家庭生活也开始堕落，因为丈夫和妻子从早到

晚在车间、工厂劳动，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今天的国家建立了教育设施，甚至共产主义的教育设施吗？即使事倍功半，不也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吗？军官学校不也是一种学校吗？你们，坐在右边的先生们，把自己年满10岁的孩子送去学习，在那里没有父母在他们身边，不是一样受教育吗？我确实不认为这类学校就是模范学校，可是，国内“贵族”家庭和上等家庭的孩子被成千，至少成百地送去学习。另一方面，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我们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应当关心孩子们的伙食，即使首先关心穷人孩子的伙食也行，因为穷人家的孩子无力带早饭上学。以后这种学校必然出现。那时你们也要共同来关心，可怎么关心呢？难道就这样维持下去吗？

先生们，巴赫姆先生朗读了一段我的一位同志的著作，很能说明问题，非常能说明问题。这部著作中说，在未来的社会里，每个家庭将会有一套漂亮舒适的住房。你们听后捧腹大笑。是的，先生们，你们认为，为每个家庭提供一套舒适的住房是不可实现的空想。你们的社会是多么可悲，连这样的要求都不能答应工人！不过，尽管如此可悲，却很能说明问题，说明你们把这种要求视为你们不得不讥笑的空想！先生们，我对你们再说一遍，最近几天，你们取笑的对象正是你们自己！（大乱；社会民主党人喊：好极了！）

李希特尔先生在他的著作^①中让“女婴安妮”死去，其目的在于批评社会主义“未来国家”的教育方法。“女婴安妮”是“施帕尔—阿格内斯”的孩子。（大笑；右边有人表示异议）怎么不是？（长时间大笑）先生们，如果说我在“女婴安妮”的出身问题上冤枉了李希特尔议员先生，我深感遗憾。（大笑）不过，她是谁家的孩子无关紧要。问题是女婴安妮恰恰死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国家”，说

^① 李希特尔：《社会民主党对于未来的描写。倍倍尔的理想》1891年在柏林出版。——编者注

是因为她得不到母亲的照料，因此夜间踢掉被子赤裸着全身，以致着凉得了感冒。这实在太可怕了！（大笑）请问，李希特尔先生，这种事情在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不是每天都在发生吗？请您问问你们的医生，他会怎么答复您，在无产阶级家庭，在我们的工厂区，有多少孩子由于缺乏照料而死于非命！我们工厂区的孩子出生后几年，就有40%夭折，这大概就是因为得到了你们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别出色的照顾吧？事实并非如此！可是李希特尔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就是这么说的，我确实不理解，一个严肃的人，而且是李希特尔先生，怎么能去研究这么无聊的问题，但是由于李希特尔先生这么说了，所以人们就会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社会。事实上，这完全是污蔑。（社会民主党人喊：确实是这样！）

然后，李希特尔先生在书中谈了另外一种现象，即关于施帕尔—阿格内斯的问题。我们曾经说过，女工们在五六年内能节约2000马克是不可想象的。他听了极为恼火，于是他说，你们错了，我举的例子是有根据的。不错，我承认，这个例子是有根据的，但这是一个例外，不是普遍现象，不是典型，李希特尔先生，我们要的是典型，不要例外。我承认，一个清洁女工，一个熟练的缝纫女工，如果常年住在上等的资产阶级家庭里干活，如柏林就有这种习俗，她们除了吃饭，每天还能拿到3个马克的工钱，如果每年工作240天，就能节约这么多钱，特别是有些人不必用自己的工资养家糊口，甚至一点也不动用自己的工资，因为父母可能对她说，你的钱自己留着用吧，留着将来生活和结婚用。一个姑娘如果意外地这么幸运，五六年就有可能节约2000马克，但这是典型的例子吗？我们在服装行业和洗染行业中进行过统计，根据统计的数字看，事实上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你们必须承认，在柏林几千名女工中，仅有一个人能够节约出这么多的钱。前不久，我们从海因茨法上看到说为什么卖淫者日益增多？为什么女工日益贫困？难道是因

为她们得到了那一点我们称之为仅供糊口的工资！十分之九多一点的女工每周只能挣五六个马克，怎么能叫她们在五六年内，或半辈子内节约出2000马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今天我们就反对把这种例子，这种例外说成是普遍的、典型的现象；这样就会使人产生一种假象，似乎多数人，或者所有的人都能像那个人一样，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去动摇现存关系。李希特尔议员先生以及施特克尔议员先生之所以反对我们，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了这种节约良方。李希特尔议员先生说，我们是要斥责你们，你们最坏的恰恰就是唆使工人厌恶节约。先生们，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说过，大家不要节约，从来没有！我们倒是说过，工人阶级靠节约来改善生活条件是极不可能的。大多数工人难以节约，因为他们的工资低得可怜，只够他们勉强糊口，聊以生存。工人的年平均工资在600马克以下，这是我们根据事故联合会的统计资料得来的数字，你们看了这一点，就会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工人得到的工资几乎还不够活命。

即使工人普遍能有积蓄，我还得告诉你们，他们有了积蓄，对你们资产阶级社会就是一种不幸。（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先生们，你们对工人普遍真正有积蓄，并不感兴趣。（大叫）当然，个别企业家也许有这个兴趣，但总的说来，企业家只要知道自己的工人有积蓄，就会说，这些家伙既然还能有积蓄，说明他们工资拿得太多，下次危机时应当予以压缩。（大乱）——济格勒同事，我的确承认，不能没有例外。我认为您是一位值得称赞的雇主，但是，除了您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他们想的是另一回事；如果您相信，多数人的所作所为同我说的不一样，那您就上了大当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迫使他们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从事生产，同时，特别是在不景气时期，首先尽可能地压低工资。

那么，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呢？我已经说过，不是因为消费太

多，而是太少。如果你们要工人普遍节约，比现在更少地消费，那么，危机将会越来越严重。大量的间接税来自哪里？主要来自工人！你们为什么主要对大众的消费品征收间接税？因为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好处。富裕阶级的五花八门的挥霍丝毫不影响我们继续生产，或从我们这里征收巨额间接税。这主要取决于下层阶级的消费量。

下面我向你们介绍一个简单的计算办法。8年前我就开始这么计算了，但你们一再提出那些旧的早已被驳倒的反对意见，所以我不得不用同样陈旧的答复来应付你们。要说让工人节约，那最简单不过的就是在吸烟上进行节约了。吸烟是一种享受。我们假定，600万工人每人每周节约两支香烟就是4芬尼，那么，加起来每周就可以节约4800万芬尼，每年就可以节约2496万马克；如果这2496万马克不用来买香烟，那么，就可能有许多家工厂关门停产。你们可以假设，每个工厂的营业额为20万马克，——这已是相当大的工厂了——，那么，按照这种计算法，大约有120家工厂就得关门，工人就要失业，所有依赖这些工厂生存的人，小商贩、商人和掮客等，就会无法生存。这或许就是你们的节约体系的结果。

再作一个假设：啤酒。啤酒也是一种消费品，因为这也是可以节约的。如果600万工人每人每周少喝两杯啤酒，相当于20芬尼，很便宜，那么，每年就可以节约啤酒钱6240万马克。如果这些钱不用来喝啤酒，那么，就有几百家啤酒厂会倒闭，工人就会失业。第一个例子中，每个工人每年可节约4.16马克，在第二个例子中，每个工人每年可节约10.40马克，当然，对每个人来说这是个区区小数。

还可以再作一个假设，烧酒也是可以不喝的。600万工人每天少喝3芬尼烧酒，每年就能节约5616万马克。如果用这种方式限制烧酒消费，该有多少酿酒厂以及与此有关的企业要倒闭啊！

此外，你们对女工们的化妆品表示不满！要400万女工、女佣等每周节约化妆费30芬尼，总计就是6240万马克。有多少工厂和商店要因此而破产啊！

先生们，群众消费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工人如果比现在多消费一倍，那么，这不仅对他们，而且对你们都是好事。所以，你们看，在一切方面，你们的良方都不奏效，还会适得其反。

此外，先生们，你们还说，我们制造混乱，我们蛊惑人心，并且挑动人们对自己的命运不满。为了驳斥这一点，我不得不在此重复一下我的朋友德累斯巴赫最近反驳这个问题时说过的话。先生们，请允许我援引一段你们自己的报纸《福斯报》1893年1月26日说的话：

“不满情绪对国家领导人来说当然是不舒服的，而消除或减弱这种不满情绪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政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就象个人不可能达到无限的完美和探索赤裸裸的真理一样。不满情绪可以推动进步，是大自然要求人们进行的理性深造的动力。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伟大事件都是由于不满才产生的。如果都满足于现状，就不会有人去发现新大陆。如果满足于现有的知识，任何学者也不会为了弄清一个问题而彻夜不眠，埋头于书堆。如果满足于煤气，就不会发明电气照明。不满是运动的原则，而静止则意味着倒退和灭亡。”

先生们，有了你们自己的报纸说的这段话，我就不用再作进一步的解释了。

下面我要谈到施特克尔先生。施特克尔先生说，我们明知哥达纲领有问题，还要把它维持几年，以致使我们自己的追随者都感到失望。先生们，我们曾经公开声明，哥达纲领是一个妥协纲领，当时合并的党中有一部分党员仍然坚持拉萨尔的观点，我们是为了他们才维持这个纲领的，如果没有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个纲领

就不会存在这么久，12年前就会被取消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公开承认这一点，我们这样做也是有理由的，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在我们看来也是有缺陷的纲领，后来也没有提出一个比较完善的纲领。

施特克尔先生还感到恼火的是，我们要求给年满20岁的人，其中包括妇女，一句话，施特克尔先生所说的没有完全成年的人以普遍表决权。先生们，一个人年满20岁就有服兵役的义务，就是一位祖国的保卫者，所以我们说，他理应享受资产阶级的表决权。而年满21岁的人甚至可以声明自己管理自己的财产。施佩尔林议员，由于您持反对立场，所以我还要对您说，在瑞士、在法国还有在美国，年满20岁的人都行使选举权，如果在这3个文明国家，年满20岁的公民可以行使自己的表决权，甚至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不存在你们所害怕的那种被颠覆的危险，那么，我认为，在我们德意志帝国也能行使这种权利。

施特克尔议员先生说，为什么不也让5岁的人参加投票？他倒不如问：为什么不让婴儿参加投票？（大笑）

先生们，施特克尔议员先生接着还攻击我们代表的唯物史观是不公正的，是错误的，我在这里对这个问题只能说几句，他对我说，您在关于伊斯兰教的著作中，从什么地方推断出伊斯兰教渊源于唯物主义现象？您在基督教那里、在宗教改革时期又是怎么证明这一点的？有人说这一切纯属精神运动！先生们，我已经说过，我不能占用很长的时间，更不能占用这里的宝贵时间作关于历史哲学的报告，但是，如果施特克尔先生认真读了我关于伊斯兰教的著作，那他也就会发现，我曾经试图对伊斯兰教追溯到当时东方的唯物主义现象。如果施特克尔先生还要问，是否应把基督教的起因归功于唯物主义的时代现象，是的，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再说一遍，是肯定的。众所周知，在基督时代的罗马帝国和犹太王国，犹

太人在罗马人的统治下绝望挣扎，如果没有这种状况，没有当时统治世界的罗马帝国的惨绝人寰的压迫和奴隶制，没有遭受罗马奴役的各国人民的不满情绪和怨恨心理，那么，实在不可想象，基督教的宗教思想和社会思想能像它现在那样受欢迎。基督教思想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当时的被压迫者相信，基督教对他们来说不仅是说天国，而且首先是说一个新的世俗王国，是说从奴隶制和仆役制中解放出来，圣经中的许多地方也教那些不太会思想的人相信，首先有的似乎不是天国，而是世俗王国。这里首先涉及的是妇女，她们在罗马帝国衰落的时候，由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生活极其悲惨，渴求解放，特别是罗马帝国的上层妇女，她们虔诚地信仰基督教。所以说，一方面是妇女，另一方面是无产者，这两方面构成了基督教的基础，是主要代表和主要传教者，同今天完全一样，无产者是一方，妇女是另一方，他们把社会主义传播到人民中的每一个角落，并帮助它走向胜利。（社会民主党人喊：说得好极了！）

宗教改革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如果旧的封建社会不像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那样土崩瓦解，要进行宗教改革是不可能的。只请你们看看15世纪发生的种种时代现象：旧的社会制度的彻底瓦解，尤其是贵族的贫困化，农民的被压制，新公国的崛起，旧的生产关系的衰败，所有这一切现象都促进了居民各阶层对彻底变革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渴望和追求。还有，先生们，农民在伟大的农民战争中提出12条的时候，路德表示反对，当时农民要求他根据圣经向他们证明，这12条同圣经有什么不同，难道这一切不极为清楚地表明，正是上述现象构成了当时宗教改革运动的物质基础吗？而王公们怎么样呢？他们由于兴奋站在路德一边的吗？不，他们是由于仇恨皇权，仇恨教会，要求把教会地产据为己有，而且已经据为己有才站到路德一边的。这就是他们支持宗教改革，迫使成千上万的臣民改信新教的原因。面对这些现象，施特克尔先

生认为可以登台了，并且说，这是一场纯粹的精神运动，根本不是什么物质原因和社会动力！不，这场运动只是由于物质原因和社会原因才产生的。但是，当路德看到王公们站到了自己一边，就立即放弃原来的革命立场，因为他认为，只要王公们站到他那边，他就能完成宗教改革了。

还要我继续谈谈胡登^①和济金根^②对封建主的进军吗？谈谈他们的动机和他们所作的争取路德拥护其主张的企图吗？是什么东西在其中起了作用？那就是赤裸裸的阶级利益和等级利益，他们设法争取他，是为了同他及其拥护者一起顺利地战胜王公们。这就是一个题目，如果我们要讨论的话，这个题目抑或能证明，一切事物都不是象诸位所认为的那样，是什么自发的。

先生们，使我最感兴趣的是，李希特尔议员先生在他的论述结束的时候一改以往讲话时的激昂语气，而唱起了悲悲凄凄的挽歌。他在最后说：这成何体统？你们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已经把我们撵出了这块地盘！可能在下次选举时，你们还要把我们挤到这座房子的中间去！但是我还是要控告你们社会民主党人，资产阶级四分五裂，不再忠实于原来的自由旗帜，今天我们已不再可能实现我们早在数十年前就希望实现的自由目标了，在这方面应当怪罪你们社会民主党人。——先生们，这一切都是正确的。为什么正确？因为社会民主党诞生了，而且日益壮大，所以，资产阶级由于害怕社会民主党的目标，就收起了它原来的纲领，放弃了它原来的要

-
- ① 乌尔利希·冯·胡登（1844—1523）——德国人道主义诗人，宗教改革的拥护者，德国骑士等级的思想家之一，1522年至1523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编者注
- ② 弗兰茨·冯·济金根（1481—1523）——德国骑士，曾参加过宗教改革运动，为1522至1523年骑士起义的领袖；拉萨尔曾以他为主人公写了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编者注

求，以致它正在日益变成保守派。这是在我们的资产阶级中出现的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非常自然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无疑是有责任的！但是，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因为害怕我们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反动，就因为如此叫我们不当社会民主党人吗？我们不这么想！这等于叫我们这个党自杀。现存的每个党派都有权生存，而每个活着的党都有关心自身发展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党奋斗，你们当然也可以为你们的党奋斗！我们将拭目以待，看谁走得最远。

如果你们面对我们，不能维持旧的政权，那应当怪罪你们的社会条件和发展，不应当怪罪我们，我们是这个发展的产物，这种发展的果实，更不能在这方面抱怨我们，把这看成是一种不幸。我们认为，出现这种事情是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我们不愿意说，自由派一事无成，我们就高兴，相反，只要你们提出自由主义的建议，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予以支持，而且将来还要这么做，因为我们认为，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存在这么久，我们对一切都表示赞同和支持，这一点就适合于改革这个社会，并在政治方面也使它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在这一点上，你们看，我们的观点又是实事求是的。我们深信，这件事一定要由我们来做，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达到其发展的顶点以前，在它寿终正寝以前，社会主义的社会限制不可能到来。因此我支持、赞同、欢迎自由派提出的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和自由的建议。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妨碍我们争取和设法争取本党的拥护者，从而使提前取得政权，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这种发展将给自由资产阶级带来一场灾难，我们不能改变这一点，我们只能从某一观点出发，对一切与这一发展有关的现象表示遗憾，这就是一切。我再说一遍，归根到底，李希特尔先生指责的发展过程决不是我们社会的灾难和弊端，而是进步，所以，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未来。先生们，如果你们还想同我们继续斗争，那我们奉

陪,我们在菲力浦^①那里再见。(社会民主党人热烈鼓掌)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文选》1981年
法兰克福版第1卷第271—328页。

(蒋仁祥译 葛斯校)

① 古希腊的大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狄摩西尼对马其顿王菲力浦二世发表过多次弹劾演说,通称痛骂的演说。这里的意思是发表攻击演说时再见。——编者注

在第二国际苏黎世 代表大会上的两篇讲话

(1893年8月7日)

在论证我和我的朋友们的提案之前，先回答兰道威尔的个人质问。兰道威尔昨天在德国代表团会议上严重警告从德国来的各个协会的代表不要参加代表大会，因为这样做会同现行的法律发生冲突，并且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兰道威尔：这不是事实)您假装不知道您昨天在发言中讲过这些话。(热烈赞同)我仅仅表示了我的惊讶：一个平时喜欢自诩为最激进的人，在这里讲起话来却像一个警察。根据兰道威尔今天的发言来看，我的这种观点没有什么要改变的。(鼓掌，无政府主义者激烈打断他的话)关于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已经了结。

兰道威尔今天的讲话有一个作用：这个讲话使我相信，布鲁塞尔决议的文本是可以作种种解释的。在布鲁塞尔每个人当然知道，对所谓政治行动应作何理解。但是为了避免发生任何误解，我同考茨基、阿德勒、朗·爱德华兹、李卜克内西提出了上面宣读过的提案。

我们的态度是从经验中得出来的。把无政府主义者同我们分开的是原则性的对立；我们的立场是如此不同，以致每次讨论都是多余的。在所有原则问题上的尖锐对立使允许无政府主义代表参加将只会带来一个后果：浪费时间和最终使代表大会的讨论毫无结果。对工会的提示是毫无意义的，所有的工会都是立足于阶级

斗争的基础上的；它们都同意使用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能保证它们获得胜利的一切手段；它们也都一致同意用政治斗争来实现它们的要求。正是英国工会多年来通过它建立的议会委员会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凡是在它相信靠它自己的力量不能够实现它提出的要求的地方，它都在利用议会主义手段和立法机构。

前几届代表大会都采取了这种立场；不管巴黎代表大会决议还是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在劳工保护立法问题（八小时工作日、禁止使用童工和禁止夜间劳动等）上，所有这些决议都是在它们应该得到实现、而只有通过立法道路才能实现的前提下拟定的。如果所有这些要求构成我们的讨论的基础，如果我们商谈的目的就是夺取政权的方法和途径取得一致意见，那么这班先生们在这里就什么也捞不到了。

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只有这次代表大会才必须对政治行动的手段做出决定，因为荷兰人也对议会活动提出了抗议，这是不正确的。当然我们同荷兰人有分歧，但是在有一点上我们同荷兰人有共同的基础。荷兰人没有根本拒绝参加普选，而且他们的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就是以争取普遍的、平等的政治选举权为目标的。我们之间的分歧点仅仅在于参加议会斗争的规模。

无政府主义者是另一回事。他们拒绝参加任何议会斗争；哪里有普选权，他们就放弃使用它；哪里需要为工人阶级争取普选，他们就进行抵制，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多余的。

在这种原则性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我们德国人决定结束辩论。要知道，先辩论3天，然后再请这些人出去，因为他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人，这肯定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兰道威尔：您特别想把们赶出去，因为我们使您不舒服！）我们德国人当然希望你们在这次代表人会上没有任何发言权。你们可以为自己召开一个特殊的代表大会，就像那些持基督教——社会观点的人所召开的单独的

代表大会一样。在这方面正如我们在右边已经划了一条分界线一样，我们同样决定在左边也划一条分界线。

今天当这班先生们尽量把无政府主义者排挤到次要地位时，他们就冒充社会主义者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或“独立派”的先生们究竟想干什么呢？他们没有共同的立场，没有共同的原则，没有纲领，也根本没有共同的名称；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意见。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作斗争。读一读他们的报纸，就会获得这样的印象，好象资产阶级根本不存在，他们的头号敌人是社会民主党。我们不能同这样一个宗派进行讨论，我们必须明确和坚定地说出来，谁可以参加代表大会和谁不能参加。

（倍倍尔的讲话一再被响亮的掌声所打断，讲话结束时受到代表们和旁听者的非常热烈的鼓掌欢迎）

（1893年8月11日）

我的朋友阿德勒在开始阐述他的观点时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委员会中多数人的意见是，必须把布鲁塞尔决议的措词修改得更尖锐一些，因为有些国家很容易规避布鲁塞尔决议，这也是针对德国而言的。在布鲁塞尔对休假日作了决定，只要有可能就照此执行。人们是从这样一种想法出发的，即必须区别各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因此必须保证各个国家有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庆祝五一节的形式自由。当然不管是在本国同志还是在外国同志们中间，对在个别场合选择什么样的庆祝五一节的形式会有不同看法。但是应该相信每个国家，对必须作出什么样的决定自己能做出最好的判断。在阿德勒也参加了的德国党代表大会上，深入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以223票对6票做出决定，不考虑在5月

1日停止工作。大会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党代表大会也指出，停止工作是庆祝的最隆重的形式；至于是否能做到这一点，每年的党代表大会都要根据当时的具体的政治情况和经济情况来做决定。因此这里不存在原则性的对立，但是我们必须保留自己决定停止工作还是不停止工作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同意所建议的决议案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同重申布鲁塞尔决议的第一部分有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在布鲁塞尔曾明确承认，每个国家有权自己决定庆祝的形式。他们今天重申这个决定，但同时又要每个国家承担义务，以完全确定的形式进行庆祝。这是不可想象的。这个问题是怎样付诸实践呢？假定在一个集会上一小部分人决定停止工作；绝大多数人表示反对；党代表大会则做出了与此相反的决定。结果会怎样呢？根据这个决议多数人必须服从少数人，必须违反真诚的信念去执行人们认为是错误的、有害的决议。这恰恰是违反党的纪律的。党对此不仅要承担道义上的而且还要承担财务上的责任。成千的工人将失去生存手段，流落街头；另一些工人将由于违反合同而受到法律惩罚。（奥地利人喊：我们那里也是如此！）1891年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制定了一条法律，根据这条法律，成千的德国工人还要受罚而损失整整一周的工资。那时我们有义务从物质上补偿所有这些损失。（其他国家的代表喊道：不，不！德国人喊道：是这样！）

如果德国做出停止工作的决定，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以庄严的形式贯彻这个决定。于是就会发生一场在世界其他国家不会出现的同资产阶级和政府的战斗。如果我们接受这场战斗，那么我们也想自己选择进行战斗的日子。（热烈鼓掌）

奥地利人抱怨我们说，由于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给他们的斗争造成了困难。这一点我始终承认并表示极大的遗憾。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自己，不能仅仅为了减轻他们的斗争困难而使

我们自己的党及其生存利益遭受最严重的损害。像他们一样，我们在这方面也必须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有自己的经验。1890年有一个城市——那里有我们党的最遵守纪律的同志，他们拥有最严密和最强大的组织以及最丰富的资金——试行在5月1日停止工作。这个试验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时也使我们获得一个教训：付出的代价不仅和已取得的成果而且和可能取得的成果是绝不相称的。我讲的是汉堡，其他各地也是如此。

还有一点：德国有75万在铁道、邮电和矿山等部门工作的国营企业工人。这几十万人由于那里规定的纪律，不能贯彻这样的决议。另一方面，在德国有一些大区，我们党在那里很强大，但是由于就业条件特别困难根本不能要求工人停止工作。

德国代表团中最多只有几个代表赞成这个决议案。特别是决议案的第三点，即用“社会革命”的手段来消灭阶级差别的提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接受这个提法，许多德意志邦庆祝五一节的活动在法律上就完全通不过。（鼓掌）

译自《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4年苏黎世版第7—8、33—34页。

（李俊聪译）

在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896年)

倍倍尔(受到雷鸣般掌声的欢迎):在饶勒斯的精采发言之后,他^①再来详细论述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和参加选举的必要性,就是多此一举了。他要求发言不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是为了根据德国党25年来在选举中获得的经验反对亨尼西的提案。他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没有哪一个党像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从它在战场上出现之日起就始终不渝地和毫不动摇地站在斗争中。25年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就获得了选举权,这不是由于本身的力量,而是由于德国的政治发展。当时在整个德国没有哪个人表示反对参加竞选。正是由于参加了政治行动,特别是由于参加了政治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从小群受轻视和受诽谤的人发展成为帝国中最强大的一个政党。它拥有175万张选票!这一成就简直使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目瞪口呆。在德国,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为工人阶级所取得的一切,都是通过社会民主党、通过它的政治行动、通过它的政治影响而取得的。因此德国工人阶级根本不理解放弃选举的要求。他们的口号是:更多的选举!越频繁越好!为什么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要把立法议会任期由3年延长到5年?是出于对工人的热爱吗?不,是出于对工人的恐惧,是因为害怕选举宣传所带来的人心激动和启蒙作用。资产阶级政党希望尽量少举行竞选。如果

^① 原文如此,记录按第三人称整理。——编者注

我们接受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对选举权丝毫不感兴趣，那我们就会正中敌人的下怀，他们会搂着我们的脖子用工人还从来没有受到过的那种夸奖之词来夸奖我们。因此，我们的要求不是放弃选举权而是扩大选举权。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我们执行无政府主义者的弃权政策，我们将会为谁的意图和目的服务。在萨克森我们掌握了全体选民的多数，政府和资产阶级党由于害怕社会民主党，便剥夺了它的选举权。如果敌人是这样来判断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价值，难道我们还应该放弃它吗？这将是最大的政治错误。

现在还要向英国朋友说几句话。亨尼西的提案对德国工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讲话人说，较长一个时期以来，德国工人阶级遗憾地看到，英国工人中有很很大一部分人还在被资产阶级党牵着鼻子走。他要求他们组织起来，独立地投入斗争。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在英国就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走在你们大陆兄弟的前面，社会主义的旗帜就会胜利。（英国代表们欢呼这个讲话）

译自《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6年柏林版第19—20页。

（李俊聪译）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 代表大会上的结束语(摘录)

(1899年10月13日)

如果要我用几句话大致描述一下辩论的实质性部分给我的印象,那么,我可以这样说,在已载入纲领的我们的原则性见解、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的基本要求上,党代表大会是没有不同意见的,在最终目的上,我们也是一致的;至少没有出现过任何意见可以令人产生与上面相反的想法;我这样说恐怕没有人会反对。说到我们为实现我们的载入纲领的任务而采取的手段和途径,关于它们的效果和意义当然是存在较严重的意见分歧的,而且将来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特别是伯恩施坦的小册子关于合作社的见解,即其中所说的合作社对于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意义,遭到了党代表大会大多数人的驳斥。但是,这些观点是允许争论的,它们无论如何决不会损害我们党的原则。

但是其次,辩论也表明,关于首先引起党代表大会上的这场讨论的那些问题,伯恩施坦在他的著名著作和在其前后发表的文章中所阐述的意见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发言人(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的完全赞同。相反,我们当中站在伯恩施坦一边作战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明确地说,他有时在这一点上,有时在那一点上(其中一部分是很重要的论点),不赞成伯恩施坦;特别是,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发言人哪怕只是试图证明,他赞同伯恩施坦在其小册子中就我们对资产阶级或某些资产阶级的态度所发表的意见。这一

情况也说明，大多数发言人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投票反对倍倍尔决议。因此一致通过决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承认，在我起草我的决议时，一开始我就在心里说，讨论的结果可能是这样的。在我动身到汉诺威来时，我甚至还想到，即使伯恩施坦本人声明可以赞同这一决议——哪怕象奥艾尔昨天所暗示的那样，有一些我不十分明了其含义的小小的指责——那也丝毫不令人奇怪。我得坦率地说，现在我对伯恩施坦的态度是：他的任何言行都再也不会使我感到惊奇了；这一点我在我的发言中也很明确地说清楚了。

但是，我当然认为，尽管伯恩施坦分子——姑且保持这个集体名称——能赞同我的决议，但是，这对于伯恩施坦来说，肯定要比对于那些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的人困难一些。

我的决议一开头说：“资产阶级社会迄今的发展没有提供理由使党放弃或者改变它对这一发展的基本观点”，这句话是同伯恩施坦在他的书中阐述的看法针锋相对的：如果他说他接受这句话，他就是放弃了他的观点的基础（大卫：完全错了！）。如果他也赞同一系列其他的论点，那么人们最后要问：为什么吵吵嚷嚷呢？如果整个事情徒劳无益，如果我们都是一条心，那为什么要感情激动呢？

我的决议的第二点——这一点直接针对伯恩施坦——中写道：“党一如既往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根据这一立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根据伯恩施坦在他的著作中阐述的关于资产阶级的全部观点，他必然合乎逻辑地得出他在《前进报》的那篇著名文章中也提出过的观点，他说：这一句是错误的，只能说“首先是”。但是，我之所以经过考虑并且故意同伯恩施坦的看法针锋相对地把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这句话写进了决议，正是因为我想要联系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

说清楚，尽管我们欢迎和喜欢其他阶级的人投向我们，工人阶级的解放毕竟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因为这关系到一次阶级斗争和解放一个阶级。如果伯恩斯坦也赞同这句话，那么，在将来有一天要对纲领进行修改时，无论如何再也不可能有某一方面会对这句话今天在纲领中的写法提出怀疑。

但是，我也要说明，我的第三段的论证肯定使伯恩斯坦难以赞同。不过，论述经济合作社意义的第四段的情况则是十分特殊的。在这一点上他的朋友们对他极尽歌颂之能事，似乎他有了什么划时代的发现，就是说发现除了作为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党和工会外，还有经济合作社这一个具有同等价值的阶级组织，它一定会从各方面教育工人阶级，以便象他所说的那样，加强工人阶级的经济权力，使工人阶级争得经济权力，从而更加易于夺取政治权力。但是现在我不仅说，党对合作社是采取中立态度的——这一点伯恩斯坦的确是赞同我的——而且进一步说：“党认为，如果具备必要的先决条件，建立这种合作社是能够改善社员的经济状况的。”——这一点不可能有人反对，即使这种改善很少，即使按照王德威尔得的说法至多占工资的百分之八。但是，我进一步明确地说，我们不能认为合作社同工人用以维护和促进其自身利益的其他组织有什么两样，我们不能认为它们对工人阶级摆脱雇佣奴隶制的枷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极其尖锐地表述了对伯恩斯坦关于合作社的见解的反对意见，如果伯恩斯坦在这一点上也说他可以同意，那么我就用得着人们平时在大吃一惊时常说的那句话了：这就叫人摸不着头脑了！

最后，如果我说，我们既不改变我们的基本观点和基本要求，也不改变我们的策略，也不改变名称，那就是说，我们不会成为伯恩斯坦所期望的那样一个民主的改良的社会主义政党，我们不会对我们党（它是一个革命党！）迄今的本质采取原则性的对立态度；

要是他对这些在我看来是棘手的建议也作了让步，那么人们再也不能设想比这更加不知羞耻的行动了。决议的结尾还多余地强调说，我们坚决拒绝旨在掩饰或者改变我们对现存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任何尝试。如果说以“掩饰”一词来评价伯恩施坦一书的内容不符合伯恩施坦的追随者的心意，那么，他们毕竟不得不承认，他费了很大的劲在他的书中用很大篇幅来证明，我们必须基本上改变我们迄今对资产阶级政党或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态度。如果伯恩施坦连决议的这一点也承认，那他就是说：我抛弃了我在我的册子中所阐述的一切论点，我回到你们这里了！而我就要说，一个悔过的罪人比九十九个守法的人更使我们高兴这句话对我们也是适用的。但是，曾经为伯恩施坦的行动大喝其采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人士弗兰茨·奥本海姆之流、纳普哈埃尔·迈之流、研究社会政策的教授们、《法兰克福报》，他们现在就会由于伯恩施坦的最新声明而陷入窘境。现在他们要进退维谷了。

选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1981年三联书店版第277—280页。

工会运动和政党*

(1900年)

工会的历史

为了能够正确评价今天德国工会事业的现状和矛盾,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工会的产生和发展。德国工会事业的形成过程同英国的有着本质的区别。英国的工会起源于英国工人同企业主的阶级斗争。在它的摇篮边,没有指导助产服务并使之受到保护的政党。德国的情形完全相反。在德国革命年代产生的工人运动还在它意识到自身之前就由于1849年下半年开始并持续到50年代末的反动时期的摧残而夭折了。因此,设在法兰克福的联盟议会,也就是以德意志同盟联合起来的各邦政府的代议机构决定,永远禁止工人协会,尤其是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的工人协会就是多余的了。后来颁发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前身也就是这个决议案。

* 从1890年首次举行“五一”游行起,在德国各地不断举行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工人运动蓬勃开展,工会的作用日益显著。同年11月,组成了以卡·列金为主席的德国工会总委员会。此后,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成了党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列金为代表的意见,他们提出党应当隶属于工会。另一种则是以倍倍尔为代表的正确意见,争论的焦点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阶级政策,还是坚持经济主义的改良政策。这一争论持续多年。倍倍尔先后在1893年和1900年就政党同工会分离问题发表过意见。他在本文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本文的引言和附录部分从略。——编者注

但是，当50年代末政治假死告终时，资产阶级开始在政治上蠢蠢欲动，并率先在民族协会内为自己创建了组织，这时在工人阶级中局面也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大工业在反动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创造了数量可观的现代工人阶级。就是德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自由派，也清楚这个事实。工人刚刚开始活跃，并着手建立协会，在1860至1863年，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普遍出现，于是，自由派代言人也试图把这些协会据为己有。他们甚至带头建立协会，表现得十分卖力，以便掌握各协会的领导权，并防止协会成员出现某些危险倾向。在革命运动年代，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和魏特林主义的宣传名声大作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对那些处于反动年代压力之下政治上全然无知地成长起来的一代工人来说，还是陌生的；而在较老的一代中，几乎遗忘殆尽。但是，资产阶级却牢记在心，并且尽可能防止这些思想卷土重来。

但这样做是徒劳的。1861年2月建立了莱比锡工人协会（职工教育协会），其中的激进分子弗里茨舍、瓦耳泰希以及罗斯梅斯勒教授和达梅尔博士等人坚决主张该协会是一个独立的进行政治性活动的组织。但协会的多数人反对他们的主张，于是造成了分裂局面。新的协会（前进工人政治协会）成立了，后来从中选举出工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同拉萨尔有联系，并且从他手中得到了要求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那篇著名的《公开答复》。后来，1863年4月，这个《答复》导致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建立，德国第一个社会民主的政党就此问世了。为了同全德工人联合会对抗，在自由派和民主派领导下的工人协会一致要召开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大会。

直到这时为止，在两大营垒中大都还谈不到工会组织。但是，在1864年至1866年期间居统治地位的商业景气，却导致了一系列的停工事件。而这些事件的进程是凶多吉少的，这就向工人们表

明,除了至今一直存在的政治组织之外,他们同时还需要一个支持他们的经济要求和斗争的组织。于是,1864年在汉堡的劳恩斯坦车辆工厂爆发了大罢工,接着布尔格的织布工,汉堡和阿尔托纳的乐器工和木匠,汉堡的水暖工、制篮工和木器旋工,莱比锡的排字工和制鞋工等相继举行罢工。必不可少的支援是靠十分有限的公开捐助得来的。但由于当时还有不少限制集会的禁令,所以这些活动多次导致诉讼案的发生。上述几起罢工是首先导致在德国一些城市建立这种专门组织的原因,例如莱比锡的印刷工人就是这样。不过同时也建立了第一个遍及整个德国的联合会,即全德雪茄烟工人联合会,它是由弗里茨舍在莱比锡建立的,并立即开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弗里茨舍本人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优秀成员,因此参加他创建的协会的雪茄烟工人乃是当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精华。因而,这第一个德国工会联合会就带有典型的社会主义倾向。不过,印刷工人联合会的情况却完全两样。它建立于1866年,在政治上严守中立;在涉及要首先发难的普遍运动时,态度暧昧。

1866年的德奥战争开始造成工资运动的中断,但在以后几年这一运动又变得更加活跃了。不过,有人把全德工人联合会(1868年是这个组织的极盛时期),尤其是把工会运动视为有害于政治运动的障碍和涣散剂。相反,联合会的其他成员又仿效弗里茨舍的作法竭尽全力促进工会运动的发展。于是有柏林的吕布凯尔特和科伦的绍波,前者于1867年组织成立了德国木工协会,后者则是德国裁缝协会的创始人。但联合会的多数成员是不赞成工会运动的;他们坚持拉萨尔的纲领,即认为唯有政治运动才能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其余一切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剂,会分散力量。因此,在1868年夏季举行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他们否决了组织罢工的提案。相反,他们却同意身为帝国国会议员的弗里茨舍和施韦泽

(联合会主席)到柏林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全德工会联合会,从这个联合会的领导和组织方面看,它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附属组织。弗里茨舍和施韦泽的行径不是个别的。就在这两个人成立所谓的工会联合会的同一个时间,麦克斯·希尔施和麦克斯·敦克尔建立了德国职工协会,从它的创立者的政治地位来看,它应是进步党附属组织。另外,1868年秋,在莱比锡建立了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领导机构。在这期间联合会转向了社会主义阵营,即转入受上述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领导人影响的国际职工联合会一方。就象形形色色的工人政党一样,现在倾向各异的工会也在互相斗争,试图互挖对方的墙角。工人进行的这种活动总是带来影响的,1870年企业主建立了第一批对抗组织,这样做的有一部分卷烟和雪茄烟厂主、机器制造厂主,以及翻砂和炼铁厂主等。

这期间,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敌视工会的人继续不断地增加。因此,特耳克于1872年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工人救济联合会(1868年建立的全德工会联合会就叫这个名字),解散同该联合会有联系的各工会组织。这个建议之所以在决议中得以通过,是因为决议特别告诫人们不要用牺牲政治运动的办法来开展工会运动。翌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又重复了上述决定,并在1874年于汉诺威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按照这一决议,那些违反代表大会历史决议把工会运动提高到工人运动首位的人,被谴责为工人阶级的叛徒,因为这样做就会不负责任地损害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鼓动工作。据知情者说,尽管施韦泽在1868年根据弗里茨舍的建议召集了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并帮助建立了全德工会联合会,但他是心怀极其复杂的情感来面对着方兴未艾的工会组织的,因为他感到这些组织也许会渐渐脱离他的影响。相反,在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的

营垒中，人们对工会组织的态度却是另一个样子。在这一方，木匠约克是工会运动原来的领导人，他在爱尔福特举行的工会代表大会上（1872年6月15—17日）授意作出一项决议，并获得一致通过。这项决议说：“鉴于资本势力对所有工人，不论是属于保守派的、进步派的、自由派的或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都进行同样的压榨和剥削，大会认为，工人的神圣义务就是丢掉党派偏见，站在统一的工会组织的中立的立场上，来创造效果显著的强有力的反抗运动的先决条件，维护受到威胁的生存，争取改善工人的阶级状况”。此外，决议还特别要求社会民主工党不同的议会党团应当促进工会运动，并针对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作出的相反决议（上面已提到）深表遗憾。可以肯定的是，过去在社会民主党的部分党员中对工会有过不友好的情绪，这种情绪使工会认为党对工会支持不够。几乎30年来，站在由社会民主党创建的工会一方的人一直认为，党有义务以各种方式支持工会的活动。社会民主党1890年在哈雷、1892年在柏林、1893年在科伦等地召开的历次党代表大会都证明了这一点。而站在党一方的人则把工会——尽管它应当履行特殊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看成是为社会民主党准备的新兵学校，因此，有些人出于这种原因支持工会。起初我本人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去对待工会的。

后来，在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两派即全德工人联合会和1869年在爱森纳赫建立的社会民主工党在哥达实行了合并，这一合并也涉及到双方的工会组织。当时仍然存在的政党分裂状况同样也对社会主义的工会运动产生了不良影响，全德卷烟和雪茄烟工人协会的主席弗里茨舍的态度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保存协会，自爱森纳赫派成立以来，他认为有必要严守中立，尽管他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忠诚拥护者。他的协会的成员们也是分属两大社会主义营垒的。

就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之后,过去分属两大营垒的工会领导人召开了一次会议^①,目的是合并工会。在这个时期特耳克放弃了他敌视工会的立场,因为由他提议的一项决议获得了通过。这项决议说:尽管工人的工会组织没有能力彻底和持久地改善工人的状况,然而它总是适于暂时提高工人的物质状况、促进教育并使工人对自己的阶级状况有所觉悟的。因此,加入工会可以说是每个工人的义务;或者说,假如一个企业中还没有这样的组织联系,那么,建立这样的联系,就是每个工人的义务。

另外,这次会议还作出决定:工会同志们的义务在于使工会组织远离政治,但他们有义务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合并后的名称),因为只有这一政党才有能力使工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完全与人的尊严相适应。

恰恰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把工会当成政治团体加以迫害的事,而且首先发难的就是萨克森王国。那里对李卜克内西和我本人在莱比锡叛国案中所做的判决,在有组织的工人中间引起了愤慨,在报纸和集会上爆发了出来。萨克森当局对此的答复是,他们的行动是针对政党和工会的,并把个别地区的有组织的成员视为独立的政治团体而加以驱散。

第二年(1873年),俾斯麦也试图向工会运动开刀,所以他在国会提出一项法案,要对撕毁合同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但他在那里没有受到青睐。相反,他发现特森多尔夫^②似乎是可以实现理想的工具。特森多尔夫在马格德堡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以普鲁士

① 指1875年3月在汉堡召开的工会全权代表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各工会合并成一个中央联合会的问题,并制定联合所有工会的组织章程草案等。——编者注

② 海尔曼·恩斯特·克利斯提安·特森多尔夫(1831—1895)——普鲁士检察官,1873年任柏林市法院法官;1885年为柏林最高法院刑庭庭长。——编者注

检查官身份初露锋芒。1874年他从马格德堡被调往柏林，任柏林市法院法官，并在第七代表团的成员那里发现了意气相投的人。

特森多尔夫同萨克森的法官一样，认为工会与普鲁士的结社法彼此矛盾。第七代表团的法官们和柏林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庭则附和他的意见。于是，解散工会并没收出纳处等措施被提上日程。工会则试图利用把会址迁出柏林和普鲁士城市以外地区的办法来逃避上述迫害。但这只是延缓时日而已。1878年10月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它把10年艰辛劳动而又付出巨大牺牲换来的一切以危害国家为名无情地镇压了下去。虎口余生的只有印刷工人联合会和造船工、制革工、裱糊工、皮革工的工会。希尔施—敦克尔的工会各协会也安然无恙，它们被认为是忠于国家和企业主的。自从颁发非常法以来，这些组织强制自己的成员写下保证书，保证绝不加入社会民主党的类似组织，这可以称得上是强奸民意的最无耻的手段之一，因为在这些协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的是自由派。

印刷工人联合会之所以能够长期苟延残喘，是因为它屈从于冯·普特卡默先生为纪念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强加给它的不光采的枷锁，这一点救了它的命。该联合会把会址从莱比锡迁到了斯图加特，试图用这一方法逃避莱比锡警察局的刁难。而冯·普特卡默先生竟以把它看成是保险机构，并且受普鲁士保险法的制约相威胁，如果它不接受下述条款的话：1、将会址迁回柏林；2、不得选举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为领导人；3、当局有权批准理事的人选。该会则降身以从，这件事显然在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疑虑。

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以后，早在该法实行期间就已经活跃起来的工会运动，又开始发展起来，尽管争夺地盘进展还很缓慢。在短暂的经济振兴之后，1890年开始的工业危机一直持

续到了1895年,它是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与此相反,工会则有人认为工会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党内一部分人和党的领导人对工会抱着冷漠甚至敌视态度造成的。因此,他们就这个问题的谈判磋商屡见于上文提到过的90年代上半叶的党代表大会上、报纸上和集会上。但是,随着1895年开始的、直到今天仍然持续着的经济大繁荣的到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自那时起,工会有了空前的发展,因而引起了一部分工会成员在认识上的大转变,以致于在这部分人头脑中似乎工会活动成了工人政治的关键,政治活动和党反而成了次要的和附属的了。

另一方面,这次工会大发展的原因还在于,天主教和基督教工人协会的领导人认为,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在他们的所属部门也要建立工会组织。这样一来,就导致工会运动的不断分裂。但是,为了取得成功,工会运动比其他任何运动都更加需要统一和团结。因此,这就向工会提出了十分重要的问题:应当怎样对付这种分裂以及实现统一和团结。

工会今后的任务

为了生存,工人被迫将自己唯一占有的商品,即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企业主。他们需要一份工资,以便也能满足家庭——工人有一个家庭——的日常需要。由于工人是按照固定的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同时出卖了自己。工人会变得不自由,而其他商品出售者则不会如此。另一方面,工人商品的价格也象任何其他的商品价格一样,是按照他们寻找工作的部门中的供求关系这一规律浮动的。企业主的利益在于把工资尽可能压低,把工时尽可能延长;而工人的利益则在于挣得尽可能高的工资,尽可能短的工时。两者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

实际上，高工资并非长工时，而是高工资短工时。在某个企业中，通常的工时愈长，工资愈低，反之亦然。这是一种社会规律，其有效性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例子得到证明。原因在于：工人通常的工时愈短，他们就愈成其为人；愈成其为人，他们贡献就会愈多；他们能贡献愈多，则需求也愈多。

但是，单个的工人面对企业主来说是无能为力的。任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善自己状况的企图，通常都以失败而告终。假如他不首先采取顺应的态度，则遭到解雇，这不是罕见的现象。暂时改善一下劳动条件，也就是生活条件的唯一可能性，另一方面抵制劳动条件即生活条件恶化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同和自己一样的人，同职工同志联合起来。因此，加入工会对每一个工人来说都是生活的必需。工会奋斗的目标是：按照劳动市场的比例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取消加班，假如万不得已，必须支付较高的加班费；在企业中创造与人的尊严相称的状况；提供法律保障；支援流动短工；救济失业者；此外，工会还同缩减工资、延长工时作斗争。一句话，同劳动条件的恶化作斗争。工会还要加强团结意识的教育，因为没有团结的意识，就不能达到任何伟大的目的；工会为了斗争和救济的需要筹集必要的资金；假如工会没有其他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就组织停工和抵制运动。

工会的任务和目标完成得愈彻底，就显示出工会愈强大，也就是说，来自同一劳动部门的劳工同志加入工会的人数愈多，则工会的领导机构就愈灵通，工会的资金就愈雄厚。然后，工会的道义力量也变得如此强大，以致许多在别种场合原可以向工人提出的苛求不得不中途作罢。单是工会的存在，就是对资本家的警告，提醒他们不要把弓弦绷得太紧。另一方面，既然工厂和企业雇佣的工人是不分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常常来自不同的民族，因此工会也应当在不考虑宗教和政治信仰，不分民族的情况下接纳会员。使所

有现在的职工同志都团结在一个组织中，这应当是工会政策的首要准则，因为假如不遵循这一准则，工会就不能或不能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但是，目前工会的分裂状况是违背工会政策这一最高准则的。自由工会、希尔施—敦克尔职工协会、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工会彼此对立。此外，还有一个作为独特组织的印刷工人联合会，一部分企业主组织还专门把他们的工人组成了竞争性的协会来与之对抗。这种分裂是对工会运动的巨大削弱，在不同阵营中日益占上风的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现象必定会阻碍工会运动的发展。那些错误地陷入分裂和互相勾心斗角的工人的无知和鼠目寸光会损害自身的事业；谁也不会奢望企业主们会有分裂和不和。企业主的这一例证尤其应当擦亮目光短浅的工人的眼睛，而且许多人已经擦亮了眼睛。

企业主阶级迫使国会通过伤亡事故保险法，因此受到伤亡事故职工联合会的支持。他们为自己建立的组织比工人的要团结牢固得多。上述企业主组织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包括了相应的职工联合会的全部人马，这是任何一个工人的组织都办不到的。这批企业主组织拥有一个待遇相当优厚的官员班子，拥有一个冷酷而警觉的维护自身利益的喉舌和手段，一般都大大超过工人组织的同类组织。另外，这些企业主组织都极善于利用国家权力和国家立法为自身服务，因此，它形成了一种普遍优越于最好的工人组织的势力。

一旦某个时期工人的组织和工人的团结感成为企业家们值得仿效的榜样，那么企业主很快就会超过工人。因此，假如工人组织另外还想要确保对自己的劳动条件施加决定性的影响，那么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工人必须团结一致对抗企业主，并通过这种团结一致把工人同志中那些迄今为止还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或还未下

决心站到哪一边的局外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来。鉴于即将在我们的经济关系中发生的转折，这样的一种团结一致尤其显得必要了。

在这个资产阶级世界上，继工业繁荣时期而来的就是工业的不景气时期。1895年开始的工业景气时期，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最高点，于是工业的不景气就开始了，有关迹象日益明显起来。不过这样一来工人的恶劣状况也就开始了，因为正如他们是景气的最后受益者一样，他们也是不景气的最先受害者，而且他们之所以受益绝大部分也只有通过斗争和节俭才会取得。但是，如果说在经济景气时期这还比较容易，因为先决条件是工人在自己的组织中表现行动团结，一致要求彼此妥协；那么在工业不景气时期要想保住所得或把损失限制在最小限度就十分困难了。对工人来说，工会在工业不景气的时期比在景气的时期所起的保护作用更大。没有工会，工人就会迷失方向，而企业主就会猖獗肆虐。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工会的团结一致是十分必要的。

不过，为了能够达到这样的团结一致，首先得弄清楚，迄今为止使工会陷于分裂的原因，并把工会的共同点，即为争取提高工人的物质的和社会的状况而斗争摆到首位。因此，这就要求停止一切地方的宗教和党派政治的论战，并进一步清除那些按照职业和社会地位本不属于工会的分子。因为工会是专门性的工人组织，所以，只有工人或为了工人的事业而由劳动岗位涌现出来的工人出身的人，或由于工人同志的信任而被推举到工会领导岗位的人，才可以加入工会。

只要工会还认识不到，它们应当取得前而讲过的彼此间的妥协，它们就不会达到团结一致，但那样一来，它们也就肯定不会成为它们本来能够成为的那个样子。可以预见，按照事态的发展状况不是一朝一夕就会实现这种团结一致的。但那时取代这种联合和统一的也许就是联合会了。一切别的形式都将随着时间而自行

发现。至于应在什么条件下缔结这种联合，那就不是本文的任务了。有关人士一定会最恰当地发现这些条件。

工会的其他任务或工会的政策

与其说我主张工会要脱离宗教的和党派政治的争论以及有过类似的企图，不如说这种要求几十年来早已成为工会同仁和朋友们的主张了。我仅仅回忆起上面已经提到过的1872年哥达^①工会代表大会和1875年哥达工会代表会议所作出的决议。不过，当时人们广泛认为应当建议工会活动家加入社会民主党，而我却不主张这样。理由之一是，这样一来同站在另一种党派政治立场上的工会活动家达成谅解的任何尝试从一开始就会化为泡影；理由之二，我认为这种作法是多此一举。任何一个象我一样的人，只要他坚信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发展壮大力量都具有战无不胜的威力，就会知道这些思想将日益占领整个工人阶级，尽管在工会中不是每天每日都有人宣讲和传播这些思想。国家和资产阶级政党对待工人的要求所采取的态度是担心辩证法在发展中会成为工人的权利，哪怕提出要求的是些没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当南德天主教纺织工人为十小时工作日向国会呈递请愿书，并且有一个上西里西亚博伊滕的天主教工人协会为了在矿山和冶炼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而向国会呈递请愿书时，只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竭尽全力地支持他们，就象国会上届会议的情形那样，这是很说明问题的。此外，请人们不要忘记，不论在任何地方，比如在社会改革领域，都得上这句谚语：食欲随饮食而来。在所有政党中，凡是下决心并且认为有义务最大限度满足工人阶级要求改革欲望的人，

^① 原文是哥达。实际上应当是爱尔福特。——编者注

首先不必把它说出来。人们只要对自己的事业有点信念足矣！

因此，我主张工会要脱离党派政治和宗教论争，但是，我赞成工会要更多、更热心地推行工人政治，即阶级斗争政策。

工会是工人的组织，它立足于现存国家和社会制度，是以提高工人状况为目的的组织。本文不去讨论今后工会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下应当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工会要使自己同它的任务相适应，可以通过下述两种途径：其一，要实现前面一段中已提到过的奋斗目标；其二，要通过国家和国家立法程序争取实现一系列要求，为了实现这些要求，作为工人组织的工会本身并不要掌握政权。例如，通过帝国立法在疾病、事故、伤残和老年保险方面就取消了工会的自由活动。但是，工会对立法的安排有极大的兴趣，所以有责任对此加以讨论，并提出自己的希望和要求。对工会来说，上述作法同样适用于结社权、集会权、联盟权（监禁方案等等）、保护劳工立法，特别关系到星期日劳动、正常劳动时间、夜班劳动、保护女工和童工诸方面。此外，下列事项也与工会密切相关，即关于家庭工业的立法，职工法院设施，劳动局和帝国劳动部的组织，矿山立法，生活必需品关税，商业和关税立法，在国家企业中的工人的状况：邮政和电报，军事和海军工厂，铁路，公路和水利建设，林业劳动等等，对农业工人的立法，迁徙自由和职业自由的问题等等。简言之，一切社会和经济的事务，即凡是涉及大多数工人或全体工人利益的问题，都应当纳入作为工人组织的工会利用报纸和集会加以讨论的内容，并表明自己的态度。

人们一定会承认，这是一个广阔的政治活动领域，承认所有上述问题都要从工人的阶级观点来加以讨论，而工会本身要为此作出保证。工会，尤其是工会的报纸更应该讨论这些题目，因为在自救的土地上没有工会本身能够插手变革和改良的任何手段。因此，在工会任务范围内开展政治活动乃是工会的责任。

工会力量的局限

工会拥有牢固的基础，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工会成员数以百万计，这种状况不会衰竭。但是，仍然有几百万人由于普遍的社会原因而在工会之外，没有争取到工会里面来，尤其在那些以女工为主或居多数的企业中情况更是如此。迄今为止，无论在哪里，只要还没有能够把大批的女工吸收到工会中来，似乎很少有成功的可能。目前，女劳动力的储备还不可能衰减；女工依其性别的原因而受其居住地及其周围地域的束缚；她们一般来说都生活在一个家庭之中，她们的劳动所得被认为是对家计的补贴；另外，她们大都缺乏训练，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婚姻会使她们失掉劳动的机会；最后，她们所受的都是顺善服从的教育。这一切都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而假如女工成了妻子和母亲（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女工人数逐年增加），对工会来说很不利于争取她们。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在家庭工业和家务劳动中的就业人员，这些人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他们也愈来愈多地同正规的工厂车间劳动发生竞争。他们处于这样一种条件下生存，在这种条件下，已经使组织力量的干预成了急需。但是，由于大家都明白的原因，由这些人员组成的组织往往是很不完备的，因而也是无力的。

工人中还有些人属于第三个范畴，他们的人数达几十万，目前，难以把他们吸收到工会中来，这就是在国营企业就业的工人。他们也开始组织自己的力量，不过，所建立的组织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对国家权力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很成问题的，并且迄今为止对于这一点没有得到过任何证明。上述情况在有些工业部门的工人中也是一样的，这都是一些重要的工业部门，其中的企业主们以辛迪加、联营、托拉斯的形式组成大型保护性团体，其目的一方面

是维持他们的商品的昂贵价格，并为此目的而调节生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对付他们的工人们，并给工人们规定劳动条件。这些企业主组织对工人的威力，就连维伯^①一类被称为工会方面权威的专家也是承认的；他们在《英国职工协会的理论 and 实践》一书第2卷第92—93页中说：“假如全部工业都掌握在大企业主手中，或者连少数的也没有落在竞争性的企业主手中——尤其是当垄断资本以某种方式防范新的对手时——那么职工协会就会发现，它的互相保险和缔结集体合同的方法就几乎等于无用了。比如，联合王国的大型铁道会社和美国的几个大型的资本主义托拉斯就是如此。面对这现代精怪施展不受任何限制的手段、牢固的环形垄断、绝对的意志的统一，就是最富有的职工协会的财产也只有25万（指英镑，1英镑等于20马克）。一、二十万工人的顽强和愤怒的呼号，就象用箭来射装甲舰一样无济于事……假如国家就是企业主，那么最强大和最富有的职工协会就象单个的工人一样是无法实现自己的要求的。”

维伯们在这里谈到的英国和美国的大企业中的情况，也完全适用于德国。请看一看象克虏伯、施杜姆、多特蒙特联营、劳拉冶金、符尔琪等等这些德国大型工业企业的情况吧，上述情况的正确性是不言自明的，暂不去说铁路和其他国营企业的情况。1894年，毕谢尔^②教授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政治协会的讨论会上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在会上说：卡特尔的下一个后果就是，在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中无时无地不是对企业主的一个巨大的支持。在一个卡特尔化了的工业中，整个企业主阶层就象一个唯一意志

① 悉尼·詹姆斯·维伯（1859—1947）——英国社会政治活动家、教授，温和派社会主义者，英国工党的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② 卡尔·毕谢尔（1847—1930）——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曾任卡尔斯鲁厄和莱比锡大学的教授。——编者注

坚强的人一样，立在工人面前。L·A·波勒博士在他的文章《实业企业主的卡特尔》中指出：通常，企业主的组织就象个别企业主胜过个别工人一样，要比工人的团体占优势。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势必产生以下的结果，即广大的工人（首当其冲的是农业工人，由于他们大量流入城市和工业区而引人注目）得不到工会方面的多少帮助。工人的这种状况，只有通过国家的和立法的措施才会有所改善，而这首先是工会活动家的责任，因为他们往往比需要他们帮助的人有更大的独立性和见地。此外，这也是为了工会的利益，因为工会应当使自己避开职位低下的工人迁徙的冲击。因此，凡是劝说不要参与政治的人，都会对工会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因为在单纯工会工作的范围内，工会不可能取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和必须达到的东西。尤其是要使工会的报纸在上述所有的政治问题上起到明确的宣传鼓动作用，这要成为工会报纸的任务，同时它也应当随时关注一般的经济发展、劳动和世界市场的关系、对经济生活具有重要性的发明和发现、政府和议会的社会政策、职业监督及其结果等等问题。

因此，工会的活动范围是广泛而巨大的，只要方法得当，肯定会硕果累累，必然有助于普遍的经济和政治的进步。

作为国家公民和党的成员的工会活动家

由于上述理由，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即如果说工会不应当搞党派政治，但是工会也许要从事工人政治，那么对于工会的个别成员来说，就会在他从事政治性的党派的斗争中出现无法相应表达自己信念的时刻。不过，他在这里不是以工会活动家，而是以国家公民的身份从事活动的。按照区选举、邦议会选举或帝国国会选举的不同情况，工会活动家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不仅是指

他作为工会成员而感兴趣的问题，而且是指日常出现的引人注目的问题，与他这个区或邦公民有关的问题，例如：国民教育问题，高等教育问题，宗教团体在教区和邦中的地位问题、交通事业、安全和警察制度、福利事业、管理体制、公共保健和贫困救济问题、刑事问题、维护公民的权宜问题、男女公民在帝国、邦和区的政治权利问题、农业政策和工业政策问题、商业政策问题、对外政策问题和殖民政策问题、军事和海军事业等问题。

现在，工会活动家，不管他是以选民身份参与其事，或是以候选人身份去博得选民的信任，都是以党的成员的身份出现的。因为，他只有在某个政党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即按照自己的心愿选举某个人，或者自身成为选民心目中的人物。

至于他想加入什么党派，这是他自己的信仰问题；工会无权过问他的政治信仰，工会也无权规定他除了工会之外还应该加入什么党派。假如双方的工会都能用这种宽容的尺度行事，那么工会的未来必然是令人欣慰和兴旺发达的。针对那些尚无法习惯于工会的这种表态的人，我要提一提每一个强大的工人运动的敌人的态度，这是按照我的老原则行事的，就是先听一听敌人在讲些什么。他们毫无例外地反对我们的作法。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证据，证明我和同我持相同观点的人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最后，我还要对党内的我的批评者说几句话。我有意在这里避免谈到他们对我的见解的异议。我无意挑起害多而益少的论战。在我看来，争取工会的统一和团结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尤其因为这是产生自运动的内在本质的必然结果。我讲这番话并非出自我个人的原因，而是应人之请就这个题目发表我的看法的。我同样坚信，还没有这样令人信服之舌和如此犀利之笔能够长久地说服不同倾向的工会成员，使他们相信，他们的短处，在他们的天敌即企业主阶级那里却表现为最大的长处。

面对资本主义集中化倾向，工人阶级必然也要集中在组织当中，同样为了对付企业主的集中化的专门组织，也必然会形成工人的集中化的、统一的工会。

不同工会的成员每天都要重新提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硬要他们分别组织成自由工会、自由派工会、新教工会和忠诚于企业主的工会，而企业主本身却把所有上述区别撇到一边，面对着四分五裂的工会组成了团结统一的企业主组织呢？再说：为什么人们要建立象印刷工人联合会这样忠诚于企业主的组织，而对于同工人友善的企业主组织却闻所未闻呢？

问题的答案是：阶级利益使企业主不去干危害自身的蠢事；但是，为数不少的工人不关心阶级利益又缺乏阶级觉悟，无知而且狭隘，他们会认敌为友，上当受骗，使自身分裂，使他们的天敌兴高采烈。有听觉的人，切莫上当！

译自《工会运动和政党》1900年
斯图加特版。

（张念东译）

回忆李卜克内西*

(1900年)

结识李卜克内西

一个人在永远失去他亲密的朋友和同志的刹那间，在他的心目中，会立刻闪现出，他同这位亲爱的亡友所经历过的一切。同亡友几十年的共同合作，他们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关系，就会一直回荡在他的脑海之中。这是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也是更高层次上的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上相互建立起来的关系。我所说的这位亡人叫作威廉·李卜克内西。

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甚至几百万的人对这位死者关怀备至，因为他属于他们大家，他的死使他们遭受到重大的打击，对死者的任何回忆都是医治他们因他的去世所受创伤的灵丹妙药，特别是这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来得这么突然、摆在眼前的事实是这么令人难以预料。这个热爱生活又非常健康，从来不知疲倦的人，这个似乎得到长寿恩赐的人，竟然不再生活在我们中间，而且永远同我们分别了，难道这能够使我们大家接受得了吗！

威廉·李卜克内西为党，特别是为我们当中的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总的说来难以用一篇文章概括，因为他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这里，我仅仅能做到，满足本报编辑部的愿望。我同这位朋友

* 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900年8月7日在柏林逝世。倍倍尔为悼念他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在《真正的雅各布》附刊，1900年第368号第3322—3328页。——编者注

和共同战斗的同志整整保持了35年的联系，长期的接触给我留下了许多回忆，今天，我只能把点滴的回忆公诸于众。另外，最近几天，我激动不安，也没有空闲时间，去查阅我们在多年交往中积累的那些可供我使用的材料。好在把我手头现有的少量材料提供给读者，大家也会满意吧。

那是1865年8月，距今差不多35年了，几年前还担任布勒斯劳商会秘书，而今已经故去的艾拉斯博士和一位先生来到我在莱比锡的作坊，艾拉斯博士把这位先生向我作了介绍，说他是被驱逐出柏林的作家，名字叫李卜克内西。艾拉斯当时任莱比锡出版的《中部德意志人民报》^①编辑，这可能就是李卜克内西找到他的原因。我当时是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主席、萨克森工人协会地区联合会主席，以及德国工人协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这可能就是艾拉斯把李卜克内西带到我这里来的理由。

当时，我十分了解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公开活动，也十分了解7月份他被驱逐出整个普鲁士这件事，所以，我非常友好地欢迎他，问他，想在这里做些什么工作。他答，他被驱逐出柏林后，曾前往汉诺威。他的朋友罗伯特·施韦希尔在那里的一家报社当编辑，但是，他在汉诺威住了几个星期，仍然没有找到工作，于是，才想到来莱比锡试试看。他的夫人和孩子仍然住在柏林。我们两个人谈到政治问题时，他的谈吐立刻使我茅塞顿开，了解到当时的要人冯·俾斯麦到底为什么下令刁难他，把他驱逐出境。谈话中，他对俾斯麦、对俾斯麦卑劣统治的攻击如同冰雹一般密集有力，他的话又是那么义正词严，所有这一切迄今没有一个人对我讲过。同时，他还批评了上议院多数议员中自由派的领袖们，大家知道，他们是瓦尔德克、敦克尔、舒尔采-德里奇、霍弗尔贝格、格奈斯特、特

^① 德国自由派的报纸，1862至1866年在莱比锡出版。——编者注

韦斯顿和福尔肯贝克等人，他还给他们加上了头衔，致使我惊奇诧异，因为尽管我迄今并没有把他们看成圣人，但也一直认为他们是一些劳苦功高的人物。当时我们的老头儿正处斗志昂扬、大显身手的时期，就是后来他也豪情满怀，始终认为他们这些人都是被告。我完全被他那卓而不群，坚毅有力的举止所征服，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工人教育协会需要请人作些报告。于是，我就邀请李卜克内西给我们作了几次报告，协会对他的每次报告都给以数目有限的酬谢。李卜克内西十分欣慰地说，象他这样一个拥有如此众多听众的报告人，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他报告的主要题目是法国历史、英国历史及英国工联，他在报告中还对德国的现状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此外，他还担任了英语和法语课的主讲人，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师，令他高兴的是，有一大批享有盛誉的学生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们对李卜克内西十分爱戴，非常尊敬，其中有一部分人后来成了他毕生的挚友。

在地区联合会中。联合起来的萨克森工人协会，即今天在帝国国会第15、16、17、18和19选区中的一些协会，当时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经常处于论战状态。但是，这些协会会员的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在思想鼓动和传播知识方面都有不足之处。同拉萨尔分子进行论战，我们必须经常研究现有的社会主义著述，当时也就是指拉萨尔的一些小册子。那时我们正处于脱胎换骨时期，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改变自己迄今的立足点。我们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对立面，然而在我们的思想上，却装满了拉萨尔的社会学说。1864年初，我在年前拉萨尔公开发表演说的那个大厅，召开了一次规模巨人的群众集会，承担了欢迎舒尔采-德里奇的任务，可以说，这是一次冒险行动，当我面对几千人的日光，把事先背好的演说词咽到喉咙里去，又当众出丑，不得不走下讲台的时候

候,我简直感到,在这次冒险行动中,我竟可怜得落了个翻船的下场。1865年夏,我拒绝了致欢迎词之类的邀请。接着,李卜克内西就来到了我们这里,似乎有人呼唤他前来此地。许许多多的工作等着他来完成。1865年9月,他在图尔姆的米尔森格伦德召开了第一个群众集会,后来很快又召开了其他集会。

他迫不及待地让他的家属——他的第一个妻子和两个女儿,即现在寡居的盖泽尔夫人和施维耶图夫人,从柏林迁到莱比锡来。他从报告和讲课中得到的酬金和从旅行中节省下来的钱,根本不够日常生活必需的开销,所以,他的经济情况比较困难。另外,当时在弗赖堡的布赖斯部出版了《上莱茵信使报》和在赖希鲍尔施出版了《格拉茨每日邮报》,他为这两家民主报刊撰稿也能得到微薄的收入,但是这点收入难以弥补亏空,他贫困到了必须精打细算的地步,为了弄到一点钱,他甚至偷偷地把一本书又一本书卖到旧书店去。遗憾的是,这些事我后来才听说。除此之外,他的妻子,一个非常情投意合的伴侣身患肺病,需要李卜克内西的精心照料。她是洋金根监狱检查官的女儿,由于参加了司徒卢威领导的起义李卜克内西被捕坐牢,这期间他同她结识。从表面上看,谁也看不出李卜克内西承受着这许多家庭困苦和不幸。他始终开朗而愉快地进行斗争,似乎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作忧愁。

从1866年到1868年

俾斯麦从1866年到1868年推行了同奥地利决裂的政策。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是,由双方共管被侵占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奥地利管理霍尔施坦,普鲁士管理什列斯维希。然而,俾斯麦企图由普鲁士独吞这个战领区,把奥地利从德国赶出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俾斯麦耍弄了种种外交阴谋,1866年初,他提议对普鲁士联邦进行改革,从而使这一策划达到了高潮。

当然，李卜克内西以极大的兴趣密切注视这一事态的发展，他还在报刊上和各种集会上表态，反对俾斯麦的计划。在事态急转直下，爆发战争已在所难免的情况下，我们召开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乌特克教授也在这次集会上发表了演说，大会要求以全民武装和全民战争反对俾斯麦的政策。今天，也许有人会嘲笑我们的这种冒然行动，但是，当时这样做确实是顺应形势的，是应当采取的非常严肃的步骤。

这场战争的过程和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战争一爆发，萨克森的小股部队就撤退到波希米亚，以便同奥地利人会合。普鲁士人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整个地区，在德累斯顿委任了行政长官，这位长官以独裁者的身份统治这一地区。

在此期间，《中部德意志人民报》由于订户寥寥无几，眼看就要停刊。可以说报纸给扔到了街上。李卜克内西好久就渴望找到一家报社、找到不受任何人控制，可以发表自己见解的报纸，他一听说这件事就匆忙找到这家报纸的出版人，提出自己要接管这家报社。一贫如洗的出版人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我们就这样，突如其来地办起了自己的报纸，不过，衣袋里却没有分文，无法支付印刷费。但是，这些困难从来没有使我们的老头儿犹豫不决。手中要掌握不受人限制的报纸，这一想法简直使他着了迷，想抵制也无济于事。他到我这来，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当时惊讶得目瞪口呆，问他，我们从哪儿弄到办报的钱呢？他若无其事地答道，钱的事我们不必担忧，暂时由出版人贷款，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前景如此美妙！事情会是怎样的，我早已经料到，筹划款项的事，首先就会落在我的身上，而摆在我眼前的麻烦事已经使我顾此失彼。年初，我已经结婚，而且负债累累。由于我的政治态度，已经使我小本经营的买卖失去很多顾客。此时此刻，我必须立即想出解决问题的好主意。殊不知德累斯顿的行政长官却是个救

命的天使。李卜克内西充分利用手中的报纸，开始十分猛烈地攻击普鲁士的当权者，似乎在萨克森掌握政治大权的人不是普鲁士行政长官，而是他。结果报纸刚刚办了3天或者4天就遭到查禁。李卜克内西对此大发雷霆，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一旦那位本人已经穷困潦倒的出版人向我们出示要付款的第一张发票，我们立即就会陷入可怕的窘境。

只要情况稍有好转，李卜克内西就催促我说，首先我们应当在萨克森建立一个政治组织。不过，我们还可以对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以及在普选权的基础上选举帝国国会抱有希望。我们同意李卜克内西的建议，并于8月初前往开姆尼茨召开了邦代表大会^①，除萨克森工人协会的代表外，还有民主派的代表，如德累斯頓的彼得曼博士和施拉普斯律师，以及莱比锡的罗斯梅斯勒教授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全权代表也被邀请出席了大会。大会提出了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特点的纲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对这一纲领也表示赞同。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冯·施韦泽先生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发出命令，禁止萨克森的会员们同我们建立联系。另外，在我们自己的人当中也产生了矛盾。罗斯梅斯勒在法兰克福议会，从前是左翼议员；罗伯特·布鲁姆斯是一位善良而受人尊敬的民主主义者，然而他们对社会运动却不能理解。1863年4月，正当拉萨尔在莱比锡发表演说，并按照他的愿望，由瓦耳泰希把罗斯梅斯勒介绍给他的时候，罗斯梅斯勒对拉萨尔十分冷淡，立刻起身，背对拉萨尔走了出去。现在罗斯梅斯勒又对李卜克内西大为不满。几天以前，我去开姆尼茨同罗斯梅斯勒会晤，他十分激烈地让我警告李卜克内西，说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是社会主义者，他

① 1866年8月19日在开姆尼茨，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主持下，召开了萨克森工人教育协会邦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萨克森人民党。——编者注

还打算谴责我们所有的人。我对这位老人深表哀伤，他当时66岁，严重的疾病在第二年年初就夺去了他的生命。当时我设法打消他的疑虑，所以没有说明李卜克内西是谁，是做什么的，以及他的目的是什么。

签订和约以后，李卜克内西于1866年10月前往柏林，他以为，不久即将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对他的驱逐令一定会被撤销，他也不会因为破坏禁令而受到惩罚。但是，他想错了。当局指控他违反禁令，他被逮捕拘留待审，最后被判处3个月监禁。这个新的打击严重地损害了他妻子本来罹患重病的身体，同年5月她病逝。

李卜克内西在柏林赴刑期间，北德意志制宪联邦国会的选举结果已经公布。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在格劳豪召开一次邦代表大会，会上李卜克内西被提名为第19选区，即鲁高-施内贝尔格-格耶尔等地选区的候选人；施拉普斯被提名为第18选区，即克里米乔-茨威考-韦尔道选区的候选人；我被提名为第17选区，即格劳豪-梅拉内-霍恩施坦选区的候选人。我们在这3个选区集中了自己的力量，我们希望能够获胜，事实上，我们赢得了第17、18选区，而失去了第19选区，因为李卜克内西本人向其选民宣讲如何管理自己选区的时间太紧了。相反，在同年9月举行的第一届帝国国会立法会议选举中，他获得了胜利。同时获胜的还有爱北斐特选区的冯·施韦泽、列奈普-麦特曼选区的赖因克博士和开姆尼茨选区的福斯特林。弗里茨舍和哈森克莱维尔后来也被增选进来，弗里茨舍是代替赖因克，因后者未被提名候选，哈森克莱维尔在杜伊斯堡中选。门德在萨克森弗赖堡也被选入帝国国会。他们在国会代表3个党团。

我不去多写我们一开始就进行的议会斗争，阐述这些斗争情况会使我离题太远，以后我们可以利用机会，对这些问题作一次专题讨论。

当时，我们越来越感到没有自己的机关报，要对党内同志进行必要的教育是根本办不到的，也不能回击施韦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提出的政策。1867年，我们在格腊召开了工人协会联合会大会，会上，李卜克内西作了一次关于矿工状况的报告，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工人协会的协助下，我们终于达到了目的，那就是我当选为联合会的主席，战胜了对手麦·希尔施博士，从此我们掌握了联合会的领导权，可以继续实施我们的计划。

1868年初，我们又取得了一大胜利。我们用自己口袋里仅有的在莱比锡从我们当中募捐得来的10个塔勒，出版了《民主周报》第1号。不过，我们从节省下来的积蓄中创办这家报纸的版面实在小得可怜，连我们自己都为之羞愧。第2号就扩大了报纸的版面。

从另一个方面看，1868年，李卜克内西的生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他在这一年第二次结婚。表面上看，这是个人私事，但事实上，这对他来说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现在，他找到了整整伴随他32年，直到他逝世始终忠实于他，大力协助他的妻子，她使他成为幸福的丈夫和父亲，从而使李卜克内西以新的力量和更大的勇气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多少年来，尤利乌斯·莫特勒在宣传鼓动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我们依靠自己的同志和《民主周报》进行积极鼓动工作。1868年盛夏，我们认为，必须把前进的步子迈得更大些，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在9月初纽伦堡大会上，对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采取新的步骤。于是，我们商定，起草一份纲领，其中包含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导言。当时，李卜克内西的政治立场十分明确，并且是敌对报刊进行猛烈攻击的对象，另外，我们还必须对一些协会采取谨慎态度，所以，李卜克内西没有担任纲领报告人，而是由罗伯特·施韦希尔作了纲领报告。施韦希尔在李卜克

内西的催促下，于1868年初就从汉诺威迁居莱比锡，并担任了《民主周报》的撰稿人。经过3天十分有趣的辩论，我们以绝对多数取得了胜利，从而使老联合会瓦解，使会员的大多数人逐渐站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也使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反对施韦泽独裁统治的、越来越壮大的反对派团结得更加紧密。

我们继续扩大战果。《民主周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也逐渐传播开来。我们在《民主周报》上对施韦泽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施韦泽对此难以申辩，这件事当时影响甚大，另外，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的压力下，施韦泽不得不邀请我们出席他于1869年复活节在巴门-爱北斐特召开的代表大会，在那里，我们将对他提出控诉。能出席大会是个了不起的胜利，李卜克内西对此喜出望外。我们俩人在前往爱北斐特的旅途中，偶然结识了威廉·普凡库赫，他是出席代表大会的加塞尔的代表。在爱北斐特等了许久，我们终于在第二天下午出席了大会。整个会场的气氛使人兴奋。李卜克内西和我接连不断地发表演说，施韦泽对我们有所表示，但冷淡、勉强。我们对一些问题要进行申辩，但未被准许。

我们出席爱北斐特代表大会的积极结果在于，达成了停止相互之间采取敌对行动的协议。大会以后不久，我们再次前往柏林出席帝国国会的一次聚餐会，上述协议在聚餐会上得到了印证。这次聚餐会是在菩提树下大街附近的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一家巴伐利亚啤酒店里举行的。

不过，和平状态没有保持多久。施韦泽感到他的组织有些涣散；由于我们在全德工人联合会里赢得了同情，他似乎感到难以保住自己在联合会里的统治地位，于是，他利用一个可笑的借口，把撕毁和平协议的罪责加祸于我们，以便于他进一步破坏其他有关协议。同时，他还背着全德工人联合会及其机关报，同以那位极其无能的门德为首的哈茨费尔特集团演出了一场和解和合并的闹剧，其结

果是使他彻底垮台。全德工人联合会中以白拉克、邦霍尔斯特、盖布、施皮尔和约克为首的一部分反对派举起了叛逆的大旗。他们同我们举行了会谈。6月初，我们秘密地在马格德堡的一家旅馆会晤，通过协商，我们取得了相互了解共同前进的一致看法。直到今天，在我的心目中，还常常出现身材修长，洒脱出众的白拉克伸展着身子，伏在弹子台上作记录，抄写宣言的景象。将近凌晨3点，我们才终于就寝，但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入眠，因为实际上我们大家都钻进了地地道道的臭虫窝。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因取得成效而心满意足的情绪，第二天早上，李卜克内西和我就愉快地启程回到莱比锡，以便为两派合并的事作进一步的努力。众所周知，同年8月初，在爱森纳赫召开了合并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建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同时，把《民主周报》确定为我们党的机关报，只是把名字改为《人民国家报》了，原来每周出版一次，现决定以后每周出版三次。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李卜克内西和我在执行议会策略方面发生了意见分歧。站在他一边的还有已经不听我们的施拉普斯。我提出的要求是，象我们往常行之有效的那样，由我们自己提出议会策略方案，采用作报告的方式，对外宣传该方案。李卜克内西反对所谓的“议会党”，说“议会党”必定使我们和我们党陷入窘境，受到腐化。在我们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以前，他就于1869年5月在柏林民主工人协会发表一次演说，题目是《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对帝国国会的政治立场》，后来他还把这篇演说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党内同志广为传阅。尽管如此，我在议会工作中还是取得了难以预料的成效，在辩论工商业法时，我提出了废除工人服务登记册的提案，在拉斯克尔的支持和帮助下，这一提案已被采纳并具有法律效力。当然，10年以后，国会的多数议员又重新决定，对未成年的工人实行工人服务登记制。李卜克内西在他自己

的小册子后来的版本里写过，他当时对议会策略拒不表态，因为建立德意志帝国以后，情况有了新的变化。显然，这些意见分歧在任何一个政党内都是不可避免的，分歧的实质也各有所异，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根本没有因此受到丝毫影响，我们象从前一样，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

普法战争

第二年普法战争爆发，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周报》及后来的《人民国家报》上，接连不断地发表文章，预言这次战争是1866年事件的必然结果。正是我们曾经最坚决地反对过1866年事件，也是我们在新组成的北德意志联邦国会，除了关心实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愿望外，还关注其他所有问题。相反，建立北德意志联邦的目的主要是使我们的愿望永远成为泡影，而我们没有帮助俾斯麦承担后果的嗜好。一开始宣战，帝国国会就发出为战争拨款的号召，当时，我们一致反对为战争拨款。只是我们对此所采取的形式不尽相同。李卜克内西主张干脆发表一篇相应的宣言，对这一事件公开表示反对。我则主张对此采取投弃权票的态度，因为直接表示拒绝，似乎会造成我们是站在拿破仑一边的印象。我们俩人在格施尼茨车站经过长久辩论，李卜克内西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那正是我们从霍恩施坦出席一次会议回来，因为忙于军运，列车不得不中途停在格施尼茨时发生的事。他当时要我起草一篇宣言，第二天在柏林，我把起草的宣言交给了他，他对草稿稍加修改，经我同意后，委托我在国会宣读了这篇宣言。

然而这件事在国会内外都引起了巨大风波，当施韦泽和其他同志同我们相反，对战争拨款投赞成票时，这场风波越发不可收拾。我们同不伦瑞克委员会和汉堡的党的监察委员会也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直到拿破仑在色当战役遭到致命打击，彻底失败后才

得以平息。不过，在这期间我们一直克制自己。所谓的公众舆论相当猛烈地攻击我们，施韦泽利用这种形势，不断派遣他的鼓动员前往莱比锡，以便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挑动人民反对“叛国者”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他们还在大街拐角处张贴海报，以莱比锡的爱国主义大学生为援军，并煽动他们出席大会。事实上，这些大会反而使其主办人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拥护我们的人当时出于愤慨，在大会上，矛盾双方多次发生冲撞，结果是我们的对手在撕打中败下阵来；但是，局势并未因此有所好转。我们不可能在公开场合露面，特别是那些大学生们试图用刺耳的音乐在窗口对我们发难。我当时住在一所带庭院的大宅子后面，大学生的举动往往受到房东的阻止，每当外面发生骚乱时，房东就把大门关起来。李卜克内西的住处比较危险，同志们只好每天晚上在他家门前站岗放哨，尽管如此，有一次在没有防备的一瞬间，他的窗子被击破。

1870年9月4日，法兰西共和国在巴黎宣告成立。这个消息一传到莱比锡，李卜克内西就激动万分地两眼含着喜悦的泪珠跑到我家来，把这一重大事件告诉了我。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如此激动过。这一事件在不伦瑞克也掀起了一次高潮。容易激动的白拉克立刻坐下来，以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一份《致全体德国人》这篇热情洋溢的宣言书，其中提出立即签订和约，不许兼并，以及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等口号。不伦瑞克委员会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这篇宣言，致使不伦瑞克委员会成员付出了重大代价，他们受到在吕岑监狱6个月的惩处。面对上述重大事件，施韦泽也不得不考虑一下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声明，赞成缔结和约，反对兼并。11月份，帝国国会再次召开会议，为了继续进行战争，会议企图通过拨款12000万塔勒的议案，这一次施韦泽和他的朋友们同我们一样，也投了反对票，但他们在会上没有发表演说。相反，我们在会议上，对政府进行了猛烈攻击，从而在帝国国会，

引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风暴。有人咆哮如雷，疯狂乱叫，致使速记员几分钟内无法记录，同我们敌对的议员们还抡起拳头，要大打出手，还以把我们打出大厅相威胁。我仅仅发言半小时，可这期间的空前骚乱，使我感到，如同经历了三天三夜难以忍受又极其可怕的艰苦历程。他们对李卜克内西的袭击比对我更加猖狂，这些人如鱼得水，以这种狂暴粗野的举动为乐趣。从此，我们初次领略警察的跟踪，警察派来的一名岗哨日日夜夜在伯尔尼堡大街我们的住处前面站岗。我们在国会的胆大包天的冒险行动必定受到制裁，这已经成为定局。因此，我一再要求，白拉克应当把所有文件转移到可靠的地方，当时不伦瑞克像德国其他所有北部地区一样，已经受到战争的威胁。尽管如此，不伦瑞克委员会仍然未能及时处理文件，所以，在不伦瑞克委员会成员被逮捕和被查抄的同时，全部档案材料也落到了军事当局手里。其中有委员会精心保存的李卜克内西、马克思、恩格斯和我写给委员会的全部书信。

叛 国 案

有人在俾斯麦住地——凡尔赛大兵营对我们在帝国国会的表现怒不可遏，他们为了逮捕和指控我们，还向萨克森政府施加压力。火药味越来越浓，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打击。帝国国会散会^①不久，就在12月15日半官方的《蔡特莱尔通讯》上发表一篇有倾向性的、色彩鲜明的文章，其中指控我们犯了叛国罪，文章断章取义地引用了我们那些被查抄的信件，以此作为指控我们的依据。12月17日，这是一个星期六，上午警察来到我的住处，随即把住宅的一切出口统统封锁，并宣布我被逮捕，同时，抄查了他们可以找到的少量文件。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也遭到了同样命运。星期一晚上，

^① 这次国会会议从1870年11月26日开始至11月28日结束。12月17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被拘留。——编者注

我从履行公事审讯我的预审官那里得知，李卜克内西、赫普纳和我被指控为图谋叛国。他还补充说，他在最近两周内不能进行预审，因为指控的材料还在不伦瑞克。被捕后，我们受到严格监管，头一两个月内，我们互相不能通消息，谁也不能看到谁。预审官料到，预审的结果对我们将十分有利，这是从他对我们的态度越来越好这一点上看出来的。还有一点可以肯定，预审官甚至认为，根本不能给我们定罪，正象我后来从可靠方面听说的那样。进一步还可以确信，如果我在国会不发表那篇关于公社的演说；如果李卜克内西不以同样方式在《人民国家报》上支持公社的话，萨克森政府会决定中断诉讼，那样我们在1871年3月28日就会获释。

可是，我们的运气不好。1872年3月，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判处我们两年监禁。这一案件在各地引起巨大反响，因为整个诉讼过程，特别是李卜克内西自豪而勇敢的态度成了宣传党的方针的极其重要的手段。

李卜克内西6月初在胡贝尔图斯堡赴刑，我是7月9日到达那里的。这之前我在国会，此外，我还因为所谓的读君案受到审讯，为此我又被判处9个月监禁。后来我终于来到胡贝尔图斯堡，而卡尔·希尔施已经在那里住了4个月，他急切地盼望着我，可老头儿则戏弄我说，你也落到如此下场。他保证，他决不甘心落到这步田地。于是，他在胡贝尔图斯堡赴刑期间，仍然秘密地为《人民国家报》撰稿，在这里他大约犯了6次读君罪，当然，都受到了惩处，对此，他采取了绝妙的对策。那时准许他每天早上到我的囚室里来，给我上两小时英语和法语课。我能学到这两种语言应当归功于他。他利用这一机会、继续从容不迫地撰写他的文章。每当他在文章中发现可能会引人怀疑的地方，便立即读给我听，征求我的意见。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要有一处引起怀疑，他们就要追问到底，检查官同样也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所以，我不是建议他删掉这样的句子，

就是向他提出彻底修改的方案。他常常因此十分痛心，他认为，这种引人怀疑之处恰恰是他文章中画龙点睛的地方。于是，他采取守势，同我进行辩论，就好象检查官一定会理解这些句子似的。辩论来辩论去，他还是不能下定决心，删掉这些句子，一般说来，他仅仅作些小小改动，经常是他越修改，句子反而变得越尖锐。

总而言之，我们当时在狱中，度过了最美好的时期。我们的妻子通常总是3周来一次，她们往往带着孩子们一块来探望，这对她们俩人来说是件相当艰巨的，尤其是在冬天。另外，我和李卜克内西俩人还展开了竞赛，只要天气情况良好，我们每天总要在大花园里散步4个小时。李卜克内西在路上来回小跑，谁也不能赶上他。在监禁期间，我们倒是锻炼了身体，对我来说，监禁反而挽救了我的生命，否则，我很难有机会彻底休息下来。对于这一点我的家庭医生是深信不疑的，他在我们被判处以前，曾向我的夫人谈过这种看法，说只要我们被判一年，那就会给我的健康带来福音。结果判了两年，那么，带给我健康的则是特大福音了。

当然，外面的人对我们俩人非常同情，他们为了安慰我们，把一切最美好的东西，比如李卜克内西特别偏爱的高级雪茄烟和葡萄酒送给我们。一支高级雪茄，一杯上好的啤酒简直是他最奢侈的享受，如果再加上一份美味菜肴，那他简直成了天下第一宠儿了。不过，凡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只要涉及到个人问题他总是与世无争的。

在我们坐牢期间，由布洛斯担任《人民国家报》的编辑；报纸办得不如从前，它的战斗力也有所下降；然而我们仍然同以前一样勤奋，特别是李卜克内西经常为它撰稿，而外人却丝毫没有发现。我们还在一片广阔但已荒芜的墓地上，开辟出一块园地，利用空闲时间，我们一块在这个园子里搞点园艺。但是，我们不能给菜地提供充足的肥料，致使本应收获到萝卜的园地长了一片野草。每天清

晨我俩都细心地观察，看看是否在一夜之间长出了球茎，这件事每天都使我们的看守笑得那么开心。假如国家强迫我们，用筐子给菜地运肥，那我们就会对这种蔑视提出最强烈最愤怒的控诉，当时我和李卜克内西在园子里是为了在劳动中寻求个人的快乐才那么干的。这就是强迫与自愿之差。

李卜克内西于1874年4月初获释。我的刑期要到5月中旬。他走后，我作为第一个便衣犯人搬到了克尼希斯坦要塞，在那里服刑。第二年李卜克内西以惊人的耐力和最大的热情投身于办报、议会工作和宣传鼓动等活动。此外，他还十分关怀自己的人口越来越多的家庭。只要他能抽出一点时间，就在住宅附近的草地上和森林里散步，他总是同家人一起出来漫游。他是那样酷爱大自然。迁往柏林以后，他仍然坚持散步，那里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经常在格卢纳瓦尔特散步，而且从几个方向在里面穿行，同样，他在莱比锡逗留期间，也没有人象他那样，经常在施劳伊斯和克纳维茨森林散步。

合并代表大会——反社会党人法——柏林

施韦泽在1871年大选中失利，与此同时，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不少人对他担任领导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因此，他辞去了主席职务，停止了党的活动。这样一来，阻碍全德社会主义者实行合并的主要障碍就不复存在，于是，人们产生了另外一些想法。李卜克内西刚刚重新获得自由，他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急于了解对方的态度。他本人是十分热中于合并的。1875年5月，合并的设想成了现实，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完成了这件工作，这主要应归功于李卜克内西。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人那么理解缓和，那么善于协调现存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点上，他的敌人直到他逝世，都没有消除对他的误解。

合并是俾斯麦特别反对、特别惧怕的一件事。只要我们处于分裂状态，他就感到没有什么危险。而目前，情况完全变了过来。他向党发起的第一个攻势就是，提出从1875年到1876年修订刑法条文。这一措施是针对哥达合并代表大会的；不过，这一企图并未得逞。当时，甚至德国资产阶级出于对我们的惧怕也不愿意牺牲自己仅有的一点自由。于是，当局不得不在1878年制造了行刺事件，从中找出制定反社会党人法的借口。此后，我们的党在它发展过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是党的短暂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经历了长达12年之久的反社会党人法的统治时期，我们党终于以获取全胜结束了这个时期。

迄今对于这个时期的问题还没有进行过充分讨论，而且也不可能进行充分讨论，这里也不是研究它的地方。因为要想全面而彻底地评价它的人，本人必须参加过这场斗争，必须哪怕在表面上起过一定的作用。如果说，单独的一个人能够使统治当局严加迫害和肆意践踏的时代顺利告终，那么，威廉·李卜克内西这个人对此是作出了贡献的。尽管反社会党人法剥夺了他生存的权利，但他一刻也没有失去理智，他仍然一如既往，凡他所到之处，都给以鼓励和推动。《前进报》这位真正的统帅，不屈不挠、不知疲倦，打击敌人或捉弄敌人，他都是走在前面。正是那些嘲讽把敌人捉弄得灰心丧气。象过去在柏林及其近郊，后来又在汉堡、阿尔托纳及其近郊实行小戒严那样，1881年6月29日又在莱比锡及其近郊实行小戒严，目的在于把我们驱逐出莱比锡。关于企图实行小戒严的消息在24小时以前就有人秘密告诉了我，我立刻通知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同志。我们对这一举动并不惊讶，因为这在柏林和汉堡都已经实行过，莱比锡不会很久也会轮上。6月20日，警察局传唤我们，并命令我们在3天之内离开莱比锡，离开莱比锡地方长官管辖的地区。目前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尽可能离戒严区较近的

地方，因为我们的家属还住在那里。最后我们选定了勃斯多尔夫。7月1日下午，李卜克内西、转瞬间即离开人世的木刻家布尔克哈特同志和我步行前往勃斯多尔夫。而警察却在莱比锡火车站等着我们，一切徒劳，难免使他们惊愕。

到了勃斯多尔夫，我们在一位裁缝师傅那里租了两间房子。但是，他一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便恐惧万分，立即下了逐客令。起初为了食宿，我们遇到不少困难。火车站饭店的老板还急忙跑到莱比锡，禀报地方长官，并请示他们是否准许给我们提供膳食。当然，这方面没有受到阻挠。于是，我决定第二天便启程进行业务旅行，我租了所谓的玫瑰小宫殿住了几天。李卜克内西在另外一座宅子租到一间一个窗子的居室，他同他的家属在这间小房子一直住到第二年秋天，我在勃斯多尔夫时，也曾在那里住过，后来我又发现一所房子，尽管房间设备简陋，可我们俩人的收入，完全可以把它租下来。李卜克内西在那里一直住到1890年9月迁往柏林为止，而我却在1884年秋把家属从莱比锡迁出，搬到德累斯顿附近的普劳恩居住。

莱比锡的同志们听说我们顽强地住在戒严地区的边界，都高兴得欢呼起来。此后，不论星期天还是节假日，他们当中并非一部分人，而经常是全体都到勃斯多尔夫来看望我们，这地方成了他们的真正圣地。我们常常在自由的小天地里召开秘密集会，因为当局安置了岗哨，警察们迈着笨重的步子走来走去，严密地监视着我们。

李卜克内西于1879年被莱比锡西区选入萨克森邦议会。莱比锡东区在我被驱逐以后12天，提名我为候选人，以此来回击对我们的驱逐。如果没有这次驱逐，恐怕我永远也不会成为邦议会的候选人，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在萨克森政府掌握的邦议会进行鼓动，在那里占领了一块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为党进行工作的阵地。我们

刚到德累斯顿的情况同一到勃斯多尔夫的情况完全一样。只要房主知道我们是谁，就立即拒绝接纳，无奈我们只好再作努力，寻找新的住处。福尔马尔1883年进入萨克森邦议会时，也曾经有过上述经历。

然而，大量事实终于向我们的敌人证实，他们利用反社会党人法是不能消灭我们的。事实恰恰与此相反！驱逐我们只能使我们有更多的自由活动天地。辛格尔在1886年也成了小戒严的牺牲者，他也迁居到德累斯顿附近的普劳恩我们这里。从此，我们大家又重新团聚在一起。

李卜克内西象以往多次经历过的一样，对于驱逐并不感到那么可怕。使他深为痛苦的是同家人分离，好在我们的住处离莱比锡不远，每逢星期天和假日家人都来探望。在学校放假的时候，还有更多的人聚集在他的周围。同过去不一样，现在他的活动反而比较自由。他非常厌恶的是，他的时间受到了派来的哨兵的限制。我确信，他始终认为，在各种各样的党的机关那里，唯有他这位主编是奴役型的，因为这项工作使他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必须定居在报纸的出版地。他所渴望的是彻底摆脱这种束缚。他所追求的是，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在所有的地方发起攻势，进行报复和开展工作。我敢断定，只要有可能，在一年中，他会用一个季度的时间在火车上度过，他会到各地漫游，去实现他的理想。获得自由以后，住在勃斯多尔夫使他的这种渴望得以成为现实。只要没有派他去苏黎世或其他地方处理党的工作，他几乎每个星期都去住在武尔岑的同志们那里，或者去当时住在哈雷，以后住在德骚的哈森克莱维尔那里，还到德累斯顿我们这里来作客。有一天辛格尔从勃斯多尔夫到我这来，对老头儿的居室表示不满，我不得不安慰他几句，我可是从来没有听老头儿本人对他的住处说过一个不字。是莱比锡同志们对他的热爱和忠诚，使他忍受了勃斯多尔夫不良的

居住条件。面对反社会党人法控制下的现状，辛格尔和我根据我们的想法，对党的工作提出了重新调整的建议，即建议迁往柏林，建议由李卜克内西担任《柏林人民报》^①（《前进报》的前身）的主编，他坦率地拒绝了辛格尔和我的这一建议，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他愿意继续留在莱比锡，在那里筹办党的中央机关报，即当时的《人民国家报》，后来的《前进报》^②。我们很难使他相信，这是一件不可能办成的事，因为转瞬之间情况就完全变了样。最后，他终于同意搬迁，前提是他的妻子也赞成搬迁，据我们所知，她本来是不愿意迁居的，因为他们一家人曾经长期居住在莱比锡，再说迁居对孩子们的教育也会受到影响，这些都是实际困难，更何况离开那些好友又谈何容易。后来，搬家的事到底提到了日程。老头儿虽然终于表示同意，可心中仍然不那么情愿。几年以后，他一直没有打消重返莱比锡的念头，并且向我们抱怨说，是我们让他生活在他难以适应的环境之中。

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柏林，最后他也死心塌地地住在那里了。象从前的莱比锡的同志们一样，现在柏林的同志们也是那么愿意同他联系。他在同志们中间感到非常快慰。同从前一样，他还是不知疲倦、废寝忘食地为同志们做了许多工作，《前进报》的各期报纸可以为此作证，首先，同志们为他举行的这个壮观而独特的葬礼可以为此作证。李卜克内西既不是公爵，也不是政府首脑，而是一个平民，在德国，至少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人有过这样的葬礼。凡是有机会参加最后送别我的老头的人，永远也不会忘记

① 即《前进·柏林人民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创办于1884年。该报从1891年起为党的中央机关报。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编者注

② 《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决定，将党的机关报定名为《前进报》，从1876年10月至1878年10月在莱比锡出版。——编者注

这个场面。前往墓地成了这一独特葬礼的高潮，成千上万抬着花圈的人列队站在街道两旁，灵车是从人群当中穿行而过的。

* * *

威廉·李卜克内西已不在人世，他的去世给我们造成了长期无法弥补的损失。他为我们为我们的党作出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他是我们事业摇篮中已故伟人当中的最后一位，先是拉萨尔，继而是马克思，后来又是恩格斯，全世界的无产者，在心目中永远纪念他们。失去了他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有3个人已先于威廉·李卜克内西离开了我们。如同对待他们3人一样，我们直到最后一息，都将对威廉·李卜克内西充满爱的哀思，我们永远把他当成我们的榜样。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文选》1981年
法兰克福版第2卷第26—39页。

（葛 斯译）

德国社会民主党 对侵华政策的态度*（摘录）

（1900年11月19日）

先生们，帝国首相^①先生给我们作了目前政策的报告，我们听后，感到其中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左边有人喊：说得对！）

他在这里向我们讲的一切，无非是对登基演说、对事先写的第3次追加预算的备忘录、对他今年7月11日颁发的照会，以及对上几周给我们下达的其他各种官方和半官方的通知等等作些修修补补，再加上一点论述而已。甚至在谈到北京公使^②的问题时，他仅仅说了一些次要的琐事，把这些琐事拿来当新闻告诉我们。

首相先生断定，对中国问题，仅仅在外国有人攻击德国的政策，他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一下，他的这些论断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是正确的。

……

先生们，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据我所知，不是今天，也不是昨天，甚至也不是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后，而是在相当长的年代，我们

* 倍倍尔就德国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山东省胶州湾一事，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了数篇演说，这是其中的一篇，阐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殖民政策的態度。——编者注

① 指原外交国务秘书冯·毕洛夫伯爵，他于1900年10月18日被任命为帝国首相，成为德帝国主义推行对外侵略政策的代表人物。——编者注

② 德国驻北京公使冯·克德林在义和团起义期间，于1900年6月20日在北京被枪杀。——编者注

索性追溯到60年前，中国就已经连续不断地领教过欧洲政府对它采用的手段，这种手段特别促使中国的统治阶级，后来也包括其他阶层的中国居民不得不确信，所有列强都在竭力使中国完全依附于自己的统治。在这里，我并不指控任何人，我要对所有的人负责任，只是德国在1897年以前尚未介入其中。欧洲政府进一步采取的步骤就是很快郑重其事地撕毁已经签订的各项协议，接下去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总而言之，他们完全无视国际公法的一切程序，对中国采取了这些步骤，致使中国国内的有志之士反复地、严肃地宣称，这一切必定不会得到好下场；只要在人民当中迸发出愤怒的火焰，只要人民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力量，那种势不可挡的运动就会一泻千里。我要在这里推荐一本好书，这本书早在70年代下半叶由一位名叫吉尔斯的英国人出版，他曾经长期在中国进行过活动，十分注意世界列强对中国一贯施展的淫威，以及由此产生的必然后果。我还要提到一本由著名的传教士法博尔在1891年写的一本书，他在书中写道，1891年爆发的运动不是最后一次，也不是最激烈的运动，随之而来的将是更为激烈的运动，以显示产生强大力量的必然性。我又想到了著名男爵冯·科尔夫1893年在一本书中关于他周游世界的一些描述，旅行中他也去过许多中国的港口。他记述了自己眼见耳闻的情景，以及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中国港口如何不断虐待中国居民的情况：一个中国人只要靠近一个外国人、靠近一个欧洲人或者美国人，他就要遭到鞭子抽打或者一顿棍棒毒打，这样的事情可以说屡见不鲜，层出不穷；作者还描述了，那些外国人如何把人们用竹子编成的小推车和其他车子给扔到一边，用脚踢得粉碎；他们又如何如何在船上虐待人。所有这一切必然要凝结为十分强烈的愤怒、仇恨和复仇欲，人们总有一天要狠狠地报复欧洲人和外国人。这一预言今日应验了。在这里，我要控诉欧洲和美国，它们是使我们在中国遭受暴乱袭击的真正元凶。（社

会民主党人喊：千真万确！太对了！）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外国人可以用最残忍的暴力行动和最严重的犯法行为损害中国人，而被欺凌的中国人却没有任何权利反对欧洲人。再者，只要欧洲人被中国人控告，哪怕这个欧洲人确实有不法行为，可他依仗自己的地位和金钱，很会贿赂贪婪的中国司法官吏，从而使苦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从各方面看，几十年来，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是有罪的。除了这些相当能够忍耐又十分驯服和常常沉默不语的中国人以外，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早就有人由于这种种残暴行为而迸发出强烈的不满，以致进行报复，最近几个月里，我们就是这一切的见证人。（社会民主党人喊：千真万确！太对了！）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反驳首相先生的见解，反对我们的不单单是外国人，就是说，反对我们的也有德国人，不，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是住在外国的德国人，有些人还身居高位，这些人说过，教会也要承担大部分罪责。今天首相先生在这里讲了一些话，还引用了备忘录中的论述，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教会制度在于同古老的、法国的、英国的和美国的相应机构进行竞争，特别是在山东省和广州、汕头等地，并取得令人欣喜的进步，从而给人带来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消除人们的疑虑，因此，以宗教的性质为基础，不论德国传教士的活动，还是其他国家传教士的活动都很少受到阻碍，如果基督教怀有政治企图去进行宣传往往更能引起人们的怀疑。”不过，首相所说的和他引用的备忘录不是一码事。近几年发生的事件倒是充分地、相反的看法提供了证据。令我惊讶的是，首相先生面对上述事实，今天在这里竟试图否认一切，似乎人们不应当对教会进行任何谴责。我对教会的态度是不偏不倚的：我不论对天主教还是对新教都一样恪守中立。如果各个教派的信徒结成同盟，在异国宣传他们的宗教信仰，那完全是他们的私事。

(社会民主党人喊：很对！)作为臣民，他们隶属的国家或帝国不应保护他们；他们本人应当对其作为教士的一切言行承担责任。假如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国际争端，他们的所属国应当申明：我对教会的所作所为概不过问；你可以按照你的习俗、你的惯例和法令予以处置。大部分新教教徒也赞成这一观点，近几个月，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过这种看法。但是，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可不是这么回事。相反，有不少事就是大部分传教士干的，因为我对今年夏天发生的事件进行过仔细研究，恕我直言，他们基本上是天主教教士，他们的行为势必导致中国人对基督教代表及其学说产生不满，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产生仇恨。另外，大部分传教士的罪过还在于，他们从各方面保护那些吹捧他们的中国改宗者，尽管这些人是中国社会上最卑劣的人、是一些改信基督教的人，他们的目的仅仅为了取得传教士对他们的庇护。我特别要提到的是，天主教的教士们依仗直到1890年都在中国保护他们的法国政府的支持，竟然获得了担任中国军职官员的权利。而这些基督教的代表人物在不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穿上中国的朝服丝毫没有不得当的感觉。传教士们的确享有特权，他们肆意滥用这种特权，甚至在审理案件时威吓法官，致使一大批坏分子在他们的庇护下，逍遥法外。他们肆无忌惮地对官员，甚至对法庭施加压力，这一切都使中国人民对传教士产生了非常强烈的仇恨。

另一方面，我们再看看个别的传教士，事件恰恰是他们首先煽动起来的。我们不妨把事情颠倒过来看看，就是说中国的传教士来到了德国，在德国进行宗教宣传，并且冒昧地干出了诸如一部分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所干的类似勾当，接着德国人民发动了象我们在中国经历的同样事件，我说这也是挑衅的结果。(左边有人喊：说得太对了！)

这里，有一件事我要着重讲一讲，这件事涉及到著名的传教士

安策尔主教。在近几年的暴乱中，安策尔主教尤其对德国来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下面我就谈谈他扮演的这一令人诅咒的角色。关于安策尔主教的事，我并非依据外来报道，也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依据安策尔主教本人公开发表的一些报告。正象诸位所了解的那样，安策尔主教是由天主教任命担任山东省主教的。山东省南部有中国人的圣地，即孔夫子出生地曲阜城和孔夫子生活和学习的城市兖州府两个地方，中国人把这两个地方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地，他们当然期望，任何外来宗教都不会在此地施加影响。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安策尔主教的天主教野心不是别的，恰恰是要占据孔夫子曾住过的城市兖州府。勿庸置疑，这种作法就是对中国的至高无上的宗教的一次挑战。安策尔主教扬言，早在十分器重他的冯·勃朗特先生坐镇北京，担任德国传教士的时候，他就已经一切准备停当，以促使中国政府允许他们把兖州府化为自己的殖民地。冯·勃朗特先生曾经警告过他，凡造成不良后果的事都应放弃。可主教并非如此，他继续施加压力，最后终于迫使光绪皇帝准许他进驻兖州府，皇帝还指令当地官员，给他以清朝高官官衔的荣誉。安策尔主教就是这样进入了兖州府。他说，兖州城里是如此宁静平安，他可以大摇大摆地在街上漫步；然而他的挑衅是耸人听闻的：他竟然走进了孔庙。（左边有人喊：听呀！听呀！）孔庙里人山人海，“我们（他和他的陪同）几乎无法挤进去，密集的百姓以震耳欲聋的喊叫迎接我们，他们高呼：‘该死的魔鬼！’”。

但安策尔并不示弱，于是群众越发不满，喊声越来越大，最后，他不得不逃跑，溜到他的马车里，在那里他感到安全一些，他在车子里紧紧抓住一位清朝大官的胳膊，并且强令这位官员坐在马车夫旁边的座位上。如他所说，让这位官员挡住百姓才有安全感。

先生们，假如一位中国传教士到安策尔主教的居住地和出生

地去，在那里以同样的方式进入天主教教堂，就象安策尔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那么，老式的巴伐利亚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愤怒得发狂，他们（我很了解他们）准会把这位传教士打个半死，如果他还能活着走出教堂，就算万幸。（社会民主党人喊：太对了！）安策尔主教也不会否认吧！这是最最强烈的挑衅方式，不是那种传教士登台的方式。诸位只要看看一个人以这么一种特殊的地位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扮演了如此挑衅性的角色，也许就不难理解，3年前，在安策尔主教活动的省分怎么会发生两位著名传教士被杀^①的事件了。这个事件是德国长期以来巴望得到的一个口实，凭借于它，德国就可以征服胶州湾，占领山东省。

现在，我来谈谈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传教士们在中国各地还扮演了非同一般的政治角色；他们当中许多人担任中国报纸的编辑，成为舆论界的官员和掌权的人。这一点曾激起人们相当强烈的不满。传教士在全国到底处于怎样的地位，为便于大家了解，这里我想向诸位提供一个信息，那就是保尔·戈尔德曼博士写的一本书，书名是《在中国的一个夏天》，作者描写的是自己1898年夏天在中国旅行的见闻。戈尔德曼旅行中有一天来到了石家湾耶稣修道院，同那里的牧师进行了交谈，在谈话中他听说，有一个僧侣已经打入到这个国家的核心从事传教活动。当时戈尔德曼表示，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那个人随时都会丧命的，可这位耶稣团的牧师则说，这话不错，不过，假如有一天他被杀掉，我们就会因此而得到一条漂亮的铁路。（左边有人喊：听呀！听呀！）

是的，果真有一位传教士被杀的话，这位传教士所在国的外交官马上就会站出来，立刻提出，你们应当对此进行赔偿！于是就会赔出一条铁路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对两名传

^① 1897年11月14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教堂被杀，在沙俄的默许下，德国以此为借口派军舰占领了胶州湾。——编者注

教士被杀赔了50万塔勒，用这笔钱去盖一些教堂并不是德国的目的，不，占领胶州湾才是他们得到的第二笔赔款——一笔重要的赔款。

帝国首相先生在讲话中，提出有人在国外断言，德国夺取或占领（有人这么说）胶州湾是造成中国目前状况的最根本的原因，首相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里，我不得不对首相先生的这一观点给以坚决的回击，我不仅能提供外国人的证据，而且还能提供国人的证据。首相先生，首先，我要提出的是那个人就是您侵占胶州湾的帮凶，干脆说就是安策尔提供的证据。安策尔主教宣称（我这里有官方的报告），他的想法同当时的德国公使冯·赫金以及当时驻上海或香港的领事施图伯尔博士（目前是殖民大臣）的想法完全不同，他们在讨论选定何处为德国进攻中国最佳地点，以便占领中国的港口时，经过外交部的测水试验，一致主张选定中国东南方靠近厦门的一个小港口，而安策尔则建议选定胶州湾。当时，这位主教偶然地，也许非偶然地来到了柏林，（他经常来往于柏林）受到皇帝召见，同他进行了长谈。正象主教本人所述，他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向德皇提议，不要占领厦门附近的港口，那里的方位不合适，而应当夺取山东省的胶州湾，这里更加合适，不论从哪个方向看，对德国的强权都很有价值，很有发展前途。同德国公使施图伯尔博士先生的提议相反，外交部决定，应当占领山东省胶州湾。就是这样，德国首先采纳了安策尔主教夺取山东的建议。就是这个向德皇提出建议的人，在暴乱席卷中国的时候宣称：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完全在意料之中。他的这种坦率实在令人惊异。

安策尔主教在1900年新年贺词中说：“行动的第一个和至关重要的前提就是占领胶州湾。我们拿下胶州湾对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一次致命的损伤。”（左边有人喊：听呀！听呀！）

他继续说道：“许多著名的旅行家去过山东，对中国的状况得

到很多错误的印象。对此，定会有所反响，这一点要事先料到，因为，攻击胶州湾的创伤，长久不会愈合，比如，象旅顺口和威海卫等地关于日前分割中国的一些报道都提到了胶州湾。”（左边有人喊：听呀！听呀！）

总理先生，安策尔主教就是这么说的。让我们进军胶州湾，建议我们占领胶州湾的都是这个人！诸位，现在来听听第二家，当然也是外国报纸的声音吧，这是今年6月7日罗马教皇的半官方机关报《真理之声报》关于这次暴乱报道：“我们必须了解，中国人对欧洲人、对天主教的仇恨总的说来由来已久，他们早就要改变保护教会的传统制度，直到今天这种仇恨已经上升为凶猛的暴乱。”

这句话暗指1890年发生的事，那一年法国公使放弃了对德国天主教教会的保护权，德国教会由帝国保护。接着写道：“安策尔主教（罗马教庭也认为他在这件事中是权威人士）已经同宗教界和各界要人作过长谈，同时开始与皇帝威廉二世接触。这期间，安策尔主教公开表示，德国占领山东引起了神圣帝国政府的不满和混乱，他承认，今后不会有什么好兆头；如果这种说法在情理之中，又怎么能说中国人完全错了？”（左边有人喊：听呀！听呀！）

罗马教庭的半官方机关报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人怀有不满情绪，难道说，这说明他们错了！

“当然，德国是一个又大又重要的列强，但它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它大概会感觉到自己象一个十分强大，又武装到牙齿的巨人那样，用暴力冲进了别人的家中。”（左边有人喊：听呀！听！）这是《真理之声报》发表的又一篇报道。

现在，有人在文章中还涉及到教会的政治观点。其中说到，非法对待一位传教士，就去侵占人家的一个省，难道有这个必要吗？完全没有必要！然而，德国在这方面开了先例以后，这种事就

扎下了根。

先生们，胶州湾事件进一步又造成了什么后果呢？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不要说我们没有占领胶州湾，因为随之而来的是，俄国占领了旅顺口和大连湾这两个地方，从而统治了辽东半岛，成为那个省的实际占领者。1895年日本却要求把辽东半岛的省份作为其战利品归属自己，当时，德国、俄国和法国拒绝了日本提出的这一要求，阻止了这件事。俄国进军那里，英国占领了威海卫、法国占领了广州湾、意大利要求割让三门湾、日本侵占了福建海岸，此外，英国又租赁了香港作为后方基地。总而言之，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把中国撕得支离破碎，体无完肤；他们把中国最好的港口据为己有，致使中国目前要想进行对外贸易，连任何一个值得一提的，可以使用的港口都没有。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我仅想到了俄国）都不惜任何代价，远涉重洋，为自己夺取港口，因为，对于大国来说，这是生命攸关的问题。让我们看看这里的情景，一个拥有许多港口，又有重要沿海的国家，却被外来入侵者用暴力有计划地占领其国土、大城市和最重要的港口，只因这个国家难以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抵抗任何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喊：千真万确！说得对！）是的，先生们，但愿诸位也如此公正！假如各位主持公道，我对你们就没有什么要求可谈了！象中国人多年来如此这般任人摆布那样，世界上还会有某个国家的人民有类似的遭遇，先生们，你们果真相信这一点吗？如果外来入侵者哪怕仅仅占领德国的一寸土地，那德国又会怎样？全民族就会像一个人似的奋起攻击，赶走侵略者！各位自己不愿意的事也不该要人家愿意。（社会民主党人喊：千真万确！）真正的、主持公道的思想家，当然也可以说一切政治家应当遵循的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

帝国首相先生担任国务秘书的时候，我们从他嘴里听到的可

不是这个，关于此类问题，我们从他嘴里听到的是什么呢？对此我可以举出一个富有诗意的例子：“德国也要求在阳光下有自己的地盘”。当然，所谓“阳光下的地盘”无非是指东亚和胶州湾。（哄堂大笑）

再者，他们把侵占领土比喻成分一块糕点吃吃，德国也要从中分到一块。是的，首相先生，这块糕点已经归别人所有了！难道您愿意把您已经到手的糕点同我平分，使我从您手中也得到和享受一块吗？（会场活跃）

同样，别人把自己的国家看成一块糕点，中国是不能满意的。世界各国，我是指欧洲列强依仗残暴的势力任意把中国据为己有，任意分割它的领土，还说什么，瞧呀，这是一块糕点，我们吃着味道好极了，快意得很，我们要一块块地把它全部吃掉，甚至还说什么，我们这样对待你，你就应当干脆把嘴闭上，保持沉默。（社会民主党人喊：说得好！）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问题的真谛所在。如果事态象现在这样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大可不必惊讶。（左边有人喊：非常正确！）诸位，我还要讲一点！到目前为止，我关于各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列举的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呢？出于各列强残暴的权势欲，以及它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绝对轻视！（社会民主党人喊：完全正确！）这也是我们的殖民统治者对黑人、对殖民地上著人的那种绝对轻视（左边有人喊：完全正确！）。也就是他们，尽管他们信仰基督教，在外国把人不当人看的那种绝对轻视（左边有人喊：非常正确！）我不要求他们把外国人当成兄弟；这样的要求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世上存在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但他们应当把他们看作人；可他们并非如此，在他们的眼里，中国人的形象似乎非常可笑，似乎是一种欧洲人要他们干什么，他们都应该乐于服从的微不足道的生物。可是诸位先生，你们完全忘了，在我们的各主要城市

都有中国公使馆，使馆是由一些在教养和知识水平方面完全可以同任何其他国务活动家，甚至也可以同我们的首相相比美的人员组成的。（会场活跃）首相先生向我点了点头，他同意我的看法了。（会场活跃）

先生们，这些人正象我们驻北京的外交使节研究中国的情况一样，十分重视研究外国的风土人情，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的使节研究了中国的情况，似乎不该在北京发生这些事。我是说，他们也研究他们驻在国的情况，关注这些国家的发展，并向北京书写报告。中国也有不少报纸和相当可观的学者和文学家，他们可以写作和阅读。另外，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甚至包括底层的苦力都能阅读。毕洛夫伯爵关于阳光下的地盘以及关于糕点的出色演说他们不能没有看过。（社会民主党人喊：很对！）欧洲报纸和各种周报关于即将瓜分中国的所有计划和建议，这些读者都会一目了然。但是，中国居民若听到和看到这一切消息，却不感到义愤填膺，那他们就未免太冷漠、太没有骨气了。（左边有人喊：说得对！）

事实上，所发生的一切使广大居民群众十分愤怒。因此，1898年10月初，在北京爆发了动乱，各外交使团对此感到恼火。接着在各使团，首先是法国、德国、英国和俄国使团的一再催促下，一支所谓的护卫军团被派往北京，除俄国军团外，每团30人，俄国军团是66人。先生们，如果我们同一个国家签订了友好往来的条约，又向这个国家派了使节，可突然之间，我们这些外国列强感到，在这个国家失去了必要的安全保障，于是，就派遣诸如此类的护卫军团，难道说，这不是又一次的严重挑衅！（右边有人喊叫，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如果不经外国政府允许就派遣护卫军团，那就是违犯民法的事件，是对民法的破坏，还可以把这种事看成是挑动战争，并且按照战争事件进行处理。外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

荣誉和利益，必须采取行动。（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同样，我们这里遇到类似的情况，政府也会采取行动。可以假定，因为爆发革命，自己的使团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同时还可以肯定，中国政府无权或者不愿意镇压革命和反革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结成联盟的各列强当然就会进逼中国，并发表声明：如果目前我们的使团不能得到充分安全，我们将立即撤回自己的使团，并作好同你们交战的准备。假如事实如此，似乎这是当时可以而且必须采用的唯一符合国际公法的措施。

.....

诸位先生，请回顾一下下面这件难以想象的事。中国驻柏林的使团有一支部队，使团在菩提树下大街或其他地区采用和平方式召开过一次民众集会；突然间，中国部队在会上开枪射击，当场有6至8人中弹死亡，大批群众受伤。大家可否知道，柏林人对这一事件是怎样报复的？事情发生后不到两小时，全城的人都被激怒，他们捣毁中国使馆的房屋，使其片瓦无存。凡是能够找到的任何完整的生物，他们统统不放过，立即打得粉身碎骨。（社会民主党人喊：的确如此！）这就是柏林人对这一类非常行动、对外国士兵在国外城市犯下重大谋杀罪行的报复。

由于积蓄了多少年的仇恨，尤其是对德国的仇恨，诸位可以想象，在北京会产生怎样强烈反抗德国使团的情绪。反抗行动震撼人心，气势凶猛，它是如此耸人听闻，又如此令人发指，致使人们在这里可以用皇帝的话说，只要想一想，就会知道，这次行动是空前的。当然，比现在，即比1900年更早，就已经有人枪杀过公使。（社会民主党人喊：很对！）也就是说，我们曾经以耸人听闻的方式在北京向中国人民挑衅，所以，他们的愤怒和报复也就越发耸人听闻。

先生们，我认为，如果没有人命令外国士兵开枪射击，他们是

决不会开枪的；命令德国士兵开枪的德国军官如果不敢断定德国公使完全赞成这一举动，他也决不会发号施令。（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无论如何，冯·克德林先生本人应当对这一丑行负道义上的责任。（会场骚动。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要他本人对这一事件负责是毋庸置疑的，在世界其他国家，甚至在我们德国大家都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社会民主党人喊：很对！）

有一些琐事对于我们了解这位被杀害的公使是颇为重要的，这里，我想谈谈这些事。6月13日那天，有两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和一个坐着手推车上的中国姑娘吵吵闹闹地从公使馆门前经过。此刻，冯·克德林先生从使馆冲了出来，气急败坏地跑到使馆工作人员旁边，（他后面站着那两个小伙子）揪住那个18岁小伙子的领口，其他的人这时已慌忙逃跑，克德林先生把小伙子拖进使馆，把他监禁起来，那小伙子只是唱歌，还兴高采烈！冯·克德林先生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表声明说，如果这个小伙子在24小时内不认罪，就枪毙他。（左面有人喊：听啊！听啊！）

人们不禁要问：身为德国公使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呢？当然，后来公使明确表示，按照先例，只能如此。

此后不久，他们便大举进攻大沽要塞！先生们，诸位必定会赞成我的看法：按照一切国际公法的概念，这是宣战的最佳形式。（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6月17日夜，联军攻克大沽，占领了这一地区，击毁要塞，破坏全城，凡一切阻止其进犯的东西均遭到洗劫。无以数计的人，不仅仅是男人，连妇女和儿童统统被士兵们杀害。（左面有人喊：听啊！听啊！）6月19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得到这次袭击并占领大沽的消息后，对这一举动向各列强的公使提出了具体要求，那就是要他们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这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占领大沽就已经意味着宣战。（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正确！）。

当然，公使们没有这么作，因为这是件生命攸关的事，我是这样看的；但是，先生们，他们事先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在采用这种方式袭击并破坏了大沽要塞以后，他们自己难道没有看出，这是必然的后果、是处于战争状态吗？众所周知，后来公使们建议，再次说明情况，并恳求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觐见。自然，这一建议被拒绝。6月20日上午，各国公使再次聚会，商量对策。有人提出全体出动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底是谁提出了这一建议不必讲明，我猜想就是冯·克德林先生。但是，该建议被所有公使否决。冯·克德林先生为此受到他同事们的警告，之后，他只身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简直是鸡蛋碰石头的冒险行动，在路上他被枪杀。瞧！诸位，这是一桩罪行，是一桩如我们的士兵大屠杀一样的罪行，两者没有任何区别。我要强调说，这是一桩杀害德国公使的罪行，是北京的广大民众在我前面列举的那些事件，以及6月20日以前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强烈报复感和难以抑制的愤怒情绪的反映。但是，不论怎么说，枪杀公使毕竟是一种犯罪行为，我可以直言，对这一行动谈不上宽恕。（社会民主党人喊：很对！）在我国，人们对这件事怒不可遏，完全正常。极端愤怒的火焰正在急剧上升。为了进行最可怕的报复，我们不一定马上前往北京。众所周知，用相应的语言，发出进攻信号，高喊复仇的不是别人，正是皇帝，他在威廉港检阅派往东亚的海军作战部队时，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其中说道：“我并非不想一统升平世界，可战争的烈火已经燃起。”

今天，甚至谁也没有看到“战争”，可皇帝却在这里大谈战争。“这是一桩胆大妄为得耸人听闻的罪行，是极其野蛮得令人发指的罪行，它击中并杀死了我忠实的代表。”

接下去，他说：“德国的旗帜遭到凌辱，德意志帝国受到侮辱，因此，一定要严加惩处，报仇雪恨，以招炯戒……我派遣你们去清算这一罪行，一直到德国的旗帜同其他列强的旗帜一起胜利地飘

扬在中国上空，并插在北京城墙上向中国人传授和平的时候，我才能平静下来。”

最后他说：“我们也想到了某些崇高的东西，想到了宗教，想到了保卫和守护我们那些在异乡的弟兄，他们当中有些人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耶稣。”

先生们，我理解他的激情和愤怒；但是，使我难以理解的是，这些话是在公开场合讲的，而且讲得那么不加掩饰。因为这样一来就提供了一个信号，即受到德意志帝国最高权威的蒙蔽，德意志帝国无论对开赴中国的部队还是对驻守在国内的部队都必定造成十分严重的结果。对于这一罪行，谈论“复仇战争”是否恰当，我这里姑且放下不提。这个词儿本身就是反基督教的，（社会民主党人喊：很对！）要想当个合格的基督教徒，如我所说，他就会以教徒的身份提出问题。但是，说出那种字眼是反对基督教的，假如基督教的教徒们都用这种办法开了极不光彩的先例，那么，那些非基督教：

“主说，复仇由我”。（右边有人喊叫）是的，圣经上的确是这么说的；其他方面也可以引用圣经，人们惯于提到圣经，并试图以此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尤其把提到道德准则的新约全书当作一本具有崇高的伦理概念的书，所以我认为，凡是熟知新约全书崇高伦理内容的人，作为基督教徒，他们的行为必须以此为准则。（社会民主党人喊：很对）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是，我相信，在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要按照上述准则行动，否则，在这种场合我不会冒昧地说这些话。（社会民主党人喊：说得好！）

此外，先生们，现在为宗教辩护突然也成了问题。“十字军远征是一场神圣的战争”这是一位新教教士向开赴中国的士兵们作的临别演说。不，十字军远征决不是神圣的战争；它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掠夺战，是一次复仇的讨伐，是用屠杀进行的报复，而决不是别

的什么。进行报复采用堂堂正正的战争形式就能把握十足地达到复仇的目的。用战争的名义来干这种事，实在妙极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复仇的讨伐。（社会民主党人喊：太对了！说得完全正确！）如此野蛮的复仇讨伐是近几个世纪以来所没有的，也是历史上罕见的；起码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比这更严重的战争……

先生们，接下去就是7月22日的著名演说，其中提到：“不要宽恕，也不要捉俘虏！狠狠打击他们，德国人的声威要靠你们在中国流传千年，使中国人永远不敢再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帝国通报》没有刊登这篇匈奴演说，出于某种原因，它被删掉了。（哄堂大笑）我确信，这段话的确被删掉了；报告人不会虚构情节。所以，今天仍然有人谈论匈奴战争和匈奴书信，其中的每个字都表明：“不要宽恕，也不要捉俘虏！狠狠打击他们，德国人的声威要靠你们在中国流传千年，使中国人永远不敢再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接下去又说“……必须考虑到基督教要在所有国家找到自己的出路！”

就是这样，再次按照这一指示，我们开赴到了中国，目的是使这个国家基督教化。但是，假如诸位想到了这一层，那你们尽可以作好准备，行动起来，不断地同中国作战好了，只要德意志帝国和大清帝国受得住。（社会民主党人喊：说得对！很对！）但是，不能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你们不能在几十年内硬是把亿万人变成基督教徒。由宗教界和政治界中相当干练的外科医生组成了耶稣教团，该教团的那些成员从教团成立之日起，便在中国工作了将近300年，他们达到了什么目的了呢？所有的基督教教士迄今达到了什么目的呢？迄今为止，他们耗费巨大精力，付出了钱财、人和劳动力的代价，而他们所得到的东西，却被当今在那里发生的事件，而且还要继续发生的事件给一笔勾销了，犹如用笔划的条条道道

给涂掉了一样。(社会民主党人喊：的确如此，太对了！)近来发生的事件，其中包括他们讲述的漂亮话，以及发动的战争等等，所有这些都永远地、世代地埋藏在中国人民群众的心中。所造成的后果无非是基督教徒和基督教的一切作为遭到抵制，使中国人民对其产生强烈的、空前的仇恨。(左边有人喊：很对！)

诸位，这就是你们的政策、你们的著名演说和今天在中国的报复结出的硕果！卡尔大帝当时在费尔登下令杀害5000名被囚禁的萨克森人，这件事至今在历史上还被视为他犯下的最大罪行之一。可是今天，根据各种报告来看，遭到德国人和所有聚集在那里的士兵杀害的中国人远远超过了5000，其中还不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是一些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人。这纯粹是驱兽围猎。在军事射程范围的任何中国人，都像兔子一样，像一只野兽一样，被当作靶子枪杀。不论谁看到这样的报道都会心惊胆颤。最糟糕的是，没有一个人问一问，面对这些反基督教的野蛮行为，那些基督教的传授者，也就是专职传播基督教学说的一大批人在什么地方呢？(社会民主党人喊：说得好！很对！)一直到今天，我没有看到一个人站出来讲话。难道说基督教的复仇欲尚未得到满足？难道说男人、女人和儿童为基督教的神灵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难道说城市和乡村还没有被彻底摧毁和洗劫一空吗？难道说还必须继续毁灭下去？冬天即将来临，成千上万的人连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也被剥夺，他们忍饥挨饿地流浪于田间。还有数千人则凄惨地死去。这一切正是以基督教的名义进行屠杀报复的结果！(会场骚动。社会民主党人喊：听着！听着！)

诸位，现在我要谈一点同我的讲话关系不大的另一件事，这件事同样也涉及到近来在中国发生的问题，但正象我说的，它毕竟偏离了话题。今年8月3日国王来到不来梅港。他在那里向北德意志劳埃德码头工人和汉堡-美国航线的码头工人发表一次重要而

简短的演说，这些工人中有不少人曾因在开往中国的轮船上勤奋工作而得到过勋章。皇帝在演说中表示：他“授于工人们的嘉奖应当得到承认”，同时令他“满意的是，这些工人没有仿效受到无祖国的鼓动而误入歧途的汉堡工人的坏榜样，而是表现了德国工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勇敢地通力合作，从而使我们超人的军队更加机动灵活。”他还说：“无耻的含义是在危险时刻丢弃了祖国。”

先生们，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往往被人称为无祖国的人。对我们的这一指控未免过于冷酷。在上述情况下，假如这次演说仅仅涉及到我们社会民主党人，那我在这里就一句话也不用说了；我的话都说过了，这些话仅对我们起鼓动作用。（社会民主党人喊，很对！）但是，问题是现在还涉及到了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上述演说就是完全针对工人的。皇帝提出了他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指控，似乎他从他的顾问官那里听到了汇报。（左边有人喊：很对！）有那么一些人，总是企图利用各种场合向皇帝指控社会民主党人，这一次指控的却是工人。干这种事的都是一些卑鄙的人。我要向各位证明，事实就是如此。

受到皇帝指责的汉堡事态到底是怎样的呢？今年5月和6月，五金工人联合会在汉堡-阿尔托纳组织一次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造船工人也参加了这次运动。工人们还同造船主取得了联系，并打算同造船主进行谈判，而不举行罢工。但是，这一设想遭到造船主的拒绝，他们根本不给工人任何答复。因此，工人的计划完全落空。汉堡-阿尔托纳的雇主联合会一再声明，他们不想同工人组织进行谈判。不明内情的、组织起来的工人确是真心实意。于是，五金工人联合会宣布，它并不想号召工人罢工，而只是打算让个别工厂的工人向他们的雇主提出自己的要求。接着莱恩施蒂克造船厂大约有六七十名工人向雇主提出每小时提高少许芬尼工资的要求，因为他们比其他造船厂的工人工资低。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工

人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注意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铆工在开往中国的船上干过活，这些工人几乎牵扯不到这上面来。（左边有人喊：听着！听呀！）现在，莱恩施蒂克造船厂的铆工，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六七十人举行了罢工。造船主随即召集其工人委员会开会，并以解雇所有的工人，关闭工厂相威胁，如果这六七十名铆工不立即复工的话。接着工人委员会提出，我们不能这么做，这是那些人的事，同我们毫不相干。接下去。诸位，请注意，在7月14日、17日和21日，造船主开始实施其提到的威胁手段，他们先后把6000名工人开除出厂。（会场骚动。社会民主党人喊：听呀！听呀！）就是说，由于六七十名铆工罢工，致使6000名工人流浪街头，这次大解雇也涉及到了开往中国的船只。有人曾说，造船主是有意这么干的，他们不能准时按照契约交货，所以必须抓住大解雇这一措施，以逃避违约惩处。是否果真如此，不得而知；但是，事实上有6000名工人被造船主驱往街头，致使开往中国的轮船发生了人力配备上的困难。后来在8月3日皇帝又发表一次演说。8月14日，汉堡工商仲裁机关主席接受工人的委托而出面同造船主交涉，进行调解。工厂主对此表示拒绝，他们对调解不屑一顾。（左边有人喊：听呀！听呀！）9月6日，工人再次试图进行调解。现在工厂主终于同意同工人代表进行协商。最后的结果是，工厂主声明，愿意撤回对6000人的解雇令，并恢复罢工者的工作，条件是他們必须立即停止罢工。那些对雇主的态度不满的工人经过十分激烈的辩论，决定对这一声明表示同意，终于在9月24日重新复工。所以说开往中国的轮船仅仅晚点一个小时，任何工人也不能对此承担罪责。（听呀！听呀！）这件事再次表明——至高无上者要注意——那些身居要职的人，有责任向皇帝讲明真相，然而他们没有向皇帝讲事实，讲的全是假话（社会民主党人喊：非常对！）皇帝因此愤怒地训斥了开往中国的轮船受阻一事，他指责被解雇的工人，说他们

是没有祖国的家伙，但是，事实证明没有祖国的家伙不是工人，而是工厂主，唯独他们是没有祖国的家伙。（太好了！很对！）

现在我再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我继续讲国务秘书先生（有人喊叫），对，帝国首相先生的演说；对他的官衔我一时还不适应。（会场活跃）我们的预算备忘录曾经阐明过德国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意义，其中也提到了为什么我们在财力和人力方面为中国暴乱付出那么大的支出。我象李伯尔博士刚才一样，当帝国首相先生认为，我们不必索取赔偿时，感到吃惊的是，他在这里说，我们付出巨大支出是必然的，因为德国在中国的贸易已身居第二，所以参加进攻也就必须符合第二位的身份。的确，德国自己证实了它在中国的贸易属于第二位；但这个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呢？英国首居第一，它同中国的贸易在整个贸易当中占67%。189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是168100万马克，而德国同中国的进出口总贸易额是个零头，即8750万马克。换句话说，我们在中国的总贸易额仅占5.2%，不会再多了。这是非常少的一部分。近几年，尤其是美利坚合众国同中国的贸易额有所增长，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超过了德国，主要因为美利坚合众国（说到这里，我又要提到帝国首相先生了）相当明智，面对中国暴乱，这个国家注重稳定自己的地位，采取了稳妥的政策，它认为，在中国缔结和约是首要问题。（很对！）相反，由于我们对中国的态度，很有可能，但还不敢肯定，我们迄今在中国的贸易将来还要大幅度下降，我们现有的以及用武器付出代价得到的那些东西将难以保住。（左边有人喊：很对！）

1899年在整个中国共有983家外国公司，其中德国的公司仅占12.3%。可是1893年我们在中国的公司大约占14%。所以说，我们的公司在走下坡路。我们的加入中国国籍的居民情况也是一样。1899年住在中国的17193名外国居民中，德国居民是1134人，

就是说占6.5%；1873年德国居民占7.8%；所以说，德国居民的数量从那以后也在下降。值得正视的事实是，近几年来中国的情况对我们不利，这种虽称不上十分不利的情况，今天由于日前的暴乱将迫使我们同中国人的贸易关系趋向中断。

在中国，我们的经济处于如此尖锐，如此不成比例的状况之中，其原因恰恰在于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蜂拥而至去充当进军的重要角色。本来这个角色应当让给英国人，主角应由他们扮演。在我看来，本来日本人是准备担当强权执政者这个角色的。尽管克德林被杀，我们德国人仍然没有任何理由采取这种方式介入其中，而我们介入了，尤其是今后还要介入，我们在进犯中国的行列中，充当了所谓的世界统帅，对中国目前发生的事件，我们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左边有人喊：非常对！）

那么，我们又是怎样当上世界统帅的呢？众所周知，可以断言这是俄国皇帝的愿望。我这里有德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的备忘录，前不久有人把它收入黄皮书中出版；我还有俄国政府使者的发言，这两份文件所讲的内容完全背道而驰。只要有人在这里、在德国说，正是俄国皇帝期望瓦德西伯爵担任总司令官，那么俄国政府的使者就声明，这不是实情，而是德方有人在彼得堡提问过是否有人对这个提议有所反映，对此俄国客气地表示：没有人反对这项提议。其他列强也持同样看法；我们就是这样充当了这个角色。我们在中国扮演的角色同我们在中国所处的地位不相适应。后来中国的事态也并没有发展到德国非派它的头号军官，即总司令官去亚洲不可的地步。在这场战争中可以拿到好战的桂冠，可以在伟大的军事行动中大出风头，这就是战争，对吧？（左边有人喊：非常正确！）

诸位，我对各位讲的这些，都是我迄今读到的，也是根据我对军事情况的有限了解，这还是军事大臣先生向我提到的，在中国根

本不需要大元帅当指挥官，也不需要将军，甚至连上校都不需要。只要有德国第一流的优秀上士对付一下那里的战争就足够了。（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左边有人喊：妙极了。）

先生们，这是我给予德国上士的最高评价。我的目的在于，讲明这不是从中可以捞到桂冠的战争，甚至连李伯尔先生说的那种预支桂冠也不能得到。那里没有真正的桂冠可拿，可我们已经为未来的股东集团拨了款，这就越发令人不解。（会场活跃）当这场战争，或你们所说的骚乱或暴动结束的时候，我们总会看到，浩浩荡荡的凯旋大军穿过勃兰登堡门，为首者当然是手捧着从中国收罗到桂冠的世界统帅。（左边活跃）当然啰，接下去他还要发表长篇的热情演说。

但是，这位世界统帅在我们这里又是怎样表演的呢？的确，有的人在外国人面前就会故作姿态。（左边有人喊：很对！）外国人对此不是嘲笑就是蔑视。他突然一反德国将军的常态，发表了演说。这些卑劣的先例同样破坏了良好的风尚。（哄堂大笑）于是，照象机呀甚至还有摄影机什么的都围拢过来，以便给后代留下富有历史意义的壮观场面。更有甚者，正在统帅夫人上车时，有人抢拍了一个镜头，而大统帅这时正握着崭新的统帅仗站立一旁。接着从库尔施泰恩，即所谓的东亚大本营发来消息说，三位亲王已经在慕尼黑火车站等候迎接统帅；假设大统帅去中国，那里会是怎样的情景呢？看吧，他若不举行小型阅兵式，就同我去那里没什么两样，也是悄然入内。（哄堂大笑）

那么，这场战争的策划者迄今到底是怎样表演的呢？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些十分令人恼火的事情。这里我也只好使用匈奴政治这个词儿，因为这种叫法已经约定俗成。关于匈奴政治的思想在备忘录中比比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份备忘录是毕洛夫伯爵先生今年9月13日提交给列强的，他在备忘录中提出了一

些条件，他说按照德国宪法规定，一旦同中国缔结和约，就必须兑现上述条件。他还强调，进行外交会谈的前提是交出被指控为在北京侵犯国际公法的首犯。还说什么强奸民意是违背促进文明的良心的。瞧吧，他们现在就在强奸民意。毕洛夫接着说，人们会对一些亲王、对帝国的一些高级官员感到满意的。一定要把那些首犯交出来，然后最好在柏林的宪兵市场把他们处死，以便让柏林人也认识认识他们。多么绝妙的基督教政治！先生们，如果有朝一日所有其余的列强要唾弃一位国务活动家，要把他的要求扔到一边去，那么，这位国务活动家就是毕洛夫伯爵。这些要求就是所说的毕洛夫伯爵在今年9月13日匈奴备忘录中提出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喊：说得很对！）

现在让我们举几个例子，看看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来自那里的书信大部分已经公开发表。《十字报》^① 前些时候提出，人们应当打听一下写信人的姓名。书写者的姓名可以公开。假如普鲁士的、德意志的检查官对那里发生的事情，对现已出版的，以及已经公开发表的东西有所怀疑，或者军事当局对此有所怀疑，那么，检查官们可以履行其职责，对书写者、对发表书信的报刊提出指控！先生们，这样做不仅使社会民主党的报刊，而且也使中央党和民族自由党等所有政党的报刊统统失去言论自由。到目前为止，只有《十字报》没有报道任何消息，尽管在耸人听闻的行动中，《十字报》的通讯员刚刚来到现场。有一位军官在信中写道：“我们向那位刚刚到达这里的《十字报》通讯员讲述了这些卑劣行动。”可是直到今天，我从《十字报》上没有看到任何关于此事的报道。还有一封信，写于8月26日，内容是描述如何折磨76名俘虏，其中除

① 即《新普鲁士报》，1848年6月至1939年在柏林出版；是德国反革命和普鲁士容克，以及后来的德国保守党极右派的喉舌；该报报头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案，所以又称《十字报》。——编者注

8个年青人逃跑外，其余68人全被枪杀。他们把这68人的辫子捆在一起，枪杀前强迫他们为自己挖掘坟墓，站在坟边被打死，然后倒进去。（社会民主党人十分激动）这是些多么恐怖的事件，怎么能够让人想象得到！

另一封信上写道：“我们大家把抓来的中国人全部打死，把那些看到的和同我们作战的所有中国人统统刺死和打倒；俄国人还把很小的孩子、妇女和所有的东西用枪挑起来……（社会民主党人激动，喊道：听啊！听啊！）

……

一个年轻的士兵9月1日在致他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妈妈，目前此地，在作战期间情况到底是怎样的，简直难以动笔描述；因为迄今发生的一切可以说都是疯狂的屠杀和混战，中国人不能受到国际公法的保护，人们甚至不必逮捕他们就可以任意把他们杀死，或者他们得不到任何人的袒护，却随地任人残害。在礼拜日的下午”——说不定恰是礼拜日的神圣时刻——“我们不得不用刺刀刺死24名被抓来的人。”（会场骚动。左边有人喊：听啊！听啊！）

难道还有比这种作战方式更加恐怖、更加野蛮、更加卑劣的事情吗？让全世界的人都来严厉谴责这种暴行也还是不够的。最后，那个年轻人写道：“但愿这种事情不再长期延续；否则我们最终会完全忘记自己还曾经当过人。”（会场骚动。左边有人喊：听啊！听啊！）诸位先生，对于这场野蛮战争的控诉，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位士兵给母亲写的信更加有力吗？（左边有人喊：千真万确！很对！）

下面还有一封信发表在《汉诺威苦力报》上，是出自一位水兵之手，信中写道：“中国人对暴行进行了报复，而且也应当进行报复，这里的报复是相当可怕的。”

他接着写道，从北京打出去的时候他不在场，“不过这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因为后来除了谋杀什么也没做。”（左边有人喊：听啊！听啊！）“我在所有的地方，在兖州和其他坚固的城市以及路过的所有村庄到处可以看到尸体；那许许多多不能逃走的病人、妇女、儿童和老人躺在燃烧的废墟上。”（会场骚动）

接着他又讲了一些暴行，在谈到一個被占领的城市时说：“我们的步兵中队长站在一扇大门的前面，中国人从另一个方向被驱赶着穿过这扇门，对着他们的是我们步兵的刺刀。这是使人战栗的场面。”（会场骚动。左边有人喊：听啊！听啊！）

《十字报》的有关人员在谈到这件事时却说：“这段话是在《十字报》上刊登的报道，是根据我们记者采访的事实写成的报道。”但是，正如我说过的，我在《十字报》上对这类报道只字未见。

还有在一家自由主义的报刊《弗朗克苦力报》上，登过一封海军第二大队的士兵开赴瓦尔特斯霍夫时给他双亲写的信，其中写道：“不准俘虏随便活动，就是说只要他们不听话，打完仗立即被枪毙。”（左边有人喊：听呀！听呀！）

接着，9月11日威斯特卡波尔的水兵弗里德里希·希施弥勒从石門写来的信上说：“我们瞄准在面前跑过的10个中国人，当即射击。现在刺刀已经上好，我们的中尉命令，只要有人来，一律刺死。这一夜许多中国人被打死，其中还有妇女和儿童。我们在海岸等待着天明。5点钟我们进入村子，在那里看到死者躺在血泊之中。一个妇女坐在死去的丈夫身旁，怀中还抱着一个婴儿；她把死者放在一块木板上，在他的头底下还垫了枕头；这一情景看上去真是可怕，但我们对这一切已经习惯了。”（听呀！听呀！）

这场战争使人堕落到了极点，战争把人们现在仅有的道德洗劫一空。如果各位（向右边看一看）以后再到这个会场上来兴师问罪，那么，先生们，我们倒要问问诸位，目前发生的这一切暴行的罪

魁祸首是谁，他们在哪里呢？（左边有人喊：说得好极了！）在《慕尼黑最新新闻报》上发表一封德国军官的信，信上说：“……一进入大沽，我们就开始看到被战争严重破坏的非常使人恐怖的情景，那种可怕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铁路沿线有无以数计的俄国士兵站岗，沿线的一切村庄完全被烧毁，被洗劫，死气沉沉空荡无人，仅能看到几只狗跑来跑去，寻找尸体；所有居民，不分年龄和性别统统被俄国人打死。俄国人是我们富有诱惑力的好伙伴。”（听呀！听呀！）德国军官把杀人放火的刽子手称为富有诱惑力的好伙伴，妙极了。

下面，还有一封信是发表在青岛《莱茵人民报》上的，信中写道：“……我们德国人和俄国人向来都是第一流的。我们从天津把小分队和被中国人包围在那里的欧洲水兵解救了出来，占领了驻扎中国士兵和强盗，即所谓的义和团起义军的所有要塞，并且杀了所有的人，不管他是士兵，强盗还是中国老百姓，也不分什么妇女或儿童，反正他们对我们都是一样，统统刺死或枪毙。”（会场骚动。听呀！听呀！）

一个德国士兵就是这样描绘他干过的伤天害理的丑行！呸，见鬼去吧！这是我的话。（左边有人喊：说得对！）

从北京发来的一封信还提到一个新花招，其中写道：“清朝的官员，主要是那些税务官非常有钱，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抢劫一切。抢到的银子和丝绸立即卖掉。”他们就是这样把一切抢劫一空的。

还有其余几封信也在我这里，信上提到：“然后，我们还在村子里搜罗黄金。”

先生们，最可恶的人向士兵发出的命令是：绝不宽恕，凡是你们看到的一切全都摧毁。上面所讲的那些正是执行这一命令的必然结果。（左边有人喊：非常正确！）

先生们，英国曾有人担忧，二三十万名士兵从布尔战争中撤回英国可能会把恶习陋俗带回来，这些士兵恐怕还会把粗野和残暴行为传播在自己的国土上。在我们德国，也有人产生过这种忧虑；幸运的是，返乡的士兵不象英国士兵那么多。最近，《地方通讯报》的通讯员在该报发表一封信，信上说：

“众所周知，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一个活着的敌人，凡是没被子弹或刺刀致死的人，也会遭到其他的致命打击。”

瞧，先生们，正值英国人在德兰士瓦进行匈奴式战争之际，在我们的资产阶级报纸上却有人表达了如此合情合理的愤慨！有人攻击罗伯茨将军，说他在这场战争中完全置国际公法的全部条文于不顾，攻击得对！英国人挑起的对布尔人的侵略战争使人恨之入骨，英国人对布尔人采用的粗野的暴力行动和残忍手段令人愤怒得难以按捺！他们是一些只见别人眼中刺，不见自己眼中梁的人！（社会民主党人喊：太对了！说得好！）这些人对于本国人民的子弟对中国人任意野蛮摧残产生的合理愤慨却不说一句话！象英国人在德兰士瓦一样，我们在中国也是侵略者和压迫者；完全如上所述，我们也置战争与保护人类的一切条文于不顾，所以，我们进行的战争是一场真正的匈奴战争，是一场真正的汪达尔战争。（社会民主党人喊：说得对！很对！）那么，是不是还要夺取战争桂冠呢？不，先生们，瓦德西伯爵不是什么世界统帅，不是军事统帅，他干脆就是镇压首领。（社会民主党人情绪激昂，高喊：说得对！）这才是他应当配戴的军衔，而不是别的。军界有人反对这一观点，可我的看法不变；只是有一点我必须说明，有人把德国的第一军官（这自然指瓦德西伯爵，我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此事，但从各方面看，他享有此誉）把这位在欧洲内战时期指挥过德国军队的德国第一军官摆在这样的岗位上，比如派他去中国，这件事本身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是十分愚蠢的，我再说得温和些，似乎任何国家都没有

干过这类蠢事。(社会民主党人喊：说得对！很对！)还要补充一点：在这个地区还发生过许许多多其他的闻所未闻的事件。

帝国首相毕洛夫伯爵先生再次前来谈了众所周知的不可改变的决议。他提到的都是些次要的、鲜为人知的问题。我对这些问题并不特别关注；但是，先生们，请各位注意，假如我们的要求能够实现，比如要求在所有地区，即在那些基督教教士或者欧洲人被杀的所有地区，一定树立赎罪纪念碑之类的纪念物，那么，这在中国人民当中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结果无非是，使中国人民不断回忆起他们在这个时代经历过的可怕事件，从而不断产生新的仇恨。在不可改变的决议的重要条款中的确有这样的内容，我不能理解的是，这样一位政治家，一位还称得上略微精明的政治家和同他一样的政治家们怎么能够塞进这样一些条款(左边有人喊：非常正确！)，既然你们有了同那个国家和解的愿望。毕洛夫伯爵先生，您可以扪心自问，您恐怕没有这种愿望吧！不干些卑劣的勾当，又可以兑现决议中的大部分条款，那是令人难以相信的。

我再回到历史事件的话题上来。请诸位回忆一下，提起1807年至1813年拿破仑强迫普鲁士革职冯·施泰因男爵^①、冯·沙恩省长等精干的军官和官员这件事，至今还会使人产生非常恶劣的印象。席尔少校^② 1809年策动起义，犯了军事叛国罪，依据法律，他必定被判处死刑。后来，他的行动被视为爱国主义的伟大创举，人们把这一行动载入所有军事著作和其他历史著作当中。约克^③

① 冯·施泰因男爵(1757—1831)——普鲁士的重要改革家。起初任威斯特伐里亚矿厂厂长，后为普鲁士省省长，曾参加过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编者注

② 席尔·斐迪南(1776—1809)——普鲁士军官，反对拿破仑的游击队队长，在1809年起义中阵亡。——编者注

③ 约克，汉斯·大卫·路德维希·冯·瓦滕堡伯爵(1759—1830)——普鲁士将军，1821年起为元帅，曾参加过反对拿破仑的战争。——编者注

将军是麦克唐纳部队辅助部队的指挥官，他从俄国撤回，我清楚记得那是1812年9月30日，在陶罗根的普施伦磨房同俄国将军迪毕赤签定了著名协定^①，这件事被人称作军事叛国罪。此后，约克解散了为拿破仑效忠的普鲁士军队，并对俄国采取中立。约克虽然知道，他背着国王这样做会使拿破仑陷于最狼狈的境地，可他还是这样做了！先生们，现在各位难道还没有想到，在中国宫廷内部也有背着光绪皇帝采取同样立场的君臣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8年3月18日当外国使节们迫使他面对已经爆发的革命答应某些条件时，他不是也处于同光绪皇帝一样的境地吗？当时的革命比他更加强大，由这位普鲁士王子领导的军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端亲王的想法同光绪皇帝的想法不一样，因为端亲王更有实力。我从普鲁士历史中列举的这些例子应该使我们受到启迪。就是说，我们的要求应当更理智些，我有意不说更人道些，而仅仅说更理智一些。（会场气氛热烈）

接下去帝国首相先生讲了英德签署著名协定的伟大意义。先生们，我告诉诸位，这是近半年来帝国政府采取的最有理智的行动。只有一点使我感到遗憾，那就是4年以前应当签署这一协定，那样我们也就不能占领胶州湾了，胶州湾并不是威海卫和旅顺口，当时，还没有在中国犯下其他掠夺的罪行。（会场情绪热烈）当然啰，那时各位要想通过海军法案还没有找到恰当的借口。当议员李伯尔博士先生^②再次认为必须对世界政策提出强烈警告时，巴伐利亚鲁波莱希特亲王以威廉港那篇著名演说为基础在《维泰尔斯巴赫》开幕式上作了关于世界政策的演说，其中说道，凡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重大事件，德国都必须发表高见，李伯尔提出过警

① 通称陶罗根协定。——编者注

② 李伯尔·恩斯特（1833—1902）——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中央党的领袖之一。——编者注

告,然而一切徒劳。我提醒诸位,“世界政策”这个词儿第一次是在1896年1月18日出现的,那时正在王宫举行庆祝德意志帝国建立25周年的典礼。当时诸位先生,特别是李伯尔议员是坚决抵制这种提法的!各位进行了两年之久的抵制,你们在1897年初还否决了同今天相比几乎不值一提的海军法案。这之后,还不到7个月,这位中央党领袖李伯尔议员先生却突然改变了立场,推行世界政策的第一个海军法案也被通过了。以后不久,又通过了第二个海军法案,然而在这期间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如果就这一坚决立场而言,人们从你们通过海军法案这件事中得出结论说诸位象很早以前一样,现在又成了“当众出丑的欧洲人”了,那么,请各位不要对此加以非难。(会场情绪热烈。有人抗议)是的,你们就是当众出丑的欧洲人,抗议也无济于事!你们通过了海军法案,现在可以得出德国依仗强大的海军在世界各地横冲直撞的结论了。诸位千万不要抱怨说事已至今,帝国首相先生对此已经难以阻拦;因为他虽是帝国首相,可掌权的是另外一个人。(哄堂大笑)

诸位先生,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可能改变对中国的政策。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简单说来,我的看法如下:同中国缔结的条约^①应当合理,坚守公正;必须视中国为平等的国家。我国的使者应当表达这些看法;保障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者和外来暴力行动的抗击,这是首要的事;保护人民的政治和宗教信仰;按照俄国的例子,在传教士从中国撤回,或前往中国时,必须明确声称,传教士不受国家保护,他们独立行事,咎由自取;假如他们干了使所在国不满或愤怒的事情,那么,他们自己应对此负责,由他们承担责任;国家一律不介入他们的事务;所有列强可以自由贸易,并推行门户开放的政策——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赞成;如果各位也主张禁止武器输

^① 指辛丑条约。——编者注

入，那请你们再补充一句：禁止外来势力在中国土地上建立海军和其他军事设防，因为这个问题在第一条要求中已经提了出来。请诸位注意，在你们说中国不应当有武器的时候，中国却已经得到了武器。中国使馆中的一位成员曾经说过：如果他们不给我们提供武器和弹药，我们就收买他们的工程师和专业师傅，我们自己来生产武器弹药。中国人是相当机敏的，诸位同我一样，很久以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会场情绪热烈）举个例子吧，前不久，德英公布了缔结的条约，当时有人向驻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的一名成员提问，在该条约的第三条中提道：两国除已有的地盘外，将不再占领一寸土地，但是，假如对方再占领，我方绝不让步，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一条款呢？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十分巧妙：第三条的意思是：人家不偷我的，我也不偷人家的，人若偷了，我必去偷。（会场情绪激动）

所以问题在于执行的政策，现在你们执行的是令人反对的政策。首先，缔结和平协定的前提是让中国作为独立的国家和独立的民族而继续生存下去。仅仅说什么我们不要一寸土地是不够的，还必须提供使中国能够作为一个国家独立生存的可能性。我们曾在旧帝国国会说过一句漂亮话：一切民族都有生存的权利。它并非仅对德国人和其他民族而言，中国人也应当如此。必须给中国人提供作为中国人而生存的条件，否则混乱和战争就不会休止。再说决不应当制定复仇的政策，而只能制定合乎人类理性的政策。另外如果不抑制仇恨和复仇欲，必将造成使生命和财产付出新代价的后果，并且最终削弱我们在中国的一切影响，下降和停止我们在中国迄今进行的贸易。（左边有人喊：很对！）仇恨德国人、仇恨欧洲人以及仇恨基督教是你们的现政策结出的硕果，毕洛夫伯爵报告的决议中就包含着这一层意思。我们认为，这一政策是荒谬的、不幸的和危险的政策；因此我们坚决反对这一政策。出

于天良,我们决不赞成为这一政策哪怕仅仅批准一个分尼,所以我代表我们党团的全体、代表坐在右侧的人、代表人类声明(右边的人大笑,社会民主党人十分活跃)我们一致反对这项提案^①。(社会民主党人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右边的人骚动,发出笑声)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文选》1981
年法兰克福版第2卷第41—71页。

(葛 斯译)

^① 1900年11月19日和22日德意志帝国会开会,讨论为德国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拨款问题,会上倍倍尔和辛格尔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坚决反对德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反对拨款。——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

(1902年9月)

按 语

1902年夏,在曼海姆天主教大会上,大教堂主持、国会议员谢德勒博士在班堡受命对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对倍倍尔和福尔马尔发难,严加谴责。班堡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有必要给予谢德勒博士先生一个机会,以使他在有被攻击者在场的情况下重复他提出的谴责,于是在班堡的中央大厅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倍倍尔议员以报告人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谢德勒先生被邀请出席,但他借故推脱,拒绝到会。今年9月24日,会议在泽吉茨议员的主持下召开,全场座无虚席。泽吉茨简要叙述了召集这次大会的原因和谢德勒的言行,接着报告人倍倍尔发表了下述讲话。

倍倍尔在班堡的讲话

我的朋友泽吉茨已经向各位说明了召集这次大会的原因并说我出席了这次大会。我不隐晦,假如谢德勒博士此间没有在曼海姆发表那篇有名的演说,我是否会应命到班堡发表演说还是很值得怀疑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应当在他仙驾驻蹕(全场活跃)的地方来回敬他的高论。在场的班堡朋友们在我本人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这一点——,邀请了谢德勒博士先生,但他拒绝出席。我理解这一点;我根本就没有指望他会到场。而假

如有人事先征询我的意见，我可能会说：不要这样做了吧，这是徒劳之举。已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人虽然乐于抨击社会民主党，但却不敢与之对阵，这又一次得到了证明。敌对的政党拥有国家权力、教会、学校和绝大多数报界喉舌作为后盾，它们都千方百计为了自身的利益来曲解社会民主党，而不知内情的人肯定会据此得出对社会民主党的印象。这种骗人的鬼把戏从党成立的那天起，从斐迪南·拉萨尔上台的那天起，一直奉行至今。起初，这些攻击得到的反响很强烈，而我本人也一度受过它们宣传的影响而同社会民主党交过锋。但在对我来说，就象自那时以来的千千万万人一样，这早已成为过去。我已经从一个扫罗变成为使徒保罗^①了。而且我今天就是以保罗的身份站在各位面前的。社会民主党本身没有受到这场诽谤的伤害，尽管它的拥护者不得不忍受空前的迫害，个人的生计和健康受到损害成了家常便饭，有时还会丢掉脑袋。但是，这些迫害并不能阻止党前进的脚步。如果说基督教在草创之初曾受到信徒们的侮蔑，受到过国家权力和当时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那么，我们时代的国家权力和统治阶级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手段可称得上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不过，同样是白费力气。罗马帝国的种种迫害不过是助长了基督教的壮大，最终使之成为战无不胜的力量。我们今天的社会民主党的情形也是如此。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热烈掌声）这些人并不仅仅满足于依仗现有的法律来压制我们，而是认为要实行非常法，以肃清“叛国者”。基督不也是以叛国罪而钉上了十字架吗？——注意，不是由于他的宗教观点，而是因为人们要拿政治主张来栽赃陷害于他，说他想要当犹太国王云云。今天，把人钉到十字架上的事不会发生了，用火刑来消除“异教徒”的事也不会有了——尽管有些人是想这样干

① 即由一种见解的反对者变成这种见解的拥护者。——编者注

的——，而是把宣传社会民主党学说的人关进要塞，投入监狱。但这种方法也不会使我们悔过自新的；一切旨在“消灭”我们的如意算盘使我们由一个人数不多的、为人看不起的和遭人谩骂的党，变成了最强大的政党。它使那些盛极一时的党派相形见绌：这就是中央党。上届国会大选引起的震惊就是这一点的明证。中央党在全德国共得选票140万张，而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则获得选票210.7万张。预计在下次大选中，中央党会千方百计保住原票数，而社会民主党的票数会有大幅度的增长。以往的经验表明，只要这个党的主张符合象工人阶级这样广大的人民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这些主张本身具有其正义性，则任何镇压、迫害、造谣、诽谤都无损它的一根毫毛。在这种情况下横加迫害，就等于帮助被迫害者取得胜利。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就是有力的证明。也许我们在1881年举行的帝国议会第一次普选时在得票上少于1878年，那是由于非常法在开始阶段给我们造成的挫折。但是，党很快就从这一系列打击中恢复了过来。1881年它的候选人获得选票约31.2万张；1884年55万张；1887年76.3万张；1890年142.7万张。这些成就证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破了产。它失败了。

我们不认为我们党的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只应当归功于我们个人的活动，即使我们能够发挥我们肉体的和精神的力量赋予我们的一切。但是，假如关系的本质不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的活动也不会取得这种成就。在悲惨状况下的基督教也是如此，因为当时没有群众，没有赖以立足的土壤。当时罗马的被压迫者的情形就象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者和现代工人阶级的状况一样，他们没有逃脱使他们注定劳碌终生以求糊口的命运，而一小撮特权者则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这些统治阶级想尽一切办法使被剥夺了权利的群众处于对自己状况的无知状态，因而他们有理由说，人们只有利用无知的、人为地使之处于自满自足的无产者才能维持

现状。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奋斗目标就是向无产者说明他们的阶级状况，向他们指出通向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制度的道路，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都不复存在，更不用说仇恨和迫害，不用说那些千方百计为社会民主党制造工作困难的种种用心了。

社会民主党产生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使象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呢？简单说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今天统治着社会并激发了前所未有的阶级对立。这就是借助资本兴起的大企业，它们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统治了农业、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使中小企业的日子愈来愈不好过，愈来愈受到排挤，而大企业则一跃而为社会的决定因素。上述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使社会的组合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彻底的革命，引起了陈腐阶层的不安和焦虑，这成了我们时代的特点。这种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靠农业为生的人口同社会其他阶层相比人数愈来愈少；相反，单纯以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现代工人阶级愈来愈成为社会人口的大部份。

仅举几个数字就可以证明。例如1882年和1895年的农业人口；按照1882年的统计数字，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人约为1925万，而1895年只有1850万，尽管在这14年间德国人口净增了650万人。（全场活跃）在工业上情况则完全相反。1882年靠工业为生的约1600万，而1895年则为2000万，现在德国每年增加75万人口，但这些人不是到农业中去寻求面包，而是流入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

但是，工业企业愈来愈集中，企业的数量在减少，就业工人的人数却在急剧增加。统计数字表明：1882年工业性企业（含手工业）为2, 270, 339个，1895年只有2, 146, 972个，换句话说，减少

了123,267个,即减少了5.4%。在这段时间里,人口增加了14.5%。在这些企业中就业的工人数量1882年为3,849,550人,但在1895年则为5,510,500人,即增加了1,660,950人,也就是说增加了43%。(全场活跃)亏损的企业中首当其冲的是手工业企业,另一方面大、中型企业则急剧增加,而且规模愈来愈大。

但这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式往往超出自身的规模,它生产的货物多于能够销售的货物——因为消费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取决于需求,而是取决于销售的可能性。于是出现了生产过剩。货物充斥市场产生滞销现象;于是大批工人被解雇,劳动者工资下降,这就进一步限制了消费。危机频频出现,一次比一次严重。这就是我们当前(1902年9月)所处的局势,它扩散贫困并大批消灭无力竞争的企业,因为这种局面必然造成这些企业的倒闭。

导致资本主义统治的状况就是如此:一方面少数人独享文化的一切成就,另一方面广大群众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含辛茹苦。这决不可能是一种合理的、“上帝所希冀的”状况。那些在此岸世界坐享其成过舒服日子的人们,口里大讲的彼岸世界,同劳苦大众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在此岸就应当有享受安适生活的权利,他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因为世间为所有的人都准备了足够的食粮,还有同样多的良辰美景、佳饈美食。尘世并非无边苦海,起码不是针对我们中间的任何人的。我们不记得有过从某人的心上抢走他的“上帝”的愿望;谁信仰什么,这是他个人的私事;但我们也不想让宗教干涉国家事务,当成维护今天的社会制度的权力工具。这个社会制度是几百年漫长时期发展的结果,不是哪个个人的成就。假如有人向众位声称,社会民主党蓄意使用暴力来改变现状,那是胡说;社会民主党想用和平发展的方式,只要事态由它来决定的话。一种经济状况也不可能用暴力来加以变革;人们不能用更换衣服的办法来变更社会制度。因为社会制度是演变的,应当为新的社

会创造必要的条件，就象迄今为止任何陈旧的社会制度为后来的社会制度所做过的那样，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也要为社会主义制度做同样的事。我们的任务就是使人们认识这种变革的必然性。假如一个政党希望变革社会制度，又不超越必要的发展阶段，那么它是有能力缩短这些阶段的时间的。影响和威力也就是为此服务的，随着我们支持者数量的增加，我们会获得这种威力的。社会民主党这种大发展的基础在于那些厌恶现存社会制度者数量的不断增加。中央党喋喋不休，说今天也和以往没什么两样。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过去和今天不一样，今天在将来也不会重复出现。每个时代，每一天，同另一个时代，另一天都是有区别的。例如一个人，死了就不会复生，这好比一种状况，一旦逝去也就不会重复出现。发展是永不停步的，经济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假如有人说，人总是有贫富之分的，并且永远如此，那是欺人之谈。在社会发展的开始阶段一般都是平等的，当然这是指最低级的文化阶段而言。但是，几千年来，社会制度变化至今，每个制度都不同于今天的。以前是封建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今天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凡是近几十年认真观察过这一制度的人就会发现，它在这一短短期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并且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对社会民主党的压制

为阻止无产阶级运动(我们坚信这一运动的必然性)的前进，统治者们——谢德勒博士先生也不例外——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拒绝给群众以权利和自由，并且千方百计使群众处于无知状态，使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真正本质一无所知。因为愚蠢的臣民比聪明的更便于统治。(全场活跃)为此，他们首先是抓学校教育。今天的学校无异于国家的大驯兽团。学校把人们的头脑加工成容器，唯上是从。遏止运动的其他手段是尽可能限制出版、集会和结社自

由，并且剥夺工人在国家和公共事业中的选举权，例如萨克森邦就是如此。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却享有一切特权和自由。试问：假如有朝一日群众开动了思想机器，那可就要当心了。就象古罗马人所说的，一旦奴隶识数，那我们可就要小心了！——

谢德勒先生如今是在曼海姆天主教大会上发表这番讲话的，有必要对这篇东西加以澄清和批驳。另外，他还说：“工人组成的如此盛大的节日游行队伍是前所未有的。令我遗憾的只是福尔马尔和倍倍尔不在场。他们想必知道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是擎红旗的，还有无数工人是紧跟着十字旗的。”——要说不是所有的工人都跟随红旗前进，这我们也是知道的。我们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例如1898年我们为我们的候选人争取到200多万张选票。这虽然是个可观的数字，但这不过只相当于1000万德国选民中的1/4。我们还没有壮大到足以使一切工人都跟着我们走的程度，但我们有一天将要达到这种程度。（雷鸣般的掌声）因此，谢德勒先生就红旗的跟随者发表的高论纯属无稽之谈。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我们是一天天好起来，而中央党则一天天烂下去。（掌声）

“工人组成的如此盛大的节日游行队伍是前所未有的。”谢德勒先生说。我们承认这一点，因为一向禁止社会民主党举行工人的节日游行。中央党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受政府的保护。只有当死亡从我们手中夺走某个群众爱戴的领袖时，我们才有可能组织群众游行。那时中央党的游行队伍便无影无踪了。只有在两年前为我们的先行者李卜克内西送葬时，才可以见到这种场面。由于它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感召力，受到有觉悟的男女工人的崇敬，没有一个教皇，没有一个王公，没有一个皇帝能同他比肩。（雷鸣般的掌声）假如谢德勒先生心满意足地断言，跟随“十字旗”的人还有几十万，那我们就让他高兴去吧；我们不必为此动容。凡是要跟十字旗走的人，听其自便。我们在党内和工会内一概不问其宗教信

仰；宗教观点同党毫不相干，只要求和党有关系的人在政治上或工会事务上必须与我们的主张相同。不过，我们坚信，就是加入了中央党的工人，跟我们走的人数也会愈来愈多的。（掌声）

谢德勒先生还有一种说法，即认为只有教会才会帮助工人，接着就发表了那篇说国家给工人准备的就是“大炮和纳税单”的著名言论。他在班堡这个地方作过的阐述，说不定他现在已不希望再作了。的确，现代的国家早就不愿意为工人作什么事了，但是国家却支持中央党和自由主义政党。首先在这方面求助于国家的是斐迪南·拉萨尔。这需要社会民主党方面付出长期的劳动，直到最终国家和资产阶级政党（中央党也包括在内）认识到，他们也应当为工人作点什么时为止。这件任务的完成主要应当归功于我们的活动。除了俾斯麦谁也不会承认这个问题，因为他1884年在国会解释说：“假如没有社会民主党，假如没有这许多对它有所畏惧的人，我们也许还真不会搞这点社会改革的。”中央党也是首先由于社会主义运动才被迫赞成社会改革的，最初他们根本没有这种要求。

“国家只有大炮和纳税单”

“国家只有大炮和纳税单！”——是的，这一点也不错；但是，它的帮凶是谁呢？可不是社会民主党！首先是中央党人，因为他们双手赞成军事法案和建设舰队法案。中央党年复一年地投票赞成国家预算。旨在扩充军备和建设舰队的预算（包括退休金和帝国公债利息在内）每年超过10亿马克。（全场活跃）这笔开支逐年增长。因此，党，即这个所谓捍卫“基督教”的党和爱好和平和博爱的党，支持的不是旨在和平而是旨在战争和大规模屠杀的国家暴力！如此庞大的海陆军军备我们应当感谢谁呢？首先是中央党。他们自愿担当了“丢了面子的欧洲人”这一角色，而且确定国会在今后若

十年内都要支持建设舰队法案。同中央党相反，社会民主党主张和平睦邻友好。也就是去干基督教传教士1800多年以来希望作而没有作到的事情，不过后者也经常践踏和平和睦邻友好的原则，因为他们投票赞成战争和国家间的冲突不和。（热烈掌声）

兵源主要来自工人和下层；他们必须为战争付出代价。用军队去“保卫”谁呢？是你们工人吗？是你们一无所有的人吗？不是！而是有钱人；是这些人需要防范外人对自身的侵害，或者就象他们所说的，也要防范内部的敌人。那么从这些设施中得到好处的人就应当承受负担，这才合情合理。可事实与此恰好相反。通过关税和生活必需品直接税，重担被转嫁到赤贫者的头上。这是中央党举了手的。“把今天的面包给我们吧！”——尊敬的诸位，他们就是这样教给你们如何乞讨的；可是教给你们这样乞讨的那些人却同时提高了面包的价格。这就是中央党的正义性和他们的基督教政策。有人讲过这样的故事，说基督曾经把高利贷者用鞭子赶出了耶路撒冷的神庙；假如今天基督降世，他也许不来找社会民主党的麻烦，而把中央党人赶出神庙——即国会！（暴风雨般的掌声）

据说现在对生活必需品的关税还要再次加码，而中央党对这一政策拍手叫好，并为之辩护。它批准了肉类检验法。这样一来完全禁止了一系列肉类的进口。据说是出于对我们健康的关心，尽管这种所谓“不洁”肉类在外国人中间是皆人欢迎的东西。也许我们的胃口太虚弱了。（全场活跃）一点也不错，“把今天的面包给我们吧！”

所有这些附加在粮食、畜产品、肉类、糖、咖啡、食盐、啤酒、烟草、白酒、煤油等等生活必需品上面的关税主要是由下层人民负担的。所谓“合理的”税收政策都是中央党插手的结果。如果一个家庭中的孩子比较多，那么中央党的好汉们就说：“这是上帝的恩赐”，但是，为了使上帝的这种恩赐变得明显些，他们就得对一切生

活必需品增加开支。这种捐税和关税对穷苦人的打击尤其厉害，因为他们的家庭人口更多！这种税收政策是很不合理的。另外还有捐助政策，由于这项政策容克地主和庄园主每年坐收高达上千万马克的额外增款，用于白酒和糖料生产。但是，通过关税和纳税政策捞到绝大部分好处，并把负担转嫁到贫困百姓身上的这个阶级，却在事后自吹自擂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帝国的忠心。啊！爱国主义来得太轻易了，他们对一个以这种方式搜刮民财的帝国的热衷来得太轻易了。（全场活跃、掌声）中央党始终热烈支持这项政策。

教会是阶级国家的婢女

谢德勒博士先生在曼海姆的讲话中还说，教会砸烂了奴隶制的锁链，从而使工人变成了自由人。废话连篇，完全不顾历史的真实！教会并没有砸烂奴隶制，毋宁说教会更拿手的伎俩是使自身适应居统治地位的、经济的和国家的现状，而且它始终站在统治阶级一边。耶稣的使徒们为消除人们的疑虑也想唆使奴隶起来反抗奴隶主，想废除奴隶制。因此，保路斯^①说：“奴隶们，在你们获得自由以后要诚惶诚恐地服从你们的主人。”圣奥古斯丁解释说，基督不是叫自由人来当奴隶，而是叫坏人来当顺从的奴隶。甚至到公元1世纪，罗马还没有奴隶市场。教皇克雷门斯五世（1305—1314）认为“把异教徒变成奴隶”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尼古劳斯五世在1454年发布的诏书中允许“把所有伊斯兰教徒和异教徒永世沦为奴隶。”博尼法齐乌斯八世、西克斯图斯四世和尤利乌斯二世都曾以反抗教皇统治的罪名处罚过奴隶。托马斯·冯·阿奎那说过：“奴隶制就人的本质来说是有根据的。”可是，何必要追溯到遥远

^① 亨利希·埃伯哈德·哥特洛布·保路斯（1761—1851）——德国新教神学家，唯理论者。——编者注

的年代呢？奴隶制直到近代还在基督教国家中存在着；40年前北非就发生过伟大的奴隶解放战争，可是两个教派的教会都没有站在解放者一边，而是站在了奴隶主一边。信奉天主教的巴西，直到14年前才宣布废除奴隶制，但不是通过教会实现的，而是不顾教会的阻挠才实现的。凡是废除了奴隶制的国家，都不是由于宗教的原因，而是由于经济的原因。是谁废除了德国的农奴制呢？是教会？！谁这么认为，他就是在撒弥天大谎。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及后来1525年在反对教会和世俗统治（尤其是在法兰肯地区）的伟大农民战争（其目的是为了废除依附制这个枷锁）中，是谁反对过这些依附农和农奴了呢？所有的教士（包括路德）都站在奴隶主一边反对农民，并且血腥镇压了这个农民运动。特别是班堡和维尔茨堡的主教们都是反对农民的，他们把自己的城堡用来对付农民。（全场活跃）

就象教会主张过奴隶制一样，它也推崇过农奴制。今天它又来鼓吹维护雇佣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教会认为，使工人成为国家和企业主的有思想的工具，是自己的责任。（掌声）

这是教会的代表人物在我们历史发展现阶段所采取的真正立场。有人声音这是教会的“善举”。

例如，中央党若干年以来就试图用工会的形式把工人组织起来。它的用意何在呢？它是把宗教贯穿于工会运动，还专门为此成立了基督教工会，并试图把不分宗教信仰、具有共同利益的工人，按信仰的差别分割开来。为什么不把那些不分教派一致反对工人要求的企业主联合起来呢？——是的，农民是另外一个问题，企业主也许对此不感兴趣。遗憾的是工人是可以引导的。他们也许会让社会民主党这个魔鬼附了体，并且会获得使中央党反感的观点。《十字报》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为什么一定要大力支持基督教

组织，为什么这些组织是人们所希望的。这是出于分而治之的考虑：使工人分裂，从而削弱他们，这样就更便于统治了。真是一语道破了整个运动的内幕。天主教派的工人应当牢牢记住这一点。（热烈掌声）

谢德勒先生也说，教会也愿意工人得到一笔象样的工资，用以维持家计。教皇也说工人要求得到一份“合理的工资”。试问：什么叫合理的，够用的工资呢？有1.5、2、3、4马克的日工资吗？谢德勒先生或者别的什么人都不想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假如他把事情挑明，就会大出洋相了。据说在班堡这里有个拥有大约2000名工人的纺纱厂，我要说，一个成年男性工人的日工资是1.40—1.50马克。这就是“充足的”工资了吗？不！这是要饿肚皮的工资。（热烈鼓掌）企业的领导人甚至还是天主教帮工协会的荣誉成员，但这丝毫也改变不了上述事实。位于班堡的教会势力强大到足以叫工人不去拿这种要饿饭的工资，可它究竟干了些什么呢？它根本不关心工资，却试图让工人保持满意。我们并不要求教会为工人干什么好事，它要干的无非是给予工人自己安排自己的政治和工会事务的起码的自由，而不要充当他们的监护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教会对工人关怀备至的是要他们奴隶般地依附于企业主。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热烈掌声）

“教会从来没有欺骗和剥削过工人，不过教会也没有向工人说，最好是把一切都头足倒置。”谢德勒先生接着说。因此，他想借此中伤社会民主党。这是再合适不过的套话了。假如他所说的“头足倒置”指的不是革命，那么他倒可以反躬自问一下，因为社会民主党还没有发动过革命，可资产阶级倒确实是发动过了。

1649年以英王查理一世人头落地而告终的英国大革命，1789—1795年以路易十六和玛丽亚—安东尼达断头台授首的法国大革命，以及波及德国的1830、1848和1849年的一系列革命运

动，无例外的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它们都是很有益的革命，因为没有这些革命，我们也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热烈掌声）

社会民主党的目标

我已经说过，我们知道，一种经济制度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应当从事物的内在本质出发去创造变革的条件。社会民主党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受益的只是少数人，这种状况是不合理的。人人有权享受文化成果；人人都应当尽其所能，人人也都应当全权享受共同劳动的成果。假如生产工具全部属于公有，而不是个体所有，就可以实现上述设想。在整个经济领域，合作社企业就会大量涌现，并且用我们拥有的技术和科学手段来加以装备。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劳动发挥最高的效益，这样就会创造出使人人都能过上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的财富来。

简单来说，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这也就是某些人把社会民主党视为洪水猛兽的原因。这里讲的是指一种与我们文化的最初阶段即古代村社相类似的制度，土地归集体所有。要建立类似的制度，不过是在更高的文化发展阶段，使用历时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为我们提供的财富，这就是我们的奋斗方向。人人都应当劳动，不过也要吃饭。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们追求的是自由和平等，即人人具有平等生存的条件！这不是一个高尚的目标吗？！我们所要实现的正是基督教迄今为止虽然致力但毫无结果的东西。正因为我们心中怀着这样美好的目标，所以在别人眼中我们也就成了一切文化的罪犯和破坏者！我们不要破坏，而是变革，从而通过劳动和人类社会的合理组织，也向赤贫者敞开文化财富。教会的代理人同我们是对立的，他们把重新建立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视为大逆不道。在基督教开始盛行的几个世纪中，即在当时的许多

国家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行原始共产主义所有制的时候，教会明知它自己也主张一切财产都属于公共所有的学说，可它们的代理人却不这么说。

主教克雷门斯一世(死于102年)就说过：“对今世各种东西的需求，对大家来说是共同的。这是我们，这属于我，那个属于别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从那以后，不和睦就来到了人间。”主教昂布鲁西乌斯·冯·韦兰德(大约生活在347年前后)说：“大自然把一切财富都给了每个人；因为上帝创造了万物，因而对大家来说享受也就是共同的，尘世也就成为公共的占有物。这样一来，大自然也就创造了公有权。只是不合理的占有(掠夺式的)才制造了占有权。”圣·约翰·克里桑斯托穆斯(死于407)在他的布道中说：“决不要说某物属谁所有；我们受之于上帝的任何东西都是共同享用的东西。因此，讲你的，我的，都是谎话。”圣奥古斯丁(死于430年)说过：“由于个人所有权的存在，也就存在诉讼、敌意、不睦、战争、起义、罪孽、非正义、屠杀等等。这些不好的东西从何而来呢？就是从财产而来。因此，我的兄弟们！我们不赞成把物当作财产据为私有，换句话说，起码我们不要去爱它。”

奥古斯丁最恰如其份地描述了私有财产的本质和恶劣影响。教皇格雷哥里大帝(约在公元600年前后)曾经说过：“你们应当明白，大地怎样造就了你们，一切的人都是团体性的，因此，大地所结的果实也应一律属于大家所有。”

请大家看一看吧，过去不少教会领袖无例外的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视为合乎情理的、作为上帝旨意的东西，正是今天的宗教代理人拼命反对的。

“你们是基督教国家的敌人”，有人这样谴责我们。但是，我们的国家不是基督教的，而是平等的国家，即在这个国家中的人都有信仰自由，因此宗教信仰自由被宣布为国家的根本法。假如说国

家真的就是基督教国家，那么其统治形式也要另换一个样子了。国家不承认人人皆兄弟，它也不会叫有两件衣服的人把另一件给别人穿。例如，今天的帝国关税和税务制度就不同于基督教。国家同基督教毫不相干，它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政体，因此，它只处理世俗事务。谢德勒先生最近在通滕豪森发表讲话说：社会民主党想使学校非基督教化。学校理所当然地不应同宗教和教会发生任何关系，因为学校是由国家设立的世俗机构。国家的公民们为了在维护生存的斗争中更好地武装起来，需要获得必要的知识。义务教育是国家义务的一个侧面，义务兵役制是另一个侧面。两者相互补充，两者都是与宗教和教会无关的纯国家即纯社会设施。假如照教会的意见办事，义务教育就要取消。当比利时天主教部排挤自由派时，采取的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取消义务教育，并遣散4000多名教师。教会不喜欢学校的教育，因为取消义务教育会使人民群众意识不到人的尊严和自己的阶级状况，穷人的孩子命中注定要为富人当牛作马，永世当穷鬼。我们的立场是，学校和教会，教会同国家不应当彼此不分。宗教应当是个人的私事。维持教会及其工作人员乃是教徒的事。国家应当全面维护宗教自由。我们不仅口头上如此，因为尽管耶稣是我们的死敌，但我们始终投票赞成取消针对耶稣会的非常法案，这一事实可以作证。中央党不同于我们，其大多数成员屡次投票赞成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假如耶稣会成员今天到这里来，我一定表示欢迎，就象欢迎谢德勒先生一样。他是如此聪明，就象耶稣会成员一样。（全场十分活跃）社会民主党是唯一真正的完全宽容的政党，完全正义的政党。我再补充一句：它是博爱的政党。我们希望各国联合，希望世界和平。我们主张采取一切措施来提高个人和整体的福利，各国联合一致。我们坚决反对离间各国人民的作法，坚决反对把文化的进步用于完善各国相互残杀的武器。我们要求结束一切与文明相背离的状况，以此

使我们的主张和要求就象平等、正义、博爱的阳光一样照耀在每个人的脸上！（暴风雨般的、长时间的掌声）

附 录

中央党的罪行录

中央党是保护关税政策和对一切生活资料征收高关税政策的坚决拥护者。即对所有农业产品：各种粮食、畜产品、肉类、黄油、啤酒、奶酪、水果、蔬菜等等，征收高关税。

中央党也是旨在嫁祸于穷人、有利于富人的间接税的坚决拥护者。

它同意对糖、啤酒、白酒、国产烟草、盐等征收高额税。就像俾斯麦当年一样，称这些东西为“广大群众的奢侈品”。

1878年间接税和关税的纯收入为235.5百万马克，而到1902年竟达819百万马克。

由于新制定的关税额的原因，关税还要再增加几百万马克。

相反，中央党却一再声明反对实行帝国收入税、财产税和遗产税；它不愿意叫有钱人通过直接税的实施来承担国家的负担，不愿意以此来使他们感觉到，维持他们的帝国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中央党也是所谓捐赠政策的拥护者。是它赞成通过对白酒税的立法。借助这一政策，白酒酿造商每年要从白酒消费者手中捞取4300万马克的好处。特别是大的酿造商从中获利高达10万马克以上。

此外，中央党还同意奖励糖类出口方案，糖厂——和糖厂的所有者绝大多数都是有钱人——每年给其他帝国公民增加的负担达3000万马克之多。

以前在所谓的文化斗争时代曾经是反对党的中央党，今天是

政府的忠实信徒，若干年以来，它一直赞成提交给国会的军事和舰队建设法案。

例如1898年的第一次建造舰队法案和1900年的第二次、规模更大的一次建造舰队法案就是如此。到1917年为止，这两项提案要耗费435.5亿马克的资金。此间，1899年它还批准了使陆军人数再次增加两万人的军事法案。

由于国会下一届任期还会提出新的海军提案，应当认为，中央党一定会投赞成票。同样，它也会批准为此必需的新征税法案，加重贫困阶级的经济负担。

中央党也是殖民地政策的支柱，尽管它自己无法否认，帝国的直接补贴和为殖民地的间接支出（船只维修费用等等）大大超过德国同自己殖民地商业交往的费用。尽管这些殖民地中最大的殖民地（东非和南非）的未来前途根本是靠不住的。

自1872年以来，德国人口由4200万增到5800万。但是旧时对国会选区的划分沿用至今，致使我们一方面有着不满10万人的选区，另一方面也有超过60万人的选区。例如柏林第六选区就是如此。对城市和工业区来说选区划分不合理是有害的。上届国会在讨论依法重新划定选区的动议时，中央党一致投票反对。中央党不愿意绝大多数直接和间接纳税人——城市的和工业区的——享有选举权。

中央党虽然声音赞成维护帝国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因为不这样作，它就会丧失在帝国议会中的影响），但是，他们对把这种选举权扩大到各州的事则抱旁观态度。普鲁士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可怜到极点的选举法，所谓第三等级选举法。谁也没有看到有人去抗争。在巴伐利亚则是经过社会民主党一年多的敦促，中央党才宣布赞成选举法。但是它却把新选举法的实施依附于一个由它认可的选区划分上，那就是低地即普鲁士受优

待。

中央党长时间以来一直依照非常法的脸色行事，有一部分今天也还是如此。但这并不妨碍大部分中央党议员一再支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凡在讨论该法的延长时，中央党总是投票赞成。

中央党自称是同工人亲善的党。其实，中央党的一大部分，尤其是代表农业选区的那一部分，乃是社会改良无形中的敌人。因此，中央党在一切涉及社会政治措施的地方表现得十分公允平和，推行一种拖沓和保持距离的政策。

中央党也试图尽可能使劳动保护措施脱离手工业和房屋建筑业。

中央党从这种暧昧立场出发，始终断然拒绝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有关劳动保护措施的详尽提案，如更大范围的妇女、儿童劳动保护措施，法定正常工作日，房屋建筑工业的劳动保护措施等等。

社会民主党一再在国会提出旨在要求给予工人以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的各种提案。

中央党则始终投票反对，对有详细内容的提案不置可否。

1899年在讨论工商业管理条例补充法案时，社会民主党提出一项动议，认为店主在其酒店被用作协会集会和公共集会场所时有权反对警察的干扰。中央党则反对这项提案。

1900、1901年在讨论工商法庭补充条款时，社会民主党提出普遍设立工商法庭的义务。中央党则投票反对。

这之后，社会民主党提议，起码要在居民超过一万人的地区设立工商法庭。中央党也加以反对。它只同意在人口超过两万人的城市设立。

社会民主党提出要保护在商店里工作的店员，他们要实行12小时休息制和晚8时关门制。中央党也表示反对。

基督教矿工职工协会要求提高工伤事故抚恤金和改进工伤事故法。中央党于1900年5月8日投票反对，而社会民主党则赞成这一提案。

上西里西亚基督教工人协会提出在矿山和工厂实行8小时工作制。中央党于1900年4月27日投票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则表示支持。

基督教纺织工人协会向国会提出的一项动议中一致要求：

1. 在纺织业工作的人，每天劳动10小时（包括休息时间在內）。这项制度要在法律上予以确认；
2. 午休从一个小时延长到一个半小时；
3. 完全废除晚8时至早6时的夜班劳动；
4. 允许纺纱工和织布工午休时间留在厂里作某种工作；
5. 在人口超过1万人的城市设立工商法庭；
6. 规定普遍建立工人委员会。

一年以前，萨克森和布尔谢德地区的基督教社会工人协会和巴伐利亚有组织的天主教纺织工人也向国会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在审议委员会上，中央党的代表反对讨论这一提议。后来，在主席团研究时，达斯巴赫议员提出要对这一提议进行审议，但很快就改换了腔调，提出一个修正案，建议作为资料提请政府考虑。

但就是这个修正案也得不到中央党的充分支持。

在研究伤残和养老保险法的补充方案时，社会民主党建议，一旦工人只能挣得其工资的一半，就应当支付伤残金。中央党投票反对这一提案，同意者只占1/3。

社会民主党在讨论事故保险法时建议，事故保险协会应当从事故发生的第一天起就承担全部事故费用，以便使人在开始的13个星期内无法把事故费转到医疗费上去。

中央党对社会民主党的提案一概表示拒绝。

最近中央党在国会以决议的形式提出的关于建立帝国劳动部的建议，自1884年以来社会民主党提过不只一次，始终遭到中央党的抵制。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关于建立劳动处的提议，也遭到了同样的境遇。

中央党也敌视教育事业。工人要想得到作人的权利，就必须有知识。中央党无论在哪一个邦都竭力使工人的知识占有水平维持在最低限度，只允许他们受一点可怜的学校教育。

中央党在巴伐利亚的影响最大。那里废除了八年制的学校教育，年满13岁的孩子就得离开学校。中央党无处不在反对义务进修学校的设立，尤其在农村。

相反，中央党打算把学校完全置于教会的控制之下，尽管学校是纯世俗机构。

1891—1892年在普鲁士邦议会上提出所谓蔡特利兹学校法草案(这个草案的目的是更加降低教育水准，扩大教会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时，中央党欣喜若狂，举双手赞成。对他们来说这个草案甚至还嫌过于自由化了呢！在讨论草案时，中央党领导人彼得·赖辛施佩格^①发表讲话说：“我坦率地说，一切普通八年制学校都可以把宗教、读、写、算术等基础课作为义务教学的内容，以便使学生能完全领会这些教材……提案的第六款说，适用于一切八年制学校普遍义务教育的内容应该是：祖国历史、地理、自然、图画！诸位先生们，这些很好的内容。但是，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而且对于整体和国家来说也是最严重的威胁。我要提个简短的问题，那些饱受这些美好事物折磨的年满14和15岁的年轻人——当雇农的，当饲养工的、放羊的、牧鹅的、当学徒、当工厂工人的——是否乐于踏上为他们敞开的生活道路呢？我要问一

^① 彼得·弗兰茨·赖辛施佩格（1810—1892）——德国政治活动家，法学家，从1871—1892年是帝国国会议员，属中央党。——编者注

声，我的先生们，这些年轻人是否会满意地，也就是脸无愧色、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些差事，他们是否会认为要尽上述的义务无须受这么多的教育呢？”

这番讲话的基本意思就是：工人愈愚蠢，企业家的日子愈好过！

要是中央党掌权，它肯定要全面废除义务教育的。比利时天主教派掌权时，立即废除了义务教育，遣散了4000名教师。

教皇作为庇护者的教会国家，直到1871年国家灭亡时为止，都没有实行过义务教育。在教会执政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过着愚昧、赤贫的生活。世界上教会执政的国家中，乞丐和罪犯是最多的，那不勒斯王国就是如此。

因此，中央党无论在经济、政治领域，还是在宗教领域，都是工人的死敌。

中央党内粗野化

中央党对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控告是人们最习惯采用的，不过也是最不讲理的：说社会民主党使群众变得粗野。

事实正好与此相反。凡是社会民主党拥有群众的地方，工人阶级的精神和道德面貌也就表现得更加高尚。道理极其明显，因为社会民主党教育工人认真思考问题，并用理想去指导他们的活动和斗争。

相反，中央党的大人物们经常批判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要求人类进步的主张，而且愈来愈粗野。例证如下：

在腊文斯堡（符滕堡）举行的天主教大会上，已故议员李伯尔针对社会民主党发表了如下讲话（1892年6月7日）：

“人们虽然说‘天主教徒是愚蠢的’，但是，成就的取得证明，事情恰好相反。因此，我们齐心协力——上士瓦本人已经这样作

了——，把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是用拳头就是用鞋后跟毫不含糊地轰出门外。(好哇！)”

李伯尔的这段话引自1902年10月13日天主教的报纸《士瓦本破晓报》(一份德文小报)的第1892年年卷第130号。

1898年大选时，来自巴伐利亚选区的一张中央党的传单上这样写道：

剥下社会民主党每个选民的皮钉在大门上。

1899年7月出版于亚尔萨斯米尔蒙森的《上亚尔萨斯省报》(主办人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诋毁社会民主党及其对达尔文物种起源学说的立场：

“凡是想当灵长类的猴子或想往更高阶段发展的人，就会变成社会民主党人，就会允许这些高明的言论在自己面前鼓噪，然后再传播开去。我们也许要向我们的资产阶级、挑唆者、社会主义者的对头们紧急建议，假如全部社会问题仅限于这些猴子的不合理的和不健全的要求，人们就会把大部分鼓噪者一棍子打死，那就会少几个吃饭的了，这是一大益处！——也少几个煽动狂和幻想狂——社会问题相当大的一部分就迎刃而解了！众所周知，对猴子就象对待其他的动物一样，一旦变得招人讨厌，就得来点不客气的。这就是人权！只要有益，就得用它。假如招人讨厌或有危险性，就得干掉它！当屠夫，把它扔到剥皮场上！这就是畜生即高度发达的动物应得的下场！”

1902年11月初，天主教的报纸《巴伐利亚农民》发表了如下文章表明它对其他信仰者的耐性：

“这些坏蛋教诲人们说，上帝是没有的，人是猴子变的。应当把这些家伙削低一头，管他是大学教授，还是别的什么教师。但却不是干掉他们，反而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王公们就是这样犒赏他们的刽子手的，就是这样培养杀害国王的刽子手的。”

为什么要对亵渎上帝的人表现出这种莫名其妙的怒气呢？基督教的上帝就是全能的上帝，因而他是可以自救的，如果他愿意的话。

来自1902年的报导是证明基督教的容忍和博爱的另外的例证：

“上月26日驻泰麦斯法的大主教德赛菲公布了一份教皇告谕，所属日期为今年7月28日的教皇告谕。这份告谕要求‘忠实的基督徒们’为消除异端而祈祷。这份告谕的题目叫作：‘关于消除异端的告谕’，它给一切忠实的热心祈祷消除异端的基督徒免罪7年。”

表明基督教的容忍和博爱的第三个例子是天主教《新慕尼黑日报》发表的一则消息：是针对“摆脱罗马教廷运动”的机关报《瓦尔特堡报》而写的。文章发表于1902年3月中旬，其中写道：“假如说他列曼先生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那就应当敬告他和来自萨克森和奥地利的慕名者们，他们的耳朵会聋，眼睛会瞎的。即使今天，也还是有把外国的闹事者和北德的劫道贼赶到庙里去的，假如有这个必要的话，用连枷和粪叉。”

世上还有比上面引用的这些言论和文章更无理、更卑鄙和更急不可耐的吗？假如社会民主党的演说家或社会民主党的文章也对中央党干过类似的事情，请拿出证据来！

反社会民主党的卑劣行径，可从下面这一份被攻击者强制诽谤者作出的声明中看出来。

声 明

去年，在卡尔克地区举行的工商法庭的选举中，发现了散发的反对自由工会的传单。其中有如下的字句：

“基督教的工人们！你们面临着选举。你们愿意把猢猻的孙

子派往米尔海姆的工商法庭，还是选送一个坚持人的尊严的基督徒？

工商法庭的陪审法官必须宣誓秉公执法。假如是一位社会民主党员领誓，那极可能是表面文章，而不是你们可以信赖的誓词……

闹事者、革命者、以杀人为快事者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你们要选以杀人为快事的革命者吗？

你们要严正回答社会民主党人！不要投这些臭名昭著者的票！……

每年都要从两百万德国工人身上筹集上千万马克，可都干了些什么呢？50个领导人要从1万马克中获取300马克，从5000马克中获取500马克，从3000马克中……余者以此类推。德国工人们，这就是你们钱的用场，而社会民主党却恬不知耻地自称是工人的政党。

滚开吧，你们这些工人身上的寄生虫和吸血鬼！

卡尔克的社会民主党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散布流言蜚语蛊惑人心的人！……

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写道：

‘要千百遍槌击灭绝人性者的胸膛，

当杀人的鲜血冲天喷起，

那时我也会在场。’……

1890年科伦出版的传单承认：

‘设置的障碍必须推翻，

血和瓦砾使我们为实现目的而战，

假如需要，甚至残遭杀戮也不胆寒。’”

下面签字划押的人供认自己是该文的作者，并作如下声明：我承认上述说法是缺乏根据的。我表示收回其中攻击自由工会、它

的选举委员会、它的候选人，特别是攻击社会民主党的污蔑之词。仅致歉意。

卡普兰·齐莱森

1901年2月1日于卡尔克

基督教的慈善家们

1902年1月报纸报道了如下的一则消息：

饿 毙

位于施万道尔夫(上普法尔茨)新教堂的牧师村，有一个精神衰弱的20来岁的青年叫麦克斯·格拉夫。尽管日前新教堂是区里最富庶的教区且农民都很有钱，却认为规定每年要付他200马克的生活费过多，因此把这个穷人遣送回乡。他上无片瓦，下无藏身之地，甚至连块木头都没有。谁也不关心这位不幸的人。上星期，人们在他一贫如洗的老屋中发现，他已经死了。埋葬之事已经确定，宪兵队已贴出告示。法院当局对尸体进行了调查和解剖，查明死因如下：“饿毙”。胃是空的。肠中尚有布的残片和谷粒。双腿已冻坏，饿成骨架的躯体满布着虱子。对这个穷人在最后几天里的喊叫，无人过问。这个教区就位于巴伐利亚中央党爱国者最可靠的领地之一的附近。他们的市长就是中央党的前任议员劳滕施莱格。——后来只判了他3个月的监禁了事。

发生上述事件以后没有几个月，报纸又报导了主教教区(就是教会主持谢德勒博士所在的教区)的下列事实：

天主教大会的一位牺牲者

在瑞士法语区的尼德米尔斯贝格(离班堡很近)，当贫民养老院院长出席天主教大会逗留在曼海姆之际，一位70高龄的老妇人

惨遭饿死。受委托负责照管老人的教区女佣人因去参加弗尔施海姆的宗教节日而擅离职守。在发现这具无人照料的尸体的前一天，老人就已经死了。其状惨不忍睹。”

可以看出，正是那些自认为比社会民主党超脱得多的人，践踏了最起码的人权。

这样的事件在社会民主党的公共设施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基督教的善心

1902年10月通过报纸发布了一则通告：

工人们在奥尔米兹地方虔诚的大主教的领地上的森林拣拾了柴火。枢密顾问泰奥多尔·罗恩阁下被窃之感油然而生。《圣经》中有这样的话：“假如你在自己田地里收获庄稼，你应当不要绝了怜悯之心，也不要把它一切都收光！因此，你也不要摘光酿酒用的葡萄，而应当把它留给穷人和异乡人，因为我是主，你们的上帝”。而高贵的神职大人们的管理局则迫不及待地向设在瓦拉西施—麦泽里奇的地方法院递交了惩罚通知。拟将犯人处以软禁。但是，昨天来自诺伊蒂特沙因的电讯说，县法院取消了这一判决，并释放了“盗木贼”，因为“他们每日的工资才只有11个十字币，生活已处于困境。按老的传统观念来说，拾柴可以被认为是一些人的权利。”

大主教罗恩是奥地利神职人员中的首富。他的年收入是140万马克，或者说每天3835马克。这位殷实的高级神职人员指使法院迫害拣拾少许柴薪的工人，这些人每天的工资只有11个十字币，折合36分尼。

假如基督看到那些在他的范围内擅自传道的人，他会说些什么呢？

《马太福音》第19章第21节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以去

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马太福音》第19章第24节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路加福音》第12章第33、34节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近，虫不能蛀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那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奥尔米兹地方的大主教还拥有数千个象他一样的基督教弟兄。教会积累的财宝堆积如山。

我们不清楚德国的教会、修道院到底拥有多少财产。不过通过对天主教邻国这方面情形的了解，我们多少会明白一些其中的奥秘。

奥地利教会财产总数为：

1886年36500万盾；

1890年33300万盾；

1895年39800万盾。

这也就是说，在短短的15年里，由原来的12400万盾，增殖为一个庞大的数字。这件事表明，教会严重忽视了它对穷人、对收入低微的下等神职人员所承担的义务。

从奥地利教会每年收入2800万盾，从中支出1662.8万盾，节余1153.5万盾。可见奥地利要缴纳税款的穷苦人有多少啊！

在比利时，神职人员的教团组织 and 宗教团体的势力和影响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有了很大增长。1846年，比利时拥有寺院779座，计12000人。1900年则增至2225座37,700人。隶属于寺院的、由它们居住的或出租的建筑物总值约73000万法郎；内部设施、供物、家俱等的保险价值达36500万法郎，以致于天主教教团这种形式的财产总数达135000万法郎之巨。但教团占有的胃口仍有增

无己。田产、树林、牧场、作坊、商号、饭店这些由中间人经营或开办的名目都是教团的财产。因此，实际的财产占有远远超过有据可查的数字。

僧侣和教会财产积累如此之大，这怎么能同基督的教义相吻合呢？

修女对儿童的虐待

近年来发生在“善良牧人”修道院和法国其他修道院的惨不忍睹的事件披露了出来。这些事件说明，那些以其宗教自诩的人会干出多么野蛮的勾当！

法国社会主义议员富尼埃揭露了“善良牧人”修道院和其分院发生的如下事实：

……年轻的女孩子一旦被解雇就得不到任何的报酬。人们强迫她们住进公共的房屋。（暴风雨般的抗议呼声）。南赫的主教也谈到过此事。他另外还谈到修道院中的孤女们只为宫廷侍从劳动……一旦她们的健康状况变坏，就分文不给，扫地出门，这乃是各修道院的例行公事。假如她们无法胜任修女们指派的劳动，就会遭到禁闭。对女孩子们的虐待罄竹难书。人们用湿布堵住她们的嘴，使她们无法喊叫。有的修女强迫孤女吞食用尿浸过的面包块，并在一旁喊叫：“吃掉你拉出的粪便！”

有的地方在体罚之前把皮鞭沾上凉水，以使鞭笞更加疼痛难熬。有一个女孩子叙述说，她被勒令在头上罩住一个口袋，只有在进食时方准取下。在那里，孩子们总是在晚点名时被告明天早晨挨棍打的次数。

在匈牙利，修女们勒令年纪较大的鞭打年纪较小的女孩子。那些修道院中的死亡率相当高。

在翁诺纳修道院，有一次孩子们作了为期9天的祷告，因为她

们希望通过对上帝的颂扬而免除她们的痛苦。

在南赫修道院，每年都要有11名儿童死亡。医生有一天为患者开了处方，这时修女却说：“这味药太贵了。”

不久前，奥尔兰斯孤儿院有一个孩子为逃避虐待而逃亡。这里修女的拿手好戏是箠刑和捆，使七、八岁的孩子如坐针毡。

1887年在摩兰热的修道院发生麻疹。孩子们受了极坏的待遇，结果100人中只有6人死里逃生。有一名叫玛丽亚的修女狠狠地踢了一个孩子一脚，造成膀胱破裂。这个孩子疼痛难忍，死于非命。

应当承认，南赫地区的图里那兹主教由于前往视察，了解到这些暴行。这位主教早在90年代中期就向罗马教皇告发了修女们的所作所为，但他却被勒令守口如瓶。当社会主义的议员就此事在议会发言以后，当局和法院都进行了调查，证明上述暴行完全属实。并且还发现了一系列比法国法院不久前审理过的更为严重的非法行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主教发现，“善良牧人”修道院的修女们大兴土木，而呈报给他的修道院预算表中却看不到这笔款项的记载。

他通过专门的委员会去核对预算。委员会发现，呈报给主教的预算是伪造的。这位主教继续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女孩子们的劳动养肥了修道院。如他自己所说，他也发现，“在全国还没有象修女对待孤女那样丧尽天良的雇主如此残酷地剥削工人。修女们还口口声声说这是为她们做好事。“善良牧人”修道院共有221座分院，7000名修女，48000名女工。虐待女工各处的情形都是如此吗？主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善良牧人’所属各机构都犯有此类罪行；其明证就是，尽管我一再控告，修道院的主持和总监们不仅为南赫地区的修女们辩解，还默许她们这样做。”

图尔地区的诺特达麦·德·沙里特修道院也揭露出同样的虐待罪行，甚至比南赫地区的情形还要严重，令人发指的虐待贫苦儿童的事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同时，比利时公众也在讨论此事，即修道院的孩子们劳动负担过重，修道院为了自身的利益惨无人道地剥削她们。

比利时的天主教也是对儿童、女工和工人实行劳动保护法的死敌。迄今为止，他们在比利时议会竭力试图阻挠破坏劳动保护法。但是，迫于社会主义者的压力又不得不投赞成票。他们是极端缺乏教养的人。

在德国，在西南部和莱茵河沿岸的许多修道院中，修女们把女工的活计——如洗衣等等——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包给商人开办的铺子（大多是犹太人开办的）。近年来，由于这种竞争的缘故，数百名贫困的寡妇和女工成了失业者。差不多每周都有修女下到铺店（例如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来收取这种不义之财。

信奉天主教的工人同其他工人一样，为自身的切身利益起见，都希望尽快结束上述的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选举社会民主党人进入各代表机构。

译自《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1903年
柏林版小册子。

（张念东译）

就副议长问题及有关事宜的 补充意见*

(1903年)

一 我为什么在本刊第41号上 发表声明——一个人的看法

正当全党对6月16日帝国国会选举结果似乎感到兴高采烈，而资产阶级政党面对这次大胜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救星降临在它们中间。《社会主义月刊》^①第7号出版了，这上面发表的两篇文章重新使资产阶级报刊松了一口气，并且使这些报纸的后台——一些政党也感到欣慰。总而言之，修正主义又一次不失时机地登上了舞台，我们的敌人正巴望它马到成功呢。

第一篇是海涅^②同志的《6月16日》，在我看来，党报没有对它予以足够的重视；另一篇则是伯恩施坦同志的《从帝国国会选举的结果中得出什么结论？》。

这两篇文章的写作动机虽然直接受到6月16日选举结果的影响，但文章对这件事表现冷淡则是显而易见的。海涅同志的文章尽管把6月16日称之为“伟大的日子”，但他的兴奋之情到此也

* 本文最初发表在《新时代》第21年卷(1903—1904)第2卷，从第708页起。——编者注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刊物。——编者注

② 沃尔夫冈·海涅在1903年帝国国会大选以后，提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在于“不要简单地取消自由主义政党，而要取代它们”。进而提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人民党”。——编者注

就告终了；然后，笔锋一转说道：在自由主义失败以后，当前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在于“不要简单地取消自由主义政党，而要取代它们，因为它们不是要取消国家资本主义的和精神自由的观念，而是把实现这一观念当成自己的使命。”他继续说道，“社会民主党以此为标志才获得了这次选票的巨大增长。社会民主党把在政党公开活动中发挥当之无愧的领导作用视为自己的崇高责任。”

他在这里硬把这说成是竞选斗争的本来结果和党在新帝国国会活动的“纲领”，然后他说道：“如果党本身是团结的，当然也是自由的，那么它是能够胜任这个任务的。敌人在大选之前对社会民主党的内部分歧寄以很大的希望，前不久出现了监护企图和部分指向参加竞选斗争的同志们的令人不快的论战，这使敌人受到鼓舞。”他接下去说的话使人感到有些突然：“大敌当前，一切个人恩怨和意向的差别都消失殆尽；以往彼此争吵不休的同志们竭诚互助。这些都是此次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极佳范例。这样，我们就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了。”

但是，这种兄弟般的合作只有当非兄弟般的强制不去破坏我们对事业热爱之情时才有可能。一致，并不意味着统一。一个拥有大约300万拥护者的政党，不可鼠肚鸡肠；它应当承认原则自由，并且在新任务面前表现出实践进取的能力。我们必须维护我们赖以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法宝：行动的一致，思想的自由。”

这篇文章没有给我留下任何一点崇高庄重的印象。它提出的所谓“纲领”平淡无奇，它的暗示吞吞吐吐，对党满腹牢骚，它在结束语中提出的要求又十分糊涂。什么叫承认原则自由呢：在党内任何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随心所欲地发表政见，这又当作何解释呢！然后，又奢谈行动的一致，但如果没有共同的原则，没有共同的基本观念，没有党内的团结一致，也就不可能有行动的一致。或者，难道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吗？——我们也不应当简单地

取代自由主义,而是在将来也要超越它,就象我们迄今通过对一切法律和自由问题表现出的坚定、果敢和持久精神始终超越过它一样。这就是迄今我们同自由主义的区别所在,即使在涉及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要求的场合,也是如此,而且将来也肯定成为我们同自由主义的更加明确的分野。莫名其妙,矛盾百出——这就是海涅之流的逻辑。

我说过,这就是海涅所理解的选举结果,这就是他所能够提出的要求。

《社会主义月刊》第7号登载的第一篇文章造成了不良印象,伯恩施坦的文章则更加深了这种印象。虽然伯恩施坦在文章伊始也提到,这次帝国国会选举就增加选票和占据议席来说获得了成功,连党内最乐观的人们也喜出望外,但他对党有史以来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的评论也就跟着完结了。接下去他立刻转换了话题,由数量上的变化得出结论说,党当前的最佳选择莫过于不惜一切代价在帝国国会占据第一副议长的职位。他认为,这样做不仅通过种种诡辩术(我认为这是他的根基)驳倒对朝见皇帝(敌人要求我们这样做)的疑虑,而且为了进一步论证他的要求,竟然作出了前所未闻的解释:“德意志帝国宪法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是同德国所有的宪法相比,恰好在它的产生和条文方面都是最接近共和主义原则的,因此党内对副议长职位的所有疑虑,都可忽略不计。这个宪法没有把某一个王朝统治德国人民的任何世袭权利合法化,它没有给予世袭君主称德意志人民为他的臣民的权利,它不承认德国的皇帝,也不承认德国人的皇帝;它仅仅根据那些被当时按照规定选举出来的民族代表机构共同通过的决定。将德国皇帝的某些职能及其尊严付托给各时期的普鲁士王位的拥有者。不管王朝的权利性质如何,按照宪法来说,作为德意志皇帝就是这个王朝的代表,这种情况同一个共和国的总统很相似,而他仅仅凭这一特

点来接受帝国国会议长团的朝见的。”^①他这篇文章的结尾对英国和德国的自由主义的实质作了历史性的分析：“自由主义在这次竞选中的失败乃是最令人不快的事件之一”，而伯恩施坦为了达到与英国自由主义的相似地位而给自由主义指出了必由之路。这篇论著给读者以这样的印象，似乎伯恩施坦以替这种日薄西山的自由主义充当救护为己任。而我要问一声：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员的任务吗！特别是在获得上述选举胜利之后！

在欣赏了这两篇奇文之后，使我十分气愤。而就在我读到《社会主义月刊》文章的同时，《新时代》第40号也到了我的手中。梅林同志在《谈谈特制的和其他的香肠》一文中对伯恩施坦的分析可称入木三分：因为，你除了在下一期《新时代》上发表一份简短明确的声明表示完全赞同梅林的文章外，再无更适宜的事可做。这样，你就可以省去许多笔墨，一举避开了在不恰当的时间、在最荒谬的场合去进行评议。这就是我那篇形式和内容如此蹊跷的声明的由来。

正如迪茨同志已经通过《前进报》声明^②的那样，如果说发表在《新时代》第41号的这篇声明正好刊登在这一期的刊首，那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把我的声明放在开头，或者末尾，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它只要刊出，并且短小精悍，我愿足矣，因为我已说过：梅林的文章对伯恩施坦的评论恰到好处。至于说海涅和伯恩施坦的文章使我得出了他们一心使党扫大选胜利的兴，至于说文章也对自由主

① 参见《伯恩施坦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302页。——编者注

② 《前进报》第175号称，“发表方式奇特的责任仅仅在于‘排版者’，兹澄清如下：这一声明的版而不是排版者排定的，而是由签署者决定的。排版者的错误仅仅在于，他出于对印刷工艺的考虑——看一眼《新时代》的头两页就清楚了——没有把其他的正文排放在人们指控的那一页上面。这里不存在应予更正的理由，同样，也没有就声明排在刊首或刊尾一事请示负责人的必要。亨·迪茨。”

义的失败唱挽歌，人们可以根据本人现在提供的材料来判断我的看法的是与非。我的错误仅仅在于，我在那篇声明中只批评了伯恩斯坦，而没有驳斥海涅。

但是，我的这篇声明向那些罗马城堡的卫士们敲响了警钟^①，他们当中有些人常常在修正主义营垒发动的类似（我所遭受的）进攻面前，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些人一味指责这份声明的形式和刊登的位置；他们又把该声明说成是“师训”，是蒙师专横的训斥之声（福尔马尔语），是个别人的神经过敏，是企图限制言论自由，尽管他们手拿放大镜也找不出我的声明有丝毫上述意愿。在我党历史上，有人企图限制过言论自由，可惜不是我。我一直是率先反对这帮人的一员。除此而外，也许我又干过一次这样的事。对我的声明不胜恼怒、并且对限制言论自由大鸣不平的党刊中，就有科尔布同志主编的卡尔斯鲁厄的《人民之友》。但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之后，为选举一位代表的事情又在奥芬堡举行了一次党的集会，会议指出，《人民之友》以对党内事务作偏袒的和仇视的报道见长。我们党内象科尔布这号人所在多多。党内限制言论自由的那一天，也许就是党在道义上死亡之日。有人一再叫嚷言论自由陷入危机，可证据又少得可怜，致使党在外界失了面子。

就在报纸对我停止抨击以后，也是在我以为关于整个令人扫兴的事件的辩论就此告一段落以后，突然救星天降，冯·福尔马尔同志出面亮相，顿足捶胸，对我竭尽痛骂之能事，并以“客观者”的尊严自居。这篇檄文在他那本言论小册子中，占了几乎整整一页。

我不止一次地发现，福尔马尔最精于“师训”之道，他忽而自感

① 例如，见海涅同志针对马尔堡的同志们发表的盛气凌人的声明——在8月13日《前进报》上——在这件事上，马尔堡的同志们无论在形式上和材料上都是站得住脚的。——倍倍尔注

是议会制的礼宾大师，忽而白感是新闻学的典礼官，装腔作势，以无法效颦的严肃面孔施教于人，诸位请看，他信口雌黄，能言善辩！

因此，我应当满意地指出，那位最有理由认为受到了我的声明伤害的那个人，伯恩施坦同志，乃是我的对手中答辩得最沉着、最务实的人，他在载于布勒斯劳《人民卫士》第177号的文章中对我的声明进行了答辩，这一形式我是认可的。福尔马尔将来可以拿伯恩施坦当作自己的榜样。

关于伯恩施坦挑起的争执问题的讨论，我就发表这些个人意见。据说，我们一部分修正主义分子热中于、并顽固地把这件事仅仅当成所谓形式问题，但这场争执表明，其背景涉及的问题远比形式问题来得广泛^①。因此，福尔马尔在他于慕尼黑作的题为《帝国国会选举的教训和后果》的讲演中，专论议长选举问题的篇幅占了26½印刷页的将近6½。8页用来批评资产阶级政党，只有半页用来探讨党的新任务。这样一来，主要议题就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了。如果说这一小段包含了诺曼先生急切恳求冯·福尔马尔同志制定的新纲领，同时，前者还敦促后者出面就任新国会党团的领导，认为这是人民的殷切期待——人们如果看清了诺曼的这番作为，就不会对他的政治生涯遭到的彻底失败感到奇怪了——，那么我可以算作福尔马尔的追随者。他在讲演中作为任务提出的东西，过去我们已经认真实行了；如果说在我们一边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那么责任不在我们身上。这一章也象福尔马尔此前论述资产阶级政党的那几页文字一样，我认为不值一驳。

① 在这个问题上，休特古姆同志在纽伦堡党代会上采取的立场是极其罕见的。据说他在会上发表的意见是按照党报上有关伯恩施坦的现成报道作出的：他说，伯恩施坦不可能不出破绽，人们对他不要过于介意才是。因此，现在以自身名义指导整个方向的人，也会受到自身营垒的谴责。休特古姆也认为，副议长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业已了结；当然是指现在，就是说，既然知道葡萄是酸的，人们就不想去碰它了。——倍倍尔注

二 伯恩施坦和帝国宪法

在我进一步说明福尔马尔就议长问题的论述和海涅、格雷同志的言论之前,我想就伯恩施坦赋予帝国宪法的意义谈几点看法。在《新时代》第40号和第45号上,梅林同志对伯恩施坦的言论作了精彩的答复。伯恩施坦在其他党刊上发表的这一页论述,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究其原因是由于党内人士迄今不甚了解帝国宪法的形成及其特殊的本质,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本文在这里作一些补充说明。

如果俾斯麦听到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评判按照他自己的身体剪裁的宪法,他准会捧腹大笑的。反过来说,进步党的已故元老象瓦尔德克^①、基尔希曼^②、齐格勒、舒尔采—德里奇、霍弗尔贝克、敦克尔等人若是听见上述议论,也许会吓得双手抱住脑袋,他们也许明白这些话意味着什么。我很想看到上述各位同俾斯麦在阴间会面并说起伯恩施坦同志的评语的那一幕。说不定老社会民主党人阿伦·伯恩施坦,即伯恩施坦同志的伯父、柏林《人民报》^③的创始人和常任编辑,他也许会就此谈点什么看法。当《地方通讯》有一次以进步党否决上述宪法为口实来责难这个党的时候,他的答复是:

① 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奥·瓦尔德克(1802—1870)——律师、德国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翼领导人之一;普鲁士上议会下院议员和德意志国会议员,进步党的领袖之一。——编者注

② 尤利乌斯·海尔蒙·基尔希曼(1802—1884)——德国法学家和哲学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会员,属中间派左翼,后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编者注

③ 德国的抱有反对派情绪的白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53年起在柏林出版。——编者注

“这部宪法是个不幸的、杂乱无章的、七拼八凑的四不象，为历史所仅见。否决它并非出于对德国抱有敌意，因为我们今天只能对德意志帝国这个优秀的组织形式寄以这样的希望，即在健康的基础上对这部宪法进行彻底有效的改造，在1849年的人民之年，德意志民族的意愿曾经一度创造了这样的基础。”

后来，北德意志联邦宪法被凡尔赛条约规定为帝国宪法，事情愈弄愈糟。而俾斯麦之所以提议在德意志人民代议机构实行普遍选举法，仅仅是因为他要借此凌驾于奥地利的联邦改革计划之上，并为自己创造一帆风顺的形势。伯恩施坦对此难道全然不知吗？早在1862年，普鲁士的保守派就设想在普鲁士境内也要实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法，因为人们认为，三级选举制的缺陷在于存在着自由派的地方参议院。如果实行拿破仑式的普选权，那么参议院就会让位于保守派。难道伯恩施坦连这一点也不知道吗？甚至俾斯麦都在北德意志制宪联邦国会公开声称，他之所以采纳普选法，是因为他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更适合于自己目的选举法，这一点伯恩施坦不知道吗？如果说以武力拼凑的北德意志联邦缺乏实行其他选举法的任何共同基础，那么叫他实行什么选举法呢？如果说他不给予这种权利，他为什么又想在最广大的民众阶层中间消除对新事物的反感呢？为了讨好敌人而修改历史，这是要不得的！我们的同志中间有人竟敢评判帝国宪法，就象伯恩施坦所做的那样，我认为是不可行的。我相信，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一致起来，尽管在涉及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之间长期意见相左。

当然，伯恩施坦同志出于变换方式的需要也有过革命异常的时候。他在布勒斯劳《人民卫生》发表文章分析说：他把社会民主党的副议长朝见德国皇帝的举动比作罗兰晋见路易十六的情形，因为罗兰的晋见并不意味着革命向国王鞠躬，而是意味着国王向革命致敬。伯恩施坦在文章中还援引了另外的历史例证自圆其说。

登在《人民卫生》上的伯恩施坦的大作颇带血腥气味——比如他举了克伦威尔的全权代表琼塞同查理一世的会见，琼塞随即逮捕了英王查理一世处斩，情形与路易十六雷同。

伯恩施坦同志万万没有想到，这段历史的回忆使资产阶级阵营大惊失色，与他原想达到的效果完全两样。教皇极权主义的《日耳曼尼亚》^①和左翼民族自由派的《民族报》声明，伯恩施坦现在对他自己建议的解释与其在《社会主义月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大相径庭。如果说社会民主党的副议长朝见皇帝意味着皇帝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致敬，那还谈什么选举社会民主党的副议长呢。于是意见相似的报纸纷纷加入了《日耳曼尼亚》和《民族报》的行列。

这样，伯恩施坦就象袒护孩子的母亲，名则爱之，实则害之。在我们还未来得及到德累斯顿党代会上为该不该朝见威廉二世大伤脑筋以前，帝国国会各主要政党的喉舌就已一致声言，在这种情况下要抵制社会民主党取得副议长的职位。连《十字报》也刊登了保守派帝国国会议员的一封来信——显然是保守派国会党团主席冯·诺曼的手笔——声称保守派国会党团决不同意选举社会民主党人作为帝国国会副议长。

我们的修正主义分子天真地过高估计了霍亨索伦王朝的一员，也就是认为威廉二世也会干同样的事，我对这一点丝毫不感到奇怪。而此人对我们的反感和敌视，我们已经连篇累牍地领教过了。正如人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样，也不能只见具体政策，而忽视政由所出的阶层。我认为，不到国会党团鉴于政治信仰的原因俯首认罪之时，帝国国会怀有君主意识的多数是不会接纳社会民主党的副议长的。屈膝下跪！别无良策。

^① 即《伦敦德意志报》，一家德国流亡者的机关报。——编者注

三 德意志帝国中的拜占庭 礼仪及其影响和后果

自1871年以来，在德意志帝国中，宫廷的关系和义务在皇帝和帝国国会之间出现了这样的特征，即有意保持这种关系并系统地加以发展的帝国国会多数，必得要求帝国国会议长们不折不扣地履行与其地位相应的传统，王冠面前的男性傲气一词，在国会多数那里也早已成为神话。

另外，如果我们的党把选举议长之后朝见皇帝一事轻描淡写为晋见礼仪——再说，这是要低三下四地寻找机会的事——那是错误的和肤浅的。当然，象我们这样的党，即便有时会碰上这样的先决条件，也应该郑重其事、毫不犹豫地放弃议长的职位。不过，有了第一步就会迈出第二步。正如晋见成了习俗一样，帝国国会每次例会散会之前都要高喊皇帝万岁，这也成了惯例。也就是说，如果你说了甲，则必定要说乙。如果第一议长因故未能主持那次会议的休会，社会民主党的副议长能够拒绝高呼万岁吗？要是他不高呼又会出什么事呢？副议长的全部威严面子都会丢光，因为多数派方面一定会对他大发雷霆，其结果就是堂而皇之地不信任表决，把他赶下台来。

但如果社会民主党的副议长想起了福尔马尔和同志们所援引的那些牛皮糖式的原则，那些只有出卖一切原则才会有的原则，并且高呼万岁，那又会怎样呢？那时议会党团又怎么办呢？它会无礼地对待由它推选的同志、象以往那样退出大厅以示抗议吗？或者，它也硬着头皮加入万岁大合唱？或者，它采取中间路线，留在大厅，喊万岁，但不一起喊？不论它选择哪一条路，都会大出前所未有的洋相，使社会民主党的副议长威信扫地。

再说，议长在皇帝诞辰还要动议授予议长全权，代表帝国国会向皇帝呈送贺信。遇到皇家婚丧嫁娶，还要代表帝国国会表示祝贺和吊唁。社会民主党的副议长能够摆脱上述事务吗？

假设各方都同意社会民主党出人担当副议长，还有邀请入宫的问题。社会民主党的副议长也许可以借故推脱一次、两次。但挨不过第三次。如果他一再推脱，就会受到宫廷、帝国国会和报界的非议，再次构成社会民主党副议长短命的原因，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但如果他应邀入宫——照福尔马尔提出的绝妙理由是可以自圆其说的，这仅仅是第一步的结果——，那么自威廉二世以来就有这样的成例，即凡是应邀入宫而无权着制服的人，应着短裤、漫游长袜和带扣鞋出现于大厅广众之中。一旦譬如福尔马尔（因为辛格尔可能会拒绝这种殊荣）——或者赫伯特——他也声言赞成出入宫廷，如果他当选，那就会满足布勒斯劳《人民卫士》提出的要把工人出身的人选为第一任副议长的宿愿——应邀入宫，那会给讽刺小报提供何等求之不得的素材啊！《柏林日报》就以胜利者的口吻叫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处理宫廷事务的！”《汉诺威信使报》带着讥讽的语调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也准备身着燕尾服、短裤和带扣鞋到普鲁士王宫朝圣了；而教皇至上主义的《奥格斯堡邮报》则出语尖刻地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副议长穿上漫游长袜、短裤和带扣鞋，定会使慕尼黑的同志们见了眼馋。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它没有说对。

但我们设想，将来规定出入普鲁士宫廷不仅要着漫游长袜，而且要穿上饰有金纽扣的燕尾服，佩带卷曲假发和三角帽——这些在时兴奢华、排场的现在，也许不足为奇，那么说不定真会在福尔马尔和同志们的说服下对这种要求作出让步的。这样一来，我们的副议长就会身着路易十六时代的朝服出入宫廷了。但是，我们

是不指望一位无津贴的议员会自掏腰包购置这套装备的，这是社会民主党财务的事。

惊心动魄的前景在这里展现！

四 出入宫廷的其他所谓理由

福尔马尔和同志们说，出入宫廷同宪法宣誓差不多。这也是错误言论。大多数邦宪法都规定有忠诚宣誓的条款。这样就产生了问题：要进入人民代议机构，就要进行宣誓；要么就拒绝宣誓，那就只好呆在外边，而这正是我们的敌人所希望的。如果我不进行忠诚宣誓，我就无法代表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那就要履行这样的宣誓。假如帝国宪法规定，各党依照其实力大小必须在帝国国会占有议长的职位，并且这些议长同时也要对皇帝履行某些义务，那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无可选择。如果我们想从事议会活动，我们就得履行这些规定，因此责难轮不到我们头上，而是那些制定了规定并借以使人勉为其难的人。此外，我们那时就有可能通过提案来废除这些空洞的公式，并进行相应的谴责。我作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不仅硬着头皮作过忠诚宣誓，而且为了能开办我的买卖和成家立业，我也一定要成为莱比锡的公民。我至今还记得当我进行忠诚宣誓时，自由派市长科赫嘴边挂着的特有的笑意。我也报以微笑并宣读誓词。

这种忠诚宣誓起源于宪法问世的那些时代。那是些革命的年代，如1831、1848和1849年。当时，王公和他们的政府认为，用忠诚宣誓的办法可以保住王冠。而宣誓分文不值，它保不住王冠，就象无例外地进行过军旗宣誓的士兵也会开小差一样。

如果由于人民代议机构中主张拜占庭礼仪思想者占多数而使这种礼仪成了习俗和义务，事情就不一样了。在1870年以前，北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谁也没有想到按照上述礼仪把普鲁士王尊为德意志同盟的元首。但是，建立帝国以后，民族自由主义成了人民代议机构中的决定因素，这时拜占庭式的礼仪也就约定俗成了。它同社会民主党相长，如水涨船高。与社会民主党相反，有人想用日益增长的孟加拉式的色彩来表示自己的忠心。这还嫌不够味，又有人发现了，或自以为发现了，以最为虔诚的拜占庭式的忠心来表白自己不仅会提高在皇帝面前的威望，也会博得皇帝的欢心。因此，在资产阶级政党之中，为了表白耿耿忠心而竞相标榜繁文缛节。凡此种都是当着我们的面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而如今却叫我们向这种被我们打击和嘲弄过几十年之久的整套把戏颁发认可证书，方法则是我们自己也来搞这一套。

我看不出这种奢望中有一丝一毫尊严的火星，倒是不折不扣的寡廉鲜耻。

有修正主义的蠢动、但不太过头的彼乌斯^①同志，异想天开。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拒绝朝见威廉二世，并不是因为这位皇帝时常激烈地抨击我们的缘故。言论自由也不适用于皇帝。当然，此外也无人能够取消皇帝的这种权利。但皇帝按其禀性来说具有激烈抨击其对手的习惯，而这是同立宪风俗不相吻合的，于是这些对手便被迫采取极其审慎的态度行事，因为刑法第95条有碍于他们。彼乌斯同志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成为修正主义的主要条件乃是忘记逻辑思维。

我们的宫廷派代表们又高声喊道，开始我们抵制参加委员会和党团负责人联席会的工作，而现在我们是在同心协力、名正言顺、有利无害地为党工作哩。

这也是错误的推论。

^① 威廉·亨利希·彼乌斯(1862—1937)——德国作家，1890年起为社会民主党人，后为修正主义者；1892年因“侮辱陛下”罪受审。——编者注

参与委员会的工作，这在原则上绝非不可接受的。问题在于参与的程度。1869年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讨论工商业法时，就曾把我选进了相应的委员会。当时讨论工商业法提案发生的主要事件，促使李卜克内西做了反对“议会迷”的讲演，后来印成了小册子，题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态度》。众所周知，后来他又放弃了这一立场。1874年和1875年莫特勒同样也是制定工商业法委员会的成员。再后来，80年代初，这个问题又成了当务之急。我们没有被选进疾病保险法提案委员会，人们推脱说，我们不具备议会党团的法定人数。1884年和1885年，迪茨和我被选进了航运津贴提案审议委员会。我们对预算持反对态度，因此，是否应当参加预算委员会，对此尚有意见分歧。

之所以反对参加党团负责人联席会，据说是因为它不是议事规程规定设置的机构，象这样的设施会限制帝国国会的权利，等等。产生这类分歧的原因在于，人们对这个机构的作用不完全清楚。今天我们知道了，党团负责人联席会并不是决策机构，不可能给帝国国会制定章程，它只不过是议长自行召集的国会党团负责人的碰头会，以便听取帝国国会在事务性问题上的态度和意见。议长按照负责人谈的意见去做他认为应做的事情，不作决定，而且国会党团也不受党团负责人在联席会上发言的约束。但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帝国国会内部。目的在于切实有效地解决事务性问题，同宫廷应酬毫无关系。

8月30日《前进报》发表的题为《新策略》的社论提法很大胆：

“80年代末，连我党参加帝国国会选举都成了问题。而当人们半违心地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人们认为同资产阶级政党共同立法、以提案的方式参与工商业法的制定是同公开宣传的目的不相符合的。虽然人们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但根本没有付诸实施。”

谁也没有时间去争论是否参加选举的事，也根本没有作出过

任何不与资产阶级政党共同立法的决定。党的中央机关报在上述事件中的态度极其含混,摇摆不定,因此直到最后一刻它都没有出面发表意见。

五 所谓党的权力的扩展问题

福尔马尔又说,他认为事关党的权力的扩展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使我们有权利和义务去参与国会业务领导工作。并接受与此相关的职责。

按照宪法和议事规程确定的义务,我们的议会党团有出任副议长的权利,对此我们之间没有分歧。分歧在于是否也应履行宫廷应酬的问题。我对此已作了答复。

但占据议长席位对于那些提供议长人选的人也意味着权力的增长,则是件新鲜事儿。而资产阶级报纸,只要它们还以自己的建议关照伯恩施坦、福尔马尔和同志们,它们就是在避免为此出力。福尔马尔同样可以这样认为,并且以此在慕尼黑的党代会和在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中间发挥影响。但他是无理的。

议长应当按照现有有关规定领导国会的业务工作,应当不看党和个人的面子行事。这就是议长的权力和义务的规范。为了尽可能公平处事,议长(起码第一议长)在其任职期间虽然不是以其所属的政党为出发点,但却可以说是该党的消极成员。就是对副议长们来说,由于其所处地位的原因也要表现某种程度的克制态度,不过,对其所属党派有利的权力是不会产生的。如果副议长们试图取得有利于自己党派的权力,那么他们就是滥用职权。

因此,我要问问福尔马尔:中央党在成立的最初10年间,由于实行民族自由党与保守党联合而被排除在议长职位之外,这样做损害了中央党的权力和威望了吗? 这些年代难道不是这个党兴旺

发达的时期吗？

其威望的低落是因为它变得更加忠诚、并因而在主席团中名列前茅而引起的。

或者，也可以这样提问：1895年，由于拒绝向俾斯麦80诞辰祝贺而产生的众所周知的同帝国国会多数的冲突，冯·列费佐夫先生愤而辞去第一议长职位，这对保守党的权力和威望有什么损失吗？

或者，也可以这样提问，当自由思想人民党党员、议员施米特作为补缺而替代了第二副议长、民族自由党的毕尔克林（他辞职的原因和冯·列费佐夫相同），这个党获得了权力和威望了吗？

或者，1898年帝国国会多数拒绝把第二副议长的职位给予社会民主党，这有损于它的权力和威望吗？在上述大选中，我们就是当了这个副议长也不会因此多得一张选票的！

这种提法乃是把纯形式问题同以政党的特征和本质为基础的权力关系混为一谈了！但却是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头脑中思想的必然后果，他们到处都把个人权力混同于政党所代表的权力。他们一向信奉的、如此著名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跑到哪里去了呢？！

六 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国家形式更是次要的

我们不要把重心放在国家形式上，不要以为人们朝见皇帝就会产生对皇帝的敬重；就我们自己的基本观念来说，关键在于社会的社会性内容，不在于国家的形式，福尔马尔和格雷异口同声地高叫。后者在开姆尼茨《人民呼声报》上就此写过整整一大篇社论，读过之后我得出的看法是，格雷同志还没有迈出国家社会的圈子。

我没有过分估计国家形式的念头，但国家形式是相当重要的。当然，我认为有些君主制，比如英国的就比有些共和国（比如南美）

的要好。不过，各君主制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君主制强大，就意味着议会很软弱。而如果王朝由于陆军、海军和官员等级制等而显得很强大，并且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那么这对任何民主制来说都是巨大的危险！因此，普鲁士的君主制乃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君主制。而普鲁士的君主同时也是德意志的皇帝，也是容克地主制度的兴奋剂，他认为这个制度乃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支柱。三级选举制在国家和社会中对工人阶级来说都是不平等的，但它的靠山和基础却是这位君主，他支持一切社会民主党迄今在普鲁士所取消和破坏的东西。而为了对此感恩戴德，则叫我们去朝见这位作为德意志皇帝的普鲁士君主，顶礼膜拜！

反过来说，要是普鲁士德国是个共和国，还是这样无精打采，那我们在各代议机构中很可能已经获得了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即给议员发放津贴，更合理的选举分配，可能还有按比例选举制，更加自由的集会结社权，更大的新闻自由，更加完善的社会改革，那时我们权力的份量与现在的截然两样，一个建制更加民主的军事体制，一个为议会负责的政府，简言之，我们一系列未来的纲领要求都得到了实现，而现在我们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还要经过漫长的、十分艰巨的斗争，并会带来巨大的牺牲，这是可以预计的！

那么福尔马尔和格雷现在也想说国家形式是无足轻重的吗？假如比利时、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的同志看了他们的发言，又会怎样想呢？我看，我们之间在党内的隔阂会日益加深。很快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了！真是遗憾，诺曼先生这么早就解散了他的中队。象我所说的，^①当然，我不希望党的那一部分人增加。

^① 诺曼先生在德累斯顿曾声明，他希望那些从国家社会派过渡到社会民主党的人在队伍中发挥伯恩斯坦那样的作用！！也就是对党起到炸药的作用。——倍倍尔注

如果皇帝有意了解真相(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副议长),那么他是会听到的,他肯定需要了解真相!福尔马尔就是这样慷慨激昂地喊叫。对他的发言是这样报道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里我们又遇上了这种奇怪的自我欺骗!连我们的修正主义者的两位泰斗格尔拉赫先生和诺曼先生,如果他们设想福尔马尔一旦当了副议长会同威廉二世交换意见,那也是要失算的。真有这样的交谈那倒是影响深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了!这里也过高地估计了个人的作用,并且完全忽视了作为现存的深刻对立的本来体现者的那些因素。

副议长也是宫廷和君主的下属,福尔马尔十分清楚,对皇帝来说,按他的吩咐来朝见和晋见的人,未经垂问或未经允许是不准发言的。如果皇帝——假设他接见了社会民主党的副议长——没有垂问或没有要求后者发言,那又将如何呢?那么就请副议长把自己的美妙纲领演说稿揣在口袋里吧!或者,福尔马尔自以为在这样的场合也能象在埃森和布勒斯劳那样议论皇帝的讲话?此外,社会民主党的副议长声言有能力处理宫廷事务,鉴于他必须郑重严肃,我对此有很大的保留的。我们在这方面是有前车之鉴的。曼海姆的同志们在一次选举党代会代表的集会上以2/3对1/3的票数通过了赞成朝见皇帝的决定,但他们认为要表达这样的期望,即有关的社会民主党副议长要保持必要的庄重是适宜的。这样,曼海姆大会的多数就打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可他们却毫无感觉!

超机会主义造成了我这里列举的矛盾和出尔反尔。我们大家都是机会主义,我们当中没有谁想以卵击石。但区别在于,我是否在不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的情况下去考虑实际的关系,关照敌人是否仅仅是因为我为了迫使敌人达成一项有益的妥协;还是出于琐事的考虑,或者为了追逐鬼怪而投入敌人的怀抱,为了达成一项虚伪的协议而大出洋相,或者仅仅是为了一项违心的协议。

七 在讨论关税额时的强加于人

假如我们拥有副议长的职位，在讨论关税额时本不会出现强加于人的现象，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一唱一合地喊叫说：伯恩施坦甚至说，早在12月13日至14日的臭名昭著的基督降临节之夜，议长的表态就使他明白了这一职位的重要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伯恩施坦又一次忽略了如下事实，即在那个夜晚起操纵作用的正是巴列斯特雷姆伯爵，而且这位伯爵所做的事是合乎其所属的热衷于关税掠夺的多数意向的。另外，在那个夜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垄断关税额的人正是巴列斯特雷姆伯爵本人，这也是合乎这个多数的意向的。

关税额的制定无非是通过破坏宪法和议事日程的途径达到的，议长们要么满足多数的上述要求，要么不在其位，二者必居其一。巴列斯特雷姆伯爵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而我倒是愿意看到他在那个夜晚训斥那位胆敢对他说人们限制提案的内容就是虐待少数的副议长。

伯恩施坦主张当副议长的意见是滑稽可笑的，因为他在未来要忠实执行的议事规程已不堪入目、肢离破碎了。我们唯一的正确立场就是：不允许我们的同志中有人担当这样的角色，而通过相应的提案来重建原来的议事规程才是我们在新组成的帝国国会中的首要义务。

作为社会民主党就要这样行动。

八 资产阶级报刊和副议长问题

在资产阶级报刊中除了《法兰克福报》赞同伯恩施坦和福尔

马尔的建议外，别无他家。既然又出面为上述二位说话，仿佛它已成了修正主义的党报，于是《法兰克福报》的众所周知的柏林合作者也来帮腔。那篇发表在第210号上的文章固然是对福尔马尔、伯恩施坦政策的有力支持，但事与愿违，它使这项政策遭受了道义上的致命打击。

在这篇文章中写有这样的华丽词藻：

“并不是帝国国会副议长职位的实际价值赋予了这个多次提到的问题以意义，而是它有代表性！”

整个资产阶级新闻界把这个问题视为我们党内某些要人急于蜕变的象征，因而满怀同情地站在我们队伍中宫廷派的一边。

《法兰克福报》的柏林合作者的文章接着说：

“本来，副议长一职照我们以前的分析看来是毫无影响可言的。他只有在议长把议长权限授予他时，才能行使议长职权。议长可以就一般业务领导问题同副议长对话。而副议长就无此必要。要阻止对少数的强制吗？——巴列斯特雷姆伯爵坚信，卡尔多尔夫^①的提案是不充分的。就象事态表明的那样，他除了辞职而外是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的。他还没有下定决心这样做，因为他认为，如要那样就要立即选出另一个能批准动议的主席团才行。因此，他进行的实际上是引导争夺该项动议的斗争，并依此共同发挥作用。作为副议长的毕辛先生不仅反对卡尔多尔夫的动议，而且反对整个关税额。连他在内，除了引退而外，别无办法。他没有这样做，这就落下了被人指责的话柄。如果一位议长面对的多数决心贯彻某些按照他的意见看来是无礼的要求，那么通常他只有采取辞职的办法。这种情况，对一位社会民主党的副议长来说就是轻率的举动了。”

^① 威廉·卡尔多尔夫（1828—1907）——德国政治活动家，国会议员：“自由保守党”的创建人之一，保护关税派，支持俾斯麦的政策。——编者注

《法兰克福报》还谈到第三点：

“冯·福尔马尔先生所言极是：‘当议长的念头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极可贵的’。的确，党由此不仅在帝国国会（在这里作用不大），而且主要是在广大选民中间会获得某种威望，这就会遏制颠覆性的、革命性的活动，前者有益，后者有害。”

我要补充一句，这番话帮了那些发表高论者的倒忙。他们虽然受到自己在敌人中的朋友的夸奖，却有致命的危险。

九 福尔马尔对未来的担心—— 党内缺乏得体的作法

但福尔马尔也有未来之忧：“否决议长问题，这根本不是解决办法，而只是一推了之。因为下次选举时问题还会出现。如果我们有一天成为帝国国会第一大党、成为多数，那又当如何呢？”

此次关于议长问题的决定以否定告终，这是肯定的了，哪怕党代会的多数出人意外地站在福尔马尔—伯恩施坦和同志们一边。我在上文已经说过，伯恩施坦本人已使资产阶级政党感到惊慌失措，而我们理应受到赏识，这仅仅是因为我们关于党团负责人联席会的博士答辩出了洋相，只好带着满脸愧色逃之夭夭。

可我们为什么要对未来伤脑筋呢？他恰恰不是未来的朋友。平时，他还没有足够的机会嘲弄那些考虑未来计划的人。但是，福尔马尔真的认为，当党在未来还会获得更大的胜利或获得帝国国会的多数席位的时候，就没有比谁来当帝国国会第一议长这个相对次要的问题更重要的别的问题了吗？

迄今，我一直认为福尔马尔是一位机敏的政治家，但他看问题的近视程度使我感到惊讶。

但发生在党内讨论副议长时的最强有力的事实是：

由伯恩施坦挑起的党报对议长问题的讨论伊始，就在部分资产阶级报纸中得到了赞同，《日耳曼尼亚》和《民族报》声明意见完全一致，其他报刊随声附和：辛格尔是不该被提名为副议长候选人的。这是由于他对副议长施托尔贝格伯爵的态度引起的，因为辛格尔接受了令其退场的要求，这使他的当选化为泡影。

上述报纸发表的这类声明是对党的严重侮辱，是对党的当头一棒，而我倒是希望，党报坚决回击这种傲慢无礼，要比党的多数刊物来得更坚决才好。因为人们为一个进入帝国国会的、为某个职位提出候选人的党事先规定提名的条件，这在过去是没有先例的。

可是，这种前所未闻的怪事竟然发生了：就在敌对报刊发生侮辱党的严重事件后不久，《萨克森工人报》——一家平时在议长问题上惯持正确立场的报纸——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对辛格尔竭尽笨拙的阿谀奉承之能事，并建议另提一位人选来替代他。几天以后，在一次集会上，海涅同志重复了与《萨克森工人报》上读者来信一模一样的想法。他在自己选区的一次集会上对《前进报》说，副议长一事的困难主要在于人选问题，因为，社会民主党也象每个国会党团一样，没有适合和愿意担当这项有约束力的、有号召力的角色的人，因为适合在会议上担当议会党团业务和发言的议员，想必还处于人们的视野之外。

很难设想，致信《萨克森工人报》的读者和海涅同志不知道此前敌人的厚颜无耻的苛求，因为《前进报》为此作过详细报道。因而，《萨克森工人报》的读者来信和海涅同志的意见都使我得出尴尬的印象。不管怎么说，都丝毫谈不上党或国会党团在由它提名候选人的问题上按照别人的规定行事。要么，人们选举由它提出的人选，要么不选。

海涅关于人选问题的谈话是毫无根据的。西姆桑^①和福尔肯

贝克，当他们就任第一议长时，就是他们党里的权威：卡尼格先生是民族自由党的首领，他也曾担任多年的普鲁士参议院的第一议长，毕辛为其民族自由党在帝国国会的朋友们所怀念，但不是因为他曾任第二副议长（此次民族自由党人倒没有提出这种要求），而是因为他对解决一系列特殊问题方面拥有权威。迄今为止，人们在我们的国会党团中还没有发现不可替代的人，党团愈大，愈是如此。

因此，事情就是这样，即党绝不能放弃1898年国会党团在帝国国会对议长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如果有人断然拒绝我们的要求，那么我们就要以我们1898年那样的冷静和郑重去顺应必然，也象暂时以强大的反对党自居的中央党那样沉着和凛然迎接命运的安排。

我说这番话系事出无奈，这是令人十分悲哀的：而发生在6月16日和25日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就更令人悲哀。我认为，关于副议长问题的辩论乃是有史以来强加给党的最可耻的一页。

十一 敌人和党内就副议长问题之争

我们的敌人对我们党内出现的关于议长问题的辩论求之不得。这场辩论增强了他们对加深党内意见分歧的希望，并且再次挑起了令人不快的一幕：敌人的部分报纸以施主的目光垂怜那些被我称之为宫廷派的人们，进而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

这样一来，我就临近了最终导致我们之间进行无休止争论的边缘了。

① 马丁·爱德华·西吉兹蒙特·西姆桑(1810—1899)——普鲁士政治活动家，法学家，1860—1861年担任普鲁士众议院议长，1867—1874年为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长，民族自由党人。——编者注

6年多以来，种种修正方案以无法预计的序列围绕着党的过去和现在、已做或正在着手的一切，一再重复——渐渐在党内制造了一种紧张不和的状况，我看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而这些修正方案却得到了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报纸的热烈反响。就象豺狼追逐腐尸一样，他们觉察到了这种离析过程，他们认为党内存在这一过程，并且最终会导致他们所希冀的成功。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队伍中那些站在无穷无尽的修正前列的要人们，在资产阶级阵营中找到了数以百计的吹捧者。一旦某位要人尊口一开或者大笔一挥，说党又犯了新错误，或者说建议就某个问题采用某种新策略，他们就会一拥而上鼓噪不休。用这些吹捧者的话来说，我们的修正主义者乃是“最有远见的国务活动家”、“真正的现实的政治家”、“具有成熟的理智和远见卓识的人物”等等，不一而足。简言之，这是过誉，出自敌口的褒奖，同侮辱和谩骂没什么两样。但在我看来，似乎这当中有些人不明白这类丑事，把无耻的奉承当成蜜糖来吮吸。而我们其他的人则是原则的骑士或原则的卫兵、顽固分子、无见识的狂热分子和诸如此类的人。

我早就得出了这样的印象，敌人对我们党内个别同志讲的这些庸俗下流言语，在我党多数同志中——这些人通过党的刊物获悉一些不完整的材料引起了愤慨和叹息。这些情感总有一天会找到表露的机会。

显然，敌人注视着一个象我们这样的党的内部发生的一切事件，并试图加以利用。更糟糕的是，由于他们从那些始终为诸如此类的事件提供材料的人们那里得出的希望和结论是幼稚的和愚蠢的，因此，对他们来说，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想草草收场，人们不一定真的看不起他们的冒失、不受欢迎的建议和下作的吹捧，只是耸耸肩膀。而这些用心有人看重，自有其充分的理由。

敌对营垒中的人们就副议长问题引起的党内争论得出了什么结论,也许表现在无意识的哲学家爱德华·冯·哈特曼^①的言论中,它刊登在《萨克森工人报》。该文说道:

“《社会主义月刊》这一派日益成为第四等级即熟练工人的代言人,而《新时代》一派则成了第五等级即非熟练工人、本来的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多么幼稚的见解!——倍倍尔注)。出于顾及党的统一的考虑,阻止前一派人得出最后的结论,但他们在党代会上表现日益强大,他们的力量随着每个元老的死亡和新人进入帝国国会而不断增长。只要党是统一的、党内较老的派别占压倒优势,就不能设想削弱宣传鼓动工作;相反,一旦新派别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或同较老的派别分道扬镳,能妨碍政府手脚的势力就微乎其微了。熟练工人的代言人是不能把坚持无产阶级即不熟练工人的专政作为目的的,而是必须把他们的委托者的利益当成伟大经济有机体的环节来处理。”

前几个星期敌人的报纸上刊载了许多类似的论断。我摘引了哈特曼的滥言。这并非因为我认为他说得对,而是因为他有些思想方法与近年来两大营垒中出现的如出一辙,尽管知道的范围很小。尤其是所谓元老的死亡,有人对之抱有希望,有人对之心怀疑惧。

我不知道,哈特曼先生是从我们的修正主义者营垒通向资产阶级营垒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听到了嘹亮的钟声呢,还是他由于自身的直觉和基于他对修正主义文献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疑,我们的敌人认为修正主义者是民族自由主义的近亲,因而得出结论,认为民族自由主义对德国自由主义造成了解体的影响,

^① 爱德华·冯·哈特曼(1842—190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把叔本华的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反动特点,同对无意识的东西的崇拜,结合了起来,是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编者注

也会通过修正主义者对社会民主党的党务活动施加影响。遗憾的是，我无法说他们讲的不对。

起码我们有一部分修正主义者旨在日益削弱资产阶级社会和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自从福尔马尔于1891年6月在慕尼黑发表演说以来，蜕化过程愈演愈烈。他在那次讲演中明目张胆地叙述了由先前的超激进派蜕化为超机会主义者的过程——自那时以来，党内先前形形色色的超激进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自那时以来，我们在历次党代会上就这种倾向进行了一系列的辩论，这些辩论迫使我们同意了某些特定的议案，譬如在批准预算问题上，这些辩论证实了上述的变化。他们试图缓和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对立、减少它们之间的磨擦。迄今为止，我们同自由主义到最后几天所积累的全部失败经验，改变不了这种努力的一根毫毛。这是当然的事！既然人们试图削弱对立，那么自由主义就不会亲近我们，而是我们要去巴结自由主义。其结果就是力争批准我们在议会范围内向敌人作出的任何一个小小的让步——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必然造成这样的局面，即我们愈是谦恭，敌人就愈是不迎合我们的意见。

另一方面，人们又不得不把上述让步当众说成是无比伟大的成就，因为否则群众就会责怪我们。这样一来，就将错就错了。

副议长问题不仅是这个链条的一个环节，它同时也是这个链条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已指出，而别人也同我一起指出过，有了入宫朝见的第二步，必然要迈出第二步，终究有一天要陷入无法维持党的既定策略的境地。

我们的修正主义者矢口否认，大家切勿上当！一旦要求他们澄清真相，他们总是矢口否认旅途的走向。但我们的敌人对修正主义策略必然导致的结果一清二楚，因此，他们对修正主义者任何破坏老策略的企图都拍手欢迎，饶有兴趣，他们千方百计加剧党内

现存的对立。

德累斯顿的诺曼先生毫不隐晦地承认这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有一天命令他们在党内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发号施令，加速党内危机的进程，我不会感到奇怪的。

譬如，民族自由主义帝国国会议员伯提歇尔博士就谈到过社会民主党内无法遏制的解体过程。他是我们最知己的敌人，他以一个向病人提出诊断的医生的冷酷之心发表了致煽动者联盟的声明。伯提歇尔先生据说是一位民族自由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个知情人。

叫我们从这个立场出发看问题，是件好事。一个聪明的人就要正视现实，不急不惊，从容不迫。首先要在我们的队伍中停止上演党内团结一致的喜剧，每次党代会之后都重弹老调，而每次会议都谈不上是团结和一致的——这段引文也是摘自海涅发表在《月刊》上的文章——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在系统地加剧党内对立，使党遭受挫折。

十一 希望和担心

致于说到希望或担心元老的死亡，那么既不会实现一部分人的希望，也不会使另一部分人忧心忡忡。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李卜克内西及另外一些人都已逝去，而人们并不认为他们的死亡会对党造成严重的危害，那么我们就知道，尽管如此党的发展情况还是令我们十分满意的。因此，假如其他的元老一旦逝去，而年轻人接替下去，那是不会给党造成危害的。新老交替，生生不息。

重要的问题在于，群众的眼睛盯在党内同志身上，群众绝不会忘记，如此众多的人经常脱离资产阶级的圈子投身到党即无产阶

级政党的队伍中来。党的成长壮大肯定会对某些疏远无产阶级的
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而影响愈加深远，党的队伍也就愈加壮大。
这些人相信，在社会民主党内找得到在资产阶级政党中得不到的
东西。我双手欢迎每一个来自疏远无产阶级的阶级的人，前提是
他要善于认清党的特点和性质，要承认党的基本观点和目的，愿意
诚心诚意同我们共同战斗。但他们中间不少人在党内还带有资产
阶级的偏见和观念。连那些在理论上领会了党的阶级斗争观点的
人，在实践中也常常重蹈资产阶级思想方法和斗争方法的覆辙。久
而久之，这些人就成了党中之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要对这些
人大喝一声：社会民主党是抱有相应目的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
政党，党虽然致力于解放全人类，使人类摆脱灾难、贫困、剥削和压
迫，但这个目标只有立足于阶级斗争和通过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
夺取政权才能达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
发展而日益壮大。

党不仅会变得有力量，它也会依靠精神力量和智慧、对国家和
社会本质的真知灼见而成长，特别是在党的无产者阶层，这支有阶
级觉悟的群众队伍一定不会容忍同他们离心离德的领导人。我们
寄希望于此。

领袖有带领党前进并首先打破对党居心不良的敌人的一切进
攻的特权：他们应当是无产阶级意志的执行者和为实现其渴求与
希望的工具。但假如领导者或个别这样的人开始以为可以把群众
用作实现自己野心或虚荣的垫脚石，而群众想必认为成为党员是
一种光荣，于是他们就屈尊就范为接受荣誉职位而混入党内，那么
这些人也许不是正经人，人们应当指给他们一条正路才是。6月16
日是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的成果，这一天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有
力地证明，我们满怀光明的希望奔向未来。但是我们只有坚定地
遵循过去的行动准绳，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上次选举的结果并不是要求到此止步。事情恰恰相反！既然关于副议长问题的辩论以我所不愿意见到的形式出现，表明党内对立有多么尖锐，那么党的代表大会，即所谓的“党的宗教会议”以明白无误的表决向我们的敌人表明，他们对这场辩论所寄托的希望彻底化为泡影。但是，表决结果也说明，党对那些日益有失去原则立场危险的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们不是进行狂妄的试验，就是强迫党去犯有失尊严的错误。

有些同志希望党代会要委托国会党团作出关于副议长一事的决定。但就几周以来朋友和敌人的公开讨论的事态发展来看，是不可能而且不应该来谈这个问题了。我知道，国会党团里修正主义者也处于劣势。但现在召开的党代会就应当成为当着党和公众作出决定的地点。党要求会议作出明确的决定；党不愿意把这个决定推迟数月，以便在国会党团密室的四面墙内了结此事。

斯图加特的海伊曼同志在国会党团说，党代会没有能力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唯有国会党团有权这样做。奇怪的逻辑！如果海伊曼仍旧是上次帝国国会选举的胜利者，那么他就适合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而既然他不幸失败，他就认为自己是不适合的。也就是说，人们应当首先当选为议员，才能拥有必要的权威。我认为，凡是认为自己根据迄今就此问题发表过的言论和文章尚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的人，最好的办法是当着他的选民的面声明，他把自己看成精神贫穷者之一，因此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接受党代会的委托。

我们要旗帜鲜明！不要隐瞒！不要躲闪！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文选》
1981年法兰克福版第2卷
第73—94页。

（张念东译）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1903年9月17日)

党员同志们,在我开始发言之前,我必须通知你们,考茨基、辛格尔和我向你们建议,对我们共同提出的第130号决议案作一点修改。我们起初没有商量,各人起草了一项决议案。前天晚上很迟的时候,在开完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之后,我们从10点半钟一直讨论到半夜。这时负责誊清决议案的人没有发现目前的这个第一条已被我们三人、也就是包括起草者本人否定了,我们已一致决定改成另一条,这就是我在这里向你们提出的:“党代表大会认为,国会党团固然可以行使它的权利,从它的成员中提出候选人以取得帝国议会第一副议长和一名记录的职位,但是它应当拒绝承担不以帝国宪法或帝国议会议事规则为根据的进宫朝见的义务或其他义务。”

你们大家已一致作出决定,认为尽管目前这项议程的正式题目叫“策略”,但是它也应当同时特别考虑到国会选举,它的经过情况和它对于党或者说对于党团今后行动的意义。这一决定是正确的,这也是因为,在选举之后,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外国的对选举结果非常高兴的党员同志那里,在我们的敌人那里都提出了这个问题:社会民主党在取得这一远远超出预料的巨大成就以后将怎么办?这一问题本身已经表示了这样的看法:选举的成果对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今后的活动有很大的意义,很有可能使党团或者说党

的整个态度发生改变。特别是有一家报纸(最近几天在这里多次提到它的名字,不过它不是《未来报》)在选举以后立即在一篇社论中非常客观地论述了党团今后是否也会在国会中坚持它迄今的所谓的否定态度这一问题。考茨基也是立即就在紧接着出版的一期《新时代》上发表了《今后怎么办?》,在这篇文章中同样提出了这一问题。我认为这篇文章有很精彩的地方,但是看完以后我并不比原来更加聪明多少,考茨基的文章往常是很少使我碰到这种情况的。我对自己说:他提出了“今后怎么办?”这一问题,却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是外国的党报,特别是维也纳的《工人报》(我读这家报纸时总是很感兴趣的)也就类似的一些思想进行了讨论。因此我的任务也是要首先讨论这一问题:今年夏天的选举带来了什么变化以及它可能对党的态度、特别是对国会党团的策略产生什么影响?在最近这次选举中,我们得到的选票从1898年的大约210万零7000张增加到大约301万张(确切数字还没有)。票数增加了90万以上,也就是大约43.7%。固然要考虑到,1898年以来人口增加了8%。有选举权的人的数目增加得还要多一些,因为德国人的平均年龄提高了。而且一般说来,参加选举的情况比1898年更加踊跃,几乎所有的党派得到的选票都超过1898年,当然没有一个党象我们增加得这么多。1898年我们有58名议员,1903年增加到81名;这就是说,1898年我们的党团占全部国会议员的14.6%,1903年占20.4%。社会民主党的成就主要是靠使左翼资产阶级政党得票减少而取得的。我们也夺取了若干中央党选区,甚至保守党选区,而且如果选举机会对我们再稍微有利一些的话,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还会大得多。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党损失很大,这主要是对我们有利。由此可见,从总数说来左派的变化不大,不过动摇不定的人和三心二意的人退出了,我们代替了他们的地位。由此可见,今后在国会中讨论人民的要求时既必须按

照资产阶级自由的精神、也特别必须按照工人阶级的利益发言的那些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了，就这一限度来说已经发生了对左派有利的巨大变化，但是就国会投票作出决定特别是作出重要决定来说，几乎不能指望会发生任何改变。即使在本届国会中中央党也可以在两种情况下获得多数。如果中央党同右派和民族自由党（它几乎在一切情况下都可以依靠这两个党）合作，它就能占多数，如果它同左派合作（这种情况决不会涉及主要问题和根本问题，而且在下届国会中将比以前更稀少），那就会出现起决定作用的左派多数。

另一方面，由于选举的结局，右翼方面的人将远远比过去更加团结。资产阶级的恐惧在复选时已经表现出来，这种恐惧促使资产阶级政党的大多数拥护者投票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即使在问题涉及最坏的反动分子时也是如此，这种恐惧将来在国会中的党派那里，特别是在中央党那里还会进一步表现出来。我坚决相信，中央党以及右派各党今后在国会中将比过去更加倾向于采取反动的行动。我们对这一点可不应当看错。《十字报》在它复选结果的感受还很新鲜的时候立即写道：“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抛弃一切疑虑，把罗马和维腾堡之间的斗争^①从政治生活中排除掉。”这是很说明问题的。这是一场使德意志帝国分裂了将近400年的斗争，是一场整个说来一直到今天都对德意志帝国的全部思想的和文化的发展产生惊人的有害影响的斗争，现在这一斗争应当愈来愈向后靠，应当愈来愈出现一种团结的局面，但不是为了促进民族的权利和自由，而是相反，是为了压制和控制民族的权利和自由。这就是这次选举斗争在资产阶级党派、特别是右翼党派那里造成的结果。这种情况是一定会发生的，细心的观察者在若干年以前就已

① 指基督教的新旧教会之间的斗争。——编者注

经不能对此置之不理了。德国皇帝由于他那容易冲动的气质，在许多方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物，而在这一方面来说恰好也是如此。我们能够根据他的态度相当准确地判断地位举足轻重的那些人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我们能够根据他的态度十分精确地看出风在那边吹，世界上唯一的新教帝国的这位代表好多年来对待天主教教会首脑以及高级和低级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态度是有高度典型意义的，它表明潮流向何处去：向后，向后，堂·罗德里哥！再向后！^①对于恰好是我们党如此大幅度地增加选票这件事来说，这或许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而且从来没有否认——这对我们来说毕竟不是耻辱，而是光荣——在一切选举中（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最初几次选举也许除外，那时选举社会民主党人是危险的）给我们的候选人投的票有相当多的数目是来自暂时还没有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党员的人。这是所谓的“同路人”。推动这些人的动机是很不相同的，当然不能一一具体判定。但我们是有这样的同路人的，我们可以承认，随着整个党的发展，同路人的数目所占的百分比也在增加。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肯定，尽管每次选举的同路人的数目可能多一些，也可能少一些，社会民主党本身的选票数目却按照一种自然规律的确定性愈来愈增加，尽管在今后的选举中这一或那一同路人会走开，但是会有新的同路人代替他们，而且坚持留在党内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数目是随着同路人的数目同时增加的。这一点是决定性的和特别令人高兴的。不管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一方面坚定地信赖我们的拥护者。在我们的同志以及这些同路人、拥护者和志同道合的人（我们这样称呼没有参加组织的人）中间，不可能有一个人在他给社会民主党人投票时会怀疑自

^① 见莱辛《寓言》第28段。——编者注

已选举的是什么人。因为如果说我们的候选人和传单竟忘了说明这一点，那么我们的敌人是替我们承担了宣传工作的，他们把我们描绘得如此邪恶，如此危险，以致我常常对自己说：他们把我们变成了这样的怪物，但是这些怪物却得到这么多的选票，这是令人吃惊的。一切吓唬人的手段在这些人身上都丝毫不起作用，他们反而说：你们愿意怎么嘀嘀咕咕，咒骂和诽谤就怎么做吧，我反正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

.....

我们从来不相信我们能使直接税得到实行，一般说来我们是被迫去做许多我们明明知道做不到的事情。问题不在于人们是否能立刻实现某件事，而是在于我们必须要求实现它，因为它是正当的，明智的，从而是必须的。我们必须依靠我们举出的理由使议会外的人确信，我们的帝国和各邦今天实行的全部政策，尽管在这里或那里也有一块遮羞布，但毫无例外都是一种阶级政策，帝国和邦都是阶级国家，只要它们保持目前的状态，这种情况也将继续下去。

.....

现在产生了我们是否应当改变我们迄今的策略这个问题。一个政党在什么时候必须改变自己的策略呢？不言而喻，任何一种策略都不是永恒的。李卜克内西有一次用他的激烈的方式说过：如果有必要，我会在24小时之内24次改变我的策略。这种说法是很激烈的，却是很正确的。不过每个政党的策略必须适应党所依靠的基本原理，如果我真正必须在24小时之内24次改变我的策略，那么在这24次中一次也不应当同党的基本原理相矛盾。这是决定性的！现在大家当然可以争论我们是否确实已同我们的基本原理发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只能由党本身和事业的成就作出决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党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都说明，我们从

上述观点出发也丝毫没有理由改变我们迄今的久经考验的策略。其次,也可能因为策略已表明是错误的或者是具有缺陷的而必须对它进行修改。在这方面也没有出现任何情况。当然是有一点,那就是:我们发展壮大,我们的议员增加了,因此我们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改变我们的策略,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刹车或者克制,不,在这批广大的选民群众根据我们迄今的策略、斗争和态度,通过投票对我们表示肯定和同意之后,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热烈地、更加坚决地和更加迅速地前进。当然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决不是站在我们习惯称为修正主义者的那些人一边——他们在最近这次选举以后要求我们在提出立法倡议、起草法律草案等方面开展广泛的议会活动,我必须讲几句话来相当彻底地摧毁这些幻想。一般说来政党制定重大的法律草案并且提供国会讨论的情况是不常见的,因为这是艰巨的工作。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我们的善良的老李卜克内西有一次怎样拿这样的立法草案给我找了麻烦。这是在萨克森邦议会上,我们批评了矿山法并且要求修改。部长说,政府承认需要修改,但是这要花费时间,要思考,调查和研究。于是我们这位老人,他始终是一个轻骑兵,他就骑马朝这里冲过来了,他说:什么?我用5分钟就可以做到。啊,话说出口了,这时我对自己说:这一下我们可卷进去了!部长当然是聪明的,他说:如果社会民主党人能够这么快就做到,那就请他们干吧!于是我们就不得不干了,因为我们不能给自己丢脸。我告诉你们,我花了14个白天和黑夜坐在那里流汗,才完成了后来拿到党团中去讨论的那一草案。它是不完善的,但是至少有了一个草案。其次我要提到我们伟大的工人保护立法草案,并且要对你们承认一件事。在敌人眼里,甚至在我们的一大部分同志的眼里,我属于那些不愿意做实际工作的人之列,就在上星期我还被称为死守原则的人,说我永远是拿出自己的那一套空话来,而且总是

表示否定。除了一个短暂的间歇之外，我在国会呆了36年，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比我这个总是否定的人提出过更多的立法倡议和起草过更多的立法草案。我们的工人保护立法草案在赫克纳关于工人问题的书^①里大受赞扬。后来当我们重新提出这一草案时，特别在纳乌曼和格尔拉赫两位先生的报纸上是一片赞扬之声，他们要求国会应当一致通过这一草案。唉，尊敬的先生们（倍倍尔转向坐在记者席上的纳乌曼和冯·格尔拉赫），你们知道是谁起草了第一个草案吗？这就是我，是这个总是否定的人！提出法律草案肯定是很好的，但是起草法律草案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我们有一切理由在制定大的法律草案时尽可能慎重从事。我们必须把这件事留给别人去做，他们是被任命来干这种事的，而且拿了薪金，这就是枢密顾问先生们；他们有材料，他们有专门知识，也有可能进行调查。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议会中做的工作已经使我们过分疲劳了。难道你们认为，现在我们有81个人，就能够强迫多数认为我们的立法倡议比别的倡议好吗？辛格尔和我曾经在国会常务委员会中徒劳地对那些先生们说明，议会除了讨论政府提案外还有别的事要做。我们这样做是对牛弹琴。我只能对你们说，我们再也不能提出立法倡议了；如果我们按照蒂姆在《社会主义月刊》上的建议设立一个处理工人保护法律和考虑一切有关提案的社会委员会，你们当真设想这样就可以有所作为吗？当然，这是非常需要的，不过我还要讲到决定性的一点，可惜我们对于这一点也一直是太不注意了。要想国会除了处理其他的讨论题目以外还彻底解决这些事情，这从议事规则来说是不可能的，否则国会必须整年开会才行，不仅如此，决定性的问题在于，德意志帝国以及世界上的其他议会的全部立法工作是如此可怜，如此不充分和有缺陷，以致如

① 指亨利希·赫克纳的《工人问题》（1894年柏林版，1902年第3版）。——编者注

果今天完成了一项法律，明天所有的人就已经看到必须再一次加以改变。我们已不再能够制定任何重大的、根本性的法律，因为不再有支持这种法律的多数派了。萨维尼在上一世纪上半期说过我们的时代没有立法的使命，这句话今天也还适用。原因何在呢？因为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以致人们最后只制定不完整的法律，而不再能制定完整的法律了。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上一世纪初拿破仑法典产生了，这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立法成果。拿破仑法典是革命的成果，是那一光辉灿烂时代的成果，从那以后资产阶级社会再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代。一些最杰出的人物为这一作品出了力——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使它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这一作品是完美的，它直到今天还在法国存在着。现在我要问佛罗梅和施塔特哈根以及所有在委员会中参加制定资产阶级法典工作的人：3年前我们有了资产阶级法典，现在我们已经到处都发现缺陷、含混和暧昧不明之处了！拿工商业条例来说吧，30年以来对工商业条例作了什么样的修修补补啊！工商业条例在1869年是一个好东西。后来增加了一些补充条例，今天它已成了一个可怜的东拼西凑、矛盾百出的东西了。由此可见，时代已不再有立法的使命了，人们已不再能制定严密的法律了，因为不断发展的利益冲突和阶级矛盾使它不可能了。我常常问自己：在这种形势下议会活动到底是否值得我们花费劳力、时间和金钱呢？我们在国会中往往是进行单调乏味的工作。我好几次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但是不言而喻，我是太热爱战斗了，因此不会长时间地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对自己说：现在什么办法也没有，只好排除困难干下去，闯出一条路来！我们尽力而为，但是对形势不要有幻想！我对你们说明这一情况，只是为了使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有了81名议员，就一定在议会里大显身手。这里分发的著作中有一篇提到了1871年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那次会上已经提出十小时工作

日的提案。这是32年以前！与此同时在爱森纳赫举行了所谓的社会代表会议，它也宣布支持十小时工作日。鲁道夫·迈耶尔声称（我想他还证明了）俾斯麦当时甚至建议起草一次提到十小时工作日的法律草案。据说这一草案要为工业工人和为农业工人规定十小时工作日（我们直到现在还不敢为农业工人要求这一点），而且农业工人的劳动时间规定为冬天八小时，春天和秋天十小时，夏天十二小时。农村已经度过了30个年头，今天又怎么样呢？我当然是八小时工作日的坚信不疑的拥护者。在这个大厅里恐怕没有人比我更加确信它的必要性，但是我十分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今天争取到了十小时工作日，我们就会很高兴了。所以说不要有幻想，在任何领域都不要有！这对你们的肉体和精神都没有害处，相反，这只会对你们有好处。——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我们将一如既往处于某种孤立状态并且仍旧是最激烈的反对派。这当然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取得让步而且认为值得为此花费力量，我们就接受让步。当然我们曾经屡次为这些让步的价值进行争论。党团的右的方面（姑且用这种说法）连最微小的让步都愿意，尽管按照我的信念这些让步是完全微不足道的。我曾经问自己：如果我们无须投票赞成这些让步也能得到它们的话，我究竟为什么应当去投票赞成呢？我究竟为什么应当通过投票赞成这些让步而在一定程度上败坏我在议会中的声誉呢？但是当我们判断出这是一项有价值的让步时，我们就投票赞成。在最近一次讨论工伤保险的补充条例时我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尖刻的讽刺象冰雹一样飞来，最后党团以14票对13票决定接受补充条例。于是我们投了赞成票，这时雅斯特洛夫博士（克瓦尔克昨天把他说成是社会糖水零售商中的一个）出来在《法兰克福报》上写文章说，甚至社会民主党也投票赞成这一可怜的补充条例，这确实是空前的。党团中的斗争就是这样的，我可以坦率地对你们讲，在党团的新的组成情况

下,这样的斗争将不会减少,而是会增加。我在上面称之为党团的右的方面的那些人,在新的国会中将能够比以前更加容易占上风,因此我认为党必须对形势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给党团规定策略。这是就一般能做到的程度来说。当然不能设想党代表大会在一切问题上都明确规定党团应当怎样行动。党代表大会只能作出指示,它可以指明前进的路线。它这样做了,党团就必须按照这一路线前进,不管是否愿意。(海涅:很正确!)您恐怕必须这样,海涅同志,这是完全不言而喻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恐怕还会更好一些,那时当然会说:谁不服从就出去。我这样说不是指任何一个人,而是纯粹客观地说的。如果党代表大会对党团作出一次指示,党团就必须遵循。如果党代表大会确信党团应对严重的过错负责,它当然会立即提出严厉的谴责。在这以后情况当然就会不一样了。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政治形势和议会形势的概况。党对此必须有清楚的认识,我们所采取的立场必须象水晶或玻璃一样明确和清楚,因为不允许有任何东西使敌人哪怕只有极小的可能说:这次巨大胜利的结果原来就是如此,社会民主党和迄今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情况一样:当它们达到了某一顶点时,它们就变了,就放弃它们的基本原则,于是它们就一切都完了。我们在许多方面已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继承人,但不是象海涅在《社会主义月刊》上的文章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继承人,他说我们必须“接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不,我们必须超过它。(海涅喊道:我写的是,要去“实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企图做的事!这就是说要超过它!)去接替和去实现,但是我不是按照您的意思那样理解的。您以后有权利讲这一点。可惜党的报刊对这篇文章的意义不是象我这样评价的。对于您的这一意见,我已经讲了我的看法。在文章中是这样说的:“它(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表现得愈来愈清楚了:不是单纯地排除自由主义党派,而是要接替它们。”如果我接替某一个被排除

的人，那就是说：我应当实现他迄今在实行而现在已不再能实行的事。您（向着海涅）毕竟是律师，是语言学家，是一个研究过逻辑的人，而对于一篇在某种程度上表述一个纲领的文章，我们当然要求它是清楚的，用不着人们去争论它说的是什么意思。（海涅喊道：请您往下念！）下面是这样的：“……它要负起责任，不是去取消公民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观念，而是去实现这些观念。”啊，尊敬的同志，难道我们迄今没有这样做吗？难道我们迄今在国会中否定过公民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观念吗？我们迄今已经努力求得您所说的那种意义的“实现”，而且超过了它。但是在这整个辩论中我们还会多次遇到我们就概念进行争论的情况。你们对此是有体会的：伯恩哈特写了一篇其重要性不容置疑的文章。但是他说：“啊，我并不愿意这样讲，但是我没法明确表述我的想法；我很遗憾做了这件事。我也保证不再做了。”这时我们作为宽大的法官必须说：“如果你做了某一件事你对其重要性不清楚的事，你当然应当得到原谅。”后来觉勒在《未来》上发表了文章，这篇文章伯恩哈特没有看过。当《新时代》向他指出这篇文章时，他认为这篇文章并不重要。当我描绘了他的做法时，他大吃一惊，控制不住自己，用最粗野的话来骂我，并且宣称他不知道那篇文章：他太天真了——不是就字面上说，而是就意义上说——竟没有对《新时代》上的文章给予足够的重视，等等。我们可不要上当。还会有人说，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表述清楚，他想说的并不是人们按照逻辑必然会从词句中看出的那个意思。而最后还可能象在汉诺威和在以后的代表大会上那样，经过几天的争论后通过一个决议，但是后来仍旧象以前那样不一致。可不要说什么党内的统一和一致了！昨天布劳恩已经弹过这根弦了，他说我们党内是一致的。这不是事实，我最坚决地反对这样说；我们恰好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现在更加不团结，分歧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现在更大！要掩盖这一

点,要再一次用糖水蒙混过去,从我个人来说我已经对这一套厌烦透顶了!

12年来,自从在爱尔福特和福尔马尔进行了大论战以来,我把好多话咽到肚里,这常常使我烦恼。我一再上当,伸出手来调解矛盾,最后我终于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现在,我们必须弄个水落石出,必须把帐算清,我们互相之间必须尽可能彻底地开诚布公。大家知道,整个新的“修正主义”运动的依据是伯恩施坦的一本书。他那时幸而是在伦敦。因为自从他有到德国来(我衷心希望这会使他幸福,而且我本人曾尽力促成这件事),自从他在德国做实际工作以来,依我看,他没有赢得声望,而是丧失了声望,不仅是在激进主义者中间,而且尤其是在他的朋友们、在修正主义者中间丧失了声望。当初,他的朋友们把他当作救世主一样热烈欢迎,他们期望从他那里得到新的福音,新的信念和新的策略,但是最近对于这个人还有什么话没说呢!现在忽然有人说:砸死他,砸死他!这不是因为他收回了他说过的话(哪怕只是一句),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他把话说得太愚蠢,太露骨了。所以人们狠狠地责备他,甚至说:“如果事情这么发展下去的话,他就必须退党!”这句话我们中间至今还没有人说过,这是直到不久前还被认为是伯恩施坦同志的追随者的那些人向他喊出来的。伯恩施坦正是在某种程度上露出了真面目,表明自己是他的朋友们的enfant terrible,也就是一个直率得令人发窘的孩子。由于伯恩施坦已经在许多人面前威信扫地,所以人们也就不太重视他提出的第一项要求,即选举一位甚至必须履行议会惯例所规定的进宫朝见义务的副议长。实际上,我对于居然会提出这个问题就很生气(这一点奥艾尔可以拿我的信来证明),因为我对自己说过:在党内充满着对于选举胜利的极大欢乐的时刻,在除了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以外,全党都确信现在需要乘胜前进,转入攻势,更敏锐地抓住时机,凭借更多的人的力量扩

大目前已有的成果的时刻，在这个重大的时刻，他提出了副议长问题并且宣称：“即使我们必须进宫朝见，也不要因此就束缚我们的手脚！”难道伯恩施坦从他自己的立场出发，还能做出比这更愚蠢、更荒谬的事情吗？而且是在布勒斯劳和埃森的演说^①还使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就象吃了最凶狠的一记耳光那样脸上发烧的时刻；在每一个稍微能思考的人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上面在准备干什么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人们不得不对自己说：我们要在这里对付的那个统治势力代表人物^②曾经如此频繁地宣布：“归根结底，军队是用来镇压国内敌人的！”难道伯恩施坦认为，这一切会在德国无产者的头脑中消失吗？如果这个人有一天认为向我们攻击的时间已到，他就会下令动员他所指挥的海上和陆上的武装力量，难道伯恩施坦以为我们中间有谁会怀疑这一点吗？这个人说过：“只要有命令，你们就必须向父母开枪！”难道这句话已被忘记了吗？谁要是看不到这些，谁要是不知道这些，谁就干脆别去当政治家！根据我的估计，伯恩施坦的声望显然已经一落千丈，并且，就我在居斯纳赫特从我的天文台所能观察到的情况来看，也有一大部分党报认为，不值得用很大力量去反对他。在这样的重大时刻竟发生这种愚蠢的干扰，我很气愤。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尽管也有较大部分的党报（包括一部分在策略问题上通常不反对我的党报）责备我，但另一方面，我从事党的工作这么久，而且你们知道，这些年来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斗争，我却从未象现在这样得到这么多同志的赞同，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提供书面证明。如果一句话说得恰如其分并且正是时候，我们的同志是感到高兴的。我在国会党团和党内还从未遇到过现在这种情况，还从未象现在这样从党员同志们、包括从瑞士、奥地利、比利时和英国的党员同志们（这是德国同志，

① 指德皇威廉二世于1902年发表的两次攻击社会民主党的演说。——编者注

② 指德皇威廉二世。——编者注

不是其他国家的同志)得到如此多的赞同意见,直到这一时刻我还在一封接一封地收到来信。所有这些同志都为终于解决了一件万分棘手的事情而高兴。这是一种在柏林,尤其在我们的中央机关根本发现不了、接触不到的情绪。这十分令人吃惊,但事情就是如此,人们在节骨眼上麻木不仁,头脑不清,同党的灵魂失去了接触,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党成立以来的40年中,我们有哪一次经历过象这个问题上一样的愤怒的风暴呢?当然,这主要是在福尔马尔同志进入格斗场以后发生的,他不仅捡起了伯恩斯坦说过的话,而且按他自己的方式把这些话扩展、加深并论证得更加精确了。福尔马尔是不轻易出场的,尤其不轻易以提出纲领的形式出场,然而,如果他认为到了他个人要为一件事全力以赴的时刻,他就会郑重其事地去做,那时他简直就象马上要宣布一种新的学说一样。在慕尼黑的情况也就是这样。我本来已经认为这件事结束了,我们只需要在党团里研究它就行了。我已经对自己说:现在你总算也可以安静地睡觉了。这时从慕尼黑传来了福尔马尔发表演说的消息。大家还记得福尔马尔1891年的行为,那时他在大剧院发表了他的纲领性演说,他因此受到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欢呼喝采。那时是这样说的:啊,这是党内唯一懂得摸索时代的脉搏的人。现在也是这样。特别是此时此地坐在我面前的纳乌曼先生,他曾经认真地恳求他说:“您是了解形势的人!务必请您从巴伐利亚的山上下来,到这里来担任领导,整个民族会用欢呼来迎接您。”说到欢呼当然情况并不是这样。在慕尼黑是有过欢呼的;只要福尔马尔来到慕尼黑,那里总是有欢呼的。慕尼黑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卡普阿^①。在慕尼黑,任何人都不可持久地不受到啤酒杯

^① 卡普阿是古代意大利以奢侈著名的城市,迦太基人的统帅汉尼拔一生所向无敌,但是在他的军队驻扎卡普阿受到奢侈生活的腐蚀后,他就开始走下坡路直至失败。——编者注

的惩罚。在慕尼黑，党的最辉煌的支柱经过一段时间也要垮台的。你们看一看这位帕尔乌斯，不久之前每一个人都还发誓说他是一个地道的激进派。当这个辉煌的支柱在慕尼黑住了一些时候以后，他垮了，他颓丧地躺在海德豪斯沼泽里了。当然，他曾经是激进派，他垮下来是同修正主义者垮下来的情况不一样的，但他毕竟是垮了。他和另一些人的遭遇一样，他们去慕尼黑时是勇敢的、忠于原则的、坚定的同志，我看到这里的桌子旁边坐着几个这样的同志。在慕尼黑过了几年以后他们的思想和灵魂都垮了。这是我的印象，而且如果我自己搬到慕尼黑去，我相信我也要为自己担心。福尔马尔的行动不仅受到慕尼黑多数同志的欢呼和鼓掌，而且也受到资产阶级报刊的欢呼和鼓掌，几乎无一例外。我们党内已逐渐达到这样的地步，有某一批人在自己周围聚集了整整一群捧场的资产阶级记者作为祭司。我不是说，他们是被召唤来的。不，他们是自己朝这批同志靠拢的，他们是自愿来欢呼，来称颂的。我最近难道没有看到这样的说法：福尔马尔，巴伐利亚的无冕之王！但是巴伐利亚的党的大多数在这个问题上对于他们的无冕之王是丝毫不感兴趣的。巴伐利亚的情绪使我非常高兴。拜罗伊特，请记住是拜罗伊特，它走在前面，首先宣布反对福尔马尔的演说。这使我大为满意。巴伐利亚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报纸曾经说整个巴伐利亚邦议会党团都和福尔马尔意见一致。但是几天以后我们的78岁的老同志加布里尔·勒文施坦（他是代表，现在在这里）宣布：我不！泽吉茨同样也立刻说：我不！哈勒同样拒绝了福尔马尔的观点，不可能指望他会是别的样子。只有一个人弗兰茨·埃尔哈特，这位莱茵河畔的普伐尔茨选帝侯直到今天还保持沉默（麦斯特：不，他也已经说了，他不参加）。是这样吗？这叫我高兴。我已经认为你（朝着埃尔哈特）也迷路了。如果人们能争取到象你这样的一个伙伴，那是很有价值的。这

种情绪在全党都表现出来了，这不是上面造成的，而是白下而上自发地产生的。我这一次没有带头，福尔马尔一说话，几乎全部党报都明确表示态度反对福尔马尔。到处都爆发了。在整个党内从下而上一致迸发出愤怒的喊叫声。也有人反对这样做。例如奥艾尔在最近一期的《社会主义月刊》（他只在那上面写文章，对他来说《新时代》似乎已不再存在了）上以他那种著名的机智的方式说，一件十分次要的事情被打扮成一场大型政治剧了。他认为这件事固然不是没有引起严重的反响，但是这一建议提出时恰好碰上新闻淡季^①，这一情况恐怕不是不起作用的。我深信奥艾尔是真心实意这样想的，这也完全符合他的为人。但是我为党内任何人都不象为奥艾尔那样感到遗憾，他竟如此判断这些已经证明党心非常激动的事件。这些演说确实已经动摇了党的基础，这时要说争论是由微不足道的的原因引起的，这不是事实，正象另一种认为这次代表大会上前几天的辩论是文人争吵的说法是错误的一样。只有丧失了真正的基础、丧失了原则立场的人才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奥艾尔认为这些事件毫无意义，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他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当然，他说党内斗争在我们这里通常是占用了夏季月份，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盛夏。我们恰好在夏天争论，这是因为我们大家，党的领袖和党团成员，在秋天，在冬天，一直到春天很晚的时候都在从事议会活动，只是到夏天才有时间考虑我们自己的事，进行理论工作，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进行论战。关于副议长问题本身，我已经在《新时代》上我的文章中详细发表了意见。我在这里无须细谈了。我要回答对我的文章的攻击，并且但愿今后也有机会来回答。……

……

^① 或称“新闻饥荒期”，指每年盛夏因议会休会等原因报纸上通常缺乏重大政治新闻的情况，这时报纸往往在小事上大做文章。——编者注

……请你们继续听下去：当《法兰克福报》的那个起初尽一切力量拉福尔马尔的撰稿人察觉党内的形势时，他在《法兰克福报》的一篇通讯中说：“如果有人认为，多数派会考虑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当副议长（即使社会民主党人接受向他们提出的那些条件），那他他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只有在这个党进一步改变时才谈得上这件事。……如果这种新的精神进入党内，那么能够进一步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刻就到了！连民族自由党人、甚至连中央党也没有想到而且不可能想到让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坐在副议长席上。现在，也就是在这一争执发展成一场原则性的争论以后，应当再一次十分坦率地说明这一点。”事情没有搞成，还受了嘲弄！人们对我们说：我们惹得你们现在争吵起来了；但这场争吵是白费劲，我们根本不想让你们当副议长；你们争了几个星期，但这全都是白费劲！这些人起初支持一个人，现在却叫他在道义上吃了一次大得无以复加的败仗！权力问题！问题在于权力的增长；一般说来这就是修正主义的问题，人们希望最后在政府中获得权力，这里和伏日山脉那边^①的人都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首先在一届内阁中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员枢密顾问，或者有一个副部长，或者甚至有一个部长那该多好！那时将会怎样？我们姑且假设，他们挑选你们队伍中最能干的人，比方说让福尔马尔当内政部长。你们难道认为他那时就能够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制定法律草案吗？要知道还有全部资产阶级在那里，他们刚刚才把自己的人派进政府，他们居然会允许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进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设想，那就是，他们十分明确地知道，他们通过这样做能够从内部瓦解社会民主党，能够使它变得同现在不一样。皇帝的确作过这样的批注：“唉，如果我们有一个米勒兰多好！”如果人们问我，我会

① 指法国。——编者注

说：我们有福尔马尔，他至少是同米勒兰不相上下的。至少他的策略同米勒兰的策略是一回事，而在我看来这是重大的错误。我们这儿的情况当然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在我们这儿，在最后关头总是这样说的：要么弯曲，要么折断，既然不弯曲，那就折断了。你们不妨假设这样的情况：权威人士中有人指望通过从我们队伍中吸收一个人进入政府而得到好处，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对工人产生影响。你们以为这件事没有让步能够进行吗？我给你们这个，是要你给我那个！没有人比福尔马尔更懂得这一条政治原则，为此人们会让给我们一点权力，这比你们所想象的要微小得多。好几年以来民族自由党人方面都有高个子默莱尔呆在政府里，两个星期以前我在民族自由党的《汉诺威信使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它的宗旨是：尊敬的同志，请您尽可能迅速地退出内阁吧；您在那里对我们毫无用处，您只是使我们丢脸。连民族自由党都是这样。让我们假设我们党也有可能遇到有些类似的情况，那时人们会对我们说：公平交易，我们对你们作一些小小的让步，但是现在请你们劳驾也投票赞成国家预算吧！你们现在必须接受陆军和海军预算、殖民地预算、对外政策、间接税、粮食关税、献金，把全部预算连皮带毛都吞下去，然后我们对你们作出让步。正像海涅的那次演说里那样说的：用大炮换人民的权利！（海涅：这么说您毕竟又提起这件事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次演说更为天真的东西。我已经反复讲过，一个强大的政府意味着一个软弱的议会。你们愈加强政府，你们就使它更加巩固，使它有力量压榨我们，拒绝我们的一切要求。有人说，究竟是谁居然会想到这样的事呢？当然有人想到的。福尔马尔在慕尼黑提出这一原则：我们应当把斗争专门集中于几项任务和几点浅近的问题，他举出的这类问题是联合、结社和集会权，取消粮食关税，标准工作日。关于粮食关税的情况，我们刚刚已经经历过了。迄今人们把这一政策叫作英国的

工会政策。这已不再是原则性的政策，我们拿出它来就会站到错误的立场上去。我们在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上讨论过预算问题。巴伐利亚的同志们投票赞成预算。那时是奥艾尔同志作了最强硬的反对福尔马尔的发言，今天他当然恐怕不会再坚持这次发言了（奥艾尔：很正确！）……修正主义在南德意志特别感到自在，这恐怕不仅是由于受了慕尼黑-卡普阿或者啤酒和葡萄酒的令人更富于人情味的影响，而是由南德意志比较不发达的经济关系造成的。但是正因如此人们不应当试图从南德意志出发强迫更加发达的北德意志接受一种新的策略。这种做法我是竭力反对的。……

……修正主义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也在于它的非常谨慎的态度。这甚至是一个主要的差别。他们满足于微不足道的小事，千万不要向前冲，千万不要激动，千万不要争取群众的同情。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本来能够把全部天主教工人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的话，那就是在巴伐利亚选举权问题上。但是那时本来应当在公共集会上提出抗议，反对取消从21岁起获得选举权的规定，反对把等待期从6个月延长到一年，反对延长获得选举权所必须的居留时期并从而使现在有选举权的15万人丧失权利。他们在慕尼黑、纽伦堡、维茨堡、埃尔朗根等地的人民集会上没有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他们坦率地对党团讲了自己的想法，为了避免这样的事，他们是这样想的：“千万要镇静，镇静！不要吵吵嚷嚷，白天不要，晚上也不要！我们关起门来搞花样，我们肯定会把事情搞成的；千万别把群众煽动起来，他们可能扰乱我们的小组！”如果把这运用到实践中去，那就成为伯恩哈特在他的文章中说出来的党的经验教训的一个部分。这些人认为：“我们愈谨慎，我们就愈容易胜利”；我说：“我们的行动愈谨慎，我们所取得的就愈少。”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说：“人们不能跳过必不可少的发展阶段，但是人们能缩短

它的时间。”^① 喔，比我们自己队伍中人所熟知的马克思更加伟大的现实政治家是没有的。人们不能跳过一个发展阶段，但是可以缩短它。我们的全部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带来社会主义社会而缩短发展阶段。但是修正主义者的说法却恰恰相反：啊，不要这么快！不要这么向前冲！话不是这样说的，但意思是这样的：群众还没有成熟呢！如果今天政权落到我们手里，你们怎么能想象这样的群众能够利用它呢？于是我回答说：你们不要替别人费脑筋了！你们究竟是否知道，当群众站在我们一边时，我们这边将会拥有什么样的智慧吗？我们的党员同志在工会中，在疾病保险储金会中，在工商业仲裁法庭中，在议会中取得了多少成就啊！特别是那些进入议会的来自无产阶级的人——我现在不说大学生们——取得了什么成就啊！这些人在今年春天和夏天在关税委员会中是怎样尽职的啊！我老实地告诉你们：我曾经期待他们会尽自己的本分的，但是看到他们如此杰出地完成他们的职责，我是惊佩不止的。请你们问一下政府代表们、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们，这样的场面是多么难堪：在讨论个别条目时至多只有一个有利害关系的人从利己的动机出发，站在他自己的狭隘的立场发言，而我们这一方面的鲍德尔特们、楚拜尔们、安特里克们，反正不管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却在某种程度上就最困难的题目凭卓越的专门知识作过发言。例如安特里克曾经就一系列最困难的化学问题作过报告，竟使政府代表吃惊得目瞪口呆。所以说，你们知道群众中有什么样的智慧吗？你们连做梦都想不到！在每一次伟大的人民运动中都会在合适的时刻出现合适的人物。如果说世界上曾经有过一次伟大的文化运动产生了自己的合适的人物、而且还有合适的妇女人物的话，那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文化运动。如果我们明天由于某种情况能够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编者注

把我们的敌人从他们的位置上赶走，并且由我们自己去代替他们，那么你们不必担心，我们一定会懂得我们该怎么办的。唉，这种鼠目寸光的观点，这种狭隘性，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这种无尽无休的安抚，随机应变，玩弄外交手腕，委曲求全！当然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修正主义者方面的政治家才能，都是他们方面的外交技巧。人们隔着1000米远就看得出他们的政治家才能了，人们从100米以外就闻得出他们的政治家技巧了。所以我对你们说：这些死抱住原则不放的人，这些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持党的老理想、老革命立场的人，他们不是外交家，不是政治家，他们不自命为这样的人，但是我要说，一旦人们注意到某一个人是一位“政治家”，他就再也不是政治家了。当某一个人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外交家并且也许还把这一点说出来时，他就不再是外交家了。一句话，这是力求和资产阶级社会亲近。掩盖、调和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对立，这是自称修正主义者的那些人在党内所追求的东西。这始终是、永远是那场旧的斗争，这边是左派，那边是右派，而中间是沼泽派。这是那些分子，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打算做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从来不说他们打算做什么。这是那些“狡猾的人”，他们总是首先听一听：“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他们总是在摸索多数在哪里，随后他们就站到那里去。我们党内也有这种人。现在有一大批人在这次讨论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人们必须揭露这种党员（喊声：揭露！？），是的，我是说揭露，这样，党员就会知道，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动摇不定的人。对于那种至少是公开维护自己的立场的人，我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能同他们作斗争，不是他们取胜，就是我取胜，但是这些动摇分子，他们总是溜走而回避任何明显的决战，他们总是重复说：我们都是一致的，我们都是兄弟。他们是最卑鄙的人！我最反对这样的人。但是，如果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上，对于这一观点是否正确还存在一

点怀疑的话，那么，我认为敌人发表的意见可以最好地为我辩护。这些意见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晴雨表。但是我要问：难道我们的敌人不是以种种方式纵容和赞扬修正主义倾向吗？难道他们不是尽一切可能从道义上来支持吗？《法兰克福报》几乎已经被叫作修正主义者的机关报了，而且人们可以说纳乌曼的《救济》杂志同它完全一样。尽管我同纳乌曼先生相去如此之远，尽管我认为他没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但是就他所采取的针对我们的策略来说，他通常是很能干的。（喊声：他毕竟没有取得成果啊！）的确，他没有取得成果。同志们，你们想，我会相信修正主义有一天将在我们党内取得成果吗？不，同志们，修正主义没有取得成果，但是它给党造成了损害。它分散了我们的力量，它阻碍了我们的发展，它迫使我们发生意见分歧，它迫使我们互相反对，而本来是应当出现相反的情况的。一大批同志误入迷途了。这些人诚实地进行斗争，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关于我们的大学生我甚至也说过这样的意见，我说过他们是怎么回事，许多人只是转眼就把他们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学到的东西忘记了，很多人或多或少地相信他们原来天生就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止一个人相信，由于他屈尊接受无产阶级的委托书，无产阶级应该为此感到骄傲。这不是存心不良，这不是故意的背叛，但这对党来说是一件坏事。除大学生外，我们的修正主义者中还有另一部分人，他们从前是无产者，后来社会地位提高了，而恰恰是现在他们认为自己的这种地位要结束了。你们只需运用唯物史观，你们就可以解开这个谜。对一切敌人适用的东西，对我们也是适用的。他们还相信自己似乎具有政治家的气质，似乎自己生来就是外交天才。有了这样的信心，再加上同其他派别的人交往，就使他们逐渐走上了我今天在这里大致指出的那条道路。其次，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所谓的无产者！是的，这是一些没有知识的人，没有教养的人，这是那样的人，他们追随一个他们个人尊重并且认

为应当感激的人。但是，如果有可能确定党内真正的无产阶级对修正主义的想法，那就可以看到，修正主义有一个气派十足的参谋部，但是追随这个参谋部的队伍却是很小的。因为在最近一次选举以后——我不隐瞒这一情况，我再也不隐瞒什么了——修正主义在国会党团里加强了，因为我知道他们十分自然地企图在国会党团里贯彻他们的信念，因为我知道这会象从前那样重新引起不间断的斗争和最不愉快的、最讨厌的摩擦，所以我自己说过：现在党代表大会、现在党的代表机构终于应当决定，从它的立场来说今后应当怎样确定国会党团的策略。我在我的最初的一次声明中已经说过：“我知道，我们在国会党团中将专门就策略进行重大斗争，但是我也知道，归根到底，当党不得不说话的时候，问题的解决就会与在国会党团中不同。我们将必须比以前更多地向党发出呼吁，要党就国会党团的策略作出决定。”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向你们提出了一项作了修正的决议，修正的内容我一上来就念过了。根据这一观点，我请你们考虑这一决议并且作出判断。如果你们相信，决议说出了必须说的话，就那请你们以大多数（喊声：一致地！）同意这一决议。我深信，如果提供了这一准绳，如果为了今后传播关于党的一切重要问题的明确和真实的知识已经采取了其他必要的措施，党就会自豪地继续走自己的胜利道路，并且非常出色地实现它的历史使命。

选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1981年三联书店版第548—570页。

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 代表大会上的两篇讲话

(1904年8月17日)

饶勒斯同志在他的发言里,关于我们德国人谈得特别起劲,给我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要把提出德累斯顿决议作为当前的讨论问题的责任归罪于我们。对此我要说,我们当中没有哪个人,无论是该决议的起草人,还是那些在德累斯顿最后投票赞成决议的人,预料到这个决议会在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被提出来讨论。这件事既然在我们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已经这样发生了,那么我们自然希望这个决议得到通过。

饶勒斯同志在他的发言的开始部分,怀疑大会是否有权以这样一个决议来干涉某些党的策略。我们的权限在我们自己手里。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大会的权限值得怀疑,那么企图用一个对各国都有约束力的决议把各国的关税政策和贸易政策确定下来的作法就更值得怀疑了。因为怎样把在这里讨论的各国如此对立的根本的经济利益调和起来,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反对讨论这个问题,远比反对讨论策略问题要合适得多。饶勒斯认为,德累斯顿决议只适合德国的情况,他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德累斯顿决议中所反对的、存在于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些思潮,对党的生活是有害的。它们不仅在德国党内存在,而且具有国际性。是的,它们不仅在德国,不仅在饶勒斯所代表的法国存在,而且在意大利也很猖獗,在奥地利(维克多·阿德勒博士:啊,别那么

说！)，在比利时也同样存在。在荷兰这种毛病如果不是由于去年发生的事件（即大规模的总罢工）被克服了的话，我们现在同样可以在那里看到。（特吕尔斯特拉：我们没有生过病！）你们差一点就要得这种病了。（笑声）此外，尽管国家形式各有不同，但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到处都一样：都是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这两者都是以阶级统治为基础，其目的都是想通过国家政权来维持这个阶级统治。

谁也不象饶勒斯那样把决议的内容理解为要想把同样的思想强加给所有的人。谁要想这样做，谁就应该进疯人院。决议无非是想在国家的阶级性质所容许的范围内，确定社会民主党在各国的策略。因此，有不同的意见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党内有不同的意见存在，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在我们德国，这种意见分歧过去存在，将来也永远会存在，这是因为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观点，在每件事上都会产生不同的意见。但重要的是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和团结。而我们不仅要站在相同的原则立场上，而且在一般政策的所有问题上还要站在相同的策略立场上，统一和团结才可能实现。对一个国家的党来说，最大的不幸是分裂。这一点我们德国人在1875年以前深有体会，比任何人的体会都深刻。因此，我要说：党发生分裂的那些国家是可悲的！

有人说，德累斯顿决议是个咒语，它意味着革除教门和开除。这两者都不符合事实。德国的情况就是最好的证明。没有任何人被革除教门，没有任何人被开除。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决议是以288票赞成，11票反对获得通过的。11名投反对票的人中，有两人已在这儿解释过了他们投反对票的理由。决议只不过是対一种被党视为灾难并予以谴责的倾向的代表人物提出警告而已。但是，如果有人对决议中的个别词句有反感，那么我们同意修改这些词句。例如，如果你，亲爱的维克多，想建议不用谴责（Condam-

-ner)这个词,而用拒绝或者不赞成这样的词,那我们是同意的。此外,盖得一瓦扬决议案中一些翻译上的错误,应根据德文本改正过来,据我所知,提案的提出者是同意这样做的。

我们认为,我们迄今在德国对资产阶级党派和政府所采取的策略,法国和其它国家也可以,而且应该采取。我们并不要求对任何对工人阶级有价值的妥协,不管这种妥协来自何方,都一律采取拒绝的态度。无论是政府,还是资产阶级政党提出的建议,凡是我们认为确实是好的,我们都接受了。但对此,我们并不说:非常感谢,同时这也不妨碍我们紧接着就最坚决地、毫不留情地去反对这个政府或这些资产阶级政党,如果我们认为它们的行动或企图是有害的、或者会带来灾难的话,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始终保持我们的完全自由和独立地位,始终牢记我们面对着一个建立在阶级统治基础上的国家。可是饶勒斯同志在法国所代表的党与政府和那些躲在政府背后联合在所谓的“同盟”中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了正式的联盟。这就迫使这些同志放弃他们为了工人阶级利益本应提出的许多要求,而容忍了许多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坚决予以反对的东西。这种作法在自己的队伍里引起了混乱和糊涂观点。坚定者忧心忡忡,他们认为这种策略使无产阶级的利益遭到了严重的损害。结果是,让无政府主义占了上风,最优秀的分子被赶到无政府主义的队伍中去了。与此相反,大量可疑的资产阶级分子却被吸收到党内来了。我始终怀疑我的朋友阿德勒,怀疑他在心灵深处是一个隐蔽的修正主义者,(阿德勒博士:哦哦!)不过,他昨天对饶勒斯策略的危险性以及他的担心,谈得很好,他讲的每句话,我都赞成。

饶勒斯的策略不会使资产阶级政党向左转,而只会使社会党人向右转。(有人喊:非常正确!)在法国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米勒兰曾以社会党人的身份参加内阁。但是,当1900年国际

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时，他出面欢迎沙皇并为此而获得一枚俄国勋章，可是当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时，他的党内同志连他的影子都看不见，更不用说向大会致贺词了。但当大会代表们站在拉雪兹巴黎公社社员墙前向殉难者表示敬意时，米勒兰所属的那个政府派出了资产阶级在人间的三位一体的代表：步兵、骑兵和炮兵，并让警察把代表们驱散。勉强让辛格尔讲了几分钟的话。这是罕有的丑闻。（热烈的掌声）甚至在1889年头号反动分子杜毕伊当权时都没有发生过这类事件。那时我们可以不受干扰地做事，到了1900年却遭到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激进内阁的禁止。如果米勒兰当时还有一点自尊心的话，他就应该立即辞职。这样一个部长在德国早就被从党内赶出来了。

饶勒斯说，法国是共和国，而德国是由反动派统治的君主国，所以德累斯顿决议不适用于法国。不错，我们的国家是君主政体，我们处于最反动的统治之下。我亲爱的饶勒斯！我们羡慕你们法国人有一个共和国，更羡慕你们有普选权，你们的一切代表机构都实行选举。但是，近几年来在法国一旦发生有一些影响的罢工，当局不仅动用警察，而且动用武装部队来镇压罢工工人，可是你们的共和国却不加阻止，这就是说，共和国政府在这些场合始终偏袒资产阶级而与工人敌对。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共和国也是一个阶级国家，在那里阶级斗争要露骨得多，在这一点上，它比君主国进了一步。我们国家的警察和司法，迄今也不断用暴力手段对付工人。但是，自从1889年煤矿工人大罢工以后，军队再也没有被召来镇压罢工工人，不象在法国那样，每一次有一些影响的罢工都会遭到军队的镇压。而且不仅在法国，就是在共和制的瑞士，甚至在大洋彼岸的伟大共和国——美国，也是如此。穆尔同志对我们说过，在瑞士只要发生较大规模的罢工，政府就派民兵，特别是喜欢派农村地区的民兵来镇压产业工人。对此我没有可补充的，我也不想

做什么补充。而我们那些部长们在这种场合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也听说了。我想，我们也听得够多的了，除了穆尔认为必须加以说明的以外，我们不要求对这方面作更多的了解。至于美国的情况，我只想提一提最近在科罗拉多、宾夕法尼亚和匹兹堡等地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就足够了。还没有哪个君主制国家敢如此粗暴地对待工人。君主国和共和国在这方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君主国有时好歹还得保持一点自己的威望；它有时还要——如像在俾斯麦时代那样——利用工人来反对资产阶级。它必须装出一付凌驾于各党派之上的样子，在德国就是这种情形，在那里搞了个所谓社会立法，它的价值究竟如何，我们决没有受骗。与此相反，在共和国里，政府是统治阶级的当然代表，其任务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如果把接受一个或几个社会党人参加政府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的让步，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的敌人非常清楚，不是资产阶级变成社会党人的朋友，而是一部分社会党人变成资产阶级的朋友，社会党人的代表被迫为资产阶级政府的所有行为承担责任。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国家是英国。英国工人每次想成为一股政治势力时，英国政府就马上迎合他们。它不仅向工人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而且还吸收他们的一两个代表参加政府，担任副大臣，它的这种作法使作为反对派运动的工人运动陷于瘫痪。英国政治家对阶级对立的理解早就比英国工人强得多。迪斯累里在上一世纪40年代初期所写的小说《西比尔》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在这本书里已经谈到了在一个工业国家内有两个敌对的民族。英国至今还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是由于这种策略造成的。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吗？

饶勒斯也提到了在法国进行的反教权主义的斗争，并说如果通过德累斯顿决议，这一斗争将无法进行下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无法进行下去。尊敬的饶勒斯同志，德累斯顿决议丝毫不会妨碍你们反教权主义的斗争。根据德累斯顿决议你们也可以随时为实现一定的文化进步而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决议所反对的是牺牲或者忽视我们的阶级要求的长期联盟。我们同情你们的反教权主义的斗争，并赞成这一斗争，尽管我们也许并不总是同意你们所采取的方法，对此我不想多讲什么。千万不要上你们的盟友的当。你们盟友是否能做到他们必须做的事情，对此我表示极大的怀疑。资产阶级也不会放弃上帝这个盟友。我们来看看法国的税收制度吧，和它比较起来，容克地主的普鲁士的税收制度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再没有比法国的税收制度更不合理的、加给工人阶级的负担更沉重的税收制度了。对于维护这样一种税收制度的政府，我决不支持。

因此，我们的立场应当是：在保证我们行动完全自由和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支持一切对工人阶级确实有益的措施，坚决反对一切于工人阶级有害的措施。

德累斯顿决议对法国社会党人的独立性的干涉并不比考茨基决议更厉害。而考茨基决议饶勒斯和他的朋友们在1900年是投票赞成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个1900年决议还不够好，所以我们再前进了一步。当然，我们不能为各个时期，为一切问题制定出一个策略，因为策略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李卜克内西有一次说得毫不含糊：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在24小时内改变24次策略。但是策略决不可以同我们的原则发生矛盾。只要我们还在同阶级国家打交道，策略的基本路线就不能改变。这就是我们所建议的决议所要求的东西。除此而外，别无其他。

请法国同志们注意，如果你们犯错误，我们也要付出代价，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大家要尽量互相保护，免得犯这类错误。尽管我们必须单独制定我们的策略，但是有一点我们永远不可忘记：在

资本主义世界里，阶级对立始终存在，而且不断激化。双方势不两立：一边是资产阶级，一边是无产阶级！调和是不可能的！战斗到底吧！（暴风雨般的掌声）

（1904年8月19日）

（受到热烈和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的欢迎。他打了一个手势，要求大家停止欢呼和鼓掌）党员同志们！我们的饶勒斯同志今天的演说，可能又会造成一种完全错误的印象，似乎是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引起这场辩论的。为了尊重历史事实，我要郑重声明，无论是在德累斯顿会议之前和之后，我们都从未想到要辩论。事实上是一部分法国同志，他们认为，我们的德累斯顿决议案适合于作为一切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基础。当然，我们自己是坚决拥护我们自己的决议的。尤其是因为在德国促使我们通过这个决议的原因，在许多其它国家里也存在。还因为自从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以来的事实表明，尽管一致通过了考茨基的决议案，但在德累斯顿决议中提到的那些作法仍在继续，而且在有些国家里还采取了明目张胆的形式。因此，现在对这种思潮作出判断是倍加需要。

听了饶勒斯的讲话，不禁会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象这样一个决议案在委员会中怎么会获得多数人的支持？饶勒斯把决议案说成这样，好象赞成它的人必定都是白痴。他把它描写成是要取消一切自由，取消一切独立思考，要压制少数派的。一句话，它是最可怕的精神恐怖主义，其罪过应由社会民主党来承担。可是，他在这里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我们当中那些对决议案的全文并不了解，但想赞成阿德勒-王德威尔得修正案的人，对这个决议案只作了微小的修改，我们的决议案的原意和内容将保持不变。单

从这个观点来看，饶勒斯对决议案的内容和意义的全部批评就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证实，饶勒斯在委员会中曾投票赞成阿德勒-王德威尔得决议案，而这个决议案像我们的决议案一样谴责了他的政策，那么，他的这种批评就更加站不住脚了。（有人喊：是吗！是吗！）为什么要这样激烈地进行谴责呢？不断有人对德累斯顿决议提出异议。说这个决议完全是为了德国的情况而制定的，而德国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诚然，德国不仅是一个君主国，而且它是由将近20多个君主国组成的。然而即使对一个君主制国家来说，将近20几个君主国同时存在，也是太多了。（全场大笑，有人喊：说得很好！）德国的情况的确很特殊。另外，德国也是一个主要由封建主义，警察制度统治的国家，也许除了俄国和土耳其外，是欧洲受反动统治最厉害的国家。我们不得不天天同这种可悲的境况周旋，不得不亲身感受这种境况所造成的后果，这一点我们知道得最清楚。一个外国人，不管他把我们的情况描写得多么糟糕，我们还是比他更了解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的决议不仅适合于我们在德国国会和德国各邦议会的策略，而且也适合于其他由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的策略。

我在委员会关于共和国和君主国的论述，有的地方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在没有直接引用报告中的原话的情况下被人歪曲得面目全非。我想再重复一遍，我们当然是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共和派。（赞同声）这是过去俾斯麦公爵，现在毕洛夫伯爵和几乎所有的德国报刊一直对我们最为不满的一点。他们谴责我们是反君主制分子，是共和派。但我们并不因此而醉心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尽管我们非常羡慕你们法国人有一个共和国，并且也希望自己有一个共和国，但是为了这样的共和国去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还没有想到。（暴风雨般的掌声）不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这两者都是阶级国家。两者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两者肯

定都是保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因此，在这两种国家形式下，立法都首先是为了有产阶级的利益的，而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在不严重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的情况下才予以考虑。因为在统治阶级面临失去政权的危险时，它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有丧失的危险。对我们来说共和国比君主国强得多。但是，君主国并不象你们说的那样坏，而共和国也并不象你们说的那样好。（热烈的掌声）例如，我还没有见到哪个欧洲国家的整个税务立法象法国的税务立法那样敌视工人。在法国，在35亿多的财政预算中，作为唯一的直接税来征收的只有大约7000万的遗产税，而我们即使在容克地主统治的普鲁士也还实行了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

饶勒斯说，在法国实现铁路国有化是他们最主要的目标之一。亲爱的饶勒斯，你们现在才努力争取的东西，我们早已经有了。（笑声）但是，如果说要实现工人的要求的话，那么，结社权和联合权在共和国经常受到的威胁并不亚于在君主国受到的威胁。如果工人想通过罢工去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那么，他们无论在哪里都不会象在大洋彼岸的伟大共和国里那样受到如此粗暴、卑鄙和无耻的对待。（掌声）不正是在小小的瑞士，仅在今年夏天就如此频繁地调动国民军去对付罢工队伍，而毫无任何正当的理由。如果每当工人试图行使联合权时，国家权力机关都调动军事力量去保护企业主，那么工人的这个权利还有什么价值。

我已经说过，我们羡慕你们在法国有一个共和国，更羡慕你们有对一切机构都实行普选的权利。但我要告诉你们，如果我们同你们一样，也有那样自由和广泛的投票权的话，那么，我们会对它采取另一种作法，（暴风雨般的掌声）一种同你们现在的作法完全不同的作法。（再次响起一阵掌声）是的，如果在你们那里工人与企业主发生了冲突，那么，你们的激进内阁也将会诉诸国家暴力，以骇人听闻的方式镇压工人。最近几年来，法国还没有哪一次较

大规模的罢工没有受到军事力量的镇压，在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内阁时期是这样，现在在孔布内阁时期也是这样。象这样的事情曾两次发生在阿尔芒蒂埃尔，另外，在布雷斯特、里尔、鲁贝、马赛以及马提尼克岛等地都发生过，就在昨天又出动军队镇压诺曼底玻璃工人的罢工。（热烈的掌声）去年11月巴黎警察局以无耻的暴力方式闯进劳动交易所，打伤了70多个工人（有人喊：听啊！听啊！）可是当瓦扬同志在参议院中提出质问，要求惩办警察局长时，一部分饶勒斯分子却投票反对讨论这项议程。（会场上发出激烈的“呸！呸！”声）同一部分资产阶级党派和政府的密切联盟就导致这种默契。如今有哪个地方的军队不是维护阶级统治的最重要的工具！饶勒斯给我们德国人上了一堂关于我们应该怎么办的课。我回答他：在德国，如果一名工人代表敢于为了讨好政府而接受一项出卖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利益的议程，那么，他第二天就会被取消代表资格，而且再也不能当工人代表。（暴风雨般的掌声）在这方面我们的纪律是严明的。刚刚提到的那种事情，只有当同政府和执政党的联盟达到非常紧密的程度，以致人们由于害怕得罪它们而不敢无保留地代表自己事业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饶勒斯声称，德累斯顿决议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引起了缺乏信心和怀疑的思想，它麻痹了党。我不明白，象他这样一位有学问、历史知识渊博的人，怎么会发表这种观点。我们的一切意见分歧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战斗力。国会和各邦议会选举中的成就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对各邦议会的选举只有残缺不全的选举法。而且我们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成就。难道我们的策略拒绝了真正的改革措施吗？或者说我们没有支持显著的进步吗？我们的策略正是要我们做这些事情。如果说在德国有了点社会进步，那么，这不归功于我们，还能归功于谁？（有人喊：说得对！）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依靠我们的敌人俾斯麦的权威来反击我们的朋友饶勒斯的攻击。（掌声）只

是由于我们的强迫和鞭策我们的敌人才进行改革。只有我们才是始终如一的促进派和推动者。我们是非常宽宏大量的，因此我们能够接受不管来自何方的让步，今天来自政府，明天来自自由派，后天来自特别努力争取工人选票的中央党。但是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横隔在我们和我们的敌人之间的那道深不可测的鸿沟。如果说，统治阶级同意改革，那是为了不使自己受到损害。它们总是知道为什么要改革。在这方面它们比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聪明。你们，英国人，请你们听着，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比英国政府更懂得这一点。英国资产阶级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聪明的！（英国人高喊：听啊！听啊！）为了阻止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英国资产阶级总是及早作出让步。（有人喊：说得很对！）如果在英国下届大选中自由派获胜，那么，英国资产阶级就会毫不犹豫地吸收一名社会党人，可能是约翰·伯恩斯加入政府。（英国代表团中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根据情况也可能吸收两名。但决不是为了迎合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告诉工人：你们看吧，我们自愿给你们别人在大陆上拒绝给你们的东西。（英国代表团中响起热烈的掌声）人们企图用这个办法来获得工人的选票和预防社会主义。（英国代表团中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那么，饶勒斯根据他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联合中想全部归到自己名下的功劳究竟是什么呢？（笑声）如果说，最近几年来在法国共和国受到了威胁——我认为这是事实——那么你们同你们的资产阶级战友一起拯救共和国的作法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会这样做的。你们同教权主义作斗争这一点，我们也不会谴责你们。如果你们在同教权主义作斗争时感到自己力量不足，那么你们就去同自由派联合吧！我们也会这样做的。但是除了这种斗争外，我们就没有共同之处了。近年来饶勒斯和他的朋友们也拯救了的世界和平究竟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受到了威胁？（全场大笑）我们也

是主张世界和平的。但是同我们相反，你们却投票支持陆军和海军的军事预算(饶勒斯派喊道：没有！)，支持殖民地预算(饶勒斯派喊道：没有！)，支持间接税(有人喊：你不也是这样做的吗？！)，支持秘密基金(饶勒斯派发出喊叫声)，你们通过这种作法支持一切危害和平的事情。(热烈的掌声)对于一个象你们的现政府那样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府，在就是否批准预算案进行表决时，我们是不会投信任票的。(热烈的掌声)

如果我们在德国想取得真正的进步，在一定情况下我们当然也会支持资产阶级政党，但是，我们拒绝和它们结成持久的联盟。

饶勒斯以为，德累斯顿决议对于德国来说，也只是暂时有效的，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糟糕的预言家。我根本想象不出，我们会有勿须照决议的基本原则去办的情况。因此，我也没有听到过比那种认为德累斯顿决议充满怀疑和缺乏自信的说法更荒谬的论断。恰恰相反，这一决议正是针对那些想使我们对原来的，经过考验的策略上发生动摇的怀疑分子和动摇分子的。(掌声)我认为，我们从未想到要排斥任何人，这也是我们有信心的证明。

饶勒斯还谈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得到了300万选票，但仍然没有政治权力，那么，在我们取得300万选票的胜利之后，他究竟对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难道要我们把这300万人动员起来，开到皇宫面前去把皇帝推翻？(笑声)在取得这次并不使我感到意外的胜利之后我马上就说过，暂时不会有太大变化的。对于我们来说，仅仅300万是不够的。但是如果让我们有700万、800万，那时我们倒要看看。(热烈的掌声)现在，面对资产阶级的大约800万票的多数，我们能作些什么，我还不知道。

我们获得的选票占全部选票的1/3，但只有1/5的议席，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少数派。可是，这却是一个使我们的敌人害怕的少数派。我们将比目前更努力地进行工作和斗争，以便争取更多

的拥护者。如果其他国家的同志们也象我们这样干，那我们将十分高兴。(掌声)今天我们是一个强大的少数派，拥有巨大的精神力量，这个少数派到处都把自己的人力投入斗争。即使我们投票通过的法律草案和提案被政府扔进了废纸篓，我们也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这样反而会对我们的鼓动工作更有利。如果我们的建议被采纳了，我们也不会受到损害，因为，这样我们就获得了成功。所以，不管我们的敌人干什么，我们总是占上风！（笑声和掌声）

饶勒斯说，就在你们获得300万选票的胜利之后，立刻就出现了废除国会选举权的想法。但是，饶勒斯同志，这除了说明我们的敌人已感到害怕而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一股要求普选权的巨大洪流包围了一个孤岛，洪水上涨，这个岛上的可怜的人们眼看着用数学方法预计出来的洪水淹没孤岛的时分的到来，惊恐万状。但是，如果你们有了200万选票，在法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们的资产阶级会平心静气地观看吗？（饶勒斯派发生骚动并发出笑声）好吧，你们等着瞧吧！

饶勒斯说：“你们之所以没有权力，是因为你们的普选权是别人送的，你们没有革命的历史”。那么，你们在法国的情况又如何呢？1848年工人和市民一起在革命中为共和国进行战斗，并且在争得共和国的同时争得了普选权。但是无产阶级还要求进行重大的社会改革，即要求面包，并且给共和国带来了3个月的饥馑，然后发生了六月战斗，无产阶级被打败了。正是可敬的共和国再次废除了普选权。如果说你们后来又获得了普选。那么，并不是因为你们赢得了它，而是因为发动政变的人，即拿破仑第三恢复了它，以便借助农民的力量来维持他的政权。至于新的共和国，这又不是你们赢得的，而是你们从你们的敌人俾斯麦那里得到的，他在色当战役之后把拿破仑第三带到威廉斯霍厄^①去了。（有人喊：非

^① 威廉斯霍厄是座落在德国卡塞尔市内的一座宫殿的名称。——编者注

常正确！)这对你们来说,不是什么耻辱,也没有什么害处!(全场大笑)要是德国在类似的情况下,在存在着类似的国内矛盾的情况下获得了共和国,那么,这也不会是我们可能遇到的最大的不幸。在德国,当俾斯麦颁布普选权时,他必须考虑到德国所具有的独特无二的革命传统,必须考虑到1848年和1849年的革命成果。没有普选权,就没他的北德意志联邦,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德意志帝国。不管怎样,俾斯麦象拿破仑一样,希望借助于普选权长期获得群众的支持,并以此来控制可能持反对态度的资产阶级。俾斯麦之所以没有得逞,这应归功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掌声)

米勒兰事件已经过去了。但由此而产生的使法国社会民主党深受其害的不幸的争论,还在继续。这种思想混乱,正象饶勒斯1898年在谈到“世界主义者”时所说的一段漂亮话中肯地表明的那样,(有人喊:听着!听着!)这段话是:社会主义不能接受一部分政权,它必须等待,直至获得全部政权。我们可以参与部分改革,而且我们也是的确是这样做的。但是一个把彻底改造社会、用新的所有制原则和生活原则来代替现行原则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党,只能接受全部政权。如果它只有一部分政权,它就一无所有。因为现行社会制度中起支配作用的原则会使这部分影响不起作用……新的社会理想不会实现,反而会声誉扫地,会产生一种使社会主义无法摆脱的危机。(饶勒斯喊道:非常正确!有人喊:听着!听着!)饶勒斯同志,您多么英明地预见到了您的发展前途啊!(饶勒斯:那又怎么样呢?!——会场大笑)您由于继续不断地支持米勒兰而使自已声名狼藉。这是您一生中最大的失策,是您送给国际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礼物。(热烈的赞同声)1900年,米勒兰不欢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召开,但对欧洲最残忍的暴君沙皇却卑躬屈膝。当我们想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献花圈以纪念被害的巴黎公社战士时,欢迎我们的却是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内阁的步兵,骑

兵和炮兵。人们看到，警察坐探多于议员。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破坏对巴黎公社战士进行国际性的纪念活动。这一行为在当时已足以使米勒兰再也无脸见人。（欢呼鼓掌）此后，我们看到，法国议会在进行表决时，饶勒斯派几乎每次都要分裂成两派或三派，也就是说，让全世界看到在德国只有最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党——民族自由党才能向我们表演的那种丑剧。很显然，领导集团中的这种混乱也必然会使党发生混乱，使党丧失威信，士气不振，使群众对领导人失去一切信任。维克多·雨果曾经称资产阶级法国为“世界之光”。法国资产阶级一度为世界资产阶级担负的使命，要是由法国社会民主党为国际社会主义承担起来就好了。遗憾的是，法国社会民主党给我们演出的并非是一场值得摹仿的戏。我们必须作出一切努力来使这场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也要承担责任可悲的表演尽快结束，让法国社会主义在伟大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最终也占有根据它的道义的和物质的力量应得的地位。因此请你们赞成德累斯顿决议案！我并不担心它的后果，相反，我期待着最好的结果。如果法国无产阶级不考虑代表大会的忠告，那么，它就不是我所坚信的那个法国无产阶级。请你们尽可能一致通过德累斯顿决议案吧！（暴风雨般的掌声，甚至在倍倍尔早已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以后，掌声仍持续不断）

译自《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4年柏林版第65—69、39—44页。

（李俊聪译）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1905年9月22日)

现在有人提出政治大罢工的建议。有人对我们说：政治大罢工正在进行，但是没有人提这件事。用假装听不见讨论的办法来对付讨论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这是一种鸵鸟政策。(非常正确！)当到处都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管提得对还是不对，每一个关心这件事的人，特别是一个不愧称为党的领袖的人，必须扪心自问：现在是不是让全党来讨论一下这个建议的时候了。(热烈赞同)当问题涉及广大群众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向他们隐瞒那些需要他们在其中发挥某种作用的措施的。即使群众欣然同意参加某一行动，那他们也要求知道措施的结果和目的。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热烈赞同)此外，通晓事理的群众也不是盲从的。现在科伦工会代表大会相信，由于通过了博麦尔堡的决议案，大罢工的问题可以不予理睬了。人们拒绝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总罢工，并声明说，我们再也不愿讨论这个问题了。结果怎样呢？结果恰恰相反。博麦尔堡的决议案就形式和内容来看是含混不清的，这个决议案通过之后讨论才真正开始。这个决议多么含混不清，从下面这一点就可以得到证明：人们甚至责备冯·埃尔姆，说他误解了决议。我同冯·埃尔姆虽然经常有意见分歧，经常同他进行舌战，但是我仍然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代表，对工会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总罢工决议的意义作出了判断。事实上必须用

放大镜来观察才能发现并没有走到要禁止讨论总罢工的地步。但在阅读决议时，以及在它申诉的理由中当然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关于总罢工的讨论应该停止。然而由于对决议还可以作别的解释，而且我们有充分理由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同工会合作，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客观地来考察这件事情。埃尔姆的文章中还有另一个地方也说出了我的心意。他在那里说，与其通过一个含混不清、矛盾百出的决议，远不如通过一个坚定的决议，以便向当权者毫不含糊地声明：只要你们胆敢碰一碰普选权，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必将充分运用他们的经济力量来阻止这一罪行。（非常正确！）我认为埃尔姆的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文章继续说：工会跟对普选权的利害关系远比政党大得多。（非常正确！）因为一旦选举权受到威胁，集会和结社的权利，以及联合的权利也会随之受到威胁。（非常正确！）埃尔姆继续说道，如果颁布非常法的话，政治领袖们根本不会陷入窘境，因为那时他们会重新采取1878年的策略。（很好！）说得完全正确。那个时候秘密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发展。我们愚弄警察就象猫逗老鼠一样。（笑声）对于无数同志说来，这是一种娱乐，这是一种个人享受。（热烈赞同和笑声）当我们在自己人中间的时候，我们之间最有趣的话题就是交谈这个期间各自的经历——我们当时如何牵着警察的鼻子走，（笑声）我们如何戏弄他们。即使有些同志不得不蹲一蹲监狱——我要说，我们大家几乎都蹲过监狱，也许有一天人们会认为，谁要是一次监狱都没有蹲过，他就不会受人重视。（全场大笑）一个党如果被检察官和刑法所吓倒，不敢维护人权和公民权，那是一个可怜的党。（热烈鼓掌）我们刚刚从俄国发生的事件中看到，成千上万的同志不惜把他们的生命和一切拿来孤注一掷，难道我们为了维护我们的既得权利就没有勇气坐几个月牢，或者忍受更坏的东西？（热烈鼓掌）因此科伦决议只是造成了混乱和模糊，从那以后争论就无休无止地进行下

去了。有趣的是博尔麦堡同志当时所作的报告中提出的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原因。他说，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工会将来不得不服从在另一个地方片面地作出的决议的危险。这“另一个地方”就是党代会。可见他们想使我们倒退，并影响我们的决定。

现在，如果说有一个问题是党和工会同样关切的，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政治大罢工的问题。因为工会会员不仅是工会会员，而且也是国家公民。作为国家公民，他们不仅跟国家的政治状况而且也跟社会的经济状况有最密切的利害关系。然而什么是国家？谁想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我建议他读一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小册子，如果一遍读不懂，那就读它两遍或三遍，那时他就会懂得什么是国家了。国家只是在私有制代替了按共产主义方式组织的家庭和氏族之后才成为必要的。只要这一过程开始了，阶级矛盾就产生了，现在有产者是无产者的敌人，反之亦然。有产阶级成了统治的力量，它压迫群众并建立国家，以便运用国家的权力来保护它的利益、扩大它的利益并反对无产者的利益。随着生产形式的发展并按照产品进行分配的方式，国家也必然发生变化。因此我们看到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古代国家被建立在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基础上的封建国家所代替。在封建国家里产生了城市资产阶级，它的利益又和封建制度处于最尖锐的对立状态。从这个对立中专制君主作为坐收渔利的第三者不断集聚自己的权力，于是产生了专制国家。但是现在出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它既同封建制度，也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并最终建立了符合自己利益的立宪国家，而且是通过震撼整个欧洲的大革命来建立的。在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都已由资产阶级进行了的时候，有人竟指责我们，说我们要革命，这是可笑的。资产阶级虽然对工人的一系列权利作了让步，但是决定性的权利，即选举权，它却始终拒不交给工

人阶级。因此，无产阶级作为最后一个被压迫阶级，也必须按照以往的一切被压迫阶级在历史上都要夺取国家权力，以便改造国家和社会以利于它们的阶级地位的同一逻辑，夺取政权，以便依靠政权的帮助在社会领域里建立那些能保证它的权力坚如磐石的设施。当然，最后国家的丧钟定会敲响，因为在新社会里不再有阶级对立，国家作为统治和支配的权力将失去其存在的根据。但是，在这实现之前——何时才能实现，我不知道，可能要很久很久——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国家权力。同志们，如果象现代工人阶级这样一个物质上、体力上和精神上已经成长起来的强大阶级竟然让人把在它之前的一切被压迫阶级视为自己天然权利的东西夺走，那是违背一切逻辑的，那是天大的笑话。（热烈赞同）我们也必须获得成功，至于如何获得成功，那是由我们的敌人而不是由我们造成的政治形势来决定的。我们只能对敌人说：你们要注意，你们在20世纪中最终还是要从历史上汲取教训的——如果你们以为，你们可以违反全国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一意孤行的话，你们要想一想，那会得到什么下场。

现在有人建议，我们必须开始进行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总罢工，作为最后的手段。无政府主义从根本上说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天然分支。（非常正确！）这从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可以看得最清楚。该书出版于1845年，它不仅包含了无政府主义，而且还包含了无政府社会主义。（笑声！）因此在无政府主义中也到处暴露出自由主义的那些思想观点。这个无政府主义说：我们和国家没有关系；我就是我自己，其他一切在我看来都是空的。国家是一个可怕的怪物，是集中起来的权力，它压迫我，剥夺我的个人自由，我对国家毫不关心；发挥你们无产者的个性吧，你们将会看到，你们会有多大作为。然而问题恰恰在于，在这些数不清的头脑中存在着的个人最宝贵的才能、使人完善的最

丰富最优秀的种子，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得不到发展，如果它们在一个别经过千辛万苦的锤炼而成为大人物的人身上得到了发展的话，那是一种偶然现象。现今的社会是建立在广大群众的个性畸形发展的基础上的，国家的职能恰恰在于设法压制群众的个性。弗里德伯格现在说，这样的国家我们应当听之任之，不用去管它。（弗里德伯格：我没有说过这个话！）等我到柏林跟你算帐的时候，我会向你证明的。在那里他会有最大的言论自由，我希望，他会挨一顿棍子，挨一顿他从来没有挨过的棍子。（全场大笑）因此，据说总罢工是一种包医百病的手段；用它可以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就象推翻国家一样，而不会碰得头破血流。一旦实行总罢工，国家就会飘到空中去——好象它愿意飘到空中去似的！（笑声和赞同）总罢工能阻止战争，解除军队的武装，它能易如反掌地争得八小时工作口；总罢工，总罢工，到处都是总罢工。这一切简直把人弄得晕头晕脑，好象头脑里有一个磨盘在转动！（好极了！）这样搞下去，脑子里会只装着一个工会。（非常正确！）人们并不希望如此，然而这是必然结果。因为这种总罢工万能思想的拥护者会逐渐对政治权力手段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完全失去信仰，这样一来，他们将不愿参加政治组织，这是完全不言自明的事。

我们已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上讨论过总罢工的问题。1889年5月1日在巴黎，特雷桑德-马尔塞勒认为，五一节宣言不会起什么作用，必须用总罢工来支持它；大会应当决定实行总罢工，作为社会革命的开始。但是，他的这个冒险建议在表决时被大多数人拒绝了。其后在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多梅拉·纽文胡斯建议，各国社会主义者应号召人民普遍实行罢工，以此回答可能出现的宣战。这个建议也被否决了。1893年的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委托一个委员会来探讨总罢工或世界大罢工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决议案，但它已不容探讨了：

“鉴于罢工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并为了一定目的而举行才能获得胜利，而这一切事先并无把握；鉴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单是由于这个情况世界大罢工就行不通，而从它行得通的时候起，它已不再需要了；还鉴于即使局限于一国之内的普遍罢工，如果用和平方式进行，那会毫无希望，因为罢工工人首先会遇到饥荒，这会迫使他们投降，而一次暴力罢工会遭到统治阶级的无情镇压。

代表大会宣布，在当前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在个别工业部门内实行总罢工在最好的情况下有可能获得成功；此外，在某些情况下，群众性罢工不仅在经济斗争中而且在政治斗争中都是最有效的武器，然而这个武器的使用是以工人阶级必须有牢固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为前提的。因此，代表大会向各国社会党建议，全力以赴地去促进这种组织，对世界大罢工的问题不予理睬，而径直讨论其他议程。”

这个决议案非常有趣——在我研究了 this 文件之后，我自己感到它的内容使我震惊：——它虽然否定世界大罢工，但却始终认为政治大罢工是可以讨论的，尽管要有条件，这就是各种组织要得到相应的大发展。我发现，决议案的这一部分实际上比阿姆斯特丹决议要清楚一些。（非常正确！）

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也讨论了总罢工的问题。在关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政策——报告人是莫尔肯布尔——的决议中说：“代表大会认为罢工和抵制是完成工会任务的必要手段，但是，它认为国际总罢工的可能性并不存在。首先要做的是，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因为罢工是否能扩展到整个工业部门或者若干国家，这取决于组织的规模。”

1900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把总罢工列入最后一项议程。报告人列金宣称：“我们重申形式上并不十分完善的伦敦决议，为的是

正式表明，我们对总罢工的看法没有改变……只要还没有建立起坚强的组织，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讨论的余地。在资产阶级看来，无组织的群众的总罢工是一种娱乐；资产阶级或许在两三天内就可以用武力把它镇压下去，这样一来，几十年的工作都会遭到破坏。”代表大会最后以27票赞成，7票反对通过了多数委员会的一个决议案，该决议案重申了伦敦决议。

你们看，这个问题完全不是一概被拒绝讨论的。最后，我们来看一看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决议。该决议称：“鉴于：群众性罢工取得胜利的必要前提是，要有坚强的组织和工人阶级自愿遵守的纪律，代表大会认为停止一切工作的绝对总罢工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罢工会使人们（也包括无产阶级在内）无法生存。还鉴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不可能是一次这种突然爆发的努力的结果。诚然，一次席卷个别有关国计民生的企业部门或者大批企业的罢工，会成为实现重大社会改革或者抗击反动派对工人权利的打击的极端手段，这倒是有可能的，因此代表大会提醒工人们注意，不要上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总罢工的当，他们的企图是不让工人们通过工会的、政治的和合作社方面的行为来进行很有意义的、日常的、小规模斗争。代表大会要求工人们通过发展自己的组织来加强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团结和实力地位，因为如果有一天提出了政治性罢工，认为它是必要的和有益的，那末它的胜利将取决于此。”

工会代表罗伯特·施米特在阿姆斯特丹所作的阐述与列金1900年在巴黎的阐述之间有显著的区别。列金说，如果你们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愿意实行总罢工，那么，你们设法搞好相应的组织，那时我们愿意讨论这个问题。相反，罗伯特·施米特在阿姆斯特丹声明说，大多数德国工会认为总罢工没有讨论的余地。当然，施米特在声明中没有提到群众性罢工。布里安在阿姆斯特丹的发言也很有趣，他认为，在德国为了防止选举权遭到侵犯，群众性罢工是必要

的。在阿姆斯特丹以36票赞成，4票反对，决议案终于被通过了。不来梅党代会也讨论了这个问题。许多发言人，如蔡特金、李卜克内西、考茨基、伯恩施坦等都表示赞成在一次党代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在科伦进行了协商。在那里博尔麦堡所持的立场跟施米特一样，他竭力反对那些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而提出类似问题的理论家。罗伯特·施米特在科伦把群众性罢工比喻为套在工人阶级脖子上的绞索，那时会有人向资产阶级喊道：拽吧！（喊声：非常正确！）当群众性罢工这个问题在群众中引起不安，并造成分裂时，博尔麦堡却指出，工人运动需要安静，以便建立组织。

其后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了讨论，特别是海涅同志在9月份的《月刊》上进行了争辩。他在那里对罗兰-霍尔斯特同志论总罢工的著作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在我看来，如果他不是写得这么尖酸刻薄那倒要好些。他同罗兰-霍尔斯特同志论战的方式使我非常耽心（非常正确！）；他讲话时用的那种傲慢口气，跟饶勒斯、博麦尔堡、大卫等人训斥人的口气一样。他写道，这类关于群众性罢工的（抽象）议论顶多不过是毫无价值的瞎扯淡！（是吗？是吗？）我们可以持这样的看法，并在朋友面前谈出来，但是面对着我们曾多次讨论过要养成良好作风这一事实，我真希望海涅在他的社会立场方面为我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我自己倒不是完全站在霍尔斯特同志的立场上，然而我饶有兴趣地读完了她的著作，并愿意向每一个同志推荐它。霍尔斯特同志的这本书是她用心血写成的。她是我所认识的妇女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当荷兰爆发总罢工的时候，尽管她并不理解它，但她还是同她的丈夫一起慷慨解囊，捐献了大笔款项，而且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经济能力，以致由此大大削弱了她的社会地位。她是一个优秀的宣传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表现出献身精神和牺牲勇气。因此，她受到这样的对待，使我倍加难过。（非常正确！）由此可见，海涅是最坚决反对群众

性罢工的。我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尖锐地批评，这样尖锐地反对一种思想。因为海涅的策略的要旨是，凭借他的法律学家的知识，逐条逐条地引用刑法，直至引用叛国的条文，直至宣布全国戒严的条文，以致每一个不十分坚定的同志一想到在德国参加群众性罢工会招致的巨大危险，就会被吓得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他还继续指出，法庭，即军事法庭，会作出多么难以置信的判决，因为，照他看来，鉴于敌人会进行挑衅，这样强大的运动用和平的方式进行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我同党内同志谈到海涅的文章的时候，这个同志说，海涅向检察官提供了发表演说的绝妙材料，虽然这并非出自他的本愿。我回答说，没有一个检察官会这样笨；的确，最笨的人不会成为检察官。（海涅：他们至少不会这样笨！——施塔特哈根：不过他们还是最笨的人。笑声。）我确信，施塔特哈根同志，您比所有的检察官加在一起还要聪明得多。（全场大笑）不，即使最笨的检察官也不会这样笨；如果他用海涅向我们描绘的那些罪状来控告我们的话，他自己会在阶级法庭面前碰钉子的。

但是，海涅的推论的全部基础是错误的。我断然反对海涅所预见的群众性罢工必然会引起后果。他在这里假定的群众性罢工可能遇到的问题，基本上也适用于任何一次大罢工。（非常正确！）如果我们在煤矿工人大罢工爆发的时候征求海涅的意见，那末他必定会出于同样的考虑建议不要罢工。而实际上煤矿工人的罢工没有给敌人造成任何可乘之机。煤矿工人们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罢工，比一切别的国家曾经举行过的所谓群众性罢工规模都要大，然而局势却令人惊讶地平静。当时我在参加了一个国际代表大会后正从布鲁塞尔回来，鲁尔区肃穆的宁静气氛使我感到惊讶。没有一个烟囱在冒烟，而平常由于烟雾太大，人们往往不得不把车窗关上。农村是一遍绿色的平原，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村庄非常安静，好象根本没有有人居住。如果说在一个政治上和文化上比其他阶层

的工人落后得多的工人阶层(就其中部分而言)中尚且能够做到这样,那末,人们会问,在财力大得多,组织发达得多,纪律严明得多的情况下,我们什么事情不能办,而同时又不致引起海涅所预见到的那些后果呢?(热烈赞同)

最后,还有一点,我们不可以计较它的得失。席勒说过:“不肯为了本民族的荣誉而愉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的民族是卑贱的民族。”的确,让人看成是懦夫,不敢起来反抗自己的压迫者的工人阶级也是一个卑贱的、可怜的阶级。(暴风雨般的掌声)看看俄国,看看6月的战斗,看看公社吧!在烈士们精神的鼓舞下,你们为了捍卫自己的最高人权,难道不能忍受几个星期的饥饿吗?(暴风雨般的掌声)如果你们不相信德国工人会那样做,那你们就是很不了解德国工人!(再次鼓掌)1880年当我建议把“合法的”几个字从我们的纲领中删掉的时候,海涅说了些什么呢?当时没有经过辩论就一致决定把它删掉。(海涅:做得对!)因此后来我们第二次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做得完全正确。(非常好!笑声。)我们不进行挑衅,我们只是保卫自己。政治大罢工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实践问题,即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和必须运用什么斗争手段的问题。当然,海涅肯定没有当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的开路先锋的意图。(海涅:没有!)但是,影响是必然的,弗里德伯格和他的拥护者们正从这个举动中吸取材料并叫喊道:你们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堕落成什么样子了。你们在大量制造恐惧心理!(弗里德伯格:我们还有比这更好的材料!)海涅只字不提,如果我们遭到攻击,我们究竟应当怎样保护自己。他只是说,这个办法不行,但是他却没有提出别的办法。我们是否应当一动不动地听人摆布呢?(热烈鼓掌)

有人说,群众性罢工是动用不得的武器。但是1891年比利时人为争取普选权而举行的群众性罢工却获得了胜利,它所取得的

胜利,相对说来,比煤矿工人罢工所取得的胜利还大(后者只是争得了一个拙劣的矿山法附则),而且也是一次政治罢工。我们的比利时同志在议会里赢得了140席中的33席。1903年他们再次举行群众性罢工,争取彻底实现普选权。的确这次他们没有取得胜利。在这里我不想引起一场关于比利时人的策略的争论,不过对此我也有一些想法。1902年奥地利煤矿工人在莫拉维亚和奥属西里西亚举行群众性罢工。他们获得了胜利,争得了法定的九小时工作日,而我们还没有争到。其后在巴塞罗纳举行了一次所谓同情罢工,这是纯粹无政府主义性质的罢工。是的,在我们德国无论是工会还是党都没有想到要举行所谓同情罢工。这种为了实现某一工人阶层的要求,某个大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都要参加的罢工,必然要遭到摧毁。此外在瑞典也举行过一次示威性罢工,——我们在德国也不会举行这种罢工——尽管这次罢工并非毫无成果。瑞典人还是迫使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责成政府在两年内制定一个新的选举法草案。罢工所要反对的旧的选举法因此作废了。再看一看意大利工人由于自己的同志遭到枪杀而举行的群众性罢工。这是群众中自发地爆发的一次大罢工,将近20万工人停止工作,其中大部分甚至是无组织的工人,他们迫使政府发表声明:今后竭力避免发生这类枪杀工人的事件。当然这并未妨碍在今年再一次发生了类似的屠杀事件。但是这次罢工使我们在不久后接着举行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从16.5万票增加到31.6万票。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次罢工在群众中也没有留下什么不良影响,尽管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对这次群众性罢工恨之入骨,并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最后再看看意大利铁路工人今年春季举行的罢工。我自己在北意大利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这次罢工失败了,失败的责任主要被归咎于我们的意大利党团,我不知道有什么权利这样做。——但是确实没有人想到要举行群众性罢工。大约在7年前

瑞士东北铁路的职工在一夜之间停止全部工作12小时，在某个车站当上级官员向下一个车站询问“12次列车停在哪里？”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就停在这里！”（笑声）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他们罢工了三天工，管理局连连求饶，他们的愿望实现了，当然是在公众的支持下实现的。最后，我还想起了俄国的群众性罢工。在俄国我们的党内同志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权力手段，但在那里他们却在同一个地方接二连三地举行大罢工。他们那种毅力只有引起人们的极大钦佩。不过，俄国的情况极端反常，这些罢工不能作为我们的榜样。——自1893年以来，这种政治罢工，这种群众性罢工只是首先从比利时开始的，这绝不是偶然的。其后直至1902年，这个问题处于静止状态，但从1902年至1905年发生了多次这种群众性罢工。因此如果有人说，所有的群众性罢工都失败了，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要问你们工会的同志：当你们还没有任何大规模的组织的时候，你们的罢工有多少次失败了呢？数也数不清，而且今天也还有很多次遭到了失败。在这里有一部分大罢工是由无组织的工人发动的，而且完全缺乏资金。是的，同志们，我不会向你们推荐这种罢工，任何人也不会向你们推荐这种罢工，那完全是无谓之举。如果说我们德国人背后受人称赞说，我们有哲学的头脑，我们喜欢——正象海涅所说的那样——搞理论，不错，是这样，然而我们也有组织起来的美德，这是任何别的民族所不能期及的。（非常正确！）我们的看法是：我们在参加一场如此重大的斗争之前，首先必须认真组织起来，进行宣传，阐明政治、经济情况，使群众觉悟，并敢于起来反抗，鼓舞他们，一旦时机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对他们说：你们必须献出一切，因为这是事关你们作为人、作为家长、作为公民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热烈鼓掌）我们不想促使群众盲目地参加罢工；不言而喻，我们不会让无组织的群众铤而走险。海涅问：你们要控制他们吗？这只能证明你们（转向海涅）丝

毫不了解工人群众在这种事情上的思想感情和本能。(非常正确) 我不想责怪你们,这是你们的生活地位造成的。我要说,我们的不足之处,应该补上。(海涅:非常正确!)我的决议案的目的就在这里。已经有的东西还不够,然而不够的东西可以创造。如果开完这次党代会后你们大家都决心按照我的决议案的精神行动起来,如果全国各地的同志们都决心按照决议案的精神行动起来,如果党的刊物将在比迄今为止大得多的规模上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不仅是党的刊物,而且还有工会的刊物都向群众进行教育,向他们指出:他们必须从事政治活动;这对于他们作为公民、作为工会会员来说有什么重大意义;譬如说,选举权有多大的重要性;做到了这些,群众性罢工——一旦必须举行的话——的条件就算准备好了。(非常正确!)但是如果有人——例如,罗伯特·施米特冷冰冰地说,工会大概再也不能摆脱无政府社会主义了,如果我们就这样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话,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当然只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工会将成为仅仅是工会而已。(非常正确!)例如,布林格曼同志在提到考茨基在《新时代》上的言论时就是这样说的。当我读到它时,我当然也会对自己说:这是一种危险的言论,它可能被人歪曲、滥用。布林格曼在他的小册子《工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和德国的阶级斗争》中援引考茨基的话说:“无产阶级在德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不可能期望从帝国政府那里获得什么东西。帝国国会已没有任何意义,任何生命。”并由此得出以下结论:“够了,德国的议会制度简直腐化了。我们党在1903年获得的300万张选票不仅没有使议会制度有丝毫的改变,反而加速了它的腐化过程。因此,我也认为工会第五届代表大会不再过问社会政治事务是正确的。事情很明显: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我们期望通过立法来改善我们的经济状况是办不到的。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只能依靠我们的工会。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组织和通过艰苦的经济斗争

才能改善我们的经济状况。”（赞同声和是吗？是吗？）这本小册子的第12页上写道：“整个政治、经济形式向工人阶级指出了工会运动的道路。这是在现有条件下改善工人状况的唯一手段。当前的阶级斗争正在经济领域内展开；工会是这场阶级斗争的承担者。”然而他既把政治活动看得一钱不值，因此，他在他的演说的末尾所说的那句漂亮话也就毫无用处：但是如果问题一旦涉及捍卫政治权利，“那么，完全可以相信，如果需要勇敢地进行一场政治斗争的话，这样的工人那时也会站稳立场的。如果形势需要，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会象骑士那样投入战斗，会象人那样去争取胜利，甚至会象英雄那样死去。”当然说得很漂亮，但是如果一个在自己的工会里很有权威的人用上述方式说：我们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不可能再在政治上取得什么成就，那么请你们想一想吧，——据说这不是布林格曼的意图——但是每个工会工作者都会对自己说：是的，我为什么今后还要把我的钱捐献给政党呢？（非常对！）较年轻的工会会员会对自己说：我根本不先参加党组织！由于我们工会领导人的纯粹片面的活动，这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必然会愈来愈严重地蔓延开去，而他们也完全违背自己愿望地走向无政府社会主义。此外我还要提醒你们注意，当科伦代表大会正在讨论群众性罢工问题的时候，在我们同社会民主联盟和工会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在汉堡举行的一次联席会议（那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商量，对汉堡议会削弱选举权的计划可能采取什么对策）上，某些党内老同志和工会工作者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有一部分较年轻的工会工作者看来多么坏，他们嘲笑党，（是吗？是吗？）嘲笑社会主义，（是吗？是吗？）嘲笑未来的国家。这些人甚至否认我们在进行阶级斗争。（是吗？是吗？吵嚷声）亲爱的同志们，我所以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而说这个话的人是工会委员会的正直的老同志。当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简直惊得目

瞪口呆。后来《回声报》的编辑们和其他在场的党员同志也证实了这个话。现在在布林格曼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甚至得到列金的赞同之后，我不得不说：你们注意吧，你们想一想，你们在做什么，你们走上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在它的尽头，你们将会遭到失败，尽管你们并不情愿这样！（非常正确！）

虽然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说，总罢工必须在一夜之间突然爆发，不言而喻，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谈论这种罢工。象我们这样大的民主党派不能搞密谋政策。（热烈赞同）它必须光明正大地奋斗。（再次表示赞同）如果我们不在道义上、精神上对群众施加强大的影响，不唤起他们的热情和信任，那么一旦需要时我们如何能掌握他们，如何能对他们说：现在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现在投入阶级斗争中去吧，如果你们都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我们必胜！（热烈叫好！）

我还要提醒你们注意的另一点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为了实现乌托邦理想，也不是为了实现未来国家的要求。我们不相信，依靠总罢工能彻底推翻市民社会，相反，我们奋斗的目标完全是为了现实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工人阶级的存在所必需的，如果它还想在政治上生存下去并进行呼吸的话。如果取消普选权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那末可以断定，不管资产阶级圈子里的人多么腐化，他们当中也必然会有相当多的人说，这样做不行，工人们从未滥用过的一项权利，不能予以剥夺。毫无疑问，我们在这些人当中也能赢得一定的同情。此外，如果我是在捍卫一项享受了几十年的权利，而不是想争取一项新的权利，那我的力量就要强大一些。（非常正确！）如果我能说：你们只有血腥的暴力，你们想剥夺我们的权利，你们是强权人物，你们是暴君，——如果我能说那些必定会使群众愤慨和激昂的话，那么我们必定能够赢得浩浩荡荡的群众包括基督教工人在内的拥护。（热烈赞同）你们工会工作者反对基督

教组织，你们作得完全对，但是1899年当帝国国会讨论刑法法案的时候，当基督教工人看到，由于现有的一点点结社权已遭践踏，他们也感到上了当的时候，他们也跟我们一样采取了反对上述法案的立场，于是中央党被迫按照巴赫姆所说的那种方式作出决定。但是巴赫姆说了什么呢？他没有说中央党原则上是自由结社权的最坚决的代表，不，他说——而这是他的主要根据——，天主教工人对侵犯结社权的行为感到愤慨；如果这种行为发生，我们就会失去全部天主教工人，他们会离开我们，这是我们无法忍受也是不能忍受的。（是吗？是吗？）让他们试试看把我们的普选权取消吧，或者再试图废除结社权吧！正象煤矿工人罢工时天主教工人曾站在自由工会一边勇敢地进行战斗一样，如果他们作为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话，他们也会表现出大丈夫气概的。

.....

当一方面海涅承认自己是群众性罢工的反对者的时候，另一方面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却超越了我们现在所代表的观点，并认为我们的道路是错误的。弗里德伯格在柏林一再不厌其详地谈论这个问题。他的第一次演说已刊印成册，并送给了我一本。书上的题词，对我极尽恭维之能事。因此，不妨可以说，书中所载的是弗里德伯格的观点。该书第3页上写道：“今天通过议会制度从阶级国家那里争取来的经济利益，可以通过无产阶级在它的工会运动中的独立活动、通过扩大它的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而得到充分的补偿。议会制度提供的理想的东西，即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阶级觉悟的提高，通过总罢工的思想、通过今天的议会制度所规定的权力的运用，可以更有力、更迅速、更有效得多地得到实现，以便在口头上或书面上对人民群众进行直接教育和影响。我们不进行任何政治斗争，因此也不需要任何政治斗争形式。我们的斗争是经济斗争和心理斗争。因此，我们的武器也必然是带有经济性质

和心理学性质的武器。”（是吗？是吗？）他在第15页上对党及其活动进行了批评，他说：“然而人们完全忘记了，其实国家什么也不是，它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词。只有当压迫还存在的时候，国家才有意义，一旦无产阶级的世界制度建立起来，再也没有压迫的时候，国家将不复存在。国家和国家权力的概念必然以进一步的统治和压迫为前提。因此，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夺取国家权力，而是要建立一种将会消除剥削和奴役的无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和内部生活”。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可以一字不易地提出同样的要求。无产阶级的内部生活将得到提高，我们将获得宗教自由，但这样一来天知道我们会得到什么。（非常正确！）弗里德伯格继续指出，党不能阻止普选权不受侵犯，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今天正在策划的反对帝国国会选举法的阴谋得逞的话，那么德国无产阶级是完全无力反抗的。”他们就是这样长无产阶级的威风的。（说得好！笑声）“我们不会为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权流一滴眼泪。”（激昂的“是吗？”“是吗？”声）“相反，我们将再次对我们敌人的愚蠢和缺乏策略表示钦佩，那时他们终究会使德国工人阶级睁开眼睛，看清德国无产阶级应走的道路。”第19页上写道：“议会里讨论的事情百分之九十九跟我们毫不相干，当阶级统治被无产阶级推翻的时候，它们将会消失。”这个观点和他第10页上哀叹阶级的司法时所流露出的观点完全相反：是的，阶级的司法是存在的，但是要谴责它，我们只有在帝国国会里才能办到，在群众大会上这样做，国家政权就会把我们抓起来。（非常正确！）

一旦失去普选权，结社权、集会权也会跟着丧失，于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权利也都会丧失。（非常正确！）因为我们的敌人如果剥夺了我们的普选权，还会让我们享受其余的政治权利那简直是傻瓜。（非常正确！）不言而喻，那样一来，我们会在我国的联盟里、在集会上、在报刊上继续不断地进行斗争。我们将唤醒群众，

从而使我们的敌人惶惶不安。因此他们如果剥夺了我们的主要权利，随后也必然会取消其他的权利。（非常正确！）这些权利是互相关联着的。如果统治阶级剥夺了工人阶级一切的权利，它会容许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目的的总罢工吗？这种思想、这种混乱、这种矛盾如何能在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我所认识的几乎是最正直最杰出的人的头脑中产生呢？我整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弗里德伯格在仙宫说——要相信的话，就必须读他的书——，有一个第五等级。（喊声：他没有说这个话！）那当然是非常愚蠢的，我也不会相信。他说，我们必须问一问自己：党是否仍站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他们的教条主义的学说使整个运动堕落了。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向我自己问道：弗里德伯格是否把党的文献忘得一干二净了？难道他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吗？在《宣言》的开头就有一句精辟的名言：“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现，它意味着整个世界观的彻底改变。在《共产党宣言》中另外一个地方说：“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宣言》论证了阶级国家是如何产生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接着又论证了资产阶级如何越来越多地产生着现代无产阶级，并迫使它组织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但是，“无产者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

总之，只要读一读《共产党宣言》，就会知道，所谓的马克思的教条主义正是，而且必须是我们的世界观的活生生的基础。我们的纲领鲜明地反映出我们党是阶级的政党的性质。演讲人背离了爱尔福特纲领中有关的地方，那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必然是一场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如果没有政治权利，就

不能进行经济斗争，就不能发展它的经济组织。工人阶级如果不占据政权，就不能促使生产资料归全体占有。把工人阶级的这一斗争变成自觉的和统一的斗争，向工人阶级指出它的天然目标——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鉴于我们的大师们的基本著作中的这些观点，鉴于我们的纲领，鉴于一系列文章、著作和报刊文章，怎么能向群众说：党离开了阶级斗争的基础——我简直无法理解。弗里德伯格援引了李卜克内西的话，但是，他应该知道，李卜克内西在他最近出版的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的著作中直接了当地声明，书中阐述的关于议会制度的观点只适用于北德意志联邦。自从德意志帝国成立以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这样做对不对当然可以争论，但是，在李卜克内西用这种明确的方式更正了他的旧观点，而他的著作只是当作早期文献来出版之后，还有人凭借我们的老同志的权威在工人面前说：你瞧，连李卜克内西都跟我的观点一致。这样做是不老实的，不这样看是极不公正的！（热烈鼓掌）这种斗争方法简直令人愤慨然而更使我难以理解的是，在德意志帝国的首都，在知识分子的城市，3000工人，其中有不少老党员，竟欣然接受了这样一个矛盾百出的大杂烩。（非常正确！）

对弗里德伯格还有一点意见。帝国国会讨论的问题百分之九十九都和无产阶级无关！因而集会和结社自由、工会、立法、阶级的司法、教育问题、刑事诉讼、监狱制度、直接税和间接税问题、陆海军问题、殖民政策、关税和贸易政策、对士兵的虐待、世界政策、保护工人立法、工人保险、营业自由、迁徙自由、合作自由、公共卫生、济贫立法、孤儿救济立法、市镇立法、住宅立法——面对所有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弗里德伯格会对我们说：呸！帝国国会讨论的问题百分之九十九都跟无产阶级的利益毫无关系！

是的，当有人说出这样的话，而且居然有人鼓掌赞成的时候，我们当然要考察各种原因，并问问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要负很大

一部分责任。(非常正确!)最近几年来我们从理论上探讨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探讨的结果不是弄清楚了若干问题,而是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混乱。(热烈赞同)在这种土壤上种子发育了,我们今天看见它正在生长。在党内基本观点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混乱不堪的局面。如果问题只是涉及那些刚刚熟悉党内情况的同志,那我倒是不会惊讶的。然而却有一部分老同志,他们在培养这种精神,因而在助长对我们党的基本观点有害的腐化习气。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从现在起要大力加强对同志的训练和政治教育,这是我们的任务。(鼓掌)昨天有人责备我对工会的中立所持的立场。我希望理查德·费舍在他昨天的结论中已经引用了我的小册中有关的地方。(喊声:引用了!)我在政治问题上从未替工会的中立辩护过,我只是说过,工会不应当把自己看作是政党的尾巴,因为它必须把所有的工人团结在它周围,而这种团结不应当依赖于政治信条。工会报纸和工会发言人都义务反复不断地向工会会员讲:你们是工人,作为工人,你们是国家公民,作为国家公民,你们要关心国家和立法的一切问题。如果这样对工人进行教育,我就愿意办一份工会报纸,整年都贯彻这样的方针:社会民主党这个字眼根本见不到,然而读者终究会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热烈赞同和笑声)这就是如何进行宣传鼓动的窍门和方式。如果与此同时党的报刊也比过去更加重视组织问题,如果各地都按照我的决议案的精神抓组织工作,如果各地的宣传都着重于基本政治教育,如果对社会主义基本著作的学习受到最大的重视,并改进学习方法,那么,在一年之内使我们联盟的会员增加一倍,工会会员至少增加25%,我们机关报的读者增加50—100%,这是不难办到的事情。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获得大量资金来对党员进行教育,并准备迎接将要到来的严重斗争,这有多么雄伟壮丽当然是无法想象的。本着这个精神我请你们赞成我的决议案,我们要本着这个精神进行工作和

斗争,直至获得完全彻底的胜利。(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1905年9月17—23日)记录》,1905年柏林版第299—313页。

(李俊聪译)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上 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的讲话*

(1906年9月26日)

去年当我们在耶拿^①分手的时候,大概没有哪一个人想到,今年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谈论政治性群众罢工的问题。你们大家都很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挑起这场争论的方式当然应该遭到最坚决的谴责。你们知道,根据总委员会和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2月份举行的一次毫无拘束的秘密会谈(关于这次会谈的情况,总委员会在不久之后召开的中央领导机关代表会议上作了报告),整理了一个记录,这个记录——正如我将要证明的那样——对谈判经过的叙述当然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由于泄漏了所谓的“一致”,随后在柏林掀起了一场大辩论。我发现,“一致”的说法在这种场合纯粹是一种嘲弄。(有人喊:“完全正确!”)如果想认真做好工作,如果有关的编辑人员自认为是党内同志,那么他们就有责任和义务,先问一问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记录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秘密会谈中讨论的问题,因为从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谈判中所持的观点没有得到反映。(有人喊:“完全正确!”)如果他们对回答不满意,那么他们可以自行其是。不过即使

* 这篇讲话发表于《1906年9月23日至2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6年柏林版第227—241页。——编者注

① 在1905年9月17至23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上也讨论过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编者注

那样，我也要把公布记录的作法看作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完全正确！）。有一句老话，叫作想干坏事却做了好事，这句话也许在这里是适用的。

我对一股思潮不得不感到极大的惊讶！我指的是，当那个有倾向性的、走了样的记录公布之后，党的一部分报刊竟立即不加思索地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真的和正确的，并对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对我本人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人们轻率地以为，记录中所说的东西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我毫不犹豫地声明：如果当时由于取得“一致”予以公布的、在一定程度上在总委员会的记录中得到证实的东西是真实的，那么那些允许这样做的人就不会受到谴责，而且是相当尖锐的谴责。因为要是那样，我们的行为，特别是我的行为，就是不折不扣的叛党行为。在不久前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曾通过一项由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规定了党的基本政治路线的决议。我不能想像，现在刚过了几个月，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竟会违反这一路线，同一个团体进行谈判，而这个谈判的目的据说是使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变得一文不值。人们本来可以指望，党的有关报刊至少会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整整一辈子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人能不能干出这种变节和卑鄙下贱的行为来。（热烈的赞同声）即使我承认，看得出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人们在观察掌握领导权力的党的首脑机关的行动，并且我认为不信任是一种民主的德行，但是，这一次党内流露出来的不信任情绪达到了如此强烈的程度，却是我从未见过的。

不言而喻，由于所谓的“一致”被公之于众，我们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陷入一种难堪的处境。谈判是在工会中央领导机关的一次会议上进行的。他们宣布，谈判是保密的，记录只发给有限几个人，大家都承担了对记录的内容严格保密的义务。现在由于一家自封的党报的泄密，谈判的部分内容却突然暴露了，而且该报还是

以歪曲的形式透露的。主要受到谴责的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曾经宣布谈判是秘密的这一事实，不得不保持沉默。我相信，自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以来，党的领导还从未陷入过我们当时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所陷入的那种难堪的处境。（有人喊：“完全正确！”）我们当时只得忍受一切攻击，只好限于对某些问题作一些澄清，但对谈判的内容却不能涉及。在这种情况下，不言而喻，既然泄密事件已经发生，那么无论是党员还是工会会员都有一个迫切的要求，即希望准确地弄清楚，究竟谈了些什么内容，以便彻底了解事情的真相，从而决定自己应采取什么立场。因此我们自然要去找总委员会，希望它——既然关于党和工会的谈判成了问题——把记录公开，好使全党和公众能够了解谈判的情况。总委员会拒绝了这一要求，它认为自己应受代表会议决议的约束，对此我们表示不能同意，因为报刊上的批评越来越尖锐，同志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收到的大量信件中，同志们以最坚决的口吻表示了他们的愤慨，并要求，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无论如何必须坚持公布记录的主张。于是我们向总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它普遍征求代表会议参加者的意见，向他们讲清情况，并努力说服他们允许公布记录。表决的结果是，参加工会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大多数都反对公布记录。这样一来，我们便被置于一种比表决前还要糟糕的窘境。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看待人家都知道的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意见是，更高的利益正受到威胁，继续隐瞒事情的真相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党和工会内不满和埋怨的情绪必然与日俱增，各式各样的怀疑必然层出不穷。（热烈的赞同声）我们理解，总委员会对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公布记录的决定感到非常恼火。但是我们还是要请总委员会的委员们设身处地为我们想一想，并问一问自己，如果他们站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立场上，他们会怎么办？碰到这种情况，总委员会没有别的办

法，只能像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那样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很久了，我们已经考虑了各种可能的情况，但是公布记录的理由这样充分，我们相信，可以不顾总委员会的反对予以公布，而我认为，这样做不会带来任何坏处。（有人喊：“完全正确！”）至少公布带来的坏处比不公布带来的坏处要小得多。总委员会在一项声明中也说，公布记录会证明，在代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总委员会的代表没有什么需要向党员隐瞒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受到各方的压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步骤，就尤其应该受到合情合理的考虑，而公布记录一事就应该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否则进行一次认真的对话就会是不可能的。（人们热烈呼喊：“完全正确！”）我已经说过，今年2月份总委员会和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会谈是无拘无束的，它无拘无束到这样的程度，就是当我们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这个邀请的决定时，我们还根本没有就我们在未来的会晤中想向总委员会说些什么这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向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个委员表示，他们在这次秘密会谈中有什么问题、观点和意见尽可随便谈。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按照某种方针作出有约束力的决议。这一点你们看一看总委员会的记录也可以得到证实，在这份记录的第6页上有这样的话：列金一再声明说，星期五就总委员会对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采取的立场所进行的会谈完全是无拘无束的——双方约定，既不按照这一方的方针，也不按照那一方的方针敦促作出某种决议。我们作出了进行这次谈判的决定，因为对我们来说同时也有必要就上西里西亚党的情况和工会的情况同总委员会进行磋商。

这是举行会谈的第一个理由。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谈判整整进行了一天。随后举行了第二次谈判。在这次谈判中我们毫无拘束地畅谈了形势。我方声明，照我们看来，在目前形势下无论如何不能考虑总罢工的问题，因为总罢工必然会以党的巨大失败而告终。

(有人说：“是吗？”“是吗？”)从记录的第7页和第8页(那里载有西尔贝施密特同志的评述)可以看出，我在自己的讲话中所阐明的思想要点。我在那次秘密会谈中首先发言。据我的估计，这次发言肯定有一个钟头。据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志们的回忆说，这次发言持续的时间还要长一点。但无论如何，在记录中只用一个印刷页是决不可能毫无遗漏地记下我的讲话内容的。(有人喊：“完全正确”)

因此，单从西尔贝施密特的简短评述中就可以看出，我的讲话内容哪怕只是近似地反映出来也是不可能的。结果在记录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各种各样的思路乱七八糟地掺和在一起，或者被拼凑在一起，以致必然把我的讲话弄得面目全非。在代表会议上我曾解释了我对群众罢工是如何鼓动起来的看法。我在讲话中详细地说明了对整个内部形势，特别是对普鲁士王国内部形势进行批评的理由。我强调指出，毫无疑问，在德国，尤其是在普鲁士举行总罢工同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举行总罢工不一样。我们在这里面对的势力和组织，一方面是普鲁士王朝和容克地主阶级，另一方面是有严密组织的工业巨头，对于任何群众罢工的尝试，这些人都会采取野蛮的手段进行镇压。如果我们想进行群众罢工，我们就必须更好地组织起来，我们的组织必须比现在或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出现的情况要好得多才行。但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考虑举行这样的群众罢工。毫无疑问，可以预料，如果举行群众罢工，它定会误入歧途，挑起罢工的那帮家伙会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以便采取非常措施。帝国国会和其他立法团体的权威人士对这种非常法将给予必要的考虑，这是肯定可以预料到的。(有人喊：“完全正确！”)

我们曾对自己说，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这类步骤，那将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必须反对某些党员在报刊上发表的

下述言论：我们应甘冒风险进行群众罢工，即使我们预见到这样做肯定会遭到失败也罢。（有人喊：“太对了！”）当然在各国人民的生活中自有“不惜任何代价”的时刻，即使预见到斗争肯定会失败也要把它进行到底的时刻。但是我非常怀疑，在那个时刻普鲁士的形势是否已经到了非进行殊死斗争不可的地步。如果有一位将军明知参加某个战役会使他全军覆没，但他仍然参加了，那么人们必定会认为这位将军是一个疯子，他会立即被送交军事法庭，并在24小时内被枪决。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面临的局势完全跟这一样。这样的行动完全是一种轻举妄动，必然会以可怕的失败而告终。我相信，正是现在激烈批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那些人，在我们一旦遭到失败后将是最先向我们发难的人。（热烈的赞同声）一部分党的报刊在这件事情上对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必然使我作出这个判断。

不难理解，当我阐述这些观点的时候，工会领导人不仅看到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加强，而且还怀着满意的心情更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好像我根本反对任何群众罢工，反对任何有关群众罢工的宣传。

我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工会领导人的看法所作的这个说明是正确的，这一点从下述事实中可以看出，即同样的观点在代表会议上直接暴露出来了，以致我不得不斩钉截铁地声明：我的观点无论过去或现在都和在耶拿的观点完全一致。我在耶拿发表的演说绝不收回一个字。有人认为耶拿决议要求我们一有机会就立即开始群众罢工。这是对耶拿决议的误解。我愿意证明，那些说耶拿的豪言壮语是放空炮的人，客气点说，忘记了在耶拿进行的谈判，当然我本来曾经希望他们表现出负责的精神，在作出这种判断之前最好先把耶拿大会的记录找来看一看，查一查倍倍尔和其他的人在那里说了些什么。（有人喊：“完全正确！”）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那

么他们在我的整个演说中肯定找不到一句可以作那样解释的话。我逐字逐句地看了两遍在耶拿就群众罢工问题进行谈判的记录，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在耶拿采取的立场多么正确啊！西尔贝施密特本人在工会领导机关谈判记录第47页上对盖耶尔提出的一条意见中说，我甚至早在代表会议上就反对总委员会委员们的容易引起误解的言论。在这一页记录上有这样一句话：当然倍倍尔声明说，即使是今天，他仍然一字不易地坚持他在耶拿说过的话。但是这个记录同第47页上西尔贝施密特所说的话大相径庭。这个矛盾如何解释？我认为，正像已经说过的那样，它是由上面提到的心理因素造成的。

只要看一看迄今为止就群众罢工问题进行的辩论就会明白，没有工会领导人和工会会员的赞同，群众罢工是不可想像的。参加政治组织的同志只有40万人，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每一个有理性的人相信，这些人要是举行罢工，即使还可以指望有些拥护者会参加进来，也必然会毫无结果。如果最广大的群众没有举行罢工的共同愿望，那么群众罢工是根本不可想像的。（热烈的赞同声）这种情况我们已经看见过了。今年8月中旬，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以2/3的多数决定举行群众罢工。然而这次群众罢工失败了，因为大多数工人和工人组织声明说，他们不参加罢工。这件事对那些认为任何时候都可以举行群众罢工的人来说，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有人喊：“完全正确！”）

而且还必须看到，俄国的形势同德国的形势根本不同。俄国是一个经济上政治上非常落后的国家。俄国实行的是专制统治，居民没有丝毫政治权利。他们占有的东西是从沙皇那里夺来的，但是在法律上尚未得到批准。俄国的斗争是一场革命斗争，这场斗争的目标是首先要争得现代国家生活的最起码的基本条件。（有人喊：“完全正确！”）

当然进行这场斗争的工人同时也力图改善他们的状况。不言而喻，这场斗争会采取迄今为止我们在任何革命中都没有见过的形式。工人阶级自然会拿起群众罢工的武器，因为这是工人阶级在俄国可以使用的唯一武器。（有人喊：“完全正确！”）在每一场革命斗争中，经常都会运用符合国家经济结构的新的斗争方法。在俄国，群众罢工在革命中自然必须起巨大的作用。尽管如此，如果群众在已经出现的形势下没有举行群众罢工的愿望，那么举行群众罢工还是要遭到失败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已有体会。在俄国进行斗争是为了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然而人们在俄国还必须努力争取的那些先决条件，在我国早在许多年前就已争得了。（有人喊：“完全正确！”）因此德国的情况和俄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不管我们对现状有多么不满，但没有人会主张，我们在斗争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使用和我们的俄国同志相同的方法。（有人喊：“完全正确！”）在德意志帝国我们有普选权。同时我还想补充一句：如果说毛伦布勒歇尔同志以奥地利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为例指责我们的策略，那么一个想站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人，一个自称已对历史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人应该知道，奥地利人所争取的选举权，40年前几乎在我国就已经实现了。目前奥地利工人正在为国会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而斗争，也就是说，正在为成立像我国的帝国国会那样的机构而斗争。奥地利工人根本没有想到要用群众罢工的手段来进行争取邦议会普选权的斗争。他们对自己说：在基础还没有打好以前，我们不能从顶端开始。因此，用奥地利来比喻根本不恰当。人们有理由期望，一个自诩为政治家的人，一个希望成为历史学家的人，能认清这一事实，而不再作这样的比喻。（有人喊：“完全正确！”）

比利时、荷兰、瑞典和意大利的工人早就进行过群众罢工，比俄国早得多。他们的群众罢工，就其实质和目的而言，同俄国的

群众罢工迥然不同。在俄国进行的是一场争取最起码的国家生存条件的革命大斗争，而另一方面则只是一场争取某些特定的目标和达到某些有限目的的斗争。1893年在比利时进行了一场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群众罢工毫无疑问获得了成功，因为等级选举已被废除，普选权，尽管是复选制的普选权已经实行。比利时同志从前在议会里一名代表也没有，现在和过去相比，他们在议会里已有80多名代表。相反，本世纪初在比利时举行的反对复选制的第二次群众罢工却遭到了失败。这也许是因为，第一次群众罢工时，比利时资产阶级遭到了突然袭击，被吓懵了，而第二次时却不是这样。（热烈的赞同声）荷兰、瑞典和意大利的群众罢工情况和这完全一样。例如，在意大利，群众罢工是一种自发的事情，而这是和意大利人的民族性格分不开的。在我国在一定程度上问题有相似之处，这就是有时我们想通过群众罢工来达到一定的、有限的目的。我国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上层建筑进行改造，如果为了争取某种政治权利在我国要举行群众罢工的话，那么这一行动基本上只会局限于北德意志。南德各邦已经享有邦议会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因此，不言而喻，当北德意志人举行群众罢工，以此作为争取议会选举权的最后手段时，南德意志人不会同时举行罢工。他们只能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我们。希望南德意志人普遍举行同情罢工，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我们冷静而清醒地考察形势的话，我们就必须对自己这样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考察方法是首先必须运用的。

至于说在一场群众罢工中必定会发生流血事件，那不是我的观点。在这里我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便分道扬镳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由于在俄国革命是以群众罢工开始的，所以在我国群众罢工同样意味着革命的发端。事物不是按照同一模式重演的。有人一再重复群众罢工意味着革命，而革命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思想，这使得美因兹的同志们在大卫博士的领导下最近发表声明说，在任何情况下在我国发生流血革命都是不可想像的。群众罢工固然可以当作最后的武器来使用，但它始终只能当作和平的斗争手段来使用。党员同志们，愤怒的群众可能做出什么事情来，这是谁也无法预料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要搞革命，我们始终声明说，革命是从上面，是由不肯满足人民正当愿望的统治阶级搞起来的。老的资产阶级国家法教师也经常持这种观点，我们和他们看法一致。但是，当人民的不满情绪达到最大限度时，它有可能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是绝不能排除的。那些认为由于德国人的民族性格，德国保险永远不会发生这类革命的人，大错而特错了。(有人喊：“完全正确！”)因此我不能断言不会发生相反的情况。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和由此造成的气氛，这不是通过人为的手段可以制造出来的。正像我们不能说在德国将要爆发革命一样，我们也不能说任何情况下在德国都不会发生暴动。(有人喊：“完全正确！”)对于我们来说，使用群众罢工的手段要考虑一定的前提。耶拿决议中说，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的选举权或联合的权利一旦遭到侵犯整个工人阶级的义务就是使用一切手段进行斗争，而其中的一种手段就是群众罢工。现在我要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有人蓄意侵犯普选权，或者，如果工人实行联合的权利被人剥夺，那就再也不存在我们是否愿意举行群众罢工的问题，那时我们必须举行群众罢工。(有人喊：“完全正确！”)我们享有的权利，我们决不能让人夺走，否则我们就会是可悲的、不幸的人。(热烈的赞同声)在这里再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再也没有考虑的余地。那时我们大家都必须赴汤蹈火，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再次响起热烈的赞同声)如果敌人企图那样做，那么他们就必须承担后果。那时我们这些维护自己的人权(没有人权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生存)的男人和妇女就将被迫使用一切手段，不惜任何代价来抵抗这种侵

犯。(有人喊：“完全正确！”)我坚信，那时远远超出社会民主党的范围，远远超出工会的范围，整个工人阶级——只要它具有政治的头脑和感觉，只要它对这些权利的价值还有一点认识——都会万众一心地加入这场斗争。(有人喊：“完全正确！”)当问题涉及尚待争取的权利时，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争取在有些邦中已扎下了根的那些权利的力量，由于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已遭到极大的削弱。我不相信一个南德同志的论断，他硬说，他们之所以享有普选权完全要归功于我们党。不对，这是南德意志各邦特殊的历史发展的结果，这是南德意志各邦所形成的特殊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特别是各资产阶级政党所采取的根本不同的立场的结果。无论在哪些邦中的哪一个邦，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都不是为了讨好社会民主党人而恩赐的，勿宁说，资产阶级政党相信，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保住它们的统治。(有人喊：“完全正确！”)至于说通过这件事社会民主党也获得了好处，那么这对资产阶级政党来说却是一件令人十分不快的附加物。如果它们能够避免造成这一结果，它们一定会那样做的。在党内也有人按照另一种倾向作了奇怪的说明；这些人把事情完全弄颠倒了。他们认为，似乎是拉萨尔搞的宣传鼓动才使我们获得了帝国国会的普选权。在拉萨尔还根本没有提出要求的时候，在普鲁士的保守派人士，特别是当时聚集在瓦格纳周围的一群人士中就有一个想法，这就是根据保守分子在同三级选举制发生冲突的时期所获得的经验，最好给予普鲁士以普选权，以便通过这个办法能够推翻站在反对派立场上的三级多数。这是历史事实。连俾斯麦也受到了这个想法的影响。俾斯麦在成立北德意志联邦国会的时候，除了实施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而外别无他法。不管我多么愿意把我们对公共事务的影响扩大到一切方面去，可是，另一方面，我不得不坚决反对那种歪曲历史的观点，它把事情说成这

样，好像那时我们已经是天知道多么强大，而今天我们同那时比起来却削弱了。（有人喊：“说得完全正确！”）

由于帝国国会普选权的实施和按规定帝国国会应享有的权限（如社会立法、贸易和交通、陆军、海军等方面的立法这些广阔的领域）的生效，毫无疑问，现在工人们帝国国会产生了兴趣，而对邦议会的兴趣不是没有了，就是有也不大。还有8年前李卜克内西就说过：“普鲁士邦议会与我们何干？让它腐烂好了。”我自己在13年前当伯恩施坦正在鼓动人们参加邦议会选举的时候，曾在科隆发表一篇猛烈抨击参加邦议会选举活动的演说，几乎有50年我们都对邦议会不屑一顾。我们有这样悠久的传统（它好像一颗留在我们腿上的子弹），现在却突然想在群众中唤起群众罢工的巨大热情，以反对三级选举法。这不啻晴天霹雳。即使敌人会对我的承认感到高兴，但我还是要说，我们主张在普鲁士实行群众罢工以争取普选权的时刻还没有到来。现在有人说：“你们过去可不是这么说的。在萨克森和普鲁士曾多次策划举行群众罢工。”据说在那个代表会议上继西尔贝施密特之后我也发表过这样的观点。这是极大的误会。为了反对新的选举法草案，去年5月在汉堡举行了许多抗议集会，使当地党的领导极不舒服地感到惊讶的是，参加这些集会的人特别少。在汉堡工人中对市政府侵犯选举权的行为开始没有任何不满情绪。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信给汉堡的同志们说，它准备同他们商量一下，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办。在这里我要作一个更正。我在今年春天同《回声》进行的一场论战中说，在汉堡的同志们还没有想到就那个星期天之后他们应当做什么的问题进行磋商之前，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当时就鼓励他们在汉堡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个说法是错误的。5月22日汉堡党的领导机关就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作出决定：把汉堡的3名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梅茨格尔、迪茨和我召回汉堡，以便商量今后的行动。当然

在此期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已在途中，但是它是在星期二送到的。因此毫无疑问，首先倡议商讨对策的是汉堡的同志们。在那次会晤中当然也讨论了群众罢工的问题；然而没有一个人声明说，愿意参加群众罢工。我们大家都深信，当时考虑在汉堡举行群众罢工简直是荒唐的。还要补充一点，市政府的草案显然不是想根本取消工人的选举权，而是想规定另一套制度，以便尽量防止，在实施旧的有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权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所谓过大的影响。可见，不论是当时还是过后，在汉堡都谈不上群众罢工。

萨克森的情况完全一样。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再被邀请去那里参加萨克森的党代表们讨论争取选举权问题的会议。我基于种种原因一次也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议，但是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们的报告，我可以这样说，尽管同汉堡相反，在萨克森社会民主党内有少数人赞成举行群众罢工，但是大多数人，包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在内，坚决反对在当时条件下举行群众罢工。然而如果发生了群众罢工，那么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自然会是最后一个公开表示不赞成这一举动的反对者。如果发生了群众罢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责任就是，即使违背它的更好的信念也要支持这个行动。你们应当充分信任你们的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它同心同德，否则你们最好让它今天就见鬼去而不要等明天。（笑声和赞同声）至于有人说在普鲁士的某个地方，在某些重要的人士当中曾讨论过群众罢工的问题，那也是不真实的。全部87名议员当时在帝国国会开会。但是无论哪一方都没有把这个想法提出来讨论。今年1月在柏林开过会的监察委员会中也没有人向我们提出过这个问题，在普鲁士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提出过这样的提案，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次也没有收到过表达这种愿望的信件。我还可以进一步声明，当时建议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是在和柏林党的领导协商后取得

充分一致的意见的，因为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根据在1904年圣诞节期间召开的普鲁士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普鲁士事务的领导权移交给了大柏林党的领导，因此后者首先负有参与抉择的使命。诚然在讨论过程中提到过群众罢工这个词，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认真阐述过这一思想。因此使我感到极端惊讶的是，最近几周来在报刊上的某些言论中居然见到这样一种观点，说什么群众罢工的思想也相当广泛地深入到了普鲁士党内，既胆小怕事又聪明过度的不幸的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竭力加以阻挠——这一点没有说出来，但明摆在那里。例如，斯塔姆普费尔同志在9月1日出版的《新时代》第49期上发表的一篇标题为《选举权运动和群众罢工》的文章中以极其坚定的口吻强调指出，群众罢工的思想在大多数同志的心里已深深地扎下了根，只要领导作出抉择，群众罢工就会爆发。在这里我想顺便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党，我们的领导不是凭聪明绝顶的智慧作决定，而只把你们当作棋子来看待的领导，因此，如果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想顺从群众的意见，为什么不强迫它这样做呢？（笑声和赞同声）前一个说法如果成立，那就必然是，大批同志确实有赞成群众罢工的情绪，这种情绪必定会推动中央执行委员会前进。然而这种情绪我们却丝毫也没有觉察到。在斯塔姆普费尔的文章中谈到了1月21日、3月18日和5月1日的集会，以及在这些集会上发表的许多演说。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某位演讲人由于过份激动，威胁说要进行群众罢工；但是我们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大批同志赞成群众罢工。当然鼓动几千人参加群众罢工算不上什么艺术，但它的失败是确凿无疑的，然而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无论如何不能轻率地招致一场失败。敌人满心希望我们轻率地招来一场失败，以便一劳永逸地消灭我们的战斗能力。（热烈的赞同声）我知道，这终究是永远办不到的，我们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

是如果我们想第二次受这种形势的连累，而且是由于自己的过失而受连累，那么我们就将是傻瓜和笨蛋。（有人喊：“完全正确！”）斯塔姆普费尔的全部论述可能是出于作者的真诚信念，但是，他同绝大多数党员同志完全没有联系。（热烈的赞同声）

其次，在斯塔姆普费尔的文章和其他报刊文章中还吹毛求疵地说，我们通常都是用“顺致崇高的敬意、某某谨呈”这样的口吻在递交下院和上院的请愿书上签名。对此他们感到愤慨。这是一个主要的、基本的罪行。我们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不得不向地位较高的人士和团体等写信求援，而且照例要用一些客套话，这些华而不实的词藻和内心的感情毫不相干。这是一些司空见惯的谎言，在资产阶级社会俯拾皆是。也许你们想，要是我们真有这些看来非常可怕的感情就好了。（笑声）我怀疑有些批评家甚至在写给某位党员同志的信的末尾也要附上几句客套话，而这些客套话和他们内心里对这位党员同志的感情毫无共同之处。（全场大笑。有人喊：“说得好！”）有人想用这件事来陷害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直太可笑了。（有人喊：“说得对！”）这个请愿书的目的何在呢？我们想通过这个办法让这两个团体再一次就选举权问题表态。当然随后内务大臣的所谓选区改划方案也会送到议会去，通过对它的讨论会简单地宣布说，请愿书的问题已经了结了，于是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比斯塔姆普费尔的文章激烈得多的是毛伦布勒歇尔同志的文章。我非常担心，我势必同这位同志发生争论。登载在《新社会》第34期上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下一个行动》。我在前面已经对毛伦布勒歇尔的一种政治观点表示惊讶。我个人尤其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我曾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一个建议——派遣毛伦布勒歇尔同志到新党校去任教。他被指定教历史课。我现在毫不犹豫地声明，如果我早知道这篇文章的话，我大概会采取另一种行动，这不是因为毛伦布勒歇尔同志对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持反对立

场——如果认为这类理由是我们的最根本的理由，那是荒唐的。只要他愿意，他写得多么尖锐都可以，但是，他写的东西必须要有事实作根据。应当提出理由，而不是论断。关于他的论断我必须说，如果是一个中学三年级学生暴露出这样的历史观点，那我还可以理解，然而一个年满30该当历史教员的人暴露出这样的观点却是无法理解的。他写道：“党的软弱无力和无所作为同我们去冬以来在许多地方听到的豪言壮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谈到了广大党员群众中据说已经出现的不满情绪之后补充道：“但是，到处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终于想看见进步了。”接着他就发表了我在前面已经予以驳斥的历史观，他往下写道：“必须取得一个胜利，否则反感、一事无成、走进死胡同、错误领导等感觉，会比过去更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在他的文章的另一个地方还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必须重新赢得群众的信任，办法是向他们指出今天已经有可能达到的、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在这里我要请问一下，你们当中有谁能够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证实毛伦布勒歇尔所描绘的那幅对党不满的图画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有人能证实的话，那么，我愿向神父说：我承认错误。但是那幅图画是不真实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那种情绪。（有人喊：“完全正确！”）一个首先是历史学家的人怎么能说“我们必须取得一个胜利”这样的话呢？怎么能向一个处于少数地位、没有掌握国家权力的党提出这样的苛求：你必须取得一个胜利？我很欣赏毛伦布勒歇尔同志指出的那种渴望行动的愿望。他入党3年——这不是对他的指责——而我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党龄已经超过他4倍，5倍，甚至10倍，你们大概可以相信，我们——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正走向生命的终结——大家都一个迫切的要求，即不仅取得一个胜利，而且要取得100个胜利，甚至全部胜利。（热烈的赞同声）

我们大家都在全力以赴地争取胜利；但是说我们现在就必须

取得一个胜利，或者说我们已毫无希望，那都是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机会的幼稚理解。（热烈的赞同声）我们究竟在哪里失去了我们必须重新赢得的群众的信任呢？在哪里？究竟在哪里？——参加组织的同志人数猛增，党的报刊的订户也在增加，这说明群众对我们的信任降低了吗？邦议会选举、市镇选举或帝国国会选举中我们取得的胜利说明群众对我们的信任降低了吗？情况恰恰相反。（会场上热烈呼喊：“完全正确！”）

和我们普鲁士关系比较疏远的希法亭同志对普鲁士的形势和群众罢工作出了比毛伦布勒歇尔正确得多的判断。我们当中没有人想到要废除耶拿决议或对它加以某种限制。耶拿决议中没有一个字符合反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策略的人的观点。同样，我当时发表的演说一个字也不收回。在这里我只想强调指出一个有意义的地方。我在不同的国家谈论了各种不同的群众罢工之后回到了德国，在这儿我说：我们德国人从不轻易采取未经深思熟虑的步骤，这使我们受到责备，说我们像奥地利战时后备军一样，总是一瘸一拐地走在后面。我们的看法是：在我们参加这样大的斗争之前，我们必须先进行认真的组织宣传工作，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启蒙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和反抗能力，鼓舞他们去迎接伟大时刻的到来，那时我们必须对他们说：“你必须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因为你作为人，作为家长，作为公民继续生存下去的问题已受到威胁。”

当我在耶拿以巨大的热情赞成把群众罢工当作一种可以使用的斗争手段时，谁也不能从我的讲话中得出结论说，我已赞成在第二年就举行群众罢工。正是因为根据我们德国的政治关系的全部结构，对我们来说，在一定情况下举行的群众罢工要争取实现的是某些完全确定的权利，正是因为为了我们大家的利益，我们必须设法把这种示威行动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所以我们要求，还要更多地进行宣传鼓动和启蒙教育，以便当时机来到时，我们能够掌握住

我们的有纪律的群众(无纪律的群众要把他们拉走),这样便不致下出任何蠢事来。(有人喊:“完全正确!”)我以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磋商的整个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宣布,我们所持的立场是,尽管群众罢工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决不容许违背我们的信念被卷入一场群众罢工,不管它是由哪方面发动的。(热烈的掌声)我把群众罢工看作是我们党的最后的论据,最后的而且是和平的手段,看作是我们必须以全部力量和纪律,以及自我克制精神加以运用的斗争手段,我们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在必要时才使用它。(有人喊:“完全正确!”)在目前我们所处的组织状态下,还不能冒险使用这一手段。在这个问题上想持乐观态度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朝各个方向展开。耶拿的倡议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还必须大力开展,在这样做了之后,那时再看一看我们进一步能做些什么。在反对我的报纸——首先是《法兰克福报》上,有人背地里说我在群众罢工问题上态度摇摆不定,说我在不来梅曾宣布反对群众罢工。这根本不是事实。在阿姆斯特丹我们大家都投票赞成关于群众罢工的决议。在不来梅关于群众罢工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将讨论这个问题,而在这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人们可以在报刊上和集会上彻底地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工会对群众罢工持什么态度?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年我们在耶拿进行过一次辩论,在辩论中多次提到科隆决议,并出现了一种意见,即认为科隆决议和耶拿决议有矛盾。在这里我不想进一步谈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证实一点,而且是怀着愉快的心情这样做的:尽管在工会领导机关柏林代表会议上某些人在发言中对党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但是谈判大体上表明,不管怎么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比在耶拿看到的那种样子亲密得多了。(有人喊:“完全正确!”)这是毫无疑问的。看到博麦尔堡同

志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我感到特别高兴。他在发言中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工人,特别是工会进行联合的不可缺少的权利受到危害的话,那么工会就应挺身而出,发动群众罢工,而不要先等党提出倡议。这是令人高兴的一致看法。我在那份记录上从另一个人的意见中还看到一个曾公开反对群众罢工的人在会议上说:“我已注意到,人们逐渐开始习惯于群众罢工的思想。”这证明,在科隆和耶拿以及其后在报刊上进行的讨论,促使大批同志们深入思考,他们深入思考的结果明显背离了他们原来的想法。我们必须争取工会赞成群众罢工的思想,这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同样,群众罢工如果得不到工会的支持也是行不通的。(有人喊:“完全正确!”)但另一方面,在工会圈子内,在一系列文章、演说,尤其是在今年春天举行的工会代表会议上的讨论中都流露出一种思想,认为在社会民主党内有人想把群众罢工当儿戏。例如,下巴尔尼姆决议也同意这个观点。在宣染这个观点方面,这个决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党员同志们!难道以多数票通过这一决议的下巴尔尼姆选区不知道,党代表大会曾就上街示威游行问题为普鲁士作过决定吗?难道它不知道,如果我们按照该决议的文本鼓动人们上街示威游行,那将导致一场流血事件,而我们没有任何保证,在这场流血事件中我们会成为胜利者?现在不仅谈到了示威游行,而且多数人同时还谈到了群众罢工。群众罢工被说成是一种随时都可以使用的宣传手段,今天我们举行一次群众罢工,明天举行一次群众罢工,后天再举行一次群众罢工。我们必须断然拒绝这种想法。我只能请求党代表大会否决就这件事提出的全部决议案,而赞同我们向你们提出的决议案。同时我发现,这些决议案此刻绝大部分已经不了了之,因为它们要求的是不要放弃群众罢工的手段。通过“一致”的公布,这一点已经达到了,“一致”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出现了一种思想:人们想放

弃耶拿决议。

其次，还要求发表一本论群众罢工的小册子。在耶拿已就此作出决定，这个决定也将付诸实施。但是由于不可能立即办到，所以我们打算先把党代表大会关于群众罢工问题的讨论情形的全部材料印刷出来并予以公布。此外，有一项决议案还要求，现在正在进行的关于群众罢工问题的讨论情形也应予以公布。我个人丝毫不反对。但是如果这样做了，那么我相信，没有哪一个人在一本小册子中关于群众罢工还能说出什么新东西来。到那时要考虑的就只是为那些和党关系比较疏远的人出版一本小册子。我认为这样做是有益的。在什切青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为波美拉尼亚作出了一项和下巴尔尼姆决议相似的决议。为了替这一决议宣传，有人说我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是孤家寡人，需要找一个靠山。我可以对你们说：在群众罢工问题上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认识是一致的，我根本没有必要当什么促进派和推动者。的确，在一件事情上我的同事们甚至认为我太保守了。（有人说：“听啊！”“听啊！”）这就是，我曾在我的决议草案中提出一个建议：一旦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举行群众罢工，它就应该立即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以便就此作出决定。这个建议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被认为很难行得通，因此只好作罢。除此而外，我再强调一次，党的领导在观点上是一致的。

我还要对米尔豪森的同志们作出的一项决议提一点不同的意见。这项决议称为第64号决议。它宣称，存在着一种危险，即在俄国的伟大解放斗争中，普鲁士政府可能心血来潮，让普鲁士军队开进俄国，以使用德国人的鲜血来窒息革命。毛伦布勒歇尔同志在一篇文章中也流露了同样的思想。在国外这种看法也传播很广。各个阶层的和各行各业的俄国同志们都向我打听，问德国想进行干涉是不是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将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我

回答说，勿须考虑德国会进行干涉的问题。即使把我们对外政策的领导看得再糟糕也还是必须说，进行这种干涉是不可想像的。帝国宰相本人也利用了第一个机会向国会发表声明，说这个谣传是不真实的，说在德国、普鲁士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支持俄国。不可否认，德国的皇帝，政府和资产阶级是同情沙皇的。不言而喻，这伙人当中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把俄国革命镇压下去；但是让德国军队开进俄国去的想法要变成行动，还要迈出巨大的一步。（有人喊：“完全正确！”）有人举出1792年的例子。但那时整个欧洲都是法国革命的敌人。那时可以成立欧洲联盟，那时可以指望把革命窒息在血泊中。然而这个企图毕竟没有得逞。

1792年和1906年的形势完全不同。今天没有任何可以随时动员起来去反对俄国的欧洲联盟，今天德国由于自己所奉行的愚蠢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是孤立的。如果有人想进行这种干涉，奥地利各党派的报纸就立即会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德国对俄国的干涉将意味着一场欧洲战争。（有人喊：“说得完全对！”）因此我们在德国要小心提防，不要让这个灾难发生。（有人喊：“说得完全对！”）米尔蒙森的同志们倡议的东西同纽文胡斯在苏黎世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旦爆发战争就进行总罢工以争取和平的主张有什么区别呢？是的，同志们，你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经历过一场大战。你们一点也想像不出1870年战争爆发时的情况。在此期间我们当然已经强大得多了；但是，对方的统治手段也越来越厉害了。（有人喊：“完全正确！”）首先军事装备已完全变样了。谁相信，在一场巨大的骚乱、狂热会把群众推入无底深渊的时候，在一场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骇人听闻的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候，谁相信，在这样的时刻可以发动一场群众罢工？（有人喊：“完全正确！”）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一旦战争爆发，从第一天起在德国就会有500万人（其中有几十万党员同志）应征入伍，整个国家都要处于战备状

态！满目疮痍、普遍失业、饥荒、工厂停工、有价证券贬值——有谁相信，在人人都只为自己着想的这样的时刻可以发动一场群众罢工？（有人喊：“说得很好！”）如果党的领导这样没有头脑，在这样的一天发动群众罢工，那么随着动员令的颁布，整个德国就会处于战争状态，那时民事法庭将不再起作用，而由军事法庭来进行判决。我已经听到一点小道消息——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在权威人士当中有人相信，社会民主党非常愚蠢，它会作出这种决定的——当局早已打算为社会民主党的全体领袖安排1870年为我们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安排的那种命运。如果你们认为在发生群众罢工的情况下敌人会表现出某种宽容的精神，那你们就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敌人宽容，我认为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国家的情况和其他国家不同。德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人们可以把这看作是恭维话，不过这是真理，我们必须牢记这个真理，并根据这个真理来决定我们的行动。（有人喊：“完全正确！”）我只能迫切地请求你们也拒绝米尔豪森决议。——请你们接受我们提出的决议案，这样就为党胜利地实现它的目标铺平了道路。（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文选》1981年
法兰克福版第2卷第199—214页。

（李俊聪译）

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 代表大会上的两篇讲话

一、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1907年8月18日)

党员同志们和战友们！我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欢迎你们到德国来，到斯图加特来，并向你们致以最衷心的问候。我们在德国举行国际代表大会，这还是第一次。诚然第一国际曾经作出决定：1870年在美因兹举行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但是当时在德国和法国之间不幸爆发了战争，因此代表大会不仅在当年未能举行，就是在随后几年里也不能举行。新的德意志帝国没有成为自由和公正的国家。它成立以后立即对它所憎恨的人物和党派实施非常法和阶级司法。因此不言而喻，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召开一次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对德国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期待很久了，我们终于敢邀请国际到德国来开会了。当我们在阿姆斯特丹向你们发出邀请的时候，你们当中有不少人摇头，有不少人表示怀疑：在德意志帝国开会是否可取，因为直至那时它在资产阶级自由方面在国外恰恰并未享有最好的声誉。然而我们还是敢于发出了邀请。我们豁出去了。我们想，人们未必真的愿意在整个文明世界面前丢脸，从而使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不能在德国召开。当然我们丝毫无意到柏林去：在毕洛夫侯爵和柏林警察局的监视下开会，这不合我们的胃口。(笑声)不过我们想，在柏林办不到的事情，也

许在斯图加特可以办到。你们看，果然如此：我们今天召开了一个庄严、辉煌的会，没有哪一次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有如此盛大的规模。（有人喊：对！）当然在最近几年中你们大概往往不免担忧，德国是不是真正适合举行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的国家。刚好在两年年前，当不幸的摩洛哥事件使整个文明世界紧张到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的时候，柏林的党员同志决定邀请我们的朋友饶勒斯，好让他以法国无产者的名义向德国无产者宣传和平。毕洛夫侯爵采取一切措施不让这个人到德国来。并通过德国公使威胁说将把他驱逐出境，尽管不久前在德国帝国国会上毕洛夫侯爵曾亲自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有人喊：呸！）这件事你们已经全都知道了。（笑声）无论如何，对于代表大会来说，这决不是一个好征兆。比邻的卡尔斯卢厄效法柏林的榜样。预定在柏林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那一天，在3个国家接壤的康斯坦茨要举行一次争取和平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阿德勒、格罗伊利希、托德斯西尼和我预定在游行大会上讲话。但是柏林的不光采的例子在卡尔斯卢厄居然有人仿效；在康斯坦茨也禁止举行集会，不过我们在那里有一个优越条件，就是可以在友好的邻邦瑞士说出我们在德国土地上不能说的话。

使你们和我们感到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普鲁士德意志政府对我们尊敬的俄国同志的态度。你们大家对毕洛夫侯爵关于乞讨者和谋叛者的演说都还记忆犹新。你们大家都知道，普鲁士政府曾肆无忌惮地把俄国留学生和工人十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一批地驱逐出境。这就是那些引起你们的怀疑，担心在德国是否能召开大会的因素。我们有把握地说，我们敢于召开这样的大会，并希望这个大会成为一次光辉的盛会，成为对全世界无产者说来一次获得圆满成功的大会。我们确实看到国际的思想在整个文明世界已经打下了多么深厚的基础。凡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找到了土壤的地方，社会主义思想也就立即扎下根来。我们今天看到，对于人类

进步来说，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国际运动正在蓬勃发展。

自从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我们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对于那些有幸出席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人来说，在那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当主席指出在远东日俄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可怕的战争时，这大概是最令人揪心的时刻，而现在，日本代表片山潜和俄国代表普列汉诺夫亲切握了手，以表示两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有人喊：好啊！）我们当时在阿姆斯特丹曾经讨论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政府的问题，那时我们之间的分歧很大。我们分手的时候都认为，我们的法国兄弟之间的统一很难恢复。但是，请看，我们大家都感到惊讶，然而又高兴的是，这件大事竟然成功了。阿姆斯特丹播下的种子已结出了果实。我们的法国兄弟团结一致地展开了强大的竞选活动，结果获得了胜利。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已从37席增加到54席，同时他们获得的选票也大大增加了。（有人喊：好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英国工人阶级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第一次作为独立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工人政党参加了竞选活动。谁也没有预料到，这次竞选竟获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结果英国无产阶级的32名代表第一次作为独立的工人政党进入了英国议会。（热烈欢呼：好啊！）欧洲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看到本国无产阶级以这种方式作为独立的政党阔步前进这一情况虽然出现得晚了一些，但是，英国朋友们，你们的开始是一个好的开端，随后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更加高兴。我在阿姆斯特丹曾预言，英国工人的胜利肯定会使英国政府接受一位社会党人加入内阁——我当时已经提到他的名字，就是约翰·伯恩——。这个预言也已经实现了。然而这一让步丝毫也没有使我们的英国朋友离开他们的竞选策略一步。（有人喊：对！）继法国和英国的这一胜利之后的是在芬兰取得的胜利。我们的朋友善于利用在沙皇制度下（这个制度不给自己和人民一点点权利）激进得有点奇怪的

现成的选举法，不仅选出了一个强大的由男人组成的议会党团，而且还有9个女社会党员被送进了芬兰议会。（有人喊：好啊！）然而这还不是国际所获得的全部胜利：在奥地利进行了伟大的战斗。我们的奥地利同志长期以来英勇地、朝气蓬勃地进行了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他们现在有87位同志当选为议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党议会党团。（暴风雨般的掌声）此外，我们的荷兰朋友，同样还有瑞士朋友在市镇选举中也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这证明国际到处都在前进。

看来德意志帝国，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例外。我不想在这里深入分析导致去年冬天突然解散国会的原因。我们经历了一场自从北德意志国会和德意志国会成立以来从未经历过的竞选斗争。在竞选中反对我们的不仅有各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还有帝国政府、某些州政府连同市镇代表机构，最终结果正像人们在这次竞选活动之后所料到的情况那样。我们获得的选票从300万增加到325万。但是我们获得的议席却从79席减少为43席。因此在柏林宫有人已经在谈社会民主党从马上摔下来了。各国朋友们和党员同志们！我向你们保证！我们感到我们没有从马上摔下来。我们像过去一样稳稳当地坐在马鞍上。（暴风雨般的掌声）在经过这样一场竞选活动之后，325万张选票就意味着325万个钢铁汉。对这些钢铁汉在任何危险的情况下都可以信赖。他们是一支宣传大军，比任何地方的宣传大军都更强大。在此期间我们的敌人也认识到了，这是一次偶然胜利，他们不能指望以这种方式战胜我们。他们能有这样的认识，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大家直至最后一个人人都迫切希望，1月25日到2月5日之间造成的损失能很快得到弥补。（热烈的掌声）但同时也深深地感到遗憾：我们大概要到1912年才能在下一次竞选中争取胜利。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后将一如既往坚守自己的岗位。汉堡市议会选举和

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的辉煌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在我们的不幸已故的奥艾尔同志的选区举行的补缺选举也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近年来参加组织的男女同志的人数已从38.4万人增加到53万人，就是说，增加了14.6万人，或者说增加了38%。（掌声）党的刊物也扩大了，党的财政收入也增加了，尽管进行了付出巨大牺牲的艰巨斗争。对于一个“从马上摔下来的”党来说，当它的出纳员在最近这个月里能够开出一张17万马克的党费收据时，这里毕竟有一种崇高的东西。（有人喊：对！）此外，德国工会的会员已由1900年的70万人增加到今年的180万人。这是无产阶级力量的巨大增长，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这就是从马上摔下来的党的现状！如果他们真的认为我们摔下马来了，那么毕洛夫侯爵和他的主子为什么要顽固地拒绝采用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办法来选举普鲁士省议会，从而使我们再次尝一尝从马上摔下来的滋味呢？（笑声）但是毕洛夫的官方机关刊物怀着掩盖不住的忧虑心情说，要求实行普选权是“骑马去打野鸭子”。（笑声）因此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未来的岁月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只要一有挥舞它的宝剑的机会，它就将证明自己还是当年的社会民主党。在获得这样多胜利之后，遭到一次失败，这又何妨？（笑声）不难理解，接二连三的胜利，容易使人忘乎所以。我们的先哲歌德曾经说：一连几天好天气最使人难受。（笑声）我们碰到了一个阴天。但是，太阳已重新露面，甚至已照耀着这次代表大会。（笑声）看来，甚至奥林匹斯山都已同我们结盟了。（重新爆发出一阵笑声）

在北美合众国对我们的同志海伍德进行了一场卑鄙的审判。统治阶级为了把这个无辜的人诬陷为杀人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这个伟大共和国的领导人也出面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公民。审判以海伍德同志的光辉胜利——无罪开释——而告终。但是，首先是他唤醒了美国的工人，促使他们注意这个伟大共和国的弊

端。尽管它在纸面上为无产阶级规定了一切权利和自由，而实际上无产阶级却享受不到任何自由和公正。我们希望，被这次审判所唤醒的美国工人群众，也像英国无产阶级作出的榜样那样，对北美共和国的政治史产生强大影响。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当中出现了一个过去从未见过的、如此强大的美国代表团。（有人喊：好啊！）

在这一切之后，我们有充分权利说：

国际在前进！每一年它都开辟了新的阵地。这次代表大会已经有整个五大洲的代表出席；全世界一切国家都派代表参加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因此我们看到，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强大的、遍及全球的党，它正向前冲锋。它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本届代表大会的工作能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国际的力量，使国际所追求的伟大思想和目标能够赢得新的拥护者。但愿这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能为国际的思想提供另一个榜样，而不像在海牙联合起来的政府组成的国际那样（热烈的掌声），它们的代表没完没了地开会。大山经过产前阵痛终于生下了一只小老鼠^①。而且当它生下来的时候也许就已经死了。（笑声）我们希望愉快地，有目的地进行工作，并取得我们能够取得的最好成就。为了表示你们赞成我的看法，我请你们同我一起共同高呼：各国人民的国际、为人类求解放的国际万岁！（暴风雨般的、此起彼伏的掌声）

二、 在讨论军国主义问题时的讲话

（1907年8月19日）

依我看来，国际代表大会已经多次讨论军国主义和战争的问题

① 这是一句德文谚语，它比喻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获得了可笑的、非常渺小的结果。——编者注

题，并作出过决议，单是重申一下以前所作的决议也就够了。（有人喊：非常正确！）然而在法国同志——主要是受到了爱尔威的所谓反军国主义鼓动的影响——要求把这个问题重新列入本届代表大会议程之后，我们不得不再一次讨论它。爱尔威在《他们的祖国》这本书中，对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并没有说出点什么新东西。这些话在前几次代表大会上多梅拉·纽文胡斯已全部向我们讲过了。（有人喊：对！）而历次代表大会都以压倒多数拒绝同意他的观点。我们的观点现在仍然没有变。爱尔威说：祖国是统治阶级的祖国，与无产阶级无关。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过类似思想，即“无产者无祖国”。然而，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们已经说明，他们不再同意《宣言》的这种观点；第二，在这几十年中，他们对欧洲的民族问题，尤其是德国的民族问题，采取了非常明确的，决不是否定的立场。我们并不反对祖国本身。祖国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属于无产阶级而不是属于统治阶级。我们反对的是这个祖国中现存的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状态。（有人喊：非常正确！）议会也是统治阶级维护其阶级统治的机构。我们到议会中去不仅是为了反对阶级统治，而且也是为了改善状态。因此，我们不只是否定，我们也到处都在做肯定的工作。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和文化发展只有在完全自由和独立的基础上，借助于祖国的语言才能得到发挥。因此受到异国统治的各族人民到处都在力求获得民族自由和独立。例如，我们在奥地利看到了这种情形，我们在波兰人争取民族复兴的斗争中也看到了这种情形。一旦俄罗斯成为现代国家，它也会发生民族问题。（卢森堡同志表示反对）我知道您的看法不同，但我认为您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每一个受异国统治的民族，首先是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亚尔萨斯—洛林反对把它同法国割裂开来，是因为它在几个世纪中与法国发展了共同的文化，平等地享受了大革命的成果，因此，它在文化上和法国发生了极其密切的、

对自己的民族性没有损害的联系。爱尔威认为，不论法国属于德国还是德国属于法国对无产阶级来说都无所谓，这种思想是荒谬的。（喊声：这简直不能叫作思想！笑声）要是爱尔威真的向他的同胞们宣传这种思想，我担心他会受到他自己的同胞的蔑视。（有人喊：对！）在战争时期民族的激昂情绪意味着什么，我们在1870年已经看到了。当时群众都认为拿破仑是战争挑拨者，尽管战争挑拨者不是他，而是俾斯麦。俾斯麦——后来才知道——通过伪造埃姆斯急电挑起对方对德宣战。^①这种激昂情绪也冲着我们发泄了，因为当时在表决军事拨款时我们弃权了，我们所持的出发点是，双方政府在战争问题上同样有罪，因为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埃姆斯急电的经过情形。

有人认为，什么是进攻性战争，什么是防御性战争有时是很难区别的，我认为这种看法完全不对。现在引向战争灾难的线索再也逃不过消息灵通和有观察力的政治家的耳目了，黑幕政治已经过时了。

试从实际的观点出发来分析一下爱尔威所理解的反军国主义问题。我不知道爱尔威的策略在法国是否行得通。我担心，要是战时在法国采取爱尔威的办法，如大罢工、后备兵拒不应征服役、士兵开小差和公开暴动等等，好处是很少的。（赞同声）我坦率地说，在我们这里这些办法是行不通的，是不可能提出来讨论的。德国的情况究竟如何，可以从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例子中看

① 1870年威廉一世从埃姆斯（德国的疗养地，当时威廉正在那里休养）拍给拿破仑第三一封急电，电文被俾斯麦篡改了。俾斯麦的目的是诱使法国向德国宣战，以便把战争的罪责转嫁给法国。俾斯麦的捏造果然成功了。被侮辱性词句激怒了的拿破仑首先向德国宣战。于是普法战争爆发，结果法国战败，帝国崩溃。——原编者注

出。虽然李卜克内西在其著作中明确地跟爱尔威划清了界线，认为爱尔威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但是，仍然有人想控告他犯了叛国罪。我也不知道，从爱尔威本人的观点来看，他的反军国主义鼓动是否值得怀疑。德国军界和德国参谋总部密切注视着这个鼓动。至于好战派，在我们那里固然还势单力薄。在政界也没有什么基础，但对削弱可能的敌人的事情，它是欢迎的。（有人喊：是吗？是吗？）在德国的权威人士中没有人希望战争，大部分人是考虑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存在。毕洛夫侯爵曾当着我的面承认，政府知道在一场欧洲大战中国家和社会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因此，我们将尽量避免战争。

但是，根据上述理由我们也不能赞成饶勒斯和瓦扬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结束句中对爱尔威主义作了可疑的让步。类似问题根本不需要谈。其实，我们在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方面是一致的。我们德国人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已经有40年了，我们比任何人都坚决。（有人喊：对！）相反地，倒常有人向我们述说饶勒斯是爱国主义的典范。（饶勒斯：在法国，人们也恰好是这样向我说到您的！）是的，你们把我说成是“伟大的爱国者”，说我拥护一切战争，哪怕不是防御性战争也罢。当然，在我们那里听到的是另一种说法。在摩洛哥事件期间，我们到处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防止战争。如果说在各国的相互关系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我们作为社会民主党人还不能完全不需要武装力量的话，那么这只能是纯粹为了防御，而且武装力量还必须建立在最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这种基础将防止滥用武力。因此，我们在德国竭尽全力反对在任何形式上可能存在的军国主义，不管是在陆军中存在的还是在海军中存在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容许别人把一些可能给党的生命，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给党的存在带来严重后果的斗争方法强加给我们。我希望，一般性辩论结束之后，我们在分组委员会上能达

成谅解。(热烈的掌声)

译自《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7年柏林版第13—16、81—83页。

(李俊聪译)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 关于“批准巴登预算”问题的讲话*

(1910年9月20日)

同志们,两年前当我们在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上,就现在要研究的预算问题做出决议的时候,大概曾以为,今后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这个问题将不再会是一个需要在党代表大会上研究的问题了。当时的决议确定无疑地宣布,从原则的观点出发,在各立法机构,即帝国国会和邦议会中,党的代表均应投票反对预算。因此,今天要我再次对这个问题发言,对我来说这是一项十分不愉快的任务。我宁愿仍旧远远地站在一旁。但是事情已经闹到日前这种样子,我觉得我有责任打消所有其他顾虑,承担作这一报告的任务。

纽伦堡决议也好,今天提交给大家的这个决议案也好,都明确联系到了前两届即卢贝克和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所做出的一系列类似的决议;在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德累斯顿决议是党代表大会历来的决议中措辞最为准确的。它不仅责成议员们拒绝给统治阶级的政府以金钱用来继续推行它们的统治制度,而且还禁止任何与资产阶级政党拉拢接近的尝试。当时在德累斯顿赞成该决议的人,除一两个人之外,包括了几乎全体南德的代表,即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和黑森的代表们,其中有科尔布、弗兰克、冯·福尔马

* 本文最初发表在《1910年9月18至2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0年柏林版第238—259页。——编者注

尔、泽吉茨、阿道夫·弥勒、凯尔、林德曼等同志。(听啊！听啊！)

在纽伦堡的时候，我们本来有一切理由按照德累斯顿决议，采取比实际采取的更加严厉的行动，因为南德那些同志当时的行为就违反了自己的决议，他们在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之前已经批准过预算。这一点必须指出！还必须进一步指出，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以后，在曼海姆作报告时，盖斯同志提议，曼海姆的同志们赞同纽伦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他的这个提议受到一致通过。(听啊！听啊！)因此我要指出，他们把自己置于何等自相矛盾的境地了。

科尔布和弗兰克等同志现在在巴登投票赞成预算，因此，他们的行动就直接违反了他们自己从前的决议。如果我们仅仅认为这是违纪行为，仅仅泛泛而谈，那么，这种见解是极端错误的。当然是违纪行为，但是不止于此，这是违反三次党代表大会确定的党的原则性准则的行为。(很正确！)党内少数派同志是否同意多数同志对于那些决议的重要性的见解，不是我们现在要谈的问题。(很正确！)因为大家知道，一致的看法是难得达到的，尤其在重大问题上，往往有一个颇为可观的少数派，尽管他们有不同意见，但必须服从多数。少数人如果不服从多数人的决议，党内生活就无从谈起。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服从的。但是，不言而喻，我们也有权反对我们所不欢迎的那些决议，可以申诉，可以在集会上、报刊上和一切有机会的场合表示反对的态度，并试图推翻这些决议，这是少数派应有的权利。然而，我们现在谈的是要求绝对服从。(好得很！)处于劣势的同志们可以行使反对派的权利，如果他们成功地把党的多数拉到自己这边来，那么他们就是胜利者，而其他同志就处于劣势了。(确实如此！)

现在巴登的同志们拿出了一大堆理由，说他们有意破坏纽伦堡决议是迫不得已。即使拿出十倍于此的理由，而且条条都有道理(据我看，所说的理由都毫无道理)，巴登同志们的行为恐怕也无

法辩解。(非常正确!)如果当时他们认为不能投票反对预算,那他们可以告诉全党:大家责成我们投票反对预算,但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不能投票反对,所以便退场弃权了。在这种情况下,这大概是唯一正确的做法,如果这么办,事情就清楚了,那些同志的行动也就不会与纽伦堡决议相悖了,而做到了他们所能做的。(一片赞同声)然而弗兰克在《新时代》第49号上发表一篇题为《关于巴登造反的真相》的文章,企图节外生枝。他说:“相反,纽伦堡党代表大会对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虽然不是多数派但却是议会工作多数派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并没有给以指示。当时也没有必要对这种可能性采取什么事先的措施,因为到那时为止,尚未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准备并有足够的力量同我们结成这种联盟。如今,在德国破天荒头一次给了巴登同志们以结成‘大联盟’的机会,而我们认为,有理由也有责任为了运动的利益结成上述联盟。如果允许进行这一合作,那么,赞成预算就势在必行了,在长达数月之久的工作中,对于预算的内容我们是发挥了影响的。”

这种说法极端错误!我们根本没有讨论过大联盟问题。当时这也许是个错误,不过要是我们这么做了,那就会有人叫喊起来,说我们想对各个邦的同志进行监护,想把一切想得出的责任都加到他们的头上,云云。巴登同志们没有得到过允许去结成联盟,不过也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党尚未对此表态,他们就采取了行动,如果他们以此为凭便认为可以违反纽伦堡决议,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非常正确!)在党内辩论中。现在有人还说什么,巴登人的行为是我们在纽伦堡对六十六人声明放任的结果。这是根本错误的。六十六人声明不外乎是一个表达他们意见的宣言,可我们不对意见而只对事实作出决定。只要提出的是纯观点和主张,我们就可以不予理会,我们也可以进行讨论,不过说一个人对决议发表了声明,他就违反了这个决议,那是不对的。声明是怎么说的

呢，声明说：“我们承认德国党代表大会是全党合法代表机构，它在所有关系全国的原则性事务和策略性事务中拥有最高决定权。”

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也同意这一看法”，这里指的就是同志们的下述看法：“在邦政治的特殊事务中，邦组织是在共同纲领基础上、根据特殊情况独立决定邦政治进程的合适的主管部门；某一时期有关预算表决投票问题的决定，必须交给对邦组织负责的邦议会党团进行义不容辞的判断而后做出。”

就是说当时谈的只是一些看法。现在那些同志们的意见是，唯有邦组织才可以做出决定，而不是全党的代表大会。对此我们甚至一直争论不休，并且今天又在争论，不过，只要随着这种声明而来的不是违反决议的行为，我们就无权干涉。在纽伦堡辩论过程中，南德的同志们所发表的口头声明较之于这个声明要尖锐得多。我根据科尔布的小册子引述几段话，我想顺便说明一下，科尔布本来可以从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抄录一些尖锐得多的段落来维护自己的见解。据小册子称，蒂姆说：“像你们强加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决议案——我现在心平气和地说——，在我们看来是不能同意的。这里不存在屈从，而只有坚决的抵制……如果你们以党的利益为重，并且如果你们愿意弥补这场蓄意挑起的党内争端和由此而犯下的错误，那你们就不要把党置于较量之中。”

弗兰克还说：“这个决议案会降低我们在议会中的地位。”

这话是弗兰克说的，可是他在卡尔斯卢厄甚至愿意投票反对预算达24小时之久。（听啊！听啊！好得很！）在另外一个地方弗兰克说：“为了我们所需要和所拥护的统一起见，我请求你们：你们不要一意孤行……”

这是不折不扣的威胁。他还说：“我们认为这个决议案是善意的反面，在我们看来，它是完全不能、绝对不能同意的。”

发表完全相似言论的还有希尔登布兰特（斯图加特）、劳赫（汉

诺威)和大卫,然而大卫过去可是谈到过绝对服从的。那好吧,谁如果像大卫那样通过演说和文章利用过绝对服从,谁就真的不能报怨了。假如说在军队中像在我们党内一样盛行一种绝对服从的话,那我们要看一看,哪里有这种军队。无论如何,领导军队的那些先生们恐怕会因惊骇而怒不可遏,可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他们是完全有道理的。

现在,藐视决议的行为发生了。有人不服从了,有人违反了纽伦堡决议。他们为这种行为辩解,声称要是不批准预算,就会给党带来可怕的损失。同志们,饭前我们读的东西就不同了。这里我想起一段话作为例子,这段话在纽伦堡时就曾起到过一种作用,这段话很能说明问题,我不得不再次举出来。早在1908年巴伐利亚的党曾经在他们的议会手册中讨论过预算表决问题。其中首先阐述了党为劳动人民所做的种种好事,并说我们没有指责党采取的否决行动,然后继续写道:“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就财政法进行最后表决时采取否决的态度,所以他们也就否决了为国家需要而提出的一切拨款。”这话是小册子里写的,那么也就是巴伐利亚党的执行委员会说的。“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并且只要指的不是应受谴责的故意把选民引向错误,这种看法就证明了对国内外议会主义不寻常的无知。”(听啊!听啊!)现在,巴登的同志们,你们要特别记住下面这段话:“因为,即使在资产阶级政党那里,这也是老一套的做法,就是说,当资产阶级政党站在坚决的反对派立场时,他们利用对预算进行总表决来表示自己对统治制度所持的否定态度。”(听啊!听啊!)但是现在我们对统治制度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我们是要以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来取代今天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因此我们同今天的制度是原则上的对立,这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都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否决预算打破了资产阶级的先例,也就是完全正常的了。(非常正确!)不过在这里我们

并不是仅仅要考虑巴伐利亚党的委员会对于否决预算的评论。在卢贝克党代表大会上，当时还是激进派的凯尔（笑声）曾发表一篇演说坚决反对芬德里希（这里的引文见《卢贝克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74页）。当时他说：“芬德里希夸耀说，我们的巴登议员受到了平等待遇。对于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实在是谦虚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给与我们和资产阶级议员一样的理所当然的平等权利，究竟从什么时候起需要我们非给与回报不可呢？”然后凯尔谈到维尔腾堡党内同志的活动，他说：“我们极其猛烈地抨击了我国的司法管理、税务、文化预算还有铁路管理，我们的抨击收到了成效，到处都赢得了赞许，人民对我们的同情增长了。假如我们以最后赞成预算来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从而否定我们自己的抨击的话，这种同情会荡然无存的。”（听啊！听啊！好得很！）

请问巴登的同志们，那几年你们因为投票反对预算给党造成的危害究竟何在呢？你们根本不可能指出来。（非常正确！）但是，现在巴登的同志们恍然大悟了，而先知就是这位科尔布同志。他在卡尔斯卢厄《人民之友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最后在奥芬巴赫党代表大会上作了两次相当长的演说，他为胜利所陶醉激昂慷慨地宣布（大意如此）：“我们所拥护的做法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是新策略的先锋，在德国、在欧洲，我相信甚至在全世界人们都将追随我们的先例。”（笑声）科尔布同志利用这种机会不仅对那个策略唱起了赞歌，而且对党的、尤其对国会党团的总策略发表了如此尖锐的抨击，以至我现在不得不说，随着这篇演说和这些文章，问题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非常正确！）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权力，今天就党的整个策略展开一场辩论。我是不愿意发动这场辩论的，我之所以不愿意，是因为考虑到明年。但是我们是躲不过这场辩论的，它迟早要发生。（非常正确！南德人也这样认为）举例来说，布洛赫博士在所谓的《社会主

义月刊》上著文，赞成那些结论都是：我们应该投票赞成农业政治措施、赞成帝国预算，等等的文章，而且在巴登的报刊上、在卡尔斯卢尼和曼海姆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弗兰克：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总是要出现的。所以，我们很有必要谈一谈，我们党在国会执行了43年并使我们壮大起来的策略是不是一个错误的策略。（非常正确！好得很！）

过去的一年表明了，我们的策略是何等的正确。到底我们党为什么发展壮大起来，为什么现在选民们大批涌向我们呢？因为我们是唯一原则性强的党，它最有力地反对了议会中作出的剥削人民、压制人民、束缚人民的决议。（暴风雨般的掌声。南德人喊道：我们也这么做了）如果一个敌人对社会民主党的否决做法说三道四，那我可以容忍，而且我想到这是一个愚蠢的或者是一个不怀好意的家伙，他只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然而，如果是像科尔布这样一位党的领袖对党所采取的否决做法说三道四，而且说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都错了，即使在帝国国会里我们也本应采取另外一种做法，那我们就有一切理由怀疑，这类攻击是否有那怕一丝一毫的道理。（非常正确！）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巴登议会党团在预算问题上的态度同他们的一贯态度毫无矛盾。（非常正确！）为什么这样讲呢？冯·鲍德曼在委员会讨论乡镇法令的时候曾发表声明说，谈不到对社会民主党平等，社会民主党的区委会是不会得到承认的。冯·鲍德曼同志……先生（大笑）——是的，同志们，如果要我在这个问题上作一客观评论的话，冯·鲍德曼先生实在比我们的人正确得多——因此，冯·鲍德曼先生发表了这个声明之后，我们的同志勃然大怒！他们认为，这是侮辱，我们党不能容忍。弗兰克同志在《美因兹人民报》上发表文章声言，虽然几个月以来他们都有投票赞成预算的打算，但是这个令人愤慨的声明发表以后，对预算投赞成票就无从谈起了，因为声

明是对我党空前莫大的侮辱。同志们，如果现今国家的一个大臣，现行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一个代理人——而现今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其目的就是保卫和维护现行国家和社会制度反对来自社会民主党的任何攻击，必要时使用暴力——如果这么一个大臣说他不承认这种平等，那么，从他的立场出发，他是完全正确的。（弗兰克：闻所未闻！）我觉得这是完全自然的。（弗兰克：闻所未闻！）

其间丝毫也没有什么侮辱存在。这种话说过何止千万遍？当他们把反社会党人法套在我们脖子上的时候，我们没有觉得这是什么“侮辱”，我们当时义愤填膺，满怀对于这个法律炮制者和拥护者的愤恨，假若那时我们心里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的话，那么，对于那些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我们就会起而攻之并予以粉碎。（暴风雨般的掌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成了我们事业的叛徒。（非常正确！）但是，当时我们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也随他去了。如果一个大臣发表了上述言论，那并不是什么对我们的侮辱。这类言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谁拥有政权，谁就要设法保持自己的政权，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敌人赶下台。（非常正确！）

巴登人所采取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弗兰克曾说，冯·鲍德曼先生是个复杂人物。我本人不认识冯·鲍德曼先生。我也很少听说过这个人，而这一点恰恰说明，他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笑声）我可以向弗兰克同志保证，在我看来，他远比冯·鲍德曼先生复杂。（哄堂大笑）从前我曾对弗兰克同志寄予厚望。（听啊！听啊！）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是最喜爱的人，我的小鬼。（哄堂大笑）但是我看错了人，他辜负了我的希望。（听啊！听啊！）因为我受骗上当，所以我就想到：见鬼，这是怎么回事呢？什么内在的动机使得他产生如此显著的变化呢？我至今还没完全搞清。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个复杂人物。不过他干的事情并不复杂！对此我非常清

楚。如果对于动机我不好判断的话，对行动我还是可以判断的，我坚决反对这些行动。

完全类似于不久前在委员会里发表的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政党平等的声明，冯·鲍德曼先生过去在那议会就发表过不止一个。是弗兰克同志1908年在纽伦堡谈起冯·鲍德曼先生挑衅性演说的，因为冯·鲍德曼先生当时就说得明白：谈不到社会民主党有什么政治上的平等！然而这些思想也没有什么复杂性，而是简单明了。现在巴登的同志们走运了，得到了不请自来的盟友；卡尔斯卢厄的保守派对冯·鲍德曼先生暴跳如雷，《十字报》在咒骂，而保守的基督教协会也纷纷声明反对他。假如冯·鲍德曼先生因为这些稻草而栽了跟头，那我就会不胜遗憾，这倒不是因为我把他看得怎样特殊，而是因为在这场蛙鼠之战中不应该马上就要一名大臣阵亡。更不需要埃尔茨贝格尔如此目瞪口呆，因为他一定知道，比冯·鲍德曼先生地位高得多的人对社会民主党完全不是这样恭维的。（非常正确！听啊！听啊！）这一点我还要讲到。结果终于决定对预算投赞成票。如果说冯·鲍德曼先生的第一个声明还激起过我们同志们的义愤的话，那么，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起先是我们的同志们开会决定：现在我们反对预算。做出这个决定，对于他们来说，十分不易。后来决议广泛公布并且传到了冯·鲍德曼先生的耳朵里。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就考虑到，社会民主党由于我的声明就要投票反对预算！那好哇，要是我能使社会民主党人落入我的圈套，那对于我、对于我们邦和资产阶级政党岂不妙哉。于是他又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是第一院的一个容克炮制的，其中说道，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个了不起的运动，是一个大家必须尊重而不应嘲讽的现象。对于这个空洞无物的声明，我们在巴登议会中的那些同志如此之陶醉，以至他们连忙开会，立即做出决议，对预算投赞成票。（笑声）与此相联系的一切危险，此

时此刻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了。

冯·鲍德曼先生耍了一个极其狡猾的花招，他用空洞无物的讲话便使整个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落入他的圈套，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是一个政治家（笑声），而那些如此便落入圈套的人，就不是什么政治家（哄堂大笑），尽管他们大言不惭地自诩为伟大的政治家。现在弗兰克同志来了，他声称，这位大臣公开地、勇敢地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是了不起的，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发动了合理的运动，这种承认是有些重要意义的，尽管这位大臣显然表示反对我们要改变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那些基本要求，声称这些基本要求应受到最坚决的谴责和抵制。弗兰克同志认为，“这一公开的、勇敢的承认”，在我们看来，是意味着收回他在委员会内发表的曾大大伤害我党的那种意见，于是，经过简短的协商以后，议会党团多数便做出了决议，批准财政法，因为据说这是政治形势的需要。（听啊！听啊！）

许多事，我是容忍和理解的，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党内我们付出的代价获得了一些东西，然而因为一个空洞无物的说明便彻底改变了原来的做法，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在冯·鲍德曼先生的话里——弗兰克同志是法学家，按照专业他学过，怎样对一些话和概念进行精确的解释——，在冯·鲍德曼的话里，究竟哪一句是承认我们平等的话呢？他在什么地方说过，如果我们选出区委员会，就会得到确认（非常正确！），在什么地方？（面向弗兰克博士）噢，你这个好轻信的托马斯^①！（笑声！）没有非凡的解释本领，就不能读出这番意思。（非常正确！）这位大臣没有许下任何诺言，他仍然站在他一贯的立场上，只是你们（面向巴登人）才突然改变了

① 托马斯（Thomas）原是基督使徒。德文成语有 *ungläubiger Thomas* 之说，意为：不易轻信的人。倍倍尔在这里换了个形容词，使他的演说增添不少妙趣。——编者注

主意。(非常正确!)但是现在科尔布来了,他在一个热情洋溢的演说中分析了据说批准预算给巴登的党带来的好处,分析了巴登党在全邦为自己争得了富有影响的地位。民族自由党人对我们推崇得很,政府也是这样,而且10年以后所有的官员都将成为社会民主党人,云云。(哄堂大笑,全场活跃)

10年前,即1901年2月间科尔布也曾预言过。当时他说,我们还要抛掉纲领中的许多累赘。他认为,纲领中的累赘就是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听啊!听啊!)和取消现行对拥有选举权的最低年龄界限,我们的纲领要求定为20岁;巴登邻近的国家瑞士,今天所有年满20岁的男子均参加地方和全国委员会的选举,他们选举学校教师、法官、政府枢密顾问,我们在纲领中同样提出了这些要求,但是所有这一切在德国还没有实现。难道我们德国人竟如此不成熟,不该拥有瑞士人已经拥有的东西吗?从20岁起就得参军服役的人,也应当有权参与决定国家的繁荣富强。

就说妇女选举权吧!如果说有哪一个要求曾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进展的话,那儿就是这项要求(非常正确!),而科尔布也经常被迫在他的报纸上报道那些同他的预言完全相反的种种成就。

冯·鲍德曼大臣什么也没有收回,他那些声明连一句话都没有收回;还是这位大臣,早在3年前就曾对当时部分资产阶级人士在复选中拥护社会民主党人而痛感惋惜。当时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在渴求实现中央党和民族自由党之间的联合以反对社会民主党。无论如何当时有人深表遗憾,不是整个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对付社会民主党人,而且甚至资产阶级也通过选举援助来支持社会民主党。(听啊!听啊!)那时这位大臣还声称,他不容忍社会民主党的官员,因此,他是绝对忠实于自己观点的。显然,巴登的同志们投票赞成预算是多么轻率啊,莫尔肯布尔同志的一个通告使我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弗兰克在纽伦堡时曾说,当时批准巴登预算的主

要动机之一是提高搬道工的薪金，可是当局不可能由于否决了预算就拒绝提高搬道工的薪金；这次提薪，搬道工拿到了1000至1400马克。现在莫尔肯布尔指出，1907年普鲁士邦议会批准了一级搬道工的薪金是1390至1790马克，二级搬道工是1090至1590马克。这是普鲁士容克的决定，远比巴登搬道工的所得为多（笑声），而1910年他们又把二级搬道工的薪金提到了1160马克。容克比巴登议会的多数和他们的政府所做的事情要多得多，可是这一点却居然成为我们的巴登的同志们批准预算的一个理由。

现在冯·鲍德曼先生说了：我们不能把社会民主运动完全说成是一种疾病；就其否定君主政体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我们虽然可以称之为空想主义，但它同时却是一个旨在提高第四等级的地位的了不起的运动，我们必须设法正确对待他们在提高群众地位方面的努力。接着就是尽人皆知的：我们的人突然改变了主意，卡尔斯卢厄的《人民之友》写道：冯·鲍德曼的态度是勇敢的，有男子汉气概，他以惯有的魄力和坦率维护了自己的立场；这再次表明，他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同他的情绪有着怎样的关系。头一天我们的人对冯·鲍德曼的立场还义愤填膺，第二天就换成了尊敬和赞赏。这种看法竟然来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简直令人不敢相信。（非常正确！）

1878年反社会党人法出笼了，两年以后，批准这个法律的第一位德意志皇帝发表演说，明确声明，对付社会民主党不仅需要采取镇压措施，还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应该对社会民主党所提要求的合理的内核予以考虑。这里，德皇于1880年所讲的不比冯·鲍德曼先生现在所讲的要多得多吗？（赞同声）对此不会有人反驳。

1884年11月24日帝国国会曾进行过一场大辩论，辩论谁是社会福利政策的创始人，而我们已故的奥艾尔同志声明说，是社会民主党！没有社会民主党就不会有改革。当资产阶级反驳这种说

法时，俾斯麦出来答辩说：假如没有社会民主党，假如不是有一些人畏惧他们的话，我们迄今在社会改革上所取得的有限进步就不可能存在。（听啊！听啊！）在此俾斯麦是积极地和直接地把社会民主党解释为社会福利政策的创始人了。然而在我们这里竟然有人说我们是一概否定，科尔布就是这样做的。

在世界上，持否定态度的人往往比所谓态度积极的工人得到的要多。（会场活跃）尖锐的批评，尖锐的对立如果合理，任何时候都有好收获，而我们的批评和对立肯定是合理的。（非常正确！）

还有1890年当朝皇帝发布的二月诏令说：“由于国际竞争给我们工人境况造成的困难，只有通过有关各国的国际谅解如果说不能克服，那也可以减少。相信其他国家政府亦打算共同探讨为提高工人的地位所应作的努力，工人们现正就这方面的努力进行国际间的调查和讨论，我希望德国同法、英等国取得联系。”云云。这里直接指的就是1889年伟大的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当时皇帝说，凡国际工人协会意欲求之的事，立法中都必须加以考虑。在另一个给贸易大臣（那时也是俾斯麦）的诏令中写道：除进一步扩大工人保险的立法以外，应该对使用妇女及少年工人的行业制度条例进行审查，而且应当考虑工人的愈来愈大的牢骚和怨言。这里讲的可是再清楚不过了，当局之所以要采取这一立法行动，是因为工人提出了这种要求，接着他还说道，在调整劳动时间的时候，要考虑到福利、健康、道德等方面的因素和永远维护对于法律上的权利平等方面的要求，这是国家权力机关的任务。难道还能找得出较之于皇帝的话里所包含的对于我们的努力所给予的更加了不起的赞赏吗？与此相对照，冯·鲍德曼的演说则是空洞无物的。在皇帝的那些诏令中还指出了对矿山和国营工厂的社会福利任务，国营工厂应该成为工厂的楷模。这一切都是当时皇帝所说的。这一切都大大超过了冯·鲍德曼的演说。埃尔茨贝格尔先生现在认为必

须起而反对冯·鲍德曼先生，如果他注意皇帝的这些言论，他恐怕就会看到，当时谈论圣上要比谈论这位巴登的大臣要多到什么程度。（非常正确！）

1900年围绕着海茵茨法我们进行了伟大的斗争。我们对这个法律的态度也是否定。（会场活跃）当时我们党团使用拖延战术挫败了这项法案：自由保守派的教授德尔布吕克^①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文艺界的普遍激愤的情绪是基础，不过足智多谋使得社会民主党党团获得了胜利。艺术、科学和教育各界必然都躲到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之下了。（听啊！听啊！）这话是出自一个头号保守派作家之口。《新苏黎世报》的一位记者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还有德累斯顿的市长博伊特勒，他是我们最狂热的敌人之一，当我作为一个县的代表进入帝国国会时，他就已经是梅拉内的市长了。1909年11月26日，在一次讨论抵制色情文学时他说：“我相信，如果把工人领袖也能争取过来支持这场斗争，那么，我们就会对（受到色情文学威胁的）各界发挥更好的影响。我可以高兴地指出，在我们采取种种措施推广好的读物时，我们已经争取到了工会领导人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听啊！听啊！）这里，我还可以引述很多有名气的敌人发表的诸如此类对社会民主党的赞誉之辞。每当讨论党的历史事件时，我时常感到惊讶，我们的作家所生产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呀（哄堂大笑），他们往往闹出一些如此巨大的错误。要纠正这些谬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做到的。几年前乌尔里希和大卫同志在黑森邦议会同敌人辩论社会民主党对社会改革的态度时，盖耶尔声称：“我们的确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我们的确投票反对过所有一切。”对此，进步党人古特弗赖施博士答辩道：“的确，社会民主

^① 马丁·弗里德里希·鲁道夫·德尔布吕克（1817—1903）——德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1876年以前是俾斯麦的亲信之一；1878—1881年为国会议员，曾反对俾斯麦的保护关税政策。——编者注

党对三个社会改革法投了反对票，但是，我投票反对一个法律与否是因为我不喜欢它呢，还是我投票反对一个法律与否是因为它对我没什么好处，这是大不相同的，社会民主党就属于上述后面一种情况。”（听啊！听啊！）无疑我们的否定产生了十分有益的效果，但是，同志们，因为竞选时还会有人向你们提出这种指责，所以我想谈下面一件事，尽管我不喜欢讲我本人：1882年，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草案，拿到国会讨论以后，班贝格议员当时就说，他不理解，为什么倍倍尔不是枢密顾问并且不赞成这个法案，要知道这个法案包括了一年前倍倍尔演说中作为法律基础所提出的全部要求。（听啊！听啊！）不过，这个法案中央党和自由党人都觉得太过分了，他们投票否决了它。（听啊！听啊！）

自由党人不单投票反对伤亡事故保险，也反对疾病保险、残废和养老保险。（听啊！听啊！）他们对国家干预不感兴趣。中央党反对残废和养老保险，投票赞成伤亡事故保险，只因为企业上的伤亡事故合作社成了该组织的基础。（听啊！听啊！）而这些政党在没有发现我们党有什么明显的矛盾的情况才会说，他们本来要采取正确的行动，可是我们错了，因为恰恰是党并不知道，他们这些说法是多么不真实，多么不合理。

谁了解近50年的历史，谁就知道，60和70年代所有资产阶级学者、整个资产阶级、各级国家政权都无一例外断然拒绝国家政权应该做些有利于工人的事，而他对许多事物的想法也持不同观点。20年以来观点的变化翻天覆地，可以说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对于国家为工人阶级应尽的义务的看法上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即社会民主党批评、否定的成就。它迫使学者、政治活动家、和议员研究这些问题。那是在1871年，年轻的国民经济学学者，其中有阿道夫·瓦格纳，同我年岁相仿，

甚至还大一点，就大胆地说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国家必须干预！而且他们特别提出法律规定十小时工作日！当时是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家奥本海姆（此人早已死了，因此不要同现在还活着的奥本海姆博士相混淆），为这些人物发明了一个名词叫“讲坛社会主义者”。那时候，这是个骂人的字眼。还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班贝尔格尔和欧根·李希特尔就进行过殊死的斗争，反对我们关于国家干预劳资社会关系的观点。李希特尔甚至一直到死都反对，虽然最后他也发现：你输了，在时间的长河中，你同你的观点一起消亡了。社会民主党现在完全有权利宣布，它使得科学界、政治活动家和议员们不得不脱离他们的旧观点。这一巨大的成就，社会民主党当之无愧。这是我们对于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采取的备受诋毁的否定态度的效果。（好得很！）

我们的纲领向现今的国家提出许多积极的要求，这哪里谈得上否定态度呢？（很对！）除去帝国国会，现在我们已逐步转向了进入邦议会、乡镇代表机构。我们在这些地方业已做出巨大成就。（很对！）不是夸耀，因为这是事实，我可以讲，全世界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像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和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暴风雨般的掌声）而我们自己队伍中的人物、巴登等地的党报却跑出来讲：整个策略必须改变。你们一味否定，我们现在必须积极工作。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放弃我们曾经为之战斗因而使我们得到发展壮大的一切，并改弦更张。我们必须放弃使我们成为今天已经拥有300多万名党员而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将要拥有400万名追随者的德国最大的政党的那些东西。我们应该无视这一切成就而突然宣布说：我们错了，我们必须改弦易辙！我们要同民族自由党人——我们的死敌结合，做点切实的工作。（大笑。说得好！）

这说的就是同盟这件事。民族自由党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民族自由党是头号阴谋家的党。(很对!)是第一个资本家的党。他们在帝国国会对一切非常法都投赞成票,他们投票赞成对亚尔萨斯—洛林实行非常法,对中央党、社会民主党人、丹麦人、波兰人等等实行非常法。今天南德民族自由党的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要求民族自由党的下届党代表大会必须重新回到海德堡声明上去,而该声明是要求对社会民主党实行非常法的。(听啊!听啊!)

这就是我们巴登朋友们的同盟者,(热烈的呼声:听啊!听啊!)你们曾经认为,投票赞成预算就可以挽救王位、祭坛和钱袋,你们可能不会把这项工作留给中央党去做的。啊,你们尽可以放心去投票反对预算。只要新德意志存在,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敢于投票反对预算,就不是绝无仅有。在文化斗争最激烈的年代,当中央党被人用鞭子和毒蝎惩罚的时候,它曾驯服地去亲吻鞭打过它的那只手,曾投票赞成过预算,甚至赞成全国预算。在德国有哪个党像波兰人那样曾不得不忍受非人的残酷迫害?而就连波兰人也吻过那只鞭打过他们的手,投票赞成过普鲁士预算,赞成过全国预算,赞成过舰队法案,赞成过所有的间接税等等。(有人喊:还赞成过金融改革!)民族自由党人是一切军事法案、形形色色舰队法案、还有各项殖民政策的辩护士。他们是间接税的爱好者。如果说他们去年在金融改革上投了反对票,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不愿支持黑蓝同盟。不过在他们的计划里却有啤酒税、烟草税和烧酒税。今天他们还在投票赞成施舍、农业关税、粮食关税、禁止进口、封锁措施。由于在法国有个疯子谋刺了共和国总统而在我国提出惩治法案的时候,正是那位已故的巴登大公站在了拥护反政变法草案的民族自由党人所进行的鼓动活动的前列。(听啊!听啊!)后来弗兰克和科尔布却还为这位大公送葬。(热烈呼喊:听啊!听啊!)这位高贵的先生对我特别钟爱。(笑声)他虽然没有称呼过我的名字,但是在霍亨特维尔和比林根我发表演说的这两个地方,每当我

演说完毕，他过后就在军事协会或借军事协会节庆的机会发表一个反对我的演说。（笑声）

这位已故的大公比德国其他的公侯们走得还要远，他是我们的自觉的敌人，不放过任何机会同我们论战，然而这并没有妨碍社会民主党人去为他送葬。（听啊！听啊！）对于社会民主党人，不管是科尔布还是弗兰克，这位大公恐怕是不会赏给这种面子的。（笑声）关于这两位同志，附带说一句，我很高兴，他们依然健在。我还可以继续历数民族自由党人的罪行。民族自由党人是普选权最坚定的敌人。在巴登，你们同民族自由党人称兄道弟，要不是中央党的帮助，你们在今天恐怕也不会有普选权，自然，中央党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得到你们的青睐，而仅仅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中央党要求普选权的时候，自由党人如果不愿堕落，自然也要提出这一要求。可是并不需要你们扭伤自己手臂的时候，你们却这么做了。（很对。南德人高声表示不同意）科尔布还嘲笑普鲁士的选举权斗争，这大概就是你们上述做法的结果。不错，你们有选举权了，而他们得到的却是耳光。（笑声）普选权这只烧好的鸽子已经飞到了你们的嘴里，你们只要坐享其成就行了。（很对！巴登人反对）还有巴伐利亚人也没费多少力气就得到了普选权。可是普鲁士的斗争却完全不同。（热烈赞同）在巴登党代表大会上有人写道，普鲁士人和萨克森人干涉巴登的关系。最强硬的分离主义者都不可能如此狂妄。（好得很）我从前就说过：普鲁士邦是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邦的东西。就其性质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再没有第二个类似普鲁士的国家了，不过，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权力，那我们就什么都有了。（很对）但是这要花费力气，花费劳动，花费汗水，必要时还要花费远比这还要多的代价。（热烈赞同）你们在南德是不能与此同日而语的，你们没有可能对这个普鲁士作出正确判断，在南方你们不理解这个容克邦的全部美妙

之处，否则科尔布也就不会对普鲁士的同志们和他们的斗争说出这些嘲讽的话了。我想，普鲁士的同志们做出了值得赞叹的成绩，（赞同声）他们还将继续做出这种成绩，然而，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敌人也完全不同于你们在南德的敌人。这的确在某种限度上对你们是有利的。这的确也使人可以理解你们就是你们。自然巴登的同志们们在预算问题上的这些变化——赞成预算几个月，然后24小时反对，然后又赞成——如果民族自由党，就是说，这个我们一直称之为旋转靶盘的党这样变来变去的话，《人民之友》大概就会写文章评论这些胆小鬼、这些可怜虫了。（好得很！）我不敢说，坚持不渝是什么。（笑声）然而现在党内有个别人开始转向民族自由主义了。近来在柏林辩论巴登事态的时候，第二选区有个发言人指出了布洛赫博士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的文章维护纯粹的民族自由主义政策时，理查·费舍^①回答说……恐怕谁都不认为他是个激进派吧（笑声。费舍高声说道：我还从来没有这个野心。）不，早先有过，可那是很久以前了。（笑声）布洛赫使我们感到不快的东西就是民族自由主义的东西。（大笑）这话说得一针见血。当时我想到，费舍还从来没有讲过这么精采的话呢。（哄堂大笑）不过我想，我们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党，如果我们当中有民族自由主义者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出去，不能留在我们党内。（好得很）此类民族自由主义者，我们这里为数不少，他们执行的是民族自由党的政策，打算把党引向民族自由党的阵营，与这个我们曾经誓不两立地斗争了几十年的党结成兄弟同盟。但是，今天我不想继续谈这个问题了，这将在某个时候继续进行讨论。

现在巴登的同志们谈起了他们实行联盟政策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巴登的同志们，我认为这些所谓的成果没有一个是唯有联盟

^① 理查·费舍(1855—1926)——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890—1893年任党的执行委员会书记，1893—1926年为国会议员。——编者注

才能取得的。(很对!)我现在十分怀疑,我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比如说是投票赞成乡镇选举法,这种选举法虽然不采用1/12,而采用1/6但它毕竟还是一种等级选举法。假如我们的同志在普鲁士邦议会投票赞成对三级选举法作这类改进,那他们就要有思想准备:柏林人会给他们吃闭门羹的。(热烈赞同)遗憾的是,人们曾经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要给党员同志吃闭门羹。然而这些如此大加赞扬的成就究竟何在?我假如让弗兰克来数说一番,他肯定做得到,并且会说得天花乱坠。据巴登的同志们讲,有成果也有搞糟了的,不过无论如何借助于民族自由党人所取得的政治上的进步还是能够举出来的。(很对)对此我们无需炫耀。因为与此同时,我们开始依附于勾结起来的敌人。说到这里,自然有人要辩驳说:事实恰恰相反,握有决定权的是我们。那就来看看吧,民族自由党人的领袖雷曼先生声明说:我们丝毫也没有背离我们的立场,可是社会民主党人却付出了巨大而惨重的牺牲。(听啊!听啊!)的确的确,我们付出了牺牲,相反民族自由党人则一点也没有放弃他们的立场。就连《科伦日报》、《斯特拉斯堡邮报》及其他民族自由党的报纸也都直率地说到这一点。自然也还有那么一些人坚持相反的看法。(弗兰克说:有几百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现实存在的事物,因此我这里要说:这并没有使我们去出卖我们的长子继承权。(很对!)

有人还说,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就会遭受巨大的危害。我一直徒然等待拿出这方面的证据,迄今我也看不出这会造成丝毫危害,然而同盟现在的景况何在呢?如果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我同资产阶级政党结了盟,我一千个相信,取胜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资产阶级政党,我们是失败者。(很对!)这是一个政治法则,凡右派同左派联合的地方,都是左派吃亏,右派得利。(的确如此!)

关于这一点,你们自己可以从被你们如此嘲讽过的毕洛夫联

盟找到再好不过的证明。这同你们在巴登所干的事完全一样，只不过前者是在大范围，后者是在小范围。（很对！）如果我同思想上和行动上必然与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对立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结成这样一个联盟，其必然的后果是什么呢？如果我同一个在原则上同我敌对的政党建立政治上的友好关系的话，那么，我必然要以不破坏联盟为准则来制定我的策略即斗争方法。（很对！）这样我就不能对什么事进行批评了，就不能再进行原则性的斗争了，否则就会伤害我的盟友。我就只好沉默，给一些事披上件仁爱的外衣，为一些不应辩解的事辩解，为不许掩饰的事加以掩饰等等。这就是联盟的必然后果，这些后果在其他方面也是明显的。（很对！）

过去工会从你们的联盟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大多数工会领袖今天所持的立场是，批准预算问题是个别邦议会的事，来自工会的同志们，我对你们说吧，同德国的党代表大会一样，总有一天你们也将被迫提出问题，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邦议会里为工会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好得很！）

问题很快就会出现。你们将不得不在你们的全体集会上，在你们的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在全德党代表大会所做的一样。例如，南德铁路联合会的一个传单写道：“邦议会闭幕了，连日来各组织递交的请愿书了结了。用了不到两个钟头。铁路工人越来越不抱什么希望，相反却更加失望。（听啊！听啊！）有关提高工资、改善经济状况、取消计件工资、增加对残废和孤寡的补助等提案，全都以财政拮据为名而遭到政府的否决。”（听啊！听啊！）柏林的科茨克同志在一次集会上讲过：“在德国任何一个邦都没有像在巴登这个模范邦那样，纺织工人联合会须为受惩处者提供如此之多的救济。”（听啊！听啊！）而大部分企业主是民族自由党人。巴登政府声称，拿不出所需的10万马克来救济已绝粮断炊的穷苦的烟草工人。今天，巴登这个小邦是烟草

工业的主要基地，报酬低微的工人就住在巴登。烟草赋税法的影响骇人听闻，今年2月份当地就有6000多名烟草工人因为这项法律而失业挨饿。（听啊！听啊！）现在还有数千人没有饭吃，因为已经几个月没有任何救济了。面对这种情况，救济那些极端贫苦的人本该是巴登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因为它也批准了这项可恶的法律。（很对！）然而它拒绝这样做，此时此刻，我们却还有人去批准这么一个政府的预算，岂非咄咄怪事。（热烈赞同）

我们来审查一下我国各邦议会的全部讨论吧，并且问一问，我们的党员同志是如何处理各自政府对待军事政策、舰队政策、殖民政政策、税收政策等等的态度的。我们在帝国国会只能抓住帝国政府，因此，你们本来有一切理由去质问各邦政府采取什么态度并最坚决地反对它们。（很对！）这些政府都投票赞成这一令人不寒而慄的财政政策并且参与炮制了它，虽然有一部分或许并不十分情愿。不过，同流合污，一块完蛋。现在竟然有那么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对一个执行同全帝国一样的政策，从而以极其残酷的方式加重贫苦劳动阶级负担的政府投信任票，这是闻所未闻的。（热烈赞同）结果今年春季巴登政府在莱茵菲尔登地区采取了什么态度呢，而在曼海姆等地又怎样呢？

不错，我们的工会本来有一切理由列出一大堆罪状，但是将来会这么做的。群众不会长期容忍下去的。Vidant consules！望执政官们注意，不要让公众事业遭到任何损害，这是在罗马适用的一句话。我要说，党员同志们一定要警惕，不要让党的领袖们给党造成任何损害。（热烈鼓掌）谁要是给党造成了损害，我们就施行民主对他表示不信任，无论什么人，对我也一样。（好得很！）你们要密切监督领袖们，还要密切监督你们的报纸编辑们。（暴风雨般的掌声）人们简直以为我们的新闻委员会在睡大觉。如果某个编辑部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增加三四十马克的支出，那就会引起不只

一次的辩论，要辩论到半夜。但是，党报是否维护党的利益，它是否向同志们报告党内冲突，像在德累斯顿所做的那样，像《前进报》编辑们当年所做的那样，像现在有关巴登人的事情那样，从而使党员同志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然而现在有些报纸却以令人愤慨的方式压制一切不合编辑部心意的东西。（有人喊道：《莱比锡人民报》就是。）在伊利阿姆有人犯罪，但是，在伊利阿姆以外所犯的罪要多出百倍，而你们在慕尼黑出了一份专刊拥护你们的批评。（笑声）

我常说：“我们的敌人直至上层人物如果不是这样愚蠢得要命，他们完全可以不像现在这样做，而用另外的方法就会使我们陷于困境。”（笑声）我的确感到高兴，他们恰好如此愚蠢。可惜的是现在社会民主党竟然有很多蠢人，十分乐意就范。（说得对！）我们的政府只需着手去寻找一个应该怎么做的办法，不过我不想给他们指明。（笑声）但是，假如还要出现骗局，我们就要讲讲这个问题了。

当然，巴塞爾曼说：“从巴塞爾曼到倍倍尔的同盟我一概不愿与闻。”同志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不仅巴塞爾曼，就连倍倍尔也不愿和这种同盟发生关系。（笑声。很好！）当瑙曼神父的口号第一次登在《柏林日报》的时候，是今年年初，出了这么一件事，在那以后不久我恰好在休息厅遇见了巴塞爾曼议员，他坐在一张桌旁。我朝他走去并且说道：“啊，尊敬的同盟兄弟，我们现在究竟情况如何呢？”（大笑）他回答说：“啊，什么话，胡闹，开玩笑！”我说道：“对，我同意！”（大笑，暴风雨般的掌声）甚至彼乌斯同志^①都认识到了，这样一种同盟是胡闹，是开玩笑。（笑声）不错，彼乌斯在他的报纸上有时乱写一些东西，常常令我毛骨悚然，可是，当他来到勃兰登堡

^① 威廉·亨利希·彼乌斯（1862—1937）——德国作家，1890年起为社会民主党人，后为修正主义者。——编者注

站在选民面前的时候，他简直是判若两人。近来，当涉及到提出他作为候选人的时候，他明显地激进了；我对他感到高兴，我希望，彼乌斯同志，你要长时间坚持这一立场。（在全体与会者的大笑声中彼乌斯走向讲台，报名要求发言）

现在有人振振有辞地说，此次巴登人的作为，在其他问题上已有先例，而且说尤其我是替罪羊，因为据说我也干过这类事。大卫同志在仔细研究了以前党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以后，曾在一篇文章或者一次演说中详细叙述过，1887年圣加伦党代表大会曾一致决议，今后选举，终选时不投自由思想党人的票。但是1890年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做法却截然相反。他说的事完全属实。在圣加伦，整整23年以前我们在国外聚会，因为我们不能在国内召开代表大会。于是提出了上述口号。当年全党遵循了我们的口号，我们一如既往信守诺言，可是进步党人却抛弃了我们。我们虽然获得了23万张选票，比1884年多39%，但所取得的席位却大为减少^①，同1907年的情况完全一样。针对进步党人的这一举动，我们提出的议案在圣加伦获得了通过。接着是1890年，这时我们一反圣加伦决议而要求全党，在终选时投左翼自由党人的票。原因是，在这期间，事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俾斯麦妄图永久保持反社会党人法，然而，反社会党人法已经不灵了。大部分资产阶级政党，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等对此大为恼火。于是我们考虑：现在在新选出的帝国国会中可能是一票定乾坤，而我们将永远受制于反社会党人法，此时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很对！）如前所述，在圣加伦我本人曾提出投弃权票的议案，现在又是我提议废除我提出的决议。（南德人有人喊道：这我们理解。）对，这一点当时得到了全党的理解。我们在哈雷开会时，我们的举动引起了一场轩然

^① 188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获选票549990张，24名议员席位，1887年获选票763128张，11名议员席位。——编者注

大波。青年派指责我们破坏了党的决议。对此我曾声明说，是的，我们犯了根本性的罪过；在我们行将做出决议的时候，从德国各地纷纷来信声明，圣加伦决议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改弦更张。随即委员会（当时委员会的成员有：奥艾尔·李卜克内西、格里伦贝格尔、辛格尔和我）便在普劳思我的寓所召开会议，根据我的建议改变了口号。那时我在申辩中强调指出，我首先提请那些义愤填膺的发言人考虑，这个问题不是原则问题，而是策略问题。（很对！）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三届党代表大会曾做过决议的、带有原则性的事情。你们（倍倍尔对着南德人说）有权不赞成，但是决议既然做出，无论如何你们也得服从。当时在富尔达我曾解释过，是否为特定情况做出个专门决议，和是否涉及到党的议会活动中一项长期规定的问题，二者是有区别的。最后在哈雷我声明过，我本来预料你们青年派会提出动议对我们投不信任票，但是你们没有这样做，那好，我现在提出议案：“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终选所做的号召符合大选当时的政治形势。党代表大会追认中央选举委员会的这一行动。”而党代大会以辉煌的多数做出了这样一个决议。但是，现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却完全是另一码事。即使下次大选，我们也要有预见地提出一个终选口号。要想提出一个适合任何情况的终选口号是办不到的。党的执行委员会一向拥有全权，根据特定情况作出不同的指示。不过，面对不明智的决议，全党也是不服从的。例如1870年，即40年前，全德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根据执委会主席施韦泽的提议决议，在任何选举中都不投所谓诚实人即我们爱森纳赫派的候选人的票，特别不投李卜克内西和我的票，但是这一决议受到了普遍抵制。那个决议说，如果进入终选的是——一名自由派和一名爱森纳赫派（诚实人），应该选自由派，如果进入终选的是——一名保守派和一名爱森纳赫派（诚实人），那就弃权。虽然决议是这么说，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却没有照办。在

1871年3月选举中，莱比锡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全体成员一致选我作他们的代表。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是这样。

还有1902年在慕尼黑作出决议之后，大选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已经决定的口号对“自由思想同盟”这个小党派是不合适的。该党候选人虽然声明投票赞成军事法案和舰队法案，但是他们也赞成维护普选权，反对非常法和粮食问题等等。于是我们想，我们是投自由思想同盟候选人的票好呢，还是通过弃权而帮助农民同盟候选人取胜？那时我们事前已经知道，假如我们赞成自由思想同盟，那么，全党就支持我们，而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的态度肯定了我的做法是正确的。可见，因为上述事件而对我们进行指责是根本不对的。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原则性的决议，在其他情况下讨论的则是策略性的决议。

不言而喻，党内同志不容许一部分党组织蔑视绝大多数通过的、对于他们在邦议会中的活动带有根本性质的决议，不容许一部分党组织无视该决议的存在而采取行动。任何政党都不容许这样，否则无论什么党都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热烈鼓掌）某些议员大概自命不凡，因而自行其是，这是不行的。（笑声）我们当中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为，一旦他们获得了席位，他们就高人一等了。（大笑并表示赞同）如果你们以为自己对党可以为所欲为，那么每个党内同志也有同样的权利。要是堂而皇之的个人自由应该决定我们往什么地方走、应该做些什么的话，要是每个人都说：决议使我感到良心上有所压抑因而不遵守决议，那么党内生活也就无从谈起了。如果一个普通党员违反了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即使比起巴登人微小得多，那他也要被清除出党，我们也要请他开路。（热烈赞同）

在北德，他们将那些没有参加公开的等级选举的党内同志开除出党了。这做得未免过分，对此我曾反对过，表示不同意。我

说，这是不合法的。小商人自己怎么能揭自己的短处呢？谁如果投票反对党，那就滚他的！但是因为人家持保留的意见就把他清除出去，这就做得过分了。话说回来，要是在北德采取了这种做法，那么我们就理解了巴登人的行为所引起的无比愤慨，也就理解为什么要求声明把他们开除出党的提案纷至沓来。他们不再属于党，因为他们破坏了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故意和党的意志背道而驰。（热烈赞同）

我毫不隐讳，我曾考虑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我也提出类似楚拜尔那样一个提案呢。（活跃）为此我拟了个草稿，我愿意告诉大家，这并非国家机密。后来我们就这件事商讨过，有人向我提出反对的理由，所以当时我说了：不，这件事我们就算了。不过我考虑：如果再出现此类事件，那就不再客气了。（热烈鼓掌）

我们可以承认，议员们是凭真诚的信仰行动的，而且事实上发生了这样的事，即巴登的党组织批准了你们所采取的步骤。这对你们是有利的。如果有人提出指控时甚至说你们背叛党，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听啊！听啊！）一个党内同志若是真的背叛了，那就不能讲宽恕，就不能同情，他就必须被清除出党。（极其热烈地表示赞同）不过，这个人或那个人揣测巴登人是叛徒，这不足为凭。要拿出证据来，要有事实。他们的行动违背了党的一项十分明确而且是三令五申的决议，仅此一件事实，还定不了叛徒。叛徒是蓄意想毁灭党，或者是希望获得好处，比如说希望当个枢密顾问什么的。（笑声）假如可以证明有这种行为，假如一个人愚不可及说出这种事，那他就是叛徒。我们当然不再需要把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像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不会将枢密顾问看作是党内同志的。（热烈赞同）

我要进一步声明，我相信我讲的这点，是代表了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们和监察委员会的，它们的全部成果都包括在我这里所提出

的决议案之中了，这就是，我们不能同意211人的补充提案。我迫切请求党内同志们，撤回有关的修正案。（掌声）

但是，我还要重申，我们的决议案中明确无误地写道：“违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是一个党内同志对党所可能犯下的最恶劣的错误之一。”现在我们又一次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几周以来党处于极度激动的状态，一定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产生出来，这以后若是再有人行动上标新立异，那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们决不能容忍，决不再客气。那么我就说：结束！谁想这么干，就让他来试试吧！

现在还有个问题，即哪些是属于党的职权，哪些不属于。我已指出过66人声明。巴伐利亚党的执行委员会在埃耳兰根也宣布过类似的东西。如果我说，奥艾尔的这个声明在慕尼黑的党的委员会内已经做过特别处理，恐怕我没有说错。其中写道，一切有关邦政策的专门问题，均应由邦地方组织独立作出规定。当时，巴伐利亚的同志们对这一声明的意义进行过争论。该声明主要包括了在纽伦堡时66人所说过的同样内容。对此我要声明，并且如有必要，我还决定将这一声明作为决议案提交给党代表大会，我声明：

“全党的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当局。作为最高当局，在党的一切事务（不论是原则性的还是策略性的或是具体性的事务）中，党代表大会均有不容置辩的权力以最终当局的身份做出最终的决断，一俟要求它这样做的时候。任何组织，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能逃避全党的党代表大会这种最终当局的决断。党代表大会这一权威性的地位是从下述事实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即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统一的党，它有统一的组织、共同的纲领和共同的目标。”（热烈赞同）

现在我愿意听听，是否有人反对这一立场并且是否有人要说：不，我们不承认党代表大会拥有这样的地位，它没有这样的权力！

那好，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假如德国的党代表大会因为在罗伊斯、施赖茨、洛本施泰因、布克堡、卢贝克、巴伐利亚、巴登、维尔滕堡等地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改变作法，从而降低自己的权威的话，那简直就是怪事了。德国四分五裂的这种可悲景象，仍然存在，但是，每个邦国，每座小城市都要有权独断地最终决断它应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即使那是如此之荒诞，不，这是不行的。（很对！）我们一定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的最终结果会是各行其是。这样党就会毁灭。我开诚布公地说吧，你们南德人是相当出色的，甚至在卡普亚，（笑声）或许我要在卡普亚度过我的有生之年，（听啊！听啊！）不过我不会成为卡普亚人。（热烈鼓掌）你们的心肠过于软，你们太软弱，你们南德人太容易被人摆弄。（奥艾尔喊道：很对！笑声）但是我们需要严厉、正直、腰杆硬的男子汉。我们需要行动果敢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拥护什么并且也据此而行动，他们不使敌人对于我们的为人感到怀疑。

当前教皇至上主义在巴伐利亚很猖獗，政府完全为教皇至上派所迷惑。如果在巴伐利亚的议会党团内有一小部分人，在这种情况下拥护巴伐利亚政府批准预算，如果发生这样的事，那就不是开玩笑。那我们就需要进行监督了。假如我们放手不管，那党就糟了，党就要身受其害。（热烈赞同）

现在还出现了另外的令人十分遗憾的事。在已经开展起来的激动的斗争中，巴登人说了：现在干涉我们事务的不仅有普鲁士人和萨克森人，而且还有外国人罗莎·卢森堡和潘涅库克。这便是巴登人的国际主义立场。罗莎·卢森堡像奥艾尔一样当然是德国人，潘涅库克是外国人，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免去了他的职务。可是现在普福尔茨海姆的《自由新闻》来了，举出在不来梅参加党代会的4位代表并用黑体字印上潘涅库克的名字。（听啊！听啊！）于是就干下了告密的勾当。这是卑鄙可耻的，是不该发生的。就连

科尔布也支持类似的意见，他也反对外国人。那首歌是这样写的：

“外国人，异邦人，
他们经常在我们中间
播种反叛的精神；
这类罪人，谢天谢地，
很少是本国臣民。” （笑声）

这就是来自巴登的声音。巴登人被教养得过于驯服，你们正是教育你们的人驯服。现在我只提卡尔斯卢厄刊载的一篇有关歌德的文章。我要声明一句，科尔布对此没有过错。不过这涉及到一个协会，在那里教士、伪君子 and 民族自由党人，可惜还有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进行协作。一家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怎么能发表这样的评论文章呢？与慷慨激昂地反对党内同志进行了干涉的同时，今年5月，罗马的费里在意大利国王面前的表现令人十分惊讶，当时科尔布曾经写道：“任何人都有权自我嘲弄，只要他愿意，但是却无权嘲弄他的党。”我希望我们大家始终都要注意这一点，尤其是巴登人。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来不得搞那种腐败的妥协的时代。阶级矛盾并没有缓和，而是变得更加尖锐。我们正在迎接十分严峻时刻的到来。下次选举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将拭目以待。如果1912年掀起欧洲战争的风暴，那时大家会看到，我们可能面临怎样的局面和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活跃）肯定完全不能采取现在在巴登所采取的态度。（奥艾尔喊道：那时我们还要在党内！）我当然也愿意这样。你们是否认为，我想把你们清除出去？然而你们的策略正激起义愤，它有碍于下决心、作好战斗准备，有碍于以坚定的步伐前进。我们应该整队行进，不要有什么越轨行动。这就是我讲这番话要表达的意思。（热烈鼓掌）

党也不容许打零工。（巴登人喊道：我们可没有这么做！）完

全没有必要地去参加隆重的邦议会闭幕，这难道不是打零工吗？你们这样做，卡尔斯卢厄宫里的人想必给以好评了吧？可是，要知道他们也不喜欢有越轨行动的人！你们既没讨得我们的喜欢，也没有讨得他们的喜欢。（热烈赞同）你们两头落空。（热烈赞同。弗兰克表示反对）是的，亲爱的弗兰克同志！以你们的智慧，以你们政治家的聪明，以你们的外交手腕，你们达到的就是这个，你们的外交手腕不明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极其热烈的赞同）党内同志还从来没有像你们这样在敌人面前出过丑。（极其热烈的赞同）今天在卡尔斯卢厄宫将举行宫廷谒见，庆祝大公夫妇结婚纪念日。我感到高兴的是，由议会党团选派的代表盖斯和普法伊夫勒在这里在我们中间。（笑声）曼海姆的党内同志恐怕考虑过了：我们派他们去马格德堡，到那里他们就逃出难堪处境了！（大笑）巴登邦议会议事规程第74条现在究竟情况如何呢？邦议会恐怕会强迫你们共同组成代表团。（弗兰克喊道：但是谁也没有去！）这一点即使在卡尔斯卢厄宫里现在也会看到。第74条束缚着你们，你们说，不过我感到高兴，因为你们并没有被束缚住；我同样高兴的是，你们至少曾经愿意反对预算达24小时之久。（笑声）于是你们就承认了，我们反对预算是行得通的。（很对！）你们自己就证明了这一点，你们今后想讲什么就可以讲什么。事实是，你们有24小时之久是下了决心拒绝预算的，这一事实就把你们投票赞成预算的全部理由都推翻了。（热烈的喊声：很对！）

在卡尔斯卢厄，宫廷人士和政府人士肯定嘲笑了你们不去参加宫廷庆典所要的滑头，在卡尔斯卢厄他们还在嘲笑某些事。（笑声）科尔布在奥芬巴赫反复声明：不要再迫使我多说话了吧，这样会对我们有害！可是他在那里讲了那么多本来不该讲的话，以致我想，这样一个滑头我还没见过（笑声），他所做的是他本来想做而且要做的相反的事。

不，同志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手挽手、肩并肩，紧密团结向前走。（热烈赞同）如果有人竟敢狂妄地说，我走我自己的路，不能接受你们的决议，——那好，就请便吧。（暴风雨般的掌声）

党的历史上有过一些类似的情况。我提请大家回顾一下勃廖艾尔，此人是1875年时根本不同意合并的，结果退出了党，数年间和他那一小撮人像路旁的野花无声无息无人理睬。哈塞尔曼也曾试图分裂党，还有莫斯特，他们都被清除出党了，而党却在继续前进。（南德人喊道：难道我们是想把党炸毁吗？）

我请你们听我讲的话。假如有那么一个人想这么干，那我就提醒他想一想这些历史事件，而假如有更多的人想这么干，即使是我们当中最有威望的人，假如是我，那很快我也就会成为一个光杆司令。（很对！）我们只有本着党的思想和精神去工作和活动，我们才能保持作领袖的地位。（讲得好！）唯其如此，也才能给予我们这种地位。我们不是在领导，我们与其说在领导，不如说在被推着走，而情况就是如此。因为假若有时完全依赖领袖的话，那我们就会迷路。（很对！）不过我在使自己适应这一角色，尽管我也干过一些蠢事。（笑声！）但是我一旦认识到了，我是承认的。（赞同声。笑声）这是你们和我不同的地方，我还注意了，在类似的事情上不再犯第二次错误。现在我们必须团结前进，敢于迎接到来的事变，不要向后看，而要向前看，并且要勇往直前，决不退缩。（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文选》1981年
法兰克福版第2卷第216—239页。

（王宏道译）

约翰·巴普提斯特·冯·施韦泽*

(1911年)

我把关于施韦泽的一章编入了《我的一生》第2卷中，这是我履行的历史的和个人的义务。这一章的文字比《我的一生》中其他任何一章都更使我动心。的确，能够撰写关于施韦泽的论述，以便说清李卜克内西和我本人在同他进行的长达6年之久的斗争中的态度，是我内心压倒一切的愿望，首先，梅林在他的《社会民主党史》中所说的话也迫使我不得不这么做。

我认为，对这些斗争的研究并不等于对施韦泽本人进行一番历史的叙述，我不想这么做；而是要描述促使施韦泽同我们对立的那些原因和理由。我本来不想把他置于尴尬的境地，致使他在我起而抨击他的地方无言以对。

梅林首先认为，我的所谓道德严肃论导致了我对施韦泽的错误评价，这种所谓的道义严肃论使我几乎全然根据这种观点来评价施韦泽现有性格的无可否认的缺陷，因此我必然对施韦泽产生错误的看法。

梅林的上述意见是错误的。我不是道德严肃论者，尽管梅林认为我的书就是铁证。我如果真是那样的人，那么想必我就要使拉萨尔的道德品质蒙受同样的评价。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我在笔

* 本文最初发表在《新时代》第30年卷(1911—1912)第1卷第180—187页。

——编者注

头上或口头上关于拉萨尔说过一句同这种评价相一致的话。我甚至也许无法排除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因为他从来也不是圣人、也不希望如此。恩格斯在熟视者中间关于此人的恶作剧的饶有趣味的讲述，我至今犹存美好的回忆。

我对施韦泽同性恋的嗜好本可不置一词，假如他在搞同性恋时也能考虑一下，我们在各种情况下、不论想在任何社会状态下生活，都必须顾全的东西的话。应该澄清他的上述表现在工人队伍内外造成的影响。我对同性恋的看法相当开放，下面的事实可以为我证明这一点，几年前，我曾动议取消帝国刑法典第1—5款的某些规定，帝国国会为此专门召集了秘密会议讨论我的建议。这能说我是替道德严肃论者说话的吗？

梅林指出，我在同白拉克通信中评价了一位《人民国家报》的编辑，但梅林也只是采用不向《新时代》读者透露我评价有关人物场合的手法，才以上述指责证明我是道德严肃论者的。我对有关人物的指责不在于他的行为放荡不羁，而在于他对所负的编辑职责掉以轻心，但对胡闹却有足够的时间，他的胡作非为使我们陷于尴尬境地。不论李卜克内西对其人有何想法，他在致信白拉克的同时也来信告诉我说：“我叫编辑事务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我要校对所有稿件，编辑善于虚设。他总是称病——不过他的病确也来得奇怪，工作一完，病也好了，而工作一来，就又病了。”

我希望，我在处理编辑事件时采用的“严肃论”在党内永远有效。在那个时代，我们有三倍的理由这样做，因为当时我们还是个很贫困的党。如果说一位编辑每月75马克（梅林说是45马克）不是个人花销，那么像每月要拿150马克养活一大家子人的李卜克内西又该怎么办呢？他的工资在6年以后即1875年才有了稍许的提高。那是具有献身精神的英雄主义。

要不是梅林试图拿编辑事件导演一场打击我的特殊胜利，我

决不想谈论对我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事情。

施韦泽的事情有所不同。我对他提出控告乃是出于这样的观点，即他的道德品质以及他生活的物质基础同他要索还的政治角色是截然矛盾的，而他扮演这一角色的方式也必然同我们相抵触。

施韦泽暧昧的政治态度由来已久。举例来说，1862年任法兰克福德国射击大会名誉主席的冯·科堡公爵同施韦泽过从甚密，施当时是德国射击同盟高级委员会和大会委员会的成员。冯·科堡公爵在回忆录第3卷第86页这样写道：

“这个(激进)政党的首领是施韦泽和维尔特。尽管传说前者受到各方的怀疑，认为似乎他在埃中海姆大街(联邦议会宫即设于此，奥地利掌握着它的主席团)和社会民主党成员处境不佳，我不愿对此做任何评价，但却有为数众多的人袒护他。”

早在故乡期间，他就以政治暧昧著称。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道德不逞之徒，这些人就在法兰克福射击大会结束不久的曼海姆皇宫花园事件^①和从射击大会出纳处侵吞2600古尔登事件中露了脸。一个带有如此劣迹的人千方百计要混入党的领导层，但却招致了最大的不信任。而他生平中的类似事件则更加剧了这种不信任感。柏林的显贵(1865年春)表示愿意负担《社会民主党人报》每日出版所需的资金，以此表明他们对维持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特殊兴趣。他对自己的朋友和同伙霍夫施泰滕^②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办的报刊耗用了朋友的金钱，然后就像对待被榨干了汁液的柠檬一样把朋友抛在路边。他从巴门—爱北斐特的保守派领导人冯·库塞罗夫手中接受了400塔勒，时隔一年这件事就被他的党内同志偶然获悉了。他为了私人目的又一次把手伸进了全德工

① 指施韦泽对一个儿童犯了有伤风化的罪行。——编者注

② 约翰·巴普提斯特·霍夫施泰滕(死于1887年)——巴伐利亚军官，拉萨尔分子，《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发行人和编辑之一。——编者注

人联合会出纳处的钱柜，这种事只有道德败坏的人才能干得出来。

道德败坏和政治错误相得益彰，上文列举的道德过失就同一部分政治错误有关。

施韦泽归依俾斯麦始于1864年10月13日他在莱比锡的演说，适逢拉萨尔与世长辞。演说的题目叫作《进步党是停滞不前的支持者》，其中提出，自由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保守派和俾斯麦是对工人阶级心怀友善的政治因素。这个演说的基本思想构成了从那时起始的施韦泽政治行动的纲领，它不时被插曲般的激进的不完全意欲所打断，这种不完全意欲则是他的敌人的抨击和全德工人联合会部分成员日益觉醒的怀疑情绪造成的结果。梅林说，成为我的老生常谈的关于施韦泽从1869年夏至1871年春的政治活动情况，基本上是可信的。此话不错。但我要指出的是，施韦泽从1869年夏至1871年春的政治活动和此前的没有什么两样。他始终顽固地坚持1864年至1871年的政策，除了上面提到的特殊场合之外。

梅林在其第三篇有关我的回忆录第二卷的文章中，谈到了我在北德意志帝国国会从事的议会活动：

“他在就任议员后的首次演说中一下子就触到了俾斯麦政策的痛处，他称其为大普鲁士的。他说，北德意志联邦只是一个大普鲁士附以若干仆从邦，这些仆从邦的政府无非是普鲁士国王的总督。出于不损害北德意志联邦的目的，俾斯麦拒绝南德各邦加入这个同盟，尽管同这些邦缔结的军事条约规定，德国的军事力量在战时统一由普鲁士掌握，也就是说无须害怕法国的异议。”

梅林接着又说：“倍倍尔以此恰如其份地描述了俾斯麦执行的政策，就算他不是大普鲁士容克，而仅仅是在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国务活动家。”

我同意上述对我的政治态度的评语，但在这里我要强调指出，

施韦泽的政策同我的和李卜克内西的政策是大相径庭的，因为施韦泽支持大普鲁士容克俾斯麦的政策，也就是梅林在上文尖锐谴责的那个政策。

施韦泽同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恰恰在于，我们主张的是民主主义的政策，但施韦泽却主张大普鲁士政策，而我们的责任就在于坚决反对这种政策。人们相信，绝顶聪明的施韦泽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俾斯麦政策的大普鲁士性质，而《社会民主党人报》却连篇累牍地表示赞同（我的回忆录中谈到了其中的一部分），施韦泽则异常狡猾地为之辩解。

我在论述施韦泽的文章中，列举了不少说明他进行叛卖勾当的证据。譬如，1865年刊出了5篇有关俾斯麦的文章，结果使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等人辞去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人的职务。报纸刊登了特尔克向威廉国王祝寿的宣传文章。1865年夏，施韦泽又同高层保守党人、同普鲁士阿尔勃莱希特亲王建立了联系，不过后者同纯政治关系有所区别。最说明问题的是，1866年春，施韦泽在被监禁期获得4个月的假期，据说是为了调养元气，其实是为俾斯麦的政策进行广泛的新闻宣传活动，其间警方和法院对他从事的政治活动不闻不问。此外，1868年秋，他向柏林警察局拱手交出了全德工人联合会，1869年1月又从监禁中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假期，目的是筹划针对我们的反宣传，并且于3月底在巴门—爱北斐特召集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在这些活动中，他独具奇特的预知天赋，在筹划停当之后，他于2月18日又被捕入狱，他早就知道，帝国国会的会议定于3月4日开幕，届时他作为帝国国会议员又会被假释在外，以便参加巴门—爱北斐特的代表大会，如此等等，而这些举动同当时乃至今天都是普鲁士政治主张的帝国宪法第51款所列的观点是相矛盾的。对这些怪事，梅林以及其他与梅林对施韦泽的看法抱有同感的人都无法令

人信服地加以说明。梅林认为，已经找到充分证明，在1867年初举行爱北斐特帝国国会选举期间，施韦泽没有依附俾斯麦。

让我们来看看是否果真如此。梅林承认，在巴门—爱北斐特对俾斯麦和福尔肯贝克进行复选时，施韦泽毫不含糊地建议他的选民投俾斯麦的票，俾斯麦能够当选其实是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帮了大忙。我倒不认为这是施韦泽恶行的新证据，而是一种为他自己和他的派别着想的、相当巧妙的战术。他说，俾斯麦在叶里霍夫选区的主要选举中已经当选，并且已经对那里的选举结果表示同意，因此，第二次选举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但他一定希望看到福尔肯贝克当选，因为“他是进步党那些已经准备投靠政府的领导人中间最有影响的人”。

俾斯麦对福尔肯贝克当选与否是不是如此关注，这姑且不说。但在这之前，福尔肯贝克的同志如卜尼格先、米凯尔、拉斯克尔、西姆桑、特韦斯顿以及新成立的民族自由党其他一些著名领袖已经当选，而福尔肯贝克就属于其中的一员。因此，他无论怎样都无所谓。但事实却是，俾斯麦无须期待福尔肯贝克在巴门—爱北斐特当选，因为后者就像俾斯麦在叶里霍夫的情形一样，已经在诺伊哈尔登斯累本—沃尔米尔施泰特当选。

这样一来，梅林用来诋毁我判断事物方法的引证，就出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漏洞。

如果说俾斯麦尽管如此没有接受在巴门—爱北斐特的选举（虽说他在叶里霍夫曾辞去过议员职务，但在那里肯定还要选出保守党的第二位议员），那么就是从表面来看，也是出于对施韦泽的感谢，因为施韦泽在1866年春季和夏季的在押体假期间曾支持过俾斯麦的政策。俾斯麦曾希望在巴门—爱北斐特的补选中选上施韦泽，果真如此，他就会成为我在帝国国会中的冤家对头。

大家知道，施韦泽在补选中名落孙山。但是，却在1867年的选

举中获胜，正如他自己招供的，那是保守党人在复选中鼎力相助的结果，同时施韦泽也从库塞罗夫处得到了上面提到的400塔勒。假如施韦泽的确立足于民主的根基上，那他既不可能得到金钱也决不能得到选举方面的帮助。

我再来谈一谈施韦泽的享乐嗜好。对他这样一个浪荡子来说，满足享乐的欲望成了他以俾斯麦大普鲁士政策的斗士自居的头等刺激物。梅林说，如果施韦泽的一位朋友，譬如保尔·林达乌否认其人有行为放荡的毛病，那么我指控的基础就靠不住了。他就像古斯达夫·迈耶尔一样，此人绝望地寻找一个能够否定指控施韦泽是享乐分子的大名鼎鼎的人，于是这位权威就发现了保尔·林达乌。当李卜克内西和我本人于1869年3月底在爱北斐特访问保尔·林达乌时，曾问过他何时担任《爱北斐特日报》总编，当时他对施韦泽的评论听起来是不怎么和善的。作为有能力论断施韦泽生活方式的人，我要援引冯·霍夫施泰滕的话，此人在提到施韦泽时称他挥金如上，至于钱的来路，他也不知道。第二个证人就是我本人。我曾应施韦泽之邀同乘一辆豪华的配有两名着金色边饰服装的侍从的马车，这是施韦泽至少在帝国国会开会期间租用的。梅林也一定会承认，对一位一文不名的工人领袖来说，这是罕见的挥霍享乐。

此外，我在书中还提到了党内同志有关施韦泽行径的见闻，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的陈述。说不定当年知道施韦泽不时在最知己的小圈子里举行香槟酒会底细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某个成员，现在还活在世上哩！

假如施韦泽的生活方式不同下述问题纠缠不清，本来是无所谓的事情：他用以维持这种生活方式的钱是哪里来的；还有，同以弥补《社会民主党人报》经常出现的巨额亏损的款项又是从哪里来的，他自己承认，该报从来没有出现过收支相抵的情况，却需要付

出巨大的牺牲。

现在让我来提几个问题：

有人说，俾斯麦收买过红色革命者奥古斯特·布拉斯^①、善于网罗洛塔尔·布赫尔^②并试图通过他争取卡尔·马克思当《国家通报》的撰稿人，可就是这个俾斯麦面对施韦泽的优良品行却望而却步，并且也没有收买他的意思，这样的话有人相信吗？提出问题也就等于否定了问题。更令俾斯麦感兴趣的难道不是收买施韦泽而非马克思吗？因为施韦泽就住在国内，而且身居唯一的、1866年以前还是很小的、统一的工人政党的领导地位。如果全德工人联合会副主席、今天还健在的达梅尔博士劝弗·威·弗里茨舍，他应当在萨克森进行的鼓动时除了主张拉萨尔提出的国家资助生产合作社外，还要主张以普鲁士为首，并把大会的新闻报道直呈俾斯麦，那么，由施韦泽为俾斯麦政策进行的新闻宣传活动对后者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更高一等的价值。而如果施韦泽同时也宣传社会主义、促使工人脱离资产阶级并以此恐吓后者，如果他另外还善于叫工人阶级对俾斯麦的政策感觉兴趣，那么俾斯麦对一项促使资产阶级同他亲近并摧毁资产阶级反对他的欲望的策略会表示欢迎的，这一手对他来说价值万金。

那么还有什么能够促使施韦泽在俾斯麦面前扮演严肃论者的角色呢？没有，绝对没有！他在金钱上的处世原则就是韦斯帕西安^③的原则：钱是没有臭味的。我已经说过，只要有钱他就拿，管它

① 奥古斯特·布拉斯（1818—1876）——德国新闻工作者，曾参加过德国1848—1849年的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9—1860年是《新瑞士报》的主编，后为民族自由党人，拥护俾斯麦。——编者注

② 洛塔尔·布赫尔（1817—1892）——普鲁士官员、曾参加过德国1818—1849年革命，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拥护俾斯麦。——编者注

③ 韦斯帕西安（69—79）——古罗马皇帝，他的名言是：钱是没有臭味的。——编者注

来自贫苦工人的口袋，还是饱食终日的资产者，还是正人君子之手。钱是没有臭味的！

在他的生平中没有任何老实人的特点，相反，许多事实表明，他的良心既不考虑道义，也不顾及政治。他的传记作者古斯塔夫·迈耶尔对施韦泽是毫无偏见的，我要说，他甚至对施韦泽是推崇备至的。但连他也不得不承认：施韦泽是个没有性格的人，他是个雇佣兵的小头目。

人们再不能对一位公职人员作出比这更糟糕的评语了。当然，这个评语并不妨碍迈耶尔认为这位雇佣兵头目对俾斯麦是忠心的，因为我说不出来施韦泽为自己的差事接受的金钱的数目，至于原因，我在我的书中已经作了充分的陈述。

同样，人们也不应忽视他的拥护者们在他们生涯终了之际对这位人物的评语，他们对他唱过多年的赞歌，并且不能说是费力不讨好的，因为他们仅仅是按照自己深化的认识和见解办事，他们失去了对那个因其名誉扫地而被抛弃的人的一切信仰。这是我党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悲剧事件。

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来说，施韦泽的教育结果是什么呢？

当他离开联合会时，那里正盛行着对拉萨尔的崇拜和狂热。众所周知，这种现象表现得极为强烈，当经过了历时4年的斗争两大派实现合并的时候，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相当一部分成员中对合并这件事在联合会内部众说纷纭，简直有酿成分裂的危险，而在合并这件事上人们倒是应该感谢国家权力机关，因为它在外部施加了种种压力，而且对两派合并倒也热心和积极的。当时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纲领，（如果说我们从一开始本不想怀疑合并的话）绝大部分是拉萨尔主义者的思想，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新时代》上、恩格斯在致我的信（发表在我写的回忆录中）里都曾经有过详尽的论述。据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拉萨尔主义在哥达取得了

胜利,也就是说,是采用施韦泽教育方法的结果。

我尤其要向我们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那些陷入催眠狂喜的人提起这一点,因为(他们说)施韦泽在当时也许是唯一理解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发表了几篇就是最严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挑不出毛病的科学著作的德国党的同志。

让人们去夸奖施韦泽是理论家或理论普及家吧!我不去说东道西。但作为工人政党的领袖,他则是一个堕落者,他就是利用那些跟着他跑的工人为了他的一己之私去为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政治目的卖力。他本来就是害群之马,我们必须同他斗争。他失败了,胜利者是我们。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文选》1981年
法兰克福版第2卷第246—252页。

(张念东译)

为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序言*

(1911年)

1895年春天这本书的第一版问世,那正是叫嚣对社会民主党采取新的强制措施的时候,自那以来德国的内部发展经历了若干重大的变革。政治性质的变革很小,而经济性质的变革则比较重要。

资本集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大银行的建立和工业的集中,表现为辛迪加和托拉斯。这种发展自那时以来取得了料想不到的进步。同这些进步相对的另一极端就是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力量也在增长。1895年和1907年的就业人数和自1893年以来社会民主党选民队伍在历届帝国国会选举中的增长,就是这两方面进步在数量上的显示。要把这两方面的结果加以比较,这样才会弄清随着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作为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基础的广大民众的政治感觉和思维也在变化,而且在向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方面变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同社会民主党的增长是互相制约的,它们是相互补充的。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国务活动家、经济政治家和人民的代表们,如果他们忽视这一点,就是不称职的人,就无法尽到自己的职责。

* 1911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在柏林出新版时,倍倍尔于同年2月19日写了这篇序言,发表在该著作的第3—7页上。——编者注

本文打算用从业人数统计的结果来探讨经济上的变革，这也许会使我离题过远。不过，凡是认识到这些变化的人，都不会否认的。但身居要职，领导各部门的人，却始终硬说没有看出社会经济的发展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什么因果关系，而凡是有思想、肯钻研的人都会认识到这种关系的。

诚然，社会民主党的增长不仅仅取决于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是从以下意义上来说的，即决定这种增长快慢的还有其他从属原因，不过增长是无疑的。如果说社会民主党在1893年得票178.7万张，1898年得票210万张，1903年300万张，1907年326万张，那么这个肤浅的一瞥就表明，随着选举周期的更替选票的增长有何等根本不同。1903年至1907年的增长很小，究其原因在于高压和恐吓。1907年帝国、邦和地区当局与统治阶级串通一气，形成了对社会民主党的坚固敌垒，好像要防止面临的社会颠覆似的。这个斗争是党进行的英勇斗争之一。不顾敌人的一致反对，党的选票反而增长，这是个伟大的成功。因为评价党的威力的重心不在于取决偶然的席位多少，而在于得票的数量，它显示了党在群众中的基础和党的拥护者的发展方向。

毫不奇怪，社会民主党不可避免的发展壮大，吓坏了一心要维护资产阶级制度的敌人们。社会在向完善化前进的同时，也在自身制造了必然成为社会死敌的那些因素。但如果说在行将衰亡的罗马帝国统治阶级尚不愿容忍基督徒，那么20世纪的资产阶级世界里的统治阶级就更难以容忍社会民主党的存在了。基督徒到后来为了自己的宗教原则而放弃了社会要求，而不代表任何宗教原则的社会民主党却代表着政治和社会要求，它是不能放弃这些要求的，假如它不自暴自弃的话。

但是，使党应运而生的原因，同样也使党不可能被镇压下去，因为消除党存在的原因，那就等于取消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

主义社会制度，也就等于宣布自我毁灭，这是社会力所不及的。

因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肯定是要失败的；同样，防止颠覆法案，如果说其拥护者在1895年真的能够就其中要表达的原则彼此达成谅解的话，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对可恨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迫害本能却深深扎根于统治阶级的本质之中。今天的统治阶级一旦自感形势紧迫，或者某些事件似乎向他们预示着成功，他们便不顾自己在自身发展进程中积累的一切历史经验而一再诉诸暴力。他自感无力，因此暴力就成了他们唯一可以信赖的手段。1910年9月和10月，由柏林莫阿比特区的停工事件爆发的骚乱，最有力地证明了这种迫害本能是根深蒂固的。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煽动者和胆小鬼来说，这些骚乱成了社会民主党采取强化立法措施的借口，以便拯救受到该党威胁的社会。当然，关于社会民主党与上述骚乱有牵连的无耻谰言纯系臆造，是无法提出证据的，甚至法庭都确认没有这样的事实。但是，为自身统治操心的统治阶级，出于对一个既恨又怕的党采取暴力措施的渴望而竭尽造谣之能事。早在1894年就已经表现出这种苗头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当时行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卡诺^①一事无关，就像当时那些要求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实行防止颠覆法案的人是无辜的一样。1910年在莫阿比特区发生的事件也是如此。但是，崇拜金元上帝的人也会巧妙地利用一切事件为自己服务。

上述案件的结局是使要对社会民主党采取非常措施的叫嚣喧闹一时，因为在那些案件中，以某种方式被捆在耻辱柱上当众出丑的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以警察为主要支柱的制度，在一个文明的国家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类事件。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一遇机

^① 玛丽·弗朗斯瓦·萨迪·卡诺(1837—1894)——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历任部长，共和国总统，1894年被无政府主义者卡泽里奥刺杀。——编者注

会又提出严格立法的要求，因为压迫者的黑心使他们自己坐无宁日。他们看到，在他们自己横行擅权的对面，一股日渐强大的势力正在兴起，他们害怕这股势力取胜。这是一个古老的历史经验：在包含着一切经济和文化状况变革的历史时期，新鲜事物在所有地方蓬勃兴起，统治阶级会轻易丧命，他们的举动正是他们要达到的目标的反面。他们难以平静下来，倒是心神不安；他们难以镇压他们希望消灭的运动，反而助长了它，并且加速了他们本想加以阻挠的胜利。

在下面这个问题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自己的观念估计有误。党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圈子里没有出现他认为应该出现的那种增长。他没有看到，大庄园主阶层和对德国经济落后感兴趣的阶层对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开展的宣传鼓动。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就是落后的、不发达经济状况的产物，他们反倒会受大庄园主和促退派的所谓拯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花言巧语的迷惑，并且驯服地为他们的竞选出力。失望情绪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经开始出现，如果时代的征象没有欺骗我们的话。在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逐年取得重大的进展，致使顽固不化的小资产阶级和小农也不能对这种现象及其影响充耳不闻了。他们切身感到了这一切。上述阶层思维迟钝，他们首先要摆脱各式各样的偏见，但他们在思索着。如果说社会民主党取得的飞速进展由于上述原因而落后于恩格斯以及同他一起的其他人的期望，那么未来将补偿既往所没有取得的东西。

可以预见，党在下届帝国国会选举中会获得比以往更多的选票。实际得票数会超过350万张，因为1907年选举的不利形势使我们至少损失了25万张选票，而在正常选举的情况下我们肯定会获得比这个数目还要多的选票。这样一来，也许有人要问：到下届选举以前，小资产阶级和小农阶层的思想情绪会出现多大的变化呢。

另外，随着工人选民的增多，社会民主党的得票数也会相应地大幅度提高，这样一来，就会给政府和统治阶级提出一个怎么办的问題。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而大伤脑筋，这不是我们的任务。那么也可能会出现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将迫使一种像德意志民族那样的伟大、众多和智慧的民族的发展采取新的道路，不管统治阶级愿意还是不愿意。

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准绳已经有了：今后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它都坚持以往的既定立场，不受别人的欺骗，也不会走上令人疑惑的歧途；社会民主党没有理由在自己的敌人面前因受人唆使而采取轻率举动和让别人拍手称快的暴力儿戏。我们强烈的意识到，整个历史的发展对党有利，党通过它强大的基础威力、通过它对正义和理性的要求而成为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对崭新的社会制度感兴趣者的团结核心，他们最终会成为绝大多数的人，党可以坚定而乐观地期待着未来。

我们从伟大的、科学的先行者的学说中汲取的信念是现代工人阶级肩负着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历史的使命，这保证了党会有一个造福全人类的未来。

译自《奥古斯特·倍倍尔文选》1981年
法兰克福版第2卷第241—244页。

（张念东译）

人名索引

A

- 阿德勒,维克多(Adler,Victor)——第387、389、551—553、558、610页。
- 阿尔勃莱希特(Albrecht)——第655页。
- 阿芬那留斯, E.(Avenarius,E.)——第219页。
- 阿克莱,理查(Arkwright,Richard)——第145页。
- 阿奎那,托马斯(Aguinas,Thomao)——第478页。
- 阿提密斯(Artemis)——第86页。
- 埃尔哈特,弗兰茨·约瑟夫(Ehrhart,Franz Joseph)——第542页。
- 埃尔姆·冯(Erm.von)——第566、567页。
- 埃尔茨贝格尔(Erzberger)——第627、631页。
-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Johann Georg)——第60、61、66页。
- 埃西(Isis)——第86页。
- 爱德华兹(Edwards)——第387页。
- 埃尔威,爱德华(Herve,Edouard)——第615—617页。
- 艾拉斯,沃尔夫冈(Eras,Wolfgang)——第417页。
- 艾谢尔尔多夫(Eichelsdörfer)——第2页。
- 艾希霍夫,卡尔·威廉(Eichhoff,Karl Wilhelm)——第76、78页。
- 安妮(Annie)——第377页。
- 安泰(Antäus)——第296页。
- 安特里克,奥托(Antrick,Otto)——第547页。
- 安策尔,约翰·巴普蒂斯特·冯(Anzer,Johann Baptist von)——第441—444页。
- 奥艾尔,伊格纳茨(Auer,Ignaz)——第291、352、362、395、543、546、613、630、643、646—648页。
- 奥本海姆,弗兰兹(Oppenheimer,Franz)——第397页。
- 奥本海姆,亨利希·伯恩哈特(Oppenheim,Heinrich Bernhard)——第634页。

奥尔巴赫(Auerbach)——第272、273、289、293、303页。

奥古斯丁(Augustin)——第478、482页。

奥赛烈司(Osiris)——第85页。

B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 Grachus)——第180页。

巴赫姆,卡尔·约瑟夫·艾米尔(Bachem, Karl Joseph Emil)——第19、312、316、319—326、328、340、343、345、347、349、351—356、358—363、365、371、372、376、377、581页。

巴霍芬,约翰,雅科布(Bachofen, Johann Jakob)——第141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第62、131页。

巴京斯基,理查(Baginski, Richard)——第280、281页。

巴列斯特雷姆(Ballestrem)——第517、518页。

巴塞爾曼,弗里德里希·丹尼尔(Bassermann, Friedrich Daniel)——第641页。

白拉克,威廉(Braeke, Wilhelm)——第11、163、425、427、428、652页。

班贝尔格尔,路德维希(Bamberger, Ludwig)——第365、366、633、634页。

邦霍尔斯特,莱昂哈德·冯(Bonhorst, Leonhard von)——第425页。

薄勒尔(Borel)——第138页。

保罗三世(Paul III)——第92页。

保罗四世(Paul IV)——第92页。

保路斯,亨利希·埃伯哈德·哥特洛布(Paulus, Heinrich Eberhard Gottlob)——第478页。

鲍德尔特(Baudert)——第547页。

鲍德曼,冯(Bodman, von)——第625、626页。

鲍威尔,埃德加尔(Bauer, Edgar)——第129页。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第129页。

贝昂塞,德(Veance, de)——第61页。

贝克尔,约翰,菲利浦(Becker, Johann Philipp)——第4、5、15、78页。

贝托许-胡斯(Bethusy-Huc)——第119页。

比德曼,卡尔(Biedermann, Karl)——第218页。

彼得(Peter)——第33页。

彼得曼, 泰奥多尔(Petermann, Theodor)——第421页。

彼乌斯, 威廉·亨利希(Peus, Wilhelm Heinrich)——第511、641、642页。

俾斯麦, 奥托(Bismark, Otto)——第117、118、155、163、185—187、209、235、251、254—256、258、259、285、286、297、310、352、353、355、364、403、417、419、420、426、428、432、476、505、506、514、536、555、558、560、563、597、616、631、632、642、654—659页。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第82页。

毕尔克林(Bürklin)——第514页。

毕洛夫, 伯恩哈特·冯(Bülow, Bernhard von)——第437、447、458、459、464、467、558、609、610、613、617、638页。

毕谢尔, 卡尔(Bücher, Karl)——第412页。

毕辛(Busing)——第518、521页。

卜尼格先, 鲁道夫(Binnigsen, Rudolf)——第120、222、251、521、656页。

波尔吉娅, 鲁克雷蒂娅(Borgia, Lucrezia)——第92页。

波勒, L. A.(Pohle, L. A.)——第413页。

波赛东——第296页。

勃兰德斯, 乔治(Brandes, George)——第138页。

勃朗特, 麦克斯·冯(Brandt, Max von)——第441页。

勃廖艾尔(Bräuer)——第650页。

伯恩哈特, 格奥尔格(Bernhard, Georg)——第538、546页。

伯恩斯坦, 阿伦(Bernstein, Aaron)——第505页。

伯恩斯坦, 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第394—397、499、501—507、513、517—520、539—541、573、598页。

伯恩斯, 约翰(Burns, John)——第561、611页。

伯勒普什, 冯(Berlepsch, von)——第286页。

伯提歇尔, 卡尔·威廉(Böttcher, Karl Wilhelm)——第312、313、325、326、331、339、362、525页。

柏拉图(Plato)——第86、143、329、333页。

柏修斯(Perseus)——第231页。

博尔西希(Borsig)——第29页。

博麦尔堡, 泰奥多尔(Bömelburg, Theodor)——第566、568、573、604页。

博尼法齐乌斯(Bonifacius)——第478页。

博伊特勒(Beutler)——第632页。

- 布尔(Buhl)——第312、325页。
- 布尔克哈特,泰奥多尔(Burckhardt,Theodor)——第433页。
- 布赫尔,洛塔尔(Bucher,Lothar)——第117、658页。
- 布克尔,亨利·托马斯(Buckle, Henry Thomas)——第158页。
- 布拉斯,奥古斯特(Brass, August)——第658页。
- 布拉特(Brater)——第75、133页。
- 布劳恩,阿道夫(Braun, Adolf)——第538页。
- 布里安(Brian)——第572页。
- 布林格曼,奥古斯特(Bringmann, August)——第578—580页。
- 布鲁姆斯,罗伯特(Blums, Robert)——第421页。
- 布鲁诺,乔尔丹诺(Bruno, Giordano)——第229页。
- 布伦奇里,约翰·卡斯帕尔(Bluntschli, Johann Caspar)——第75、132、133页。
- 布伦坦诺,路德维希·约瑟夫(Brentano, Ludwig Joseph)——第121页。
- 布罗克豪斯,亨利希·爱德华(Brockhaus, Heinrich Eduard)——第218页。
- 布洛赫(Bloch)——第624、637页。
- 布洛斯,威廉(Blos, Wilhelm)——第430页。

C

- 蔡特金,克拉拉(Zetkin, Clara)——第573页。
- 查理一世(Karl I)——第480、507页。
- 楚拜尔(Zubeil)——第547、645页。

D

-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第146、490页。
- 达梅尔(Dammer)——第399、658页。
- 达斯巴赫(Dasbach)——第487页。
- 大卫,爱德华(David, Eduard)——第573、596、623、632页。
- 戴歇尔霍伊泽(Dechelhäuser)——第369页。
- 德尔布吕克,马丁·弗里德里希·鲁道夫(Delbruck, Martin Friedlich-Rudolf)
——第134、337、632页。
- 德尔卡塞(Delcasse)——第457页。
- 德累斯巴赫(Dreesbach)——第381页。

- 德赛非(Dessewffy)——第491页。
- 狄茨根,约瑟夫(Dietzgen,Josef)——第312页。
- 狄摩西尼(Demosthenes)——第386页。
- 迪毕赤,汉斯·冯(Diebitsch,Hans von)——第465页。
- 狄茨,约翰·亨利希·威廉(Dietz,Johann Heinrich Wilhelm)——第229、502、512、598页。
-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第555页。
- 杜毕伊,沙尔·亚历山大(Dupuy,Charles-Alexandre)——第554页。
- 端亲王(der Prinz Tuan)——第465页。
- 敦克尔,弗兰茨(Duncker,Franz)——第404、407、417、505页。
- 敦克尔,麦克斯(Duncker,Max)——第401页。

E

- 俄狄浦斯(**Ödipus**)——第235页。
- 厄尔特尔(Oertel)——第302—304、311页。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Friedrich)——第66、67、98、158、165、172、175、232、233、307—309、327、328、334、428、436、525、568、583、615、652、655、659、664页。

F

- 法博尔(Faber)——第438页。
- 菲勒克,路易(Vicreck,Louis)——第220页。
- 菲利浦(Philipp)——第386页。
-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 Feuerbach,Ludwig)——第83、129页。
- 费尔迪,H.(Ferdy,H.)——第152页。
- 费里,恩利科(Ferri,Enrico)——第648页。
- 费利茨,麦克斯·冯(Feilitzsch,Max von)——第226页。
- 费舍,理查德(Fischer,Richard)——第585、637页。
-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Fichte,Johann Gottlieb)——第327页。
- 芬德里希(Fendrich)——第624页。
- 福尔肯贝克,麦克斯·冯(Forckenbeck,Max von)——第114、417、520、521、656页。

-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Vollmar,Georg Heinrich)——第280、282—285、290、294—309、311、312、434、469、475、503—505、508—511、513—519、524、539、541—546、619页。
- 福斯特林,弗里德里希·威廉·艾米尔(Försterling,Friedrich Wilhelm Emil)——第422页。
-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Jules(Julius))——第52页。
-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Voltaire,Francois-Marie)——第143页。
- 弗洛里安妮,卢克勒蒂(Floriani,Lukretia)——第137页。
-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Ferdinand)——第146页。
- 弗莱塔格,奥托(Freytag,Otto)——第110页。
- 佛罗梅,卡尔·弗兰茨·埃贡(Frohme,Karl Franz Egon)——第292、345、535页。
- 弗兰克(Frank)——第619—622、625—629、635、636、638、649页。
- 弗兰肯贝格,F.冯(Frankenberg,F.von)——第161页。
- 弗雷泽(Freese)——第17、64页。
- 弗里茨(Fritz)——第290页。
- 弗里茨舍,弗里德里希·威廉(Fritzsche,Friedrich Wilhelm)——第11、104、128、163、399—403、422、658页。
- 弗里德伯格,拉波海尔(Friedeberg,Raphael)——第570、581—584页。
- 弗里德里希,希施弥勒(Friedrich,Hischemüller)——第461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第74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第465页。
- 傅立叶,沙尔(Fourier,Charlers)——第172—182、333页。
- 富兰克林,本杰明(Franklin,Benjamin)——第143页。
- 富尼埃(Fourniere)——第496页。

G

- 盖布,奥古斯特(Geib,August)——第11、425页。
- 盖得,茹尔(Guesde,Jules)——第553页。
- 盖尔曼(Germann)——第2页。
- 盖斯(Geiss)——第620、649页。
- 盖娅——第296页。
- 盖耶尔,弗里德里希(Geyer,Friedrich)——第593、632页。

- 盖泽尔夫人(Frau Geiser)——第419页。
-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Goethe, Johann Wolfgang)——第137—139、320、613、648页。
- 戈尔德曼,保尔(Goldmann, Paul)——第442页。
- 格尔拉赫,赫尔穆特(Gerlach, Hellmut)——第516、534页。
- 格拉夫,麦克斯(Graf, Max)——第493页。
- 格勒伯(Gröber)——第361页。
- 格雷(Göhre)——第505、514、515页。
- 格雷哥里(Greger)——第482页。
- 格里伦贝格尔,卡尔(Grillenberger, Karl)——第310、643页。
- 格鲁姆布莱希特(Grumbrecht)——第100页。
- 格罗伊利希(Greulich)——第610页。
- 格奈斯特,亨利希·鲁道夫·海耳曼·弗里德里希(Gneist, Heinrich Rudolf Hermann Friedrich)——第417页。
- 光绪皇帝(Kaiser Kwangsu)——第441、465页。
- 古特弗赖施(Gutfleisch)——第632页。

H

- 哈茨费尔特,索菲娅(Hatzfeldt, Sophie)——第7、424页。
- 哈格里沃斯,詹姆斯(Hargreaves, James)——第145页。
- 哈勒(Haller)——第542页。
- 哈马赫尔(Hamacher)——第369页。
- 哈默施泰因(Hammerstein)——第323、358页。
- 哈赛尔曼,威廉(Hasselmann, Wilhelm)——第96、164、650页。
- 哈森克莱维尔,威廉(Hasenclever, Wilhelm)——第163、422、434页。
- 哈特曼(Hartmann)——第29页。
- 哈特曼,爱德华·冯(Hartmann, Eduard von)——第140、523页。
- 哈特曼,格奥尔格·威廉(Hartmann, Georg Wilhelm)——第217页。
- 海克尔,恩斯特·亨利希(Haeckel, Ernst Heinrich)——第129页。
- 海克尔斯(Häckels)——第140页。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第58、344页。
- 海涅,沃尔夫冈(Heine, Wolfgang)——第499、501—503、505、520、537、538、545、573—575、577、578页。

- 海伍德(Haywood)——第613页。
- 海伊曼(Heymann)——第527页。
- 汉尼拔(Hannibal)——第541页。
- 豪斯迈斯特(Hausmeister)——第17页。
- 赫伯特(Herbert)——第509页。
- 赫德尔,麦克斯(Hödel,Max)——第110、185、251、254页。
- 赫尔德,赫尔曼·古斯塔夫(Held,Hermann Gustav)——第221页。
- 赫耳多尔夫,奥托·亨利希·冯(Helldorff,Otto Heinrich von)——第98、109、118、131、215页。
- 赫尔富特,路德维希(Herfurth,Ludwig)——第214页。
- 赫金,爱德蒙德·冯(Heyking,Edmund von)——第443页。
- 赫克纳,亨利希(Herkner,Heinrich)——第233、534页。
- 赫拉克利特(Heraklit)——第360页。
- 赫里佐斯托莫斯(Chrysostomus)——第84页。
- 赫普纳,阿道夫(Herpner,Adolf)——第428、429页。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第360、523页。
- 亨尼西,约翰·波普(Hennessy,John Pope)——第392页。
- 胡登,乌尔利希·冯(Hutten,Ulrich von)——第384页。
- 胡姆波尔特,A.(Humbold,A.)——第139、140页。
- 华莱士,罗伯特(Wallace,Robert)——第143页。
- 华盛顿,乔治(Washington,George)——第97页。
- 霍夫曼,卡尔(Hofmann,Karl)——第101页。
- 霍夫施泰滕,约翰·巴普提斯特(Hofstetten,Johann Baptist)——第653、657页。
- 霍弗尔贝克(Hoverbeck)——第417、505页。
- 霍亨瓦尔特(Hohenwart)——第64页。
- 霍霍夫,W.(Hohoff,W.)——第80页。

J

- 基尔希曼,尤利乌斯·海尔曼(Kirchmann,Julius Hermann)——第505页。
- 吉尔斯(Gilles)——第438页。
- 济格勒(Siegle)——第379页。

济金根, 弗兰茨·冯(Sickingen, Franz von)——第384页。
伽利略, 伽利莱(Galilei, Galileo)——第229页。
觉勒, 保尔(Göhre, Paul)——第538页。

K

卡贝, 埃蒂耶纳(Cabel, Étienne)——第333页。
卡德穆斯(Kadmus)——第315页。
卡尔大帝(Karl der Grosse)——第453页。
卡尔多尔夫, 威廉(Kardorff, Wilhelm)——第518页。
卡尼茨, 汉斯·威廉·亚历山大(Kanitz, Hans Wilhelm Alexander)——
第315页。
卡诺, 玛丽·弗朗斯瓦·萨迪(Carnot, Marie-Francois-Sadi)——第663页。
卡佩尔, 奥古斯特(Kapell, August)——第274页。
卡普里维, 列奥(Caprivi, Leo)——第285、368页。
凯尔(Keil)——第620、624页。
凯泽尔, 麦克斯(Kayser, Max)——第164页。
康帕内拉(Campanelli)——第333页。
康塔格雷尔(Cantagrel)——第177页。
考茨基, 卡尔(Kautsky, Karl)——第328、387、528、529、556、557、573、578页。
科堡·冯(Coburg, von)——第653页。
科恩(Cohn)——第303页。
科尔布(Kolb)——第503、619、620、622、624、625、629、631、635—637、648、
649页。
科尔夫, 冯(Korff, von)——第438页。
科赫(Koch)——第510页。
科茨克(Kotzke)——第639页。
克德林, 克莱门斯·冯(Kettler, Klemens von)——第437、449、450、457页。
克拉默-克勒特(Cramer-Klett)——第29页。
克莱斯特-雷措夫, 汉斯·胡果(Kleist-Retzow, Hans Hugo)——第99、100、
104页。
克雷波斯, R.(Krebs, R.)——第2页。
克雷门斯一世(Clemens I)——第482页。
克雷门斯五世(Clemens V)——第478页。

克里桑斯托穆斯, 圣·约翰(Chrisostomus, St. Johannes)——第482页。
克虏伯(Krupp)——第29、339、351、371、412页。
克伦威尔, 奥利弗(Cromwell, Oliver)——第334、507页。
克奈尔克(**Knörcke**)——第365页。
克瓦尔克, 麦克斯(Quarck, Max)——第536页。
孔布内阁(das Ministerium Cmbes)——第560页。
孔夫子(Konfuzius)——第82、441页。
孔西得朗, 维克多(Considérant, Victor)——第177页。
库勒曼, 威廉(Kulemann, Wilhelm)——第216、217、229页。
库塞罗夫, 冯(Kusserow, von)——第653、657页。

L

拉萨尔, 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第8、37、39、41、62、66、74、75、
83、117、120、158、232、267、299、322、327、331、381、399、400、418、421、
436、470、476、525、597、651、652、654、658、659页。
拉斯克尔, 爱德华(Lasker, Eduard)——第101、212、213、425、656页。
拉策尔(Ratzel)——第140页。
莱辛, 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第531页。
莱希哈尔德-施特罗姆贝格, 马蒂尔德(Reichardt-Stromberg, Mathilde)
——第136页。
赖辛施佩格, 彼得·弗兰茨(Reichensperger, Peter Franz)——第118、
133、488页。
赖因克, 彼得·阿道夫(Reinke, Peter Adolf)——第422页。
兰道威尔(Landauer)——第387、388页。
兰格, 赛米尔(Laing, Samuel)——第151页。
朗格,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Lange, Friedrich Albert)——第4、120页。
劳, 卡尔·亨利希(Rau, Karl Heinrich)——第121、341、342页。
劳赫(Rauch)——第622页。
劳滕施莱格(**Lautenschläger**)——第493页。
勒南, 厄内斯特·约瑟夫(Renan, Ernest-Joseph)——第129页。
勒瓦尔德, 范妮(Lewald, Fanny)——第136、137页。
勒文斯坦, 加布里尔(**Löwenstein, Gabriel**)——第542页。
雷曼(Remann)——第638页。
李伯尔, 恩斯特(Lieber, Ernst)——第456、457、465、466、489、490页。

- 李卜克内西, 卡尔(Liebknrecht, Karl)——第617页。
- 李卜克内西, 威廉(Liebknrecht, Wilhelm)——第2、7、67、72、77、78、128、163、228、268—270、308、323、325、358、361、387、403、416—436、475、512、525、532、533、556、573、584、598、643、651、652、655、657页。
- 李凯特(Rickert)——第100页。
- 李希特尔, 欧根(Richter, Eugen)——第247、319、328、329、345、349、356、358、359、361、365—371、373—379、384、385、634页。
- 列费佐夫, 冯(Levetzow, von)——第514页。
- 列金, 卡尔(Legien, Carl)——第398、571、572、580页。
- 列曼(Lehmann)——第541页。
- 林达乌, 保尔(Lindau, Paul)——第657页。
- 林德曼(Lindemann)——第620页。
- 卢森堡, 罗莎(Luxemburg, Rosa)——第615、647页。
- 卢梭, 让·雅克(Rousseau, Jean-Jacques)——第174页。
- 鲁波莱希特(Ruprecht)——第465页。
- 鲁齐乌斯(Lucius)——第274页。
- 路德, 马丁(Luther, Martin)——第383、384、479页。
- 路特希尔德, 冯(Rothschild, von)——第333页。
- 路易十六(Ludwig XVI)——第364、480、507、509页。
- 罗伯茨(Roberts)——第463页。
- 罗恩, 泰奥多尔(Rohn, Theodor)——第494页。
- 罗兰(Roland)——第506页。
- 罗兰-霍尔斯特(Roland-Holst)——第573页。
- 罗斯梅斯勒, 艾米尔·阿道夫(Rossmässler, Emil Adolf)——第399、421页。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约翰·卡尔(Ro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第120、327、341、342页。
- 洛伊施纳(Leuschner)——第344页。
- 吕布凯尔特(Lübker)——第400页。
- 吕特, 菲利浦·奥古斯特(Rüdt, Philipp August)——第220页。

M

-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第143、145、146、148—152页。

- 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第91页。
- 马克思,卡尔(Marx,Karl)——第5、15、78、80、83、109、117、131、143、150、151、158、172、231—234、239、244—246、299、308、312、327、328、334、428、436、525、546、547、583、615、655、658—661页。
- 马索夫,冯(Massw,von)——第353页。
- 玛丽-安东尼达(Marie-Antoinette)——第480页。
- 玛丽亚(Marie)——第497页。
- 迈,纳普哈埃尔(May,Naphael)——第397页。
- 迈耶尔,古斯塔夫(Meyer,Gustav)——第657、659页。
- 迈耶尔,鲁道夫·海尔曼(Meyer,Rudolph Hermann)——第131、536页。
- 迈耶尔,卡尔(Mayer,Karl)——第17页。
- 麦兰德,菲力浦(Mainländer,Philipp)——第130、140页。
- 麦斯特,亨利希·恩斯特·奥古斯特(Meister,Heinrich Ernst August)——第542页。
- 毛伦布勒歇尔(Maurenbrecher)——第594、601—603、606页。
- 毛奇,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Moltke,Helmut Karl Bernhard)——第219页。
- 梅茨格尔,弗里德里希·威廉(Metzger,Friedrich Wilhelm)——第598页。
- 梅林,弗兰茨(Mehring,Franz)——第502、505、651、652、654—657页。
- 梅奈特(Mehnert)——第315、316页。
- 美杜莎(Medusen)——第231、234页。
- 靡菲斯特斐勒司(Mephistopheles)——第320页。
- 门德,弗里茨(Mende,Fritz)——第7、8、270、422、424页。
- 孟德斯鸠,沙尔(Montesquieu,Charles)——第307页。
- 弥勒(Miller)——第303页。
- 弥勒,阿道夫(Müller,Adolf)——第620页。
- 弥凯,亚历山大·爱德华·冯(Mücke,Alexander Eduard von)——第75页。
- 米凯尔,约翰(Miquel,Johannes)——第351、656页。
- 米拉波,奥诺雷·加布里埃尔(Mirabeau,Honoré-Gabriel)——第174页。
- 米勒,冯(Mühler,von)——第68页。
- 米勒兰,亚历山大·埃蒂耶纳(Millerand,Alexander Étienne)——第544、545、553、554、560、564、565页。

密那发(Minerva)——第273页。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Morgan, Lewis Henry)——第141页。
摩莱里(Morelli)——第333页。
莫尔,托马斯(More, Thomas)——第333页。
莫尔根施特恩,Fr.(Morgenstein, Fr.)——第234页。
莫尔肯布尔,海尔曼(Molkenbuhr, Hermann)——第571、629、630页。
莫斯特,约翰(Most, Johann)——第129、650页。
莫特勒,尤利乌斯(Mottler, Julius)——第423、512页。
穆尔(Moor)——第554、555页。
穆罕默德(Mohammed)——第82、93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第61、149页。
穆勒,詹姆斯(Mill, James)——第149页。
穆泽尔(Muser)——第220页。

N

拿破仑第一(Napoléon I)——第465页。
拿破仑第三(Napoléon III)——第163、185、186、426、563、616页。
纳齐安茨,格雷哥里·冯(Nazianz, Gregor von)——第91页。
纳乌曼,弗里德里希(Naumann, Friedrich)——第533、549页。
瑙曼(Naumann)——第641页。
尼德尔奥艾尔(Niederauer)——第290页。
尼古劳斯五世(Nikolaus V)——第478页。
尼特哈默尔,阿尔伯特·尤利乌斯(Niethammer, Albert Julius)——第167—171页。
纽文胡斯,斐迪南·多梅拉(Nieuwenhuis, Ferdinand Domela)——第570、607、615页。
诺贝,摩里茨·奥古斯图斯(Nobbe, Moritz Augustus)——第217页。
诺比林,卡尔·爱德华(Nobiling, Karl Eduard)——第110、111、185、252页。
诺曼,冯(Normann, von)——第504、507、515、516、525页。
诺斯提茨-瓦尔维茨,赫尔曼·冯(Nostitz-Wallwitz, Hermann von)——第225页。

O

- 欧塞毕乌斯(Eusebius)——第84页。
欧文, 罗伯特(Owen, Robert)——第176、333页。

P

- 帕尔乌斯(Parvus, 即亚历山大·格尔方德Alexander Helphand)——第542页。
潘涅库克, 安东(Pannekoek, Anton)——第647页。
片山潜(Katayama)——第611页。
普法伊夫勒(Pfeiffle)——第649页。
普凡库赫, 威廉(Pfannkuck, Wilhelm)——第424页。
普菲菲尔, 爱德华(Pfeiffer, Eduard)——第2、52页。
普拉内贝格(Planenberg)——第115页。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第611页。
普特卡默, 罗伯特, 维克多(Puttkamer, Robert Victor)——第225、229、404页。
普特卡默—普劳特(puttkamer—plauth)——第225页。

Q

- 齐格勒(Ziegler)——第505页。
齐莱森, 卡普兰(Zillesen, Kaplan)——第493页。
乔治·桑(George Sand)——第137—139页。
琼塞(Joice)——第507页。
丘必特(Jupiter)——第86、273页。
屈韦特尔, 弗里德里希·冯(Kühlwetter, Friedrich von)——第67、69页。

R

- 饶勒斯, 让(Jaurés, Jean)——第392、551—565、573、610、617页。
热罗尼莫(Hieronymus)——第91页。

S

- 萨克斯,艾曼努埃尔(Sax,Emanuei)——第233页。
- 萨克斯,汉斯(Sachs,Hans)——第220、221页。
- 萨姆特(Samter)——第121页。
- 萨维尼,弗里德里希·卡尔·冯(Savigny,Friedrich Karl von)——第535页。
- 沙恩,亨利希·泰奥多尔·冯(Schön,Heinrich Theodor von)——第464页。
- 舍恩兰克,布鲁诺(Schonlank,Bruno)——第233页。
- 舍尔(Scheel)——第121页。
- 圣彼得(der heilige Petrus)——第86页。
-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 Henri)——第333页。
- 圣约翰(Sankt Johannis)——第86页。
- 施杜姆,卡尔(Stumm, Karl)——第339、347、350、369、371、412页。
- 施拉德尔(Schrader)——第326页。
- 施拉普斯,莱恩霍尔德·亨利希(Schraps, Reinhold Heinrich)——第421、422、425页。
- 施米特(Schmidt)——第337页。
- 施米特,莱恩哈特(Schmidt,Reinhard)——第514页。
- 施米特,罗伯特(Schmidt,Robert)——第572、573、578页。
- 施穆勒,古斯塔夫(Schmoller, Gustav)——第121页。
- 施纳佩尔-阿恩特(Schnapper-Arndt)——第233页。
- 施佩尔林(Sperling)——第382页。
- 施皮尔,赛米尔(Spier, Samuel)——第163、425页。
- 施帕尔-阿格内斯(Spur-Agnes)——第319、329、377、378页。
- 施塔特哈根,阿尔都尔(Stadthagen, Arthur)——第359、535、574页。
- 施泰因,卡尔·冯(Stein, Karl von)——第337、464页。
- 施特克尔(Stoecker)——第215、350、357、360、379、381—383页。
-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ss, David Friedrich)——第129、130页。
- 施梯伯,威廉(Stieber, Wilhelm)——第67页。
-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 Max)——第569页。
- 施图贝尔(Stübel)——第443页。
- 施托什,阿尔勃莱希特·冯(Stosch, Albrecht von)——第114页。
- 施托尔贝格-韦尔尼格罗德,奥托(Stolberg-Wernigerode, Otto)——第109、

520页。

施韦希尔, 罗伯特(Schweichel, Robert)——第2、417、423页。

施韦泽, 约翰, 巴普提斯特·冯(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von)——第7、10、163、269、270、306、400、401、418、421、422—424、426、427、431、643、651—660页。

施维耶图夫人(Frau Swienty)——第419页。

释迦牟尼(Buddha)——第82、85、93页。

叔本华, 阿尔都尔(Schopenhauer, Arthur)——第84、140、523页。

舒尔采-德里奇, 海尔曼(Schulze-Delitzsch, Hermann)——第24—26、37、52、303、321、322、417、505页。

绍波(Schob)——第400页。

司徒卢威, 古斯达夫(Struve, Gustav)——第419页。

斯宾塞, 赫伯特(Spencer, Herbert)——第151页。

斯芬克斯——第235页。

斯塔姆普费尔, 弗里德里希(Stampfer, Friedrich)——第600、601页。

斯图亚特, 詹姆斯(Steuart, James)——第143页。

苏格拉底(Sokrates)——第82、85、86页。

索罗亚斯德(Zoroaster)——第85页。

T

唐森, 约瑟夫(Townsend, Joseph)——第143页。

特耳克, 卡尔·威廉(Tölcke, Karl Wilhelm)——第401、403、655页。

特赖奇克, 亨利希·冯(Treitschke, Heinrich von)——第67、70页。

特雷桑德-马尔塞勒(Tressand-Marseille)——第570页。

特里普(Trip)——第67、69页。

特吕尔斯特拉——第551页。

特森多尔夫, 海尔曼·恩斯特·克利斯提安(Tessendorff, Hermann Ernst Christian)——第403、404页。

特韦斯顿, 卡尔(Twesten, Karl)——第417、418、656页。

蒂姆(Timm)——第622页。

图恩, 阿尔丰斯(Thun, Alphons)——第233页。

图纳恩(Thünen)——第120页。

托德斯西尼(Todeschini)——第610页。

托拉德(Thorade)——第2页。
托马斯(Thomas)——第628页。

W

瓦德西,阿尔弗莱德·冯(Waldersee, Alfred von)——第457、463页。
瓦耳泰希,卡尔·尤利乌斯(Vahlteich, Karl Julius)——第399、421页。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莱奥(Waldeck, Benedikt Franz Leo)
——第417、505页。
瓦尔德克-卢梭,勒奈(Waldeck-Rousseau, Rene)——第174、554、560、564
页。
瓦格纳,阿道夫(Wagner, Adolph)——第121、149、150、152、153、341、342、
633页。
瓦特,詹姆斯(Watt, James)——第145页。
瓦扬,爱德华·玛丽(Vaillant, Eouard-Marie)——第553、617页。
王德威尔得,艾米尔(Vandervelde, Emile)——第557、558页。
微耳和,鲁道夫(Virchow, Rudolf)——第129、150页。
威廉一世(Wilhelm I)——第111、616、655页。
威廉二世(Wilhelm II)——第444、507、509、511、516、540页。
威伦普芬尼希(Wehrenpfennig)——第119页。
威纳尔(Werner)——第275、279、290、291页。
韦尔凯尔,卡尔·泰奥多尔(Welcker, Karl Theodor)——第132、133页。
韦兰德,昂布鲁西乌斯·冯(Weiland, Ambrosius von)——第482页。
韦斯帕西安(Vespasian)——第658页。
维伯,悉尼·詹姆斯(Webb, Sidney James)——第412页。
维尔德贝格尔(Wildberger)——第280、281、290—292页。
维尔特(Wirth)——第653页。
沃里斯霍费尔(Wörishoffer)——第238页。
乌尔里希(Ulrich)——第632页。
乌特克,亨利希(Wuttke, Heinrich)——第420页。

X

希尔登布兰特(Hildenbrabnd)——第622页。
希尔施,卡尔(Hirsch, Karl)——第429页。

希尔施, 麦克斯(Hirsch, Max)——第2、98、100、101、105、401、404、407、423页。
希法亭, 鲁道夫(Hilferding, Rudolf)——第603页。
希施弥勒, 弗里德里希(Hischemüller, Friedrich)——第461页。
西哀士, 艾曼纽尔·约瑟夫(Sieyès, Emmanuel-Joseph)——第174页。
西尔贝施密特, 海尔曼(Silberschmidt, Hermann)——第591、593、598页。
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第478页。
西姆桑, 马丁·爱德华·西吉兹蒙特(Simson, Martin Eduard Sigismund)
——第520、521、656页。
西内西乌斯(Synesius)——第91页。
席尔, 斐迪南·冯(Schill, Ferdinand von)——第464页。
席勒, 弗里德里希(Schiller, Friedrich)——第340、575页。
谢德勒(Schgädler)——第469、474—476、478、480、483、493页。
谢夫莱, 阿尔伯特·埃伯哈德·弗里德里希(Schäffle, Albert Eberhart
Friedrich)——第121、139页。
辛格尔, 保尔(Singer, Paul)——第222、228、275、371、434、435、467、509、
520、528、533、554、643页。
伯特古姆, 阿尔伯特(Sudekum, Albert)——第504页。

Y

雅克(Jacques)——第138页。
雅斯特洛夫(Jastrow)——第536页。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第91、143、329页。
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第92页。
耶稣(Jesu)——第82、83、86、91、93、320、451、478页。
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第91、478页。
雨果, 维克多(Hugo, Victor)——第565页。
约克, 汉斯·大卫·路德维希·冯·瓦滕堡伯爵(York, Hans David Ludwig,
Graf von Wartenburg)——第464、465页。
约克, 泰奥多尔(Yorck, Theodor)——第11、402、425页。

Z

泽吉茨, 马丁(Segitz, Martin)——第469、542、620页。
宗内曼, 列奥波特(Sonnemann, Leopold)——第2页。